

这段史实是时代的缩影，是向民主与自由进军的号角，是反封建、反专制的一场鏖战，是黑暗与黎明的搏斗。当年的言行不是个人的异想，也不是事件的偶然，是历史造就的必然结果。逝者如斯，愿其沉淀会促使今后历史的发展！

“星火”案幸存者：谭蝉雪

面对“国家社会主义”体制造成的政治、经济的全面危机，《星火》所表现出的历史和社会责任感、高瞻远瞩的眼光、政治和思想的坚定性、理论的批判力量和行动的勇气，确实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一道“天火”，照亮了现实的黑暗，也为未来播下了火种。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钱理群

【当代华语世界人文历史丛书】

炼狱归魂

——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

Return to Purgatory

*Memories of Survivors of the "Spark" Case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1957—1981)

向承鉴 著

 博登书屋
Bouden House
New York

【当代华语世界人文历史丛书】

学术顾问：黎安友

主 编：荣 伟

副 主 编：罗慰年

Academic Adviser: Andrew J. Nathan

Chief Editor: David Rong

Deputy Editor: William Luo

Published by Bouden House, New York

Return to Purgatory

Memories of Survivors of the "Spark" Case During the Great Famine

炼狱归魂

——大饥荒年代“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1957—1981）

向承鉴 著

封面版画：胡杰

出版：博登书屋·纽约（Bouden House·New York）

邮箱：boudenhouse@gmail.com

发行：谷歌图书（电子版）、亚马逊（纸质版）

版次：2024年3月 第一版 第一次印刷

字数：394千字

定价：\$45.00 美元

Copyright © 2024 by Bouden House, www.boudenhouse.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review.

作品内容受国际知识产权公约保护，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作者介绍

向承鉴，生于1938年农历冬月廿九（阳历1939年1月19日），江西省武宁人，祖籍河南省光山县。1956年夏毕业于江西九江一中，同年被全国五所重点理工大学之一的兰州大学化学系录取。1957年6月被划成右派，1958年8月按“劳动考察”处分，遣送到甘肃省天水农村参加劳动。

在水武山，亲历“大跃进”、大饥荒造成的灾难，与张春元等民主先驱挺身反抗，创办地下刊物《星火》，批判共产风，探讨社会出路。1960年案发被捕，在看守所单独关押一年多。1962年7月，在武山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八年。先后在位于天水的甘肃省第三监狱、兰州砖瓦厂服刑。1966年“文革”开始，12月随长期服刑犯人押送至甘肃玉门饮马农场，1970年1月被押送至青海省贵南县巴仓农场，次年调往青海德令哈农场。

1978年9月刑满，留场就业；后调到总场的育红中学（农场子弟中学）任教。

1981年冤案平反，回到兰州。在兰州连城铝厂中学任教。1984年获兰州大学补发的大学本科毕业证书，被评为中学高级教师。曾任该校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

1996年退休后，从事研究和写作，著有回忆录《炼狱归魂》《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等。

目 录

黑暗时代的星火与幸存——读向承鉴回忆录《炼狱归魂》 艾晓明	1
一、学府暴政——兰大反右之殇 / 2	
二、暗夜星火——《星火》的思想光芒 / 9	
三、西部炼狱——“我不服，永远不服” / 21	
四、“不堪回首偏回首”：记忆的生死存亡 / 33	
不堪回首偏回首（代序）	37

上 篇 正青春喋血时

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	41
一、灭顶之灾 / 41	
二、“阳谋” / 44	
三、兰大反右的第一个“牺牲” / 50	
四、我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 52	
五、列车上的邂逅 / 54	
六、泪像剪不断的线 / 58	
七、短暂的恋情 / 61	
第二章 右派学生的酷暑寒冬	66
一、住在“棺材”里的人 / 66	
二、“疲劳战” / 70	
三、孙自筠和冯淑筠 / 73	
四、世上没有救世主 / 77	

五、万壑千山有穷时 / 81

六、离校前的日子 / 85

第三章 疯狂的岁月 91

一、乍到联丰社 / 91

二、最轻的劳动也能累断腰 / 96

三、一喜一忧皆惊雷 / 99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 / 103

五、在“大跃进”日子里 / 107

六、大炼钢铁续篇 / 114

七、“命令”原是恶作剧 / 118

八、“地质矿产普查队” / 122

九、住病房的日子 / 127

第四章 求索之路 132

一、“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 132

二、创办盐井公社综合化肥厂 / 138

三、万户萧疏鬼唱歌 / 143

四、《星火》 / 147

五、我和杜映华 / 151

六、我和张春元 / 155

七、进地狱的时刻 / 159

中篇 炼狱行

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 165

一、“你的代号是十一号” / 165

二、“我是政治犯，要享受政治犯一切待遇！” / 169

三、第一回交锋 / 174

四、“刺刀见红” / 179	
五、杨森其人 / 185	
六、南号记实 / 192	
七、又戴手铐 / 197	
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202	
九、宣判 / 209	
第二章 上诉中院.....	216
一、董剑青和马象乾 / 216	
二、糊鞋里子和纳鞋底 / 220	
三、忘不了一双圣洁的眼睛 / 222	
四、1963年春节 / 225	
五、“我不服，永远不服！” / 228	
第三章 “脱胎换骨”	233
一、不期而遇张炳秋 / 233	
二、装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 236	
三、心在不停地颤栗 / 240	
四、出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 243	
五、张炳秋是“畏罪自杀”！ / 246	
六、“冬训” / 249	
七、四中队跑了一个犯人 / 253	
八、劳改队的另类犯人 / 256	
九、处决袁同礼 / 260	
十、韩教导员“畏罪自杀”了！ / 262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	265
一、武威火车站一瞥 / 265	
二、黄闸湾修跌水 / 267	

- 三、倒土坯 / 270
- 四、捉奸捉双 / 273
- 五、疏勒河畔 / 276
- 六、姐姐的信 / 279
- 七、在四站住病房的日子 / 283
- 八、六八年底冬训 / 287
- 九、“你就是何案的总后台！” / 291
- 十、双重夹击 / 294
- 十一、阴霾重重三月天 / 297
- 十二、与邹庆礼、周有祥重逢 / 300
- 十三、小蝇末虫可恶的纠缠 / 304
- 十四、第一次秋收劳动 / 307
- 十五、大搬迁前后 / 311

第五章 日月山下 318

- 一、最初印象 / 318
- 二、陈康年和他的犯人小组 / 321
- 三、听来的“故事” / 325
- 四、种土豆撞上“恶煞” / 330
- 五、又一次遭遇“恶煞” / 334
- 六、锄草和秋收前后 / 337
- 七、饥饿，除了饥饿还是饥饿！ / 341
- 八、燃烧的大年初一夜！ / 345
- 九、触目惊心的“一打三反” / 347
- 十、最危险的时候！ / 350
- 十一、1972年春节 / 355

第六章 转机 358

- 一、树挪死，人挪活 / 358

- 二、朱彬其人其事 / 361
- 三、我认识的初立朋 / 365
- 四、我认识的姚士彦 / 367
- 五、制造 5406 菌肥 / 371
- 六、几件小事 / 374
- 七、没有不散的筵席 / 377
- 八、爬过一山又一山 / 380
- 九、听红卫兵讲故事 / 385
- 十、又当“自由”犯 / 388
- 十一、修理组和修理车间 / 391
- 十二、第一次承接任务 / 394
- 十三、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 397
- 十四、当辅导员 / 400
- 十五、看望肖恒和姚士彦 / 404
- 十六、刑满前对劳改农场的思考 / 407

下 篇 归 魂 路

- 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413
 - 一、初上讲台第一课 / 413
 - 二、和鲁××的邂逅 / 419
 - 三、和×女士的交往 / 424
 - 四、探亲记 / 430
 - 五、“桃花运” / 436
- 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441
 - 一、2010 号房 / 441
 - 二、“右派改正” / 446

三、历历往事、斑斑血泪！ / 452	
四、给邓小平写信 / 455	
五、天水中院行 / 459	
六、又见孙自筠 / 464	
七、与王暉交谈 / 469	
八、永别了，劳改农场 / 472	
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	480
一、二次探亲 / 480	
二、草草完婚，急急上课 / 484	
三、武山之行 / 487	
四、“我不信邪！” / 491	
五、侄女冯英茜来访 / 493	
六、魂兮归来 / 495	
尾 声	498
后 记	503
附录一：向承鉴为《星火》所撰的六篇文稿.....	504
文稿一：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 504	
文稿二：自白 / 511	
文稿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 512	
文稿四：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 《南泥湾的方向》 / 514	
文稿五：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 ——目前农村剖视之一 / 516	
文稿六：告全国人民书 / 522	

附录二：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寻访“星火”连载四	524
附录三：向承鉴及其《星火》冤案年表	537
编后记	547

黑暗时代的星火与幸存

——读向承鉴回忆录《炼狱归魂》

艾晓明

《炼狱归魂——甘肃“星火案”幸存者的回忆（1957-1981）》，作者向承鉴，是当年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的当事人。1960年，亲历大饥荒的惨烈后果，被发配在天水武山农村“劳动考查”的兰州大学右派学生，自印刊物《星火》，揭露极权罪恶，发起抗争行动。这部回忆录的部分章节，曾收入到《星火》幸存者谭蝉雪的《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¹一书中，初稿曾分章载于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页；² 全书尚未正式出版。

这部回忆录分为上、中、下三部，全书共十三章，超过35万字。

第一部《正青春喋血时》有四章内容，包括兰大的鸣放和反右两章，押送到天水武山县劳动考查两章，时间从1957年开始到1960年9月底案发被捕。

第二部《炼狱行》共六章，记录了作者被捕后十九年的经历。前两章的内容是在武山看守所关押至上诉被驳回，定罪判刑，前后时间22个月。接下来的四章分别为在兰州砖瓦厂服刑近四年，文革开始后到饮马农场三年，再迁至青海门源的巴仓农场接近两年，最后到达德令哈农场，在此服刑八年。时间跨度从1960年9月30日

1 有关“星火”一案，谭蝉雪先出版了：《求索：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该书的修订版见谭蝉雪：《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本文引用的是修订版的电子版。

2 向承鉴：《炼狱归魂》，<http://www.mjsh.cc/Book.aspx?cid=2&tid=3287> 现在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网站已经停止更新，相关文库还能保存多久，已经难以预料。

至 1979 年右派改正开始。

第三部《归魂路》三章，记叙了作者在劳改释放后留场就业和生活的状态。平反冤假错案开始后，他回到兰州，与同案难友往返天水争取到全案平反，并继续上诉，推翻了有关言论有错的结论，得获无罪判决。此后回到兰州工作，重建个人生活。

作为当年一桩大案要案的当事人，同时也是反右、劳改的幸存者，向承鉴的回忆对于研究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有着重要价值。首先，它是继谭蝉雪的《求索》之后有关《星火》案的又一证言，是关于这场抗争的历史文献。作者呈现了案发前后的社会脉络，描述了《星火》同人——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思想者挑战极权专制的壮举。第二，它是西部多所劳改营的记录，作者描述了在甘肃、青海等地长达十八年的劳改经历，揭开了中国式古拉格的西部长卷。第三，它是一位反抗者个人的心灵史，作者展示了在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力碾压下他经历的痛苦磨难与生死历练。

展读这部回忆录，犹如进入通向黑暗时代的隧道。这一切首先是从 1957 年反右运动开始的。

一、学府暴政——兰大反右之殇

1957 年鸣放时期，向承鉴年方十八，时值大学一年级下学期。他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鸣放，还被选为班里鸣放委员会的委员。当时所提的意见，在高校中也有普遍性，如赞成“教授治校”，对大字报中暴露出来的某校领导作风败坏提出批评……反右期间，这些言论被恶意扭曲，成了“向党进攻”，甚至夸大为“要杀共产党”。如此，他经历了有团省委宣传部部长指导下的班级批斗会，被兰大党委“点将台”点名划右……青春喋血，苦难命运由此拉开序幕。

在向承鉴的反右经历中，呈现了那个时代怎样的面向呢？

从今天的标准来看，向承鉴和他的学友们当年所提意见不要说都是正确的，即使有错误，也完全符合整风中“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原则。值得深思的并不在于这些意见的是非本身，而是在于，

鸣放到反右这个急转弯，它出尔反尔，不合情理；这种全然反理性的政治实践，却怎么变成了人们普遍接受的现实？它的实质是什么，意义在哪里？

从反右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来看，右派的命运已事先注定。无论这些右派学生是否真的“反党”，他们早就被预设为反党分子了。大专院校在每个地区都是整风的重点场所，兰州大学在甘肃是首屈一指的重点院校，而向承鉴所在的化学系，在甘肃省的整风反右中，则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那篇反右的冲锋号——6月8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后不到十天，在1957年的6月17、18日，甘肃省委由张仲良、常志修召开会议，检查了兰大和西北师范学院的整风工作，并向中央办公厅做了如下汇报，其中已经定下来右派学生的人数比例：

兰大的情况是：右派分子以副校长陈思伟（九三）及化学系主任左宗其（陈的爱人）为首想夺取学校的领导权，认为校长林迪生（党员）无能力，是奴才，教务长陆绒林（校党委委员）是宗派主义者。他们主张学校并系，企图把党员系主任给并掉。十六日陈带了三个学生去西安要求派教授来兰大，以便扩大自己的势力。兰大的师生人员情况是：助教以上共有二〇六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八点七强，中间派占百分之七十一一点八强，右派占百分之十九点四强。学生共有一五一九人，其中左派占百分之二十四点四，中间派占百分之六十二点六，右派占百分之十三。³

在向承鉴的回忆中，兰大的鸣放正是从陈时伟传达当年最高国务会议精神开始的，主持这个会议的就是毛泽东主席。经过层层动员，甚至上升到对待党的态度这个高度，学生们才积极投入到整风运动中。结果，陈时伟成了兰大反右的第一个牺牲，向承鉴也位于首批被划为右派的二十个学生之一。按照上述汇报，兰州大学已经划出了将近二百的右派学生。这也就是向承鉴所说的，参加了两周

3 《情况简报（整风专辑）汇编（一）》，第59页。见宋永毅主编：《反右绝密文件》第1卷，国史出版社，2015年第1版（电子版）。

的鸣放，决定了一生的命运。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疾风暴雨中，年轻学生怎么会认罪呢？的确，在相对安稳和宽松的政治环境下，无法理解一个正常的学人，怎么能够失去尊严和傲骨，接受自我批判和羞辱。

然而回到当年的历史环境，就能明白，反右全然不是会议和文件中的思想观念之争，而是思想专制在所有人群众中展开的言论入罪实践，是一场波及全国各阶层的强迫认罪运动。在这里，针对单位里任何领导或者具体工作的批评都可以成为罪状，如果有伸张公民权利的意见以及其他政治性言论，那就更是弥天大罪。当年同样被划为右派的大学生陶渭熊，将这一时期高校内的反右称之为学府暴政，其特征之一就是校园完全变成了审判罪犯的场所：

反右时学校就是法院。每个系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是审判庭，都可以对学生进行审讯、逼供、量刑、定罪。而这样的审判，不需公安机关的侦察取证，不需检察院提起公诉，不需要律师辩护，更不准个人申辩，也没得正式的判决书；一句话，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只需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甚至党员个人认定某学生是右派分子，就可以对他实施一系列的非法审判。⁴

为了迫使学生和教师自承右派的角色，将自己人格化为新生的阶级敌人，从而证实高层反右的必要性，各种精神和肉体的迫害随之而来。陶渭熊将这个有组织、程序化的强迫认罪过程概括为八点：

1. 大字报围攻
2. 批判斗争
3. 非法搜查
4. 监视、隔离
5. 栽赃陷害
6. 道德审判

4 陶渭熊：《反右运动中的学府暴政》，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05810>

7. 党的判决书

8. 对未成年人的审判

在这一系列通过行政力量贯彻执行的“猎巫”行动中，向承鉴这个稚气未脱也从未设防的单纯学生，正如他的兰大难友一样，陷入了荒谬的处境。如果他真心反党，这可以说是一场悲剧；可是他不仅不反党，而且对党有着全身心的情感认同。根据共产党的阶级路线，他出身贫困家庭，这是党的阶级基础。党在他的心中，正如歌曲中的比喻，是穷苦人民的救星。他在班级批判会上就是这样反驳的：

交代“我要杀共产党”吗？这话我没说过，谁说了谁交代，与我无关。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没神经错乱。我家世代贫农，我自幼逃荒要饭，是共产党救了我和我全家。解放后我是全县第一任少先队队长，我姐是全县第一个共青团员；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助学金，对共产党只有感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对共产党恨从何而来？

没有人回答向承鉴的问题，相反，同情他、拒绝揭发他的朋友如冯淑筠等人，相继被划为右派。仇恨宣传使年轻人分裂，右派学生顶着莫须有的罪名，被孤立、唾弃，落入仇恨和鄙视的陷阱。当年的报纸宣传，反右的调门日益增高，语言暴力和人格侮辱花样翻新，由这种舆论煽动起来的强迫认罪，把寝室也变成了囚笼。向承鉴如此描写了他的处境：

我的床四周，靠墙的一面贴着各种标语、口号；其他三面用绳子拦住，绳上挂满条幅。在我头部位置，条幅上写着“彻底砸烂右派分子向承鉴的狗头！”

整个拐角楼像座墓地，宿舍就像灵堂。每晚上床睡觉，我只能掀开这些白纸幡帐钻进去。我感觉就像睡在棺材里，自己成了一具活尸。

批斗会从连续三个小时，到持续了三个月的疲劳战：

先叫我站着交代，一站就是七八小时。待到马上要栽倒，才叫坐着写交代。我不知交代什么，写什么。我愿意交代我的任何罪行，但无法对上吕的“口供”。左派们对我的耳膜吼，推我的座椅，揉我的身体，撞我面前的书桌，没有分秒不停歇。即使我抖擞精神，尽最大意志去写交代，头脑已经不听使唤。笔尖刚要接触纸面，眼前一黑，笔尖重重戳在纸上。笔尖弯了，颈椎像是断了，头颅以自由落体的运动形式砸到桌面上。“嘭”的一声，我已无法写出最简单的“一”字来。

在这样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下，向承鉴直接去了派出所，要求将他收留遣送去监狱；他甚至想到一死了之。尽管如此，他并没有认罪。熬到1958年6月，他被划为极右，处罚为保留学籍，劳动考察。

这是向承鉴与那一代右派学生的成年仪式：

1957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我当时还年轻，并非真的理解了争取自由民主。“东邻失火，殃及池鱼”，我不过是鱼池里一条很小的鱼。反右过后，我才意识到这场运动的严重性。

以向承鉴的大学经历为例，我们从这场成年仪式里看到了什么？

假如我们说土改、工商业改造等运动，涉及到对土地、私营企业的剥夺，那么就高校反右来说，被剥夺的并没有具体的物质财富。那么，反右的目的是要争夺党对学校的领导权、控制权吗？我认为也不是，因为这些权力本来就在执政党手里。它不曾被夺走，更没有受到普遍的挑战。即使是主张“教授治校”，也仅仅是意见而已。倘若真的实现了教授治校，党群关系不是会更好吗？那么，是要巩固党的思想影响力？或许是，但从向承鉴的自辩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对党的思想是多么拥戴、情感上又是多么认同！在他以及那一代青年学生那里，有几人不是认为自己是党的儿女，哪里多少人真正在反党？而且，他们那么踊跃地参与鸣放，不正是在追随党，响应党，从而证明了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强大影响力吗？

既然如此，还要搞这个反右干什么？

是的，如上设问，只是出于常识的假设。反右的发起，不是来自这种常人和常识的逻辑。要回答反右的目的，不能仅看当时报纸上是怎么宣传的，也不能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去同理他对国际形势的隐忧以及权力受到威胁的心理。因为，那种威胁与其说是真实存在，不如说是极权者内心的恐怖想象，也是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虚妄推断。在彻底改变了农村、城市的所有制结构之后，在一次又一次的肃反和镇压运动之后，反右确定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在思想上确立专制。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⁵

在这段话中，毛泽东十分明确，所谓阶级敌人，即是那些“对于亡国、共产”不甘心的人，这适用于所有那些在土地改革和镇反、肃反中被无情镇压的人，也必然将其相关受害人以及各种程度上的异议者包括在内。在下面这段话中，他尤其明确地将思想言论划入犯罪范畴：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⁶

反右要达到的思想统一，具体来说就是对最高统治者个人意志

5 毛泽东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marxist.org-chinese-mao-19570701.htm>

6 同上。

的全面顺服。任何批评意见、甚至沉默都被当作对权力的挑战。所谓“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以战争术语表达了建立思想专制权威的迫切性。

换个比喻，也可以说，高校反右如同一场极权政治下的服从性训练。它不是因为发生了鸣放而必须反右，而是因为必须既鸣放又反右，用“引蛇出洞，聚而歼之”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方式，来达成权力意志对青年一代以及知识分子的绝对控制。反右的伟大胜利是以这种控制的圆满来达成的，通过强迫认罪以及劳改劳教、开除学籍、降职降薪到内部控制等一系列不同等级的惩罚手段，它完成了新一轮阶级分层，重塑了校园的人际关系和文化心理。向承鉴写道：

同学间友爱、和谐的氛围没有了，代之以冷漠、猜疑和互相戒备。坦诚活泼的交流和辩论没有了，代之以沉默寡言和见风使舵。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学风没有了，代之以政治红是唯一的香饽饽。

以上说到服从性训练，这个概念，我最初是在 2022 年 4 月一篇有关上海防疫的网文中读到的。而在网上查找，这个概念一般并非用于分析社会现象——的确，除了奴隶社会，哪有向所有成员要求思想行为的绝对服从呢？这个概念通常是用来说明对狗的训练要求。狗，作为人的宠物或者人为了达成某种功利目的的工具（例如作为工作犬或者商业犬），它必须习得服从，才能和主人缔结良好的关系，从而完成主人所交付的使命。对狗来说，无所谓善恶对错，忠诚就是美德。主人通过训练狗的服从性，使它可以完成人力做不到的事情，包括探雷试毒，赴汤蹈火。

同理，极权统治者要控制这个社会每一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使个人成为驯服工具，辨别是非也是多余。反右是 1949 年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服从性训练，其一，它训练了各级党政机构对领袖意志的执行力，不仅是党政合一，以党代政，而且以党代法，党的政策文件具有法律的约束力。其二，它训练了各阶层的社会成员对领袖意志的绝对服从。领袖就是党的最高意志，而各级单位的领导干部

也同样是党的化身。通过反右的规训与惩罚，这个由上及下的一元化权力系统被牢固地确立下来，它不仅不容置疑，而且还需要人们不断发挥斗争性来确保与党同仇敌忾；这种态度才叫捍卫无产阶级专政。其三，它通过出尔反尔的政治转向，训练骨干力量的绝对忠诚。唯有放弃思考，仅凭服从的忠诚，才能使政治运动得以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地持续下去，从而保证党的意志上下畅通。

正如向承鉴所看到的，经过反右的大清洗，在高等学府，不可能再有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更不用说人格尊严。得以留校任教的只能是那些服从性最好的人，服从与忠诚老实，这就是极权政治所需要的能力和品质。右派学生成为一道受惩戒的风景，他们的助学金被扣除，无法满足温饱，连亲人也不理解。最后学业中断，有人被捕，送劳改、劳教；最轻的也是保留学籍，先送到农村监督劳动。

兰州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总数不过两千，被划右派二百余人，达到百分之十。回顾这一刻，向承鉴称之为中华民族历史的巨变时刻：“它使许多人消失，使这个民族积极正派的精神品格荡然无存。”这是从受害者角度看到的巨变，反过来则可以说，这是反右取得的巨大胜利，它是对人的自由意志的胜利，也是煽动仇恨的胜利。它证明，通过言论入罪确立了思想文化上的专制，高等学府终于沦为一个背离理性、常识和逻辑的世界。被妖魔化、标签化为右派的人，无论认罪与否，都被逐出了正常的生活轨道，落入到未知的命运黑洞。

二、暗夜星火——《星火》的思想光芒

1. 党外反对派

反右的一年之后，向承鉴和大约四十位兰大右派师生去天水农村，接受监督劳动。这些人中像他这样的二年级学生占了半数，年龄都在二十左右。从1958年7月中旬至1960年9月30日案发失去自由，向承鉴在乡村两年多时间，经历了大跃进、大饥荒和创办《星

火》的求索。

当时，在全国各地高校，都对右派学生进行了惩处。上海高校的学生发配到新疆，北京的学生遣送到青海……兰大学生的遭遇并无特别之处，然而，为什么在这一群体里，出现了《星火》，产生了一批舍身取义的反抗者？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由于他们直接生活在农民中间，而不是在劳教劳改场所。监督劳动，这个惩罚相对要轻一些，向承鉴等兰大师生还有一定的行动自由。如此，在天水基层，他们直接观察和体验到了1958年以后农村的灾变。

从向承鉴的回忆来看，离校之初，他也同样是创伤累累、前路茫茫，深感个人力量的渺小，甚至也变得麻木。然而，五七年的亲身经历，让他无法再相信主流意识形态的宣传。在农村，他做过宣传员，参与过炼铁炉的试验，被调去搞地质矿产资源普查，办化肥厂试制菌肥，甚至要为乡镇设计无轨电车。以戴罪之身，一方面，他不得不服从调度，绞尽脑汁；但另一方面，那种反科学、反理性的疯狂，令他从内心感到惊骇。所到之地，基层干部的暴力管制就在眼皮子下发生，而农民社员无从抗争，唯有屈服。底层社会的现实让他认识到，五七年的言论入罪，必然产生出如此后果：“偌大中国，科技人员总有数十万众，却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大喝一声：这种蠢事干不得！”

第二个原因，以向承鉴为例，为了寻求思想出路，他在这一时期开始了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的理论溯源；并立下远大抱负：批判性地重审马克思主义。四十多年以后，他完成《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的书稿，如此回顾了写作的初衷：

写这篇文字的念头始于1959年6月。那时我在西北偏僻农村接受“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处分近一年时光，亲历公社化、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大饥谨，带着对现实的诸多困惑寻求答案，开始研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书。

县文化馆长是位白胡子长者，我有幸从他那儿得到《资本论》，

以后又读《全集》以及当时能买到的列宁、斯大林、黑格尔、费尔巴哈的著作，读到1960年9月30日被捕。在看守所黑号近两年，点煤油灯读，读到监狱。直到1963年3、4月押送劳改队服刑，才把这些书给了难友董剑青。⁷

不仅是向承鉴，身处农村的《星火》创始人如张春元、顾雁……都有同样的思想历程，他们一拍即可，相互激励，谭蝉雪在《求索》一书中已有论及。

第三个原因，这期间的党内斗争表明，类似上书这种诉诸于当代统治集团的批评已绝无可能。《星火》作者开启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作为独立于党外的政治反对派，直接发起抗争。这在当代反极权的政治实践中是开创性的，也是最具标志性的行动。

1959年秋，政治局势更加严峻。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标志着党内上书的言路完全堵死。向承鉴写道：“中国进入了绝对‘一言堂’的时代。”他所在的公社，开展了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

过去强盗土匪偷偷摸摸行事，抢掠对象是豪强财主；如今却是社会强势群体——执法的国家官员明火执仗抢劫百姓。他们掠夺的是百姓中最苦最穷的农民，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濒临死亡的绝境！

1959年冬，饿死人的情形大量发生。正是在如此悲惨和普遍的现实面前，向承鉴还有与他交流沟通的其他同学，共同面临了一个有关良知和责任的问题：怎么办？

这群青年师生，其时他们尚可自保：每月有固定的生活费，有定量的粮油供应，他们是拖拉机手、技术员……还有文化知识可供役使，从而摆脱了强体力劳动的压榨。为解救农民，这批学生也学以致用；向承鉴他们曾将工业葡萄糖加工，使其转化为可以食用的果糖。他自己还冒险为同学们涂改购粮簿，使生产队能再度购粮，为社员续命。但各地饥荒的消息以及眼前饿殍的惨景令他无法平静。

7 向承鉴：《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年4月，第468页。

他多次试图给党中央上书，但前车之鉴摆在眼前：兰大学生孙自筠给党刊上书被捕。庐山会议后，新一轮反右倾运动再度席卷各地。

这样，向承鉴与《星火》的发起者张春元等一拍即合，《星火》因此诞生。

2. 《星火》 檄文

《星火》第一期 1959 年底由向承鉴与物理系同学苗庆久刻印出来，发刊时间确定在 1960 年元月。

兰大的物理系研究生顾雁为《星火》写了发刊词：《放弃幻想，准备战斗》，文中表达了《星火》撰稿人与党内批评者不同的激进立场。当时，全国各地基层干部群众为饥荒求救，给中共中央和政府高层写信者不计其数。尽管大多数信件遭到围追堵截，确实也有很多信件是寄到了的。而这些信件，无一不是将救命的希望寄托于中共领导和最高领袖的决断。《星火》撰稿人摈弃了这一不切实际的做法，他们明确认识到问题的根源，那就是政治制度的极权本质，它通向封建主义，通向法西斯纳粹的独裁政治。他们所写文章的批判锋芒直指执政党和其最高领袖，并批判了造成灾难的一系列政策决策。

顾雁在《发刊词》中写道：

由于几年来倒行逆施的结果，目前的统治集团已经陷入了一个无可救药的恶性循环，一步步踏着秦始皇的覆辙。

为什么曾经是进步的共产党执政不到十年就变得如此腐化反动，在国内怨声鼎沸，叛乱四起，在国外陷入处处楚歌的境地呢？这是由于把全民的天下当作私有财产，事无巨细，清一色由党员来管理的结果。这是由于建立偶像迷信压制民主，形成中央集权的法西斯统治的结果。这也是由于政治寡头们狂妄自大、指鹿为马、一唯倒行逆施的结果。这样的独裁统治硬要称作社会主义的话，应该是一种由政治寡头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与纳粹的国家社会主义属

于同一类型，而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点。⁸

《星火》的灵魂人物张春元针对当时最迫切的缺粮问题，写了《粮食问题》一文，他以讽刺的口吻列举了报刊发布的粮食产量数字，并将之与现实中的农民口粮标准进行对比，他认为，粮食紧张不是什么“吃风盛极”造成浪费，而是应该将农民问题、政治制度、生产方式、经济税收、对外贸易等联系起来考虑。按照这一思路，他分析了农民的现实处境和原因：

当今的统治者和历史上任何统治者一样，利用农民革命爬上了天安门，登上了宝座，一只手接过农民所赐予的王冠——主席，另一只手却狠狠地一拳，把农民大众打倒在地，践踏在脚下，用政治愚弄、超经济的剥削、强制性的奴役劳动等政策，采取了诱惑胁迫、党棍恐怖、饥饿等手段，夺去了农民的土地、耕畜、农具、种子等生产资料，给农民带上比中世纪封建社会还要沉重的锁链，使广大农民处于依附农奴的地位，成为真正的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把农民千辛万苦得来的劳动果实，用征收公粮、统购余粮、催逼勒索，收刮得干干净净，使农民经常地处于半饥饿的慢性自杀状态。⁹

《星火》撰稿人从反右的苦难中幸存下来，经历过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虚伪性，这使他们对宣传舆论的话术保持了高度警惕。在他们的论述中，虽然不可能有西方文化研究中的“话语”概念，但从亲身体验中，他们认识到了宣传就是套路，是通过一系列与现实无关的概念词语虚拟现实，掩盖真正的问题。张春元指出，公社化的目的是加强对农村的统治，利用编造的天文数字来决定税收、统购、外销等，结果是使农村的生产力受到摧残和破坏。而“欺骗、撒谎、吹牛、夸张，没有一句真话，是当代政治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也是这种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

张春元、顾雁的文章挑战一言九鼎的最高统治者，为《星火》

8 引自谭蝉雪：《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2016年第一版，第67页。

9 同上书，第92页。

定下了鲜明的政治批判基调。向承鉴与他们联手作战，连续写出六篇文章，共计约一万二千多字，成为《星火》的主笔。

3.政治批判

《星火》第一期有五位作者，刊印的八篇文稿中，向承鉴贡献了其中三篇。这三篇文章的标题分别为《自白》《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自白》只有两百多字，其中提出了反对现政权，争取“和平、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新的政治目标：

我们信奉的是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认为马列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对于任何东西——人物、主义等的绝对崇拜，绝非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它必须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能体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工农）的意志。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的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矢志不移地为彻底地摧毁它而奋斗。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¹⁰

从这篇《自白》里，还可以看出《星火》作者群的思想来源。在原则上，星火撰稿者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信仰；而到马克思主义的源头去寻找批判现实的理论依据，这是当时以及后来许多民间独立思考者的路径。不同之处在于，向承鉴他们更多地吸取了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主义的观点，并从反右之后传开来的《南斯拉夫共产党者联盟纲领（草案）》（以下简称“南共纲领草案”）中得到启发。后者的反教条主义和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探索，给了这群青年新的思想力量。

“南共纲领草案”1958年4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编辑出版，全书28万多字，公开发行了8万册。根据谭蝉雪的回忆，张春元和向

10 同上书，第68-69页

承鉴分别从林昭和北京亲友处获得该书；使之在水、武山的兰大学生中流传。谭蝉雪写道：“同时传阅的还有：波兰事件、铁托的演说及世界各国共产党对演说的批判。”这些在《星火》创刊者中引起强烈的回响，激励他们从更开阔的理论视野来思考社会主义阵营的新变局。

“南共纲领草案”是南斯拉夫执政党在 1957 年冬公开与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决裂后发布的，它标志着南共决心摆脱苏联模式，独立探寻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当时在中国，这个文献是被当作反面教材，供批判使用的。出版者称它为“一个反马克思主义的、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纲领”，1958 年 5 月到 10 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又连续编辑出版了十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修正主义成为与帝国主义相提并论的概念，可见舆论攻势之猛烈。

在这套文选的第一辑，收入了《人民日报》1958 年 5 月 5 日的社论；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喉舌将南共纲领与中国的右派言论联系起来进行批判，文中说：

像各国反动派和资产阶级右派的口吻一样，南共领导集团恶毒地诬蔑无产阶级专政，说它“造成官僚主义、国家极权主义思想，政治领导力量脱离劳动群众，停滞、社会主义发展畸形化，以及内部矛盾和对立的尖锐化”。¹¹

但对《星火》撰稿人来说，南共纲领正是他们思考中国现实的理论出发点。这个纲领批判了苏共的思想垄断和政治霸权，反对教条主义，尤其是论述了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这对《星火》的青年探索者深有启发，从向承鉴的第二篇文章中可以见出。

向承鉴的这篇文章题为《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标题与毛泽东的著名文章相同，显示了青年挑战者睥睨权威和高屋建瓴的气势。文章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分别论及国际情况、国内情况和我们的

11 见《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批判南共现代修正主义文选》，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 年 5 月第 1 版，第 2 页。

任务。其中对国际形势的阐述几乎是“南共纲领”中相关内容的浓缩，有些措辞也脱胎于那个文本。在“国内情况”这一部分，向承鉴概括了中共建政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特点——主观臆测和没有法制，他写道：

当代统治者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实在和它的没有法制，它使得许多无辜者在心灵、肉体上受到重大的创伤，使数以万计的生灵变成冤魂。¹²

他认为，反右以来，执政者已经公开走上了与人民为敌的道路，在这方面，他呼应了张春元对农村问题的观点，并且加以扩展：“由于当代统治者推行各种各样反动政策的结果，工农业生产力已遭到全面的毁灭性的破坏；由于以所谓的‘党性’代替个性和人性，而实际是强赐人民的‘奴性’”，“由于变化无常和没有法制，人民基本人权被剥夺”。结果是“饿殍遍野，烽火满地”，在政治上、人民精神面貌上、经济上出现了全面紧张和混乱。

在此基础上，论者指出了将思想批判付诸行动的方向，即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应该展开的行动包括理论研究、到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以及启发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理智。文章结尾向全国的百姓发起呼吁，吁请他们向着“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为迅速彻底地摧毁当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统治而奋斗！”

4. 揭露话语套路

向承鉴的第三篇文章《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标题引用了毛泽东最喜欢的采用一个比喻。毛泽东经常以此表达成绩和缺点的关系，从而反驳党内外对其政策路线的批评。在大跃进期间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批评国务院的工作，并且点了多位大右派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抓住这一个指头来反冒进。他警告说：

12 同注 8，第 71 页。

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好不好？这是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民一泄了气，不得了。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伸出手看看，究竟有几个指头生了疮？不过一个指头有毛病，不过多用了一些钱，多用了一些人，就“库空如洗”呀，“市场紧张”呀。¹³

对此，向承鉴反驳道，如果说要看主流，农民的情况就是社会情况的主流。然而他们正处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

在今年阴历三、四月间，有一个县就饿死了一万多人，有一个生产队就饿死了180人之多。槐树叶吃光了三次，柳树叶吃光了一次。

这就是“社会主义”给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恩赐，这就是农民从当代统治者那里得到的幸福生活！¹⁴

《星火》第二期虽未印出，也已积累了五位作者的八篇文章稿；向承鉴写了其中前三篇。根据谭蝉雪从案卷资料中录入的文稿，向承鉴文章的第一篇题为《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第二篇为《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剖视之一》（署明了写作时间：1960年4月19日午夜三时），第三篇是《告全国人民书》。在向承鉴的记忆里，他还写了《食母记》，文稿现已无存。

第一篇为未完成稿，很可能是向承鉴在入狱前所写的最后一篇时评文章。开头第一句说到“中共中央8月10日发出的文件”，应该是指1960年8月10日结束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文件。这些文件聚焦国内经济调整，为停止大跃进做了政策准备。8月下旬，《人民日报》开始重提南泥湾精神，宣传毛泽东在内战时期提出的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目的是动员人民艰苦奋斗度过荒年。向承鉴用冷嘲热讽的语调，揭穿了这里采用的话语骗术。他认为，这种宣传暗示了目前的困难，与大跃进时期的吹牛皮形成鲜明对比。但

13 引自李锐：《“大跃进”的序幕——南宁会议【3】》，

<https://www.dswxyjy.org.cn/n/2015/0603/c244516-27099041-3.html>

14 同注8，第95页。

它回避了灾难的根源和政治责任，只是用战争环境下的南泥湾精神来转移视线，继续蒙骗人民。

《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剖视之一》，从标题来看，应该是向承鉴准备完成的系列观察之一；其中依然贯穿了一种透视，那就是以农民的具体生活经验揭露主流话语的虚妄。文章开头就写到报纸上的流行概念，叙事人说：“那什么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咯，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咯，生产关系咯，我可说不上，连什么叫生产力我都不懂得。”借这位26岁的青年农民的口吻，乡村生活的惨景跃然纸上：父亲饿死，村民饿死了三分之一，生产队干部凶神恶煞，社员在挣扎、煎熬中度日。结尾回到农民对共产党的态度，能说出的都是套话，是绝望顺从，迫不得已。哀莫大于心死，这篇文章，呈现的正是这种状态。

《告全国人民书》是讨伐的檄文、悲愤的控诉，也是殊死拼搏的战书，字里行间，如有怒涛奔涌：

全国的父老兄弟们、姐妹们、全体同胞们！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59年、60年血的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我们用木板、桌子、门、床做的棺材埋葬了我们的亲人，【用】柜子或草席埋葬了我们的亲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人葬在门前的院子里，葬在家里，葬在床面前所挖的坑里，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濒于饿死的人。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不知道自己死在今天或明天，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来拿动亲人的尸体。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对人性、对生命的浩劫啊！¹⁵

值此民族生死存亡之际，怎么办？作者把血淋淋的现实揭露了出来，在最后一段，发出了决一死战的怒吼：

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全体同胞们！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

15 同注8，第111页。

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团结起来，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战斗！惟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¹⁶

5. 点燃星火的生命

向承鉴所写的六篇文章，连同《星火》其他作者的文章，代表了大饥荒时代批判极权的思想深度，也呼出了反抗者的最强音。而写出这些文字的青年向承鉴，年仅 21 岁。他深知，所有这些思考注定是生死攸关，以命相搏。因为在 1957 年，他没有任何反党的想法，就已经被追讨、惩罚；而此时他已经无可争辩地成为一个自觉的反对派；岂止是自觉，他对独裁统治的深恶痛绝和救国救民的迫不及待已经压倒一切。时隔六十年，重读这些犹如怒火燃烧的文字，我们依然可以体会到，作者在奋笔疾书时，不仅没有自我审查的设限，而且完全摆脱了恐惧。如他所说，“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他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

六十多年过去，重新掂量这些文字，很难说在今天不会被重新定罪。即使中国社会在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已经有了长足进步，但离言论自由还相当遥远，尤其是政治反对的言论自由，更不必说呼吁行动了。但历史地看，当文革结束之后，《星火》冤案终获平反。除了时代变化作为主因，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办理重审的当事人，其中就有天水农民的后代。他们深知《星火》青年群体，包括撰文最多的向承鉴，所有的论点都有现实依据，而在那背后是几千万农民的血与泪。

尽管如此，当政治反对要面临生命的代价时，我们还是不断追问：这种坐言起行的勇气从何而来？谭蝉雪引用《星火》作者之一、北大右派学生林昭的话做了解释：

16 同注 8，第 112 页。

党若真能英明理政、公勤治国，林昭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岂有政治成见存在，非要闭着眼睛抹煞良心反党不可？但党既不能做到那样而恰恰相反，又要说、弄出了如许多伟大的混账与血淋淋的荒唐来，致使人物凋零、江山糜烂、血泪遍地而白骨成堆。那么，林昭虽是乳发未干的黄毛稚子，也觉中怀惨痛五内崩裂而万万容忍不得！这时候，同一条件起了完全相反的促进作用，——正因为我本来是党的追随者、拥护者，所以才更要反党！¹⁷

换言之，反对的是党或者是某某某领袖不重要，它的权力和威严更不重要。重要的是事实，所谓知识分子的良知，是对事实的坚守并为此承担道德责任。

而就对事实的判断来说，我只看到一点算是有所失察之处，那就是对党内外反抗力量的过高估计。这或许仅仅是因为《星火》作者群毕竟还很年轻，还没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从向承鉴的文章里可以看出，他认为，“当代统治者在国内、外已经陷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反右倾运动证明，共产党内部处于空前大分裂。而且，“小规模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张春元预言，农民革命运动将会席卷全国。

到1960年5月，张春元、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已经开始思考拟出总纲领和成立正式组织。他们从践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开始，势必突破对结社自由的禁锢。他们设想了三个组织名称，其中第一个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联盟”。这个名称承袭“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而来，谭蝉雪南下设法出境的目的之一，就包括与南斯拉夫驻港机构取得联系。

计划中的组织，另有两个建议名称，分别为“中国共产党革命（或革新）委员会”和“中国劳动农工同盟”，前者呼唤中共党内的革新派，后者强调面向工农大众。向承鉴为此，与被打成“右倾”分子的原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做了深入交流，使杜映华和“星

17 同注8，第65-66页。

火”的青年反抗者结为盟友。向承鉴相信：共产党需要自我改造与更新，“党内有正直有识之士，只是被邪气压制，没有实权。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为农民的悲惨处境而呼号。”

张春元并和向承鉴商量，将《星火》第二期印出数千份，寄到每一位县级干部手中。张春元还有一个计划，即在1960年8月向全国五大城市的高层干部印发《星火》第二期文稿《论人民公社》，以激发共产党内部的思想分化，为共同奋斗寻找同道。

然而，不仅是党内的健康力量已经受到绞杀，而且，对他们的监控大网早已拉开。这年4月，张春元联系过的兰大学生右派向省公安厅告密；5月，两位与向承鉴、苗庆久一起劳动的同学向武山县公安局交出书面报告。6月、7月，谭蝉雪和张春元先后在广东被捕。9月，武山、天水两地公安大搜捕。至当年9月30日，公安在武山逮捕33人，案件以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为名告破。根据谭蝉雪统计，全案涉及人员共44人，有22人被判刑。9月30日凌晨，向承鉴被捕，开始他的炼狱之行。

三、西部炼狱——“我不服，永远不服”

从1960年9月30日至1979年同月同日，向承鉴失去自由超过十八年。从他对这段经历的回忆可以看到，法制完全缺席，一旦被定罪为反革命，没有任何可能免刑。

现在的读者可能会问：那个时代的冤案为什么不能得到及时纠正？且先回顾1949年后反革命罪的由来。

反革命，最初就是一个外延相当模糊的概念。在1951年开展的镇反运动中，反革命指各种对新政权构成威胁的旧势力，包括土改中的所谓“地主、恶霸”，也包括和旧政权有各种联系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从杨奎松研究镇反运动的论述里可以看到，在那时的高层领导者指示里，反革命的言论和行动都可以指证为罪行。¹⁸

18 杨奎松：《新中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研究》，
<http://m.aisixiang.com/data/48152.html>

镇反运动之后，反革命罪逐渐发展成为一个“重在以思想与政治倾向等主观因素归罪”的罪名，¹⁹ 它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直至 20 世纪末影响最大的且处罚最重的一个罪类。这个罪名，直至 1997 年 3 月才取消，其标志是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布。

反右之后对大多数右派分子的处罚还是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而一旦定罪为反革命，就可以直接逮捕、判刑，送去劳改场所。

建国之初，1951 年 5 月 15 日，在全国规模的镇反运动之后，公安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决议首先表明：

大批应判徒刑的犯人是一个很大的劳动力，为了改造他们，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为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闲饭，必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²⁰

这种劳改模式，照搬了苏联古拉格——劳动集中营的经验。这个话题后面再具体展开。

也是在这个决议中，在规划劳改的同时，令人震撼的是有关反革命罪的死刑原则，这里竟然划定出数字指标。由此可见，反革命罪在当局眼里实属罪大恶极：

对于在共产党内，在人民政府系统内，在人民解放军系统内，在文化教育界，在工商界，在宗教界，在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内清出来的应判死刑的反革命分子，一般处决十分之一、二为原则，少者十分之八、九均应采取判处死刑缓期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²¹

镇反和肃反的血腥镇压，要到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才有学者开始深入调查。而在反右之前，本来就没有建立起民主的法制体系：民法、刑法、民诉、刑诉，这些法典，一部也没有。法律制度被当做政

19 胡建森：《反革命罪的存废——从政治刑罚到法律刑罚》，
https://www.jrb.com/xueshupd/mt/201903/t20190320_1978711.html

20 《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决议》，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ozedong/1968/3-016.htm>

21 同上。

治工具来使用，执政党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服务于党的政治工作。而到五七年鸣放前两个月，毛泽东更是直接指示大中小学取消宪法课，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灌输党的政治观点。²²

在1952年的司法改革后，一大批熟谙法律的法学界人士已经被清理，逐出讲坛或司法队伍。到了反右之后，残余的一点法制形式也被全面摧毁。法律系、法学院均被取消，那些鸣放中提了意见的法学家全部落马；百分之九十的律师被划为右派，律师制度随之废除。²³

到1958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讲话，他如此强烈表达了对法律的蔑视，阐明了以党代政、以文件代法律的权力意志。他说：“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能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我们每次的决议都是法，开一个会也是一个法。”以后他还说：“要人治，不要法治。《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执行，何必要什么法律。”²⁴

到1959年4月，中央政府原有的监察部、司法部均被撤销，司法部党组成员全部打成右派。从此，以言治罪畅通无阻，运动治国越演越烈。至文革开始，公安、检察院、法院系统同属必须“砸烂”之列。

1967年1月，全国城乡按《公安六条》办案，进一步将“以言治罪”制度化和法律化：

《公安六条》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

22 毛泽东：《关于加强学校思想政治工作问题给周恩来等的信》，引自《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1月第1版，第398页。

23 参见陆锦碧、铁犁：《建国初期司法改革的得失》，收入郭道晖：《当代中国的法学争鸣》，第21页。

24 这一段里的两条引文均引自张懿：《第四届全国司法工作会议的来龙去脉及其严重影响》，载于《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文集》（第四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10月版，第426—427页。

当依法惩办。”²⁵

向承鉴与《星火》案入狱者的囚徒生活，就处在这样一个越来越凶险的政治环境下。在几千万人饿死之后的中国，反对独裁制度的青年探索者尽数入狱，这标志着国家历史进入了最黑暗的岁月。

通常，一个家庭或单位出现了“反革命”，这个人就被排斥出了正常的世界。他就像鬼魅一样，既不存在于可见的世界，又化作政治阴影，笼罩并影响到亲人、子女的生活。很少有家人能到狱中探视，当事人也难以写信透露案情或写出真实的体验。中国的监狱和劳改营内幕，即使事后来看，由于当事人的回忆录并不算多，也并非都能自由出版；可以说即使在今天，内情也并非广为人知。

《炼狱归魂》在这方面贡献了宝贵的记录，向承鉴揭露了在审判期间、甘肃服刑和青海服刑不同阶段所经历的红色恐怖，还有他个人作为政治犯所坚持的反抗与尊严。

1. 审判前后：“惟有一腔血，拿来祭轩辕”

如果说在监狱之外，执政党就不受法律监督；那么在法办反革命的机构，就更谈不上犯人权利了。初进武山看守所，向承鉴失去姓名，代号为11号，每月的口粮不过十八斤。从1960年9月30日被捕到1962年元旦，他被单独关押长达十五个月，这间黑号仅六平米大小，里面完全不见光亮。

向承鉴从不认罪，抱定了宁死不屈的决心，压迫更强化了他的反抗意志。他拒绝剃光头，要抽烟，要读书，要求基本的卫生用品。他对所长怒吼道：“我是政治犯，要享受政治犯一切待遇！”不达目的，他拒绝回答公安局长的审讯。就这样，他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集》等，并在那种孤独囚禁的条件下继续他的阅读思考。

这期间有几次提审，他把审问的场所当做申辩的论坛，他的反

25 周大伟：《新中国“依法治国”理念的吊诡和嬗变》，
<http://www.hybsl.cn/beijingscankao/beijingfenxi/2015-06-09/52649.html>

驳甚至比在《星火》上撰文更尖锐：

如果千万个饿殍在地有灵，如果奄奄待毙的人们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我敢说，他们恨不得啖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你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这就是眼下这个政权的全部涵义。

他在公安的深夜审讯中怒斥独裁暴政，并拒绝揭发任何同学。因此被认为表现恶劣，两次被戴上手铐。在小黑号关押了十个月之后，才第一次争取到晒太阳的机会。十五个月后，他被转到大监号与其他犯人一起关押；二十二个月后判刑。

就法律程序而言，向承鉴没有得到过《起诉书》，没有经历过检察院起诉，仅有一次法院提审。在1962年7月1日，《星火》一案被宣判，他获长刑十八年。据家人回忆，他本来是与被告苗庆久同样，被判二十年；可能考虑到出生于贫苦家庭得以免去两年。8月25日，他的上诉被天水地区中院驳回，他当场留下一句话：“我不服，永远不服！”1963年3月，他被送去劳改。

2.劳改之行：经历生命的各种极限

向承鉴劳改的第一站是兰州新生砖瓦厂，后来到了玉门附近的饮马农场。文革期间调去青海，他干过窑工、农工、电工……在执行劳改的地方，再没有讲道理的可能；所有囚犯面对的是如何生存下来的考验。

劳改队生活第一个突出特点是高强度体力劳动。

向承鉴在装窑分队，他记载了装窑犯人的劳动定额，活路不仅繁重，而且极度紧张：

三个装窑工一天要装窑五六万砖坯（有时甚至高达七八万块），每人每小时近两千砖坯，每块砖坯都要放稳，要垫实。码放的位置必须准确，一旦坍塌可是大祸临头。五六万块砖坯，全靠三个外码工码成一个个背子，人人是争分夺秒、拼了老命地干。

为什么劳改队如此讲求效率？如果要拿中国的劳改集中营与前苏联的古拉格进行比较的话，有一个特点是对古拉格的直接承袭，那就是所有的劳改企业，都有自己的经济目标：“包括古拉格劳改营在内的强制劳动对前苏联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²⁶ 劳改犯人只能接受对自身劳动力的压榨，来换取生存的基本条件。

如果说这里还有企业管理的话，那么针对犯人的基本原则就是暴力强制。完不成定额的劳改犯被酷刑折磨，死于各种工伤意外，全是司空见惯之事，“人死灯灭，无人再提”。

对劳改犯的压榨还表现在极其简陋的劳动条件，向承鉴记录了出窑的脏：“窑里煤灰、砖灰，尘土飞扬。人们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连口罩也不发一个。内码两小时，出得窑外，头发、眉毛上都盖了一层厚厚的砖灰，整个人变成了白猿。”

还有拆窑的热：

窑内温度此时当在 800 至 1000 摄氏度，最困难的莫过于从最高扇子上取下第一块砖。此时，五个犯人都戴上棉头套，穿上棉衣，又戴上胶皮棉手套。大家全副武装，轮流上阵。只见第一个犯人屏住一口气冲上去，不过是一两秒钟，棉头套焦了，棉衣糊了，棉手套外的胶皮都熔化了。热浪把第一个犯人打回来，第二个犯人接着上。棉帽、棉衣冒烟着火了，赶快拿水浇灭。有时，凡数人，进窑数次都没取下一块砖，全都无功而返。时间紧迫，任务比军情还急，怎么办？将棉头套、棉手套、棉衣全用冷水浇湿，再入火海！

何不等待窑凉下来再拆窑出砖，狱方要的是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土窑利用率和青砖产量。而犯人遭受的生命威胁和磨难，全都无须考虑。

劳改犯人最难忍受的则是所谓“思想改造”，这对良心犯来说

26 “参加会议的纪念碑人权组织副主席彼得罗夫说，包括古拉格劳改营在内的强制劳动对前苏联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之音新闻：《学术研讨会：苏联体制如何从古拉格劳改营获利支撑经济》，2011年10月31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article-20111031-the-role-of-gulag-and-forced-labour-in-soviet-economy-132918868/789925.html>

其折磨不亚于超强体力劳动。因为这里要求不断交代罪行，自我羞辱；它也是监狱管理的重要手段。与监狱外的运动治国相似的是，强迫犯人认罪同样造成犯人的群体分化、自我分裂，从而给统治者提供分而治之的对象。而监狱作为专政的“刀把子”，则可以毫无顾忌地运用暴力，不认罪，轻则批斗，重则加刑以及改判死刑。

如前所述，在狱吏眼里，反革命犯正是思想改造的重点。向承鉴深知：“自 1957 年后，‘现反’中又有一类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其中首推有文化的年轻大学生，他们被视为‘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我即属此类人。”由于不认罪，他被当作“反改造尖子”去围观死囚宣判，而这一幕绝没有电影中的英勇就义，死囚早已被勒住喉咙。这一切都让他重新体认了这个非人的环境“我距生存太遥远，与死亡近在咫尺”。

只有在亲历者的笔下，我们才能看到，这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是何等的残酷，犯人全面剥夺自由，他们的生命也随时会遭到虐杀。文革期间，狱中暴力的随意性和普遍更是达于极致。《星火》案中的张春元和杜映华、《星火》撰稿人之一林昭此时被处决；随着文革的高涨，狱方在犯人中发起一轮又一轮的检举和斗争。

在玉门饮马农场服刑期间，向承鉴被指认为“何案”（以大学生或知识型犯人为主的反革命案）的“总后台”，这个莫须有的“何案”成员都被关进小监：

这小屋长、宽、高均为一米左右，糊上泥巴，留个门，形同鸡笼或狗窝。凡“何案”犯人一律被戴上手铐、脚镣，推入其中。一人一屋，高不能

直腰，宽不容躺卧，只可倚墙席地而坐。小屋随砌随进人，泥巴湿糊糊的，数九寒天，薄被薄褥，地上只撒了把麦草，其情其状，惨不忍睹。

他的难友、曾经的医科大学生邹庆礼被揭发后关禁闭、戴背铐，半年后“手腕化脓溃烂生了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了。”

只有将向承鉴所写的劳改历程联系起来思考，我们才能真正洞察那个时代的本质。如果说，1957年反右建立起了思想专制；那么，使这种专制得以维持和强化的则是由公检法这类国家机器实施的系统性的暴力。监禁和劳改惩罚，形成对全社会的威慑。高墙外的意识形态规训与高墙内的暴力强制，两大系统共同铸就了管制社会的天罗地网。

3.青海十年：中国式古拉格大本营实录

1970年元月上旬，以备战需要为名，甘肃的犯人被大量地调往青海，向承鉴记录了这一路的见闻和此后十年青海劳改的经历，这也使得这部个人自传成为青海劳改历史尤其是巴仓农场和德令哈农场的重要记录。它的重要性在于，这是从受害者角度写出的历史，作者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了那个时代对人权的践踏以及专制的恐怖。而它也是非常详实的生活实录，从最初的衣食住行、劳动生存到农场显出衰落之势，从老犯人的去世到文革结束后大批犯人因平反而离开……在个人的历史中折射出毛泽东时代无可挽回的衰败，即使还不能说是彻底终结。

话说到现在，受难者的叙述依然是被边缘化和受到压制的。在官方叙述里，青海的监狱事业依然被看作新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兴建于2013年的青海监狱历史博物馆盛赞当年监狱工作者无私奉献、忘我牺牲的精神，但这种赞誉主要是给予公安干警的，而真正承担了开疆辟土、拓荒建设的囚徒（其中有大量的冤案受难者），仍然被称为“罪犯”。根据腾讯的相关报道，“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前期，青海监狱先后从外省市调入大量罪犯和劳教人员，当时押犯占全国总数的1/4。”

青海监狱历经了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先后创建数十个农场，开垦耕地面积占到全省国营农场的98%；创建数十个工业和建筑业单位，总产值占到全省的52%；开创了牧区农场和高原绿色农业，成为青海省重要的粮油生产基地。当时，青海省总人口

仅 200 余万人，青海监狱系统就占了 1/8，而劳改生产却占到青海经济的 1/3。时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张国声评价说：在青海经济中劳改生产“三分天下有其一”，其影响力在全国都是少见的。²⁷

以上文章的前两个数字，应该是引自《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²⁸时间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即 1953—1957 年。根据在青海劳改农场做农业技术工作长达二十年的李华英先生回忆，省委书记张国声对劳改生产的评价，是在 1957 年的一个会议上说的。²⁹自 1959 年起，青海省执行中央关于向边远地区移民屯垦的决策，大量增调外省犯人，开垦劳改农场，耕地面积由原来的 30 万亩扩大了九倍，一度达到 270 万亩。³⁰而调遣到青海劳改的外省犯人，主要是反革命犯，1958 年以后，新增加了右派、反社会主义分子等。刑事犯则不占多数。³¹

27 《谁说监狱史迹和建筑不是文物？青海这家特殊的博物馆很值得参观！》

<https://new.qq.com/rain/a/20190720A0AJI400?pc>

28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劳改生产在全省的比重，农业耕地面积占国营农场的 98%，工业总产值占省属工业的 52%，建筑业承建了西宁大部分房建工程。”见《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编纂委员会：《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

29 绿洲遗老：《我在劳改农场二十年》（修正补充版），<http://bbs.tianya.cn/post-no05-209523-1.shtml>

30 “从 1959 年起，将西宁地区劳改单位和各大劳改农场相继改组为 10 个联合企业公司，下属上百个场、厂、司、矿。各类人员猛增至 20 万人（不包括家属和支边青年），耕地面积扩大到 270 万亩（加上青年农场共 382 万亩。”同注 28，第 4 页。

31 有关外省调入青海犯人的总数，《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中记载：1951 年以后，“截至 1994 年，累计收押、改造罪犯 24 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从全国 18 个省（市、区）调来青海服刑改造的。”“70 年代以前，在押反革命犯和惯盗惯窃等社会渣滓多于其他刑事犯，是劳动改造的主要对象。”以上两段引文均见该书第 2 页。“由外省、市调入的占 2/3 以上。”见第二章《刑罚执行》第二节《收押》，同上书第 33 页。但李华英（绿洲遗老）认为，《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有关外省调入犯人的总数前后有矛盾，他在文章上写道：“1958 年‘大跃进’开始后，公安部决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逐步分批调 15 万至 20 万名犯人支援青海经济建设。1958—1960 年，从山东、河南、安徽、浙江、江苏、陕西、四川、广东、上海等省市调犯 95 万余人（其中由上海调来女犯 650 人）”。我核对原书发现，李先生对上海调入犯人“95 万”，应该是误读，在该书第 35 页上记载的是“9.5 万人”。但仅就官方

看向承鉴笔下的调遣转运，不禁让人想起二战电影里开往奥斯维辛的死亡列车。大批犯人从玉门镇出发，车内不开窗，不供水，吃喝拉撒全在其内：“一个闷罐车厢里装了一百好几犯人，不知走了两日两夜还是三日三夜”，终于到达青海省湟源车站。“这一路，从玉门镇到湟源，车门从没开过，犯人命比牲口贱，不怕掉膘、渴死、发瘟。”³²

接着，从湟源到日月山，不计其数的武装押运卡车排成长蛇阵，足有几十里路长，这应该是青海劳改历史上一次规模罕有的大调遣。

向承鉴一行先被安置青海门源的巴仓农场，在这里，他与“新中国”之初进来的全国各地犯人相遇，这些人在土改、肃反和镇反运动中被判刑后流放到青海，均已服刑十五年以上。其中一批伤残组犯人，其伤残程度令人震惊，如同中国劳改历史的活化石：

伤残组犯人有明显的肢体残缺，严重者自臀部以下全被截掉，看上去只有上身，他们在截肢处捆个牛皮蒲团，双手着地，一掌一掌地移行。有的人从膝盖处截肢，有的人从踝骨截肢，还有的人失去了五指。这些来自南国的人，开始不知这儿严寒的厉害，那时又缺少御寒衣物，肢体都是冻坏的。他们也必须劳动，干些捻毛线、织毛衣的室内活路。

由这些犯人的伤残程度可见，当初青海被确定为中国劳改农场的大本营时，劳动环境何其恶劣。即使到了1970年代，劳改队里处境最好的犯人是什么模样呢？向承鉴写到杂工组里的那批犯人，他们也是早年来青海，此时已算是幸存者中的佼佼者，他们在草原上单独作业，“打扮得多姿多彩，半像汉人，半像藏民，有几分流寇

统计的数字来计算，外地调入犯人已达25万至30万，这还不包括其他几个数字，例如，1.1958年前已经进入青海的犯人，2.1958年以后送来劳教被混编入劳改犯队伍里的受管制人员，3.同一时期被关押而未判决的人员，4.文革前后（1965-1978）调入的1万余人，5.1983年“严打”开始后从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调入的1万多犯人。所以，“累计收押、改造罪犯24万余人”，这个统计数字，肯定是不确切的。

32 《青海省志·劳动改造志》，第5-6页。

气息，”身上御寒的皮帽、皮筒、毡鞋都是捡拾废品手工制作的：

杂工组犯人每人背条麻袋，这是唯一的劳动工具。他们在大草原上从早走到晚，每天的路程甚至长达五六十华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拾牛粪马屎，但凡犯人用得着的东西自然也不会放过。从荆棘丛中、草蓬里，可以拾拣到一绺绺骆驼毛、羊毛；从沟沟岔岔处往往能拾到死羊羔，还有藏民丢弃的牛羊下水。偶尔甚至能捡到整只死狐狸、死狼……直到天黑尽，他们才背着一麻袋东西，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监房。有口福的人，将拣到的死狗烂猫开膛洗净，丢到两只大铁桶里。接着，炉火旺旺地直燎到天将破晓，几个人端着大碗，分而食之。这过程弄得满院子飘起肉香味，大田犯人闻着无不垂涎欲滴。

这里所描绘的图景，显示出老犯人求生本能的强悍。然而，这种无异于动物的求生本能，需要何等的麻木和泯灭人性才能习得，它本身又是多么荒诞和反文明啊。这些囚犯中很多人受到过现代教育，至少也曾有过基本温饱的生活；然而他们被长年抛弃在荒野，与亲人隔绝；在饥饿和死亡的威胁下，求生的本能催生出各种突破正常人生理极限的行为，偶然抓获的蛇或鱼被生吞活剥，死去的动物尸体也是宝贝。而且，连这些兽尸杂碎也是可遇而不可求。向承鉴写到，在巴仓第二年的春节前，他和难友试图在食堂的污水池里掏出被伙房丢弃的猪牛羊下水，结果却懊恼地发现下水早已霉烂。至大年初一，长年饥饿的新犯人忍无可忍，计划冲进食堂，铤而走险。一个制度对人的剥夺，达到如此残忍的地步，那个时代监狱事业的光荣背后，难道不是无数囚徒的血泪吗？

向承鉴等甘肃犯人调遣到青海时，文革已进行了三年多，此时正值军管时期（1967年2月-1973年8月），劳改系统对犯人的管制比文革前更严。“对犯人只讲惩罚压服，对刑满人员基本上只留不放，对‘三类人员’的正常申诉斥之为‘翻案风’”，“甚至重提

‘降低生活标准，提高劳动强度’的错误口号”。³³ 这种高压态势，也就是向承鉴在巴仓农场两年间所感受到的：“饥饿，除了饥饿依旧是饥饿；恐怖，除了恐怖依旧是恐怖。”

1971 年监狱里搞“一打三反”，向承鉴经历了又一场无妄之灾。在他负责读报的报纸上，有一张毛泽东像被烧了一个洞。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一时间，向承鉴被当作头号嫌犯。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每夜和衣而眠，随时等待着绑赴刑场。幸而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向承鉴被调往德令哈农场，度过了刑期的余下六年。

德令哈是青海第一大劳改农场，有数万犯人和留场就业人员。向承鉴在这里一年之后，服刑进入第十三个年头，也当上了可以在农场范围内自由行动的犯人。时年 34 岁的向承鉴，此后的处境略有改善。他做过多种与技术相关的工作，也因此认识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犯人和留场就业人员。向承鉴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做了很多具体的描述，他并非有意地去对各种冤案的当事人进行道德判断，因为犯人之间也不允许交流案情，但从他的记录中显然可以看到，大量的反革命案都是冤案。而且，令人意外并感动的是，即使是在如此悲惨的处境下，依然有人保持了道德底线，显示出人性的亮点。

例如一批来自农村的犯人，在巴仓是犯人组长陈康年等人，在德令哈是组长周孔章等；周在 1958 年带领社员抗交统购粮而被判二十年长刑，他在小组里带头干重活，并使整个小组的成员彼此融洽相处。

他遇到各种案情离奇的“反革命”，有按指标抓捕的少年犯、对地主家庭感恩的长工、任劳任怨的基督徒、试图“偷越国境”的记者……文坛前辈姚士彦等。向承鉴记录了他们的故事与命运，他个人的喜怒哀乐与他们交织着。他为生命的消逝哀叹，为师长、挚友和老乡的关爱而感动，也从政治局势的变化看到转机。这样一些具体而微的生命关联伴随他熬出了十八年，也使得这部回忆录的内

33 此处引述的死亡与失踪的例子均见于申渊编著《五七右派列传》上集，在武宜三收集的《3.6 萬右派簡錄》中，能够找到更多的案例。这里提到的两部重要资料均为武先生馈赠的电子版，特此致谢。

容扎实而丰富。

四、“不堪回首偏回首”：记忆的生死存亡

在《炼狱归魂》的序言中，向承鉴先生以“不堪回首偏回首”作为标题，宣了他的写作立场和态度。何以不堪？我们都知道，冤死的人和幸存者至今未能得到应有的公正（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改正”二字）；还不能公开地祭奠、纪念他们，而已有的文字、影像记录都因为言论审查而遭封禁。然而，对于亲历者来说，这还不是直接的原因。逝者，有什么可以挽回他们的生命？这种永远的痛失，是不堪承受的记忆之重。

2001年，向承鉴开始写《悼文十篇》，从他学生时代的难友和挚友写起，纪念史美唐、冯淑筠、邓德银、胡学忠，还有《星火》烈士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接着是他在德令哈的忘年之交姚士彦……他们的故事后来都融入《炼狱归魂》这部书稿里了。

在《悼文十篇》的开头，向承鉴如此描述了他在写作时备受煎熬的内心状态：

往事如烟，又历历在目。犹如眼前的远山，既模糊又清晰，“烟”始终飘散在心头，不肯消散离去。有时，这“烟”化作磐石压着我一颗破碎的心，使我难于呼吸几近窒息。

每当夜阑人静，我在伏案笔耕，或躺在床上，这时，死去的挚友便一个个走马灯似的来到我的面前，向我倾诉。他（她）们有的披头散发，有的满身血泪，有的肢体残缺不全，形骸皆不堪入目，使我片刻不得安宁。巴金老人写《随想录》半夜从床上滚下来打破台灯的经历，我亦感受过。

我诅咒造化不把我变成一棵草、一块石；我甚至祈盼得一场大病，从此成为无记忆和思维的“植物人”，从此解脱这无尽的痛苦与悲哀。

读到向承鉴手稿上的这些文字，我想起另一些人的名字——

在申渊先生编著的《五七右派列传》和武宜三先生依然在修订更新的《3.6万右派简录》中搜索，可以找到多例在反右中蒙难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被发配在青海劳改、劳教，其中一些人惨死狱中。以下只是其中查有记录的几例：

黄嘉音（1913-1961）文汇报副刊主编，划右后关押在青海的一座监狱，受刑事犯欺侮，他奋起反抗。狱方诬陷他“蓄意杀人”，将他枪毙。

贺步陶，南京工学院学生，开除学籍团籍后青海劳动教养，下落不明。

周金声（1924-1960）江苏省人，上海市继光中学化学教师。划右后发配青海省共和县恰卜恰镇劳动教养，不久惨死狱中，死时三十六岁。

浦厚生，上海市虹口区某银行办事处副主任。青海劳改，死不见尸。

陈贵（1914-1966）湖南长沙人，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地质系毕业，曾任燃料工业部总地质师，青海劳教，文革中愤而自尽。

冤死的囚犯到底有多少，我们至今也并不知道。当年有记录吗？应该有。能够找到各个劳改场所完整的死者名单吗？不知道。德令哈等青海的劳改农场在1987-1988年间已移交地方政府管理，不再属于监狱系统，至今已有三十五年。已有的档案不开放，还有很多档案因管理不善或无人保存而散失了。共和国前三十年间无数蒙难者的生命就此沉寂无声，连名字也没有留下来。

然而，我们毕竟知道了以上名字；这都是来源于幸存者的回忆和研究者的寻找。他们因此免于遗忘，成为不可抹杀的历史，而且是浩劫的铁证。

向承鉴就是这样，他与难友谭蝉雪一样，将痛苦的经历化为守护记忆的力量；他让他的挚友和难友，通过他的文字记录而留存于世。

1996年退休之后，向承鉴完成了他早在1959年6月就开始的计划——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审。至2000年，他写完《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一书，后来在2014年自费印出。在书中，他选取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译本中的经典篇目，逐一展开批判。他认为，正是马克思主义这一新宗教鼓吹阶级斗争、革命暴力和无产阶级专政，给人类造成了空前浩劫。从学术角度来说，这本书或许还称不上是一部成熟的研究著作，但作者依据自己对中国现实的深刻理解所提出的反驳，则体现出了突破思想枷锁、转向民主政治的强烈意志。

2003年底，向承鉴于江西老家完成了《炼狱归魂》这部长篇。他的妻子同时也是他的精神伴侣师凤枝，多年来竭尽全力打理家务，照顾他的生活，也为他在电脑上做了他所有文稿的打字录入和校对工作。

我先是在胡杰纪录片《星火》中初识向承鉴先生，我记得片尾的画面重现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的情景：拿到无罪判决后，向承鉴独自去到黄河岸边，点燃了祭奠难友的火堆。在影片里，火光与祭奠者身后的黄土高坡、与林昭所讴歌的海鸥叠映。这是孤独的祭奠，但通过胡杰纪录片、江雪的系列采访，它已经写入了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成长史。正如汉娜·阿伦特曾说过的：

即使是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³⁴

真正见到向承鉴本人，已是在2022年夏天。比起十年前在纪录片中的形象，向老师明显衰弱了许多。他在晚年安居的江西老家就医不便，正准备返回退休单位所在地兰州治病。他患有严重的冠心

34 汉娜·阿伦特：《作者序》，见《黑暗时代的人们》，王凌云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版，第3页。

病并肺部呼吸系统疾病，师老师告诉我，住院时曾告病危，那时他神志不清，仿佛再度被噩梦萦绕；行刑者近在咫尺，他们要将他带走。

写到这里，我又不禁想到，那个时代的幽灵，被向承鉴在《炼狱归魂》中审判过的恶魔，还会卷土重来吗？我们失而复得的历史记忆，能否帮助我们认识强权并进行抵御？这个问题，应该由今天的读者来回答了。

2023年2月8日初稿于江夏

不堪回首偏回首（代序）

回忆录要有个序，我不认识名人，文字又不含蓄隐忍，请人写序要担干系；我这一生连累的人已经太多，不能再背新债了。考虑来考虑去，算了，自己动手。

《炼狱归魂》中的故事发生在毛泽东时代，我把它记录在案，从一个小的侧面反映那个时代的一些情况，目的在于还历史以真实。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是千千万万条人命熔铸的。历史，只能由人民来写，人民才拥有历史的终审权。把历史的记录权、终审权交于某一人之手，无异于证明人民“愚不可及”，或者独裁仍在肆虐。两者必居其一，也可能两者俱全。

故意淡化或篡改历史，是对历史的背叛。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倘无真史，何以伸张正义？何以教育后代？何能迈向未来？

其次，我要对这本回忆录中的人说几句话。

本书重在纪实，使用真名实姓。只有几个地方因涉及隐私，为免误伤，才将真名隐去，用XXX或字母代之。本书写到的人，有些已经作古，大多数还健在。我有责难、挞伐；有颂扬、钦敬，都是当时的真实感受。不管属于何种，不论生者死者，我对他们都要说一句：对不起，请原谅。我无法一一征求意见，没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也联系不到他们。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人，没有人能摆脱环境的制约影响。只不过在一类社会中，个人思想、意愿、人格尊严受到应有的尊重；而在另类社会中，几乎完全身不由己。

由于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积淀，由于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曾痴迷于一个“主义”，曾死心塌地崇拜迷信过一个人；更由于当时太年轻，还不会独立思考，当政治飓风卷来，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而操纵全剧的只有导演一人，直至大戏闭幕数十年

后的今天，仍有某些“群众演员”不甚了然于自己的角色。至于在“运动”中为什么如此这般，除了操控和服从，我以为还该问问自己的良心。

我不记恨任何人，事情的发生有历史和社会的根源。中国在那个时代，人们的政治遭际和人生悲剧，是多种社会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深究这社会力量之因，反思悲剧产生之源，拟制防患重演之策，是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一切仁人志士的责任。

我已六旬有五，每与故人重逢，“往事不堪回首”早成了口头禅。这“不堪回首”四个字，蕴含了多少血泪！

可我还要说一句：不堪回首偏回首，何妨？

我和我的同龄人都已垂垂老矣，来日无多，还有什么可担心顾虑？有什么难以割舍？在住进“万年屋”之前，回眸生命历程，对后辈儿女是一个负责任的交代，有益于我泱泱中华今后少走些弯路；自己也算没枉来人世一趟。

2003年12月7日，写于赣北小村。

上 篇

正青春喋血时



第一章 兰大的鸣放和反右

一、灭顶之灾

1957年7月上旬末，这一天，批斗会拟在祁连堂二楼教室进行，会场早布置好了。宿舍的人全走了，无人通知我开会；落得忙里偷闲，顺便理理自己很糟的心绪，便踱步到了静观园老城墙旁。

此时梨花早谢，青果尚小。自然界开什么花，结什么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绝无例外。何以我一片爱党心花竟结出“反党”之果？思前想后，悟出一个道理：真纯并非美德，它是无知和幼稚的别称。不要以为人都一样，人与人千差万别，太复杂。不要迷信“一贯正确”，世界不存在这东西。一切在运动变化之中，有时，你愈崇拜它，献给它的鲜花愈多，它回报给你的果实愈苦涩。

我沉浸在遐想中，M君来到跟前，她是来叫我去开会的；只有她猜得到我会在此。我告诉她这种会太无聊，该说的都已说了。还是那句话：要我承认“反党”，办不到。他们有权力押我去劳教所，抓我进监狱，有权判刑和杀我，再也无须用开会方式解决问题了。浪费我的时间无所谓，浪费大家的时间可惜。我在此等着，你去叫他们来抓我吧。

M君说，今天的会很要紧的，团省委有一个领导来参加。也许，越是上边的人越通情达理，越能说清楚你的问题。要是不去，反而让人以为你畏罪心虚，你还是去吧。

我已琢磨了好几天，我把得出的结论告诉她说，反右运动如果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你的分析可能有道理。可惜不是这样，这场运动是政治需要，完全是自上而下发动起来的。直接指挥的是党中央，毛主席亲自挂帅，各级党委施行。越是上边的人必然越左，他

是带着任务来督促的，岂能还抱幻想？我郑重告诉她，此后不再来往，比如叫我开会，即使组织委托，你也要坚决拒绝。你应积极批斗揭发我，污水尽管往我身上泼，我绝不恨你。我已成替罪羊，不愿你也当牺牲品，和我一道跌到陷阱里。

M君对我的话不以为然，她认为事情并非我所估计得那样严重，不过是批判，检讨认错完事。她的话轻飘飘的，我真替她着急，不免提高声音道：“你好糊涂啊！报纸上和党委都明确指出，反右运动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我能成为‘反党右派’，难道我不是苦大仇深，难道我对党不热爱？对我尚且如此，那任何人都可能被划右。你赶快离我远远的，把我视作传染病人，千万莫当儿戏！”

说来说去，我接受了她的劝告，随她去了会场；免得别人以为我做了亏心事，不敢见官。

到得会场，已是十点光景。刚落座，进来一位中年人，他三十好几，中等个头，衣着光鲜整洁，身后有反右委员路宝田和陈祖武等人簇拥着。同学们大多拥上前去与他打招呼，女同学斟茶献上。此时，有人送来数张《甘肃日报》，报上醒目的大字标题一下攫住大家的目光：苏共揪出反党集团，有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作为异类，我只远远地瞄了一眼，心中好生吃惊。这几个人原来都有标准像，1953年斯大林死后，他们是握有实权的苏共领袖，而且都是有数十年历史的老革命。我原以为地球上我是最冤的人，现在知道还有比我更冤的。

教室里一时很安静，直到大家对报纸内容大致有了了解，会议才转入正题。路宝田先致辞：今天，我们请来团省委宣传部姚部长指导我们班的批斗会，感到非常荣幸。我代表同学们向他表示热烈欢迎！此处掌声起来，他接着说，现在，请姚部长给我们作指示。

姚部长一手摸着茶杯，另一只手比划着手势，用一种合格的鼓动家的口吻，声音洪亮地说道：这场反右斗争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亲自部署发动的，它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共和国的命运。如果我们不彻底击败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中国将出现匈牙利事件，

千百万共产党员将会人头落地，无数革命先烈换来的无产阶级政权将得而复失。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又将骑到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帝国主义将卷土重来。大家想想，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啊！我的话绝非危言耸听，而是有根有据。你们这儿就有一个右派分子，他明目张胆地嚎叫要杀共产党员，要把共产党杀光！他现在手中还没有刀把子就如此疯狂嚣张，一旦刀把子落到这些人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右派分子疯狂向党进攻，目的只有一个：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夺无产阶级手中的刀把子，实现反革命复辟……。

这个看似文质彬彬、道貌岸然的人原来是个信口雌黄、满口喷粪的混蛋。我在心中狠狠骂道。

姚突然亢奋起来，以高八度的嗓音领着同学们呼起口号——

一切热爱党，热爱毛主席，要求进步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粉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彻底打垮右派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

保卫毛主席！

保卫党中央！

中国共产党万岁！

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万岁！

紧接着，反右委员路宝田宣布：现在由右派分子向承鉴交代他的反党罪行！反右委员陈祖武厉声喝道：右派分子向承鉴站起来！

我没想到，这闹剧煞有介事，如此拙劣卑鄙。即使不让我“交代”我也不会沉默缄口，我已经迫不及待地要说话了。我尽量抑制住愤怒，语气平和地“交代”道：“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请问：我在何时何地、有何人证明我说过‘要杀共产党’的话？”

语音刚落，四个彪形大汉王牟、潘琨、杨淳庆和薛洪福忽地一齐呼叫起来：“只准你老实交代罪行！不准反攻倒算！”

“交代‘我要杀共产党’吗？这话我没说过，谁说了谁交代，与我无关。我不是精神病患者，没神经错乱。我家世代贫农，我自幼逃荒要饭，是共产党救了我和我全家。解放后我是全县第一任少

先队长，我姐是全县第一个共青团员；我从中学到大学一直享受助学金，对共产党只有感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对共产党恨从何来？”

只听得又是一阵歇斯底里的吼叫，一通狂轰滥炸：“不许美化自己！不许往自己脸上贴金！”

“是否美化贴金，你们可以调查。倘有半点不实，任凭处置！”

王牟拍着桌子狠狠吼道：“你是毒蛇！是披羊皮的狼！我们不会上当受骗！”

我豁出去了，也大声叫道：“要杀要剐，由你！我没说过的话、没做过的事，强迫我承认，休想！”

“你嚣张！”他指着我叫。

“你胡说八道，诬陷人！”我反驳道。

批判会没达到预期效果。反右委员在姚部长的耳畔嘀咕好一阵。午饭时间已到，只好草草收场。路宝田道：“现在宣布校党委决定：经审查，吕佩璜、鲁丕杰、冯淑筠系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右派分子，从现在起戴右派帽子。学校后天放暑假，我在此代表反右委员会严厉警告右派分子：无论在校还是回到家里，都要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认真反省反党罪行，随时准备检查交待。如若乱说乱动，继续放毒，必将罪加一等！现在散会。右派分子先退场。”

我忘不了这一天，1957年7月，《甘肃日报》刊登苏共中央揪出反党集团的日子，也是我进入炼狱的日子。

其时，我被兰大党委“点将台”点名划右大约已有十天了，之前已开过多次批斗会，哪一次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蛮不讲理、血口喷人。

我怎么会划上右派的？事情还得从两个月前说起。

二、“阳谋”

1957年5月初，兰大副校长陈时伟先生参加最高国务会议返校，向全校师生传达了会议精神。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主持召开的，

他在2月27日的会上作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讲话，在4月30日的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共产党要开门整风，清除党内的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三大不正之风。他号召民主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士、广大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改正缺点。他说的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毛主席态度谦恭，言辞恳切，让我好感动。我心想只有毛主席有此胸襟气魄，真不愧是伟人。

随后，校党委书记刘海声作了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刘书记人高马大，此前我一次没见过。从他口音判断，像是山东或河南人；听说他来兰大前当过驻越南使馆文化参赞。他的资历、级别与林校长相差颇远，跟林的作风也迥然有别。会后，师生中无甚反响。整风是党内的事，老师忙于教学科研，学生忙于功课，不太当回事。

共产党办事向来认真，锲而不舍，擅于运用组织的力量。全校动员会后，紧接着是系总支、年级党支部、班级团支部的动员会。这些会有的叫座谈会，有的叫茶话会、谈心会等。为招徕与会者，还备有茶水，甚至有水果、点心；以表组织者“闻过则喜”的虔诚心意。校园依旧悄无声息，还是无人提意见，“鸣”不起来。

没过几天，换了另一种说法：谁要不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说明对党缺乏感情。谁提意见做不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明对党怀有二心。这可是了不得的政治帽子，它传达的讯息再明白不过。

就我当时的思想感情来说，只要党需要，我可以为之献身。我不得不思索直至搜肠刮肚，为了党更纯洁、更伟大正确，看看她身上还有什么美中不足。我认真思考，条分缕析，结论却是：我对党没有任何意见。我才是个大一学生，对党的政策方针以及兰大党委、行政的情况一无所知。我岂止是对党，即使对我认识的同一小班四个党员同学郁桂莲（女）、巩玉珍（女）、路宝田和李超云，我也提不出任何意见。我想，反正只是传言，党组织并未正式传达说，每个人都必须提意见。没意见就是没意见，管他呢。每逢星期日，我和同学冯淑筠照常去富强路的甘肃省图书馆读书。

这时的我，心比天高，已暗暗锁定了要为之终生奋斗的科研目标。我需要涉猎的知识太多，时间不够用。在物质生活上我要求低，吃得饱、穿得暖就行。我甚至认为，学校提供的物质条件已经超过我的需求。我无忧无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高年级的同学先贴出了一些大字报，有揭露个别党员领导干部违法乱纪行为的，有批评党员干部盛气凌人、作风霸道的，有指出瞎指挥贻误工作造成损失的……一年级同学新来乍到，也贴出少量大字报，其中批评学校招生时浮夸吹嘘，有同学对学校教学设备不满，要求增加教育投资的。也有人提出，新校址选建在闹市区是装潢门面；他们要求改建在雁滩等等。令我迷惑的是，教授和老师都噤若寒蝉，没有贴出一张大字报。

问题无一得到处理，意见无一得到答复，学生们的情绪开始躁动。这与其说是对共产党不满，不如说为下级党委的漠然态度所激怒。一时间，大字报迅速增多，贴满了祁连堂、天山堂、至公堂的墙壁。以后操场上、学生宿舍前的甬道上也拉起绳架，大字报一张张挂在了绳索上。有的系、年级，三、五学生办一个大字报园地，名目繁多，诸如《号角》《觉醒》《论坛》《先驱报》《战斗报》等等。有的名字还很古怪，如叫个《黑老鸱》的。

平时，除同一小班同学外，不同系、不同年级乃至同大班不同小班的同学都无甚交往。大家忙于功课，不知谁有什么兴趣特长。运动一来，许多人的天赋才华显山露水，叫我大开眼界。有书法极好者，有画漫画唯妙唯肖者；有文章逻辑严谨、见解独到的人；更不乏思维敏捷、口齿伶俐的辩论才子。我所见到的大字报中，未有所谓恶意“诽谤”“中伤”“攻击”。作者论之有据，充其量，有的言辞有些过激罢了。没有一张大字报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或者针对党的基本方针政策，锋芒所向，无非是某个领导的工作作风、某件事情的具体做法。在我看来，这些正是党身上存在的瑕疵，是应该改正的缺点。

校园里的大字报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未来得及看的大字报很快被新的覆盖，同学们吃饭时端着碗边吃边看，即使如此也只

能看完大字报的几分之一。教学秩序乱套，课没法上了，干脆停课鸣放。

从这些大字报里我知道了许多情况，做梦都想不到啊。原来有些教授是新中国成立前后响应共产党召唤回国的，其中有的人甚至变卖家产，购回国家急需的仪器设备。然而回国后，多因家庭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而得不到信任。他们在肃反和思想改造中被称为“重点”对象，“检查交代”屡屡不能过关。运动的主持者和积极分子把他们当作“凶神恶煞”“反动堡垒”“披羊皮的狼”“扮美女的毒蛇”。有些教授成了“头上长疮、脚下流脓”“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的“卖国贼、特务、伪君子、大坏蛋”。这还不算，还要逼他们心悦诚服，自愿接受这些光荣头衔，给自己编故事。不少人受尽侮辱，有人被逼发疯甚至自杀。

有张大字报揭发了这样一件事，是我入校前发生在兰大的：物理系有位女生长得漂亮，被校某领导干部看中，先后采用各种手段逼其就范。该生死活不从，最后跳黄河自尽了。大字报点了当事人的姓名，真实性不容怀疑。想不到在新中国之神圣校园竟发生这种事，丑行居然出自党员领导干部。这与我心中党的崇高形象水火不容，哪里是共产党员？是货真价实的罪犯，应依法严惩，该杀！我脱口骂道。

停课数日，学校如一团乱麻，终不是办法。有人提出：大鸣大放应该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于是各系、各年级纷纷成立了鸣放委员会。现在想来，这应是党委旨意，舍此谁能有这么大的号召力？我这小班同学经民主选举产生了鸣委会，我居然被选为鸣委。

大家选上我，并非因为我鸣放积极，情况恰恰相反。党委宣布整风之时，我没参加过任何形式的座谈会。鸣放伊始直到停课，我没写过只字大字报，更没向党以及任何人提过一句意见。那时我的入团申请正报团委审批，个别人对我还有非议，说我不关心国家大事。即使看大字报，我也是在上、下课路过时偶有一瞥。当选鸣委，大约只是因为我当过学生代表，又是《红染缸》（注1）的编委之一，还上台演戏献过丑吧，我猜。

在各级鸣委会的组织主持下，各系的鸣放会相继召开，有的会我去旁听了。在新校址的中文系、历史系开鸣放会，搞得很热烈，颇有声势。化学系的鸣放大会在各系之后召开，系大人多，因此在昆仑堂进行。一年级同学中，只有小六班的史美唐同学发言。

鸣放会意见提了一大堆，问题揭了一大批，兰大党委始终不表态也不答复。大家越来越不满，情绪开始激愤。学生提出要求，请甘肃省委派工作组来校处理问题，由《甘肃日报》报道兰大的鸣放情况；要求成立赴京代表团的呼声也日益强烈。

省委工作组来校后，原是聋子耳朵不办事，只两三日便被同学们“请离”了。皮球踢过去又踢过来，失望之余，同学们要求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亲自来校解决问题。

听说张仲良晚上七点准时到校，兰大师生翘首以待。人们从盘旋路新校址步行一个小时赶来萃英门与会。昆仑堂早已满座，不少人挤在过道和两边靠墙的地方，会场笼罩着热切期盼的气氛。不料，两千多师生等了个把小时，人困马乏，直到天黑尽，这位边疆大员才坐小车姗姗而来。他不是时间观念差，而是缺乏应有的礼节和诚意。会场气氛不再是期许，而是充满焦躁、不满甚至愤怒的情绪。张仲良从边门进到大礼堂，我站在门边靠墙处，看得清清楚楚。他身材颇高，背似乎有点弓，他是我见到的最高级别的行政长官。

昆仑堂灯火通明，雷鸣般的口号声响起来：“共产党万岁！”在当时气氛下，这口号颇有点嘲讽的意味。人们继续高呼：

要求省委答复意见，处理问题！

把危害党的坏人从党内清除出去！

惩办迫害、诬陷的凶手！

外行不要领导内行，我们要求“教授治校”！

要求把兰大鸣放情况公之于众，省委不要欺骗舆论！

为什么把新校址建在闹市区装潢门面，谁人主使？

据说，张仲良行伍出身，解放大西北时是彭德怀属下的军长。“城门楼上的雀儿——见过场面的”，如今坐在台上，面对情绪亢

奋的大学生，显出浑身不自在。天气很热，空气很闷，汗水从他的额头、脖颈渗出。他不停地用手帕擦汗，又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

“同学们，请不要激动！有话慢慢说，我们欢迎大家提意见！”

“意见已经提了一大堆，今天请书记答复这些意见，要你解决问题！”

会场又卷起一阵呼啸：“不准迫害教授！不准打击报复！”

“要求答复！立即答复！”

人们看到的是一副苦涩的面孔，是无言以对的窘态。张仲良不愿对“任何意见”表态，也没有给“任何问题”以解决方案。他的暧昧、支吾和搪塞，引起同学们更大的不满和骚动。我看他张口结舌，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话，显得很狼狈。

他应该有备而来，何以形同白痴？我对他的能力、魄力产生了疑问。兰大师生的鸣放意见无非三类，其实不难处理。第一类关系到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伤害者，要求调查核实后，凡有搞错的情况，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属恶意诬害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属于腐败的，坚决清除出党，触犯刑律者要依法惩治。第二类意见属于正确或基本正确的，应该着手兑现。若条件不成熟，假以时日，创造条件解决。第三类是意见不正确、要求不合理的，不妨理直气壮予以回绝。党掌握着几百万军队，有强大的专政机器作后盾，怕什么？只要第一书记是非分明，态度明朗，群众的不满情绪很快会平息下来。同学们虽然激动，然而也都是讲道理的。

看着张仲良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顿生恻隐之心。他毕竟也曾赴汤蹈火，战功赫赫，为什么不敢接触具体问题？我真替他着急。

其实，张仲良并非我等乳臭未干之辈，而是老谋深算的政客。直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毛主席此前已作了“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伟大战略部署。张仲良用的是缓兵计和激将法。他只是装作呆头木脑，实乃演戏而已。

傻乎乎的我哪里知道这些，我的小班同学大都和我差不多，既不知情也无意见可提。既然选我当鸣委，我便提议将本班同学男女搭配分成若干小组，每组访问若干个教授、副教授、讲师等，给老

师以精神支持。我认为应该打消他们对打击报复的顾虑，做好访问记录，不加任何分析点评，以大字报形式整理公布，供党委参考。我想，这也算是帮党整风尽点心、出点力吧。

根据一个小组的访问记录，我整理后写出了大字报，这也是我唯一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XXX教授访问记》，全文写了四页纸，贴在宿舍旁边与学生饭厅之间的墙壁上方。内容是该教授在思想改造和肃反运动中骇人听闻的遭遇，我在抄写时，只觉心在战栗，在汨汨地流血。

既然张仲良亲自来校依然不解决问题，兰大赴京代表团便择日启程了。

三、兰大反右的第一个“牺牲”

赴京代表团只到达了西安，就被高教部以刘凯丰副部长为首的工作组截住，安排住在西安一所高级宾馆里。此时，从上海搬迁至西安的交大，也因对搬迁不满，闹得很厉害。刘凯丰主要为解决交大问题而来，兰大问题尚在其次。

在西安的兰大代表团不时有消息传回校内，代表团成员每天与刘副部长舌战，谁也说服不了谁，一直在那儿僵持着。

正值此时，兰大新校址传来消息说，雁滩农民对大学生鸣放切齿痛恨，忽一日夜晚，他们冲进兰州医学院学生宿舍，掀掉被子，将学生们拽下床。他们质问道：我们几十个农民供养一个大学生，用我们的血和汗。你们为什么还要反党？共产党哪点对你们不好？有的农民愤怒地朝学生吐口水，骂他们身在福中不知福，恩将仇报，是禽兽不如的白眼狼！

真是咄咄怪事，农民怎么知道大学生鸣放是反党呢？报纸没有披露大学生提了些啥意见，连我这置身其中的人都没感觉出反党的味道，他们是如何知道的？如果没有人潜心策划、组织，农民会来大学校园闹事？我无法想象。

6月8日，我还在为此犯傻的时候，更大的地震发生了。这天，

《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顿时山摇地动，恍若空气中都隐伏着雷霆。整个校园，人人目瞪口呆。还有传闻言之凿凿：有人在北大党委门前安放了颗炸弹。我在想，这是谁干的？真正是反动透顶！《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直接传达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对我来说，它无异于真理的化身。震惊之后我又想到，放炸弹，那毕竟是个别人所为，国家有那么多公安人员，不难侦破，将其绳之以法；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进行全国总动员吗？此前，《人民日报》点了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葛佩琦等一大堆人名，似乎这些人与放炸弹的人是同伙，我感到不可思议。

《这是为什么？》发表后没过几日，《甘肃日报》以通栏大字标题整版刊发文章：《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这份报纸在张仲良、吴坚（中共甘肃省宣传部长）领导下，是省级地方党报党性最强、政治嗅觉最敏锐的。整个鸣放期间，它对兰大的鸣放没有一个字的报道；如今，看到北京上空升起的信号弹，它从像埋伏在战壕中的战士一跃而起，向着右派亮出刺刀！

“大鸣大放”满打满算不足一月，我卷入其中只有两周时间。无论校内还是报纸上发表名流言论，我看不出谁有“把共产党赶下台的狼子野心”。即使全错，不接受拉倒呗，谁能强迫，谁敢？何必出尔反尔，不怕失信于民？

政治家做事有别于草民百姓，反右斗争在全国开展起来。校园瞬间化作讨伐右派的战场。批斗陈时伟先生的大会在至公堂进行。墙上到处贴着标语，用的全是“粉碎”“打垮”一类字眼，仿佛要审判一个杀人凶犯。至公堂只能容纳百几十号人，参加批斗会的人都是事先挑选好的。进不去的学生只能隔着玻璃窗围观。

很快我发现，屋内与会者中有鸣放大会上见过的面孔。曾几何时，他们对党的缺点也曾怒发冲冠，不过数日，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成了“批判者”和反右英雄。

陈先生坚决否认自己“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连错误也不承认。连续几天，批判收效甚微。大会于是扩大范围，改在昆仑堂召开，这依然没有封住陈先生的嘴。他自我辩护说：赴京代表

团是经党委批准成立的，各系代表是民主选举产生的，我受党委和行政会议委派参与。怎能说代表团是我组织的？我何错之有？代表团只是向高教部、党中央反映兰大情况，难道这也叫“反党”？如果赴京代表团有反党行为，请拿出具体事实来。有人批判陈先生买空卖空，不学无术。他愤然离座，从家里抱来一摞科学专著放在讲台上，不再吭声。

鸣放中，我看了许多大字报，知道了存在于党员中的不少坏事劣行；这却并没有改变我对共产党的感情，我懂得把党和它的少数党员区别开来。而反右开始后，我对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有了新的思考和认识。对陈时伟的批判显然是以势压人，充满诬陷和人身攻击。这些却不是个别党员的个人行为，而是在党委组织领导下施行的，体现的是整个党及其领袖的意志。

尽管我有看法，也只能深埋在心里，有人却敢大声喊了出来。这人就是他们的女儿，她当时在兰州女中读高三，校园里常见她骑辆红色飞鸽牌坤车，身影婀娜。她说得一口流利的美语，在女中功课出类拔萃。她父亲的“反党罪行”在《甘肃日报》被公之于众后，有同学幸灾乐祸地将报纸拿给她看。她当众将报纸撕成碎片，且辩解道：“这全是谎言！总有一天会不攻自破。”

陈时伟和夫人左宗祀先生都被划为右派，白天遭受批斗，夜里有人围困其住宅，轮番呐喊，使他们夜不能寐。他们家离我们学生宿舍不到百米，夜夜门外的狂呼乱喊之声清晰可闻。终于有一夜停歇下来，我感到好奇怪，此后从他人的口中听到，也是他们的女儿冲出屋外，慷慨陈词：“骚扰民宅，侵犯他人的休息权是违法的！你们还是大学生，我为你们感到羞耻，难过！”

这就是毛泽东的所谓“阳谋”，一场悲剧在兰州大学拉开序幕。

四、我戴上了“右派分子”帽子

陈先生的批斗会开过两周光景，到了6月底或7月初，兰大党委公布了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学生中有二十来个右派，我的名字赫

然其中。我眼前顿时一片漆黑，完全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首批被划为右派的学生，多为各系各年级各班的鸣放委员，赴京代表团成员全部划右，仅一人例外。这些学生右派有中文系三年级学生肖藩，他是赴京代表团的副团长；有物理系一年级学生苗庆久、历史系一年级学生屈健英等。

学生中成立了反右委员会，其成员都由党组织钦定。

我这个小班的反右委员有三人，在他们的主持下，针对我的批斗会起初还比较有章法；我尚有澄清事实和辩白的机会。我觉得划我右派是天大的冤枉，是党委的错误决定。心里没鬼，不怕鬼敲门。要说我那时胆小真个是胆小如鼠，说胆大又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我相信自己能证明自己的清白无辜，最终能得到党的谅解。

我这小班起初只有我一个右派，批斗连续不断。我对所谓检举揭发与分析批判逐一作了回应。我的“反党右派言行”归纳起来有以下各点：

当鸣委，搜集整理“反党黑材料”，充当“反党急先锋”。

对这一条，我答辩说：鸣委不是我要当的，是大家选的。全校各系各班都成立了鸣委会，谁最先成立，由谁提出，由谁批准，这一点不难查清。再则，我在鸣放期间没写过一张大字报，没说过一句话；更不是什么“反党急先锋”，时间上也是最后卷入的。至于访问老师的大字报，我是根据记录整理写出。既未断章取义，更未恣意发挥。被访问老师说的是否属实，我无能也不该负调查落实之责，这是党和政府应当做的事。我又没有昧着良心造谣，何况，毛主席有言在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何错之有？

第二条罪行：骂党员干部XXX该杀，吹捧资产阶级教授，说他们应该入党。一恨一爱，证明我的阶级立场反动。

我对此供认不讳。我说，XXX是党员领导干部，正因为如此，他干坏事对党的危害更大，应从重惩治。逼婚违反婚姻法，把一位大学生逼到跳河自尽，不该严惩？刘青山，张子善都曾是党员干部，党也清除了他们。这样做，正是为了党更纯洁，是对党怀有热爱之情。至于我所谓吹捧资产阶级教授，事实是我看到教学楼灯火通夜

不灭，我为教授的敬业精神所感动，因此我说“像这样的好教授应该入党”。诚然，他们也可能有某些缺点甚至错误；至于够不够党员标准，那是党组织说了才算。个别党员的恶行是否属实，亦有待组织调查。我说“该杀”，是基于大字报揭发的恶行。

批斗会越来越激烈，只要别人发言结束，我立即予以反驳。有人说我同意储安平“教授治校”观点，这就是篡党夺权。我答道：能者多劳，智者为师。教授治校可以少走弯路，减少时间和金钱的浪费，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又有什么不好？教授治校也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之下，难道教授能将高校搬到外国去不成？如果这也算“篡党夺权”，无异指斥党心胸狭窄、寸权不让，不过为一党之私。这合乎逻辑吗？

在反右委员和积极分子看来，我说得越是头头是道，越显得“气焰嚣张”。其实我是无法沉默，无法接受这天大的冤枉。他们又动员同学们揭发检举，对平时与我关系接近的同学不断施压，可惜这些也都收效甚微。如果我真的错了，我可以认错。但我没有错，硬要我接受“三反”的帽子，办不到！

他们不曾料到，我年纪轻轻，竟是块难啃的骨头。这一天，终于借来尚方宝剑，于是有了开篇的一幕。

五、列车上的邂逅

开我的批斗会不让我说话，这还是第一次。有“钦差”亲临与会，情形大有不同，这一点不足为奇。非团员想要入团靠积极参加批斗，团员想“火线”入党更需要积极表现，只有傻瓜才会错过机会，我的同学冯淑筠便是傻瓜之一。

冯淑筠不是“鸣委”，鸣放中没写过一字大字报，没有一句感慨之辞。此前，反右委员和党团组织轮番找他谈话，要他与我“划清界线”，“反戈一击”，都被他断然拒绝。非但如此，他反而对他们说我坦诚正直，是个好人。他这样明目张胆地为我辩护，反右英雄岂能放过他？自从我囿于右笼，要他远离我，割断来往，每次

都被他“顶”回。结果，这老实巴交的人也被打成右派。他的划右，全是受我株连，我心里的痛楚比自己划右更甚。我和冯都不是性情孤傲、惹是生非的人，同学相处十个月，我俩未与任何人发生过摩擦或者红过脸，为何有人要这么对待我们？

在我这一小班，最了解我的有三个同学：张友杰、冯淑筠和路宝田。张友杰与我都来自武宁，我们从穿开裆裤时就在一起，两家人住在同一条街，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我俩已经同学了十三年。我们不只是了解彼此，连相互的家庭成员都很熟悉。张友杰背家庭成份包袱，“夹紧尾巴”，小心谨慎，他不可能站出来替我说什么，这我能理解。其次，熟悉我的就算路宝田了。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我的家庭、身世他都知道，他更清楚我对共产党的真实感情。只要他说句良心话，我的处境或许可以改观。然而，他一句话也不说，斗起我来更积极。他是个聪明人，政治上成熟得很。他知道，不如此，难以脱掉与我的干系。你为什么介绍一个反党右派入团？只要有此一问，他立马会陷入泥淖。他只能昧着良心伪装积极，不像泥鳅般滑溜，行吗？我对他多有怨恨，又不能不“佩服”。

人啊人，我在心里感叹：都是人，冯淑筠与路宝田何以有天壤之别，待我如此泾渭分明？初涉人世，我就交了这么两个朋友，却从这截然不同的态度中体会到真假善恶、世道人心。

放暑假了。

东去的列车挤得一塌糊涂，我与淑筠君年轻又无行李，好不容易才挤上车。行前，班上还有几位同学相送，令我感动不已。他们是冒着政治风险的，仅此就值得我铭记一生。

我俩是学校统一订的票，座位靠着窗户，彼此面对面。我们旁边坐着兰州卫校东北籍的三位女同学，她们也是回家度暑假，各带了一大网兜白兰瓜，沉甸甸的。我帮她们把网兜放到行李架上，累出了一身汗。这趟列车严重超员，站着的人比有座位的旅客多得多。旅客挤满了过道、两车厢衔接处，洗漱室和厕所里也全是人。每个人都像楔子一样楔在固定的地方，难以动弹。有的旅客只能单脚站立，真个是无立锥之地了。全车厢的旅客都无法上厕所，不能打开

水或下车购买食品。厕所门口，一个怀抱幼儿的妇女弯不下腰，婴儿在啼哭，她无奈地前后探望。列车员堵在房里出不来，也免却了打扫卫生的辛劳。

我见不得别人受苦遭罪，尤其老人和孩子，这比自己受罪还难受。经和同学们商量，我们说在这两排座位上各增加一位老人，大家欣然同意了。我仍安定不下来，一直在寻思怎样使老人、孩子和长途旅客少受点罪。无序则乱，混乱使有限的空间变得更加狭窄。我敲开列车员的房门，向她表示愿意帮助她整顿车厢秩序。我把具体做法告知她，她很感意外，也很惊讶，但决定按我的办法实施。这是1957年的夏天，社会风气尚属纯正，小偷绝迹。只要礼数到，人们遇到困难没有不愿提供帮助的。

我陪列车员向有座位的旅客逐一鞠躬，请求人们发扬友爱精神，终使得两人座位坐上了三人，三人座上坐了四人，过道上的人顷刻少多了。我们又把车厢连接处和厕所里的旅客安顿在整齐而能坐人的行李上。然后列车员逐一询问有座位的短途旅客，使他们与无座的长途旅客对号。经这番手术，车厢面貌大为改观。车过定西，我忙了足有两三个小时。搬码行李我亲自动手，回到座位时，衬衣都能拧出水来。

卫校的三位女同学拿出随身带的食品，摆满了茶几要请我吃。她们说是犒劳有功之臣，对我热情备至。老冯笑眯眯地说道：“古道热肠，你一辈子改不了。”

五个学生相逢，有吃有喝，又说又笑，很快混熟。三位女生活话更多，我们一直聊到灯光暗淡下来。

时过午夜，瞌睡虫不请自来。乘客多已沉入梦乡，我也昏昏欲睡。身旁的女生靠在我的肩头不知何时睡着了，我上身穿一件背心，她的面颊贴在肌肤上，细嫩、滑腻，痒痒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触少女的肌肤，她浑身散发芬芳的气息，令我陶醉。

开初的感觉是美好的，时间一长也难受起来。7月中旬正热，车厢人多气闷；三人座上四个人粘在一块，我这半边身子又承受着重负。不多时便汗流浹背，浑身酸麻难支。我见她睡得香甜，不忍心

唤醒她，只得强支硬撑。正当我疲惫不堪、思想矛盾斗争之时，她突然由我肩部滑到双腿上。她趴在我的腿上，睡得更酣畅沉稳了，就像是趴在她的父兄、亲人身上，或者是躺在情人怀里。我怀疑她是有意为之。男女间一见钟情的事是常有的，何况，我也不甚难看，不乏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她有选择爱的权利和表达爱的方式，不管真睡假寐，总之无可非议。几天前的批斗会上，那些狰狞可怖的面孔和歇斯底里的吼叫还包围着我。那场景给我留下的心灵伤痕，此时犹如贴上了止痛膏，有双温馨的小手在替我抚平。

我把双腿尽可能放得平稳，一动也不敢动，唯恐把她弄醒。夏日只穿了条薄裤，她趴睡的地方距离我最敏感的领地只有一布之隔。少女呼吸的热浪冲击着生命之根，使它有些躁动不安。我感觉到她发育良好的双峰，末梢神经将一切讯息传递到大脑中枢，带我到了伊甸园。鲜熟禁果的诱惑力如此强烈，我想俯下身去搂抱她，抚摸她，去吻她。我的血管里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像是一触即发的火山……但我开始问自己：你了解她吗？你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这种感觉不是爱情，只是一种动物性的冲动。如果连这一点都不能自己，还算是人吗？还有什么远大理想可言？

身静而神游，各种乌七八糟的念头袭上心头，展开肉搏。我敢承认，我的本能经历了一次熬煎，理性和意志力受到考验。我自始至终也并没有碰她一下，我的内心告诉我：这胜利来得很有些艰险呢。

她一觉睡到大天亮才去洗漱，回到座位后，她羞红着脸对我说：“实在对不起，昨夜叫你受苦受累了。”我乐呵呵道：“老大哥照应小妹妹，原是应该的，不值一提。”

车到西安站。我要在此下车，再换乘去武汉的车。我遂与冯兄并她们三位少女一一握手道别。我的脚刚落到站台上，她追了下来，要我签名留下地址。她的眼里闪动着奇异而圣洁的光辉，撼人心魄。我并不愚钝，明白那里的一切含义。

犹疑片刻，我决绝地对她说：“忘记我吧，我是个右派。”

六、泪像剪不断的线

我从兰州至西安、武汉，辗转回到江西武宁的家中。从上大学到现在，一年不见了，亲人都很高兴。继母夸我长高了，长胖了，完全像个大人模样了。弟弟拽着我的手，不肯离去。父亲面露欣喜之色，却没说一句表扬的话。他对儿女一向很严肃，我一生也未听到过他的赞誉。可这次不同，我发现父亲只是开心了几分钟，很快就恢复了蹙眉不悦的表情，家中似乎有什么事要发生。

果然，父亲迫不及待地递给我了一封信。信是由哥哥执笔、以哥姐两人的名义写给我的。当时我哥哥在北京的重工业部化工设计院工作，姐姐在北京地图出版社。我与他（她）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在信中，我也向他们提到了兰大的鸣放情况。哥姐的来信主要是询问我在鸣放与反右中的表现，他们叮嘱我：千万莫说有损于党的话，莫做有损于党的事；要始终如一地相信党、热爱党。

待看完信，父亲开始唠叨。他说的无非是忆苦思甜，诸如我家祖祖辈辈种田务农，世世代代都是忠厚良民；哥讨饭时被富家的狗咬伤，姐在逃荒路上掉到河里几乎没命，以后要送人当童养媳。又说杨云峰如何欺侮人，兵痞如何吊打父母等等。父亲的家史故事我不知听过多少遍，而且大都是我亲见亲历，早已铭记在心。只是父亲这次讲述更详尽，态度也更严肃。他不时用眼光审视着我，那意思我懂：我们全家是靠共产党、毛主席才翻身解放的。“吃水不忘挖井人”，要知恩图报。父亲没逼问我在大学的情况，话里却隐含着责备。

两个月来发生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全都突现眼前，我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觉醒来变成了吃人魔鬼。委屈、冤枉，更是奇怪，一点也不明白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满腹的悲愤在学校无从发泄，我多么想得到亲人们的同情和理解啊。如果母亲在世，我会扑到她怀里，向她呼号哭诉。如今，万没想到父亲对我疑心忡忡，以为我忘恩负义。

我委屈到了极点，眼泪像根不断的线。这是我从记事起当着人

面第二次痛哭，第一次还是母亲逝世的时候。想到无端端地被划为右派，泪水更是狂泻不止。在这个世界上，母亲是我最亲最爱的人，可在我心中，还有一个比生我养我的人更为高大的母亲，我曾发誓，要像保尔·柯察金那样投入她的怀抱，为她献出一切。现在她却抛弃了我，不，是她背叛了我，这怎不叫我如丧考妣般的哀痛呢。

我一句话没说，什么也说不出，只是不断垂泪抽搐。父亲从未见过我这样，终于猜到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不再责备我，反过来说了安慰的话。我很感激父亲的宽容，否则，当夜便是我的忌日。他说：“你个性倔犟，脾气丑，心善良，是个明事理的孩子。天下没有第一，只有第七；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凡事争强好胜，这是你的最大优点，也是你致命的缺点。枪打出头鸟，人太冒尖易遭嫉妒。你千万要想得开，要忍辱负重。万一大学上不成，回家来和我一道做棕绳，或者下乡种田，劳动吃饭，一样光荣。你年轻，以后的日子还长得很。只要摆正思想，天塌下来也没有什么了不得。”

我涕泪横流，无法向父亲解释。我的遭遇太怪异，根本说不清，我也不敢真情相告。父亲对我有着殷切的期望，何止父亲，全家都是如此。我知道这打击对他们是多么巨大，为供我读书，全家人节衣缩食。父母辛劳终生，没休息过一天。如今，父亲竟是这般豁达明理，我好感动。坎坷人生使他能洞悉世态，从容面对。我心里像吃了颗定心丸，顿觉敞亮许多。我感谢父亲，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他问我：天下什么东西最大？我想了想，很有把握地回答说：天最大。父亲摇摇头叫我再想，我再想不出来。父亲说：“天是最大，比天更大的是理。”我琢磨他的话，直到上了高中才体会出他的意思：理即公理，也即事物的客观规律。可在随后的日子里，我才知道有比理更大的东西，那就是权。

我立即给哥姐回了信，大致内容是：我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划我右派是个误会，是莫大的错误。毛主席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无论从阶级、家族、家庭和个人根源来说，我都没有“反党”的理由。参加鸣放整风是响应党的号召，当鸣委是同学们选的。毛主席有言在先，言者无罪……，

宪法又赋予公民言论自由，我不明白我有何错、何罪；党为什么要对我这样。我更无法容忍的是，断章取义，无限上纲，还不准自己辩护。这样下去不得了，不知要冤枉多少人。

我依然写道：请相信我，我对党充满爱，没有伤害她，心里只为着她更好。

在信的末尾，我要求哥姐看完这封信后，将信转交给我的同学M，她也回京度假了。我想请她带回学校，交给团组织，权当我写过组织的思想汇报。我告诉他们，我对自己如何被划上右派的这件事说不清，加之心绪太糟，思想如一团乱麻理不出头绪，因此也无法详叙。M同学知道经过情况，详情可以向她询问。

信寄出后，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大一这年糊里糊涂过去，鸣放，停课反右，至少虚度了一个月的光阴。自划上右拍派，我已做好最坏的准备：不到逐出校门那一天，决不抛掉功课。同时我又心存侥幸，我不信最后定罪处理前不调查核实，不信共产党毛主席会伤天害理。因此，暑假离校时我就做好了计划，要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我带回家一摞书，有福里斯编的《普通物理学》和习题集，有费尔金格编著的《高等数学》和习题集，还有英语和俄语教程等。每早我六时起床，到公园跑步锻炼半小时，再读两小时外语，只等弟弟来叫我吃早饭。上午我学习三小时，下午四小时，晚上为乘凉娱乐时间；一切照计划而行。

有一天，弟弟的学年成绩单送到家里。我打开一看，各科成绩平平，无一科优秀，我很感吃惊。他马上要升六年级了，照此下去恐怕连中学都考不上，得管管他。他太贪玩，像个野马驹，成天不归家。弟弟回家来，我拿出成绩单数落他一顿，并给他约法三章：每天上下午各学习一小时，由我布置一些作业，完成后方可出去玩，否则要受惩罚。开初两天他憋着性子完成了任务，第三天，我刚上厕所回来便不见了他的影子，作业和课本乱糟糟摊在桌上。我气得牙痒痒，揍了他一顿。

这是我第二次对胞弟施暴，第一次是因为他擅自跑到大河里玩水，那是性命攸关的大事。家乡的修河是条桀骜不驯的河，每年夏

天都要淹死几个大人和孩子，其中就有我小学、中学、高中的同学。它吞噬过多少人的生命啊！在九江读书四年，每年我都不断写信给弟弟，叮嘱他不得去河里玩水。有时在梦中也会被他的“偶发”事件吓出一身冷汗，偏偏有一次就在河边的沙滩上逮住了他。一个十岁的孩子，如此凶险的大河是你玩的地方？我吓坏了，把他狠揍了一顿。

我继承了母亲至善的心地，也受到父亲个性里简单粗暴的影响。母亲逝世后，弟弟便是我的最亲，我对他的感情很深。可是在我的生命历程中，唯一被我伤害过的恰恰是弟弟，谁能相信？两次体罚弟弟下手都极狠，过后自己又暗自垂泪。回想起来，这是我终生的切肤之痛！

人性充满矛盾，感情尤其说不清，道不明。爱之深便也责之切，这种感情二十多年后又转到儿子身上。暮年反思，实在是我一生的最大悲哀。

七、短暂的恋情

虽已运交华盖，花季年龄仍伴有美妙的心灵插曲。回家不几日，又邂逅一位佳丽，引出一段恋情来。

那时我家由东门搬到新官巷，依然是破房子，是自家捡断砖烂瓦盖下的；其中一半的材料还是茅草，但面积比原先的略大。夏天乘凉时光，一天傍晚，我这从不出门的书虫突发奇想，决定到县工会图书馆去转悠转悠。我想那儿说不定有我需要的书，路也不远，举步可到。

我正在翻阅一本书的目录，一个身影罩住了灯光，久久没有移去。我不由抬起头来，呵，身旁站着一位姑娘。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连衣裙，犹如黑暗中一道闪光，我眼前为之一亮。

我在南昌仅待过一个多月，在九江整整四年；此后我到过武汉、郑州、西安等大城市，又在兰州上学一年。虽然谈不上见多识广，毕竟也见过一点世面。然而无论在我的中学、大学同学中，还是在

城市的车站、码头偶尔一见的人群里，她的美貌真是无与伦比。

她的名字我姑且隐去，当年的少女才十六岁，比我小三岁，低四届，我们早认得的。她的父母在县城一家百货店工作，家境殷实。在我之前的印象中，她原是个不起眼的小姑娘；两年不见，竟出脱得如花似玉，光彩照人。看上去，她比电影明星白杨或者秦怡更为清纯，又更年轻。

虽然为少女的美貌所震惊，我瞟过一眼便还是低下头来，继续看书。可心里不禁惊叹：这等偏僻小县，也有如此丽人。还没有回过神来，她大方地开口和我打招呼：“你看书呢，好专心咯！”

“嗯，唔。”我感到突然，有些结巴地应道。

工会图书馆有一间藏书室、一间阅报室，外边是个乒乓球室，这里是县城唯一的文化场所。室内人不少，眼睛多，到处是熟人。我放下书，随着她走出图书馆来到街上。路灯半明半暗，影影绰绰。她的话多起来，居然还是关于我的“故事”。

这些“故事”令我吃惊和惶恐，而且多半不真实，都是些加油添醋的传言，把我读小学和初中的经历夸大了。所谓出色、冒尖之类，实际情况不及“故事”的十分之一。我不是过目不忘的“神童”，更非样样得第一的超人。成绩稍好，那是“逼”出来的，不拿第一意味着不再有上学的机会。我的音乐、美术等科目成绩几乎一直处在倒数位置。至于说我小时候打架不怕死，那也是逼的。人若欺侮我，自然要抗争嘛。

街灯朦胧，不时遇到熟人。她把我领向洛阳纸店背面的后街，那儿正对着中山公园的入口，离她家和我家都不甚远。道路僻静，几乎不见行人。我俩走走停停，叽叽咕咕，时而话题轻松，时而又聊些严肃的事儿。她笑声轻盈，时光飞快流走。到了该分手的时候，她忽然问我：“你在大学有女朋友吗？”

“有过比较接近的，那已是过去的历史了。”

“为什么？”

“你还太年轻，容我以后告诉你，好吗？”

她有些怏怏不悦。初次见面，还能对她说什么呢。

第二天下午，约四点钟光景，我正坐在竹床上读书，她突然飘进屋来，像只小鸟。我正期盼着她，并且猜她一定会来；简陋破旧的小屋顿时明亮起来。她是令我怦然心动的姑娘，昨晚见她一面，我久久不能入睡。以前我从不失眠，沉睡如泥，可昨夜辗转反侧，陷入无尽的遐思妄想中。

堂前只一张方桌、一张竹床，两条长凳。她坐在竹床的另一端，背对着街口。那张饭桌，弟弟只要做功课，我平时都留给他用，只有他出门玩耍我才去用。弟弟见有客人来，早溜了。继母端来一杯茶，她连忙起身道谢说：“伯母，我是来请教问题的，不麻烦您老人家，您忙您的吧。”

我拿不出任何东西来招待她，心里有些过意不去。她反过来安慰我道：“今天我终于发现一个秘密，懂得一个道理：家庭困难也许不是坏事。有钱人家的子女整天想吃盼穿，读书哪能像你这样专心哩。”这话不像出自十六岁的女孩之口，令我感动。我原担心她会嫌贫爱富，到我家一看，立马逃之夭夭。而她安静地坐在竹床上，没有立即离开的样子。显然，她是个有主见的姑娘。她又说：“我只是过来坐坐，希望不影响你。你继续看书吧，就像我没来的时候一样，好吗？”

我脸上发热，又没有什么话好回答，只得点点头照她说的做。她一坐便是两个小时，我看我的书。此后竟然天天如此，从不间断。

有一天她临走时问我：“你晚上还看书吗？”我摇摇头答道：“晚上不看书，早睡早起。这样既节约电费，又不影响家人休息。”

“如果你不反对，我们晚饭后出去散散步好吗？”

这正是我所期望的，只因害怕遭到她的拒绝没先开口。在家里，尽管继母有意回避，难免也要进进出出，在眼前晃来晃去。不过我建议她，在我们一块散步时，能带上她的那个五六岁的小弟弟。

“为什么？”她有些迷惑。

“以后我再向你解释我的理由，好吗？”

夏天奇热，无论富人穷人、大人小孩，天天都要洗澡换衣服。这天，她穿着一件白色上衣和一条粉红的裙子翩翩而至，犹如一朵

出水芙蓉绽放在我眼前。她的另一只手牵着她的弟弟，

沿人少的后街边聊边走，我们来到中山公园。公园操场四周，古树参天，葳葳葱葱，行人绝迹。我们坐在一棵古松下，她弟弟在跟前蹦蹦跳跳，很快累了，就停歇下来，趴在她的膝头。繁星点点，月上中天，只有小虫儿低音奏鸣，伴和我俩的窃窃私语。

痛苦的日子度日如年，欢乐的时光转瞬即逝。一个月的暑假眨眼而过。

我告诉了她我的一切，悲苦的家事、辛酸的童年。我坦陈被划右派的经过，也推测了可能发生的种种情况。我说我的毛病不少，个性倔犟，邈邈，轻信他人……就连小时候尿床的毛病也说了。从看见她的第一眼起我就喜欢她，对所爱之人，没有理由隐瞒任何事。她有好几个同学是我小学、中学同班同学的弟妹，对我的事听说颇多。显然，邂逅并非偶然。当着她的面，我不愿用任何言辞赞美她的美丽，我不想她误会为我有意恭维。我对她解释了为何建议她带上小弟一起散步，我敞开心扉说：我怕，怕控制不了自己的感情，对你做出非礼之事。

人性有时很脆弱，光靠理性很难驾驭。我向她诉说了在火车上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以证明要战胜诱惑是何等的困难。这惹出了她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我问：“你在耻笑我吗？”

“不，一点都不，你诚实，值得信赖。看来，那位东北姑娘是真的很喜欢你。人家又是中专生，条件比我强，你为什么拒绝人家的美意呢？”

我知道她在试探我，只能坦诚相告。

“我不愿拿你同任何人相比，我相信自己的直觉。你是见一面令我心颤心酥、心动加速的姑娘，而且至今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她听了嫣然一笑：“如果光有一副空皮囊也值得你如此钟情？”

我后悔没有一股脑说出对她的全部印象，立即补充道：“我的直觉告诉我，你的内心和外貌一样美丽纯真。”

我俩的关系发展得惊人得快。她向我表示，不论我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她都愿以身相许，终生相伴。

我们的行为很缜密，却无法瞒过继母，弟弟对此也有猜测。她每次到我家来，故意选在父亲上班做工的时候，但父亲也还是觉察到了。到我即将离家赴校前，父亲突然地对我说道：你的婚事完全由你自己做主决定。但父亲要给你提个醒：“女人太漂亮了，不一定是好事。富家女儿娇生惯养，吃不得苦的居多。你又有事在身，前途未卜，你要慎思。”我未置一辞，心里答道：“我意已决，除非她负我，我决不负她。”我知道继母向他做了通报，她是很有心计很敏感的女人。

少女执意要送行，她不用担心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她说那反而能使她摆脱众多男孩的纠缠。但这个理由没能说服我，我还是谢绝了。我想到的是，过早公开我俩的关系，会影响她今后的生活和在校学习。况且，我有紧箍在身，命运凶险，消息迟早会传到这个小山城来；我不忍心她受株连。

行前，我们晚上依旧到公园幽会；这日她破例没带她弟弟。在那棵古松下，我拥吻了她，轻轻地又极其热烈地。她的胴体柔似水、软似风，我不敢把她搂抱得太紧，怕把她搂疼了，搂化了。

汽车驶过东门港的小桥，我突然发现她站在桥头上，向我挥手。我看到她在嘤嘤啜泣，脸上挂着泪花。

我怅然若失，那年，我十九岁。

注释：

1. 《红染缸》是我们年级办的壁报，另一编委叫杨萌霞，她与我不在同一小班，刊物名称是她提的。因为功课紧张，壁报只出了两三期便名存实亡。

第二章 右派学生的酷暑寒冬

一、住在“棺材”里的人

暑假，当我在爱河里徜徉、在书本中畅游时，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召开了一系列重大会议，反右运动布置就绪。原以为暑假前的批斗已够味，把人冤枉得五内俱焚，没想到“老鼠叨木锨，大头在后边”。

此时，毛泽东把六利六不利的政治标准加进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要有利于加强共产党的领导；有利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国际共运的团结……凡“六利”即谓香花，“六不利”则为毒草。我对此甚觉迷惑，毛主席号召知识分子帮党整风时，可没有“六利六不利”之说。显然，任何缺点、错误不能说，说不得。如果此话在前，傻瓜也会缄口，再灌甜汤也不喝，还提什么意见呢？

“右派分子”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阶级敌人。既然是反击阶级敌人的猖狂进攻，那反右则是真理和正义全操手中了。列宁有一句名言：“对敌人的宽容，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话已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我这个“阶级敌人”此后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8月底回校，化学系和物理系全部搬至新校址。男生住拐角楼，女生住一字楼；二年级住二楼，每间八人，仍是上下铺。

9月初，刘海声一声令下，党、团组织和积极分子全部动员起来。不到一天时间，新校所有楼道墙壁上都贴满了反右的大字报，还有各种漫画、讽刺诗、标语。

我从化学楼回到宿舍，这里也是“焕然一新”。我住的房门两

侧贴着一副白纸对联：

摇唇鼓舌 句句恶语如毒箭 堪为右派马前卒
泼墨弄笔 篇篇黑文似枪弹 实乃反党急先锋

正中门楣上就是我的姓名，三个斗大的字。

房间里的“打扮”别出心裁：我的床四周，靠墙的一面贴着各种标语、口号；其他三面用绳子拦住，绳上挂满条幅。在我头部位置，条幅上写着“彻底砸烂右派分子向承鉴的狗头！”反右委员路宝田与我同室邻床，他凶狠地对我说：“这些条幅、标语，不得损毁。否则，后果自负！”

这栋楼的一楼住的是一年级新生，只有他们是反右后入学的。从二楼到四楼，隔一间房便有一个如我住室相似的装扮，只是对联各有千秋。其他右派的床帷是否和我一样，我不得而知。整个拐角楼像座墓地，宿舍就像灵堂。每晚上床睡觉，我只能掀开这些白纸幡帐钻进去。我感觉就像睡在棺材里，自己成了一具活尸。

白天照常上课，晚上在文科楼开右派批斗会。各个教室都在揪斗右派，口号声此起彼伏。我是学校最年轻的右派之一，也是“气焰最嚣张”的一个；因为我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

批斗会场的布置也成定规：讲台正面坐着三位反右委员，他们铁黑着脸，威风凛凛。在他们对面是我、吕佩璜和冯淑筠，我们身后和两边是同学们。暑假前鲁丕杰（甘肃临洮人）也划右了，现在得到解脱，我真为他高兴。不管怎样，少划一个总比多划一个好。思想开了小差，直到反右委员吼叫着要我站起来，我才回过神。我们这个小班有三个右派，据说以我为首。批斗时，火力集中在我身上，吕君和冯君是陪衬。我的情况不属于“交代不彻底”，更非“检讨不深刻”；而是根本不接受“三反”桂冠。左派视我为“反动堡垒”，一个个揜拳捋袖，发誓要攻坚克难。这些人不会放弃表忠心的机会，有的人还指望“火线入党”呢。我越顽固，引起的民愤就越大；口号升级变成呐喊，震耳欲聋。外系、外年级的同学也受到

吸引，教室和走廊挤满了围观的人，以至于有的班级批斗会陷于停顿或冷场。同班姑娘 G，对党的感情深厚，对我尤其愤恨。只见她满脸红紫，因个子矮，竟是跳起来痛斥我，唾沫星子也溅到了我脸上。陕西籍同学薛洪福说：“不信把你这老牛头炖不烂，只多花几斤木炭！”我心里倍觉滑稽，谁是老牛头？我才十九岁啊。

刚入学时，G 对我很热情。她爱跳舞，学校每周六晚办舞会，她邀我去做舞伴。我对跳舞不会不爱，她硬要教我，我推脱了。她蛮有韧性，有时在周六晚饭时刻，大庭广众之下也大嗓门指着我说：“这位，我晚上请他跳舞！”我感到不悦，宁肯不在学校吃晚饭，也要早早逃逸。“五一”会演要我出角色，她是推荐最力、最坚决的一个。

G 有足够的理由恨我，即使唾我一脸，也是受之无愧的。

到了下午课外活动时间，我们几位右派同学被分派去干活，打扫厕所，擦拭门窗玻璃和楼梯扶手。我们被剥夺了一切行动自由，包括体育锻炼的权利。

仅过了三五天，我的问题突然升级了。饭厅外贴出一张硕大的漫画，走近一看才知画的是我。这张漫画使我这乳臭未干的小卒子，一跃而成臭名远播的大右派。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幅画是兰大反右期间的画王。一是大，画幅比我本人还高。二是挂的地点显眼，它就挂在平时放映露天电影的银幕之处。画面对着小操场，无人不见。不仅如此，而且画中的人物形象狰狞，两边的楹联更是抛出一个接一个的政治帽子，足能吓死胆小者。作者把我画成一副骷髅似的，尖嘴猴腮，奇丑无比。头上又戴了缀有德国纳粹党徽的钢盔，脚踏马靴过膝，腰佩长剑及地，眼吐凶焰，一颗黑心长在胸腔右边。两边对联的上联是：法西斯匪徒；下联是：希特勒走卒。漫画空档处全文公布了暑假期间我写给哥姐的信，正是前面我提到过，请 M 同学转交团组织的。

这封信本是一封家书，仅仅是倾诉自己的冤情。莫说我没有任何反动思想，即使有，会将内容反动的信件请人交给团组织吗？所谓政治运动，原来竟是以此来制造出轰动效应。我对某领导干部逼

死人命说了一句气愤的话——这种人该杀，就被夸大歪曲成我要杀共产党，要杀光所有共产党员！只要能“宣传群众”，“鼓动群众”，便达到预期目的，哪管这是真是假。即使把你冤枉得死去活来，七窍流血，仍然是干板上钉钉，不容翻案。我的家书如何能与法西斯、希特勒连得上？可是对于搞运动的人，难道还需要和你商量吗？

我的信成了又一次向党进攻和疯狂反扑的“铁证”。据说，信中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该书有一著名论断：“我们共产党人是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论者”。如今，我有反党的事实和效果，却没有反党动机，鬼才信呢。这不是与毛的思想唱对台戏是什么？可是同一个人又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的恨从何而来？我的“反动意识”何由产生？

嘴是扁的，舌头是软的，有的人怎么说都有理；那本经想怎么念就怎样念。到了我这儿，怎么念都不行，都成了“狡辩”“反攻”“反动”。

我被迫沉默，心里却不服。在震天价的吼声中，我只看到眼前一张张涨红的面孔，完全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我的灵魂出窍，在脑海里神游；所有的思绪都在反驳所谓“动机与效果”统一论。历朝历代皇帝佬儿的主观动机都是万寿无疆，到头来无一活过百岁；早夭的帝王是自己主动找死不成？毛岸英从苏联回国，毛主席要他学农学工，又到朝鲜战场学军，盼他成才接班，不想却死在异国。这效果与毛的动机如何统一？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捐躯刑场，他们不想看到革命胜利？资本家办厂也有失败、赔得精光的，这结果是他们的初衷？若人们都能“效果与动机”统一，共产党闹革命又何须二十八年浴血奋斗？我随手可举出一万个“动机与效果”不能统一的例证……

在所有检举中，只有两点有些事实根据，其余全是捏造的谎言。说我把党员分为三类，并“三三”开：三分之一的党员靠党混饭吃，

三分之一的党员靠党整人、害人；三分之一为人民服务。虽有夸大，与我原话的意思总算沾着边儿。另一件事是，我任《红染缸》编委时，又搞了个副刊，叫《НОВЫЙ САД》（俄文：新花园）。我们用块小黑板将《诗刊》等文艺刊物上有品位的作品介绍给同学们，其中就有四川诗人流沙河的作品《胆剑篇》。这还是1956年底或1957年“五一”前的事；而不是在鸣放期间。

结果，流沙河被划了右派，我曾经推荐过他的作品，便成了臭味相投、居心恶毒。据批判者说，流沙河诗中把白杨比喻作指向蓝天的长剑，锋芒所向是共产党！

我的态度不谦恭，不该我承担的，坚决抵回去。我答道：“所有报刊是党在领导，任何文章发表前先经党委审查通过。《诗刊》是党审批在全国发行的一级文艺刊物。抄录转载其中的作品，何错之有？就算有错，也不是我的错。那些审稿的人是干什么吃的，难道个个瞎了眼！”

与我的漫画像几乎同时贴出的，还有中文系二年级女生谭蝉雪有关“爱情自私论”的日记摘抄。谭蝉雪被左派钦定为“兰大的林希翎”，可谓“臭名昭著”。抄她日记的大字报有好多张，贴在拐角楼边门的上方。由于所有墙壁都已贴满，只好从边门到饭厅正门再拉上绳子。我大致浏览了一下批判家的观点，只能嗤之以鼻。

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通信自由，怎么可以搜查并公布别人的日记？爱情倘若不是自私的，难道要将自己心爱之人拱手相让、无私奉献？“爱情自私论”与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有何关系？如果爱情都大公无私，岂不是真的要“共产共妻”吗？

阶级斗争原来如此啊，为了打倒和消灭“阶级敌人”，是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直到你身败名裂，成一堆臭狗粪。

二、“疲劳战”

白纸黑字，我的家信内容是“秃子头上的虱子”，谁都能看清楚。尽管组织批判的人一再加大马力，穷追猛打，也难从鸡蛋里挑

出骨头。于是，暂时偃旗息鼓了一阵子。不几日，又有我“反党”的新罪证被“揭发”出来，左派同学如获至宝。

据说，我曾精心策划组织了一个三人反党小集团，凡三次在泉水沟秘密开会。每次皆有时间、地点和内容，这些材料来自内部成员之一的“坦白交代”。呜呼，纵有三头六臂，浑身长嘴，也赖不掉。确实击中要害，叫我昏厥，欲哭无泪！

吕是个聪明绝顶的小伙，他和我同岁，可能比我还小月份。不到万般无奈，他绝不会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他承受不了高压，在“坦白从宽”的诱惑下，产生侥幸投机心理，也是人之常情。我对他有几分怨恨，更多的是同情。我更悲哀的是自己，为什么我想不出这种好法子来解脱自己呢？

对我的批斗终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一切火力集于我一人之身。以往批斗总是从晚上七八点开始，进行到十一点就结束。如今变了样，反右委员将全班同学分成几个小组，由以班为单位的大会，改在我宿舍中开小会。每个小组七八个人，每一组都轮番上阵。对我的狂轰滥炸日以继夜，接连几天几夜不叫我合眼。此曰车轮战，又叫疲劳战。先叫我站着交代，一站就是七八小时。待到马上要栽倒，才叫坐着写交代。我不知交代什么，写什么。我愿意交代我的任何罪行，但无法对上吕的“口供”。左派们对我的耳膜吼，推我的座椅，揉我的身体，擂我面前的书桌，没有分秒不停歇。即使我抖擞精神，尽最大意志去写交代，头脑已经不听使唤。笔尖刚要接触纸面，眼前一黑，笔尖重重戳在纸上。笔尖弯了，颈椎像是断了，头颅以自由落体的运动形式砸到桌面上。“嘭”的一声，我已无法写出最简单的“一”字来。

倘若可以自由选择死的方法，我首选枪毙或砍头；那只会几秒钟的痛苦。其次我会选被毒气毒杀，也不过半小时的苦痛。就算选林祥谦那种被一次又一次屠刀杀戮，也莫过于个把时辰而已。唯独这“疲劳战”断断选不得，因其令人痛苦的时间比前两种要长无数倍。历次政治运动中有那么多人自污，那么多名人大家上吊自刎，我终于知道缘由了。

此时的我，如同落进虎口的羔羊，这虎却不愿给我一个痛快。它将我噙在口中，戏弄我，要我活着，每天定时定量地撕扯我的肉体 and 灵魂，慢慢地消受我，还要叫我知道他们在细嚼慢咽地“品味”我。

他们就这样“炖”我这老牛头，不是几天几夜，是足足三个月！我经常失去知觉，坐在椅子上尿湿了裤子，浑身臊臭。路宝田继续作践我，他在文科楼北侧贴出大字报：“死硬极右分子向承鉴在宿舍里随处大小便，弄得全室臭气熏天，以此报复、毒害同学！”当即被我撕了。我无法承受这非人的折磨，只盼大限早点降临。

一个早晨，拂晓时刻，趁他们戒备松弛，我溜出拐角楼，出后门进入了兰大的家属院。我钻进一堆木头里，睡了个昏天黑地。我也不知在这里待了几天几夜，总之醒来时大约是午后两三点。没有丝毫犹疑，起身我径直去了兰州火车站对面的派出所，这是我早盘算好的。

派出所里一位满口兰州方言的中年汉子接待了我，我告诉他，我是兰大右派学生，因罪孽深重前来投案自首，请派出所收留我，或将我遣送至看守所、监狱。这位中年人问我是哪省人、多大岁数、兰大哪个系的，我悉数告诉了他。没想到他似乎成竹在胸，给我上了一堂政治课。他说：“你还是十八九的毛孩子，身在福中不知福。你们兰大是全国重点大学，化学系更是全国出名。你是赶上好时光了，人民花钱培养你，多不容易呀。你们不好好读书还要胡说八道，给你一个教训是应当的。不过你也不必想得太严重，谁又能保证自己不犯错误呢？年轻人血气方刚，不知厉害，难免说了过头话；只要虚心接受批评，认真改了就好了，就没事了。回去吧，别耽误了你的学业。”

数月来第一次听见有人说人话，心里有几分感动。转念一想，他对大学校园里反右的残酷性概然不知，这比起我的幼稚来也并不“成熟”到哪里去。

我已横下心来，宁愿去吃劳改饭；舍此无法摆脱“疲劳战”的折磨，非死在他们手中不可。因此，我反反复复请他收留我，跟他

“泡蘑菇”。他说道：“无单位向我们递交报批材料，无群众检举，又无上级指示，我如何能收留你！”一直泡到日沉西山，还是遭他断然拒绝。我无法可想，无处可去，只好先离开了派出所。

我想到了死，这念头已萌生一个月了；如今忽然离我很近很近。我伫立在兰州东车站台东端的岔道口，蒸汽机车不时从我旁边驶过。有的机头喘着粗气，喷出的蒸汽罩住我全身。此时，只要跨前一步，我立刻会粉身碎骨，成了一团肉泥。可是我又想到了那位物理系女生，她跳河而死，而逼她跳河的人仍然官运亨通，没有受到任何报应。如果不是大鸣大放，几乎没人知道这件事。还有，“思想改造”运动那些上吊自杀的人，死后还要背负“畏罪自杀”的恶名。倘若我死了，不过是兰大少了一个右派，多了一个畏罪自杀的人。这世道太不公，我不能死得不明不白。至少，我要写好遗书，告诉亲人我是清白无辜的，而不是“畏罪自杀”的。

回到学校，进了宿舍。路宝田朝我瞪着一双死鱼眼，他定定地审视我；我也朝他定定瞪着，眼光也不柔和，我俩谁都没说话。

利用上课时间，我快速地写了三封遗书和一封短笺。遗书一份给死去的母亲，一份给父亲，另一份给兄弟姐妹；短笺是写给××姑娘的。我把它们放在贴身内衣口袋里，像完成了一项壮举。这下好了，我可以随时奔赴黄泉，最爱的母亲在那儿等着我，我还怕谁？

三、孙自筠和冯淑筠

事后听说，在我失踪的时候，反右委员发动同学四处寻找。有人判断我已经葬身于黄河浊浪，谁料如今我又出现在他们面前。不知何故，对我的“疲劳战”停止下来，批判会如从前一样到晚十一点就结束了。但与此同时，路和同寝室的同學明显增强了对我和监视。只要我在床上有点动静，无论是翻身还是下床解手，总有人故意咳嗽一声，好像是发出暗示：我醒着呢，你可不要胡来！想不到，踩在脚底的一只蝼蚁，竟使有些人睡不安寝，“英雄”原不过是胆小鬼。批判会上，我拒绝检讨，也不回答任何问题。会后我不再写

任何材料，我豁出去了。

我并非冥顽不化，在整个“鸣放”期间，属于我的问题只有一个：同意教授治校。当时，我这小班没有一个同学不赞成这一观点，从大字报里看到党风不正，谁个不气愤？只是人们见风使舵，变色快而已。

我原以为凶神恶煞全叫我撞上了，很快就发现有人所受迫害可能更甚于我。

饭厅旁放映露天电影的场地平时是个排球场，有个主裁判坐的高凳。一天下午五点光景，我上完课路经此处，目睹一幕闹剧：中文系三年级一群人正在围剿一个右派学生。这同学我认得，他叫孙自筠，反右前还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调干生，人长得很漂亮。排球场并非开批斗会的地方，显而易见，他是逃出会场被大家穷追不舍而堵在这里的。一帮人将他团团围住，狂呼乱叫，有的人气势汹汹地抡胳膊，还有的人七嘴八舌地质问着。我见他急了，呼的一下跳到那只高凳上呼起口号来：“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再好的口号从右派嘴里出来也不行，那些批判的左派们说，他是在讥讽党和领袖，继续作恶放毒。还有人说他“打着红旗反红旗”，比其他右派更阴险！这帮人在高凳下疯狂地扯他的裤腿，拖他的脚，有人怒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

我无心看戏，自己原是悲剧主角，瞥了一眼，不知闹剧后来怎么收场的。过了几天，校园又传开消息，孙自筠半夜敲破伙房的玻璃，他钻进厨房拿菜刀把自己的舌头剁了一截！

听到孙自筠自残的消息，像有一股寒风穿透我的后背。我钦佩他的胆识，他找到了右派的错误根源。人没有舌头，就不能说话，那可该有多好。汉字的“狱”字造得出神入化，聪明人早得到启示，可惜我太愚钝，悟得迟了。

冯淑筠君我每天都能见到，在课堂上，在右派一起劳动时，在以班级为单位的斗争会上；但始终没有说话机会。一天午夜时分，我在盥洗室里间与他同时入厕，偶得相见。我有多少话想对他讲啊，不是串供，无供可串；我俩都心怀坦荡，光明磊落。我对他说：“我

已万劫不复，政治斗争需要敌人，我是铁定地要当作牺牲的。你不同，你不是鸣委，又没说过一句错话。你只是不愿与我划清界限招来株连。如果你还认我为朋友，就该接受我最后也是唯一的请求：不要为我殉葬！你是有妻小的人，你要为他们着想。请你立即向我开炮，现在还来得及。我已有‘杀光共产党’的恶名，再大的罪过也背得起。你就检举我要杀人放火，要炸党委，炸天安门城楼……我决不怨恨你。”

冯淑筠提着裤子，站在我面前，两眼直勾勾地盯住我：“你的一切要求我都尽量办到，唯这要求我绝对做不到。依年龄我可做你的兄长，我已是孩子的父亲，我懂得怎样做人。我了解你的身世、为人，也知道事情的全过程。要我向你的心脏再楔进一把刀子，这种出卖良心的事，宁肯死我也不会干！”急得我一下跪在他面前，抱住他的双腿。我苦苦哀求他，他断然回绝了我。

冯君淑筠，河北省南宫农村人，中等个，年龄大我四五岁，说一口河北方言。大家平时相处都不错，冯对我更亲切，就像我是他的亲弟一样。

记得是1956年冬天，学校组织同学赴兰州炼油厂参观。据说兰州将成为全国化学化工中心，目前正在兴建全国规模最大的炼油厂。待埋到地下的管道直径有两米粗，人能昂首从中穿行。那天飘着雪花，地上积雪很厚；晚上回来时我的棉鞋都湿透了，只好放在宿舍的火炉上烤。天亮时我才发现，一只棉鞋已经烧掉了半拉。冯君硬把他的棉鞋拿来让我穿，自己却穿着单鞋。

饭厅门前与宿舍间有块冰场，面积不过二十平米。每见北方同学滑冰，那么痛快尽兴，我好生羡慕，恨不得立马学会。在冰场上，有时连晚饭都顾不上吃，一直练到天墨黑。前后两三个小时，我不知多少次人仰马翻，后脑勺、屁股、手掌摔得生痛，全跌肿了，冯君一直在一旁相伴相守，直到我基本学会。星期天我还要去黄河边找大场子滑练，把瘾过足；又是冯君陪我，如保护神一般。河边冰薄，还来不及下场，一只脚踏进冰窟窿中。也幸亏冯君赶来相救，帮我把腿拔出来。棉裤腿精湿，他又帮我烤棉裤，忙了大半天。上

大课占座位，领讲义，事事他都想着我。

这一次，他因我而落难，却还反过来安慰我说：

“谁忠谁奸，谁善谁恶，终有一天会真相大白。你一定要熬过这一劫。”

熬，终究要熬的，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轻生！可是，熬过精神的荼毒，还有物质生活的折磨等我承受。

两荤一素一汤的日子勉强过了一年，新学年伊始，各人根据自己条件到膳食科买主食和副食票。要命的是，右派学生一律被取消了助学金。人民的血汗钱岂能用来喂养“反人民”的“狼崽”！我记不清具体时间，这大约是在1957年10月，失去助学金，我的生活立即面临了巨大的困难。

其时，我姐、姐夫、我哥都在北京工作；我若向他（她）们求救，或许能得到资助。但我不愿把这一情况告诉父亲和哥哥，我怕增加他们的痛苦，更担心他们受到我的株连。倘若他们来帮助我这样一个阶级敌人，以后追究起来，纵是有千张嘴也说不清楚。我的罪过，只能自己消受。

饭厅有两层，底层是学生就餐的场所，二楼是留给教师的。开饭时，学生排队打饭，拥挤不堪。为方便教师，底层除正门外还在后边留有一个小门，教师可以通过那个楼梯间可直达二楼。楼梯间与学生饭厅连通，约十平方米大小。学生分了“派”，饭厅自然分“等”；这小楼梯间成了右派学生的专用餐厅。开饭时，右派们不约而同地端着盆碗蹲踞在此，一个挨一个。大家互相看看，吃的都差不多，只有主食，无钱买菜。所幸的是，学生饭厅备有调味品，辣子酱、酱油和醋各自装在带木盖的小瓮中，可供免费取用。吃米饭就泼一勺酱油再加点辣酱，味道倒也不错。若吃馒头，将馒头掰开，内中夹着辣酱，也算可口。

大饭厅人头攒动，熙熙攘攘。那儿有饭桌，有椅凳，一些人吃得油头油嘴，笑得骄横得意。大饭厅与楼梯间近在咫尺，有如两个世界。小小楼梯间拥挤着数十右派，无论认识或不认识，谁都是各吃各的，不打招呼。右派分化得很厉害，出于生存本能，有人特别

关注其他右派的一言一行，然后去打小报告，立功自赎。人人都有教训，各自谨言慎行，心照不宣。

不过，时间一长，我还是在这里认识了许多原先不知姓名的右派同学。其中，有兰大赴京代表团的副团长肖藩、成员之一屈健英以及谢成、李克家等外系同学。我也认识了同系化三的胡学忠、史凌霄、同级不同小班的吕绥生、邓德银、翟所迪等等。

右派饭厅唯一的一位女性来自物理系，她大约与我同届，个儿不高，戴副深度近视眼镜。她与右派男生一起用餐几个月时间，没有说过一句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家，他一米九的大块头，物理系二年级，原是校篮球队主力中锋。在球场上他左冲右突，骁勇非常，全校都认得他。他的饭量了得，每顿吃八个馒头，是我的一倍。馒头中夹的辣酱很多，从里面流出来。他动作极快，四五口就消灭一个馒头，嘴上、腮帮子上都沾上了红红的辣酱，头上沁出热汗。这种狼吞虎咽的“香”吃，再无食欲的人见了也会生出吃的激情。

将近一学期的时光，我没有沾过荤腥，连五分钱一份的土豆丝也没买过。营养严重缺乏，精神压力巨大，加上极度的睡眠不足；身体早已不堪重负。我终日头晕眼花，还有耳鸣，好像有轰炸机在耳畔起落不休，连视力也在退化，眼前常常是混沌模糊。尽管如此，我仍坚持上课，竭尽生命余力。很多右派上课时都坐在后面座位，我顾不得这些，偏要抢占前排座位。非如此，我看不见黑板上写的字，听不见老师的声音。课毕，拖着沉重的身体，我步履蹒跚地踱回宿舍。一路上，我得十分留神，以防被碰倒甚至被风刮倒。我的身子如同风筝，随时有断线扑地的可能。

我终于奇迹般地熬过了1957年这个旷世不经的寒冬。

四、世上没有救世主

寒假到了，学校停了课。我没有回家，此时对我来说，最迫切的问题莫过于填饱肚子。那些日子我几乎断顿，连买主食票的钱也

没有。我每顿只吃一个馒头，幸好再无批斗纠缠。

兰州大学的对面是一只船街，这里有兰州第三十三中学（又名兰大附中）。我去那儿挨家挨户出售自己，终于找到两家雇主，我有了一男一女两个初三学生。我给他俩补数、理、化，每周各三个下午。我的条件不高，只要管饭就行。家长对我满意，他们夸我细心，有耐心，讲得透彻明白。如此，我不但混饱了肚子，还额外得到了补课费。其余时间我用来复习功课，以弥补被耽误了的学业。说来奇怪，半年的批斗熬煎，并未使我的思维紊乱麻木；相反，我的自学能力大有长进。我学会了逆向思维，考虑问题成熟了许多。在学生家中我受到两家人的礼遇，感觉自己由野兽的世界又回到人类社会，有了人的尊严。原来皮包骨的身体也得到一定的康复，寒假我过得充实惬意。

新学期开始，反右已是强弩之末。校园里虽时有咆哮之声，也是稀稀拉拉，不过是胜利者打扫战场的余威。大多数右派的罪行已尘埃落定，等候发落。反右运动开始向纵深发展，矛头开始指向中右分子、中间分子，要他们向党交心，检讨在鸣放和反右中的态度立场，交代与右派的关系。如我所料，M君成了“双反”的重点，受到严重冲击。尽管此时的批判比当初批斗我们时温和得多，日子也不好过。她是个纯真坦诚的人，看到她的处境，我的心隐隐作痛，也有几分歉疚。值得欣慰的是，因为我当初断然拒绝她的态度，她不至于因为我而蒙受更多羞辱。

有天下午，化二右派都在接受惩罚性劳动：给化学楼打扫厕所。小六班有个右派，生着酒糟鼻，红红的，不论春夏秋冬，鼻翼上都冒汗。史美唐走近我悄声说：“他是一条狗！”此前我一直迷惑，右派同学一起劳动，谁个积极、消极，谁个发牢骚抱屈，都遭批斗。这“包打听”谁干的？

我学乖了，恨不得像孙自筠那样割掉舌头变哑巴。其他人很快也心知肚明，人见人躲。虽然他善于伪装，狗没过多久就成了狗屎。

(1)

取消助学金后，生活陷于困境的右派同学大有人在。个别人甚

至动起歪点子，有偷别人饭票的，有偷自行车卖的，此后相继被侦破，遭到严厉惩处。如被逮捕判刑，少则两三年，多则五年以上。这条路我是不会走的，化三的胡学忠、冯淑筠和我不谋而合。我们商量后决定，星期天到建筑工地打短工自救。

与家属院隔条马路的和平饭店，此时正在施工中。工地头头见我们三人都是年轻小伙，满口答应。

工长分配的任务是给泥瓦匠师傅挑运砂浆，每人要供应两位师傅。冯君原本就单薄瘦弱，泥菩萨过河一样，用尽浑身解数，勉强能应付着完成任务。我在三人中年龄最轻，体质更弱，虽说寒假期间得到了喘息之机，仍然如大病未愈者。和平饭店已盖到三层，我挑着两铁桶砂浆走在竹排搭的梯子上，颤颤悠悠，晃晃荡荡，十分吃力。甭看两小铁桶砂浆不起眼，分量足有六七十公斤重。砂浆距施工楼不足百米，挑着它爬楼实非易事。起初两趟，我鼓足劲一口气挑上去，累得眼冒金星，腿肚子发软打颤。我很担心虚脱了从梯子上滚下去，只得中途小歇一下，然后再挑上去。砂浆很快告罄，师傅叫喊着要料。我每趟都得拼尽全力，凭着意志坚持下去。幸亏这时胡学忠不请自来，他不要扁担，一手拎了一桶急急追上来，帮我救火。

我与胡学忠此前素无来往，从此对他有了认识。无论年龄、学识、做人，他都堪为我的学兄和楷模。他祖籍四川，当时偕母亲住在武汉。胡兄中等个头，肩宽体壮，圆脸、浓眉、大嘴；上唇一络整齐短髭，隐约有络腮胡，性格又豪爽，他是兰大不多几个拳击运动员之一，生就一副铁骨钢筋。他性格豁达乐观，我几乎看不到反右斗争给他精神和肉体留下的创伤。他挑两小桶砂浆如同游戏一般，嘴里还常哼着四川小调。每隔一段时间，他就帮补我两桶；上午下午各有三四次。

胡兄这样帮我，完全是主动和无私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他的“应该”。右派中不乏这种热心肠的人，冯淑筠也是这种，他若有能力，不待我开口也会出手。但这反而增加了我的愧疚，就我的本性来说，总希望能够帮助别人，不愿当弱者接受帮助。我后来又改

为减少重量而尽力缩短中途停歇的时间，只挑两个大半桶，结果和挑满桶的效率也差不多。科学证明有多少体能做多少功，增加体能需要锻炼和积累。我唯一能做到的就是早上和中午提前上班，在师傅未开工前把泥斗挑满，尽量不给胡兄增加负担。后来体力有所增长，但同时楼层也在加高，劳动强度越来越大。长达一个多月的周日打工期间，我始终没能做到自食其力，直到最后也还需要胡兄帮我一两趟。

和平饭店主体工程竣工后，我们三人又承包了整幢楼的清垃圾任务。各楼层、房间的垃圾并不多，无非断砖、木屑、砂浆渣之类。但这活计比预期的要困难，主要是水泥砂浆渣粘连在墙上、水泥地板上，很难剥离。胡兄建议分工，由冯兄先用铁锨将易清除之物从窗户扔出去；那些粘连的砂浆块由他来对付。我则负责最后的清扫。胡兄不知从何处借来一把钢钎，它一头尖一头弯曲扁平，既可当钢钎又可当撬杠用。粘连甚牢的水泥块，无论大小，一碰即脱，事半功倍。这一天，我们三人只穿了条裤衩，戴个大口罩，从早干到天摸黑，足足干了十三小时。整幢楼到处尘土飞扬，到处噼里啪啦。我们中午只啃了几个冷馍，汗水干了再湿，湿了再干，都成了非洲黑人。当我们请工长来检查验收时，他大吃一惊：“想不到你们动作这么快！这么大的工作量，通常三个工人干三天才能完成。”

洗了澡，我们直奔当时兰州最好的餐馆悦宾楼，要了好几道菜，美餐了一顿，简直解了一年的老馋。天道酬勤，我们终有所获。

在这段时光里，我们不曾说过一句与政治相关的话，也不曾有一字提到鸣放与划右，各人铭记教训，心中有数。回校路上，胡兄突然说：“我大约在校时间不长了。对我们的处理，依我估计很快会下达。但愿你们能留校继续完成学业，我祝你俩好运。”

表面看来胡兄无忧无虑，谁知他内心的凄苦呢。

我能遇到胡学忠君，幸甚，对“患难之中见真情”这句话有了更深的体味。

五、万壑千山有穷时

1958年3月，我系一位右派老师被捕，他就是张我权先生。张我权原为化学系秘书，是系主任左宗杞先生在教学和科研上的得力助手。他被捕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他是兰大第一个按政治罪名被法办的右派。

抓捕他的时候，我正在化学楼边门侧旁的实验室做实验。忽然门外开来一辆中型军用吉普，车上跳下四五个军人，急匆匆朝楼上奔去。只过一会儿，这几个人就夹着一个用白布单蒙住全身的人下楼来。军人将此人塞进车里，车一溜烟开走了。

我心里嘀咕：抓的何人？因何事？做完实验出来，我发现满校园都张贴着标语：

坚决镇压现行反革命分子！

拥护人民政府逮捕现行反革命张我权！

提高警惕，严厉打击一切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人民的红色江山万岁！

校园里一片肃杀气氛，似乎刚沉寂没几天的日子又要开始翻江倒海。人说鸡蛋里挑骨头，而根据自己的经验，现在何须去挑，可以直接指斥说鸡蛋原本就是骨头。我也得有精神准备，横祸随时会从天而降。

我印象很深的还有中文系学生肖藩被捕，那是在1957年12月。肖藩自1957年秋始，因无钱买书，成了新华书店的无钱买主。与他有类似行为的还有中文系的李××，肖与李先后遭公安局逮捕。此时我与肖藩颇熟，他在被捕前已得知情况，先写好了家书托我寄给他的亲人。我照办了。他被抓走后，学校在饭厅二楼举办了“肖藩罪行展览”。他从新华书店拿出的书果然不少，大概有好几十本，多是中外文学名著。虽然我羞于此举，但毕竟情有可原；何况是书，古人有“读书人偷书不算偷”之说，如今不敢有此奢望，唯愿政府

手下留情，对他从轻发落

没过几天，学生李××也被抓了；校方也同样办了个展览。偷饭票的、偷自行车的右派学生都被逮捕了。

但凡右派，只要牵扯到一点儿刑事罪的，通通逮捕法办。听说肖藩被判了十年有期徒刑，政府对这类人是新账老账一起算。

1958年5月间，对右派进行处理提到党委的议事日程。党的政策是这样：右派问题属于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处理方法是先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

我们班首先讨论了对我的处理，除了本班同学外，小六班的沈凤嘉（注）应邀出席。沈是调干生、中共党员，也是党支部成员。他是代表党的一级组织与会的。

反右委员路宝田首先宣读了关于我的右派问题的最后结论，然后他说征询我的意见，要我在结论上签字。

我终于等到了这一天，允许我开口说话了，多么不容易啊。我想到，不管如何处理，我必须澄清事实，对自己负责，这是我早盘算好了的。我感到奇怪的是，结论中只字未提什么我在泉水沟组织了三次反党会的事，也没提什么反党小集团。所谓我“要杀共产党、把共产党杀光”的事只字未提，更没有说我是什么“法西斯匪徒、希特勒走卒”和那封信的内容。因为这些，我被折磨得痛不欲生，到头来全属虚妄。如今竟要不了了之，天下有这道理？

“我不能签字！”我回答。

“为什么？这些问题都是你以前交代了、承认了的，为何不签字？”

“这很简单。都是你们逼的，不是我思想里原有的东西。你们中任何人，在相同的高压下都会和我一样，叫你交代什么，都会乖乖地交代。”

“教授治校难道不是你同意的观点？”

“教授治校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没这水平。我同意教授治校，但并没有反对或不要党的领导。鸣放中，请问你们哪一个站出来表示过不同意教授治校的观点？没有，一个都没有。我又何错之有？”

我的话很不策略，打击面太广。我顾不得这些，不吐不快。我的话使所有左派都有了右派之嫌，反右委员面面相觑，一些人忙不迭洗刷自己，痛斥我顽固不化，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会场一下炸了锅。

“你把班上同学分成小组拟制访问计划，写了访问录，是不是事实？”

“当鸣委是你们选的，为什么要选我？问你们自己。党委再三再四号召鸣放，提意见的人何错之有？意见不正确，你不接受拉倒，谁也无权强迫党接受。搜集、整理意见，也没有加油添醋，错在何处？”

“你赞赏大右派流沙河的《胆剑篇》，在同学中大肆宣扬，该当何罪？”

“这更不是政治问题，我看不出也嗅不到那里面的白杨——长剑是指向党的。如果有罪，罪也在《诗刊》主编、审稿者身上，待你们把审稿的、发行的全抓了，再来追究我不迟。”

路宝田对我虎视眈眈，眼镜片后露出狰狞的凶光，咄咄逼人道：“这么说来，在整个鸣放中，你的全部言行都是正确的，你洁白无瑕，完美无缺。反右运动把你冤枉了，我们全搞错了？”

没想到他还有脸说话！

“是的。我不敢说自己完美无缺。但我没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丝毫没有这种意念。”

会已无法继续下去，路宝田宣布：“现在请同学们发表处理意见。”

发言者有说我继续“放毒”的，有说我攻击反右运动，全盘否定党的反右政策的；有的说我是“毒蛇”，是“十恶不赦”的……总之，我的冥顽态度已经够处极刑——划为极右分子，开除学籍，劳动教养。

沈凤嘉此前一言不发，只是默默地审视着我。直到大家要求给我最重一级处分后，他才代表党支部作了总结性表态。与其说是表态，不如说是威胁；时隔近半个世纪，言犹在耳。

他说：“你是个死硬分子，我们知道你此时在想什么。你抵触、不满、怨恨，对每个批斗过你的人，对党、对政府，你怀恨在心。有什么法子呢？这是人民的江山，是铁浇铜铸的。你胆敢碰它，必将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他的话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当他要我在处理意见一栏签字时，我毫不理睬，昂首挺胸跨出了教室。

“开除学籍”的意见通过了，我虽有思想准备，仍然是痛彻心扉。听说最后处理决定将由学校裁定，思谋再三，第二天一早我就跑到校长办公室，求见林迪生校长。

一位女干部接待了我，她询问了我一些情况，有意劝阻我。在我的执意坚持下，她还是去请示了林校长，并得到允许。

林校长坐在沙发上，手支着头，似乎正在沉思某个问题。见我进来，他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我坐在那儿。我有大半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气色很差，面容憔悴。我听说比他级别低得多的刘海声正纠集一伙人向他发难，批判他思想右倾，反右不力。在这种时候我来找他，的确会授人以柄，使他为难。

但我没办法，我已经被逼到了悬崖上；不得不求助于我信得过的老校长。林校长问了我的姓名、系别和年级；他做了记录便不再吭声。我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家史，坦陈在大鸣大放中的言行以及被划右派的由来；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这中间因为情绪激动，难免有过激之词和“放肆”的时候。林校长微闭双眼，一直认真地听着。他不曾插话打断我，也没有推脱敷衍的意思。直到我一股脑儿说完，林校长才说道：“要正确对待群众运动，任何时候都要始终如一地相信党。”

我回到宿舍，心里嘀咕：“这是句冠冕堂皇的话，这种样子，叫我如何正确对待？又能如何相信？”直到二十年后的1978年，林校长还对吕绥生提到当年我们之间的这场谈话。只不过，他是把吕绥生当成我了。

不几日，有关右派分子的群众处理意见公布了，名单就贴在文科楼阶梯教室外边。惩罚分四个等级，学生中最严重的是“开除学

籍，劳动教养”；次一等为“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以观后效”；再轻一点的是“留校察看”；最轻一级是只戴右派帽子，免于处分。受最重和最轻处分的右派人数都少，得到中间两级处分的占多数。

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只有我和史美唐被划为“极右”，“开除学籍，劳动教养”。同为极右而开除和劳教的还有肖藩、屈剑英等人；肖藩此前已被逮捕。“群众意见”如此，更改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已经被开除了，我和史美唐不再去上课。

根据我后来的了解，兰大右派教师受处理的情况可分为六等，名单如下：

第一等处分为劳动教养，共有七人。其中，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者三人：陈时伟、刘文兴、段重希。未开除公职、劳动教养者四人：徐长昆、田春如、曹文正、周志中。

第二等处分为撤销原职，监督劳动，共有九人：管照微、胡晓愚、任国钧、黄培柱、黄尧荪、邓志民、李思联、詹宗杰、徐修梅。

第三等处分为撤销原职，留用察看，共有八人：左宗杞、段子美、李剑夫、曹觉民、吴文翰、王景尊、周慕溪、陈佩芳。

第四等处分为撤销原职，降级使用，共有十八人：李学禧、匡扶、谷扬、张照珂、李延涛、李珍熙、王培桐、王德基、周瑛、吴南儒、杨素空、王廷湘、刘昶丁、陈湘凌、刘阿丽、王戢武、吴宗汾、李民忠。

第五等处分为撤销原来担任的部分职务，降职降级降薪，共三人：丛林玉、陈耀祖（讲师降助教）、方孝博（副教授降讲师）。

第六等为免于处分，共三人：张孟伦、孙艺秋、张忬。

六、离校前的日子

我已坚持到最后一刻，再去上课，给人“死乞白赖”的感觉，非我所愿。冯淑筠、吕绥生、邓德银、翟所迪等同学未被开除，都是“留校察看”或“免于处分”。他们前来安慰我，我对他们坦言，今后谢绝看望，以免耽误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愿他们努力功课，学

有所成，并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

史美唐与我同病相怜，待同学们都去上课了，他就到我的宿舍来。

史美唐是上海人，原来在小六班。他圆圆的脸，肤色白里透红，人长得俊秀，一表人才。说实话，开初我对上海籍同学颇怀偏见，认为他们身上多少有“骄娇二气”。经过两次交谈，才知他的底细。

美唐君出身于上海纺织业的一个资本家家庭，上海解放前夕，父母动员他和妹妹移居香港，许诺送他去英国或美国任何一所他想上的大学。他却不稀罕出国留学，一心要为新政权效力。最后和父母闹翻了，他报名参加了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他表现出色，一次在河南某地抗洪抢险，奋不顾身堵堤决口，荣立三等功。1955年他从部队复员，经过一年补习，与我同年考入了兰大化学系。

美唐君的故事震撼了我，我原来觉得自己是“自来红”；现在认识到也有人放弃了优越的家庭环境和前途来参加革命。我只是第一任少先队队长，无功可表；他已经经历过艰苦考验，立过战功。我劳教后至少还可以回家与老父亲团聚，而且，一位可心的姑娘正在南国翘首以待我的归来，他却是真正的无家可归、孤苦伶仃了。

我为美唐君的处境忧心忡忡，竟然忘了自己的痛苦。我还告诉他，群众讨论后的第二天我去找了林校长。他说：“你做得对，也找准了人。”他也认为林是一位正派的共产党人，并坚信这次谈话会起到作用。

“那么，你是不是也该找林校长谈谈呢？”我试探着向他提出建议。

美唐君对我苦涩地一笑：“我比你大三四岁，我经历的、体会过的，你没经历过。你出身好、根子正，这一点非常关键。我出身不好，再申诉也无人相信。出身犹如胎记，不可能洗刷掉。尽管我曾登报声明与父母脱离关系，仍然摆脱不了人们所说的‘阶级仇恨’，哪怕把心剜出来也无济于事。”

呜呼，原来如此，我无话可说了。

1958年6月下旬，中共兰大党委公布了对右派的最后处分决

定，果如史君所料，二百余教师和学生右派的处分，都按原来的群众意见办理，几乎原封不动；唯有我得到“罪降一等”的“宽大处理”。

兰州大学的教师和学生总数不过两千，划右派二百余人；中央下达的百分之五右派指标，兰大划出了百分之十的右派，超额完成反右任务。对此，刘海声功莫大焉。

6月的某天，被送劳动教养的右派走了，走得悄无声息。我不知他们是被捆绑走的还是押走的，也不知道给他们戴了手铐刑具没有。直到一年后我才得知，美唐君的劳教地点就在兰州市内，那地方四面高墙，墙上还有电网；大门口有荷枪实弹的武装人员把守。这分明是监狱啊。劳教人员并未被判罪量刑，名义上还有公民权，何以遭如此对待？

我保住了学籍，算是不幸中之幸事。虽说是劳动考察，以观后效，毕竟还有重返学校的希望。几位好友都为我高兴，谈话中，大家帮我总结教训。他们批评我秉性刚直，太不灵活了；又叮嘱我今后不管遇到何种情况，务必都要控制感情，管住自己的嘴。

冯淑筠君则要我在离校前，处理好另一件事，是为善后。

1957年暑假，我们在火车上邂逅兰州卫校的三位女生。没想到有人对我“念念不忘”。暑假返校后不久，几位女生跑来兰大看我，并捎来几大包东北土特产毛栗子等。其时我正受到严酷斗争，她们一定也见到了我的特大漫画像，看到了我宿舍门上的对联和床帷四周的白纸幡。难得的是，她们并未被我这“匪徒”吓退，而是执意要见我。遭到左派坚决拒绝后，她们不得不把东西寄存在校传达室，直到半年后，东西才转到我手里。冯君告诉我，食品吃了，包食品的大手帕是万万留不得的。姑娘往往把手帕当成定情的信物，那会令人产生误会，造成伤害。

星期六晚上，冯君陪我去卫校。三位女同学像接待亲人一样招待了我俩。我借口宿舍说话不方便，邀她们三人一道出去吃顿便饭。交谈中，我也自报“家门”。意外的是，她们都不惊愕。原来，她们有位老师平时深受学生爱戴，只因说了“外行不要领导内行”的

话，也被划为右派了。我这才知道，连中学和中专也在反右。她们中的一位说：“本来嘛，外行不懂业务怎么领导，不是瞎指挥吗？我认为这话没错。”我怕扯远了，赶忙拉回来说：“三思而后言，或者干脆不表态最好。你们千万要记住我这兄长的话。”

不知何时，那位曾趴在我腿上睡觉的女生偷偷去买了单，我发现后硬是把钱还给她了。为谁该付钱的事，双方争执了老大一阵。我若依了她，大有“一家人”不必计较的意味。这是冯君早与我商量好的，断乎不能让步。我感到很内疚，虽然没有接受她的好意，但她确实是位善良多情的好姑娘。

接下来，由几位好友凑钱，冯淑筠君出面张罗，为我缝制了两套“蚂蚁布”劳动服，还为我准备了一个缝补用的针线包。翟所迪君又塞给我三十斤全国通用粮票，他们把我自己不曾想到的都替我想到和准备了。

离校前的晚上，冯淑筠、吕绥生、翟所迪前来与我相伴。我们买了两只烧鸡，每人半只。在一只船、铁路新村的小巷里，我们边吃边聊，直到深夜才返校。他们异口同声道，人多眼杂，明天不便前往车站送行，这算是提前为我饯行。

躺到床上，我翻来覆去，思前想后，一夜无眠。大学勉强读了两年，一年在血雨腥风中熬过。从鸣放到反右，由翻手为云到覆手为雨，不谙世事的我由人变成非人。大学生看起来个个天真纯洁，到关键时刻，各种面目都显现出来。有嫉妒别人女友漂亮能干的，有“挖墙脚”使绊子将人推下陷阱的。中文系某班有七个女生，她们的男友全成了右派，反右后这些女生都跑到了反右英雄的怀里。有人为达到入党目的，不惜拉别人垫背；有人为毕业后能留校或分配到好的单位，不惜将竞争对手打翻在地。反右是天赐良机，这些人自然不会放过。

同学间友爱、和谐的氛围没有了，代之以冷漠、猜疑和互相戒备。坦诚活泼的交流和辩论没有了，代之以沉默寡言和见风使舵。公平竞争、积极向上的学风没有了，代之以政治红是唯一的香饽饽。右派学生政治课成绩一律不及格，其他功课即使学得再好也只能及

格。教师若评为“良”，就有“同情、偏袒”右派之嫌。而有的人学得再差，教师也得送其过关；不敢给他“不及格”。学生明分三派，壁垒森严：左、中、右（或红、白、黑）。在红类中又有大红（党员）、红（团干和入党积极分子）和淡红（一般团员）；在白类中有只专不红、走白专道路的，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有反右消极和右派有牵连的。右派又还有四个等级。如此三等十级，大班小班同学俨如梁山好汉在忠义堂排座次，每人心里都明白自己的斤两，焉敢僭越，唯看人脸色行事而已。校园人际关系已达空前虚伪程度。

人类史之前，曾有过冰河时期。由于地壳和气候巨变，大量物种消失，恐龙的绝迹仅是其中之一。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经历过巨变时刻，它使许多人消失，使这个民族积极正派的精神品格荡然无存。

这就是1958年7月中旬我离校前的校园情景，我即使已变得麻木，还是切身感觉到了。你为兰大的未来、祖国的命运、党的事业而忧心吗？确实。可是，你已经是兰大的外人、党的弃子了啊！不错。可我还是炎黄子孙，无人能开除我的族籍。你这人终不改赤子之心、傻子之愚，真是不可救药了！可是……可是，谁又怜悯你生死未卜的命运，谁为你喋血的青春而哭呢？你连自己都顾不了，还操这些闲心做什么？

反右终于偃旗息鼓，左派、右派和所有运动中的人都心力交瘁了。此后才知，我离校后兰大又补划了一批右派，他们被遣送到武威黄羊镇去了。反右把知识分子尤其大学生过了一遍筛子，只是，不知筛出来的我等，是真正的渣滓呢，还是别的什么。

无论如何，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完成了我的人生转折：由未成年人向成年人的转变。我的感情变得深沉一些了，我也不再口无遮拦，“言论自由”。我看人看事，看社会看人生，脑子里似乎明晰了许多。

1957年是我人生的分水岭，我是反右运动的受害者之一。我当时还年轻，并非真的理解了争取自由民主。“东邻失火，殃及池鱼”，我不过是鱼池里一条很小的鱼。反右过后，我才意识到这场运动的

严重性。建国以来，有过众多的政治运动。因年龄关系，我只知其名，不知其实，更不曾介入其中。1957年的鸣放和反右是我卷入的第一个运动，谁能想到，竟使我受尽磨难，九死一生！

注释：

1. 2012年7月该同学给我电话，他解释说：那时节与一党员来往多，是帮他学习，并没有伤害过其他同学。为对同学的历史负责，2013年2月，我向王晾电话询问，王说：确有其事，且我就是因他受害的当事人。
2. 此后我的右派朋友告诉我，沈凤嘉并不太“左”，他对与他同小班的右派同学多有同情。沈和路现在都在兰大，同为化学系教授。

第三章 疯狂的岁月

一、乍到联丰社

按“劳动考察”处分到农村去的兰大右派师生大约四十人，在学校党政干部的“护送”下，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大家坐在同一节车厢，一个个神情木呆，不说一句话。耳边传来列车发出的轰鸣，沉重而单调。

这群异类中，唯一的女性是中文系二年级学生谭蝉雪。讲师有一位，即化学系的胡晓愚先生。似乎也有其他助教、一两位教授，只是我不认得。还有三位研究生，他们是化学系一级教授朱子清的研究生胡依理、物理系苏联专家的研究生徐诚和物理系徐躬藕教授的研究生顾雁。我也看到了熟悉的学兄，化学系三年级胡学忠君，还有中文系的断舌右派孙自筠君。

意外的是，和我同届的二年级学生竟占了半数，大家的年龄都在二十左右。

胡晓愚先生胖墩墩的，他是化学系的主力讲师，一直教高年級的有机化学。听说他是江西九江人，二十一岁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同年考上北大研究生。胡先生1955年毕业后调到兰大任教，二十七岁已是高教八级。他在化学系广受学生欢迎，一是课讲得好，二是外语根底深。据说他看英语书的速度比看中文速度还快。反右开始后，他与张我权先生被左派称为系主任左宗杞的哼哈二将，如数学系所谓“四大太保”一样，全校无人不知。

胡依理是武汉人，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徐诚和顾雁都是上海人，同时毕业于北大物理系，又一同考上兰大的研究生。兰大此时期虽是五年制全国重点理科大学之一，但研究生总共没几个，这三

位又是研究生中的佼佼者，偏偏都被划为右派。

火车走了六七个小时，没有午餐供应，也没有水喝。大家唇干舌燥，饥肠辘辘。到天水北道埠下车，已是下午三点多光景。师生们背着行李，手里提着装脸盆和洗漱工具的网兜，男女老少走在街上像一群逃难的人。囫囵用餐毕，忙不迭地又乘车到达天水地委大院。有人逐一点名，将我们一分为二，一半的人留天水市，另一半人去武山县。老师们、三位研究生和女生谭蝉雪，还有胡学忠、孙自筠等，他们都分在水市，我则在另一半里。

乘车向西，马不停蹄地到了武山县委。县委又将这一半一分为二，一半人去洛门，另一半人留在城关。我随其他同学共十人去到城关，城关又将我们十人分别派去两个不同的公社。我和苗庆久、张开锡、郑连生分到联丰高级社，另有五位同学到贺家店高级社，他们是谢成、柴志德、马启凯、孙和，还有许金田。

联丰社地处武山县城与贺家店镇（又名山丹镇）之间，离县城约七八华里，距贺家店只三华里许；陇海铁路从村庄中间穿过。这个社由于工作出色，多次获得国务院和甘肃省嘉奖，社办公室挂着许多奖旗。此前，中共甘肃省委为安置我们这批右派，曾向有关部门下达指示：环境要选交通方便的，地点要选群众觉悟高、各方面工作都先进的，以利对我们的监督改造。联丰社完全符合这些要求。

我们四个被安排在李书记（兼社长）家里，这是个典型的西北农家院落。南边上房住着李书记一家人，我们学生住在靠院门的耳房。这间耳房呈长方形，约莫有十五平方米大小；靠西墙是个大炕，可并排睡下四个人。炕下是条一米许的廊道，有一个小门和一方小窗。外面的院子很大，有七八十平米，大部分用土梗围成了菜畦。菜畦里种的葱、香菜、萝卜长势很好，绿茵茵的。菜畦边还有三棵果树。

从院门进来，走过一条窄窄的小道，经过我们门口才到上房。上房门前有台阶，阶高半米，共有三级。李书记家的上房比之我们住的耳房来，显得又高又大；耳房更像个厩棚。李书记家我从未去过，屋里的布置摆设如何，不得而知。

刚把行李放到炕上，立即有人带我们到了位于村东头的社办公室，接受训话。李书记开门见山地说：“你们是犯了错误的大学毕业生，乍到农村来，生活肯定不习惯。你们要放下架子，会慢慢习惯起来。要听从社员的监督，接受社队领导的安排指挥，不要说不该说的话，这样减少你们的麻烦，也减少我们的麻烦。有事需要进城，要向我们请假。要努力劳动，舍得流汗。你们的劳动表现将决定你们的前途。你们过去干了对党、对人民不利的事，主要通过劳动去赎回。一句话：你们要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你们唯一的出路。”

一段时间以来，我觉得自己像幽魂一般到处漂泊，如今总算落到了坚实的土地上。虽然还是有志忑、恍惚、惊惧和疑虑，毕竟还是踏实多了。

回到住地，天已断黑；李书记的母亲送过来一盏马灯。铺好床，各人囫囵几口路过县城买的冷馍，又准备起第二天劳动穿的衣袜。大家不说一句话，各自歇了。对我的三个新伙伴来说，这一定是个难眠的夜晚，我听见他们翻来覆去的。而我头晚上没睡，早困得不行，很快去会周公了。

刚睡个囫囵觉，村里有钟声“啜”“啜”地响起来，紧接着是一阵喊声：“上工了！”天色尚未大亮，我们一骨碌爬起来，行动都很快。我穿了劳动服，他们三人也都穿着较旧的衣裳。只有张开锡戴着眼镜，没法更趋近社员的打扮。我们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出了门。在去往工地的路上，我们也学着社员的样子，蹲在渠边用手兜些水往脸上一浇，双手再往下捋一捋，算是洗了脸。以后每天都是如此，只在睡前漱一次口，算是入乡随俗。

我们四个人分配和基干民兵连一起干活，这天和随后几天的劳动都割大麻和沤大麻。社里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把弯月形带柄的砍刀。大麻长得一人多高，秆粗如棍。民兵连是些棒小伙，内中还有几个穿旧军服的，估计是返乡退伍兵。他们割起大麻来，如同切菜般容易，一刀下可撂倒好几棵，眨眼工夫扫倒一大片。可我只砍了几下就大汗淋漓，每棵要砍两下才能砍断，不知是刀不锋利还

是力气相差太多。

7月下旬，太阳正以它最充沛的精力向大地散发热量，地里干活的人对它的淫威都有几分畏惧。除我们几个，其他人都戴了草帽。中间休息的时候，一些人到树荫下歇凉，也有人不理会毒太阳，坐在大麻捆上，吸着五分钱一包的猫牌香烟或老旱烟。他们一边吞云吐雾，一边开着粗俗的玩笑；话题多是大姑娘小媳妇之类，甚至脏言秽语，不堪入耳。有时玩笑开过了头，双方厮闹，摔起跤来，却未见谁真红脸。

天气太热，下午开工很迟，到工地已是三点半了。一位壮汉拿来四顶旧草帽，给我们每人一顶说：“戴上，莫嫌，总能挡晒。把你们的白皮细肉晒糊了，李书记跟前不好交差。”我心中油然腾起一股感激之情，以后才知他是民兵连的排长，我们这伙人的头头。

大家渐渐熟悉起来，民兵连这些青年人，知道我们是大学生，开始问这问那。天上为什么会出现七色彩虹？扫帚星拖个长尾巴是怎么回事？也有拿我们开玩笑说些不上串的话，我们装作听不懂，也不搭腔。

过几天才知道，与我们一起劳动的还有两个右派，他们是天水步兵学校的尹茂春和王佐。尹是吉林人，年约三十，个头稍矮，满脸短须，脸红扑扑的，身体很结实，原为步校中尉战术教官。王是陕西人，高个，年约二十六七岁，一脸书生气，原是步校中尉文化教员。部队也搞“大鸣大放”？也“划右、反右”？此前闻所未闻。如今他俩都穿着旧军装，和民兵连的人在一起，真打成一片了。如果不开口说话，谁也分辨不出来。

收工回来，虽觉疲惫，心情却不很坏，那原因多半在一顶草帽上。这天回来吃罢晚饭，大家不约而同地整理起自己所带书籍，学习已提到我们的生活日程。从此，除白天劳动，我们都坚持学到夜晚十二点。那时条件差，我们四人共用一盏马灯。围坐在矮矮的马扎上看书，很是费劲吃力；但我们都很勤奋，注意力也集中。我带来一本《俄华词典》，开始啃格琳卡俄文原版的《普通化学》。一切尘埃落定，心里杂念全无。我感觉学习效果不错，甚至有几分兴奋。

割完大麻，接着是运麻和沤麻。联丰社的北边，渭河缓缓流淌，绝大部分土地就在河边，少部分在铁道南边山上和山根处。渭河边有一块天然凹地，那正好用来作为沤大麻的池子。它离大麻地三五百米，引来渭河水就可以浸泡大麻。我们把运来的大麻一捆捆摆放齐整，然后清沟放水。放满水需个把时辰，小伙子们熬不住这段悠闲时光，又斗嘴或摔起跤来。

水放满了，大麻捆子都漂起来。民兵们都在脱衣服，我不明白他们要干什么，只好一样也脱得剩条短裤衩。大家朝渭河里走去，有些人“扎猛子”，沉到河底去捞大石头，然后将石头肩扛背驮运到池边。

这儿远离村庄，妇女、小孩不会来此。此时，人们脱得精光，跳进池里，用身体和石头将大麻捆压沉至池底。浸泡发酵要一个月时间，待绿叶青皮腐烂褪尽，人们再将麻捆捞出晾晒至干。冬天农闲，这些麻捆分到各家各户，由老人、妇女和小孩剥麻。剥好的麻由国家收购，少量留作麻绳、麻线自用。

我们四人虽然一起吃住，一块学习劳动，二十四小时都生活一起。但经过反右，也都有垫背的教训，彼此不敢交谈。苗、郑和我都是二年级学生，张开锡是物理系四年级学生。此前我只知苗庆久的大名，四人中只有他是调干生。苗身体魁梧，年长我六岁，也是我们四人中年龄最大的。他是北京人，籍贯东北沈阳，出身地主家庭，以后随父母迁往北京。他的情况与史美唐君相似，北京一解放，他便参了军，在公安司令部边防保卫局工作。苗庆久曾任中尉参谋，两次荣立三等功。1955年从部队复员后考入兰大。鸣放期间，他曾是物理系赴京代表。

张开锡是武汉人，个头与我差不多，长得干瘦，戴副深度近视眼镜，是物理系响当当的高才生，四年功课成绩全优。他带的书最多，不少是外语精装大部头。张平时沉默少话，是个典型的书生。

郑连生不知何处人氏，身体也单薄，面相比实际年龄显老，嘴里镶了颗金牙。他平时话多，常露出金牙，给人龇牙咧嘴的感觉，我不太喜欢他。劳动时他常主动与社员唠嗑，不久就有社员说他讨

好卖乖，虚伪轻薄。尽管个性不同，我们四人倒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

也有心烦的时候。工地上偶有个别调皮社员，向我们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比如，你们放着好好的书不读，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说了些啥，能不能向我们讲讲？这些问题令我们尴尬，只能用听不懂去搪塞。有时纠缠得过分了，他们的排长不得不过来制止。

一个多星期后，我们又被分到“穆桂英青年女子突击队”，去谷子地、糜子地锄草。

二、最轻的劳动也能累断腰

谷子和糜子地在铁路南边的山坡一带，突击队长三十好几，热情泼辣。到了地里，她先教我们如何识别糜谷与野草，然后发给每人一把长柄锄头。

所有农活中，也许锄草是最简单的农活。然而对我却成了难题。糜子、谷子在四五公分高时，与野草几乎无异，仔细分辨才能发现一个叶片有茸毛，另一种没有。我原本视力很好，双眼都是一点五，经过一年多反右“疲劳战”，长期严重的营养缺乏，身体一直没能恢复，两目视物常觉混沌模糊。要识别有无微细的茸毛，不俯身贴近看不清楚。我很紧张，心里嘀咕：如果误锄了庄稼留了野草，被扣个“故意破坏”的罪名，浑身長嘴也说不清。我小心翼翼，将身子折成直角，握着锄柄下方的三分之一处，眼睛瞪得大大的，像工兵排雷一般探索着往前锄。不多一会儿，腰腿僵硬，疼痛难忍，速度慢得像蜗牛。身旁的同学，情况也不比我好多少。原先我们和其他突击队员排成一横排往前锄，只一会儿工夫，被撂下一大截。年轻妇女锄草时，手握锄柄上方，身子只略微下倾，锄头来回舞动，轻松自如，嘴上还在插科打诨，嘻嘻哈哈，丝毫不影响劳作。

尽管小心到了家，队长在检查质量时，仍发现我有少量误锄的情况。她看出我的紧张心态，非但没扣帽子，反而说了些宽慰的话。

我们四个人眼看落得远了，那些年轻妇女便返回来接我们一阵。虽然她们没什么文化，心眼比学校里的文化人好太多了。

队长发现我视力差，下午给我一把小铲，叫我蹲着用小铲来锄。距离一近，自然看得真切。小铲解除了腰部的重负，我很感激队长的照顾。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比起基干民兵连的小伙子，年轻妇女在一起更疯。无论劳动或休息，噉噉喳喳，嘴没闲的时候。聊的尽是些男女秘事，说到要害处，发出毫无顾忌的浪笑。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去解手，走到不远的地头便褪下裤子，露出大屁股来，吓得我们不敢侧目。休息时，有个别大胆妇女跑到我们跟前问这问那，还说要些带有挑逗、刺激性的话，比如提有关避孕方面的问题；尽拿我们开心逗笑。

这里没有歧视与敌意，笑声一扫笼罩我们心头的阴霾。

基干民兵排长和妇女突击队长的善意帮助，不仅是因为农民的本质善良，事后我们得知，这还来自领导指示。这位领导便是中共武山县委委员、山丹镇的杜镇长。很遗憾，我记不得他的名字，有人说他其时还兼任武山县副县长。

杜镇长——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汉子，无论相貌还是身材都无特殊之处。据他自我介绍，自己只是个初中肄业生。但他谈吐彬彬有礼，颇有知识分子的气质。他第一次登门看望我们，是在“大麻战役”刚结束的一天晚上。我们四个正围着小马灯静静看书，突然门口李书记喊道：“同学们，杜镇长看望你们来了。”

我们都站起来，望着立在门口夜色中的两个黑影，没人搭腔。这场面令人难堪，并非我们不懂礼貌，而是感到为难，故而发愣。小屋里一米多宽的过道上塞着我们四条汉子，加上小矮桌和小马扎，已显得十分拥挤。总不能让客人站在门外吧，可往哪里让座呢？还是苗庆久老练，他道：“请镇长、书记进屋上炕坐到被子上吧，既柔和又能展开腿脚。”

似乎有什么约定，李书记过去有事只站在门外说，从不进小屋，杜镇长也一样。没等我们反应过来，他一屁股坐到门槛上，李书记

则坐在廊檐外石阶上。

“大家都请坐，不必客气多礼。”他用锐利的目光扫视我们的集体宿舍，被子折叠得还算齐整，被子与后墙间放着箱子。我们每人都有只小箱，张与苗是皮箱，郑是棕的，我的则是藤箱。箱上码着几摞书，张开锡的书最多，床头放不下，不得不侵占到我和苗的地盘。过道的另一端是我们的灶房，那儿放着一只煤油炉，还有一只硬纸盒，上面放着块小案板。灶房实在太小，事实上我们都是门口的屋檐下做饭。四顶旧草帽挂在墙上。小屋再无杂物，已经撑不下了。

矮桌上马灯的光从低处照过来，在后墙上投下我们的巨大身影，小屋光线昏暗且有点扑朔迷离的味道。

杜镇长用平和的语气说道：“我在县上开了一个星期的会，本想早点来看望大家的。农村条件差，生活比较困难。看得出，你们没被困难吓住，白天劳动，晚上坚持读书，很不容易。你们的行动证明，你们已经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决心。社员们对你们十多天来的劳动表现也是满意的。我和李书记今天来看望大家，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大家有什么要求。”

要求？笑话。我们戴罪来接受改造，自己明白有几斤几两，还敢提什么要求？我几乎怀疑他在引诱我们，立刻警觉起来。大家都沉默不语。

过了一会，记不得是谁像是耳语般地低声道：“衣扣脱了，手磨破了，能不能到县城去买些针线、胶布之类的东西？”

杜镇长当即答复：“可以。到城里买东西，不必请假，打声招呼就行。为方便你们的生活，今后你们也过星期天，这天你们可以集体去采购东西。”

他的允诺对我们不啻是莫大的恩赐和奖赏，我们太需要去县城了。不是要去买针线与胶布，而是要买进口货。到农村后，遇到的最大难题，莫过于吃饭喂肚子。社里配给我们一定数量的糜面和谷面，还有少许的白面，也有一点土豆和别的蔬菜。吃糜谷面饼肚子发胀，大便解不下来，这还是小事；主要是粮食数量有限，而劳动

强度大，缺油水。肚子常在提抗议，半夜饿醒再难入睡。其时，我们手头多少还有一点粮票和现钞，多为亲人支援和好友馈赠。

杜镇长临走前向我们宣布，兰大每月给你们十五元生活费（我记不太清了），每月定量二十八斤；钱和粮票都由县委组织部转发。他捎来了第一个月的钱和粮票，当即发给了我们。

杜镇长坐在门槛上，他的身躯一半在小屋灯光里，一半沐浴在月色中。我忽然感到，他好像一位播撒善意的使者，让几颗破碎的心重新凝聚在一起。

他说以后每星期都来看望我们一次。他确实做到了，直到我离开联丰社。

三、一喜一忧皆惊雷

甘肃天水的武山县，当时是全国闻名的先进县、红旗县。1958年8月，这里率先兴起大规模的水土保持运动。联丰社又是先进里的先进，样样走在前边。我们四个学生，这时也随青壮年劳力开拔，到县城南面的山上安营扎寨。

南山的山头、山腰插满了红旗，来自各个高级社的青年男女歌声飞扬，红旗招展，场面浩大，我们的任务是十天内修好南山一带的水平梯田。

开工典礼刚结束，我和苗庆久被召到县委宣传部。一位三十来岁的干事向我俩下达任务：办《工地快报》。不知情的社员议论道，到底人家是有文化的人，又吃上了拿笔杆的轻松饭。岂不知这活儿比拿锄头、铁锨累多了，我俩又面临了严峻的考验。

我们每天天不亮就从县委出发，赶在社员上工时候爬到山上。我们随身带着小报，爬上爬下，分送给各工地的社员，还要读给他们听。然后我们收集先进人物事迹，记录社员的顺口溜、打油诗。要跑遍所有的工地，少说每天要爬三四十里山路，南山上山沟山岭起伏伏，我们爬坡登山，越涧跨壑，有时在无路之处跋涉。中午时分，社员能休息一两个小时，我俩只能一边啃干馍一边走山路。

最令人头疼的莫过于提防乱石，攀爬时要十分谨慎小心；既要提防上面滚落的石头砸着自己，更怕自己踩滚了石头砸伤别人。一块小石子从山顶以重力加速度冲到山下，如果砸到人，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可不愿当“杀人犯”。山上山腰到处尘土飞扬，乱石防不胜防。我俩整天在遮天蔽日的尘土中穿梭，直到下午五点才开始返回县委大院。

回到大院，边吃饭边写稿。既要覆盖面广又要突出红旗社的典型特征，我俩尤其怕犯政治性错误，不能不字斟句酌。约六千字的小报，稿子写好凑齐，往往已到晚上九点之后。送审待批又得花个把小时，然后我们挑灯夜战刻蜡版，开机油印；每晚都忙到午夜两三点才能上床。

十天的水土保持战役胜利结束，我与苗已累得半人半鬼，蓬头垢面，浑身酸臭又精疲力竭。这些天吃的苦犹如在地狱走了一遭，我终没能扛住精神和体力的双重超负荷压力，一回到社里就发起高烧，病倒了。

8月，社里出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王佐的未婚妻从西安来，专程来与他结婚；预先准备了各种必需的证明。她约莫二十三、四岁，面容姣好。圆圆的脸上五官端正，两只大眼睛水灵灵的，清澈明亮。社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以及老太太都跑来看新人，赞不绝口。

王佐、尹茂春的住处就在我们旁边，隔条窄窄的巷道，直线距离不到五十公尺。办喜事的时候，王佐很识时务，只请了他的同事尹茂春和我们四个同学。我们都送了贺礼。酒席上，王佐的爱人表现不俗，饭菜全是她一手张罗的。虽无山珍海鲜，都是些家常菜，但味道很不错。她落落大方，有见地，善言谈。我们不断向一对新人祝福，新人也频频向我们敬酒。席间，她说了一番话，更是令人刮目相看。

“我高中毕业，我高中的物理老师是北大毕业的，他是最敬佩的老师，去年被划成了右派。我了解王佐和他的家庭，否则，我不会千里迢迢找上门来嫁给他。你们在学识上都是我的老师，在年

龄上有的是兄长，有的是弟弟。如今与王佐遭遇相同，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世界上的事太复杂，时间一长就会水落石出。何况，社会上了解你们的人。你们切莫自暴自弃，只要挺住，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她的话如涓涓清泉，注进我干涸的心田。王佐不知是什么学校毕业的，我知道他的英文根底不薄，他正在阅读英文版杜鹏程的《保卫延安》。我终于明白他之刻苦的原因了。

过了两天，王佐送走了他的新婚妻子。她在新疆乌鲁木齐找好了工作，好像是在银行系统。我没见着他俩新婚后的离情别绪，这事在当地一时传为佳话。

第二件事发生在一天晚上，天刚断黑，我们正准备夜读；一位社员在门口嚷道：“李书记叫我来通知你们，带上小马扎，现在就到社办的院里开会。”社办的院子我们已不陌生，刚来社里时曾在那儿歇脚，后来又被招去聆听李书记的教诲。它比普通农家院落稍强一些，堂屋的廊檐较宽深，廊檐边的石阶高些。院里有几棵果树，独无菜畦，是片空场子。想来它原是个小地主的宅邸吧，如果在小院里开会，坐满了能容下三四百人的光景。

进到院里，一盏大汽灯正悬在廊檐正中的上方，发出刺眼的白炽光。院里熙熙攘攘已经坐满了人。有人招呼我们坐到最前面的廊檐下，那儿有张长桌，李书记和另三个社里的干部对大家坐在那儿。

“社员同志们，请大家安静！”李书记略带嘶哑的嗓音大声喊道。待喧哗平静下来，他接着道：“现在我宣布：联丰高级农业社斗争地、富、反、坏大会正式开始！”

紧接着，有人厉声喝道：“把地富反坏分子押上来！”小院立时卷起狂飙，人们淹没在一片口号声中：坚决粉碎地富反坏的反攻倒算阴谋！打垮地富反坏分子的反动嚣张气焰！我们绝不允许万恶的旧社会卷土重来！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在我面前，突然冒出来六个人，像是从地洞里钻出来的。他们都耷拉着脑袋，佝偻着腰，分站在长桌的两边。李书记的声音在继

续：“社员同志们，你们都听说了，自去年夏天以来，右派分子向党发动猖狂进攻。为了配合这个进攻，在广大农村，地、富、反、坏分子到处造谣煽动，挑拨社员和干部关系，中伤诽谤干部，恶毒攻击党的农村政策。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要颠覆人民的红色江山，想要旧社会复辟！社员同志们，你们答应吗？”

群众怒吼：“坚决不答应！”

李书记又问：“我们该咋办？”

群众中再一次爆发出怒吼：“斗垮他们！打倒他们！粉碎他们的美梦！誓死保卫党！保卫红色江山！”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冲出一伙人，我认出来其中多数是基干民兵连的小伙。他们扑过去，给站立着的六个阶级敌人一顿拳打脚踢。眼见其中四个人东倒西歪，两个人被打倒在地。群众堆里，喊打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这件事就发生在我面前，距离我还不到一公尺。倒地的那一个“敌人”撞在我腿上，几乎把我撞倒。我看得太真切了！

我的心一阵阵发紧，我吓懵了！这太突然，太快了，比闪电还快。1951年土改时，我年尚幼小，哥姐都参加了。从他俩的几十本土改工作笔记中，我大致知道一点斗争地主的情况。以后读毛选，我也晓得“阶级斗争是疾风暴雨式的暴烈的行动”。但毕竟未亲临其境，这还是我第一次目睹这场面。过去听说土改，我的同情心无疑是在受压迫的贫苦农民一边；我的父母、家族也曾遭到过富人的压迫，斗争恶霸豪强当然是正义之举。但对眼前的斗争，坦白地说，我内心很反感，很厌恶。

经历了反右之后，我不禁要问：说他们“造谣煽动”“恶毒攻击”“阴谋复辟”，确有其事吗？谁能保证不是我在反右中所谓“要把共产党杀光”的异曲同工之作，谁能保证不是无中生有、欲加之罪？何况，根本不准当事人说话，不准为自己辩护；上来便是拳打脚踢，人仰马翻。要说1951年土改，可以说那是非常时期，新政权刚建立，来不及设置法律制度，靠群众运动来横扫恶势力。然而解放都八九年了，仍用老法子来达到震慑敌人，要造成多少冤案？

眼前这六名“阶级敌人”，两人尚年轻，其余四个都年过五旬，

还有一位是女性。就只有这位老太婆最幸运，只被推搡了几个趑趄。事后听社员议论，这六个被戴了地富反坏帽子的人并未有什么“乱说乱动”之举，只因上级指示，需要教育他们一下，达到巩固江山威慑敌人的作用。老太婆有个孩子在县上当干部，这才受到照顾。对这六个人如何下手，谁轻谁重以及把谁打翻在地，事先早有布置。

这晚上我惊魂不定，一宿无眠。天快亮时，恍惚中有许多人朝我扑来，拳脚并用，棍棒交加。我来不及喊救命，后脑勺就着了一闷棍……醒来已是浑身大汗。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做这种噩梦，我承认，我吓破了胆。一年的反右运动，尽管批判中吼声如雷，尽管疲劳战也熬人，但毕竟未遭受到直接的皮肉之苦。那时我理直气壮，脑子里从未出现过怕字。反右后，我怕了，如今更是胆战心惊。“震慑敌人”的作用在我身上充分得到体现了。

毛主席早总结出“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统治术，在“弛”的时候，预示“张”即将到来，万不可被表象所迷惑。要时时刻刻小心啊，我在心里告诫自己。

事后才知，当时那种场景正所谓整社大辩论运动中的一幕。

四、人民公社化运动

反右后再无人敢犯上，毛主席已是一言九鼎。全国形势发展很快，下面的事大约发生在1958年8月下旬。

有一天夜晚，村庄整夜似乎都处在剧烈的骚动中。锣声、鼓声、号声，嘈杂的人声、脚步声，夹杂着阵阵鞭炮声，连续不断传到我耳边。天虽没亮，我已了无睡意，干脆起床跑出去看看个究竟。我猜想，一定有什么大喜事发生了。自到农村后，我们没看过报纸，又没有收音机（那可是件惹是生非的东西，我们中谁也没想过要买它来听）；能得到的讯息比社员少多了，可说是与世隔绝。此时我看到，农舍的屋前房后到处贴红红绿绿的标语，上面写着：“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是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金桥！”田间小道，村里村外，到处走动着手拿三角小红旗的男女。

人民公社化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一夜之间席卷了联丰社的社员群众。吃罢早饭，全村以及邻村的男女老幼都聚集到了队部，院内外站满了人。人们手擎毛主席的画像和巨大的横幅，举着五彩彩旗，联丰人民公社成立大会开始了。接着，喇叭里响起李书记嘶哑的嗓音，他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人民公社就是好”。他说，“为了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经过昨晚通宵的酝酿讨论，现在我宣布：联丰人民公社正式成立了！”顿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彩旗飘舞，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接着是从一个村游行到另一个村，小孩穿着新衣，大人穿戴得也比平时整洁。人们脸上喜气洋洋，到处都是一派节日气氛。

我们四个大学生被叫到队部搞宣传，我们的任务包括写大型的标语，房前屋后、村头路口都要刷上标语。同时还要布置、美化公共食堂。公社决定办公共食堂，后天就要正式开伙。家家户户的锅灶都要撤掉。干部交代说：“时间短，任务重，你们要全力以赴。所需材料找会计领。”

写字的事自然不费难，不到一天时间，我们用石灰水涂满了全村所有大一些的墙壁。标语字一律用板刷写成广告体，字的大小则视墙壁大小和字数多少决定，字小如碗，大如盆。

公共食堂在原先队部的库房里，要打扮得像个样儿是桩难事。从早到晚，我们几个人满满干了十多小时，累得王朝马汉一般，个个成了大花脸，衣服上也留下一块块污渍。我们在墙上贴上红绿标语，屋檐下十字交叉地挂上彩旗花带，正中还吊了个大绣球。饭厅大门上写了副对联：“吃水不忘掘井人，幸福全靠共产党。”横批是“饮水思源”。饭厅里靠灶房的墙上方，贴上长条幅：“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两边墙上开了四扇窗户，我们把墙壁也刷了一遍，但饭厅的光线依然不好，黑糊糊的。李书记来检查验收时，皱了皱眉头，嫌不亮堂。我们汇报说，没石灰了。勉强刷一遍，等于用清水洗了一下，没有效果。他说，先凑合着，以后再加工。他又叮嘱道：“食堂可是一面镜子。如今四海为家，随便到哪儿吃饭都不要钱。以后不但社员在这儿吃饭，还要接待外地的客

人。寒碜了，影响不好啊。”

李书记作风泼辣，在社员中享有蛮高的威信。他手下的干部办事雷厉风行，麻利得出奇。我们在打扮食堂的同时，妇女队长领着一帮婆娘进进出出，又搬又抬。锅碗瓢盆、米面缸桶、油盐酱醋等各项物品一一到位。食堂外面，几个人正在杀猪宰羊，会计将鞭炮抱进灶房，那是一千响的鞭炮，足有十几挂。明天食堂起伙开灶，对所有社员都是个大喜日子。

整个联丰社热浪涌动，人们像小儿盼过年似的翘首以待。果然，天色微明，村庄又一次沸腾起来。男女老少穿着过年才穿一次的衣服，笑逐颜开，有的老人眼中淌出幸福的泪花。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单位起伙，历来都是主妇围着灶台转。如今这历史习俗一夜间被革了命，世上还有比此更伟大的壮举么？

起初几天，食堂的确红红火火，尤其老年人特别舒心。社里选派了几个最俊的姑娘媳妇盛饭送菜，菜肉都焖得软烂，没牙的老人乐得合不拢嘴。那些青年妇女也是喜上眉梢，她们知道此时做饭也与在家里不同。这是社会分工的需要，是能赚到工分的。

李书记文化水平不是太高，长相也粗俗。他有砂眼的毛病，因此两只眼睛总是红肿的，无风泪长流，风吹泪不断。但他头脑精明，懂得“民以食为天”。社员的眼睛都盯着食堂，李书记知道要办好食堂来显示公社化的优越性。的确，食堂办得不错，李书记的威信也如日中天。

食堂开伙的第二天晚上，小队长上门通知我：“石灰没了，四处买不到。社里决定用白土代替。这种白土产在南山的沟里，碰巧，有位家住南山沟的妇女来队里走亲戚。她明天回去，请她给你带路。给你选匹最老实的马，你带把十字镐、一把铁锨，挖两背篋白土回来。”

这事我要单独出行，为避免早上手忙脚乱，我当即跑到马厩找到饲养员，一一落实了牲口和工具，又去面见我的向导——一位三十出头的妇女。我们约定了出发的时间地点，我再到食堂要了一天的干粮。队上交代的任务一点不敢马虎。

出了村庄，翻过铁路，便到了南山。南山山高坡陡，只有些羊肠小道蜿蜒而上。我牵着大牲口，跟在年轻媳妇后面爬陡坡。我的身体仍然虚弱，走了一会儿就气喘吁吁了。牲口只驮着一把镐、一把锨、两只空筐；虽无重负，却不大肯走，我得时时用力拉它。爬上山梁才看见，山那边是条大川，竟比渭河川还要宽阔得多。我能清楚地看见，川中间有一条颇正规的公路，路上有汽车行驶。公路两边有高高的白杨和柳树。下到山底，穿过公路，走不多远那年轻妇女便到家了。稍事休息后，她领我到了她家后面的山沟里。那儿就是挖白土的地方，离她家不过里把路。

我谢绝了她的帮助，自己将牲口拴在一块大石上，把背筐中的草料倒在它跟前。我同时啃完干粮，开始用镐挖白土。

白土很硬，挖起来颇费劲。花了约莫一个多小时，我终于挖下一大堆白土，装满了两个大筐。看看太阳，似乎还不到正午；我庆幸已完成了大半任务，牵着牲口原路踏上归途。

走到公路上，意外发生了。公路上漫了水，水虽然不深，但有水面长约几百米。看看四周，无路可以绕过去。我脱鞋挽裤，打算淌过去。我没料到的是，牲口看见汪洋一片水，断然不肯前行。我用力拽，它用前蹄顶着不挪步。我死命拽，它拼命后退。我愤怒了，它更凶狠，朝我瞪起红眼珠与我较劲。我思忖着，该换个位置，便移步到了它后面推它，用锨把敲打它。它依然不肯下水，我急了，使劲敲它屁股。这家伙突然兽性大发，连蹦带跳尥蹶子，将背筐、十字镐全掀了下来，撒野要挣脱缰绳。我死死抓住缰绳不放手，它居然拖着跑，直把我拖倒在地。

我只得松手，眼看它飞奔而去。我大声呼喊前边的行人，请他帮忙截住。行人未理睬，我这时已经浑身透湿，糊成了泥人。个人凄苦不足道，我担心的是，丢了社里的一头大牲口，回去可咋交代？我真个要吃不了兜着走，大祸临头了。我心里好害怕，又无处跑，无处藏，唯有听天由命了。我心里叫苦不迭，肩上还扛着铁锨和铁镐，又背着两只空筐，其中的白土早已被掀翻在地。拖着沉重的步履，一路忐忑不安，直到天黑我才硬着头皮回到社里。

我满怀沮丧之情向饲养员交回工具，却突然发现了那匹老马；它正在马厩里安闲地嚼着草料呢。老马识途，果然不假。这个该死的畜生，害得我好苦哇。人在倒霉处，连牲口也作弄你；心里愤愤然不能自己。

没完成任务，我立马到队长家去检讨。他听完我的叙述却没批评我，反而捧腹大笑：“牲口也认生，再老实的牲口也有犟脾性。它和人一样，只是不会说话。你只有摸到它脾性又会治它，它才会对你服服帖帖。”

我羞愧无言。是呵，人也与牲口一样，我如今不是被治得服服帖帖了吗。

这段时间，我们和社员一样，也在公共食堂吃饭，过了几天放开肚皮吃的好日子。不仅如此，而且，无论大人小孩，每个人都唯恐自己吃少了吃亏；一天要吃以前两三天的粮。

只是，不知这好日子能坚持多久？

五、在“大跃进”日子里

公社成立后，迎来“大跃进”的狂潮。一天等于二十年，超英压美；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没经历过“大跃进”的后生，要研究那时的历史，不妨翻阅当时的报纸。每天都有新鲜事，卫星上天，亩产万斤粮……其实，历史的荒谬还要远远超过报纸上的报道。

武山县是红旗县，卫星放了不少，却没放出全国级的大卫星。如今我只记得两颗：一颗是玉米亩产万斤卫星，另一颗是白杨树上结苹果卫星。前者发生在武山何处、何人所为，已了无记忆；后者发生在洛门公社的百泉，是位团支书的把戏。

玉米卫星见报，喜坏了县上头头。他们组成验收团并召开现场会，对卫星地科学估产，核查验收。能够放卫星的人都是权势人物，绝无平头百姓。他们早得到通知，做好各种准备。先是动员一批忠实可靠的劳力，他们挑灯夜战，把事先选好的十几块地的玉米连根

挖出，然后栽到待验收的地里。栽完了就在田里放水浸泡，再用脚逐一抹平泥土，不露痕迹。卫星地的玉米秆密不透风，一株贴着一株，像热恋中互相搂抱的情侣。农技员挽起裤腿跳进地里，取一个平米的面积，数玉米有多少棵，每棵接了多少棒玉米；再乘以这个地块的总面积，结果远超过万斤。领导喜形于色，验收团成员欢呼鼓掌，互相道贺。食堂早已备好酒菜，验收团吃得满嘴流油，皆大欢喜。

不过两日，玉米叶儿蔫了，秆儿黄了。正在灌浆的玉米死了，从此再无人管。反正卫星放了，即使颗粒无收仍是亩产万斤。

洛门有龙泉、百泉两地，都在渭河边上，是武山的富庶宝地。我有九个同学在此接受“劳动考察”，其中刘良寰和陈德根都是学生的。那儿有位团支部书记想快些染红头上的顶子，创造出“白杨树上结苹果”的卫星，接连几次通过验收，轰动全国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友邻。后来朝鲜、越南等国的科学家也要派团来考察取经，终于把事情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年轻的团支书政治上稍嫩，沉不住气，吓得逃之夭夭，听说跑到陕西躲了，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所有的卫星都是精心策划出来的，上下沆瀣一气，自然功德圆满。经过反右运动，谁还敢反党反领导？再没有把不痛的手指塞进磨眼里的傻瓜了。

1958年的9~10月份，甘谷县、漳县和武山县三县合并为武山县，县的建制扩大了，公社的建制也随之扩大，基本核算单位一下扩大了好几倍。并县合社突出一个“大”字，公社吃饭不要钱突出一个“公”字。“一大二公”是毛主席倡导的，自然“越大越公”越好。公社实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联丰社以班、排、连、营的建制，在公社统一指挥下，开拔到另一社队深翻土地。

所谓深翻土地，是将地下深处的土与地表土倒腾换位，标准是一公尺。这个活路的劳动量很大，得要用大兵团人海战术；正好发挥公社的优势。但我一边翻土一边思忖：表土是熟土，具有团粒结构和微生物的分解活动，把它翻到底下去，而把生土翻上来，来年

能长出庄稼吗？适当深翻些，比如半公尺，或许还能使土壤疏松，增加其毛细作用利于保墒，但我猜不出深翻一公尺的科学根据。

验收人员拿着皮尺，逐人逐块丈量深度，一公尺，半点不含糊。社员有的是力气，至于效果是无须想的。党的话就是真理，党和领导不会错的。

我正在那里揣摩着，工地另一端冒出两个干部朝我走来。他们把张开锡、苗庆久和我召集一起，急匆匆道：“刚接到上级指示，你们三人另有任务，现在就随我俩回队去。”

心里一路打鼓，不知是福是祸。回到住处，杜镇长站在门口，严肃地告诉我们：“接到中共武山县委电话指示，点名调你们三个和柴志德，立即到县委报到。你们任何东西都不必拿，我派马车随后给你们送去。你们现在就动身。”我们四个大学生，两个物理系的，两个化学系的；其中四年级和二年级各两人。听了杜镇长如此紧急的命令，丝毫不敢怠慢，急急上路。

县委门口站着几个人，见我们走到，一位干部径直过来自我介绍道：“我是张十存，这位是县委第二书记张克仁同志。同学们辛苦了。”我们被引领到县委小会议室，坐在沙发上。两侧的茶几上摆放着“牡丹”“前门”甲级香烟，通信员还端上了龙井茶。第一书记张十存给我们一一递烟，我们其时都不吸烟，因此谢绝了。

县委书记张十存，四十左右年纪，人很精神。听闻他解放初期参加工作，原为小学教员。虽说资历不深，但善于审时度势，职务和级别很快超越了他原来的上级。他在武山县的权威性恰如毛泽东在全中国的权威性，即使在水地区，他也是数得着的名人。想不到今天他礼贤下士，对我们几个右派如此客气。我有些“受宠若惊”，心想，且看他葫芦里卖什么药。

张书记讲话丝毫不拖泥带水。他说：“毛主席在一个月前，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要十五年超英压美，又提出今年要把我国钢铁产量提到1070万吨，赶上并超过目前英国的水平。目前大办钢铁是一项政治任务，省委分配给我县完成百天百吨。现在，一百天即将过去一半，我们还没炼出一两钢铁。这个任务倘若完不成，我们将

受到党纪、政纪处分，还可能受到法律制裁。坦白地说，这些天来县委的同志食不甘味，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经县委扩大会议研究决定，特把你们调来攻关。相信你们不会忘记党和人民的养育之恩，会贡献才华，帮助县委渡过难关。县委对你们寄予厚望。”

原来如此。

第二书记张克仁，这时才发现他是个“独眼龙”，也是小学教员出身，年纪比第一书记稍大。他的话很简短：“你们就住县委工业局，和县委主要领导一起用膳。我们尽可能为大家提供最好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具体由工业局长朱光汉同志负责安排。”他指了指坐在他不远处的一位身材颇魁梧的汉子。

第一书记又用婉转的语气问道：“看看同学们还有什么要求？”我们听懂他的话外之音，他在等待我们表态。

我们四人相互看了看，谁都没吭声。我端起茶水，一边啜饮着，一边心里掂量：“这任务非同小可。他第一书记都怕撤职法办，落到我们头上还了得。我们不是钢铁学院学炼钢的，谁心里能有底？万一不成功，责任归谁？”

张书记等了几分钟，见我们像泥塑木雕一般，有些尴尬扫兴，只好道：“时间太宝贵，希望你们立即开展工作，期望明天就能看到你们的计划方案。”

绵里藏针，他明显在行使权力。不管你表态不表态，任务非要砸到我们身上不可。我忽然感到我不如牲口，那匹老马还会对我瞪眼珠，尥蹶子，摔筐子，比起它的自主性，我不及万一。

离开会议室，几位大员陪同我们参观县委工业局化验室。朱局长告诉我们，此前有位中学老师在这主持工作，只是一连几天也没能化验出铁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实验装置和试剂全是现成的，柴志德给我递眼色，那意思是叫我试一试。幸得分析化学学过不久，我还记得，便动手操作起来。我用了两种定性方法，确证了铁元素的存在。待实验毕，柴志德向他们解释了实验现象和得到的结论。县领导的情绪一下高涨起来，张十存竟忘记了地点场合，兴奋地大声道：“我早说过人与人不同，大学生与大学生也不一样。要调动

一切能调动的积极因素嘛，事实证明县委的决策是正确的！”他的话引来一片恭维。一个年轻人跑到朱局长身后低声报告：“他们的行李全部到了。”张书记耳朵特尖，未等局长开口便发出指示道：“你们去代劳一下，替他们整理好，铺好床。他们的时间比金子还贵重。现在就领他们到县委澡堂洗澡，朱局长去安排伙食。我要与大家共进晚餐，替同学们接风洗尘。”

晚餐很丰盛，很难相信，在这样的西北小县能吃到如此丰富又可口的菜肴。如此口福，自反右后我没见过也没想过。席间，除原先的三位领导，又来了一位陪客。领导们频频举杯，敬酒劝菜。可惜我们四个人中唯苗庆久能喝点酒，其余人滴酒不沾。

回到工业局住所，床铺果然安排妥帖，书也摆放得齐齐整整。但我们知道好吃难消化，任务不容易完成。炼钢需要平炉或转炉，炼铁需用高炉。就县上的设备条件，莫说炼钢，即使建座高炉炼铁也难似上天。显然这明明是个火坑，硬逼我们往里跳。但我们都不想被活活烧死，只好讨论怎么办。我们必须先收集资料，然后进行分析，制定方案。我们向朱局长做了汇报，请他尽快找来近一个月的《人民日报》、各省的省报，一句话，凡登有炼铁消息的报刊都要。“大跃进”年代，领导的行动也很迅速，不过个把小时，几大摞报刊杂志送到跟前。从中央到省地县，所有的宣传报道都围绕着大炼钢铁这个中心转。有关炼铁炉，各地发明的种类多得很，有小高炉、小土炉、小平炉、自然吸风炉……有的炼铁炉还附有构造尺寸图，加上文字说明。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炉子，我们直到天亮才读完，如同读了一夜的“天书”。

就我们已有的知识，其中百分之九十九我们不相信它是科学；更谈不上发明创造。从这些方法和图纸来看，其中大约包含了人类社会铁器时代到来之前探索炼铁方法的全过程，却唯独没有铁器时代以后炼铁术的发展演变经验。不用焦炭，不用鼓风机，没有添加熔剂——造渣材料石灰石，无法达到千度高温；如此，铁矿石熔化不了，如何炼得出铁来？我们一眼就能窥出其方法的荒谬。只不过，事到如今，谁还敢怀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

科学复古，大张旗鼓。我们不愿复古得太远，更不愿回到史前社会。任何人都可以去搞发明，我们不敢。我们没有政治本钱，且科学良心尚存，我们的处境很难。

从上百种炼铁方法中，我们只筛选出了两种小高炉，认为有些道理，可以参考。最终我们决定，以书本上的高炉结构和方法为主，结合筛选出的小高炉加以简化，建一座试验高炉。

方案得到张十存书记认可，我们四个人分工合作，两位物理系的负责建试验炉，柴和我负责找矿和化验。

全县的能工巧匠很快调集到一起，县农机厂、木器厂、砖瓦厂、电厂全力以赴。试验炉建在县城西关原县农机厂厂址上，建炉工地上拉起长长的红布条幅，上书斗大金字：“苦战五昼夜，誓死拿下试验炉！”工地上人流涌动，人们立即挖坑竖杆架线，装变压器安马达。又有人和泥拉砖砌炉子，更多的人在运矿石，砸矿石和石灰石。工地上的人们都是一路小跑着干活。

我们四人更紧张，办公与设计都在现场。依据化学反应方程式，我们要计算出原料配比、炉体总容量、炉膛容量、炉膛燃烧面积、焦炭的燃烧热、电动机功率和鼓风机的转速以及进风量等等。最头疼的是炉温能达到的高度，它是最关键的。而炉温与焦炭质量——燃烧热与单位时间投入量有关，与炉膛燃烧面积和风量马达功率、鼓风机转速有关，又与炉体结构——保温状况等多种变量有关。炉温是多个变量的函数，关键是我们知之甚少或一窍不通，结果我们却成了这儿的权威了，这是多么荒唐。没有人可以求教，又没有相关的理论书籍可以找来一读。我们像热锅上的蚂蚁，比任何人都惶恐不安。我们只能期望炉子点火后不断测温，及时调控。张开锡与苗庆久在泥瓦匠跟前来回奔波，拿着皮尺、钢卷尺不停地丈量着。

我们太幼稚了，其实我们才不是什么权威，真正的权威是县委书记张十存。在修建试验炉的日日夜夜里，他亲临一线挂帅，熬得眼球充血，实在困得不行，就与我们一道在炉旁的麦草堆中和衣而卧。即使在这时，还有人不断来请示：“焦炭只有一点点，再弄不到怎么办？”“用煤代。”“砌炉膛没有耐火砖，怎么办？”“用

普通砖代，难道活人还叫尿憋死！”“没有保温隔热的石棉，咋办？”“那就免了吧。”

第一书记一言九鼎，尽管在我们的方案将所需材料写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也答应了的，如今全变了。我们就在他身边，他丝毫没打算征求意见。他的指示斩钉截铁，我们明白了，他拿我们当棋子，我们是他事先备好的替罪羊。想起这个后果，令人不寒而栗，浑身起鸡皮疙瘩。

人的行为常常是矛盾的，张十存对我们的态度尤其如此。生活上我们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县委特地请来一位上海厨师，顿顿美味佳肴，绝大多数时候由张书记陪着就餐。其时我们疲惫到连走路都打瞌睡，精神也极度紧张，食而不知其味。面对眼前美食，竟会想到死囚行刑前吃“诀饭”的情景。

小高炉竖立起来，开始点火。马达、鼓风机昼夜轰鸣。不论成功与失败，炉子有了，这算是告一段落。

拿着地质锤，背着帆布包，柴志德和我每天到矿上去采一次矿样；后来是隔天去一次。铁矿距县城不远，先过渭河桥，再从县医院西侧的杜家垅进沟。这沟叫令家沟？我记不清了。从那里一直沿缓坡上去，不过十几华里路。一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少都是弯腰弓背的，年长的约莫六十多，年幼的只有十来岁。十里盘岩路拥挤不堪，人们情绪高昂，山歌飞扬。这时，也只有在这时，我忽然发现地里的庄稼早已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本应是龙口夺食的季节，现在却喧宾夺主，队里只剩下挪不动窝的老人和幼童，农人一年的血汗都撒到地里了。我心里道：“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来年农民吃什么？”

处理完矿样，老柴和我正在化验，朱局长陪着第一书记闯进门来。张书记兴高采烈地说道：“呵！你们这里的瓶瓶罐罐真不少呀！”弄得老柴和我面面相觑，他连试管、试剂瓶的名称都不知道，我们也只好对他打个哈哈。

几天来，晚饭后照例是背煤。这是张书记的命令，全县干部都得执行。干部都要背煤，我们四人岂敢偷懒，他亲自在西关过磅验

收哩。煤在武山车站（陈家门），距县城约四华里。煤是由外地用火车拉来的，卸在路基边斜坡上，块煤极少，多是细末状的渣煤。我们糊里糊涂刨上一背斗，背上就走。在午夜十二点前一般能背三趟，每次六七十斤。这背煤的活于我也够呛，背得太少怕人说投机耍奸；背得重了，体弱吃力，胳膊勒得发麻。途中又无歇脚之处，要歇只得卸下背斗。可要再将背斗背起却非易事，必须双膝跪地才爬得起来，每每要挣扎再三，拿出吃奶的气力。比较而言，我还是愿干这种最简单的力气活，多流些汗，无精神负担。脑力劳动虽轻，要承担巨大责任，时时有祸从天降之虞。

陈家门到县城之间有条沟，两边全是麦地，直达渭河岸边。麦地里，小麦粒都落在地上，麦秆竖着，好似一片黄纱帐。在“钢铁元帅”大发威时节，少数干部仍乘着夜色躲到里面去抽烟或聊天，然后睡上一觉。直到午夜，这些干部才背上一背斗煤回去点卯。十二点前不敢回机关，那样会露马脚。任何时候都有贼得很的人，也有老实过头之人。

六、大炼钢铁续篇

试验炉成功与否不得而知。工业局化验室没有定量分析设备，送走的“样品”我们四人都不曾经手、没有看到。依我判断，多少有些低品位的烧结铁炼了出来，就该谢天谢地了。

不两日，化验结果回来。天呐，样品居然是用红绸布裹着的一块长条形烧结铁，它锃亮，熠熠发光。这是试验炉出来的？我目瞪口呆，不敢想象。中共武山县委在西关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我们四个人均未得到邀请。不与会更好，我们心中可以少些愧疚，少担干系；心头的重石终于落地。

祝捷会后我们即被告知，武山县的大炼钢铁将全线铺开。县内再分划三个战区，一战区在西关原地址，留两位同学；二战区在甘谷，去一个同学；我到三战区漳县，明天即令启程。

我内心忐忑不安，如果用试验炉炼铁，建试验炉的任务将落在

我一人身上，我担心自己不堪重任。

天刚亮，我正在收拾行装：一个中年人走到我跟前，自我介绍：“我叫董明儒，原在县农科所工作。奉县委指示，来当你的助手，请多指教。”他向我伸出一双肥厚的大手。我点头微笑，表示欢迎。他随手从挎包里掏出一件东西给我看，这是面红旗，上书“武山县钢铁指挥部第三战区化验队”。他告诉我，昨天他接到通知，立即请人连夜赶制了红旗。有了它，会给我们工作带来许多方便。看得出，他是个有社会阅历且有心计的人。

由武山到陇西东铺，乘火车用了一个小时。而这里离漳县还有七十华里，我发愁当天难以赶到漳县报到。董似乎胸有成竹，他不慌不忙地找来一根长竹竿，将随身所带的红旗挂上；然后他高高举起红旗，拉我到了大路口。公路上过往车辆不少，董见一辆拦一辆，气壮如牛地问道：“你的车去哪？”果然有一辆卡车要往三岔镇、岷县方向去。他摇着手上的旗，用老师向学生发问的口吻对司机道：“你知道钢铁元帅吗？”“知道。”“我们是钢铁指挥部的，有紧急任务，请把我俩捎到漳县。”司机嗫嚅着只好同意。驾驶室还能坐一人，董一把将我推进驾驶室，自己飞快地跳到车斗里。

此时已经 11 月光景，早上下了霜，天气很冷。我很感谢他的照顾，按理他比我年长该坐驾驶室。我毫不迟疑将短大衣脱下来，摺给了他。

汽车在无路的河床里颠簸，七上八下，我的头几次磕碰到驾驶舱的顶盖。七十华里的路，汽车跑了三四个小时；直到下午三时我们才到指挥部报了到。我俩被安置在原漳县县委招待所，董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房门边贴出“钢铁指挥部化验队”的牌子。

县城只有一条主街，长不到二百米，面积不及南方的区镇。一端是县医院，医院后是陡峭的大山；另一端是原漳县中学，此时改名为武山县第三中学。主街连着唯一的一条公路，是通往三岔镇的。三岔是交通枢纽，那儿有汽车可达岷县、陇西等地。漳县估计因漳河得名，漳河离县城只有里把路，中间隔些田亩农舍。董充当我的向导，不停地指指点点，向我介绍漳县的一些情况；我却觉得索然

无味。不到一刻钟工夫，我们已经走遍了县城。除县委、县政府、医院、中学之外，街上看不到楼房。到处是破旧的矮屋，看上去简陋、黑乎乎的。路上行人稀少，给我落后荒凉之感。

我们最后溜达到中学对面的河滩前，这儿人流涌动，与街面的冷清截然不同。走近一看，原来是电厂工人正忙着挖坑架线，还有许多人忙着木工活。据电工说，今晚十点这河滩必须灯火通明，这是钢铁指挥部下达的命令。一句话提醒了董明儒，他对我说：“我们赶快回招待所，肯定有会，有任务布置下来。”我俩赶回招待所，果如董所料，会议已进行了一段时间。一位领导（副书记？）正在讲话，见我俩进来，冲着董板起脸孔道：“现在是火烧眉毛的时候，不是游山玩景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坚守岗位，免得找不到人，误事！你们现在去中学借化验所需仪器，明天一早去李家沟采矿样，要将化验结果尽快报到指挥部。”

原以为将东关试验炉推而广之，如今只是采矿样化验，我感到如释重负，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头头硬邦邦继续道：“农机厂、木器厂、工艺厂、电厂，除电厂留人值班，其余人全到河滩钢铁基地上班，不能缺席，也不能请假！”

我们从中学借得必需的仪器和试剂，又打点准备好第二天上山的工具，直到夜深才上床休息。我俩已受到警告，再不敢有半点懈怠。

漳河冬季流量很小，大致似老家的东门小港。令我惊奇的是，河水清澈如镜，一望到底，这与家乡的修河一样，使我顿感亲切。河上架着最原始的桥，几组木棍叉支着，上面铺垫了一些树枝。河对岸是片颇开阔的川地，树木、农舍错落有致。再往西行，河川逐渐变窄。那儿有个颇大的村庄，道路由村中穿过，路两旁有饭馆和卖日杂的小店铺。由此向前不远，我们拐进北面山沟，此即李家沟。沿沟而上，不多远便是矿点。矿点四周已挤满喧闹的人群，全是青壮年劳力，他们正在用铁锤、钢钎、镐锹挖矿石。

矿点不大，分上、中、下三层。我们从东、南、西、北四个不同方位取样，共取了十二个矿样。我指哪儿，董的小铁锤就落到哪

儿，他很尽职尽责。只一个时辰的样子，我们便完成了取样任务。归途中可见，此时满山沟、满河川都是浩浩荡荡的运矿石大军，绝大多数人都用背斗背，偶尔也能见到有人用毛驴驮着矿石。

回到住所，我俩马不停蹄地安装仪器，处理样品，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多才写好实验报告。老董忙不迭地拿了就往指挥部跑，我正打算躺下稍事休息，他气咻咻转回头对我说：“还是一起去吧，若头头问话，我不懂，难回话。”

我们一起到了指挥部，递上报告单，这位“第三战区钢铁总指挥”只瞟了一眼，便朝着我问道：“那儿的石头里含铁，是吧？”他随手把报告单塞进抽屉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我明白了，他们并不需要化验。在此之前，人们已经在挖矿石，也将矿石源源不断地往外运了。领导需要的，充其量就是验证铁元素的存在，仅此而已。

我信步踱到河滩工地，仅一天时间，这里的变化令我瞠目，工地上简直比赶庙会还热闹，灯火亮如白昼，数不清的三角小彩旗系在绳索上，飘在工地中央和四周。十几只如同鸡厩的炼铁土炉一字儿排开，每只炉子连着一个鼓风机，鼓风机由大木轮带动三角皮带；数个年轻社员摇着一个木轮。女社员围在小山般的矿石堆前，一边砸矿石，一边与摇木轮的男社员“漫花儿”。“漫”是“唱”的意思，“花儿”是西北流行的高腔民歌；男女老幼皆会。人堆中有电工、木工、钳工来回穿梭，推着手推车输运矿石的人流往来不断。鼓风机的“呜呜”声、砸矿石的“噼啪”声、此起彼伏的歌声汇成了“大跃进”的奏鸣曲，响彻夜空。

我立在离人群较远的黑暗中，并未受到这热情之火的太多感染。相反，我的心情复杂而沉重。冬季的寒夜，冷气袭来，由不得浑身打了一个寒颤，便折身往回走。

路过中学门前，里面的强光吸引了我。近前一看，一间大屋里蹲着许多中、老年妇女，她们用煤灰和着铁矿粉，捏成如拳头大小的团团，尔后把它们装进土罐里。我忽然想起报上介绍的“罐式炼铁法”，没想到竟如此神速地传到了这里。但我断定，这是不可能

有真正的结果的。

躺在床上，被窝里暖和，我却睡不着。偌大中国，科技人员总有数十万众，却没一个人敢站出来大喝一声：这种蠢事干不得！

屋外朔风呼啸，山歌阵阵传来。自奉召大炼钢铁以来，我和我的几个同学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寝食难安。原以为他们启用我们，缘于崇尚科学，现在才悟出了，这不过要用所谓“名牌大学生”的名义去做挡箭牌，堵住世人的嘴。谁还怀疑武山炼铁的科学性呢？小学教员出身的二位张姓领导，解放后才参加工作，短短几年工夫就入了党，爬上了父母官的高位。他们深谙为官之道，如今他们手中又多了四只猴子，平添了耍猴赚钱的工具。这几只猴早戴上了紧箍咒，他们想怎么耍就怎么耍。我们的小命攥在人家手里，竟也干上了助纣为虐的勾当。此时此刻，如果跳出来说实话，谁个相信？能扭转乾坤？实在太可笑，只能白白送掉小命。离校时，好友们的诤言犹在耳旁。

罢，罢，罢。

七、“命令”原是恶作剧

辗转反侧，刚入梦境，董明儒跑来敲门。他对我说：“看来，需要我们办的事不多。我家在贵清，离城四十里，有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想回去看看。多则三日，少则两天，请你给个方便。”我当即答应了他，自己留下来应付。

董也是小学教员出身，调农科所工作后，曾去某农校接受过短期培训。他不再像找我报到时那样兴高采烈，他也看出了所谓化验队原来是聋子的耳朵，可有可无。

我每隔一日便上山到矿点取样，回来做铁元素定性化验。在这“大跃进”一日千里的日子里，我竟掉到空隙里，成了无事可做、无人问津的闲人。我不愿浪费时光，乐得读起随身所带的书籍。

每天一大早，我便到离炼铁基地约五百公尺的漳河上游岸边，在那里做早操，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朗读外语。当我完成功课打算

返回住所时，不意发现在我不远处，有个人佝偻着身子，低头在地上寻寻觅觅。直到走近前去我才发现，这是位头发花白、年过六旬的老人。他光着头，两眉和上髭被呼出的热气染成白霜，鼻头和脸颊冻得通红。他上身穿件露絮的破袄，袄上披了一条破麻袋；腰上系着一根草绳，下身只穿了条破单裤，脚上穿的是生牛皮窝窝——它算不上鞋，我不知该叫它什么，只好用“窝窝”替代。“窝窝”里垫的麦草，有的麦草秆直伸到他的裤脚处。我见老人瑟瑟发抖，不停地搓手顿足，脊背上的空背斗摇来晃去。显然，他的手、脚乃至全身都快冻僵了。我弯身勾头贴到他面前问：“老大爷，您在找什么呢？我能帮您吗？”他这才发现我，略略直起身子，颤颤地道：“这天气真冷呵！衣服太单，肚里又空。不瞒你说，真有些熬不住了，想在这土豆地里寻点填肚皮的东西。”这位额上、脸上全是沟壑的老者，有双特别慈祥、清澄的眼睛，他比我的父亲还年长，我的心一下子紧缩了，有一股热流在胸中涌动。看到老人眼下如此恹惶，我忙对老人道：“大爷，请在此等我，不要走远了，我一会儿就回来。”我一路小跑从住处拿来一套绿色绒衣裤、一双毛袜和从灶上打来的两个热馒头，塞到他怀里。一句话没说，我扭头回来。我不忍心再看老人的模样，更不忍听他说感激的话。

那套绒衣是姐姐从北京寄我的，尚未沾身。离校前冯君等为我张罗的御寒衣物绰绰有余。调来参加会战时，头头曾提出给我们每人缝制一件大衣，我们婉拒了。现在想来还是该接受的，将它披在老人身上多好。我感到抱歉的是，没能给老人一双鞋。我原有一双布鞋、一双球鞋，早穿破扔了；现只有两双半新皮鞋轮换着穿。

我并非事后诸葛亮，从食堂化开始的那天，我心里就嘀咕：只怕长不了。穷吃滥喝，人人都怕吃亏。吃饭成了竞赛，一天至少吃掉平时两三天的粮。原以为能支撑一年半载，谁知才过了三个月，便已是穷途末路。

老董在家只待了两天，他捎给我一大挎包果子，并郑重其事地说：“都是给你的。”这果子原来是小梨，个儿小，黄澄澄的，味道不错。我很感谢他的好意。初与他相处时，我心怀戒备，多一句

话也不说。经过五七年的教训，我很怀疑他是上边派来监督改造我的。日子一长，才知他性格沉稳，嘴里话少，眼里有活，手勤脚勤。凡较笨重的体力活，他都抢着干，不让我插手，对我甚关怀体贴。只是他干细活有些毛手毛脚，有次滴定化验时，失手把滴定管碰成两截。当时他紧张得了不得，我没有责怪他，反而安慰了他。从此他视我为知己，交谈也多起来。我觉得他其实有头脑，也不乏正义感。有一次，他试探着问我：“这种搞法真的能炼出铁来吗？”我没有正面答复他。他自言自语道：“即使矿石里含有再多的铁，如果不熔化，铁如何出来？如今只把矿石烤烤，离熔化还远着哩。”他的话切中要害。我向他浅显地解释了由铁矿石变铁的主要机理和化学反应，他听得很认真。好像听懂了一些，他颇为激动地说：“这里没有焦炭，用的是沫子煤、草炭，有好多地方用的是柴草，或者砍树当柴烧。莫说一千多度，恐怕两三百度也不到。用手摸摸土炉的外壳，分明凉凉的。一千多度连砖也会熔化，所以要用耐火砖砌炉子。眼睁睁瞎胡闹，怎么就没人出来说句话呢？”我平静地问：“谁敢向群众运动头上泼冷水？谁敢反对毛主席‘以钢为纲、大炼钢铁’的指示？现在还有这样的傻瓜？”

我们不仅是炼钢铁的见证人，还是参加者。老董比我耳朵灵，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他向我敞开心扉。他谈到的情况，此前我是闻所未闻，同时也令我茅塞顿开。

食堂化以后，农家的铁锅、锅铲派不上用场，为完成炼铁指标，干部挨家挨户强行将农民的铁锅摔成碎片，将农家箱柜上的锁头、锁扣以及门上的门扣拔除，有多少老妇哭哭啼啼地哀求，有多少农民拉拉扯扯地抗争，一切全不中用。

为解决燃料缺乏，无数树木遭到砍伐。山坡、河川、道路两旁，树桩比比皆是，大地犹如长满疮痍，满目疮痍。大炼钢铁对森林资源、植被的破坏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有的地方竟以山坳为炉，将无数砍倒的树木铺垫其下，上置矿石，燃至盈月。而到最后，林木燃尽，矿石上也只留得一些烟熏火燎的痕迹。他告诉我，这事发生在甘肃陇南某县。

我无话可说。

在第三战区钢铁任务即将“告捷”的时候（不知这任务是用何法度量计算的），指挥部来人通知我：县委一把手来电话，要你亲自去接。我十分惊恐，不知何时又有大祸临头。战战兢兢跑过去，电话里一个颇熟悉的声音命令道：“你今晚赶回县委，具体任务等你回来再告诉你。”

我立即到厨房打了四个馒头，将几件衣服几本书塞进挎包，急匆匆地上路了。老董送我爬上医院背后的大山顶才回，这时我背上已是汗水涔涔，气喘吁吁。随后又是下坡，上坡。高一脚低一脚，我在河沟与山梁上行进，走的全是羊肠小道、沟沟坎坎。我穿着皮鞋，很难走。约莫走了两小时，来到三岔口，不知该走哪条道，只得拐到临近村庄问路。村庄里全是老翁、老妪或稚童，皆摇头不知。所有醒事的人全去炼铁了，真急煞人。无法可想，只能猜着走，错了折回重走。直到翻过一道山梁，看到一个叫绿林饭店的歇处，才知道这儿已是陇西地界。一打听，不过走了三十里路。此时，残阳坠落，暮色降临，我吃了两个馒头喝了水，立即接着赶路。

绿林饭店到东铺没有岔路，山岭上有一条羊肠小道，两旁是深沟。山上多是半人高的枯草、棘蓬，有些灌木丛，间或有一二乔木。听饭店老板说，这荒山有狼，近来发生过伤人事故。我便加快了步伐，几乎是一路小跑。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四周一片模糊，淡淡的月光照下来，眼前一条白道道，一阵暗，一阵黑，无法分辨哪里是坑，哪里是坎。我几次被绊倒在地上，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又跑。最不争气的是那双鞋，皮鞋后跟错位，钉子扎进了脚后跟，剧痛。用手一摸，黏乎乎的，我只得狠狠地将鞋后跟拔掉。山风阵阵，风吹草动，担心有饿狼扑出，我浑身不住地冒冷汗。就这样跌跌撞撞，磕磕碰碰，周身伤痕。大约半夜时分，终于看见了东铺的闪烁灯光。

由山嘴下得山来，踏上东铺到陇西县城的汽车路。这里离东铺火车站约有四五华里光景。我原先像只充足气的皮球，谁料一到公路上气全跑了，人也蔫了，瘫了。我又饥又渴，只觉得浑身疼痛一

齐发作，身体竟成一团烂肉，全无筋骨支撑。我一头栽倒在公路上，再也撑不起来。公路上不时有汽车呼啸而过，一道道白光照到我身上，扬起的沙土溅到我脸上。躺了一阵，我试探着站起来，一阵剧痛又使我扑倒在地。我掏出一个馒头就着果子吃了，方觉好些。今天就要过去，如来佛已在念紧箍咒，头皮在发紧发麻。我的两条腿似铁砣般沉，脚痛得不能沾地。我必须拿出全部意志力，一边走，一边数着路边的电线杆：不走完两个杆坚决不停歇。那时已经很难说是在走，站不住的时候只能爬行。

五华里的平坦大道，我走完它足足花了三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火车站，大约凌晨三点多，我乘上了东去的列车。上车后，好不容易才脱掉皮鞋，褪了袜子，我这才发现两脚全是血泡，右脚被钉子戳了个大洞，血仍在殷殷地流，两脚都已发炎，肿得像两只棒槌，身上的衣裤多处被扯破撕烂。

我记不得是爬还是走进县委大门的，那已是第二天的八九点钟。第一把手见了我，惊讶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咋弄成这等模样了？”我有气无力，断断续续向他汇报了经过。他听完汇报，严肃地说：“很好嘛，你经受住了一次考验。看来，你执行党委的指示是认真、坚决的。叫你回来是商讨筹建县科学院的事，你先看病上药，洗澡理发，好好休息两天，我们再开会讨论。”

好一个“考验”，他一句话何止是叫我脱了一层皮，几乎是要了我的命。我实在太幼稚，易上当受骗又胆小如鼠。“整社大辩论”让我吓破了胆，我已是无胆之人，哪敢冒险抗命？

八、“地质矿产普查队”

筹建县科院，这是真的吗？我们几个想都不敢想，但县委决定却是真真切切的。在讨论实施方案时，我们应邀列席。与会者个个豪气冲天，尤其二位张姓领导，更是趾高气扬。我们不吭声，大致能揣摩到他们的心思，无非又要一鸣惊人了。

柴和我受命给县科院中心化验室造计划，估算经费。这任务不

算困难，我们搬出大学教科书，开列出仪器、试剂的名称、数量和规格。只用三天时间，一份长达数十页的计划便交卷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没几天又接到新指令，要我尽快回到漳县，对该地区的地质矿产资源进行普查，我助手兼向导仍是董明儒。

天啊，在他们心目中，我居然成了无所不会的万能博士。我才勉强读完大二，有两三门功课未及考试就被赶下农村。我知道自己学识贫乏，更不用说，隔行如隔山，我对地质矿产一无所知。欲哭无泪，一个戴罪劳动考察的右派，敢不接受党委的命令？

我用了一整天时间跑完武山一中图书馆，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天上午我去到县的新华书店，没想到这里竟有《地质学》与《矿产普查》两本书。我如获至宝，欣喜不已。

大炼钢铁结束了，我们也变了旗帜。现在我们的旗上写着：武山县地质矿产资源普查队。我和董明儒先到了离城三四里的盐井，据说这里熬的盐特香，远近闻名。我们仔细观看了熬盐的全过程，取了样品。接着又到三岔镇，听说离镇不远有座山出冰晶石矿（六氟铝酸钠或钡盐），需取样化验。

从山上下来，一回到住处，我便忙不迭地翻书，对照样品观察。老董劝我歇着，我对他苦笑：“从百分之百的外行变内行，有几万里路要走。我恨不能成杨戩用三只眼读书，我们指望这两本书活命了。”

1959年2月，春寒料峭，北风凛冽，乡间行人绝迹。正是农民休养生息的日子，我和老董却要上路。我们坐着牛车去贵清、石川。路，甭说多难走，在崎岖的山间小道上，一摇三晃。老牛颈上的铃铛不停地响，有时几乎把我从牛车上摇下来。太颠了，我时时下来步行，直到天将黑才到贵清镇。

贵清镇位于石川、草滩和漳县的交通路口，有百十户人家。三岔路口即贵清镇的十字街心，此地正中有棵硕大的老树，树枝伸展开来，像把巨伞。时值黄昏，鸟儿归巢，无数乌鸦在空中盘旋咕噪。我从未见过如此庞大壮观的鸦阵，脑中不禁跳出马致远的《秋思》中的情景。枯藤老树昏鸦，古道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那些词

句好像专为我而写，心中不禁涌出对故乡的思念。我该给父亲写信致一声问候，还有××姑娘，也该给她一些讯息。

贵清管理区在离街不远的公路边，那儿有个大院。公路对面是个麦场，周围有土墙围着。接待我俩的是位年轻媳妇，看岁数她年长我四五岁，颇有姿色。她看了介绍信，满面春风道：“我是妇女主任，欢迎你们光临。我们书记和主任都到县上开四级干部会去了，管理区暂由我负责。你们有何要求尽管提出，一定尽力。”老董把她叫到一边，从他的表情可以猜出，他在介绍我的情况，介绍中还有吹嘘。老董的家就在小镇附近，晚上他要回家去住。

老董一走，我的形象似乎顿时高大起来。妇女主任派来人为我烧洗澡水，烧好炕，又安排伙房为我备饭，俨然敬神一般。她安排我住在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的外间有电话、办公桌、文件柜，我则住在里间。她又从别处抱来了干净、鲜艳的被褥和枕头，我估计是从新婚家庭中借来的。看她忙得七七八八，我很过意不去。晚饭是白面片，外加一碗红烧羊肉。她告诉我她已用过饭，却并不离开桌面，而是在一旁看着我吃，帮我调酱油、醋和辣子。她见我斯文，又给我夹菜。伙房师傅事先若不知情况，定会拿我当成她的亲弟弟哩。她对我说，像你这样的稀客，过去我们是摆席招待的。如今不瞒你说，管理区家底空了，我们很困难，细米白面和肉类都只剩得一点点，留着专门接待上边来的领导。不是舍不得，委实再拿不出别的东西，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一碗羊肉，她和厨师没沾牙，已经尽心尽力了。而我原本是受之有愧的，她要知道我是右派，还会如此对我吗？

断黑后，天气异常阴沉。风吹到院里，卷进片片落叶。洗过澡无事可干，我早早躺下看书。盖着一床大红缎被，图案是两只耍欢的大凤凰，色彩非常绚丽。枕头是绣花的，做工很精细；蓝格单人床单也是新的。只是火炕烧得太热，我有点承受不了。

九点光景，我正在读《地质学》，电话铃响了。女主任急急跑来，我能隐隐听到外间电话中的对话。

套间门没有锁头，灯亮着。女主人估计我没睡，径直进来坐在

炕沿上对我说：“事不凑巧，今晚上很可能要打搅你休息。刚才书记来电话，县上‘四干’（*四级干部会）会结束，干部要连夜赶回来。大约凌晨两点，他们路过我们管理区。与会干部要看看我们区广大社员的劳动干劲。书记要求在各山头、路口布置社员挑灯夜战，还要有山歌唱和。他要我紧急动员，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凡行动迟缓者要以白旗对待，绝不姑息。”其实电话内容我已听到个八九不离十，不知她为何要如此详细地告知我，我只得诺诺应付。

她在外间不停地摇电话，银铃般的嗓音又尖又脆。她逐一给各生产大队通话，对下属不禁用着命令的口气，有时竟是吼叫。她要各大队立即通知生产队的主要领导，十一时准时到管理区大院开会。凡不按时到会者，后果自负。她语气威严得很，不容置辩。

看了一阵书，火炕虽烫，仍昏昏而睡。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地被一声喊声惊醒。院子里有“噗噗嗵嗵”的响声，好奇心驱使我披衣下床，想看个究竟。刚打开门，风裹着雪花掀门而入，我连忙退回里间，系好衣扣又加条围巾，才踱出门外。

从饭厅牵出两个大灯泡，明晃晃地朝院子照着。天空中正飘着鹅毛大雪，雪片在一群人的头顶漫舞，风在四处怒吼。风雪中的这群人有二三十个，围成不规则的圆圈，每人头上都冒着热气。圈中站着两个人，看不清面孔，两人都耷拉着头。女主任正发作雷霆之怒：“为什么迟到？电话里通知十一点准时开会，你俩偏十一点半才到，是不是对党不满，故意消极对抗？说！”其他人一齐喝道：“说！老实交代！”那两个嗫嗫嚅嚅，其中一个道：“我路远，要翻两座山头。”女主任尖声道：“嘿，你倒有理了，路远不晓得笨鸟先飞一步，不晓得路上跑快点！行动军事化你不懂？你是有意捣乱，有心给我们管理区脸上抹黑！大家看怎么办？”群起呐喊：“斗他！拔他白旗！”四周的人动起手来，将白旗人物猛力推向东。未待他站稳，东边的人又将他推向西。东南西北的推搡，被称为白旗的人前仰后合，摇晃翘翘。群众的推搡中还夹了些暗算拳脚，不几个回合，这一位就像装满粮食的口袋一样，“咚”的一声沉重倒地。另一位还算幸运，没吃拳脚，只被人“呸！呸！”吐了一脸痰唾。

白旗拔掉，红旗竖起。女主任命令：“现在大家立即回去布置。午夜一点，各山头、路口必须灯火通明！社员都要出动，要唱山歌。各队要开展竞赛，比干劲，比谁的歌声更响亮。还要评比，名次在前的受表扬奖励，排在最后的，要拔队长的白旗，散会！”

若不是亲见，我不会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是真的。我对女主任的第一印象原本不坏，她待我热情周到，却没想到她还有另一副面孔。她肯定误以为我是上边派来的人，所以周到奉迎；而对普通老百姓却如此专横霸道，而且凶狠。我知道她自己的能力并不足以使她拥有这权威，而是有种更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撑着她。我怔怔地发呆胡想着。

会散了，社员们也已散去。雪下得更大了，透过灯光看去，满院重重雾气。远望天地一色，黑洞洞一片混沌。雪花打着旋儿飘落在脸上，也令我起伏翻腾的心潮逐渐平静下来。

我已了无睡意，便继续读书。

不久，有歌声传来。我看表，尚不到一点。刚才的拔白旗行动显然起到了震慑作用，唱歌的人由少变多，歌声也从弱缓而变得嘹亮起来。我踱出大院，站在大门口的公路上观望，只见远近四处都有火光闪烁，虽看不到社员在干什么，却能从此起彼伏的歌声中，悟到这干劲了。歌声在夜空回荡，一遍遍地重复，高亢却又单调。

我一边看书一边等待，看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一则我想看看这钦差队伍究竟是什么样的，有多大阵仗。二则我想他们可能会先进到这办公室，我还不免要与之寒暄几句。此时若我在睡大觉，似有不恭之嫌。谁知等到四点也没见到他们的影子，很觉扫兴。社员唱了几个小时，嗓子哑了，气力没了，歌声好似哀鸣。我也睡了过去。

一觉醒来，已是九点多。老董早来了，在外间等着，没叫醒我。院里一层颇厚的积雪，伙房只有大师傅，不见女主任的人影。她忙了整个通宵，委实不容易，也该歇歇了。

听伙房师傅说，因大雪封路，开会的干部压根没挪窝，昨夜是白等了。一出几千人大戏，无一观众，却唱了个通宵达旦。

出得管理区大门，白雪皑皑，一片银色世界。大路上的积雪比

院里厚多了。举步不远，看见一幅奇怪的图景：路边生产队的麦场上，满地堆着苞谷棒，地面上撒了不少金黄的苞谷粒。还有小凳、马扎、簸箕、脸盆，横七竖八全浸泡在雪中，一片狼藉。我能想象到的是，听说钦差们不来了，浑身冻得麻木的社员一窝蜂似的奔逃回家。寒冷使他们无心顾及家什，这是多么紧迫的情景呵。

我和老董并排走在松软的雪路上，皮鞋踏进雪里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路上不见一个行人，天上亦无一只飞鸟，正是柳宗元《江雪》中的图景。我俩默默地走着，我的心从不曾如此沉重。

中学时读过杜甫《石壕吏》，如今还能背诵：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过去的吏，现在看来都是些蠢货，捉一个人当兵，还要夜里亲自跑到农家动手动脚。如今数九寒天，无数村民被动员起来，挑灯夜战，只要干部一声命令。不光人作弄人，老天爷也是帮凶，一夜飞雪，不知有多少老人妇孺回家后卧病不起……。

上午十点多，贵清镇家家关门闭户。折腾了一夜，人们都还在沉睡。我们走在去石川的路上，那儿离贵清镇不过二十华里。沿着公路走，很快就到了。

石川风景秀丽，如同我的故乡武宁。这儿的山犹如南国的山，山山葳葳葱葱，云蒸霞蔚。这儿的水也如南国的水，山间流泉悦耳如琴，你会身不由己去捧饮。山上山下安详静谧，连林间小鸟也不畏人。大西北竟有如此宝地，一改我对此地穷山恶水的印象。我看松鼠跳跃，观游鱼嬉戏，仿佛回到了童少年无忧时代……。

贵清和石川都有好山好水，农民勤劳，理当过舒心日子。然而我知道他们的日子很挠心。

九、住病房的日子

1959年的3月底，我突患眼疾，不得不终止任务。我的眼疾还是在大炼钢铁搞试验炉时种的祸根。由于没有防护镜，在观察炉内状况时我被炉渣灼伤了眼角膜。当时并不觉很严重，没有吭声。如

今发作起来，眼睛肿如核桃，不得不治。我先后到县医院、洛门矿泉疗养院诊疗，病情不见好转。4月初我返回兰大，住进了学校的病号室。

病号室设在文科楼前面的一排平房里，它原来是建筑工人的临时住所，极其简陋。好在每个病号单住一间，倒也清静方便。离校近一年，不通讯息，现在好友相见，分外欣喜，彼此交流了别后的经历。我讲了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大家觉得如《天方夜谭》，既新鲜又不可思议。

只在这时我才知道，在校师生遵张仲良之命也去参加了大炼钢铁会战。理科各系悉数到陇南天水武柴乡太碌，那个地方位于葡萄园站与建河站之间；文科各系去引洮工地。化学系年过五旬的左宗杞先生也莫能例外，这位全国分析化学权威，远没有我幸运，她与所有师生一样跋山涉水背矿石，在荒野风餐露宿。冯淑筠君告诉我，矿石在山上，原本无路去采。左先生高度近视，戴副眼镜，身单力薄，莫说背矿，空手也难应付。山下是条河，冯君看不过意，担着风险背左先生过河。吕佩璜年轻，不堪忍受这苦，宁肯不要学籍，跑了，吕绥生送的他。小伙子尚且不堪其苦，左先生的为难可想而知。

左先生是我最崇敬的学者之一，兰大新化学楼是她按照当时世界一流水准亲自主持设计和监督施工的。有一次检查施工质量，她凿开已浇铸水泥的地板，发现钢筋使用规格不符设计要求，执意要施工方返工。大楼竣工验收又因质量未达设计标准，她断然拒绝签字。左先生为此迁怒校方某些权势者，她的品性、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窥一斑得见全豹。

反右期间她受尽羞辱，记得化学楼系办公室外墙走廊上贴着一张针对她的大字报，这是模拟医生给左先生治病的处方；其中写道：心脏在胸右侧，先天性畸形。病因：思想反动、反党夺权。处方：换心换骨。医师×××。

这位“医师”我认得的，化学系某助教，年约三十，人长得一般，嘴唇厚，爱打扮，终日抹着口红。当时抹口红者极少见，故而

我印象深刻。反右时再也编造不出谎言时，有人还要挖空心思去作践别人，这是人性的一大悲哀。

校内同学早已泾渭分明，左、中、右之间隔着鸿沟，老死不相往来。留校的右派同学处境甚至更坏。兰州炼油厂 1958 年冬开挖土方，敷设地下管道工程，沟深至六七米，须将下面的土用筐抬至地面。抬筐时，左派总是选几个身强力壮的人来对付一个右派。他们经常将双筐甚至三筐叠在一起，将筐推向右派的一端。结果，这一端的人便要承受百分之七八十的重量。如果你走在后面，土筐直挪到你的脚跟，无法举步走路；如果你走在前面，脚后跟与土筐咯碰，碰得鲜血直流。左派每抬两三趟，便替换去干装筐的轻活；右派必须一连抬筐四趟才能换班。

我听了感慨万千，照以前又会出口骂人，如今心里愤怒，嘴上不说。想起在联丰社割大麻、锄草时受到社员的照顾，很为自己庆幸。读书人比大老粗毕竟有心计，再恶毒的法子也想得出，做得到。

我住在病号室，唯一的功课就是每日两次去省人民医院，在那里接受碘化钾治疗。为解我寂寞，冯君只要无课就来陪我；或者一上完课就往我这儿跑。有时他一人来，有时其他同学一个两个或者四五个人一齐过来，我这小小病房始终情意浓浓。有次我在医院门诊挂号时偶尔发现，一位挂号女护士，年方十八九岁，相貌肤色奇佳，宛如天仙。我告知诸友，众皆赞不绝口。每当我电疗时，他们就坐在挂号室窗口外的长凳上，像一排和尚观瞻观音菩萨，远远地，默默地眺望着那尊女神。他们不让她发现自己，更不敢惊扰她。呵，尽管我和我的同学属于异类，此时也在豆蔻年华，春心荡漾。即使在非人的处境里，心灵依然不乏对美的憧憬和爱的激情。这位不知名的姑娘是幸福的，她怎能想到有如此一群朝觐者对她的痴迷倾慕呢？青春是美好的，永远值得回味和留恋。

兰大的生活已今非昔比，食堂早就是定量供应。主食杂粮多，细粮少；百分之七十的杂粮多为玉米面，蒸出的馒头黄惨惨的。有时食堂将玉米面蒸成发糕，有甜味，还算可口。只是定量标准低，包括女生在内都不能饱腹。尤其是副食很糟，菜肴少见油花。肉食

有时一周难得一见，偶有荤腥供应，膳食科事先要张贴《号外》。师生得知顾不得上课，蜂拥而至。倏忽间，人们排出长队，那弯弯曲曲的长蛇阵总有两三百米。排在前面是幸运的，排在后面的站了两三个小时，腰酸腿胀脚发麻，结果却是锅空盆罄。失望之余只得暗吞津唾怏怏而归，无人敢发一句牢骚。

有一天，校园锣鼓震天，招来众多师生围观。原来兰大伙房的炊事员放了一个大卫星：一斤苞谷面居然制作出七斤发糕！炊事员抬着大红喜报和一幅醒目的招贴画，画面上的两个炊事员头戴白高帽，身着白大褂，红光满面地抬着一簸箕盆大的发糕，去向中共甘肃省委报喜。师生面露菜色，和者甚寡。我心里想，一斤苞谷面所含蛋白质、淀粉、脂肪、各种维生素都是定值，产生多少热量也是定值，即使制出一万斤发糕来，并不能增加一丝一毫养分。这种发明再多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劳民伤财。不幸的是，这事竟发生在大学校园，离“愚人堂”只有一步之遥了。我看到同学们吃饭的家什，由小碗变为大碗，由大碗变为盆；食器虽大，饥饿感有增无减。最严重的1960年春，据说学生每餐是一盆菜糊糊，其中所谓菜有时是野菜甚至树叶。

操场上已不见体育活动的矫健身影，连过去那些咋咋呼呼、颐指气使的人们也少了过去的骄横，发蔫了。

光靠学生食堂已难以为继，我们几个人又囊中羞涩。只有翟所迪家中的境况较好，偶尔他做东，邀我们到街上饭馆吃一顿。市面百货匮乏，尤其是进口货奇缺；即使有也很贵。衣衫褴褛的农民沿街乞讨，随处可见。饭馆里供应的是所谓“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主食有二两一个的“银裹金”，此物外表是白面，里面是玉米面。饭堂里拥挤着乞讨的老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向你伸出脏黑而干瘪的手，眼里流露出苦涩和无奈。看着饥饿的求乞者，食客又怎么吃得下去？不等客人离座，乞食者便拿走碗和盘碟，用舌头将残羹剩汤舔个干干净净。

没有1957年的反右，“一言堂”不会来得这么快。没有吹牛皮的大比拼，眼下的这一切以及随后的全国性大饥谨也就不会发生。

我和我的几位同学对此都有深切的认识，只是我们从不议论这些。

治疗一月，眼角膜伤口基本愈合。但我左眼的视力依然严重减弱，从一点五下降到了零点二。医生说，以后多少还能恢复些，斑痕块不大，相貌无碍。

大炼钢铁运动终于过去，在我的心灵和肉体上都留下了时代的创痕。

第四章 求索之路

一、“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1959年5月，武山县城，到处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他们无钱乘车，只能一路向西，目的地是新疆。尽管各地已是一片肃杀，“大跃进”的鼓点非但不停，竟越擂越响了。此时又有花样翻新，新的口号是：社办工业，遍地开花。

任务早布置下来，叫我们四个人去搞社办工厂。就在我回校治病的一个月时间里，柴、张、苗三人已在杜家垌办起一个“化工厂”。为了方便我养病，他们三人要我在这厂里看家坐镇，他们则去县城东边十里许的上街子那儿，要再筹建一个新厂。

我很感激诸学长对我的照顾，但是，我到杜家垌厂里一看，心简直凉得发颤。天呐，这是个什么玩意？胡日鬼竟至于此，这是谁的馊主意？

杜家垌是个好地方，它位于渭河北岸，与武山县城隔河相望，两地相距不过一华里。渭河上有大桥相通，由一条大马路过桥，可以直达县医院。杜家垌就在医院西侧，四周林木掩映，景色宜人。厂址在一个四合院里，四面有一人多高的土围墙，墙外是密密一片杏林。此时杏树郁郁葱葱，花团锦簇。老令介绍说，这儿的杏又大又甜，远近有名。

令队长领我把四合院看了个遍，这里房屋还算齐整，北边正房有高高廊阶，房高屋空，屋里只砌有一个大灶，尚未点火。另有一排东厢房全空着，西房是个贯通的大间，内有一排土炕，炕上有衣被等物，已经住了八九个人。南面下房西头一间是办公室兼卧室，

有个双人土炕，一张桌、一把椅。它的隔壁是间大房，里面放置了十几只大瓦缸，缸上一律覆盖着厚草垫，弥漫出浓浓的尿臊气。来到院子里，可以看到一眼石磨。

老令年约五十，他满脸皱褶，细眯眯的双眼总像在笑，下巴尖削。这是个老实巴交的典型农民，也是党员。他带着十个妇女在此操持，其中有两个十七八的姑娘，其余是年轻媳妇和中年妇女。

办公室的墙上赫然贴着两张大纸，上面写着一串化学反应方程式，我认得是老柴的手笔。柴是我学长，一向受我敬重。他万不该出这个馊主意，胆子太大；我怕这西洋镜被人戳穿。那些方程式不过是纸老虎，其用心是唬人的。柴兄以人尿作为原料，在一定温度下使尿素发酵转变为碳酸铵，然后利用化学平衡移动原理，使粉末石膏微量溶解后于溶液中交换离子，最终通过转化得到硫酸铵化肥。这个过程在理论上或许成立，实践上却无意义，也不可行。因为人尿中尿素的含量微不足道，通过发酵转化成碳铵既慢且难。即使完全得以发酵并交换，所获硫铵的数量依然极其有限。一月两月得到半斤或者一斤硫铵，却要花几百个劳力；从效益上来说是得不偿失。真没想到，我们曾切齿地痛恨瞎胡闹，如今自己竟也胡闹起来。

可是，生米已煮成熟饭，我又能说什么呢？

老令每天早上到城里担尿，又要带劳力到山上寻石膏，挖石膏。他兢兢业业，忙得马不停蹄。他也从来不说任何人，只是以身作则带动大家自觉干活。小院里两个年龄大些的妇女砸着石膏，然后将小粒放到磨盘里再磨成粉末。又有人将粉末倒入大缸尿中浸泡，再盖上草垫，等待发酵与交换。大家轻车熟路，再笨的人一看便会。一切都井井有条，没有什么事需要我来“指导”。我便落得躲在办公室不出门，成天看书，只是隔一天进城一趟，看看书店有无我需要的新书。还有一个必修功课就是到县文化馆，翻翻这两天的《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县文化馆白胡子馆长是贺家店人，搞不清过去干过什么，只知道他属于统战对象，他对我已是很熟悉了。

这期间看报，有篇文章给我留下终身不忘的印象。该文作者是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他提出的观点大意是：地表上的太阳能只要利

用百分之三十，粮食便可以达到亩产四万斤。我看了大吃一惊，难怪“大跃进”牛皮吹上了天，原来是有科学家的“理论”根据呢。我想，如果从科学发展观来看，钱学森的推论也有可能实现，但那只能在是遥远的未来。拿来眼前说事，无疑是为盛行的吹牛浮夸风火上浇油，为毛的反右倾抬轿造势。我感到很悲哀，“三钱”（钱三强、钱学森、钱伟长）曾是我的偶像，如今有的被划为右派，有的堕落成政治帮凶，这是多么可怕又可悲啊！

数理化和外语的专业书读不下去看，大脑如同一团乱麻，心绪糟糕透了。每趟进城都看见一些烦心的事，遇到令我揪心的人。那拖儿带女的逃难人流，其中有的人来自甘谷北山的礼辛公社，有的来自邻县通渭。他们告诉我，公共食堂早已断炊关门，已经饿死不少人。像他们这些能够走到外头来乞讨，都是命大的；许许多多走不动的正在家里等死。天啊，人民的政府咋能见死不救呢？这些淳朴农民都是党夺取政权和建立政权所依靠的基本群众啊。

每进一次城，我身上不多的粮票和钱都倾囊而尽；回来后我坐立不安，悲愤不已。心在颤抖，在流血。我要写！向党中央、向毛主席报告这儿发生的情况，为民说言，即使头颅搬家也不惜！当我奋笔直书时，脑中又出现了反驳之辞：党中央、毛主席难道不相信他的省委、地委、县委和公社党委，而竟去相信你这个“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正在接受监督改造的右派？各级领导明明说是“形势一片大好”，你说逃荒讨饭，饿死人，这不是恶毒造谣、污蔑攻击吗？只怕你的上书还不见踪影，小命早粉碎了！

写了又撕，撕了又写。每次进城回来，我都经过这样剧烈的冲动和斗争，心潮起伏，难以自禁。我想起同窗好友对我的叮嘱，千万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管住自己的嘴巴，即使天塌地陷也要沉住气；努力劳动，争取尽早归来。可是，可是，我如何能控制得住呢？我是有灵有肉的人呵，没有人的感情行吗？我多么希望自己眼瞎耳聋，变成无知无觉的一截木头，那该多自在幸福。罢！罢！罢！写也无用，白白找死，何苦。

在这种心境下，思想变得深沉固执：这搞法难道是马克思主义

所教导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我没日没夜地狂读起马列著作，希望从经典中找出答案。我借得《资本论》和马恩的其他著作，尽量少进城，以减少对自己的刺激。

偶尔进城一次，看见渭河桥头的路边地里竖着一块大木牌，近前一看，牌子上写的是毛主席给公社社员的一封信，信的大意是：社员想种什么就种什么，地适合种什么就种什么，不要听上面党委、公社的瞎指挥。

这指示诚然很对，仔细一想，又有滑天下之大稽的感觉。

国家实行计划经济，“想种什么就种什么”，那还用得着“计划”吗？计划经济岂不落空了？公社化以后，土地归公社所有，由公社、管理区、大队统一管着，社员手中无地可供支配；生产队的地种什么与不种什么，岂容社员同志们做主？要是这样，把党的领导和基层政权置于何地？谁还敢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听上面党委的，那么听谁的？该不是又在“引蛇出洞”吧？公社化以后，农民连起码的人身自由、劳动自由权也荡然无存；叫你六点上班、九点收工，你敢迟到、早退？队长叫你今天割麦、明天锄草，你敢不服从调配？你不服从也可以，食堂的勺把子掌握在书记、队长手里，明天起停你的伙，看你老实不！不只是种什么不由社员，收获多少、留多少口粮、种子、饲料，交多少公粮，卖多少统购粮，全由领导决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农民到哪里去种地？如何能“想种什么就种什么”？

亡羊补牢没补到地方，仅补在毛的嘴上。信是为纠正共产风、浮夸风而写的，可是，“右倾、小脚女人”是谁在天天唬？党委不听你上级的，能行？谁敢？你才是共产风、浮夸风的真正源头，还煞有其事把一切责任推给下级党委！

在县城或走在乡间小道，我还时常看到一列列“劳教队”。受管制的劳教分子个个黄皮寡瘦，无精打采；队列的后边跟着荷枪的基干民兵。我知道那人群里不乏贫下中农，不乏有识之士；但我无能为力，只是不停告诫自己：以此为鉴啊。

有一天，几个在洛门公社龙泉、百泉劳动考察的同学老远跑来

找我，开门见山：“听说你条件不错，来打游击了！”

这些同学是褚松村、陈德根、杨贤勇。褚是地理系二年级，陈是生物系二年级，杨是中文系三年级。他们都在农村背粪斗，生活与社员无异。此时一个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比起他们，我确实条件不错，既无体力劳动，还得到胞姐接济。我二话没说，马上买来几斤大米、两斤白糖，还有一只鸡，全掺一起焖了一大锅。我这种烹饪法大约无人有过，总之大家饱餐了一顿。是晚留住我处，炕小又只一条被子，四个人靠墙半躺着，被子横盖在腿上，所幸夏夜不冷。大家要我坦白交代恋爱故事，说到大天亮。

不久，工人增加了一位新丁，家住离杜家垌五里地的魏家庄。原来的工人尚属年轻，且都来自本地的同一生产队。她看上去五十多了，头发也已花白，一双脚比三寸金莲大不了多少，每天却要跑这么远来上班。我心里颇感奇怪，生出些莫名的同情。她一来，不待分配便主动去推石碾，这是这里唯一的重活。她从不吭声，像围磨盘转的老牛。砸石膏的女社员原本同一生产小队，相互很熟，边干活边扯家常，就像老妪不存在似的。

一天，一位女干部来看望老妪。这位女干部年约三十，端庄沉稳，原来是老妪的女儿。在交谈中，我才知老妪系地主成分；她老伴年过六旬，仍被队里派去引洮工地，因不堪劳累和饥饿折磨，在工地上吊自杀了。老妪被打发到这儿，是接受监督劳动。女干部高中毕业，时任县妇联主任。她言辞谨慎，唯亲情难舍，我能窥到她内心的隐痛。

没多久，我被调去东顺化工厂。我在这里与柴、张、苗三位会合了。这儿的摊子由中文系二年级的马启凯支应着。

东顺化工厂直属城关公社党委领导，与杜家垌不同，这里有点工厂味儿。我们在这里独立完成了建成了小型水电站，完成了水轮机、发电机安装调试；小电站除供厂动力用电之外，还要提供管理区的照明。厂里又生产出东风牌肥皂，这是用一种叫太古油又名土耳其红油的代油脂来制作的；其他产品包括农药石硫合剂。塔式硫酸车间（挖的地槽）花两月时间建成投产，生产出的硫酸虽品位不

高，却货真价实。当时市场上肥皂脱销，硫酸奇缺，产品供不应求。

工厂距县城十华里，离武山火车站五华里，位于东顺管理区上街子村的渭河南岸，河对岸是洛门公社管辖的百泉。除我们原有四个同学，因人手不够，又调来另一位同学孙和，他是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上海人。公社给厂里配备一位姓邓的厂长、一位会计，有二十名从农村招来的男女青年工人。工人拿工资，每月二十元。

建厂与生产的一些过程无须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因工作关系，我和我的同学得以认识了县委干部杜映华；这个机缘对我们的命运影响至深。

杜映华是我们的顶头上司，他当时是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他个头偏矮，皮肤黝黑，看上去很平常。每次我们去向他请示汇报，他的答复既简短又明确。我至今记得他说的话：做任何事都要有利于农民和农业生产，从实际出发，不搞瞎、哄、骗。他是解放前入党的地下党员，曾就读于陇西师范，因痛恨国民党的腐败而参加学运，投入到党的怀抱。解放初他就是漳县的县委副书记，资历比解放后入党的巫山县委书记张十存、张克仁早得多。他为人忠厚，不去搞那些欺上瞒下、吹牛拍马的事，因此仕途上未得升迁反而屈居于二张之下。

时值1959年8月，饥荒在迅速蔓延，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垌、百泉、龙泉、下街子与上街子村，原是武山富庶之乡，此时也是极度缺粮。地里的苞谷正在灌浆，生产队须派社员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即使如此，社员饥肠辘辘，总要设法解决肚皮问题，于是此岸的人夜里涉河去对岸偷掰苞谷，彼岸的路数也一样。相邻的生产队都是互相偷，值班的社员可谓是贼喊捉贼。因“偷盗”引发斗殴甚至致死人命的事，时有发生，邓家堡的一个社员为了能偷挖土豆，竟然将看守者直接用铁锨砍死。

农民自己的劳动果实，本该属他们所有。如今劳动的主人无粮下锅，食不果腹，这是什么世道！

二、创办盐井公社综合化肥厂

8月，我的工作又有变动，我和苗庆久一道被调到盐井公社办厂。

魏宏模原是城关公社第二书记，与县委一把手的关系很铁；他们同属少壮派，数月前他晋升为县委常委，任盐井公社第一书记。盐井公社的地盘即原漳县几乎全县，大得邪乎，自然要派一个得力干部坐镇。魏同时向县委点名要了我和苗庆久。

意外的是，在办粮油关系转迁时，我俩不但都有干部待遇，还得到特批，享受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我们每月可以得到一斤清油的供应，粮食定量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一般干部每月供应标准是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其中百分之六十为杂粮。对这种破格优待，我并不受宠若惊，心里很反感：我俩算什么“高级知识分子”？严格说来恐怕一般知识分子都不够格。我意欲拒之，苗一把拉住我，说：恭敬不如从命。我心虚害怕，怕的是好吃难消化，还怕人家以后反咬一口，说都是我们自己吹的牛。魏的用心我俩心中清楚：无非要我们拼命效力，替他争光闯牌子。

公社社址在原漳县县城，公社党委和公社分别占了原漳县县委和县政府的办公地。第一书记魏宏模极少与我俩照面，他要掌握全盘。直接给我俩布置任务的是公社工业部长贾政兴，此人年过四十，身材魁梧，没有坏心眼，是个忠厚人。根据魏的旨意，我俩要筹建个综合化肥厂。

厂址选在县城东北的砖瓦厂旧址，离原炼钢基地不过二百米。这里四面有围墙，墙内有十亩地大小。围墙里东南两面有两排简易平房，西端并排两座旧砖窑。院里种满卷心菜，此时都长得老大一棵。砖瓦厂因何原因倒闭我们不得而知，工人已都解散回家，唯留下两位元老：一位是工人师傅贾义，另一位是原砖厂的会计，他姓王，我忘记名字了。

贾老六旬有余，身材高大，身板硬朗，脸色红润，两目炯炯有神。他是烧窑、炆窑的老把式，在漳县、陇西、岷县闻名遐迩，常有

人来请他看火。他的老伴六十已过，小脚，慈眉善目，福福泰泰的模样。老两口带着小外孙女一起生活，住在围墙外渠畔的两间小土屋里。

姓王的留守会计三十好几，尖嘴猴腮，说话含混不清，偏又多嘴长舌。他身为会计却不会做账，也不会核算成本，还要我来教他。

根据公社的指示安排，从各管理区、生产队选拔招得二十名工人。这些工人有男有女，个个聪明伶俐；年龄最大的二十挂零，最小的才十六七。他们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由小学到高中不等。年轻工人给厂里带来勃勃生机，生产进度比预期要快。我记得他们全是拿工资的，每月二十来元？我记不准了。我和苗庆久此时也得到特批，每月拿三十元技术津贴。贾老工资最高，每月是六十多元；会计也有工资。

要养活自己和大家，担子全压在我俩身上，没有能赚钱的产品不行。当时硫酸市场销路看好，这儿又有黄铁矿，我和苗庆久决定，先建塔式硫酸车间。贾老负责砌炉，又从甘谷姚家庄购来陶管和储酸罐，不过一月功夫，硫酸车间便投产了。这期间我们只遇到一点小麻烦，因买不到电动机，我们弄来匹小柴油机。苗和我此前都未摆弄过机器，捣腾了两三个小时才把它发动起来。

就这么二十名工人的小厂，公社也没派厂长和别的干部；工人称呼我俩“技术员”，其实我们是什么都管。贾部长隔日来看看，从不指手画脚。环境宽松，激发了我们的自主性和积极性，我俩稳打稳扎，弄成一个项目再搞第二个。靠围墙南边的一排平房有三间，我们拟建菌肥车间，生产固氮菌、磷细菌、钾细菌三种菌肥。虽然没有搞过菌肥，但手头有套完整资料，一看便会；关键是菌种要可靠，消毒要严密。

老苗和我与贾老一家一块儿吃饭，我们每月将粮、油和津贴悉数交给贾老。大娘做什么我们吃什么，不过问不挑剔。那时常吃的是卷心菜下面片，偶尔买得到鸡蛋。由于食品奇缺，价格也贵得惊人，鸡蛋两元钱三个，二两不到的饼子一元一个。和着卷心菜做馅包顿饺子或吃顿烙饼，就算是改善生活。我俩很满足，比起饥饿的

农民，我们已经是活在天堂了。老两口待我俩亲同父母，他们的小孙女才八九岁，“叔叔”“叔叔”喊得很甜，使我俩感受到久违的温暖与亲情。

厂里年轻工人初来一个月时，生活还算将就，随后便难以为继。他们并非城镇户口，不享受国家的粮油供应，每月必须回生产队领粮。起初听说是每月有二十四斤，年轻人吃得半饥半饱，只能寻些苞谷棒瓢子，回来用木槌捣碎，再挖厂房的卷心菜煮糊糊帮补。会计发现工人连根挖卷心菜，每每要指桑骂槐一顿，仿佛这菜是他的私有。

一个多月来，我们忙得车轱辘转，没出过厂门。我俩不只是技术指导，而且与工人们平起平坐，和泥，挖地基，砌墙，什么活都干，深得他们的敬重。这伙农村青年直率坦诚，有话也乐意对我们说。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发生在农村的许多严重情况。不过，我们牢记着自己的身份，听了之后，我和老苗从不开口表态。

9月底，我出差去北京购买菌种。尽管思想上已有太多的迷惑，我依然告诫自己：全国这么大，难免不发生一些怪事情；自己生活在偏僻西北的一隅之地，千万莫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以偏概全”的错误。我尤其对被划右派不服，所以提醒自己不要因此把社会看得一团漆黑，妄下结论。出差机会难得，我想一定要多看多听，以便通观全局，对当下的形势有个准确判断。

我看到的情况很糟，尤其是陇西、武山、甘谷直到宝鸡的甘肃地段。站台上饥民成群结队，一个个伸出脏黑的手向旅客乞食，哀声凄楚。列车上也有乞讨者，在甘谷站附近，有位四十左右的妇女牵着一个骨瘦如柴的男孩，来到我的座位旁。她说母子俩已两天没进食。我买了几个饼子，刚放在茶几上；听说后全给了她。她拉着儿子扑通跪在我面前，一声声喊着救命恩人；我的心如同被针戳了一般。

我在太原下车，假道看望我哥；我们整整五年没见面了。其时我哥由北京化工部调到山西化工设计院，在南堰的省化工学校临时兼职教制图课。手足情深，相见时的激动自不必言。哥哥邀我听他

的课，课讲得一般，主要是语言不太生动，重点难点强调不够。我担心学生听他的课犯困。我哥又把我介绍给设计院的总工，并邀请我列席一个拟建的电石厂设计研讨会。总工知道我是兰大化学系的，临末要我谈点意见。我基础知识还算可以，正年轻气盛，乃不知天高地厚地说了一通，竟受到总工和与会者的谬赞。

哥哥比我长得高大白净，相貌堂堂，此时二十九岁，已有了女友。女友张××是山西师大物理系本科毕业，也是该校老师。我又应邀听了她的课。她讲课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事后才知道她是该校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之一。张不算太漂亮，却善良热情能干，对我如亲弟弟一般。

在太原待了四天，正值国庆放假期间。我住在哥哥的女友家，张家有个独门独户的小四合院，她的爷爷、父亲和几个叔叔都受过高等教育；有的在北京、天津工作，有的在大学任教。她现今与母亲和弟妹一起生活，弟妹在念高中。这个家平时少有声音，即使有人说话也都是轻言细语的，满院书香之气。说来奇怪，张母与我极投缘，她特别喜欢我。她亲手给我缝了件“青滚身”，非常合身贴体，一穿上身便再舍不得脱。此后这件衣服一直是我的最爱，直到1962年春节，我在武山看守所将它送给了难友冯淑筠御寒。这几天里，我陪伴老人看了场晋剧《下边亭》，在来去的路上都是我搀扶着她。看戏时我依偎在老人怀里，感觉到母爱又回到我身上。

这期间，只发生了一次不太愉快的事。我向哥哥讲述了农村见闻，他听后深感不安。哥哥知我自幼性情刚烈，嫉恶如仇，担心我会出事。他千方百计想要说服我，纠正我的看法。

我哥指着太原新盖的一排排高楼质问我：“难道这些不是伟大成就，你为何视而不见？”

我答说：“我眼不瞎耳不聋，自然不会否定这些。我只是没叫成绩蒙住双眼，遮没我的良心。”

哥哥很生气地说：“这些事你管得了吗？你不去想它不行吗？”

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如果人人都采取回避态度，‘匹

夫有责’就成空话，这正是当前局面得以发生的原因。不过，我已不是小孩子了；我不会因为个人委屈而产生偏见，去干非理性的蠢事。”

我们的辩论只能不了了之，再辩下去，我会拔腿离开。哥哥转圜道：“我们兄弟相见太难得，不谈这些令人烦恼的事了。我的任务是叫你吃好，玩好，休息好。”

他哪里知道我此时的心情，我脑中常变幻出鬼门关前排队的人群，又怎能安心玩好休息好呢？

到北京后见到胞姐，我吸取教训，只字不提下面的情况。我与胞姐在1953年分别，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如今彼此相见欣喜若狂，姐姐搂着我亲了又亲。

这是我首次来京，姐姐带我四处游览一番。此时的北京度过建国十周年大庆，依然还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我参观了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都是气势恢宏，堂皇富丽。只是心境不同，观感也就迥异。这些建筑的豪华气派与农民啼饥号寒的景象有多大的反差啊。民以食为天，国以民为本，这些建筑是供人观瞻享用的，理应人先物后；为何不先解决人的温饱生存而后再盖它们呢？难道脸面比起农民的死活更重要、更值得优先考虑吗？与此同时，即使在北京，在天安门广场，在刻意镂雕的繁荣背后，尽管不断有流民被收容遣送与驱赶，不时还是能发现饥寒交迫者的身影。

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安保速度了，北京的公安保卫确实坚如磐石。我从中科院红旗菌种厂买到菌种，刚回到姐姐家，派出所的人就跟来“拜访”了。他们十分仔细，连小木盒里的菌种也探查了一番。

归程中，我在天津、正定、保定、石家庄、邯郸、郑州和西安都有意稍事停留。车站是观察认识社会的窗口，我看到到处是逃荒的饥民，到处是投亲靠友的落难亡命人。总的印象是，甘肃、河南情况最严重，河北、陕西次之；山西似乎问题不很大。我原来猜测，瞎胡闹的仅甘肃一家，张仲良弄了个黄袍加身——庐山会议后，他在八届八中全会上晋升为中央候补委员；谁知全国皆然。

回到厂里将所见所闻对老苗细叙，彼此感叹唏嘘。不管哪个省，当官的牛皮吹得越大，头上的顶儿越红，老百姓的日子也越难熬。

老苗告诉我，魏书记又下达了新任务：从漳县城到三岔镇要搞无轨电车。我听了几乎惊骇得闭了气。

苗是调干生，颇有社会阅历，他沉得住气。他对我说：“你全力以赴把菌肥搞出来，无轨电车的事我来想办法对付。”

有了可靠菌种，只要牢牢把握消毒和接种关，菌肥生产我是成竹在胸的。只是在配置菌种培养基时遇到大麻烦，此时工人的生活极恶劣，有的人从生产队一个月领不来粮，饿得迈不动步。培养基要用土豆熬汁（还有琼脂），工人见到土豆如同见到救命神丹。土豆尚未入锅，在洗与切的过程中，先就有一半以上进了他们的口腹。我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一块块生土豆丢进口中，竟无法指责他们；我开不了口。

菌肥是在 11 月上旬生产成功的，无论菌种的扩大繁殖还是二级菌种的培养全与书本所叙形态一致。

三、万户萧疏鬼唱歌

进入 11 月，天气冷了，此时的政治气候更令人寒彻骨髓。

庐山会议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打成反党集团，彭老总成了罪魁祸首，一撸到底，中国进入了绝对“一言堂”的时代。毛泽东就是党，党即毛泽东。只要与毛意见相左，不管是谁，就是“反党”。中央如此，上行下效，各单位各部门的一把手也就成了小“一言堂”。谁都是看一把手脸色行事，人们都变聪明了。狠抓阶级斗争和“一言堂”是双刃剑，农民原本已是苦不堪言，此时的处境更为凶险了。

这时，盐井公社调集了脱产干部，开展了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粮食哪里去了？社员偷了？藏了？这还了得！床上的枕头，撕开！火炕，刨开！堂前、屋后、鸡厩、猪圈，挖地三尺！枕头里不知何年何月、哪辈人装进的谷糠麦衣，撒得满炕满屋，一片狼藉。

社员没有哭喊，没有抗争，人们一个个木呆呆地面对。这就是盐井地区的农民啊。

我想，对农家的情况官家再清楚不过，却还要煞有介事演戏，故意把农民糟践一通。

过去强盗土匪偷偷摸摸行事，抢掠对象是豪强财主；如今却是社会弱势群体——执法的国家官员明火执仗抢劫百姓。他们掠夺的是百姓中最苦最穷的农民，农民已到了山穷水尽、濒临死亡的绝境！

正值其时，中共武山县委在新寺公社召开粮食现场会，与会的是各公社书记、主任。据说新寺公社不但超额完成了国家公购粮任务，还留足了社员口粮、种子和饲料。除此以外，竟然还有余粮。新寺公社的头头好不风光。事后却传出真相：那所谓堆积如山的余粮，只不过是表面有几麻袋粮食，内里的麻袋全装着麦草。参加会议者个个心中亮堂，而无人敢戳穿这西洋镜。

有一天晚上，县城放映露天电影。我整整两年没看电影了，心旌摇动，也去观看。放映地点在漳县中学即后来的武山三中校门对过的街口。小小银幕挂在矮屋檐下，朔风吹得幕布晃晃闪闪。天寒人饥，观影人稀稀拉拉只有数十个。片名是《猪，浑身是宝》，系甘肃电影制片厂摄制的。

这片子拍的就是本县的事，它发生在我和苗庆久调来之前。当时魏宏模调升到这儿当“一把手”不久，他靠如此养猪一鸣惊人。他把各管理区、生产队的猪全集中到一块，对上面谎报实现了“一亩地一头猪，以地养猪，以猪养地”的良性循环，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魏因此受到县、地、省的表扬而走红。省上派来制片厂编导拍摄。结果，片子拍完，猪也死光了。当地人知道底细，表面上这是部科教片，实际是为魏树碑立传。影片的片名出来，刚露几个镜头，下面观众全走光了，放映者只好早早收场。

那段时间，我右脚跟长了个“鸡眼”。眼见脚下隐隐作痛，它越长越大，病情越来越严重。回想起来，那还是“一把手”催我夜行百里山路留下的后遗症，如今脚不能挨地，成了瘸子，到了非治不可的时候。我去公社医院求治，说要动手术，医院却无麻药。我

痛得难受，再三请求，医师终于同意实施不麻醉手术。手术虽小，震动不小。听说不用麻药剜“鸡眼”，门诊和住院的病人都来围观，有些护士、医生也来看。毕竟是刀子剜肉，我疼痛非常，豆大的汗珠从头上滚下来。医师问：“能坚持吗？”我硬着头皮大声道：“没问题”，还故意扭头看手术操作。哪知一见锃亮闪烁的手术刀，心里立即发怵，这才觉自己并非真的猛士。

我想到林祥谦被军阀刀割凌迟的痛苦感受，我要做好承受痛苦的精神准备。

手术完，见“鸡眼”有拇指大小一坨。脚上的创口里塞满了引流纱布条。待厂里派担架来接我时，我已一瘸一拐地到了厂门口。

这时，厂里二十名年轻农民工已撑不下去了。回队打粮的人空手而归，公共食堂多已关门。情况最好的生产队也只能一天供应两马勺菜糊糊，那糊汤稀得照见人影。农民工饿得东倒西歪，不少人下肢浮肿。厂外四周的田野和公路两旁，还有漳河两岸的岸边，那些槐树、榆树、柳树乃至白杨树的树皮，都被剥得光怪陆离。

更严重的是，到处在饿死人。1959年11月，有的村子里饿死的人无人埋。人们已经挖不动墓穴，抬不动尸体。这时只好动员中学生去埋死人，埋一个死人可得四两合125克的粮食补贴。中学生人数少得可怜，多为干部子女；他们也饿得够呛，故而乐此不疲。最先饿死的人被认为是“有福”的，他们还能得到薄板棺材，还有人把他们埋到村外坟地里。后来死的人多了，哪里还有棺木？只能用一床破席卷起尸体，扔到村里刨的浅坑里。再后来无人问津，尸体停在炕上任其腐烂，屋门洞开。通渭、甘谷等地有的村子是十室九空，狼群大白天在村里大摇大摆啖撕死尸和将死的人。

“千村薜萝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写旧社会血吸虫灾害的诗句，其实，它正是眼下这个新社会农村的真实写照。

面对浩劫，农民想些什么呢？唯一能做的是安排家庭成员谁应保谁，谁先死谁后死。为了传宗接代续“香火”，女保男，长保幼，先死奶奶后死爷，继之死母死父，要千方百计保住下一代尤其男娃。

这些是几千年封建传统使然。

这就是中国农民。何等理性，何等软弱与可悲！旧社会，在民国二十八年至三十一年即 1939 至 1942 年前后，发生在河南南部的大饥荒是我经历过的，因记事颇早，我依然有印象。

老天作孽，连年干旱无雨，庄稼颗粒无收，死亡笼罩着大地。在北向店镇，白天依旧熙熙攘攘，各种商品和吃食琳琅满目。但镇上已有许许多多的饥民、乞丐，他们用棉絮裹头，遇到手拿吃食的人，不论大人、小孩，冷不防一把夺走就跑。他们边跑边回头望，手里将食物迅速塞进嘴里。遇到凶汉赶来，就被劈头盖脸毒打一顿。一到夜晚，家家都提早关门闭户。外面的饥民求爷告奶奶呼爹叫娘，哀声通夜不绝。第二天早上开得门来，街上总能看到一二倒毙的饿殍。

我家不远处是家米行，有贩运粮食的商人赶着成群的骡马从南阳来住；此地遂成众矢之的。这家米行颇大，铺面上的二楼住着主人和客人。后面是个大院，两边厢是马厩，院后有坚固的后门。每到夜深，镇外“唉啊”之声由远及近，由小到大。镇两头有门楼，上置土炮及枪銃。听到饥民的脚步声，门楼上土炮和枪銃齐响，直至饥民远遁，哀声沉寂下来。我想，本地人并未向饥民瞄射，因从未听说有被射杀之人，估计只是以枪炮声驱散人群而已。但时过不久，哀声又起；每夜凡数次。终于在一个夜里，饥民不再惧怕枪炮，他们抬着大木头将米行后门撞开，米行被洗劫一空。

早上，小镇上的人拥到米行门口去探询，母亲抱着我也去了。只见店堂一堆稻草，草里躺着浑身是血的两个死人。

1941 年左右，发生在河南南部的饥荒是数十年不遇的天灾；而眼前发生在甘肃的是自作孽的人祸。天灾尚且可逃，我家和许多河南光山、罗山人一样，从河南逃荒到江西，得以活命。而此时的人祸，天下一统，无处可避，无处讨要。那时北向店镇的百货齐全，此时漳县城里有钱也买不到东西。那时饥民公开抢粮致死人命，官府尚知情急可恕；此时无人敢有非分之想。谁若敢抢公粮国库，必遭杀身之祸。那时，富贵人家多少要做施舍饥民的事情，官府也多

少要发些赈济；此时为官者个个装聋作哑，见死不救；不仅如此，更还要掘地三尺反瞒产，为虎作伥。

根据可查考的史料记载，历史上的饥荒，规模不过几州几县，人口不过十万百万。时下的饥荒遍及全国，挨饿者数亿人口，饿殍盈野。

血性青年的我，何止是“独沧然而涕下”，简直是肝肠寸断啊！

自从知道庐山会议揪出了彭德怀“反党集团”后，我已心灰意冷，对毛为首的党不再抱幻想。我已经将偷偷写给党中央的上书撕得粉碎，连苗庆久也一无所知。

怎么办？我还能做些什么？

四、《星火》

魏宏模丝毫不为饿死人所动，他要用更多的尸骨垫高向上爬的梯子，他对“无轨电车”也催得更紧了。魏让县里的木器厂、农机厂、工艺美术社全都停工，把所有手艺人调来投入制造电车的外壳。苗和我则开始设计和制图，夜以继日地赶工。与此同时，贾正兴部长又下达了制造黑色炸药的任务。他说，漳县几乎年年发生冰雹毁坏庄稼的事，有些老农能识别冰雹云团，只需在山头放几炮即可击碎云团，化险为夷。这是为农业服务的正经事，我们立马行动起来。

活性炭、硫磺都不难得到，唯有火硝（硝酸钾 KNO_3 ）难求。只得用上土办法，挑出三四个尚能动弹一点的农民工，每天背个背斗去刮老城墙土、老炕土。土背回来以后经过浸泡、溶解、过滤、浓缩过程，达到一定波美度，有火硝结晶析出。我们花了半个月试制出黑色炸药，经试验很成功。

10月，我出差到磐安公社，那儿有台报废的汽车发动机，贾部长叫我去看看能否修复来派上用场。

磐安公社位于洛门与甘谷之间的磐安镇，离车站不远。我路过洛门顺便看望了我的同学杨贤勇、田昌文和何之明。此时他们三人也从生产队调出来办厂，厂址在洛门车站东边的一个村里。是夜，

我住在那儿，和他们三人聊了个通宵。这是一个刀子刷心的夜晚、一个愤怒的夜晚。我向他们报告了盐井的所见所闻，没想到生活在铁路线上的他们，见到、知道的比我多得多。人相食、卖人肉包子这类事，都是我此前不知的。我们是一群有知识有正义感的热血青年，怎能接受眼下魑魅魍魉横行的现实！

但是，除了满腔悲愤而外，我们又能如何呢？

磐安的情况一点不比盐井强，镇上到处是双腿浮肿、拄着拐棍的人，其中不乏年轻人。向阳的山墙根上有一堆堆人在晒太阳，有人依着墙，有的躺卧在地上，一个个神情呆滞麻木。公社招待所食堂供应黑面杂粮，乞讨者围在餐桌前，伸出枯枝般黑脏的手，叫人不忍进食。

回到盐井厂里，才知我出差磐安时节，韦民到厂里来了；老苗详细向我通报了当时的情况。韦民是中共天水地委第二书记，中等个头，四十许。他穿件军用棉大衣，大衣原来的黄色已褪成寡白。魏宏模知道他要来此地视察，提前做了各种应对。为防露出破绽，全公社搞了个爱国卫生运动，漳河两岸、公路两旁以及县城周围那些被百姓剥了树皮充饥的裸树，一律被刷上了石灰浆。宴席也准备就绪，要为韦民接风洗尘。谁料他人不知鬼不觉地一头扎到我们这小厂来，要找两个右派谈话。苗处事谨慎，出言婉转，但韦民书记从他的含蓄中还是了解到了不少实情。

听说他一到公社，对魏劈头一句话就是：“不错嘛，你们这儿的爱国卫生运动搞得蛮有气势。”他拒绝了专门为他准备的筵席，自掏粮票啃窝窝头。

听了老苗的介绍，我深信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只不过没实权、不得势罢了。

韦民走后，魏不再提造无轨电车的事，他蔫了。

有一天吃饭时，老苗说，我们也该吃顿榆树皮，体验一下农民的疾苦。我很赞成，而贾义老两口则不以为然。他们以为我们是心血来潮，说着玩的。看我俩态度认真，大妈才用白面和榆皮各半烙成饼。这种榆树皮面混合饼，老苗一气吃了两个，我吃了一个半便

再难咽下去。原以为我什么苦都吃得，其实不然。苗虽出身地主家庭，可他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超过我。我感到很惭愧，对他更加尊敬。

自从5月在杜家垌开始读《资本论》，我完全放弃了对理科知识的自学，全身心地攻读马列。我买的、借的马列著作有一大堆，还借有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夜读已成习惯。此时，老苗和我同住一间大房间，这里既是我们的卧室又是办公室。菌肥车间建成后，培养室大间里有个小套间，作为接种室，它非常密闭、安静，是夜读的理想之所。形势愈严酷，我读书愈勤奋，恨不得从书中抠出思考现实的答案来。我要努力充实自己，写出的东西应具有理论高度和说服力。我如饥似渴地读书，经常是通宵达旦。老苗对我极关怀，他知道我忧心如焚在发狠，常常后半夜披衣起床劝我休息。我一般早饭后睡一觉，上午不是万不得已，老苗不叫醒我，一切由他应付。我深深感激老苗，他太体贴我了。

在天水的领导干部中，我们对韦书记怀着好感，认为他是个货真价实的中共党员。他走后我们一直在考虑，为解农民饥饿之急，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知道报上在介绍“人造肉”和“小球藻”，但那些东西难解燃眉之急。后来忽然想到，应该去天水地区二级站和武山、陇西三级站仓库，看看能否找到一些可供“进口”的原料或代用品。我拿着介绍信跑了一趟，在天水北道埠二级站仓库终于有所收获，我购得仅有的两块工业葡萄糖一百公斤。只要用稀酸酸解并加少量蜂蜡，工业葡萄糖即可转化为果糖食用。我那时我尚未学有机化学，此方法系柴志德学兄赐教，他后来是兰州化工公司高级工程师。

在制作过程中，大部分果糖被农民工进了口；最后所得仅为原料的十之二三。拿到商店以每斤五元出售，人们蜂拥而至，转眼销售一空。在当时，即使五十元一斤也有人买。事后听说，有些饥民得知有糖售卖，从远道拼命往商店赶，竟死在了路上。

果糖成了催命鬼，我和老苗听说后，心里很不是滋味。

10月，孙自筠在天水遭逮捕，消息传来，我陷入深深的绝望。

我对毛泽东最后的幻想终于彻底破灭。

孙自筠与我一块儿离开兰大，他在水接受“劳考”处分；他的经历和见闻与我们不相上下。不知五九年何月，他给中共中央权威刊物《红旗》写了封匿名信。据说信的内容是抨击人民公社，揭露社会弊端，尤其披露了正在出现的农村大范围饥馑。这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好”针锋相对，当然是弥天大罪。信寄出后，当局费了许多力气才查出作者，以“现行反革命”罪将他判处重刑。

孙自筠是个热血男儿，他想我之先，行我之前；我好敬佩他的胆和识。但我不能走他的路，重蹈覆辙。

人若只为自己苟活于世，无异于猪狗。面对这无尽的倒行逆施，这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惨景，这黑白颠倒的人间地狱，我再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我是农民的儿子，千千万万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悲惨地死去，我不能帮助、解救他们，宁愿和他们一同去死。他们死得，我有何死不得？我虽只二十一岁，也已经看够了，活够了。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要爆发！当谭蝉雪来看望老苗时，我义无反顾地走上普罗米修斯取火之路。1957年我是百分之百毫无知觉地落入陷阱，如今我是在百分之百理性的支配下自觉去地狱，无怨无悔。唯有死亡，才能解除心在滴血的痛苦。

大约在1959年底，谭蝉雪专程来看望老苗，住在招待所；此前他俩早有联系。我和老苗已有一年半的朝夕相处，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我们相互信赖，已到无话不谈的程度。他对我呵护有加，我们之间亲如兄弟。“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苗庆久带我去招待所一同晤谭蝉雪，他们俩年龄相仿，都是调干生。我在校时已知谭蝉雪的大名，对她印象不错，很乐意去拜访这位“兰大的林希翎”。我称呼她“谭大姐”，直到今天我依然这样称呼她。话不很多，很快推心置腹。我们有共同点：心是颤动的，没死；血是热的，没冰；灵魂是圣洁的，不脏。

天气很冷，我上身穿着太原张妈妈为我缝制的“青滚身”，脖子上围了条咖啡色的薄围巾；穿着呢裤、皮鞋。他俩都说我酷似电影《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不但穿着打扮像，个头神情也无二致。

送走老谭，苗与我开始动手刻印刊物。碰巧原砖瓦厂遗留有个小油印机，可以派上用场。刊物名为《星火》，老苗在刊名旁画了一只手，手上擎着火炬。内容方面有这样几篇文章：顾雁撰写的《发刊辞》，标题为《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两篇文章：《农民、农奴和奴隶——当前农村剖视之一》《粮食问题》；胡晓愚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我们还刻印了北大林昭写的叙事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文章都很精彩，林昭的诗尤其令我感动不已。只是篇幅嫌少，不够出一期的。我以为缺少一篇核心文字，否则不足以说明大局，无以解人之心急、心忧、心痛。遂与苗商议，由我写篇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我在文中抨击时弊，揭挖根源，批判党内主流派和一切蜕化变质者，矛头直指“一言堂”堂主。

按说，这篇分量极重的文字，无论从年龄、学识、资格和阅历来说，都不该由我来写，而应由素质更高的人捉笔。由于时间紧迫和形势危急，只能由我来滥竽充数。此外我还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自白》，另一篇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世道又与地狱有何区别？为了自由和尊严，为了颤栗流血的心得以平静，我不顾一切写出了我的观察和认识。我十分清楚这样做的后果，我已经做好了为真理而献身的准备。

五、我和杜映华

1960年元月，我回到城关公社东顺化工厂。我与杜映华接触日多，时常去他家中。杜映华是陇西土店子人，土店子与陇西火车站相隔不远，与鸳鸯镇、贺家店临近。杜的家眷在武山车站陈家门，我由厂到县城往返必经过他家。

杜映华的家在一栋破旧简陋的平房里，这里有两间卧室、一间灶房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无沙发也无像样的桌椅，只有一张旧方桌、几条木板凳，与普通农家无异。他有两个男孩，大的五六岁，小的

两三岁。他的妻子善良贤惠，却不很能干；两个孩子看着鼻涕拉撒的又衣帽不整，屋里也窝窝囊囊不甚整洁，一点不像书记家的样子。我来此地劳动考察一年半了，曾到过生产队长至公社一级干部的家。那些干部的家里，炕上有铺的盖的，床边柜上还码着花花绿绿的被褥；炕桌都是油漆镂花的，擦得锃亮反光，个个家中都收拾得熨熨帖帖。而且，职务越高，家里摆设越阔气，与普通农民家庭泾渭分明。虽然公社化以后，一切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都被废除，但农村的贫富差别并未缩小。凭借手中的特权，干部多吃多占多分是极普遍的现象。我到过最穷的农民社员家，床上只有破席烂被，真是穷得叮当响。像老杜这种县委干部之家，其寒碜恹惶得不如一个生产小队长，这是我万万没料到的。吃看脸上，穿看身上，贪不贪看床上，俚语说得有理；显然，杜映华是个清官。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每次都是洋芋拌汤，外加一小碟咸菜。仅有一次，嫂夫人烙了两张饼。老杜和我都再三推诿，最后把饼让给了两个孩子。

年前在新寺公社召开了全县粮食现场会，我估计杜是与会者之一，因此向他了解会上的情况。这个从不发火的人，竟把我吓一大跳。他怒不可遏地拍桌而起：“全是假的，无耻的欺骗！真想不到世道变成这样！”

“那么，为什么没人当场戳穿呢？”

“谁敢？连彭老总都成了反党，再说有何用？白白牺牲。这股风是上头直接刮下来的，谁能顶得住！”

杜知道许多地县发生了饥荒，他说，岷县、漳县、陇西、通渭、定西、徽县、成县、康县、两当、临夏、永登、天祝……全都一样严重。

一天下午，我到公社汇报工作，天已很晚，在公社用罢晚餐，杜留我与同住一起。城关公社在县城后街拐角处。公社街对过有间平房，是专为杜准备的，有时开会太晚不及回家便住此处。房里有张双人床，一桌一椅一个暖壶，还有脸盆洗漱等物。是晚，我们竟有说不完的话，诉不完的衷肠，聊了个大通宵。

他问到我的家庭、身世以及“犯错误”的情况。我对他坦言相

告，毫无保留。他说：“古来兵不厌诈，对待敌人，可以搞阴谋诡计。可是解放后，共产党夺得政权成了唯一的执政党，一切当依宪法办事。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皆属人民范畴，用对待敌人的手段设置陷阱，这个前提就是错的。现在看来，后果比事情本身还要严重。如今到处坑蒙拐骗，谎言满天飞，无人敢说真话，就是五七年反右、五九年反右倾的必然后果。”

他是个善于独立思考的人，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令我感动和钦佩。

我同他谈到1956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那时我入校不久，朱子清教授从德国回来偶尔向学生谈及。他参加在德国举行的国际贝母植物碱学术会议，也是来自东方国家的唯一与会学者。匈牙利事件发生时，他正好在首都布达佩斯，住在中国驻匈使馆。为了他的安全，使馆人员劝他不要外出，他还是到大街上转悠了。街上到处是火是血，个别匈共党员和干部被“暴徒”捆绑在电线杆上，遭焚烧杀戮，惨不忍睹。可是当“暴徒”知道他是科学家时，自发地将他团团围住保护起来。

我当时百思不解。经过五七年到五九年的变故，尤其眼下这些触目惊心的事，终于能够理解匈牙利事件的原委了。

老杜更是无限感慨，他说，抗日战争时，有老乡为了营救八路军战士，宁肯献出自己的亲生儿女。也有百姓为掩护在国统区的地下党员，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解放初期，人民同党的感情何其深厚啊。万想不到短短几年工夫，党变得这么快。在有的地方，老百姓对有的党员和干部，已经切齿痛恨，甚至恨不得啖其肉，寝其皮。不难想象，匈牙利事件就是在类似中国眼前的现实背景下发生的。

我们从《共产党宣言》发表、马克思主义诞生谈到国际共运的现状；从苏联谈到中国，从斯大林谈到毛泽东；从党的历史谈到现实。血淋淋的现实令我们悲愤难忍，我们直抒胸臆，把生死置之度外。这夜，我们谈话的重心是抨击“个人崇拜”和毛泽东自1955年反胡风以来的倒行逆施。

解放后尤其1957年后，每一次政治运动同时又是造神运动。每

次运动都神化了毛，扩大了他的权力，削弱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1955年反胡风运动剥夺了文艺界人士的民主权利，1957年反右剥夺了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民主权利。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仅是剥夺了农民的民主权利，而且他们的耕种自主权、劳动自由权、收获分配权等等全都丧失殆尽。1959年庐山反右倾后党内民主荡然无存。“民主”步步收缩，权力尽在毛泽东一人的股掌之上，成了他的一己之私。造神运动大功告成，所有人伏在他脚下顶礼膜拜。

毛能一手遮国，自然有张仲良的一手遮省，张十存的一手遮县，魏宏模的一手遮盐井公社。毛不懂经济，偏要大权独揽瞎指挥，共产风桩桩件件他是源头。大量饿死人，毛是始作俑者。

老杜和我同时相信，党内有正直有识之士，只是被邪气压制，没有实权。我们渴望有更多的彭德怀挺身而出，为农民的悲惨处境而呼号。

我把《星火》文章中的观点几乎毫无保留地和盘托出，不觉天已大亮，我俩意犹未尽，肝胆相照，肝胆俱裂。

分手后我一路在想，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也许算不得什么；一朝权力到手，能保持头脑清醒，对劳苦大众不改初衷，很难。有人为妻儿私情所累，有人不舍既得利益，有人怕丢乌纱帽。庐山会议对彭老总万箭齐发，这证明党内高层领导干部同样无党性原则可言，良知泯灭。从上到下，党的肌体相当一部分已蜕化变质，共产党需要自我改造与更新。彭德怀、杜映华是勇于对自己身上毒瘤动刀的人，他们不愧为真正的革命者，是猛士和英雄。

杜映华对任何人没有架子，我刚到他那儿还没有彻夜交心时，他为了照顾我，主动为我打洗脚水。第二天一早，又是他去打洗漱水，买早点，跑进跑出好几趟。我要去做这些，他坚决不让。我这人很古怪，一生中不可能对任何人有架子，也憎恶一切摆官架子的人。我的信念是人人平等，除了工作关系以外，在一切交往都应如此。杜映华就有这种平等意识，因此也赢得了我对他的敬重。

六、我和张春元

我终生不忘的一件事发生在1960年2月，刚过春节不几天的一个早上。这天，我破格起了个早，去渭河对岸的百泉看望农妇李大娘。厂子就在渭河边上，我急匆匆地贴着河沿的麦地走。

春寒料峭，乍暖还寒，两三寸的冬麦上铺了一层白霜。不远处是上街子社员锄草的队伍，他们不一定知道我的姓名，却是都认得的。走着走着，我忽然发现这些社员停下手中的活，直愣愣地盯视我。我停住脚，勾头把自己细察一番，怕是衣着有失检点。在厂里我一向不修边幅，但出门尚知稍作整理，这次也没忘记。我低头眼角向外一瞟，哇，一具死尸就在我脚旁的地埂，我惊骇得险些跌倒。

过去只是听闻饿殍，这是头一回亲见。我看到一具小女孩的尸体，她年龄约在十二至十四间，穿了一身缀满补丁的夹衣裤，那衣裳黑不溜秋，脏得没法看。她嘴里还噙着一块东西，半边露在嘴外，看不出是土豆蛋还是土坷垃。她的脸如黑炭一般，身体蜷曲成了个小坨坨。

稍微镇定后，我环绕尸体一圈，默默地向她三鞠躬，算是对她的悼念与送行，然后继续走我的路。

城关公社由于有老杜掌舵，在武山县算是最好的公社。东顺管理区在全公社中情况又是最好的。老杜告诉我，城关公社情况最危急的是榆盘管理区，那个区在南山地带。他已通知社员停止出工干活，以保持体能。他向我表示说，他在自己管辖范围内将倾尽全力，避免发生饿死人的事。那个死去的女孩是外来乞讨者，既然有那么多人发现她，想必有人出面去埋她。我想，上街子农民一定还有老人记得这件事的。

我走到河湾下的僻静处，再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捶胸顿足，血在沸腾，胸膛像要爆炸。啊！啊！这就是祖国的明天、人类的花朵啊！

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这小女孩是我的亲妹妹，我又该如何，又能怎样？我受着良心的折磨，尤其懊恼自己没有相机，不能记录

下这触目惊心的画面，让它以后站出来说话，为历史作证。

从李大娘家返回，紧接着我去榆盘看望谢成。老谢是中文系四年级学生，陕西虢镇人，他老成厚道，与我交谊颇深。由东顺出发，我从邓家堡东边一条山沟里逶迤的小路南行，不过二十华里路程，很快到了。谢成一个人住在老大一间土房里，房内有床铺，还有一张破桌、一把旧凳；显得空荡荡的。谢成的身份有点像驻队干部又不全像，到底算啥他自己也搞不清楚，反正有些会他是不能参加的。

老谢见到我高兴得很，连忙跑出门去，好大一阵才回。他对我说，我这里已是山穷水尽，拿不出东西招待你，好在我们是好朋友，你不会见怪。他随手在桌旁的地上燃着一堆火，把刚找来的一兜东西打开。那东西共有二三十颗，说是土豆，但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差不多只有拇指般大。我俩围着火堆，边烤土豆边聊。他向我介绍了远近的情况，无非是这里那里有多少多少人饿死。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薄本子，怔怔地望着出神。“那是什么？”我问。他递到我手里，原来是生产队返销粮购粮证。

谢成说：即使你不来，我也要找你了。公社杜书记指示减少体能消耗，生产队已停止劳动。队里要设法熬过这段时光，不能发生饿死人的事。现在已是十万火急，有一批社员躺在炕上动弹不得。或许今天、明天，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他们已熬不过去了，想来想去，只有在这小本本上做点文章。此事危险性大，弄不好会坐牢。

他的意思我懂，购粮证上凡是领过粮的都有印迹；他要我设法将之褪色，消去印迹，以便冒充未打粮者，好再打一次返销粮。

二话没说，我立刻接受了他的委托。我心想，死的决心都已拍定，还怕坐牢？吃着烤土豆，我俩的手上、嘴上、腮帮子上全是黑糊糊的，成了大马猴。我俩相视而笑，笑得凄楚又悲壮。

救命如救火，一回到厂里我立刻行动。我先用高锰酸钾稀溶液将字迹氧化，感觉氧化有些太过，纸发黄了；我又用草酸还原。我小心翼翼地涂抹着，直到最后看不出痕迹来。没想到这事居然成功了，榆盘从粮库打来一千多斤粮。老谢像喝了蜜一样，我也甚感欣慰。

2月底，邓德银兄寒假探亲由四川返校，途中在武山下车。他专程来看望我，令我十分感动。邓兄只住了一宿，第二天就赶回学校了；然而这一宿他一直在啜泣。他向我诉说了老家四川的情况，对我如五雷轰顶，魂销魄散。他说四川有的县饿死人达到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四川乃天府之国，理应比甘肃好得多；现在我才知道，那儿也被糟蹋成了人间地狱。邓兄说：即使死尸遍地，那里还在大搞反瞒报、反隐藏运动。基层干部如狼似虎，农民生命危在旦夕。

我理解邓君的心境，他的正义感丝毫不亚于我。但是我什么也不敢对他说。我不是不信任他，但我想到，他已经学有所成，国家需要更多的科技人才；我不能牵累他。他的价值超过我，我不愿他与我一道去做牺牲。我是个感情易冲动的人，面对挚友讲述的残酷现实，我却只能装作无动于衷；这是何等的不容易啊。我叮嘱他务必精于学业，其他一切都不要去管。我知道他会认为我麻木不仁，但我只能如此。

第二天早上我送他上火车，他的双眼又红又肿。我不忍看，不敢看；没想到这竟是我俩的永诀。

1960年春，听闻陈家门车站有家店卖肉包子，生意很红火。而且只在早晨卖，很快便卖得精光。长久无缘肉食，我也想解馋；无奈有夜读习惯，早上爬不起床，不能一饱口福。忽一天传来消息，有人从包子中吃出人的手指甲。我大惊失色，恶心不已。又闻在陇西县某偏僻山村，儿子将刚断气的母尸背到土豆窖里，将之吃得只剩头颅后逃匿。言者告知我其真实姓名，足见所言不虚。我听了头发根根竖起，过去只知人相食，尚不闻子食母，历史又开新篇章！

1959年，在陇西与武山之间发生了鸳鸯镇农民“反革命”案。这时判决下来，到处贴着布告。此案中，判斩立决的有好几个农民。我几乎每星期都要进城，在东顺化工厂与城区之间，我先后两次发现了倒毙的饿殍。在铁路路基的斜坡下，我看见的是大人的尸体。我不再像初看到女孩尸体时那样震撼，那样不可遏制地狂飙冲动。不是我的心变冷变麻木了，而是泪已流干。每次我都到县公安局去

报案，请他们派人去掩埋。只有这样做了，我才稍觉心安。

5月，张春元兄路过武山，顺道来看我。他说我在《星火》上所写的文字有见地，击中要害；同时他向我介绍了除东北而外各省的情况。他说，广东、广西、云南、贵州、湖南、湖北都很糟糕；四川、河南、安徽更甚，那里与甘肃一样，死人如麻。南方唯有江西稍安，尚未发生死人情况，即使有也是外省进来的人口。因为江西有省长邵式平坐镇，他甘冒右倾风险，给江西人带来福祉。张兄又告诉我，不论白天黑夜，二十四小时的分分秒秒都有人偷渡越境；人们像潮水般往外涌。为了活命，不少人付出了生命代价。外逃的人中，男女老幼、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已到了疯狂的程度。

我向他通报了杜映华的大致情况，张春元说，庐山会议证明党内正直有识之士大有人在。即使眼瞎耳聋，也能嗅出全国的狼烟尸臭，只是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屈服于一个人的淫威罢了。这种局面断不能长久，我们要和党内的健康力量、和一切良心不泯的人共同奋斗。张执意要见杜映华，我勉强同意了。他俩从未晤面，不便多谈，只寒暄了几句，张春元便告辞出来。

时值中午，张兄和我平展展地躺在铁路的南坡上。这儿离车站不远，荫凉僻静。张兄对我说：“下期《星火》要印它数千份，争取寄到每位县级干部手中。要加快写稿组稿，争取第二期尽快刊发。”我甚赞同他的构想。他沉吟良久，又道：“大江南北，黄河两岸，遍地哀鸣，尸骨成山。现在很可能只是开始，更严重的情况还在后头；我们处在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危急的时刻。这场旷古浩劫源于个人崇拜，源于根深蒂固的封建观念和独裁专制制度。为人民幸福，为实现民主制度，千千万万先烈付出了生命，现在轮到我辈了。我们要与党内外一切仁人志士共同奋斗。否则农民的悲惨命运无由解救，国家无望，民族无望。”

当我还是黄口小儿的时候，张春元兄已经上了朝鲜战场。他是坦克兵，也是个血性青年。他对农民有深厚的感情，我很尊重他。

送走张兄，我立即动手写《食母记》。我想把它写成一篇报告文学，因为是真人真事。动笔之后却为了难，我只知主人公的姓名和

故事发生的大致地点，无法去当地做进一步的探访核查。这显然不符合报告文学的要求。不得已，我保存了主人公的姓名和地点，将这件事写成了短篇小说。那时正值年轻，激情汹涌；一字一句犹如蘸着血和泪在写，仅用了三个昼夜便脱稿了。

七、进地狱的时刻

一天，我接到父亲的来信。父亲已老眼昏花，信是小弟代笔。他在信中告诫我说，要老实改造，争取早日获得党的宽恕，尽快回校完成学业。信中还夹着一张小纸条，弟弟特地向我汇报了×××姑娘的情况，这正是我急于知道的。自1957年暑假一别，眨眼三年；我只给父亲写过一信，报告他我仍活在世上而已。除此我还能写什么，又有什么可写？我未曾给×××写一个字，非我绝情，实在是不知道该寄去哪里。我既内疚也很痛苦，现在终于知道，由于抗不住父母之命，她已出嫁了。分别之后她曾经常到我弟跟前打听我的消息，待我弟如同亲弟，对他多有照应。

自古以来忠孝难两全，为了千千万万的父母，我只能舍小家顾大家。何况老父亲还有哥姐和小弟在，比家破人亡的农民强多了。裴多菲写道：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此前我意已决，为难的是无法与×××通信，告诉她这个残酷的决定。现在好了，她终于有了归宿。我去掉了心病，内心唯愿她生活幸福，再无别的挂念了。

6月，突然传来老谭在边境被捕的消息，形势急转直下。春元君曾告诉我，五一节老谭住在广州某旅社，突遭大搜查，谭被押进收容所，还扣下了她随身带着的八百元现金，这是春元君写电影剧本《中朝儿女》所得的稿费。在当时，八百元不是小数目，相当大学毕业一年半的工薪。收容所要谭蝉雪回兰大，待学校为她开出证明后才会把钱退还给她。她没有回校开证明，钱也不要了，一走了之。这次竟又出事，我判断不出数日，追查的人就会到兰大、天水 and 武山来。为验证我的估计，我赶紧给洛门同学发一短信，尔后我

亲到洛门收取，果然发现信已被侦查过。

此时，我身上有三篇文章：林昭的长诗《海鸥》、何之明的《再论人民公社》和拙作《食母记》。我把这三篇文字又认真地捧读了一遍，竟爱不释手，不忍焚毁。尤其是林昭的诗，她写得太好了！《海鸥》与她的《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可谓姐妹篇，撼人心魄。拙文是从我的血泪中流淌出来的，如今要亲手掐死它，犹如杀子，我难以下手。但我的理性告诉自己，在没有思想自由的制度下，这些文字足可构成死罪。为不株连友朋，我必须狠下心来，将三篇手稿付之一炬。

1960年9月29日，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一早来了位干部，他手持公函对我说，公社派你去贺家店，任务是将一盘水磨改造为一个轧花车间。紧接着来了辆马车拉我的行李和书籍。我感觉此事蹊跷可疑，但也只能受命前往。到了贺家店镇，此时已是下午四时许，有人安排我住在一间办公室里。我进房间后看到，室内有一张床、一桌一椅。靠里墙是个长条形的大面柜，我便把书全码在上面。靠窗的桌上有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那窗子上没有玻璃，用纱布遮着，纱布的颜色已经泛出黑黄，屋里像是长期没住过人。

稍稍整理一下床铺，吃了点食品，我便动身去水磨转转。水磨在东边的沟口，离住地不到两百米。此处两旁皆山，一条小溪从南山上流下来。水磨靠沟的西侧，沿沟直上就是去新寺公社的捷径。沟上方很狭窄，到了沟口才变得开阔。沟里有高大的白杨树和其他乔木。夕阳西下，山沟里光线黯淡，有几分阴森。我觉得索然无味，便折回住处。

在住处刚坐定，立即有两位自称管理区的人来访。他们王顾左右而言他，不一会便离去。此时我已非常清楚，他们是来验明正身的公安便衣。人在瓮中，要杀要剐，悉听尊便，何必多此一举。我随手点亮煤油灯，从面柜上选了一本要读的书。刚捧起欲读，忽的一阵风吹来，灯灭了。重新点亮，刚沉入书中，又一阵风，吹熄了灯。我不信鬼神，心却烦躁起来，对着窗外大声吼道：“既然是鬼，快快进门，莫扰我读书！”

十二点过，我刚躺下，尚未入睡。只听门外“哐啷”一声，有人破门而入；同时耳边响起一声厉吼：“不准动！”几支手电霎时间照得小屋如同白昼，其中两支手电直接对着我的眼睛照射。我床前站着四条大汉，黑洞洞的枪管抵到了我的鼻梁。

“起床！穿上衣服！”我无意反抗，顺从照做。接着是在逮捕证上签字，来人将我五花大绑起来；继而是满屋搜查。我没想到，对区区一介文弱书生，他们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我的书很多，除马列经典以外，其余是数理化、外语等大学教科书。四条大汉检查极认真细致，他们一页页地翻书，从午夜一时直翻到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翻完，一无所获。

“对敌人的宽恕，就是对人民的残忍”，这早成了公检法人员的座右铭。那绳子将我捆得之结实、之狠，非常人所能想象。我先是浑身冒汗，热汗之后冒冷汗。两条胳膊立时麻木，很快全身都麻木了。绳索嵌入肉里、骨里，神经阻断，除大脑以外，似乎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我心里道：林祥谦是人，能忍刀割之荼毒，我何以不能！我要呻吟一声就是孬种！结果，那挨绳捆的伤痕直到两三年之后才逐渐隐退。

搜毕，由绳捆改戴手铐。他们将我的行李捆成了背包，并令我背上，这才押我出屋。

天色灰蒙蒙、阴沉沉的，我被他们押到镇中一座大空屋里。这儿原是生产队的公共食堂，我的五名“劳考”同学应该在此用过膳的。如今它成了不见炊烟的空屋，屋里坐满社员，黑压压的一片。有的人坐着小凳，大多数人席地而坐，男女老幼都有。公安人员拿着事先拟好的文稿，朗声读道：

“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全国各兄弟单位的紧密配合下，在中共武山县委的正确领导和统一指挥下，我公安干警英勇机智，协同作战，一举破获重大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将涉案罪犯一网打尽，”……“这充分证明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威力，充分证明”……

此时，我心如止水，无惊无惧，无悲无戚。我逐一扫视面对我

的农民社员，他们无不面露菜色，对我并无痛恨之意。每与我目光相遇，便立刻避移。原设想会遇到雷霆怒吼，受到拳打脚踢，我已准备默然承受。但这一切都未发生，无一人呼口号，无一群众声讨发言。公安念毕文稿，大会在寂静中散场。

在县看守所的所长办公室，所长履行了详尽搜身之责。他收缴了我的裤带、鞋带、现钞，手表。我一手抱着被褥，一手提着裤子，迈进了监狱之门。所长办公室墙上的挂钟指着这一刻：1960年9月30日下午四时四十分。

中 篇

炼 狱 行



第一章 在武山县看守所

一、“你的代号是十一号”

所长个头魁梧，肉头肉脑，粗俗不堪。他瞪起一双牛眼，凶狠地对我说：“你的代号是十一号，十一号即是你，你就是十一号。从现在起，不准使用你的真姓名，不得向任何犯人透露你的真姓名。否则，后果自负。”他打开小三号的牢门，我刚进得门里，大铁锁“哐当”一声，他锁门走了。

我立时沉入到黑暗，什么都看不见了；只能原地伫立，静待瞳孔放大。这是大白天，屋里的亮度有如傍晚，依稀能辨出一些东西。靠山墙是个土炕，炕下的地面有一公尺宽。门的北侧有扇窗子，上面是铁栅栏，旧报纸将玻璃糊得严严实实，泛出微微的黄色。门框下有个“猫眼”，门背后有只木便桶。这是单独关押的小黑号，总面积有六平米大小。

放下被褥铺好床，山墙的另一边传来咔嚓、咔嚓的铁镣声。我听到女囚的哭泣，又不知哪里突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那声音凄厉，但我也不觉毛骨悚然。即使在监狱外面，这种声音还少吗？我坐在土坯砌的炕沿上听了一会，难以分辨出哀号的缘由。经过一天的折腾，三十多小时未得睡眠，加上浑身痛楚，我已精疲力竭。该想的后果早已想过，疲惫难耐，我上床和衣而卧。

躺在炕上，原本麻木的上肢此时疼痛异常，处处都是火辣辣的。虽感觉困乏，依然难以入睡。我想到文天祥的《正气歌》、岳飞的《满江红》、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想到伏契克《绞刑架下的报告》，还有夏明翰的诗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

有后来人。”我又想到李大钊、林祥谦，想到在铡刀下壮烈牺牲的刘胡兰……

“报告班长，东一号倒尿桶。”

“去！”

我被大监号放风的声音惊醒，小屋里依然漆黑如墨，只有窗户显出一丝昏黄，门框的“猫眼”处漫进一束光，照亮了两寸远的一线地面。我翻身起床，“哎哟”，胳膊痛得钻心，一点儿使不上劲。我缓慢而困难地坐起身来，我必须坚持锻炼、晨跑，这是我的既定计划。我面对监号门原地跑步，皮鞋触到干硬的地面，发出响亮的“啪哒”声。没想到这脚步声起，一下带动了其他小监号，各个房间都先后“啪哒”起来。声音震耳，惊动了高墙上的哨兵。在他们听来，这像是无言的挑战吧。哨兵大声命令：

“不准跑步，立即停止！你们要找死啊！”

高墙上哨兵来回奔跑，我听见了拉枪栓的声响。我和其他跑步者根本不理睬，脚步更加整齐，声音愈加响亮。我边跑边给自己计数，每跑一百步勾一个手指。我拟跑到五千步，直到后背心微微有汗，以达到锻炼所需的运动量。跑完步，我还拟做一套“劳卫操”。只是两条胳膊无论如何都抬不起来，我只能活动一下脖颈和腰部。

哨兵咋呼一通，然后悄无声息了。我们的晨跑此后再没受干涉，我知道那些“啪哒”作响的皮鞋声来自我的诸同学，他们与我一样，几乎是在相同的时刻进到这地狱之门，只是一时无法辨别谁在哪间号子里。

这天早上，我这个小监号没放风倒尿桶。有人在我的牢门上踢了一脚，低声喝道：“接洗脸水！”猫眼处递进一只小号瓷缸，水只有半缸子，勉强能蘸湿毛巾。约九点许早饭，牢门打开，强光射进来，闪电般刺目。定睛一看，门外有四个人，想来是同类。两个壮汉抬着菜桶，一个人拿马勺打菜，另一人端着簸箕专门发馍。拿马勺的人看年纪刚过三十，红光满面很精神，看不出犯人味儿。即使在牢笼外面，也难见到人有他这种气色。发馍的那位长得干瘦，气质颇文雅，一看便知是知识人，年纪约在三十左右。那拿勺的一

位对我道：“奉政府指示，十一号吃劳动饭，拿碗来！”他用马勺在菜桶里搅了搅，舀一勺，又递给我一个稍大的馍。接着他们锁好牢门，去了下一个监号。

馍是糜面的，湿重约四两。菜汤里有甜菜叶，偶见块根切出的一二薄片，汤里有一丝甜味。

牢饭竟是这等好东西，比外面农民强多了。农民如有这吃喝，何至于短时间饿死。农民连犯人也如，他们若是知情，一定会挤破牢门蜂拥而至。

我哀叹自己愚蠢，当我还是自由之身时，面对老乡们的饥饿一筹莫展。现在的我多么想给奄奄待毙的人们通风报信，快往看守所、监狱闯，要求当犯人。如不被接受就故意犯事，总比白白饿死强啊。

我何止愚蠢，也是幼稚到了极点。尽管事先有思想准备，一切还是大出意料。我在书上读过、在电影上看过形形色色的监狱：古代的、现代的；外国的、中国的；国民党的、希特勒的、日本鬼子的……却不知会没收犯人裤带、鞋带。为了跑步，我只能将毛巾系在裤袷上。我更不知有黑牢，犯人被全日置于黑暗中。《红岩》里有中美合作所“渣滓洞”，只是到大厦将倾时，国民党才将共产党员许云峰关到地牢；而那也只是地下室的一个单监而已，也是有光亮的吧。我如今却是被关在完全不见光亮的黑牢里。

诗人赞美太阳，说她把光明和温暖均等地奉献给每一个人，现在方知大谬。天公虽有美意，专权者置之不理。天底下唯权为大，上天赋予人的一切本能和权利都被剥夺。人长大脑要思考，不准；否则就是反党。人要生存，必食可食之物，不给；只能以薇蕨、树皮、观音土代之。人有独立人格和尊严，一概废之，只要驯服。阳光会带来希望，激励斗志，当然也不能照到犯人，焉能叫“反革命”白白利用！

黑暗，除了黑暗还是黑暗。黑牢里分不出白天黑夜，无法知道何日何月。我逐渐体味到，把人置于无休止的黑暗，实在是治人杀心。比起脚镣、手铐、电刑、老虎凳、鼻子里灌辣椒水，甚至与酷吏来俊臣的“烤瓮”相比，这种手段还要远胜几筹。长久的黑暗可以

令人精神失常，变成白痴甚至是活尸。这是谁的发明？实在值得历史学家去做一番考证。人类社会自有分工和阶级以来，就有一类人专修整人之道。许多共产党人坐过国民党监狱，想来也最懂怎么修理犯人。不仅如此，必然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

在隔日放风倒尿桶的十分钟里，我对外部环境才有所观察。小号子一溜七间，由北而南依次为小一至小七号。小一号斜对着监狱大门，小七号的南边是厕所。厕所系小号与大号共用，中间隔了一堵墙，下面尿尿相通。这排小号的门面对着大墙，与墙相距约三尺许。大墙高五六公尺，矮小的监号罩在它的阴影里。

墙上的哨兵居高临下，对所有监舍虎视眈眈，枪刺在阳光映照下，闪烁着寒光杀气。没过几天我已经开始有了判断，根据脚步声和偶尔的咳嗽声，我知道其他小号也关着我的同学：小一号关的是田昌文，小五号关的是苗庆久，小七号关的是何之明。苗庆久代号十三号，何之明代号十五号。我只是不知道小四号和小六号关没关人。小二号关了贾老汉等，至少有两人；另一位又是什么人呢？

最令我迷惑的是小四号，那里脚步声若有若无。我怀疑在我与苗庆久之间，可能有个监视的“钉子”。苗庆久与我一样吃的是“劳动饭”，在所有同案同学中，只有我和苗受到了“破格优待”。我心里清楚，这优待是要留活口做反面教员。不劳动而吃劳动饭，一定是案情重大，只有在阎王那里注过册的人才可享受。它没有给我带来心理负担，一切在我预料之中。

在七个小监号中，除我而外，还有谁被关入黑牢了？将贾义老伯抓来又为哪桩？想到冯淑筠君因我而罹祸划右，心里就痛楚愤怒。如今贾老汉又因我和苗庆久株连而身陷囹圄，更令我心如刀割。他已是六十好几的人，怎么受得了这痛苦？他老伴带着小孙女，日子又如何打发？

黑暗、孤独、饥饿，三个恶魔步步向我压迫过来，咀嚼我的灵魂，窒息我的呼吸，吞噬我的肉体；我只能听之任之。人，只有在这时候才体会到自己何其渺小与无奈，生命不如蝼蚁。

一天早上，开罢牢饭不一会儿，牢门忽地“哐当”打开来。所

长立在床沿对我道：“十一号！起来，给你剃头！”门外跟着个犯人，一手捧个小木盒，一手拿块戥刀布。

我躺在铺上一动未动，不理他。自从黑乎乎的枪管指着我的鼻子的那一刻起，我已有二十多天没吭过声。所长又厉声吼道：“十一号！起来！你聋了吗？”我依旧懒得理他，看他如何是好。这家伙于是动手拉我，我用胳膊猛烈地甩开了他。由于用力过猛，受伤的胳膊钻心地痛。我只能慢慢地扭过身来，再问道：“这是谁的规矩？有法律依据吗？”

“所有犯人都必须剃光头，你不剃由不得你！”

我咬牙扶住了像被折断的胳膊，站在地上对所长怒目而视。

“你官小权不大，弄出纰漏怕你担不起责任。回去转告你的上司：凡无法律依据的规矩我一律不承认！头不剃，要剃就连头一并割去，省得一次次麻烦！”

我努力克制自己，他并非我要打交道的人，无须同他多费唇舌，只这冰冷的一句足够他受用了。

这位憨汉没想到我竟敢挑战他的权威，鬓角鼓起了青筋，他怔怔地盯视着我。待他出门时，我又道：

“转告你的上司，我是政治思想犯，我要享受政治犯的一切待遇。洗脸水要多，还要漱口水。我要读书，读你们提倡的马列主义的书，你们没理由拒绝！”

此后所长再未来提剃头的事，洗脸水、漱口水也给得多了。每早从“猫眼”里递水，递进来三四次。我脑中不断浮现这种念头：只要他敢侮辱我的人格，动我一个指头，我就绝食到底，提前结束生命。我已无反抗能力和斗争本钱，只能以命相赌。而生命对我已毫无意义，早一天晚一天都是一样的。

二、“我是政治犯，要享受政治犯一切待遇！”

两个月了，小监号一点不见动静。我身上的油水耗尽，饥饿感一天比一天强烈。早上我依旧起身原地跑步，步履日渐沉重。同学

们的步伐也没有开初那般齐整响亮，时间也短暂多了。我吃劳动饭尚且体力不支，那些吃小馍的同学更是可想而知。估算了一下，我吃到嘴里的“朽粮”每月是十八斤的样子，那些吃小馍的每月不过十二斤左右。我亲眼见到，那小馍比我拿到手的小得多。我必须减少体能消耗，跑步量降下来，逐步降到两千、一千、五百步。大约半年后，我连跑步也跑不了了，只能在炕下坚持慢走。我头晕，四肢软得像面条。

糜面馍引起消化道障碍，三天才解一次大便。大便解不下来，只有蹲在便桶上，浑身鼓劲，累得满头大汗。就这样，一次得蹲个把小时，后来形成了习惯性脱肛。大便时大肠头随之而出，只得用手托着慢慢送回去，痛苦不堪。我深知照此下去，很快我会被拖死、磨死。我必须抖擞精神，拿出全部意志力与之抗争。我所能做的，唯在两顿饭之间不上炕躺下，坚持在这两米长、一米宽的空间来回踱步。我一面交替搓揉两条胳膊，使其恢复功能；一面不断提肛深呼吸，以图脱肛现象得到改善。我就这样锻炼着，直到过于疲惫，才到炕沿上坐一会儿。

黑牢里时光难打发，孤独与寂寞像毒蛇咬噬我的心。我想到亲人，我的父亲、早逝的母亲、我的兄弟姐妹，还有众多的同窗好友。如今他们身在何方？又在做什么？我想交谈，想给他们写信；但这一切全是妄想。我只能与墙壁、与脚下的大地、与黑暗对话。若是写信，信寄给谁，谁就会遭厄运。“家书抵万金”“恨别鸟惊心”，这些名句时时跳跃出来。一声鸟鸣会令我想到杜鹃啼血，一声雁叫会记起鸿雁传书……

大墙的南墙外是县城唯一的操场，偶尔也传来踢球声、奔跑声和呼喊声。我能想象出来，那里有一群天真无邪的身影。我比他们大不了多少，原本也有娱乐游戏的精力和权利。为了他们，我将我的权利割舍了。夜阑人静，大墙外传来婴儿的啼声，更使我怦然心动。在黑暗的笼罩中我仍感到处处有生命的搏动，它勾起我对生的眷恋……同一时刻里我也想到，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多少老人和稚童了无声息地饿死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东顺渭河畔的那个小女孩。

我想到裴多菲的名句，全世界总有几亿人能吟唱，可有多少人领会到了它的内涵？我猜作者是蹲过监狱的，否则他写不出来。

小号没有动静，大号子却在日夜提审。从进进出出的“报告”声中，我辨别出来，大监里关押了我的许多同学：杨贤勇、孙和、谢成、陈德根等全在。我这一案的当事人都是以代号为名，从我这“十一号”开始，全用单号，直到四十几号。我无法知道何以会株连这么多人。

我渴望战斗，早已做好了出审准备。但我的对手不急，他要用黑暗、孤独与饥饿来拖垮我。最严酷的是黑暗，三个多月里，我未见一缕阳光。我感到整天晕晕乎乎，身子轻飘飘的。“猫眼”处漫进一丝光亮，我把毯子铺到地上，脸贴到“猫眼”处，让这一丝光亮全落到脸上，以增加些血色。无论如何，不能给人病态模样。

“猫眼”约十公分见方，目力所及不过盈尺。我看见几只蚂蚁在寻寻觅觅，慌张而匆忙，无一得食者。我心里想，这是几只蠢蚂蚁，大墙里的人几成饿鬼，哪里还有馍屑可寻？赶快逃难去吧。虽一无所获，看它们一个个还挺精神。难道它们是以土为食吗？它们有将土壤分解或合成以供生存需要的本领？中学时学动植物，可惜对蚂蚁食性了无印象。我忽然突发奇想，人若能以土为食该有多好，再不会饿死。然而，土既可食，必有人千方百计据为己有。权大者则土多，无权者便无土，照样还是有人饿死。沉浸在没日没夜的黑暗中，各种古怪的念头纷至沓来。

忽一天开牢门打饭，我看见了书记张克仁。他拿着一串钥匙站在门边，嘴里叼了一支“大前门”香烟，一副安闲自得的样子。他看着身边劳务犯发馍打菜，自己逐个开牢门，锁牢门。此时他也认出了我，他的独眼定定地审视着我。我们在大炼钢铁时打过交道，彼此是认得的。现在，他是全看守所的犯人大组长。

原中共武山县委第二书记张克仁，我和他一起多次吃过饭。此人乖巧奸猾，总把“一把手”捧到前台，迎合张十存喜欢表现、乱“放炮”的心理。他和张十存两人利欲熏心，把武山县搞得鸡犬不宁；老百姓背地骂他们是两个“大坏种”，死有余辜。我在外面就

听说过，张克仁是个衣冠禽兽。任职期间他在县城嫖宿，出差下乡曾逼奸良家妇女。就这样还不满足，他竟然鸡奸他的通讯员，以前有几个通讯员都被他蹂躏，迫于权势不敢揭发。他比我先当了犯人，给他送礼进贡的人依然络绎不绝。现在我亲见他叼着“大前门”烟，活得轻松潇洒。当时实行配给制，“大前门”是甲级烟，只供应县级领导。可见“虎死不倒威”，在外面他为所欲为，当犯人仍然吃香喝辣。这种坏人、恶人，处处还享特权，真是岂有此理！

我越想越气，用皮鞋猛踢牢门。哨兵在高墙上叫：“不准砸门，找死啊！”我继续狠踢，响声更大。

哨兵问：“你要干啥？”

我道：“叫所长来！”

所长出现在我面前。“啥事？”

“我要抽烟！”

“犯人不准吸烟，这是规定。”

“张克仁是不是犯人？”

“他是上级领导特批的。”

“犯人也分三、六、九等？你们搞封建等级制够彻底的嘛。”

“张克仁入监前是县委第二书记，分管公检法；你捕前是反党右派。张克仁是一般刑事犯，你是现行反革命。能比吗？”

他振振有词，“政策水平”还不低哩。

“你知道何谓右派，何谓左派？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革命？你不懂。你只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我是不是右派、是不是反革命，历史终归要出来说话，无须同你嚼舌。我的良心、人格、道德比张克仁高尚一万倍，我与他如同人与畜，不能类比。你连这个都搞不清楚，还颠三倒四，实在可怜得很、可悲得很啰。”

我本想破口臭骂他一顿，但动怒伤元气；我精力有限。

所长眼露凶光，那样子像要一口吞了我。

“你太嚣张，太猖狂！你谬论再多，烟就是不准抽！”

“你搞错了。你既无权批准我抽烟，也无权禁止我抽烟。你的职责是转告你的顶头上司，这烟我非抽不可！”

当他气呼呼地出门时，我斩钉截铁地补了一句。

烟，我此前点滴不沾。父亲家教极严，他不沾烟酒，也如此要求子女。我从未有过吸烟的念头，现在要吸烟，只是发泄愤慨，也是对当局寻衅吧。

没想到事情解决得这么快，隔天早上放风倒便桶，所长给我拿来一只木柄新烟斗，又递给我一包末合杂拌烟丝。他说：“允许你抽烟，但不允许拿火柴。张克仁每天给你送两次火。”

烟丝呈深褐黄，形同木屑，是属于乙级或丙级的那种劣质烟丝。我很快发现，它未能给我带来好处，反而呛了肺。每抽一口我的嗓子都火辣辣的，咳嗽不止。并且，张克仁每次进门送火，我都心生恶念，恨不得动手掐死他。理性告诉我，现实问题并非起因于个人，而是制度、体制的必然。张十存、张克仁都是体制召唤下跑出来作祟的魔怪，不改变体制，置一人于死地毫无作用。黑暗中，望着烟斗里的一撮火星，我想到我与苗庆久刻印的《星火》。此时内心的信念又升腾起来，只要普罗米修斯精神不死，光明终将照亮中华大地！

元旦过后，小二号有忙乱的脚步，传来互道珍重的告别声。接着是锁门的声音，然后又是一片死寂。贾老伯伯经过三个月的甄别，无罪开释。贾老已年过花甲，他若有个三长两短，大妈和小外孙女也断绝生路，事关三条人命。我为贾老高兴，为他全家高兴。

一天刚吃罢晚饭，所长领着个单瘦的小个头干部来到我这黑牢。平时所长来巡视，他踱步或坐在炕沿，或躺在炕上，我对他都是不屑一顾。这种干部见得多了，十之八九都是二混混，我无法待之以礼。如今又在两个营垒，更是水火不容。而这一回所长说：“十一号，这是丁局长。”我才慢慢转过身来，且盯视着他抗议道：

“我是政治犯！你们凭什么关我黑牢？你们不给我光明，说明真理不在你们手中，你们害怕光明！我要读书，读马列主义，你们无权拒绝！你们禁止我读马列主义，证明你们背叛马列主义！我抗议！强烈谴责一切虐待迫害政治犯的法西斯行径！”

这些话是我早考虑好的，苦于见不到权势人物，一直埋在心头。如今见到这位大人，立刻连珠炮般爆发出来。我判断，他必是我的

对手之一，今天他来，无非是要熟悉他的对手。他把我审视一阵，尔后回应道：

“你是现行反革命罪犯，案情重大。我们国家没有政治犯一说，我们不承认所谓政治犯。现行反革命犯在一切罪犯中是我们最凶险的敌人，对敌人如何处置，那是我们的权力。你再抗议也枉然，不过，有的要求我们可以考虑。”

三、第一回交锋

小号有了动静，最先被提审的是小七号的何之明。何之明正直、热情，能干又有才华。他撰写的《再论人民公社》一文，很有见地，我很欣赏。何是湖南长沙人，出身旧官僚家庭，上有六个兄弟姐妹，他是老七。大哥何之光大他十多岁，抗战前已大学毕业；因不满国民党腐败，投身革命参加了共产党。何之光以家庭背景为掩护，做过许多有益工作。抗日时期他参加了中共的东江游击纵队，并任重要职务。解放后出任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常在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上发表有分量的文章。我中学时代读过，印象深刻。

何之明比我大两岁，个矮壮实，练过体操，体质不错。他1955年考上兰大物理系，因他大哥当时正接受肃反审查，株连到他被取消入学资格。第二年他哥的历史做了结论，他再次参加高考并被录取。但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五七年兄弟双双都被打成了右派。

提审何之明多在白天，我几乎每次都能从他的脚步声中得知。他的皮鞋声从小监号的南端老远传来，往返都要经过我的牢门。我一直没有发现苗庆久被提审，我对他很熟悉，能分辨出他的脚步声。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意识到，老苗大约与我一样，都是在深更半夜被提审。

大约是四五个月以后，何之明君从小监号调到了大监号——东二号去了。

元旦后不久，忽一个深夜，我的监号门突然打开，一束手电光照射进来。“十一号，起来！穿好衣服！”那声音低沉、威严。

我渴望提审，渴望战斗！这是我期盼已久的，我迫不及待，但此时还不准备开口。

出得看守所，穿过小县城唯一一条主街，我被带往看守所正对街的县公安局。身前是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引路，身后紧跟两个武警，一左一右。街上漆黑，手电筒的光在我身前脚下晃动。穿过县公安局的前院，我被带到了后院的预审室里。

这屋里很亮堂，一百瓦的灯光有些刺眼。环视室内，我看到，这个房间并不很宽但很深。我正面摆了三张桌，桌边坐着两个人，其中之一是才认得的丁局长，听他口音像是甘谷人。他的右侧是个身材颇高的中年汉子，穿着考究。两边当属书记员角色，两人都很年轻，手边放着纸笔。我的位置在他们正对面，背对着门。我身后和两侧，七八个武警呈弧形站着，都是彪形大汉。

有人指着椅子，示意我坐那儿。椅旁有一方凳，上置一杯水。我与审问者之间足有五六米距离。

我对如此布置有两点估计：他们要与我“文斗”，采取软化的方法。他们预防着我可能的暴烈行为。看来，他们对我有所了解 and 戒备。

丁局长环顾左右，象征性地征询了开审意见后，他问道：

“你的姓名？”

“你的籍贯、年龄？”

丁：“你怎么不回答？”

书记员找梯子下楼，自问自答道：“你叫向承鉴，汉族，现年二十一岁，江西武宁人，捕前系兰州大学化学系右派学生。对不对？”

丁：“向承鉴，你是个聪明人。你自入监以来受到人民政府种种照顾和优待，不可能不知。现在你应配合政府，主动交代罪行，早日落实问题，争取政府的宽大处理。”

丁：“你是有知识的人，应该了解党的政策。党的一贯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根据我们掌握的证据，你的罪行非常严重，你已站在悬崖边上了，再不回头，必自绝于人民！”

他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只要不满足我的读书要求，决不开口说话。我等待着一切酷刑，准备承受一切痛苦。

丁唱着独角戏，他身旁的那位汉子始终没开口，只是阴冷地审视着我。我分析，此人才是这台戏的真正主宰。

丁：“你不要错估形势，以为你不开口，抗拒交代，我们就不掌握你的犯罪事实。明白告诉你，你的同案都交代了。你的罪行铁证如山，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我们要你主动交代，是给你争取从宽的机会。你即使一句不开口，我们照样定罪，从严惩处！”

他隔几分钟说几句，有的是“开导”，有的是恐吓；有生的引诱、死的威胁。我依然无言，他的话几火车皮装不完，在我听来分文不值，全是废话。

“审讯”约莫持续了两小时，我已经做好了受刑的准备，反正不开口。丁与他身旁的那个人低声叽咕一阵，将我押回了看守所。

过了几天，所长打开牢门。他身后跟着两个犯人，一个抱着一大摞书，另一个拿把靠背椅和小凳，还有盏煤油灯。他们把东西放在地上和炕上，立刻出了门。我连他俩的脸都没看清，这时所长说：

“经上级研究，同意你读书。不过你要安分，不得有越轨行为！”他又递给我一支自来水笔和一小盒火柴。

“还要手纸和牙膏。”我平淡地说。只要活一天，我就要像人一样生活。他没理我，锁门走了。

“我有书读了！”我在心里呼喊，几乎冒出声来。

读书权的获得来之不易，还是我的“闭口令”起了作用。任何时候对独裁者的乞怜不如斗争有效。我迫不及待地点亮煤油灯，黑牢里顿时有了一片光明。呵，我的书，我的笔，久违了！像挚友重逢，我亲切地抚摸着它们。

我把书在炕沿边码放整齐，将靠背椅的靠背顶住便桶，再将煤油灯放在椅子上。我坐着小凳，就着煤油灯，如饥似渴地开始读书了。

有书读，我不再孤独寂寞。我可以同书的作者对话、辩论，可以尽情评论书中的观点。有人把书比喻为精神食粮，实在太恰当不

过。虽然它不能当饭吃，但全身心沉入书中时，却会忘记饥渴。没有书读，时刻感觉饥肠辘辘，胃肠像索债的小鬼，时刻在催逼、拷问我的神经。我吃了上顿盼下顿，时间漫长难熬。尽管想着糜面馍的念头太无聊，却无法控制生理上的神经反射。

如今，我一口气从上午九点半读到下午四点，不觉中等来了下一顿的“朽粮”。时间变短了，不再那么难熬。

拿进来的书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集》等，这是我在外面已经读过的，而且不止一遍。现在重读并不觉得厌倦，恰恰相反，由于情境不同，我发现这经典中的许多观点值得质疑，也需要反思批判。

然而，这里毕竟不是读书的地方，即使再想读书，也不得不停顿下来，做一点自我调控。小监号密不透风，唯一和外面通风对流的是那只“猫眼”，但它太小，煤油灯点的时间长了，油烟弥漫，乌烟瘴气，连呼吸都困难起来；我鼻子里以及咳出的痰全是黑的。我无法夜以继日地读书，于是便取消了晚饭后的夜读。两顿饭之间只能读四小时左右，烟味太浓了就得熄灯。

尽管可以点燃煤油灯，而小监里亮光依然有限。屋上的檩条影影绰绰，我数了又数，一共是二十一根。瞪大眼睛搜索，我终于发现除我之外这里还有活物，那是两只蜘蛛。一只在东南角山墙的上方结网，我无法触到它；另一只就在便桶的上方，举手可及。我用火柴梗拨动蛛网，想观察一下另一端蜘蛛的反应，它却一动不动，似乎早已知道我的空城计。我站到靠背椅上去拨弄蜘蛛的身子，它无意逃避。为什么它是不动的呢？难道知道我不会加害于它，或者它已经饿死了，只留下了瘪壳？我无法判断，想来这小家伙还是太傻，在这个鬼地方守株待兔能得到什么，连蚊子、苍蝇也飞不进来啊。

一天，张克仁领我去所长办公室。所长正在将一套新棉衣翻过来倒过去检查，他从衣领到腋下，到处都揉捏了一番。和棉衣一起送进来的另有一双胶底棉鞋和一副棉手套，所长把鞋带和连接两只手套的布带也取下来，照样过细地捏搓着，他把鞋底也翻过来观察。

就这么折腾了好一阵，才将衣服和鞋子等递给我。

我问他是谁送来的，能否见送物者一面？他像个聋子、哑巴，铁黑着脸，没给一句话。他对我切齿痛恨，无非是我从没把他放在眼里。此刻我对他更是厌恶了，真是个混蛋！连谁送的或者寄的东西都不告诉我，岂有此理。

我太需要这些了，眼下已是隆冬，旧年快到了，冬衣来得正是时候。

回到黑牢急忙点灯察看，这是一套崭新的深蓝色双面卡棉制服，里子是浅蓝色平布，从检查时扯开的衣缝处看，露出的棉花也是新的。我脱下青滚身将它穿在身上，长短肥瘦非常合体，身上顿时感觉暖融融的。棉鞋也可脚，如同亲往鞋店试穿过才选购的。棉手套是黑色的，大拇指单独，另四指合在一起。可能是布料不够，手套里子用了不同的布，一只是蓝格平布，另一只是花格平布。

眼下滴水成冰，加之狱中营养极度匮乏，我身体虚弱，尤其畏寒。一个月前我便早早地全副武装起来，但我只有一套毛衣毛裤。我上身穿着那件薄薄的青滚身，下身还是一条呢料外裤。这点东西熬不过冬天，我计划用毛毯裹身，无论如何不能把自己冻死在牢里。

毫无疑问，棉衣和棉鞋这么合身，一定是和我最亲的人送来或寄到的。谁会甘冒受株连的风险做这件事？父亲了解我，可继母对我感情淡漠，他们不可能知道我出事。即使是知道，家里的情况也无法给我缝制这么体面大方的棉装。胞姐对我至爱，但她在千里之外，可能性不大。我想到大哥女友的母亲、远在太原的张大妈，又想到百泉的李大娘，还有贾义的老伴……都有可能，无法肯定是谁。疑问在我脑中盘桓，内心感动得无法入睡。

这是多么宝贵的亲情啊，这些衣物的价值不仅在于物质，更在于精神。倘无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气魄胆识，怎能突破政治高压和株连的天网？我心中漾起一阵阵暖流，我愿为报答这种爱而献出一切，正所谓：

河山横白骨，那堪民倒悬！唯有一腔血，拿来祭轩辕。

四、“刺刀见红”

阴历年前，等来了第二次审问。还是在漆黑如磐的深夜，还是老地方，一切如同第一次。唯有一点区别，小凳上居然有一盒飞马牌香烟。无论烟和水，我决定一点不沾。对于那些程序性的询问，一概不予回答，我还反问道：“你们逮捕我三个多月了，连我的姓名还不知道，是不是抓错了人？如果知道，何必多此一举。”以下是当时的一番对话：

丁：“向承鉴，我们破格准你抽烟，又破格准你读书，说明我们共产党光明磊落，政府还在挽救你。你要老实交代问题，不要不知好歹。”

向：“我预先向你们交代一下我此时的真实感觉：善恶颠倒，荒谬绝伦！我认为我和你们应互换位置，这样才符合公理民意。”

屋里光线明亮，从他们短暂交换眼色的神情中我判断，他们依然没有预料到我会如此回答；空气像是凝固了一阵。

丁：“你现在对我们的诽谤、对人民政府的恶毒攻击，我们都已记录在案。你将罪加一等！你的罪行重大，给你的机会和时间你该珍惜。一意孤行，只有死路一条！”

向：“自落到你们手中的第一秒钟起，我就没有打算活着出去！奉劝你们把一切威胁、恐吓的话全收起来。至于我的所谓‘罪行’，我永远不会接受你们的观点。我了解自己远胜过你们，胜过一切人，就像你们对自己的了解也胜过我。我所想所作，从未有为个人、为家庭、为家族的半点私念，我罪从何来？何以为罪？你们称我为‘罪犯’、‘反革命’，我永远不会接受这一称谓。想当初，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旧政权的统治，被捕后哪个不被称为‘罪犯’、‘反革命’？现在我的情况正好和那时一样。”

丁局长身旁的那位中年人突然拍案而起，声色俱厉地吼道：“不准你污蔑共产党！不准你赤裸裸地进行反革命宣传！我们共产党人是全民族利益的忠诚捍卫者。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权就是反革命！这是宪法明文规定的，岂容你狡赖！”

我估计得没有错，他终于由后台跳出来。这才是审讯大戏的导演、我的真正对手。后来我听说，他是天水专区公安处的负责干部，陕西人。对他的淫威，我本不屑一顾；但对他的观点我要据理反驳。我对他道：

有理不在言高，不在于气壮如牛拍桌子。我不知你的身份和职务，但我认为你该是个有修养的人，我为你的举动感到汗颜。我只知真理不怕辩论，不怕批判。你不准这，不准那，无非拒绝辩论，不准我开口说话。这唯一能证明的是你内心的空虚和恐惧，证明真理不在你手中。是的，在过去的某个时刻，共产党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人民的利益，但那是过去，不是现在。你们正把中国拖向封建复辟的道路，现在的社会比旧社会有更多的压迫剥削、更多的不公；有更多的血腥杀戮——并非只对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对农民大众——残忍性超过旧社会地主豪强千百倍。当一个政党没有党内监督，没有人民监督，无限滥用权力，不知权力来自何处的时候，不可避免地滑向自己反面。你不会承认这个事实的，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任何人都抹杀不了。你们只是沿袭了共产党的称呼，而不是过去的共产党。你们是一群蜕化变质的假共产党！你们自己心里没数？需要我举出例证吗？

这位自恃手握尚方宝剑的人，面对我咄咄逼人的诘问，仍抖着专政者的威风，只是凶焰有所收敛。

我们共产党人信奉唯物主义，以马列主义理论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对阶级敌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你的无耻谰言诋毁不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正确，恰恰证明你是一个疯狂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个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凶恶敌人。我们决不对你施仁政！

我继续反驳他：

先生，你的话只最后一句说对了，是真话。至于唯物论、马列主义，不要侈谈为好。请问你这位马列先生，何谓唯物论？一亩地打几万斤粮，怕不是唯物的吧？大炼钢铁又炼出了什么？你们奉行

的是唯心论、主观意志论！你心里应该清楚，你们早就背叛了唯物主义和马列主义。你所说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弥天大谎，确切地说，你们实行的是对人民的专政、暴政！

眼见这位马列先生气得满脸通红，我更加亢奋和激动了：

你们剥夺了千千万万善良农民的生存权利，还恬不知耻地高谈阔论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者。如果千万个饿殍在地有灵，如果奄奄待毙的人们有表达自己意志的自由，我敢说，他们恨不得啖你们的肉，喝你们的血！你们所代表的仅仅是一小撮既得利益者、特权阶层，这就是眼下这个政权的全部涵义。

至于我个人，虽是年轻幼稚，还没有幼稚到幻想你们对我施仁政的程度。你们有权力将我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我随时恭候。

屋里静悄悄，静得能听到针落地的声音。我身后的七八个彪形大汉也没有发出任何响动。

这次提审长达三个多小时，回到监号仍满腔悲愤，不能自己。躺在床上睡不着，吟道：

我悲童叟饥，我哭尸骨寒。昂首黄泉道，怒斥黑暗天。

阴历年前夕，小七号悄悄换来新主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我的同窗挚友冯淑筠君。入狱后，我自己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唯独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几个大学朋友。我担心他们因我而蒙受株连，可这一切还是发生了。我无比愤怒，无限悲痛，简直要发狂了！

我的罪孽竟是如此地深重，我株连他划右，如今又株连他进了监狱，我心如刀剜。

冯君与我个性不同，我疾恶如仇，桀骜叛逆。而他沉默内向，逆来顺受，与世无争。如此大的性格反差何以成为挚友，我解释不清。或许如哲人所言，相反相成、相得益彰吧。我俩确有共同点：襟怀坦白、赤诚、善良，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出卖良心。眼看他即将毕业，已学有所成，家中又有妻小，这打击对他实在太沉重了。他对我的政治思想一无所知，与《星火》毫无关联。抓他简直是丧心

病狂，穷凶极恶到了极点！我自认坚韧的神经一下子癫狂了，痛苦和哀伤非笔墨能形容。苍天啊，我愿将人世间一切罪过、一切痛苦一人承担，赶快雷轰电劈将我化为肉齏吧！

那天夜里我走进预审室，一脚把小凳踢翻，一杯水泼溅一地，那盒飞马牌香烟飞到我前面的审判桌下。我狠狠地骂道：“少跟我来这一套，瞎了你们的狗眼！”不等审讯者开口，我怒吼道：“你们凭什么抓冯淑筠？你们滥抓无辜，草菅人命，丧尽天良！我抗议！”

我的愤怒一下子喷泻出来。

他们没料到我会如此肆无忌惮，沉默了好一会，丁才开口：

“专政的刀把子攥在我们的手里，抓冯淑筠自有抓他的铁证！你是泥菩萨过江，自身不保，还替别人操心，你不感到滑稽可笑吗？”

我道：“在你看来滑稽可笑，在我看来理所当然，义不容辞。我要像你们一样，处处只为自己打算，虽是右派，照样苟且活命。我和你们具有不同的人生观，我的心胸和情操你无法理解，就像我无法理解你们的所作所为一样。在你们的眼里我是罪犯，在我的眼里恰恰相反，你们才是真凶！你们大概都是所谓的共产党员吧，口口声声为人民谋幸福，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摸摸自己的良心，你们是这么做的吗？你们好话说尽，坏事做绝；挂羊头卖狗肉，欺世盗名！”

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用手指着他们大骂：

你们一个个吃得肥头大耳，戴的狐皮帽，穿的毛皮衣，此时此刻，亿万人民在受冻挨饿，啼饥号寒，在死亡线上挣扎煎熬！千千万万农民饿死在田野山岗，停尸在自家的炕上无人掩埋，哀鸿遍地，尸骨成山！请问：这是不是事实？你们眼没瞎，敢否认！但凡有一点良心人性，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你们绝对不是共产党员，没有一点人的同情心，没有一点人性，没有一点人味！你们是一群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彻彻底底的畜生，连畜生都不如！你们有什么

资格审问我！这才是善恶颠倒，才真正滑稽可笑。

“马列先生”一跃而起，重重一拳砸在桌上，一只茶杯盖震落到地上，碎了。他用手指着我叫道：

“在威严的专政机关，你竟敢明目张胆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辱骂我干警，反革命嚣张气焰何等猖狂！仅凭你刚才的反革命言论将你就地正法，也是你罪有应得！死到临头，你还执迷不悟！”

我朝前跨出一步，指着自己的胸口：“你为刀俎，我为鱼肉，你来呀！现在就朝这儿开枪！我要是眨眼就不是父母所生，就不是炎黄子孙！”

两个大汉上来将我拖回到椅子上，按住我的胳膊。我继续怒吼：“你们伤天害理，草菅人命何止千千万万，这是你们的权力，我一介书生何足挂齿。不过，你们终将受天谴、遭报应！”

丁道：“你对我们共产党的恶毒攻击丝毫无损我党的光辉形象，你对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诋毁，将作为你的新罪行记录在案，一切后果自负！”

他的语言干瘪贫乏，只能吓唬三岁孩子。笑话，后果当然自负，难道要我替我负不成！我针锋相对，毫不退让：

我已明确说过，你们不是共产党，你们信奉的不是唯物论、马列主义，你们搞的绝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说到底，你们搞的是个反动大杂烩，有原始社会的愚昧、落后、图腾崇拜；有中世纪、奴隶社会的黑暗、野蛮和暴虐；有比封建社会过之不及的等级制度，有对农民的压迫与掠夺；有假人道、假民主、假自由；你们集合人类社会发展各阶段的反动大成！在这些破烂的外面，蒙上一块光灿灿的“社会主义”金字招牌，到处招摇撞骗，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

中年汉子迫不及待地跳起来，证明我的话戳到了他的痛处。他歇斯底里一声怒喝，打断我的抨击与揭露：

你给我住嘴！向承鉴，你是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死硬份子，是最凶恶的阶级敌人！不管你对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仇恨、

攻击、谩骂、诅咒，不论你如何嚎叫，你们的反革命图谋已彻底失败，你们彻底完蛋了，谁都挽救不了你们灭亡的命运！

我一点不肯住嘴：

我不是你们这些胆小鬼，不敢承认事实。我正视事实，承认事实。不错，我失败了，不然现在不应该是我在牢里。但是，真理不会失败！真理终将战胜谬误，战胜一切邪恶！即使我的尸骨化为灰烬，总有一天，人民会替我讨回公道，历史将宣判我无罪！等待你们的将是正义的审判。正如现实中我逃脱不了你们的魔掌一样，你们一定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

记不得这次审问是如何收场的，只记得我的肩头始终有两只大手用劲按着，使我无法站立起来。

押回监号，所长给了我应得的奖赏：戴上手铐。

这是入狱后第一次戴刑具，手铐是土铐，它给我许多不便，不过并未造成很大的痛苦。本来我手腕就细，现在更是骨瘦如柴，所以手铐无法铐紧。我觉得自己是个颇称职的犯人，在审讯期间直抒胸臆；就算立刻被拉出去枪毙，我也无甚遗憾了。我对自己的下场不抱任何幻想，管它三七二十一，我先把要说的说了，免得以后没机会说。这番交锋，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快慰。回想那场激战，兴味盎然，点灯命笔，又写了首小诗抒发情怀：

你有和我有

你有强权；
我有真理。
你有手铐、脚镣；
我有手腕、脚踝。
你有刺刀、枪炮，
我有头颅、胸膛。
刀枪杀不灭真理；
镣铐锁不住思想。

五、杨森其人

正是春节时候。在悄无声息、更残漏尽的漆黑牢房，不由得忆起孩提时过年的情景。

除夕，总是母亲最忙。她操持着给全家人烧水洗澡，还要切菜，预备饺子馅。洗澡次序由长到幼，每人得到一大盆温水。先是祖母、父亲……母亲自己最后洗。洗完澡大家逐一更衣，从头到脚换上新帽新衣新袜新鞋。所有这些衣裳鞋袜都出自母亲一人之手，她以大改小，将旧翻新，早就准备停当。然后一家人围着火盆，包饺子聊天，守岁。

这时的我或者给弟妹烤糍粑，或是带他俩到屋外放花炮；直到后半夜熬不住了才去睡觉。大年初一，一大早便急不可耐地爬起来吃饺子。我最爱吃母亲做的饺子，那是用地菜（一种野菜，有细长的白根）拌一些肉末做馅，味道好极了，全家一年到头也难得吃上几顿。我要吃满满两大碗，撑得肚皮滚圆才出门拜年。直到天黑归家，一天也不觉得饿。

从初一到十五，小山城总是热热闹闹的。城外四方的社火不断涌进城来，舞龙的，耍狮的，踩高跷的，戏蚌的，划旱船的，抬菩萨的……有钱人家都几箩筐几箩筐地买花炮，我家虽穷也要买几挂鞭炮给小孩燃放。谁放得多，谁就更体面。

夜晚闹龙灯，全城成了人的海洋，欢乐的气氛一浪高过一浪。龙珠是用铁丝网住的一团火红木炭，火星飞溅，流光四溢。张着大口的巨龙紧随龙珠上下飞旋，穷追不舍。舞龙者头缠毛巾，光胸光膀，一个个身姿矫健。鞭炮在龙身上、舞者的身上、头上、脚下处处炸响。我与其他孩子在大人的胳膊下钻来窜去，又喜又爱，又惊又怕。上岁数的男人都穿着长袍看热闹，他们背着手挽着暖手炉。小孩专好恶作剧，跑过去将爆竹悄悄塞到手炉中，“叭”的一声，那人屁股后腾起一股气浪烟尘，大人见状好不惊慌狼狈。第二天满街是炮花纸屑，没及鞋面。人们踩在纸屑上发出“扑哧”“扑哧”之声，足见前夜的狂欢盛景。

我恨旧社会，它有太多的压迫欺凌，然而那时的老百姓依然还有欢乐开怀的时刻。万没想到，用鲜血换得的新政权，压迫与不竞争甚于旧社会。值此除夕之夜，高墙外没有响起一声除旧迎新的爆竹，县城里万籁俱寂。我，一个当年的少先队员现在变成反革命罪囚，在漆黑的牢里戴铐过年。

初一早，始闻几声稀稀落落的爆竹，如清明节上坟祭悼亡人。1960年过去了，多少人死无葬身之所？1961年来了，又有多少人将成饿鬼？

手铐戴了整整一周后才被解除。

早在何之明兄挪到大监号的时候，我便写了张纸条，时时带在身上。我想给老苗打声招呼，这纸条上只有六个字：摆观点，护友朋。我与苗相隔咫尺，却始终不得见面。春节后的一天，机会来了。

一个早上，我出门放风倒便桶。提桶路过小五号门口，见这儿牢门半掩。苗在门里露出大半个身子，穿着短皮大衣。我心里大喜，在厕所里将纸条揉成团，待返回路过他门口时，一下扔到他怀里。张克仁走在我前面，他丝毫没有察觉。以前放风由所长开门锁门，春节后改由张克仁担当此任。

然而，我扔纸条的这个小动作却没能逃过高墙哨兵的鹰眼，他立即大吼起来：“十一号串供！给十三号扔纸条。”一边跑他还一边拉枪栓，一下子惊动了所有看守，众武警像要立即向我开枪射击的样子。张克仁领来所长和两个武警，在我和苗的身上、号子里抄查，像过筛子一样过了一遍。无果，他们又把我叫到所长办公室审问。我一口咬定，没给苗撂过什么东西，那是哨兵看花了眼。

事情不了了之，但他们对我的警惕性更高了。过不多久，苗庆久和冯淑筠都被搬到大监号，这大约是在1961年4月份。

七个小监号如今只关着我一个人，这丝毫未加重我的孤独感。相反，我心里还轻松了下来。冯和苗都是我最知心的挚友，我宁愿代他们俩中的任何一个人受戮赴死。只要他们能得些解脱，这比给我自己减刑还更受用。只是，这一整排小监号除我而外虽再无活人，当局依然终日锁门，不给室内透气透光的机会。我要求半掩门，也

遭到断然拒绝。

十个月了，除了放风的瞬间，我没有见过阳光，没有呼吸过新鲜空气。黑牢使我头晕目眩，走路也步子不稳了。早上晨跑我只能做到两百步，腿脚沉重如灌了铅一般提不起来。跑完后我坐到炕沿上，大口大口喘气。我感到自己如灯油耗尽，只需一丝微风生命就会熄灭。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我写了张纸条给所长：

丁局长：要杀从速！否则，拿我当活教材的算盘要落空。我要晒太阳！

隔了几天，要求终于获准。这天中午时分，我正在煤油灯下看书，牢门忽地打开，所长站在门外喊：“十一号！出来晒太阳。”

门口一条窄窄的甬道，我把毯子铺到地上，平展展地躺在上面。太阳红彤彤，天空瓦蓝瓦蓝，白云朵朵如絮如帛。时间急匆匆地倏忽而过。

十个月未见天日，失而复得的阳光令我有重生之感。太阳几乎垂直射在身上，一会儿身上就暖烘烘的，后脊也沁出汗来。我索性把棉衣、毛衣全脱了，只穿了条裤衩。这时又不禁突发奇想，人若能将太阳热直接转化为所需能量该有多好，那就再也不会饿死人了。

我赤条条地、直挺挺地躺在地上。眼望长空乱云，无限感慨。高墙壁垒森严，阳光下刺刀闪耀，哨兵露出半头半脸，直愣愣地盯着我。我忆起林昭的诗句，那是《普罗米修斯受难之一日》里秃鹫的凶光……普罗米修斯被铁链锁在巨石上，任鸷鹰一块块撕咬、啄食他的肉体。但是，他的思想是吞噬不了的，他的精神永存不朽。呵，普罗米修斯，我正走着你所走过的路。

前后不到两小时，太阳离我而去，我重又回到黑牢。此后虽无定规，隔一段时间，便能晒一次太阳。只是在此期间，狱方故意制造出肃杀恐怖气氛，将所有监号的门都上了锁，不准任何犯人走动。

眼看八一到了，每逢节假日即是当局捕人、杀人的时候。我估计对我的判决不会来得这么快，但也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独裁者没有法律可言，眼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社会上如此，更莫说对

犯人了。进到看守所时，所长处存有我的四十四元现款，我不能留到身后充公国库。我对所长提出要求，将这钱全部买成可食之物。所长答复说，县城无其他食品，唯有甜酱可买。我同意全部买成甜酱送犯人大灶，自己留了半碗。

甜酱是调味品，虽可入口，也并不是正经饭菜。平时饥饿难耐，但没有什么具体物品可做念想，胃肠哭闹折腾疲惫后，人终得入睡。这时，半碗甜酱就在身旁，再难抵挡诱惑。先用舌尖舔舐，嘿，蛮有味哩，再也忍不住，一口接着一口，半碗全吃下肚了。

一觉醒来，嘴里又苦又涩，浑身着火一般。身边无水，口渴难耐，再想也无别的法子，只能接自己的小便解渴。小便的味道咸、苦、涩，没能解渴，反觉更渴了。此时辗转反侧，真是苦不堪言，彻夜再无法合眼。我想到渴比饿更厉害，饥饿还可以拖一段时间，渴只需很短时间就可使人昏迷。我是自作自受，活该。花钱买得教训，使我知道渴是种酷刑，令人痛苦得不可名状。活活熬到第二天，“猫眼”里递进来洗脸水，那几小杯水我咕嘟咕嘟全喝了，神志才清醒过来。

春节过后相当一段时间，当局把我挂起来不闻不问，却抓紧了对我的同学们的提审。直到五一过后，才开始有新的交锋。与以前一样，每次提审都在深更半夜，仍是那套人马、那种阵势。每次审问我仍答以诸多“不敬”之辞，除了回来继续关小黑号，当局不再以刑具报复。

在多次审讯中，我对自己的观点毫无保留。我已经把当局的“唯物论”批驳得体无完肤，把披着外衣的假共产党骂得狗血喷头，把所谓的社会主义也揭露得淋漓尽致。我的言辞与我在《星火》中所述观点，己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以说，此时的我已无任何“反动思想”值得隐瞒。我对暴政、独裁的抨击都是以大量客观事实为根据，我认为这些文字和言论，都没有超出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范围。我知道在他们眼里，我犯的是死罪。既如此，我必须写出我的思想观点。文天祥死前写了《正气歌》，方志敏留下了《可爱的中国》；与其糊糊涂涂死，不如清清楚楚死。我就是要把我的认识和盘托出，

留给后人评说。我知道，独裁者一定会拼命掩盖、篡改历史事实，真正的史实难见天日。但是，即使文字面世的希望再渺茫，我也必须写。我要赶在十一这一天之前写完，这是我被捕一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很可能就是我生命的终点。材料写完，我便平静地等待末日降临。

国庆节这天不见风吹草动，一切如旧。没能迎接到死神，却迎来一个伴。节后不几天，所长领个人进来，没吱声就锁门走了。我坐在小凳上看书，只回头瞅了一眼，这是个与我年龄相仿的青年人。他将一抱被褥放到炕上，对着我的脊背问道：

“十一号，我睡哪儿？”

我心头一怔，很快回过神来。把他与我关在一个号子里，所长事先对他必有交代。

“不要动我的东西。睡哪儿，你自便。”我头朝北，他只能头朝南。就这么大个炕，还用问吗。我对他心存戒备，没有好感。

我把码在南头炕沿的一摞书挪到北头，给他挪地方铺床，这才发现他是位“财主”呢。他的被子是大红缎被，还有一床皮褥子，外加一条纯毛毯。再看他身上穿的，一色毛料呢子。在小县城，这般衣着我没发现过。他是什么人？我心里嘀咕。

没过几天，我从他的话里知悉了他的来历。他叫杨森，武山洛门人，家在离洛门镇不远的南边，我不记得具体地名了。此前他在兰州八里窑监狱羁押了多半年，然后才解押到武山。他的案情是盗窃粮管所全国通用粮票，数额达几万斤。数万斤粮票即是数万斤粮食，还含食油在内。在死人成堆的农村，这粮票能救得几百条人命啊。如果仅为自己和家人活命，也还情有可原，杨森并非如此。他携娇妻遍游全国，每斤粮票以三至五元不等的价格出售，获得了可观的不义之财。就这样大肆挥霍，过了一年多逍遥日子。这是个毫无道德心的人渣。

他个头与我差不多，脸色苍白，留着浅浅的平头。那头发是剃过光头后长出的短发茬茬，由此能看出，他蹲监时间不短了。他身着高级毛料制服，这与他的年龄、气质极不相称，给我很滑稽的感

觉。言谈中我判断他只有初中文化，果然如此。

杨森的到来减轻了我的孤独感，也打破了我宁静的狱中生活。我读书受到影响，这给我带来烦恼和对意志力的新考验。

杨森也是特等犯人，可与张克仁媲美。张靠的是过去手中特权，杨凭的是攫取的国难财。无论在外头还是狱中，他们的生活都是普通百姓无法企及的。那些辛苦劳作、披星戴月的人饿死了，这些社会蛀虫、人渣反而活得有头有脸，惬意得很哩。

每个星期都有人来探视杨森，接见回来他提着大包小包的吃食。还没等吃完，又有新的食品送入，从没断过顿。他盘腿坐在床上，打开大包小包，里面有大饼、油饼、鸡蛋以及当时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的罐头点心等；我不明白他何以如此神通广大。他将食品杂乱地摆满一铺，像是故意展览，或者是向我炫耀。我对他既嫉妒又痛恨。

我不愿看他吃相，也不愿那一堆食物在眼角晃来晃去。我把椅凳和油灯挪到北头窗下靠我睡铺的一段，背对着他。

以后相处熟了，他每次接见回来总要掰块饼子“礼让”我，均被我谢绝了。在那两个多月共处的时间里，我没沾过他的一米一粟。我承认非常需要食物，他的吃相和食物令我馋涎欲滴。但我也是有理性的人，介子休不食嗟来之食宁肯饿死，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我为何不能？此外，我总觉得把杨森与我关押一起有阴谋，当局用心良苦；我更觉得杨森的食物含着血腥气。

的确，杨森是冲我来的。一周以后，当局总是每隔三天就要提审他，时间也总是在晚饭后的五至七时之间。他回来后，看不见提审给他精神上留下的任何影响，脸上反露出几分得意来。我相信自己的反应并不迟钝，他是个“包打听”。

他刚来时，我与他的确聊过天，有时时间还较长。我希望从他嘴里得知社会上的情况，尤其是农村和农民的处境；而他似乎对我的案情更有兴趣。他说，你们的案子听说大得很，是全国出名的大案之一，中央都知道，还直接过问呢。这看守所原来不是这样的，自你们进来，警卫一律换成双岗，严厉得蝎虎，比兰州八里窑监狱还要紧张呢。

我知道我们是两类人，所以我对他很警惕。自判断出他是“包打听”之后，我根本不同他交谈了。

凡有语言功能的人，不叫他开口说话无疑是种残酷刑罚。杨森猜到我对他的看法，他还是自言自语，喋喋不休。他不是哑巴，又有个“听众”。从他嘴里我知道了社会上、看守所犯人的许多情况。他说了下面这些事情：

中央已经知道甘肃的情况，张仲良撤职了。有的地方饿死人太多，中央紧急向甘肃一些地方调运粮食，没饿死的有救了。

我去过新疆。甘肃许多逃荒的人往新疆跑。甘肃与新疆之间有个星星峡，数不清的人饿死在半路上。我亲见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倒到沟壑里，惨啊。

原先我们把苏联叫“老大哥”，提倡一切向人家学。如今中国“小弟弟”与苏联“老大哥”吵开了，闹翻了。这世道怕有麻烦哩。今朝有酒今朝醉，管它天塌地陷，关我逮事！

全看守所只一个戴脚镣的犯人，关在东二号，与张克仁一室。他叫汪汉江，漳县三岔镇汪家庄人。解放前中共陇东游击司令郭化如是洛门郭家庄人，把汪汉江的胞弟打死了。为报弟仇，汪汉江打死了郭化如，并割下郭的头拿来祭他弟弟的坟。郭化如要是活到现在，最低也是省级大官。汪汉江算是死定了，不枪毙他就没有够格枪毙的人，他真是罪大恶极呀。

那个不停叫喊骂的女犯叫王列娃，洛门人，离我家不远。她是勾引奸夫杀害本夫，手段残忍，她的命恐怕也难保。

我越不理他，他越急于同我“交流”。表面上我对他所说的情况反应冷漠，实际上我认真地听着他谈到的每件事。我对农民的饥馑状况终于得到重视感到宽慰，对星星峡发生的情况深为震惊；对中苏关系变化如此迅速地公开化，我则颇感突然。

中苏闹翻，原因错综复杂；依我判断根本原因有两条：

毛泽东要争国际共运领袖、世界革命导师的名分。斯大林在世时，毛不太可能与他争这第一把交椅；斯一死，这成为世人关注焦

点。毛自恃羽毛已丰，不把赫鲁晓夫放在眼里。野心家和自大狂的心理必然如此。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痛揭斯大林恶行，大批个人崇拜，触到毛的痛处。毛从延安开始就处心积虑地大搞个人崇拜，眼见神像塑就，赫鲁晓夫跑出来毁神拆庙，他怎能容忍？

这是我的猜测，不会对人说，更不会透露给杨森。杨森吃饱了就瞪着眼睛想心思，而后则呼呼大睡。有时他鼾声太大妨碍我看书，我只得摇醒他。他说的有关郭化如的事，我曾在一本党史书上见过，确有其人。杨森说的还有许多事，我都记不得了。

六、南号记实

1962年元旦后，我也离开了单独关押的小三号，转到大监号南号。搬的那天，所有监号都关门上锁，搞得神秘兮兮的。到了南号，所长指定我睡西头的墙边铺。屋里犯人满满的，全都大眼小眼地看着我。所长收走了我所有的书，还有我用过的靠背椅、凳子和煤油灯。的确，在这儿没地方搁这些东西。临走时他对我命令道：“不准你到门跟前东张西望！”

杨森没和我一起过来，他去了哪里？犯人都没见到他，也没有人提到或者认识他。按理说，他案情简单又是一般刑事犯，应该不会在小黑牢待下去了。他是被判了还是有“立功表现”得到宽大了？我纳闷起来。或许，根本就没这么个犯人，他的姓名、案情全是编的。直到数十年后的现在，这事在我心中仍是个谜。

南号总共不过二十平米，有二十几名犯人羁押在此。室内的南山墙顶部有一方洞，即使站在床上也还需搭人梯才能摸到它的下沿。监门朝北居中，门东有扇窗户，窗下放着一只很大的便桶。便桶没盖，屋里弥漫着浓浓的臭味。床是在一个长方形木头框上钉的一排木板，床下空无一物。床架中间有根粗木头柱子直通屋顶，是房顶重量唯一的支撑。与小三号的相同点在于，号子门与床铺间的过道仅只一公尺宽，两个犯人并排无法通过，都要侧着身才能通行。

外面遍地饿殍，此时必然是刑事案的高发期。偷盗、抢劫、扒窃、凶杀……各类犯人多得挤破监狱。南号的木板床不过六七公尺长，两米宽，居然要睡二十多个犯人。晚上睡觉只能打颠倒，一个人的膝部套着另一个人的腹部，就像链扣一样，扣得紧紧的。夜里不敢起夜解手，否则再难寻回睡觉的地盘。但也总有憋不住的，黑天瞎火摸上床来，不是踩到这个的胳膊就是压着那个的腰，引出一片“哎呦”声、叫骂声，弄不好还要厮打起来。这时从后墙高高的方洞中便传来大声吆喝：“不准喧哗！你们想找死呀！”实在挤得无法，有两个被褥厚实的犯人宁肯睡到木板下的地上。

我的铺位靠着西墙根，我旁边的何金来对我很照顾。他生怕挤着碰着我，犹如一道屏障一样拼命挡住另一边的侵犯，我因此得以安稳地休息。

何金来，武山洛门龙泉后北山人。他年龄约二十七八，圆脸浓眉，两只大眼，唇上留着短髭，是个不识字的农民。不久我便知道了他的案情，他的胞弟何金海关在东三号，妹夫张玉定关在东一号，三人是同一个案子。出于饥饿，万般无奈下他们合伙偷粮被人发觉，引发殴斗致死人命。如此，三个人都成了杀人犯。

何金来本分善良，属农民中老实憨厚一类。可以肯定，正常情况他绝不会偷盗，更不要说杀人了。比起那些拿软刀子杀人的人，他这个“杀人犯”又算得了什么！

天大亮才开始放风，从东一号开始，次第开门。犯人先要喊“报告班长”，得到高墙上哨兵“去”的准许后，犯人才能从监号出来。大家排好长队，依次入厕。厕所蹲位少，有的犯人情况“紧急”，提着裤子就往里冲，一阵噼里啪啦，溅得到处都是。有时不免溅到邻人身上，弄得臭气熏天，这又免不了骂闹一通。各监号轮流放风一圈，前后要两个多小时。

接着开早饭。菜桶抬到监号门口，犯人拿着吃饭家什站在监门里，一个个瞪着鹰眼，盯着桶里、勺里和簸箕里，各自在心里分辨粥的稠与稀、馍的大与小。

在这里我还是吃劳动饭，除了我以外，南号还有两个不劳动而

吃劳动饭的犯人，一个叫张文汉，一个叫王希圣。吃饭时我才发现，张文汉还戴着手铐。

犯人吃饭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我的习惯是，馍一到手，几口解决，然后才喝菜汤。我的胃肠对糜子面已经适应了，脱肛也不治而愈。我这种吃法自有科学根据：人在饥饿时食欲最旺盛，唾液、胃液分泌也多，此时利于消化吸收。有的犯人却与我截然相反。

薛克明，年约二十五六，武山或甘谷人，小偷，吃起饭来与众不同。他不慌不忙靠着被子，盘腿而坐，手里将馍揉捏成馍屑，放在一张纸上。纸边放着他的甜菜汤。只见他操起他一截约半尺长的木头，用拾来的玻璃片在木头上刮着，有一下没一下，木屑落在他的裆部，他的眼睛则滴溜溜地四下转动。看得出他是在制作一件工艺品：一只吃炒面的小勺，那勺头上还站着只小猴，已经有模有样。刮一阵过后，他用手指撮点馍屑送入口中，然后又抿点菜汤。他能将早饭一直吃到晚饭开饭，早餐吃完了接着吃晚餐，天天如此。

南号无犯人组长，不搞学习。犯人三三两两坐在床沿或靠在床上，有人窃窃私语，有人闭目养神；更多的人是拖开被头睡觉。

戴手铐的张文汉睡东头靠墙，这是个彪形大汉，颧骨奇高，眉毛少淡，左脸颊下有块大黑痣。他的凶悍外貌与案情相符，这是个杀人犯。他原在兰州毛纺厂工作，1960年春节回家探亲，邀了个老乡结伴而行。他的家在甘谷礼辛公社，那里属于渭河北面的山区，自然条件据说颇恶劣，逃荒和饿死人首先在此处以及通渭等地发生。行至离家门不远的山上，老乡与他闲谈，无意中暴露了自己身上带有三五十元钱。张文汉时年不到三十，家中有年轻妻子和一个小男孩；想到自己回家过年身无分文，顿生恶念。他乘人不备，用啤酒瓶对同伴后脑猛力一击，随后将死者抛入窑洞里。

这案子案情简单，审问过几次，他都供认不讳，已转至法院到结案的时候了。

王希圣是一贯道道首，活动于陇西、岷县等地。他年近五十，腿微瘸。据说他利用封建迷信装神弄鬼，欺诈钱财，还犯有奸淫妇女的罪行。不过，与他闲聊时，他满口承认那些伎俩全是作假。我

问他：明知是假，为何还拿来骗人？他的回答倒也诚实：谁都想活得轻松惬意一些。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张文汉与王希圣案情不同，根源有相同之处。我没有反驳他们所说的谁都想自己活得好，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想叫别人活得好的大有人在。

卢黑斗和李绪虎都是盗窃犯，同是漳县人，年龄也相仿，二十刚出头的样子。卢黑斗从不洗脸，脸上脏兮兮如黑炭一般，同号犯人都嫌他。李绪虎块头壮实，不爱说话，眼眯成细缝颇似弥勒佛，说起话来也是轻言细语。他懂礼貌，对其他犯人都很友好。早上抬便桶他总争着干，大家对他蛮有好感，我亦如此。

还记得有两个甘谷籍犯人，一个姓牛，十六七岁，生着两只肉乎乎的招风耳；另一个脸上已有许多皱纹，大约五十出头。他俩睡在靠中间的位置，是全监号的地主老财。甘谷挨陇海铁路，他俩都是铁路钳工，就吃起火车来，时称扒车犯。这种人爬上货车，不管吃的、穿的、用的，只管往下掀；沿途自然有人捡起来送到。货车是运动着的国库，他们以此大发横财，与杨森一样可恶。这两个甘谷人因有横财垫底，也是不时有人接见，送来各种食品。

李崇武，武山县城附近人，年约三十出头，脸红扑扑的。他身穿一件深蓝色的制服棉衣，不说话，文质彬彬的样儿。我估摸他是个知识分子，极可能是中学教师或小学教员，不清楚犯有何罪。

南号还有两位“富裕中农”或堪称“富农”的犯人，一个叫汪贵州，一个叫何金来。汪四十来岁，长得很富态，四门汪家堡人。他穿件老式对襟棉袄，又长又肥，与短大衣相当，显得颇有点绅士派头。从他说话来看，这人颇有政治头脑，举止也老成稳重。何金来是个精瘦的老头，甘谷人，满脸皱纹，蓄着山羊胡子。他俩每两周或一月也有人接见，送点炒面或烙饼之类。

康建堂也是个彪形大汉，个头与张文汉不相上下。康年约四十光景，满脸络腮胡，脸红似关公，嘴巴宽宽的。他的话奇多，而且声音响亮，无所避讳。不知他是为什么进来的，从他给大家讲的故事中判断，他在马步芳的部队中干过，且非普通一兵。每当天黑监

门锁上后，他的故事便开场。

我搬来南号不几天，南号犯人之间爆发了一场肉搏战。

那日，甘谷姓牛的小犯人接见时收到了油饼之类的东西。他正在吃饼子，张文汉忽地从东边窜过来，抓起牛的食品大嚼起来。牛大声斥骂，张不理不睬。牛便上前抢夺，两人打斗起来。虽有另一位“财主”帮忙，然一老一少，终不是对手。只见张文汉在木板床上跨着大步，捧着戴铐的双手连同铁铐一同砸到他俩的头上和身上，将他们打倒后他又再用脚踢。张文汉为自己辩护道：“这些食物是你劳动所得吗？是偷国库的不义之财！既是非法所得，人人有份，你吃得老子也能吃！小杂种！老杂种！”

其他人都不吭声，保持中立。所长进来不问是非，把他们臭骂了一顿，一场打斗不了了之。

其他犯人印象淡漠，已无从追忆了。

过了几天，我才了解到看守所的全貌。这里四面都是高墙，从外面看就像个古堡。里边是个长方形小院，东西宽约三十米，南北长约五十米，东、南、西、北共有四排低矮而简陋至极的监室。南、西、北这三排监室均是单边檐，唯东边一排是双檐。小监号与大监号共着山墙，东边监号由北到南依次为东一、东二、东三、东四号；西号有西一号和西三号，两号间有个医务室。北边和南边都只有一个监号，即北号和南号。东南角的厕所将东监与南号连接起来，此外，四边形的另三只角有条窄甬道，屋子不相连。所有监室与高墙都有三至四公尺的距离，这个地方成为空地。监号中间有块打了地埂的菜畦，看不出其中种的何物。

我的同学田昌文关在东一号，何之明、陈德根关东二号，他们与张克仁、汪汉江同室。东四号关的是孙和，西一号是杨贤勇，谢成在西三号。苗庆久和冯淑筠由小监转来大监后，都关在北号。还有几个农民也有代号，我一个也不认得，不知道他们的任何情况。据说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案子的，这几个农民中有雷各家（关东三号）、雷振华（与我同号室）、刘武雄（关东三号）、五十多岁的康伯——我不知道他名字，关北号。还有个叫王凤岐的，在我搬南号之前已

经死了。有人说他是饿死的，也有说是病死、吓死的。

还有几位犯人，与我不是同一监室，也给我留下颇深印象：

医务室有一位犯医，叫裴慎；年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脸色红润，胖墩墩的。裴慎看上去颇有气质，他是武山名中医，出身地主家庭，五七年被划右派，后又成了“历史反革命”。他被判二十年重刑，但因医术高，在看守所没受罪。说给犯人看病倒是其次，主要是让他给县上的达官贵人看病。一天多半时间，他都在外头出诊。

与孙和同在东四号的一位犯人，三十好几岁数，我不知姓名。他穿一身深蓝棉制服，一副干部模样。每次放风倒尿桶，只要看到我，他便对我竖起大拇指致意。有次竟悄声对我道：“抗拒从严，回家过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听说他是个“三进宫”，前两次都因“拒不认罪”又查无证据而得到开释。他在向我传授经验哩。

与杨贤勇同在西一号也有两个犯人，我不知其姓名。其中一位脸红眼珠红，有四十多岁。有人指着他向我介绍说：“他就是吃过人肉的人。”另一位原是管理区主任，曾任职于盐井公社某地，满脸络腮胡，有严重的沙眼病。他似乎熟悉我，每次西一号倒尿桶从南号门口经过，在停站时他总跟我打招呼。他对我说：“我见过你写的字，字如其人，你的骨头硬得很哩。”说得我如坠五里雾中。

七、又戴手铐

关南号后，对我的提审改在白天，不过仍然有特别措施。狱警先将各监号上锁，然后才叫到我。其实我关押在南号，看守所无人不知，我的同学更不必说。锁门纯属多此一举，目的无非是给我精神压力，给其他人造些恐怖气氛。每次离开监号去提审室，我都猜得到，我的同学和其他犯人正从门缝、窗洞里注视着我。我平时走路姿势就是挺胸抬头、目不斜视的样子。但此时身体极虚，出门前我总叮嘱自己，步履要沉稳，不能趑趄蹒跚，更不能栽倒！

穿过正街时，我扫视着街景。路上行人很少，冷冷清清。我有

一年多没见过自由人的面孔了，眼前的路人有的表情冷漠麻木，有的无精打采；自然也有的人显得轻松闲适，貌似活在太平世界。

审我的人丁是丁局长，我们之间又是一番唇枪舌剑。

丁：“现在要你坦白交代你和你的同学的关系，我们给你立功赎罪机会。”

向：“我何罪之有？罪从何来？要赎罪的是你们这些人！”

丁：“你发展，串联了哪些同学加入你们的组织？”

向：“刚解放我参加少先队，五四年退队；五七年正要参加共青团成为团员，谁知将我打成右派，团没入成。我认为我够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资格，你们却把我抓进了监狱。我现在不隶属任何政党、组织，又如何发展串联别人加入什么组织？”

丁：“你不要抵赖狡辩，你们的反革命组织已经铁证俱在！”

向：“请问：既然堪称组织，它叫什么名称？又有哪些组织机构？没有，你说不出来！难道世上会有无名称的组织？”

丁：“你们的组织就叫‘右派反革命组织’，你们的目的就是推翻现在的革命政权，这是再清楚不过的！”

向：“‘右派’、‘反革命’，再傻的蠢货也不会先自我否定，将他的组织冠名为‘右派’、‘反革命’，这合乎逻辑吗？亏你想得出来！”

丁：“休要胡搅蛮缠，交代你和你的同学来往和关系。”

向：“多得很！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几百几千。从何说起？”

丁：“我们要你交代的，你心中有数。用不着装糊涂，耍滑头！”

向：“耍滑头的是你，不是我！同学多如人海，你要在大海里捞哪根针，何必转弯抹角，指名道姓好了。”

丁：“交代你是何年何月在何处介绍冯淑筠加入你们组织的？”

本来，得知当局给饥民调运救命粮的消息后，我对他们的仇恨和对立情绪已经有所缓和，心里萌生反省。如今一提冯淑筠，由不得又愤怒起来，不禁破口大骂：“你们一切都是从想当然出发，公

社化、‘大跃进’的恶果是千千万万人饿死！你们办案还是想当然，不知要冤枉多少无辜！之所以有今天，想当然就是你们的思想根源，至今还不觉悟，还在继续。我与冯淑筠自1959年5月以后，没见过一次面，没通过一字信，无由交谈一句；你们无根无据，红口白牙，信口雌黄！”

丁：“我们知道你与冯淑筠是莫逆之交，情同手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没有共同的政治思想基础，能有这关系？你骗得了谁？”

向：“这是你们的逻辑，是你的职业使然。依此逻辑推理，我倒要问：毛泽东与彭德怀出生入死，患难与共数十年，比起我与冯不到两年的友谊，那不知要深厚多少倍！彭德怀如今是反党集团首领，毛岂不理所当然的是该集团的一员？依此类推，彭老总的挚友同事岂不都是反党集团成员？蒋介石‘宁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尚且并未将中共党员的亲朋好友斩尽杀绝，是否认为他杀人还太少？封建制度株连九族，难道你们要发扬光大株连十族？还有比人以群分论更荒诞无稽的吗？”

丁一时语塞。转而怒道：“你是满口胡言，借机诽谤，宣扬你的反革命观点，你必将受法律最严厉的制裁！”

向：“你才是真正的胡言！至于我说的是不是胡言，你最清楚！”

丁：“你俩是知己，总该有成为知己的经历吧！”

向：“我无意隐瞒我对冯淑筠的美好感情。他诚实、正直、善良，他的人品永远值得我学习。至于他对我的看法，我不得而知，也无须知道。在你们眼里，我是魔鬼；但我敢肯定，在一切有良知的人心中，恰好相反！”

这次“马列先生”未参加，丁局长唱了“独角戏”。与其说是他审问我，更像是他与我辩论和被审。

整个监院气氛开始松动起来，一个明显的标志是，早上放风后当局允许犯人在院子里绕菜畦地跑步活动。我和大家一样，也得到了许可。苗庆久正帮着裴慎抄写他的两部中医论著，有时我看到裴慎还去北号与苗对弈象棋。

忽一夜，南号出了件偷案。

满脸皱褶有山羊胡的甘谷籍犯人接见时拿回一袋炒面，大约有十斤的样子。夜里睡觉他将炒面袋当枕头，袋口扎绳栓在手腕上。他以为万无一失，没想到半夜小解后炒面不翼而飞。急得他大呼小叫，告爹骂娘。监号漆黑一片，他想不出办法来找，只好用手挨个儿摸每人的口鼻，判断窃贼。这一手惹得人人怨怒，骂声不绝。一直折腾到天亮，无有结果。在放风倒便桶时才发现面袋在桶里，炒面只剩一把。所长进来主持开会，坦白交代与检举揭发双管齐下，全号犯人如和尚坐禅，既无自首者亦无揭发者。所长说：“偷犯查不出来，你们全号子不开饭；何时查出来再开饭！”伙房犯人组长张士俊颇有谋略，对所长耳语一阵；结果南号反而提前开饭了。

一个不到二两的馍，一口便可送到肚里去；一马勺菜汤可以不沾牙，三五口灌下肚。平时大家是喝着碗里的，望着桶里的，都能再饶上一口。这次果然不同，只见薛克明、卢黑斗靠被而坐，馍和菜汤放在一旁点滴未动。所长道：“馍和菜汤都要吃了，谁个不吃谁个就是偷犯！”他挂在那儿，定定地监视每个人进食。

薛克明只喝了两口菜汤便两眼发直，浑身大汗，捧腹在床上打起滚来。裴慎跑来一看，二话没说，叫抬到医务室急救。灌肠洗胃，折腾整整一日，才救得薛、卢性命。

这两个盗窃犯在监外并不认识，入监后性相近、心相通，只须对方一个眼色，另一个就能心领神会。平时他俩不互相来往，只细心观察同室犯人的睡姿卧态，以便需要时得心应手。在我来南号前他俩还联手偷过牛犯的食品，那食品放在山墙高高的窗洞处，离床面足有三米高。他俩搭人梯偷食一空，这次才一并供认。

十斤炒面，二人一顿几乎吃光？换上两头牛怕也会撑破胃的吧。

白天，犯人无聊，总要找点事打发时光。李崇武颇善圆梦，大家便把夜来所梦讲给他听，他总能说出个道道。康健唐也大讲他的见闻，他确实是解放兰州的亲历者，要不然，小说家也编不出那故事来。

解放战争中，彭德怀的一野横扫西北马步芳部，唯一的硬仗莫

若打兰州。兰州地形狭长，两面环山，黄河在其间湍流而过。南面的皋兰山高而陡峭，是兰州的屏障，马步芳的部队据此死守。马兵凶残剽悍，光裸上身，举着马刀与解放军在皋兰山上殊死肉搏，拉锯战几经反复。在狗娃山尤为惨烈，双方死人无数，尸首填满沟壑。解放军迂回到北塔山，切断马部退路，只余黄河铁桥唯一通道。铁桥窄小，不堪车辆拥挤，马部溃败途中，相互挤死踏死及溺水渡河溺死者无数。康建唐擅于讲故事，加之亲历亲闻，吸引了全号的人。

夜里，所有犯人躺下后，先是一阵寂静，接着又有故事开场。黑天瞎火，仿佛都赤条条地回归到原始本能。有讲“爬灰”的，有讲翻墙嫖娼的，还有的讲儿子与母亲通奸、父女乱伦……一句话，离不开两性关系。讲者满嘴淫词秽语，听者津津有味，嘻嘻哈哈。有个犯人如是讲：

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言他的毬大；一个说她的屁大，争论不休，互不相让。一天，他俩来到一条大河边，河流湍急且宽阔，无桥无船。男人说：这有何难，看看旁边的女人，他沾沾自喜道，我把我的东西打硬千军万马从上而过。怎么样，你比不过我吧？女人哈哈大笑，慢悠悠道：你那东西一软，不如一条蚯蚓。车人掉到河里，还不闹个车毁人亡。我只要吸口气，把河水全盛到我的家伙里，使它成为一条干河，想怎么走怎么走，想从哪儿过哪儿过，岂不比你不强多了。男人羞愧无言，只好认输。故事中还有许多下流话，不堪入耳。

社会上的人形形色色，看守所、监狱则是集中了各种类型。毕竟杀人不眨眼的暴徒是少数，大多数人都是属于愚昧麻木，沾染了恶习，本质并不很坏，其中也不乏善良之辈。可怕的正是这个大多数，我不能想象，自己身陷囹圄，每天饥饿难熬，家人饿死的饿死，逃亡的逃亡，哪还有心情在此说这等笑话？我对这大多数，悲其不争，怒其不醒。

在南号，据我观察，多数犯人对我并不反感，而且还有点隐隐的崇拜或者是敬而远之。我猜想他们从传闻中多少了解到一点我们的案情，不然，我与何金来素不相识，他何以会主动照顾我呢？自

我来到南号，还不曾说过一句话。然而在一天夜里，当全屋再次弥漫着淫荡的笑声之时，我终于开口道：

“大家请听我说几句话，如果认为说得不对，只当我没说。如果觉得还有些道理，就请大家多想想我们是怎么进监的？想一想自己失去的亲人，想一想还活着的亲人现在是如何过光阴的吧。”

我的话如一盆冷水泼在大家头上，顿时全号静寂无声。紧接着我简单分析了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源，谈到列宁关于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的论述。在我看来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过头了，唯一不成熟的是主观条件。而原因就在于有太多的人麻木不仁，在牢里还是醉生梦死。

我的话尚未说完，牢门突然“咣当”打开来，所长站在门外厉声喊道：“十一号出来！把衣服穿好！”

门外伸手不见五指，所长拿着手电筒在我身后一左一右照着。到了办公室，他直接给我戴上手铐，然后才说：

“你竟敢在犯人中公开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犯人起来造反！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铁了心了！”

我不否认也没有反抗，只在心里道：“你可算个称职的牢头，天寒地冻独自偷听，太为难你了。”

这是第二次给我戴手铐，仍然是土铐，颇松。半夜里，何金来偷偷给我取掉手铐，待天快亮时又给我戴上，每夜如此。

第二天，其他监号犯人也发现我被戴上刑具了，大家露出吃惊和担心的样子。面对同学们询问的目光，我报以坦然的微笑。

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这是个特别寒冷的冬天。南号不比小三号，那儿严严实实，除拳头大小一个“猫眼”，其他地方都密不透气，利于保暖。我在那里过了一冬，不觉得很冷。南号不同，四面八方透风，山墙那儿有一孔墙洞，门边的窗户只有铁栅栏没有玻璃。床板下空空荡荡，冷空气直往上蹿。垫褥都薄，夜夜冻彻骨髓。没办法，犯人只得自由

配对打通铺，将两床垫褥叠一起，盖两床被颠倒睡。汪贵洲邀我与他打通铺，多亏他有一件老羊皮袄盖在被子上，免却我寒冻之苦。

我头朝外靠过道，他头朝里挨山墙。我的头跟前正是那根唯一支撑屋顶的粗木柱。一次，老汪接见拿回一小布袋炒面，有三四斤。他无处搁，只好挂在这柱子上。睡到半夜我突然惊醒，仔细辨听，有人正站我的头跟前屏声敛气。我用腿碰醒老汪，他立刻大喊：“有贼！”，说着爬起身来。幸好偷窃未遂，他取下口袋抱入怀中又继续睡。

白天，其他大监号牢门大开，可以晒到太阳；唯南号有特殊规定，牢门只准半开半掩，太阳只能晒到廊檐，屋里阴冷阴冷。同室的人都偎在床上，只有我在一公尺宽，七八公尺长的地上缓缓地走，同时不停地活动按摩两条胳膊。

李绪虎很快被调去犯人灶房，送饭时他抬菜桶。每天我和他能见两次面。此前，我对他颇相信，关系非同一般。他成了自由犯，我为他也为自己高兴。东二号是个劳动监号，全号都吃劳动饭。其中有个犯名叫孟云，甘谷籍，矮墩墩的。他是个拳师，还擅编织毛衣。陈德根、何之明以他为师很快也学会了编织，并获得吃劳动饭的资格。所里抽犯人出去当杂工也多是东二号监房挑人。

这一段时间里，我的同学“同案”相继又被提审，终于在一个深夜轮到了我。

这是另一处地方——县法院，审讯也是另一套人马。主审干部与丁局长一般的小个头，人称呼其王庭长，后来我知道他名王连喜。他的两侧坐着一男一女，一眼就能看出，两人都不是当官的，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人民陪审员”。时值午夜，那位男性无精打采，昏昏欲睡；那位女性颇有姿色，年龄二十多岁，是个分娩不久的年轻母亲。她不停地揉搓着丰满的双乳，没有婴儿吮吸，乳汁胀得她坐立不安。

屋里灯光通明，王庭长拿着一张纸宣读我的所谓犯罪事实。不到三分钟，他便念完了。我正要开口说话，只听他道：“带回去！”

我愤怒之极，大吼起来：“我抗议！你们这不叫公审，这是法

西斯的秘密审判！我只能接受有听众参加的公开审判！”

王道：“向承鉴，你聪明过分了！你以为我们会给你提供宣传反革命的讲坛？你做梦！”

两个武警挟住我的胳膊，将我拖出屋子。

令我莫名其妙的还有，根本没有给我《起诉书》。数十年后我依然百思不得其解，我的案子没有经过检察院起诉这一程序。法院对我提审，也仅有这一次。我等呀等，县法院再不肯与我照面，直到宣判的那一天。

令我欣慰的是，春节前几天，冯淑筠君终于无罪开释。冯兄关押在北号，那个监号与南号对面，相隔不过五十公尺。我每天能看到他，我感觉他身体极度虚弱，脸无血色，两耳薄如纸。每次放风路过南号门口，我俩相视无言，心中的苦痛只有自己知道。我怕他受寒冻，把我最爱的青滚身送给他御寒。他冤枉坐了整一年牢狱，总算熬出头了。我想到，他的父母、妻小正翘首以待，冯君总算可以赶回河北南宫的乡下，与全家过个团圆年了。至于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不敢想。

童年时代常做梦，梦得次数最多的是从高空跌下去，跌呀跌，一直往下掉，下面深不见底。我吓得身子缩成一团，直到吓醒。

五七年反右以后，我不再做梦，梦离我远去。图囿中我思念亲人友朋，非常盼望与他（她）们在梦中相见；却从未如愿。唯这次提审后，做梦的功能似有恢复，我突然梦见与几个初中同学一起打乒乓球，一气打坏了四只球。第二天讲与李崇武，他不假思索对我道：“你的问题清楚了，已结案。你就等着判决吧。”他说得很肯定，毋庸置疑的样子。

春节前两天的深夜，我又被叫了出去。到了公安局的前院，所长对我道：“你进去吧，不用喊‘报告’。”进到一间我不熟悉的房间，灯光明亮，大屋里无人，通往里间的小门敞开着。我径直进到里间，这儿的灯光幽暗。有人轻声问道：“你就是向承鉴吧？”我点了点头。他很不客气，并不招呼我坐下，而是用犀利的目光审视着我，足有几分钟。然后才指着我身旁的椅子说：“你坐下。”

接着又是一阵沉默。

我已适应了屋里的光线，也不客气地打量起他来。他年约五十五左右，衣着朴素，有种沉稳庄重的气质。他斜坐着，人靠着桌子，一条腿笔直地搁在凳子上。我心里想，他应该是带过兵，打过仗的，那条腿就是证明。

沉默一阵，他才开口，声音轻而慢：“今天不谈案子，就谈谈你的出身和此时的感想吧。”

这是个大题目，从何说起呢？我稍微考虑了一下，便开口道：

“我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北向店一个贫农家庭，以后随父母逃荒要饭到了江西武宁落户。据父亲讲，我家世代是穷苦老实农民，祖辈没有一个犯法坐牢的。我现在成了唯一例外，我不知道在我死后，我的家庭、家族的亲人该为我骄傲还是为惭愧。我是农民的儿子，没有愧对祖先，也没有愧对养育我的人民。天地昭昭，日月可鉴，我死而无憾！”

他沉默着，仔细审视着我；有时我们目光相遇。他的目光安详平和，看不出他内心活动的蛛丝马迹。

屋里只有他和我，都不说话，空气凝重。停顿了好一阵，他见我无意多谈，便不再问，只是淡淡地说：“就谈到这儿，你回吧。”

这是一次奇特的审问，没说几句话就收场了。我判断这个人的身份不一般，也许他就操着生杀予夺大权。他若不是中央派下来的就可能是省上的人，至今他的身份对我仍然是个谜。

“神秘人”提审了我，还提审了南号的张文汉、王希圣、东二号的汪汉江、北号的苗庆久，还有西一号脸色通红、因偷挖土豆将人打死的犯人；都是重刑犯。

看守所每隔一段时间都要检查监号，逢年过节尤其如此。检查时，先进来一批干警，把全号室犯人驱赶至院中。犯人掏尽口袋之物放在地上，然后由干警逐个搜身。此时另一部分干警则进入号中，他们掀被揭褥，探洞摸隙，大声吆喝，咋咋呼呼。那围着犯人在身上揉捏的，遇有疑处便一把扯破，探个究竟。随身的所谓违禁物品都是些微不足道的小物件，无非裤带、鞋带、针、线、烟叶、火柴之

类。而他们更关注的是书、信、纸条一类。检查者把每个监室翻得一片狼藉，搅得乌烟瘴气，然后扬长而去。

1962年春节前夕，查监的阵仗更大，进来的干警更多了。来人一律戴着大口罩、白线手套，无处不查，耗时更长；搞得气氛异常紧张。直到数月后，我才知晓缘由。

大年初一早饭略有改善，菜汤漾着油花，破天荒发了白馍。早餐毕，各监号犯人坐在监门口的屋檐下，观看节目。孟云耍了几招武术动作，有人演奏了京胡、二胡；还有个犯人变了几个简单的小魔术。

春节过罢，天水所属的几个县有了新的划分。1958年甘谷、漳县并入武山县，现在又恢复为从前的三个县。三个县的犯人随之分开，李绪虎、卢黑斗还有伙房组长张士俊走了；南号的几个甘谷犯人也走了。过去拥挤不堪的监号顿时显得空荡荡的。赵所长也调回到漳县，这里来了个新所长姓王。

大概是在正月初五吧，新所长领了一批“达官贵人”到看守所巡视，气势很有点轰动。王在前边引路，丁局长、王庭长陪着一个小高个子干部直奔南号而来，他们后边还跟着两三个人。号门敞开，丁局长指着坐在床沿的我，对那个高个子说：他就是向承鉴。高个子颇有修养，对我微微点头，嘴里哎哎两声，算是同我打招呼。我见他如此，也向他点了一下头。这高个儿有一米八的块头，脸上有点稀稀拉拉的麻子，却也不甚难看。我们属于两个战壕，无话可说，只是彼此观察了一番。他走到院里又回头对我点点头，我站在门里也向他点点头，算是道别。

无疑，他是位大员。对他的态度，我既非受宠若惊，亦不抱侥幸幻想。无论他有无善意，我都无所谓；只是以礼还礼而已。

事后犯人中传言，高个儿干部乃天水地区专员。尽管我解释说，与此人无杯水之交；犯人依然议论纷纷。李崇武更是说：“你有贵人相助，性命无碍，很可能会无罪开释。”我心中有数，再没有比这种估计更荒唐的了。

开春了，天气一天天暖和起来。

张文汉是甘谷礼辛人，却未被调回甘谷。我心里疑问着，忽一日，新所长把他叫了出去。不一会儿，他耷拉着脑袋回来了，戴铐的双手捧着一张纸。那是《判决书》，他的案情简单，判决写的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我问他：“上面规定了上诉期，你上诉不？”

他悲哀地摇摇头。

我又说：“如果想上诉，我可以帮你写上诉状。”

他神情沮丧地说：“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何况是无缘无故杀人，上诉也白搭，都怨自己鬼迷心窍。”

呜呼，再歹毒的人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虽然张文汉罪不容赦，我仍对他生出一丝同情来。他的祸心出自无奈，如果生活境况不是如此困顿，他不会行凶。最后他还能认罪认罚，比起千方百计遮掩罪恶的人还是好很多。

他很凄然，哀哀对我道：“我媳妇很年轻，肯定守不住。只可怜我那三岁的儿子，他叫张水稻；你若能活着出去，拜托代我照应一下。”此刻我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点点头。然而我心里道：“不久我也会与你黄泉相见，你拜托我，是拜错了主儿。”

王所长进来，后面跟个自由犯。“张文汉，把你换个地方。”那犯人上前把张的铺盖一卷，还有吃饭家什一并抱着。张文汉调至小七号关押，随即被砸上了脚镣。

没过几天，犯医裴慎调走了，不知去了哪里。汪汉江判了有期二十年。对汪的量刑，有知情者告诉我：

郭化如的案子，解放后已杀了两批。一批在1952年，一批在1955年。这两批人抓来后，都是刑讯逼供。结果他们都承认杀了郭化如，也都被判了死刑。谁想1958年抓到汪汉江，他才是杀郭的真凶。他这次只判了二十年，原因可能在于为郭化如案被冤杀的人太多，汪因此破格得到了宽大处理。

在近两年的时光里，看守所的犯人一个未判未动，现在说判说动就接连不断了。连日来，各个案子都有被判决和调走的犯人。

人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我对此并不全信，医学和心理学对

做梦有诸般解释，终不能释我所疑。而这些日子我却一连做了好几个梦，梦境稀奇古怪。我宁愿存在心底待以后再去印证，不愿说与圆梦专家李崇武听。像他那种圆梦法算不得高明，我也可以无师自通的。

我梦见自己和张春元、谭蝉雪三人皆被判处极刑，我们一块儿赴刑场。他俩头上、身上血迹斑斑，唯我好好的滴血未染。我们仨并排站着，有人举枪待发，我正要高呼口号，一阵冷风穿胸而过。醒了，胸部犹觉疼痛。我心想：“挨枪子不过如此，待知道痛时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

另一个梦中，一辆大卡车拉着我到了一地方，这里既像监狱又像农村；四面有高墙耸立的城堡，周围有绿树掩映的房舍。公路宽敞，路两边有树有电线杆，周边是阡陌纵横的农田。卡车将我摺在此处，风似的开跑了。梦境里的田野酷似我此后服刑的劳改农场，但那时的我还根本不曾到过这种地方。

又有一次，梦境中有日本鬼子的飞机，它正疯狂地追杀我，朝我扔下炸弹，又对着我俯冲狂射。子弹在我的前后左右溅起串串尘烟，我拼命跑，跑得跌倒在废弃的土窖里。炸弹爆炸扬起火柱，我浑身是血，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又跑，一连越过七座废窑，飞机才离我而去。醒来我浑身痛楚，瘫软如泥。

如果要牵强附会，也可以说这样的梦境多少预示了我后来的经历；但下面这个梦则十分离奇：

我眼前不远处耸立一座巍峨的建筑，我很好奇想看个究竟，便贸然朝它走去。门前有一男一女两位老者，似一对外籍夫妇，皆耄耋之龄，然鹤发童颜，眸亮目清，面相甚慈蔼。见我来，两人交头接耳，像在议论我。他俩不似看门人，我欲进门，皆对我颌首微笑做欢迎之状。进得门里，是个极大又明亮的厅堂，窗户墙壁洁净如洗，地面也熠熠生辉。厅堂里空无一人，唯墙上有许多庄重美丽的壁画，像展厅一样。我一边观赏一边赞美，安然醒来，梦境依然十分清晰。这梦中画面至今拂之不去，却无从解释。

或许有人说我是“迷信罐罐”，那也无妨。我只是如实记录而

已。那都是在 1962 年春曾经有过的梦，此后我又长久地与梦无缘了。世上最复杂的东西莫过于人，人的大脑神经、神经细胞的活动机制和规律，至今仍有未解之谜。或许人的感觉不止有五，还有第六、第七甚至第八，只是现在还未认识到而已。

九、宣判

牢笼里无报可读，但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事也不是一无所知。讯息来源是犯人接见时包食品的报纸，以及自由犯外出劳动带回的片言只语。

有张旧报的一角转载了《印度时报》一段文字，说的是西方国家评论中国“大跃进”是大跃退。另有一段文字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对中国人民公社制度的评论，公社化运动刚兴起的时候他就断言：“人民公社制度是原始落后的、大规模的奴隶制。”杜勒斯不愧是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的批判一针见血，比我这深谙内情的人看得还要透彻，令我震动，也钦佩之至。

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只说“我要负主要责任”，再无下文了。张仲良挪了个窝，调到山东任第四把手。张十存书记调离了武山，去天水专区当了水利局长。为使农民出口怨气，公社、管理区、大队的干部在各自地区被“批斗”一番了事，所有的官员在宝座上岿然不动。

中苏论战公开了，内容不知。我心里只觉可笑，自己的国家搞得一塌糊涂，有什么资格说东道西？

6 月 30 日傍晚，在外做工回监号的自由犯带来消息：明天七一，县法院将在洛门、甘谷两地同时召开宣判大会。他极肯定地对我说，你们一案将在洛门镇宣判。我不怀疑消息的可靠性，这个犯人当天正是在县法院的一个头头家干活。

我立即忙碌起来，要准备行装了。外面已是盛夏时节，牢里多数犯人依旧穿着冬衣。现在，我要把身上的新棉制服拆条缝，掏出内中的棉花，使之成为一套夹衣裤。我还要将皮鞋仔细擦亮。汪贵

州、何金来、李崇武、雷振华等人俱来相帮，很快就收拾停当了。打扮好的我，在地上走试走试，大家道：还是个标准的大学生模样，一点没变。随后我把被褥和不多的几件衣物作了分配，难友们眼里个个噙着泪花。

夜阑人静，漏尽更残。想着生命就要结束了，我回忆着自己短暂的人生，亲人的形象一一浮现：慈爱的祖母、善良又勤慧的母亲、刚直也粗暴的父亲，还有我的兄弟姐妹。逃荒路上、孩提时代、少先队长的日日夜夜。大学生活、鸣放反右、同窗好友。我也想到了李大娘、张大妈、贾义老两口，那具饥饿女童的尸体、那些饥寒交迫的农民乡亲……扪心自问，对童叟从无欺诈之行，对民族深怀挚爱力图报效，我何罪之有？如今却要倒在自称革命者的枪弹下，究竟又是谁背叛了谁？

我想起鲁迅先生的《药》，想起上个世纪发生在沙皇俄国的事。那些青年都是贵族后裔，受过大学教育，沙皇待之不薄，有世袭的特权地位。按唯成分论观点，他们理应对沙皇忠心不二；然而，眼见俄国政治腐败，沙皇昏聩独裁，国家衰退落后，人民水深火热；他们受正义和良心的驱使，毅然举旗造反。结果人头落地（包括列宁的哥哥），多数人充军到西伯利亚服劳役。我和我的同学如今走着与他们相似的路，俄国历史在我们身上又一次重演。

我又想到，将宣判定在七一，真是寓意深长。这一天是中国共产党的生日，用我的头颅庆祝它的胜利，用我的鲜血祭奠先烈的灵魂，诚然是极应该的。为了人民幸福、民族复兴，有多少仁人志士、多少真正的共产党人慷慨捐躯！我是读着《烈士诗抄》《可爱的中国》长大成人的；把我作为牺牲，敬献在先烈灵前，我感到荣光。他们是我的偶像，值得我顶礼膜拜，我死后可与他们相聚为伍……

山墙的洞孔投进一缕微光，天亮了。我一面穿衣把自己收拾齐整，一面在心里打着腹稿，想着在刑场上我要高呼的口号。

原先九点多钟才开早饭，这天提前到八点；监所的气氛与过去骤然不同。吃罢饭罢，我第一个被提出监所。我没忘记用目光与难友们逐一致意告别，何金来和汪贵州垂着头，不忍看我一眼。跨出

牢门，各监号的人簇拥在门跟前目送我启程。

所长办公室早有丁局长、王庭长在等候，还有几个我不知姓名身份的人在场。

丁局长道：“向承鉴，今天对你和你们一案进行宣判。你在看守所羁押期间表现极坏，大骂我们，大骂共产党。我们对你从未恶言相加，尊重你的人格。不管你对我们如何敌对、抵触，我还是要奉劝你：在今天的宣判会上，你绝不准胡来！不准吭声说话，不准呼口号！否则，你要承担一切后果！”

王庭长似乎嫌丁的话不够明白，又告诫一番：“不管你认为我们的话是善意还是恶意，你都必须控制自己，千万不敢胡来！宣判回来后你可以上诉，上诉是你的权利嘛。”

他暗示我不会被当场处决，我却丝毫不敢有任何侥幸心理。自五七年反右以来，我已经历得太多；我对他们的凶残性、欺骗性体验很深，不再相信他们的任何话。我拿定主意，到时候相机行事。

随后，我的同学同案被一一提出来，逐一被绳捆索绑。我和苗庆久脖子上的绳索未打死结，与大家的捆法相同。丁走到我身后，像是检查绳索，他动了动绳子，绳子似乎较之前松了一些。十时整，大批武警前呼后拥着，我们十余人被押至武山的陈家门车站。接着，一众人乘上火车，中午时分到达武山县下辖的洛门镇。天气十分燥热，我穿的又是夹衣夹裤；步行至洛门公社大院时，衣衫已全部汗湿了。洛门公社事先准备了午饭，我们吃到一餐算是人吃的东西。

两点钟光景被押进会场，此前的绳子解了，一律换成手铐。

洛门镇当日逢集，真是万头攒动，人山人海。街屋的墙上、电线杆上贴满了红绿标语：“坚决镇压反革命！”“坚决粉碎蒋匪窜犯大陆的阴谋！”

宣判大会的主席台是临时搭的，它的上方悬着横幅：武山县人民法院宣判大会，白纸黑字尤其显眼刺目。我和我的同学同案在台前列一横排，台下的人们有的露出惊奇的表情，像在观看耍猴戏；绝大多数人神情呆滞。

扩音器里响起审判长的声音，他正在宣读我的罪行，继而是判

决：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这实在太出乎我意料，要么斩立决，要么承认我是正确的，两者应居其一。结果偏不，不杀不放，判十八年你慢慢消化去。这是用钝刀子剜你，叫你痛不欲生，生不如死！

我原估计，宣判大会必然是冷冷清清的，观众浮肿着脸，拄着拐，目光迸火……然而我从围观人群中看到，其中也不乏脸色红润者。这或许是被太阳晒的，或许是人们的生活改善了。我于是又想到，只要农民得以生存，个人死活又算什么。

从标语中，从县里头头开篇发言里，方知“蒋匪妄图反攻大陆”。官方并且将我和我的同学掺和其中，说什么“两者遥相呼应，紧密配合”。这完全是栽赃陷害，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拼接一起，欺骗舆论和百姓，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二字！

大会足足开了两个多小时。太阳喷吐着毒焰，我被晒得汗流浹背，两眼直冒金星，几乎休克栽倒。

在这次会上，苗庆久被判有期二十年，何之明被判十五年，杨贤勇被判十年。在1984年《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结案报告》中，不知为什么，何之明的刑期被写为“原判十年”，减少了五年。在我的印象中，何之明肯定是被判刑十五年。孙和、田昌文、陈德根，他们的刑期都是七年。谢成被判三年。几个农民也都判了有期，其中刘武雄判十五年（他与康大伯的儿子是同母异父的兄弟。根据康明前后来对作家依娃的讲述，他被判十八年）。雷焕章、雷振华被判七年。雷革家判管制，北号的康大伯无须服刑，交群众管制。

回到监所，同号难友见我活着回来都为我高兴，一起跑来搂抱我。看看汪贵州，激动得已是老泪纵横了。

同一天在甘谷也召开了宣判会，结果很快在监所传了开来：张文汉和王列娃同时被处决，他俩在刑场上的表现成为犯人的谈资。

王列娃算得上刚烈女人，直到枪响之前，她一直骂不绝口，毫无畏惧。她是为追求幸福和爱情献身的。婚姻必须以爱情为基础，她既然对原来的丈夫切齿痛恨，本该早些分手。倘若法律开明一些，

她又懂得如何正确运用法律，杀夫的悲剧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她的死不止证明了她的愚昧，同时证明中国法律亦在愚昧之中。

张文汉却是个懦夫，一押进会场就浑身筛糠无法站立，靠两个武警挟住，尿湿一裤子。行刑前他已无知觉，像堆烂肉被拖去枪毙了。他走得悄无声息，没有人为他发出一声叹息。

过了五天，我被调到东二号。我的判决书现在找不到原件，但当时我年轻，记性很好，根据记忆复原，内容如下：

武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62) 武法刑字第 (34) 号

被告向承鉴，男，汉族，现年二十二岁，原籍河南光山，现家住江西武宁。家庭小手工业者，本人学生出身，捕前系兰州大学化学系右派学生，现在武山县看守所羁押。

上述被告由武山县人民检察院向我院提起公诉，经本院开庭审理查明：

被告向承鉴，于一九五九年十月底在漳县加入“右派反革命组织”，伙同苗庆久刻印《星火》刊物并亲自撰写“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反革命文章三篇，文中大肆造谣煽动，鼓吹颠覆我人民政权；疯狂串联发展反革命成员杜映华、罗守志、何之明、杨贤勇等，妄图打入我党政机关等要害部门；积极策划筹建反革命武装，图谋反革命武装暴乱。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被告向承鉴实属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第×条第×款之规定，判处：

被告向承鉴有期徒刑一十八年。（刑期自一九六零年九月三十日起至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止。）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十日内依法向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武山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审判员：×××

审判员：×××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公章）

书记员：×××

认真研读判决书后，我决定上诉。除刻印《星火》刊物并撰写三篇文章属实，判决书中所列的其他罪状全是无稽之谈。所谓右派反革命集团，这是当局的捏造。我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也不可能发展、串联他人参加。至于“武装暴动”云云，更是天方夜谭。

没花多少时间我就写完了《上诉状》，当即递了上去。

令我惊讶的还有，这份《判决书》是打印的，刑期那里分明可见涂改的痕迹。原来的判决是有期徒刑二十年，不知何故，宣判时竟有人用墨笔改为了“一十八年”，之前打印的字迹仍依稀可辨。

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得知真相，原来是沾了唯成分论的光。父亲和胞弟告诉我说：1962年年初，天气很冷的时候，有三个干部来到我家里。其中一位是本县干部，由他陪同的是两位外调干部，皆穿蓝色大衣，戴蓝棉帽。

外地来的一位干部对父亲道：“你的二儿向承鉴犯反革命罪，要法办判刑，现通知你知道。”父亲听了，惊骇得几乎晕过去：“天呐！这是咋回事！我家世代穷苦出身，连一个中农的亲戚都没得。托毛主席、共产党的福，我全家才翻身得解放。我这孩子旧社会逃荒讨饭，凭共产党给的助学金才读的大学。他生性倔强，脾性丑，心却不坏。过去读书年年第一，没想到书读得越多，人越糊涂。这该如何是好！”

知情作陪的县上干部证实道：“他说的是实，他家里穷得叮当响。这孩子很会读书，是个好傲好傲的学生。”两位外调干部把我家里里外外打量一番，又见门楣上有“军属光荣”的匾牌，二话未说，从口袋中取出《判决书》，找来墨笔，大笔一挥，将二十年改成了十八年。

我的《上诉状》交出去不几天，看守所迎来大开拔。

早饭刚毕，王所长进来。他站在医务室门口，拿着一份名单直

呼犯人名字。我听到三个字：向承鉴！这还是第一次叫到我的姓名而免却了代号。我和我的同学、同案一个不漏地得到通知：立即捆行李。同时被叫到名字的还有其他犯人。

顿时，各监室一片混乱。末了，所长又叫我去保管室整理自己的东西。那儿有我唯一的一只藤箱，还是母亲逝世后我在县中住读时的老古董。箱内有两件东西我准备带走，一件是一把计算尺，英国货，功能齐全；它是哥哥大学毕业后转送我的。另一件是我写的电影剧本习作《旧情与新谊》，曾寄胞姐读过，已是第二稿了。

待我到了保管室，只见箱子大开，两件东西全找不见；唯有一些书还在箱子里。罢，罢，此去黄泉路近，丢了的计算尺和文稿，不帶也罢。所长办公室还有我二十几本书，我决意全都带上。

来不及与难友们道声珍重，我们立马上路了。多数犯人开拔到武山洛门，去那儿的云雾山劳改农场。我、苗庆久、何之明和杨贤勇去天水的省属第三监狱。

别了，武山看守所。你是熔炉，是炼狱，又是试金石。我在此待了二十二个月，而在前面等待我的又是什么呢？

第二章 上诉中院

一、董剑青和马象乾

由武山到天水，我们乘坐的是普通客车。普客里多是衣衫不整的穷人，车厢里拥挤不堪，还有行乞的人穿过，乱糟糟的。我们四个人受到特别照顾，面对面占着两排座，四周座位被公安干警包揽。有的旅客挤昏了头，一头撞到我们座位上，发现我们戴着锃亮的手铐，不待武警吆喝，忙不迭地逃离了。

下午五时许，到达天水三监。照例是搜身检查，然后交接登记，尔后才放进监狱大院。

省属三监比起县看守所来，果然气势不凡。四面高墙上有电网，每隔十公尺许有一盏弯头向里的聚光灯。我被分到一监院，何之明在二监院，老苗分到三监院，老杨在四监院，每监院一个。进到指定的监号，里面已经有了一位六十多岁的瘦弱囚犯，他张罗着帮我铺床。我还没放好书籍杂物，就被带出去传讯了。

离监狱大门不远有两排平房，这是狱吏们办公的地方。每个办公室的门上分别挂着管教科、劳动科、医务科等牌子。我被带进典狱长办公室，一个四十左右、长得颇单瘦的干部指着一张小凳叫我坐下，立刻开始了他的训话：

“向承鉴，你在看守所的表现你心里清楚，我们也全清楚”。这个“全”字他说得特别慢而清晰。很明显，是他有意加重语气强调的。“你不但不认罪服法，还有极严重的重新犯罪行为。这儿是监狱，不是看守所！我现在郑重警告你：在这儿，你若再胡来乱行，你将自绝于人民！我的话绝不是吓唬你，你莫当儿戏。我们希望你

老老实实接受改造，重新做人，你要是不想活，那我们也没办法。你自己考虑吧。如果你有思想问题，有看法，可以找我们谈，绝对不许你在犯人中散布，你听懂了吗？”

我定定地注视着他，点头算是回答。他大约也是甘谷人，口音与武山丁局长相同。

回到监室躺在床上，我仔细回味这牢头的话。心中疑云重重。很明显，他话里有话，难道我在看守所写的许多墨迹落到他们手中了？那是我之前托漳县犯人李绪虎带出去保存的。他的话不像是在诈我，这究竟是咋回事呢？

监狱里的第一夜有些不平常，是夜，我被魔住了。这是生平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次。我感到一个硕大无比的黑东西压在我身上，它力大无穷，任凭我如何挣扎，竭尽全力却不能掀翻它。就这样一直搏斗了好长时间，醒来时浑身是汗，犹觉气喘吁吁。我没喊出声，眼睁睁地等到天亮。我不信鬼，但这事真真切切。我无法解释，大约我身体太虚弱，神经出了问题吧。

一大早，一个面色红润、两颊短髭刮得泛青的人闯进监室来。他瘦高个头，看上去很有文人气质。他坐在炕沿笑眯眯地看着我，直到我漱洗完，才拍拍我的肩头，叫我跟他走。原来他也是犯人，住在监院的第一监室。室内只有他一个人，房间却和五人住监室一般大。这里没有炕而是摆了一张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房间里宽敞明亮，也很整洁。他告诉我，他叫董剑青，是一监院犯人大组长，并且兼着天水新生被鞋厂的总会计。他说：“你来了，我很高兴。我已向张典狱长和管教科长作了请示，以后你协助我的大组长工作，我实在忙不过来。”

“要我干什么呢？”我没出声，疑惑地看着他。

“白天全天我要到外面门市部上班。你早上负责领大家做操，教操；检查各号室卫生。下午四点半到六点，你召集大家在大监室负责读报。就这些。等一会儿就开始，我给大家说一下。”

像是瞌睡遇到枕头，这两项任务我当然乐而为之，自己需要它。董拉着我，“咱们先检查各号室的内务、卫生。”他喊一声：

“各室组长！检查卫生咯！”一下子拥出来十几个人，由他的房间开始，逐一监号巡看。组长们进进出出，指指点点。各监号都搞得不错，被子折得方方正正，如军人床上的“豆腐块”。我正懊恼自己的被子未及叠好，但到了我的住室，我的被子也成了“豆腐块”。

卫生检查罢，还要简单评比，记录在案，每周评比一次卫生红旗。之后是做早操，操罢才开早饭。

做早操无须别人喊，所有能动弹的犯人早已自动站到门口的甬道上。董对大家只说了一句话：“我忙不过来，今后由向承鉴领你们做操、学习和检查卫生。现在开始。”

监院甬道狭而长，两边为监号。石头铺就的甬道宽约四米，中间高，两边低，呈拱形，勉强可以并排站两人，整条甬道上全是人。

大学时学过“劳卫操”，竟成了我终生的健身法宝。两年在看守所里，每天早上做一遍，从未间断过。我只熟悉这个，其他操皆不会。

我一边喊口令，一边做示范动作，做得很认真。只是胳膊捩伤未好，动作无法做得完全到位。这套操难度大，犯人身体都很虚弱，不免东倒西歪，形象狼狈。看得出，他们都很愿意做操，也像我一样尽力而为。

老董没跟着做操，他在一旁观看。末了，他用目光告诉我，今天就到此为止吧。他又把我住室的老囚犯招来跟前嘱咐道：“马象乾，下午学习，你协助组织好大家。”他跟我打过招呼，匆匆离去。

早饭是一个苞谷面馍，外加一点咸菜。这馍比看守所的劳动馍还大一些，比糜谷面也可口得多。早饭毕，犯人立刻紧张忙碌起来，各自奔向劳动岗位。这儿劳动分为两大部分，监房外的工棚劳动和监室内的劳动。工种多种多样，有剪裁的，缝纫的，编鞋的，锥鞋底的，刷糊鞋底的里子的，打褙子的；最轻的劳动是糊火柴盒。每个工种劳动都有定额和质量要求。

“报告班长，去工棚劳动。”“去！”这样的对答经久不息。各监院监室都有派到工棚去劳动的犯人，他们三五人排成一排，站在董剑青监室的门口，仰头向中央哨楼上的哨兵报告。

同室的马象乾正在糊火柴盒，另一个犯人也姓马，回民，个子比我高大，年约三十，颧骨高且有颗痣。他在纳鞋底，大约炕下空地窄，展不开手臂，他将马扎放在自己的铺位上。他干活速度之快捷，令人惊奇。没人分配我干什么，我乐得读起带来的书。

三监是个四方建筑，正中是两层的岗楼，一半为狱吏办公室，其中还有医务室和病房，再往里是各工种工棚。由这一半要进入另一半区域，必须经过中央岗楼下面的大厅；这里共有六个门，一个门通向外面；五个小门分别通向去五个监院的甬道。总之从岗楼上俯瞰，门厅的这半边辐射出五条光带。哨兵在哨楼警戒，可绕着圆圈看到每个监院的内部情况，也可以监视工棚里犯人的劳作。

我在武山看守所待了二十二个月，除王凤岐之死，没听说过有别的犯人死亡。这三监我虽新来乍到，却听说到不少有关犯人饿死的事。这些事都发生在1959年到1962年初。一直到1962年春节过后，当局才给犯人增加了粮食定量，饿死人的事逐渐减少。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犯人的康复不是易事。马象乾告诉我，这监室原住了五个犯人，如今只剩他和那位纳鞋底的同姓犯人。死者中的最后一位就是在我来此两天前抬走的，他那时就睡在我现时睡的地方。我忽而想到第一天晚上被魔住的事，对他们说了，他俩都吃惊称奇。马老汉说，直到现在，有些监号还有卧床不起的重病人；隔不多少时日便抬出去一个。一监院还有个犯人得了一种怪病，体重只余四十斤。上月请来外面医生诊视，却也道不出缘由，说此病在世界上尚属首例，暂名为“瘦病”。不少极虚弱的犯人现在仍要每天注射葡萄糖针剂，只是注射后，犯人浑身哆嗦，半日方止。

马象乾，甘肃岷县人氏，个子瘦小，谈吐不紧不慢，见多识广。据他自己称，解放前夕当了半年乡长，不曾得罪一个大人小孩。解放后并未追究过他这段历史，不料1958年反右后突然把他抓起来。判决书上只有两三行字，无点滴罪恶，判二十年长刑。

这事我早知道，1958年我还在学校时就听说，大鸣大放使有些人心有余悸。为巩固政权，全国范围内据说一夜之间逮捕了“牛鬼蛇神”多少万，名曰“大扫除”。原来在国民党军队中当过班长排

长的人，曾经有政策宣布不予追究；结果大扫除期间一律予以清除，被扫荡的还有过去的乡长保长，有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政治高于一切，就算党内高级干部也休想躲过。

连彭德怀也因政治需要“牺牲”了，你马老汉少见多怪罢了。

二、糊鞋里子和纳鞋底

犯人政治学习唯一的内容是读报，学习室远离中央哨楼，在甬道另端的一间大房子里。这儿的老犯人每人都有个马扎，唯我没有。大房间里密密麻麻坐着百多号人，进门处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是专为主持学习的人而设的。

第一次学习，我有幸通览我的所有同伴。有的人不能做操，但可以参加学习。与在看守所不同，这里都是重刑犯人。二十几的年轻犯人除我而外一个没有，三十出头的也很少。犯人大多是老朽之人，身上带着浓浓的罪囚之气。内中有一个犯人叫李凤鸣，江浙人，年约六旬，背微驼，人瘦小，面呈猪肝色，嘴唇极薄，上下唇重叠而突出，是种典型“鸭子嘴”。他的出奇特还不在肤色和嘴型，而在身披一件百衲衣。那原是件单衣，补来补去成了夹衣，最后成了铁壳棉衣或者说是盔甲。我无法统计这件宝衣上有多少补丁，那小的补丁是一寸见方，大的约四平方寸。补丁上摞补丁，布料有的属绸缎，有的是平布，还有厚呢料……简直是集一时之大成！

这件衣服证明，主人至少在狱中待了十多年了。它和看守所南号薛克明的猴头炒面木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堪进国家博物馆的工艺品。

隔了两三日，住我隔壁监室的上海籍犯人徐国珍跑来通知我，要我参加室内糊鞋里子的劳动。他对我说：“参加劳动可以吃劳动饭，每月还发两元零花钱。”

劳动本我所愿，人活着要吃要穿，要消耗物质财富。无论我不是犯人，劳动都是我的本分。

徐国珍是监院内的生产组长，圆脸大嘴，一双红沙眼整日流泪。

他领我到了他的操作台前，一边讲解一边示范。一双鞋子分鞋底和鞋面两个部分，而鞋底又有里外两面。挨脚的那面是里，踩地的那面是外；我的任务就是给挨脚的那面糊上里子布。随后他发给我一个木架和一块三十厘米见方的小木板。这是种简单劳动，我能一目了然。先将里子布铺在木板上，在上面刷上浆糊，然后包在鞋底的襻子上。初干时动作不快，没老手完成的量多；有时还让鞋里子沾上了浆糊弄得不干净。不出三日，我完成的数量就达到上游水平了。

糊鞋里子的活干得熟练了，又叫我换新工种——纳鞋底。徐说：“劳动饭分等级，纳鞋底算重劳动，定量高。”

纳鞋底要坐在马扎上，膝盖夹一夹板，鞋底固定在夹板上。锥子是唯一工具，须磨得极锋利。其技术要点有二：一要绳疤均匀，排布有序，线路呈菱形或梅花形；二要将绳结拉紧。我缺腕力和技巧，成形的鞋底软得像面条，质检为丙等，进入了残次废品。生产大组长告诉我，苗庆久、何之明、杨贤勇初试纳鞋底，第一双就得到了质检优等。看来，除读书勉强过得去，我比他们都笨。以后又试了几双鞋底，还是乙等，始终没能过技术关，只好放弃。

想起儿时常见母亲纳鞋底，她不干别的活，估计一双也得纳一天。这儿有人的效率竟能十几倍于母亲。同室马姓犯人1959年张家川回民暴动时被捕判刑，为赚特等劳动饭，别的犯人已经入睡，他还在加班。无须任何亮光，他竟然能纳出甲等甚至优等的鞋底，每日完成十五至十六双，对我来说简直不可思议。

我只能干较轻的活路，也只有“轻劳动饭”的待遇；但我并不为肚皮发愁，因为董剑青在帮助我。

我与董剑青有缘，一见如故。当我们比较熟悉后，他说，我见你第一面就觉得你不错。我说，我也是。他又说，你普通话说得比我好，读报口齿清楚，教操很认真，大家反应不错。

董剑青年长我五岁左右，仍保持着大学生的气质。他毕业于某财经学院，后分配到天水一家国营企业当会计师。他与天水一位姑娘相恋，感情炽烈，未婚先孕。当时这种事会被看作是生活作风败坏，甚至是“流氓罪”。董剑青怕身败名裂，因此设法让姑娘堕胎。

他私下使用了土偏方，结果意外发生竟致女方死亡。董剑青被判了无期徒刑。谈起这事，他痛悔不迭，对女方怀着深深的内疚。判刑后，因是一般刑事案，政府对他仍很信任，叫他重操旧业。白天他在外面门市部上班，晚上八九点才回监院就寝。他接触的都是社会公民，故而他的打扮也没有犯人样儿。每月他还拿十元技术津贴，在三监是名副其实的特别犯人。一天三餐他都在上班的门市部吃，狱里仍留给他一份朽粮。平时他把这份朽粮分给大家，只有节假日打牙祭的伙食才留给自己享用。

我入监不几日便得到了他的照顾。在看守所的二十二个月，尽管急需食品充饥，我一直拒绝嗟来之食。如今却心无芥蒂地接受了董剑青的帮助。监狱里的晚餐多数时间是白面面片，间或内中还有肉屑，是我很喜欢的饭食。知道我抽烟，有时他也捎进来一盒半盒给我；偶尔他还给我一把水果糖。可能是年轻的缘故，身体虽然在看守所受尽摧残，到1963年春节已大体恢复。我的胳膊依然不能高举，倒也无大碍了。

没有董剑青的物质援助，我不会恢复得这样快。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我从董剑青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鼓励。他还教我识别犯人的方法，这使我在以后漫长的劳改中没吃大亏，受益匪浅。

我对他无以为报，1963年过春节时，胞姐寄来十条手帕、十块香皂、十支牙膏，我与他二一添作五，分享了胞姐的情意。

三、忘不了一双圣洁的眼睛

1962年国庆节后，我突患急性角膜炎。病情很严重，我被抬到医务室病房。医生对此颇为重视，他采用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我在点眼药、吃消炎片之外，还在眼部做热敷，又把双脚浸泡在热的艾草水中，一泡一两个小时。犯人医生李希贤（这名字可能有一字记得不准）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泡脚的艾水凉了又赶紧换上热的，叫我好不感动。

李希贤是甘谷人，高中文化，个头比我稍高，也瘦，年约二十

七八；不知他的案情和刑期。他很聪明，当犯人后才学得护理知识，以后不断钻研进步，因此当了犯医。他日夜守护着我，无人叫他就不离开。待我的病情好转后，他更是不离开我了，他向我问数理化的各种问题，求知若渴。我也竭尽所能地回答他。

有一次我问他：“这儿给犯人注射葡萄糖，为什么会发生浑身哆嗦的现象呢？”他告诉我，给犯人注射的葡萄糖原非针剂；为了救命，就将葡萄糖粉用开水溶解，是装瓶自制的。注射后的反应可能是消毒不严，也可能是糖粉不纯所致。我说难怪，这实在太冒险了。葡萄糖粉只能口服，直接输入静脉会造成伤害。通过肠胃消化吸收和血液直接吸收，这是两种不同的途径。胃肠可将废物排泄，而一旦有害物质进入血液后，则再难清除。他说葡萄糖针剂市场脱销，这是应急，是没办法的办法。不过到现在为止，注射后哆嗦一阵就好了，还没出现太大危险情况。我说：“人命关天，到出现时就晚了。”我建议他停止注射，改为口服。

他问我：你能否设计一个过滤、高压消毒装置？那是极需要的。这对我并非难事，过滤装置我熟悉，又亲手搞过菌肥生产；高压消毒、无菌接种操作我都是轻车熟路。我把方法详细向他解说了，并告诉他：“过滤只是一种物理分离手段，对提高葡萄糖纯度的作用是有限的，对那些可溶的有害化学物质，它则无能为力。”

昔日武山看守所的犯医裴慎，此时也在三监。他比我早来大半年，我们是老相识，病房夜来无事，他与我对弈一两局象棋，我俩棋力相当。裴慎不久被无罪开释，七十年代调到兰州的省监当了大砂坪劳改医院院长。文革结束后裴慎得到平反，担任过甘肃省政协常委。我平反回兰州工作后一直与他有交往，直到他逝世；这是后话了。

医务所所长是个四十左右的胖子，下眼皮有明显的眼泡。听说也是老右，却有干部身份。他给危重病人看病，每天巡视一次病房，平时再难见他，几乎没说过一句话。这位所长的妻子年轻漂亮，又好打扮。看年龄比他要小十五至二十岁，偶尔到医务所来找他，大不咧咧的样子引人注目。

李希贤把我的一些情况报告给所里，犯医裴慎也力荐我。老右所长同样主张将我留在医务所。他们遂向狱方打报告，终因我案情重大又表现极坏，连管教科这一关都没能通过。

我住病房期间，苗庆久和何之明调工棚劳动，去学裁剪。有无杨贤勇我记不清了。听说苗与何无师自通，在三监引起很大反响。其实理科学生都会机械制图，现在只是按图索骥，是再简单不过的了。

眼疾痊愈后，我仍回到一监院。

又有一日，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令我热血沸腾，也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日我在甬道上，哨楼上一位“班长”对我招手，我径直走到哨楼他所站的地方下面。环顾四下无人，他俯下身来对我轻声道：“我知道你的情况。我要用我的命换你的命，救你出去！”他距离我高两公尺，只有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的表情极为严肃，语声带着颤音。

在看守所，我愿用我的命去换冯淑筠、苗庆久的命；他俩都比我更存在的价值。现在竟有人要用自己的命换我的命，我太熟悉这种感情了。这是肺腑之言，令我激动得不能自己！

他是个稚气未脱的青年军人，年龄当在二十岁左右，可能还不到二十岁。他穿着军大衣，戴着棉军帽，红扑扑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他说的是很差劲的普通话，我无法判断是何处人氏。从他的目光里能感到他的真诚，我对他说：“让我考虑考虑。”

他的话燃起我对生的渴望，也让我重新思考了生命的价值。我早已万念俱灭，十八年牢狱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生不如死，不如早吃一颗“花生米”了此一生。不想，居然有人如此看重我。我应该无愧于他，无愧于生我育我的人民。我必须坚强地活下去，用事实来证明谁是谁非、谁善谁恶。

思前想后，一夜不曾合眼。这是惊心动魄的生死抉择，对他和我都是如此。他还太年轻，不知其中的复杂和利害，尽管他在这么说之前，必有种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敬佩他的献身精神，但我的结论与他相反。监狱被围得像铁桶一样，插翅难飞，整个社会也是

如此。如果冒险而为，十之八九是白白送死。我死了事小，又要害他终生。年轻军人侠肝义胆，正是民族的希望所在；若他为我而死，我于心何忍？受我株连的亲友还少吗？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要出去我便从监狱大门大摇大摆地走出去，绝不能做株连他人的事！

我意已决。第二天，我没有走近哨楼，只是远远地对他摇摇头，然后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

事后回忆此事，每每心潮澎湃又心有余悸。因为还有另一种可能，尽管可能性微乎其微：谁能保证他不是受人指使前来钓鱼的？呵，世事何等复杂，谁又能看得准？不过我庆幸没有在这件事上脑袋发昏，无论如何，我的选择是明智的。

四、1963年春节

春节快到了，董剑青对我说：“春节各监院要办墙报，一监院由你负责。从明天起，你不用参加室内劳动了，全力操办此事。”显然，他是事先请示过了的。他又告诉我，“犯人中有的是人才，四监院就有不少老学究，都是解放前大学毕业的。有人当过国民党县长，有参议，有师长、旅长。他们肚子里都有货。大年初一，各监院要互相参观评比。张典狱长和管教科长肯定来，说不定还有劳改局的头头来。”我明白他的意思，无非是要我认真对待。

办墙报，自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几乎伴我走过整个学生时代。写篇东西，写小楷字我也算凑合，唯插图画画非我所能。此时，我的书法水平简直是在一生中的顶峰时刻，不知是笔好还是墨好，写的字连自己都不相信出自己手。插图由一位当过小学美术老师的犯人动笔，效果也很不错。墙报上的文章我全是东拼西凑，只有两首小诗算我的应景之作。

正如董兄所言，初一上午十时许，典狱长、管教科长以及不明身份的干部来了一大帮。在哨楼底层的大厅里，狱方又召来各监院大组长、生产大组长以及犯人中的文人墨客。我也被召去，犯人共

有好几十人，但其中没有我的三个同学。典狱长带领大家，由一监院开始观摩，人们呼呼啦啦，七嘴八舌，逐个阅览评点。

此前我没去过别的监院，这次随大队人马，先后到了二、三、四、五监院。二、五监院的甬道都是窄窄的，与一监院差不离。三监院则宽得多，四监院的甬道更比一监院宽了三四倍。果然，四监院的壁报很有特色，版面错落有致，书写精美大方，字和插图都很漂亮。还有几首旧体诗，水准均属上乘；一位当过漳县县长的董姓犯人所写的诗，堪称压轴之作。大家反复品味，皆啧啧称道。

五监院是个女监，没见几个人。大家也进去走了一遭，壁报无甚特色，按下不表。

临末，大家在大厅乱哄哄议论了一通，一致认为一监院和四监院最好；二三次之，五监院更次。

回头交代一件事，其时我的心事早已不在壁报上。到二监院浏览毕，大家鱼贯而出，我走在最后。那里的门边有一个监室，牢门半掩着。不经意间我往里一瞥，天啊，里面关押的竟是张春元君！这是我始料不及的，看到他的身影我深感悲恸和震惊。我不知他的讯息已整整两年半了。

张春元，河南上蔡人，家庭出身贫寒，与我一样也是农民的儿子。他年长我约五六岁，参加过抗美援朝，是坦克兵。朝鲜停战后回国，他曾在武汉军区给司令员开小车，技术娴熟，车开得快，快得有时首长都不敢坐。部队里的手枪射击比赛，他曾名列第一。1956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历史系，1957年被划为右派。我们都被处罚到天水劳动考察，他被分配到马跑泉公社。因为他在部队的汽车队担任过技术员，就被公社调到拖拉机站，既是拖拉机手也负责维修。

张春元爱好文学，劳动考察期间他还写出了电影剧本《中朝儿女》。他用了笔名司马章，剧本在1959年发表于长春电影制片厂刊物《电影文学》上。故事大意如下：志愿军一侦察小分队深入敌后，一次战斗中侦察员冒死救出朝鲜老乡，自己不幸落入虎穴。朝鲜阿妈妮为救出侦察员，献出了自己的儿子。

张春元以他在朝鲜的生活体验为基础来创作，讴歌了中朝人民

的战斗情谊。剧本成功发表后，他受长影之邀，前往落实摄制计划，返回后却被公社党委知悉。党委立即电告长影厂：“作者系右派”。一切计划泡汤，唯得数百元稿费。

张春元君性格豪爽刚烈，侠骨义胆，为人坦诚正直。入狱前我一直视他为兄长，对他倍加敬重。此时此刻，他还穿着我送给他的军大衣。我俩一里一外，还能说什么呢？没有交谈机会，千言万语化作短暂的一瞥，算是互道珍重。没想到这一面竟是我与他的永诀！

过春节，一连放了三天假，连演三天戏。戏台搭在工棚边，各监院犯人分别坐在工棚与医务室之间的场地上。纪律不甚严，犯人得以小声交谈。不同监院犯人有同一个案子认识的，有在外面认识的朋友，借此机会或远或近打着招呼。几百人坐在各自的小马札上，场地里看去黑压压一大片。我的目光搜寻到老苗、老何、老杨三人，我向他们送去我的节日问候。

舞台上演的全是古装京戏，演员、伴奏清一色都是犯人。三监原有犯人多来自江浙一带，还有上海人，他们爱好并擅长此道。据说在 1953 或 1954 年还成立过犯人京剧团，那时有成套的衣箱。我刚到三监时有人问过我，似乎有意召我进去，可惜我是戏盲，对京剧只能说略知一二。这几天演的京剧折子戏有：打渔杀家、徐策跑城、捉放曹、空城计、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演员技巧娴熟，唱腔有板有眼，只是表演者年龄都老了。拉京胡的犯人尤其投入，只见他的头左摇右摆，琴声悠扬动听。

董剑青与我坐一起，他递给我瓜子、糖和香烟；只有他才有这些年货。我俩边吃边聊，他对各监院的知名犯人都熟，逐一向我做着介绍。

第一位是马大主教，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他被关押在二监院。我们一监院与二监院的座位毗邻，他又和我并排，相距咫尺。一进戏场，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穿一套蓝色簇新的毛料制服，莫说在监狱，即使外面、在省地级高官里，也难得看到这种高级衣料。他知道我与董正在谈论他，便向我俩微笑点头，十分友善。董告诉我，马大主教是 1959 年底被抓的，当时发生了西藏藏民和甘、青两

省回民“叛乱”，他是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的大主教，也是回民“叛乱”首犯。张家川“叛乱”平息后，好几个要犯被处决；作为首犯的他竟留得性命，判了死缓。原因可能在于他属于高层统战对象。董说他穿的这套衣服是政府专为他定做的礼服，1959年他以大主教的身份应邀赴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大典。想不到这衣服穿上身还不到一两月，他就由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世事难料，升降只在转眼间。

马主教四十出头，身体颇壮实。他黝黑的脸上透着红润，右下颌部有一大块斑痣。他这一案很大，仅在三监院就关押着数十名他的同案。一监院还有两个阿訇，一个判无期，一个判二十年；与我同监号的锥鞋底超快手也是二十年。董又告诉我，他们这一案子确实是真刀真枪干了一场的。

当过漳县父母官的另一董姓犯人，在参观壁报时我们已认识。董剑青告诉我，这位董先生解放前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对法律和文学造诣甚高，是全监公认的第一支笔。

几个原国民党军队的师长、旅长和团长，各自穿着黄棕色的破旧呢服，有的人呢服上缀着刺眼的补丁。一眼看去，这些人骨子里仍透着军人气息。他们的命运起伏跌宕，人生感慨一定不少。

看戏三天，一直未能见到张春元兄。我时时记挂着他，多么希望能再见他一面啊。然而他是未决犯，享受不到看戏的恩典。

五、“我不服，永远不服！”

进监时，张典狱长曾对我说，你有什么思想问题可以找我们谈，绝对不准在犯人中散布。我从报上获知，此前国际上发生了三件世人瞩目的大事：一是中印边界武装冲突，一是中苏公开论战，中共发表了“九评”；再一件是美、苏的加勒比海危机。我对这些有所猜测和思考，乃以《不同的看法》为题写了份书面材料，写好后拿给董剑青过目。他很欣赏，认为很有见地。我把材料递给了监狱当局后，转念一想，感到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生死未卜的人，还

“心事浩茫”忧国忧民，可笑不自量了。此后我总算清醒些了，所幸材料如泥牛入海，当局也未追究下来。

过罢春节不几天，监院来了个新犯人。他年约三十左右，名叫黄根宝。原来他在武山云雾山农场服刑，因为“重新犯罪”被羁押来三监。他此前就知道我，又向我介绍了在云雾山农场我的诸同学的情况，还谈到杜映华。在我印象中，黄根宝勇敢有余，沉稳不足。因此我只听他说，一句不答。环境太险恶，对任何人我都不敢不有所提防。

元宵节的第二天，我被传唤到典狱长办公室。我到后坐下，这时又进来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与我年龄相当，一副学生派头。

那女的开口便道：“我现在代表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你的上诉依法宣判。你站起来！”

于是我与女审判员面对面站着，办公室其他几个人也都站着。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62)法刑字第十三号”。

她滔滔不绝地读着复审判决书，内容与原判分毫不差，只是我又多了一条“罪行”：

申诉人向承鉴在看守所拘押期间，不思悔改，反而变本加厉，书写反动诗词，总结反革命“经验教训”，提出新的反革命活动策略，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之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据此，本院认为，原判事实确凿，量刑恰当，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1962年8月25日

这段文字的确令我惊讶，我问女审判员：“何谓‘终审判决’？”

“终审判决就是最终的判决，就是再不准上诉的判决！”她的口气近于轻蔑，但我进一步发问道：

“为什么不能再上诉？请问：法律依据是什么？能否拿出来一闻。”

“我们认为你没有再上诉的任何理由与必要，你的犯罪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量刑恰当。”

“你们自然认为判得准确无误，否则你们就不会这么判。不过，上诉是法律给予被告的权利。该不该上诉，有无必要和理由再上诉，应该是‘我认为’，不能是‘你认为’。你无权剥夺我的上诉权，除非你拿出法律根据来！”

我在外面就通读过中国刑法方面的书，她太小看了我。而我一眼便看出她不过是刚从政法学院或大学政教系毕业不久的书生。对我的反驳，她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满面绯红。我接着反驳说：

“你认为‘定性准确’，我认为‘定性全错’，全颠倒了。不妨依据共产党人的理论学说，依据社会发生的真实情况来讲理，我愿同你或者其他任何人辩论，你以为如何？”

“我是革命者，正在行使人民赋予我的权利而对你实行判决：你是个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现行反革命罪犯。你要同我辩论？笑话，你不配！”

我知道为自己辩护的机会已经所剩无几，我必须冷静镇定。我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以便能把观点表述出来。我心平气和地说：

“革命与反革命是个相对的概念，没有革命无所谓反革命，没有反革命也就失去革命的存在前提，它们又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我不否认共产党人过去曾代表民族、人民的利益，而且，现在共产党人中初衷不改的也大有人在。但是”，我话锋一转，语气突然激昂起来：

“真正的共产党人，必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必然先忧后乐；为大多数工农群众的利益鞠躬尽瘁！现在是这样的吗？千千万万饿殍可以为证，亿万啼饥号寒的农民可以为证！你刚才说你行使人民赋予你的权力，你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你心里很清楚！你说我‘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我断然否认这一颠倒黑白的指控，我只承认坚决与你们的倒行逆施为敌到底。”

她粗暴地打断我，拒绝我的挑战：“我没时间听你嚼舌、胡说八道。反正不能再上诉，再上诉只能加重你的罪行。”她拿起文件

夹，一扭屁股走了。我冲着她的背影怒吼道：“辩论就是说理，不敢辩论就是不讲理！我不服，永远不服！”

我心里明白，她说的不能再上诉就是定论，只是把话没说透，也不敢说透。我和我这一案是他们的上级或上上级直接插手的。武山法院的原判不过是秉承上意，怎么判、判多少，全是上边定夺。即使复审，也非中院所能决定。既然如此，再上诉也是白搭。

一直笼罩在心头的疑云，现在终于落定。在看守所关黑牢期间，我秘密地写了不少诗文，到南号后我委托李绪虎带出去，没想到最后还是落在了当局手里。我不知道是李主动献媚邀功交出去的，还是他出监时被搜走的。依我分析，前者的可能较大。他本人案情轻微且是文盲，当局不会去细查他。而且我委托他代为保存的小纸片又是缝在他衣服中的，他如果不愿意，完全可以拒绝，我不会有丝毫埋怨。而对我的委托，他表示要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它。当时我是何等感动啊。我多么幼稚，太不了解也太相信他了。我想到方志敏《可爱的中国》，想到《烈士诗抄》这样的作品，它们都是革命者在就义前所写，由狱友妥为保存才得以流传的。而今我却做不到了。鲁迅的《药》发表数十年了，他的呐喊并未唤醒国人；我不知道现在是人性更堕落还是统治术更高明了？

如今事过境迁又年代久远，当年在黑牢里密写的诗我还记得其中一首：

绝命诗

胸膛也就百千洞，
项上不过碗大疤。
莫笑憨愚卵击石，
生命源自一细胞。

为通衢不闻哀号，
为阡陌不见饿殍；
秋瑾殒命无所惧，
小卒步尘亦自豪！

1963年3月，我和苗庆久、杨贤勇、何之明被押至兰州新生砖瓦厂服刑，三监的另一些有期犯因年龄较大，被押去新疆劳改。由于事先获知去向，我与董剑青得以从容话别。他对我有许多嘱咐告诫，我都一一铭记在心。我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字，只是把所有书都给了他，作为纪念。

第三章 “脱胎换骨”

一、不期而遇张炳秋

装牲口的闷罐子车到兰州时，天已断黑。我们被武警四面八方地包围着，吆喝着，昏昏然不知南北东西；最后被赶进一处有四面高墙的所在。大墙里有数排平房，我被赶进最里边一排的一间大屋里。屋子里空无一物，黑糊糊的，人与人彼此看不清楚面孔。一位专政者将门“哐当”一锁，走了。大家各寻块地方，在水泥地上打开行李，囫囵躺下。从天水到兰州，那时火车走得慢，经过了十个小时的折腾。一路上虽然有少许干粮充饥，却没喝上一口水。

第二天天刚亮，门外响起尖锐的哨声，有人大声喊：

“起床，快起！捆好行李，在操场集合站队！”

我和大家一骨碌爬起来，连忙捆行李，知道又要开拔远行。喊声刚过几分钟，进来一大帮干部，一个个如狼似虎，大声吆喝骂骂咧咧。对那些动作迟缓的犯人，干脆是连打带踢：“你们这些猪猡！还没睡醒没睡够吗，我叫你睡个够！”皮鞋在犯人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挨踢的犯人发出痛苦的呻吟。

这就是劳改队，一个野蛮不讲理的地方、一个拿人不当人的地方。我虽未被踢打侮辱，心中也十分愤恨。我知道，这是他们的见面礼，是给刚投入劳改的犯人一个下马威。对犯人施虐的人中，有一个是韩教导员，我不久后知道了他的身份。

与董剑青告别时，他反复叮嘱我：“到了劳改队你要时时处处小心谨慎，那儿是执行机关，他们不跟你讲道理。万不可表露出你不认罪服法，否则要吃大亏，很难熬出去。”

我拿定主意：无事不找事，小事尽量忍，不主动寻死。毛泽东已七十，我想看到水落石出的一天，还想有机会写点读马列书的心得。毕竟已熬过看守所最凶险的日子，我要十分冷静小心地面对今后的一切。我决不会乞求生，不要像狗一样活。要是那样，我宁愿死。总之我想的是，能熬就熬，除非熬不过去，毕竟刀把子攥在人家手里。

犯人集合在一个颇大的广场上，那儿后来是一中队犯人的饭场，狱方给新来犯人分中队，最先点到名字的是我和我的另三位同学。我首当其冲，分到一中队；何之明分到二中队，杨贤勇在三中队，苗庆久分在四中队。每中队一人，我深知这种分配的缘由。

兰州新生砖瓦厂并非新起炉灶，“三年”期间它被迫下马，如今又恢复生产，我们是补充进来的新鲜血液。这个厂坐落在兰州东站与皋兰山之间的红山根，监房不大，工地却有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犯人收工时要入监院，进小笼，只有烧窑的自由犯除外。虽说是工地面积大，沿线都有警戒网，这个大网由火车站南面站台一直撒到皋兰山的各个山岗和土丘上。

这厂已经很有规模，它拥有九十九座罐式土窑，各窑容量大小不等，小的七八万、大的则有四十几万的容量（如42号、92号窑），内部俨如国宴厅一般大。每年的砖瓦产量达数十亿块，兰州市绝大部分建筑用砖皆来自于此。一中队是成品中队，二、三、四中队是半成品中队，专事砖坯制作。而一中队又分为四个分队：一分队是烧窑分队，这里尽是一些刑期短、案情轻微的刑事犯，他们吃住在外头。二、三分队是装窑分队，四分队是出窑分队，两个队共有两百多犯人。

我被分到一中队的三分队第三小组，我们组和另一个小组共四十名犯人住一间大宿舍。宿舍内一侧靠门，另三面围着一圈土炕，中间有二十见方的空地，这空间比看守所和三监的监舍要开阔得多。犯人睡铺由管教干部指定，一般来说第一名是犯人组长，最后一名是副组长。我的铺位挨着组长，这是所谓记录员的位置。我们这组的组长叫孔繁成，副组长叫周歧昌。

孔繁成，案情属于一贯道，判了有期二十年。他比我大十多岁，个稍矮，很结实。他已服刑将半，性格老成持重；平时少言寡语，对其他犯人很严肃，对我却很友善。副组长周歧昌二十七八岁，原是兰州一名武警，似乎还有分队长的官衔，曾在侦讯队受过特别训练。因监守自盗案判刑。他长得四方四正，一米八的个头，身体强壮，性格开朗活泼，对谁都开玩笑，对我尤好。

阳春三月，乍暖还寒。开工伊始，所有中队犯人都干同一种劳动：清除窑里的碎砖垃圾。九十多座土窑大致分为南、中、北三排，每座窑上都有编号。两排窑之间有汽车路，汽车可通到每座窑跟前。犯人各背一个大背斗，在公路上蜿蜒而行，队伍如长蛇蠕动。出窑时由于肩上重负，个个像老牛一样弯腰弓背，由东向西，再将垃圾倒在西头一个很大的污水坑边。回来时卸了重负，大家有说有笑，边走边交谈。上、下午工间休息一次，每次只有十五分钟。休息时小组的人一般都是围坐在一起，聊天抽烟。休息结束，装筐的换班去背垃圾，背过的人换班装筐。

我的身体大致恢复了，干这个活不觉吃力，何况路程不远。

一天，我背着空背斗往回走，听见后面脚步匆匆。一个犯人急步追来问我：“你就是向承鉴吧？”我答道：“就是。”“哎呀，我找你好苦啊！不想在这儿找到你。”我甚感惊诧，莫名其妙地呆望着他。于是，他向我滔滔讲起我在武山看守所受审的诸般情况。他说，每次半夜提审，我都站在你身后。你们这个案子破案后，外面传言纷纷，说是农民要来劫狱；弄得看守所很紧张，白天黑夜都加双岗。我无站岗出勤任务，夜里提审你，就抽我担任临时警戒，一次不漏，故而对你很熟悉。

原来如此。

他说，提审时你说的那些话，我们听了头皮发麻，后心直冒冷汗。心像针扎一样，既刺激又害怕。有一次，你离开椅子，用手指戳他们，骂他们是一群良心丧尽的畜生，畜生不如。我浑身哆嗦，你那些话太撼人心魄了。

他还讲述了许多，一点不假，他确实是见证人。

我说过的话，犹如一阵风刮过，充其量扬起一些尘土，卷起几片黄叶，以后自己也淡忘了。但对听众，也许会掀起思想和感情的大波澜，我也有过类似经历。

他对我的言论记得如此详细，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赞誉之辞也使我惭愧不安。

他叫张炳秋，约年长我五岁光景；陕西人，高挑个头，脸色白里透红，嘴巴大大的，长得蛮帅气。看守所期间，他是县武警大队管理员、排级干部。他妻子是天水火柴厂女工。在武山服役期间，他与武山一中的一女生产生恋情并同居，被判重婚罪有期三年。他的原配妻子对他又爱又恨，虽告发了他但仍深爱着他。张在服刑期间，他妻子节衣缩食，经常给他寄食物和用品。他是个坦诚人，把握不住自己的感情。作为他的朋友，我的坦言规劝和尖锐批评他都接受了。他对自己的负义行为很后悔，我只是不知后来和他妻子是否和好如初了。

张炳秋分到一中队的四分队，不到三个月，我也由三分队调到出窑分队，与他在同一小组。

三月下旬，天气渐暖。三个半成品中队的犯人纷纷转入自己的行当。大卡车运来涮坯斗的沙子，犯人们有的卸车，有的运沙，有的往坯场洒水，又压又刮，平整坯场。老犯人教新犯人制坯倒斗的技术，各坯场不断传来扣斗的“噼啪”声。成品中队的犯人除清垃圾外，每人发了一根长长的牛皮带，还发了制作背夹用的帆布等，人们为正式生产做好各种准备。

二、装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4月初，当半成品中队开始试斗倒坯时，成品队也抽出一些犯人去倒坯。那不是砖坯，而是一头宽、一头窄的楔形土坯，每一块都有四块砖大。后来我才知道这是用作箍窑的。罐式土窑由于高温又要炆窑、饮窑，窑体受热不匀，每使用一段时间，窑体会裂缝，有坍塌危险。这时必须扒掉上半截，重新箍，名曰修窑。

修窑、箍窑的活，一般两个装窑小组同时上阵。有和泥的，担水的；有上泥抹泥的，运坯递坯的；更多的人是背土填实窑帮。大师傅只有曾凡晨一人，曾是二分队一组的犯人组长，他是武威人，四十出头，人长得粗壮，箍窑是他的绝活。他动作极快，每块三十多斤的楔坯递到他手里，似乎不用观察随手放上，按一下就行。从窑内往上看，窑箍得圆圆的，像用圆规画的，每块坯都摆放得恰到好处。他一圈圈箍上去，不断缩小收拢，直至窑顶，形成一个直径不到一米的圆孔。泥很湿，他一刻不停手；从底部炉膛朝上足有十多米高，人像俯在半空里，悬得很。我担心会窑壁坍下去，直为曾凡晨捏着一把汗。艺高人胆大，一点不假，他的泥瓦匠技艺足有八级工的水平。

坯场上的砖坯垛一排排竖起来，有的已经晾干。4月中旬，二、三分队开始背坯装窑。每小组二十个犯人，窑内三个装窑工，犯人组长总负责；外面坯场留三至四名码工。外码工人数量视坯场离窑的远近而变化，距离近则需要的外码工多，反之则减少。其余的人皆为背工，管教干部事先依年龄、体质诸情况，将犯人划分为甲、乙、丙三个劳动等级。

各等级有不同的劳动定额指标：甲等劳力每趟需背二十八块砖坯，乙等背二十六块，丙等背二十四块。此外，根据坯场与窑之间的距离，一小时背多少趟也有详细规定：如距离为八十至一百公尺，每小时需背二十五趟。那么甲等背工每小时需背 $28 \times 25 = 700$ 块，乙等六百五十块，丙等六百块。砖坯全为红胶土，瓷实得很，有时只有八九成干，每块坯重五公斤。也就是说，甲、乙、丙三个等级的背工，分别负重为一百四十公斤、一百三十公斤和一百二十公斤。如果是行走平地，倒也困难少些；偏偏这儿是老砖瓦厂，连年取土倒坯，如今坯场都在公路两旁的深坑里。如此将砖坯背出来，必须爬三十至六十度的陡坡。外码工少，背工多，犯人往往一天也轮不到换班机会，得背整整八小时之久，定额指标一块也不能少。组长若是想讨好犯人，就会多放外码工，少放背工，这样可以使大家得以轮换休息。但在狱方看来，这就是窝工浪费。为了避免这一点，

每个犯人都明确的定额任务，各小组每天还有硬指标，例如要求每天装窑的数量要达到五万块。

任务落实到人，各组就专设了一人来做窑门记录，也就是给背工划趟数，记坯数，算任务指标和实际完成的数量。背工半途掉的砖坯要扣除，损坏的也要记录在案。背工负重爬坡慢如蜗牛，为争取时间，空手返回坯场就得一路小跑。诚然，为少跑几趟，可以每趟多背砖坯；反之亦然，多背几趟，少背一点。总之，每小时应完成的砖坯总量是定值。装窑分队有人用多背砖坯少跑几趟的方法完成任务，多跑少背的方法则未见奏效。

装窑工和外码工的合作是“实报实销”，背工背多少，码工就码多少，装窑的工人也都装完，三者都与打仗一般。三个装窑工一天要装窑五六万砖坯（有时甚至高达七八万块），每人每小时近两千砖坯，每块砖坯都要放稳，要垫实。码放的位置必须准确，一旦坍塌可是大祸临头。五六万块砖坯，全靠三个外码工码成一个个背子，人人是争分夺秒、拼了老命地干。

装窑分队犯人的劳动定额和组织管理，钉是钉，铆是铆，实在是太科学了。任务落实到每个人头上，谁都钻不了半点空子。

以前，农村搞大规模的“一平而调”，吃“大锅饭”，搞得社员劳动积极性丧失殆尽，连大小便都憋到工地去释放。虽然也是记工分，那不过是聋子的耳朵，工分再多换不来钱。稍好的地方一个工分只分得一两分钱，有毛把钱就很不错了。社员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犯人的劳动就截然不同，三监有“号子饭”、轻劳动饭、重劳动饭、特劳动饭之分；发零花钱也根据劳动能力做了区别：不发、二元、三元、五元。砖瓦厂就更精了，精到滴水不漏。谁说当权者不会组织生产？他们只是不在劳改队里搞社会主义的大锅饭，而是要搞资本主义的按劳付酬。否则，如何调动犯人的积极性？我叹服！

我的定额是丙等，这算对我很照顾了。按年龄给我定乙等也不为过，然而即使我拿出吃奶的力气也完不成。第一天新犯人学背窑，我试着背上了二十四块砖坯，重约一百二十公斤，结果两肩下坠，

两胳膊和两手发麻。周歧昌给我换来较宽的皮带和更厚更软和的背夹，又背了一趟，胳膊酸麻得更厉害，浑身打颤。我不是惧怕劳动，无奈这负荷远远超出了我的体能。小时候我打过柴，也担过城墙砖去卖，那也是超重的强劳动，毕竟只是偶尔为之。也可能我的胳膊被绳捆伤了，实际上并未痊愈。从五七年反右受到摧残到看守所关押这三年，我的恢复只在表面，距离应有的健康还差得很远。总之，我只能等待惩罚，有什么法子呢。好在周歧昌把我换下来了，他叫我去外面码背子。第二天正式装窑，我的活路则是窑门记录，这个活是由狱方指定的。

装窑分队的犯人劳动，是我所见过的人间最重的活儿。

犯人中有奇人，周歧昌和樊永贵就是其中的两位。他俩有时背的是“飞机头”大褙子，码的砖坯有四五十块，重约两百多公斤重。他们在30至60度的陡坡上悠悠慢行，同时还在和别人闲话聊天，真是令我咋舌。

我体谅到犯人劳动的苦累，干窑门记录时也自觉尽力。别的窑门记录员只是站在那儿划趟数，我却没让自己闲着。一有空，我或者进到窑内帮着装窑，或者去到坯场帮外码。有时我也在背工来路的路上奔跑，帮他们扶正背子，把掉在路上的砖坯抱回窑里。反正哪里忙往哪儿跑，一刻也不闲。我深知我是“工具”，只能做这些而已。

一座十多万砖坯容量的砖窑，一个小组两天就可装好。这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就算自动化的生产线也难比拟。

幸运的是，犯人伙食定量颇高，每月有五十三市斤。所以，尽管劳动强度高，犯人身体并不见垮。工人和一般的工作人员定量都一样，无论你是统计（即犯人大组长）、窑门记录、杂工，还是办《新生小报》的犯人。每日三餐，每餐有两个玉米面窝窝头，比拳头还大。星期天休息则吃两餐，上午改善生活吃白面馍，下午吃白面片，拌以有肉的脍菜。

一中队离伙房最远，平时都是整队到伙房前的操场用餐，下雨天则将饭菜打回小组分食。四分队有个杂工组，全是六十以上的老

犯人；中队的犯人统计李光伟也在这组用餐。这组年龄大，活路轻，很多人吃不了两个馍，是唯一有余粮的富户。吃不了的馍可根据自己意愿给外组犯人，那些吃不饱的犯人常拿眼盯视这个组。

小组犯人轮流值日，分菜分饭分面条，是值日者的职责之一。有的犯人视当值日为一月之中的大喜之日，有的则觉得分菜分饭最为头痛。毕竟绝大多数犯人仍吃不饱，总嫌值日给自己碗里舀稀了，分少了；争争吵吵是常有的事。饭场有时如战场，激烈争吵的人甚至拳脚相向。遇到那贪婪的值日者，他好不容易轮到掌勺把，狠心捞一把，尤其有肉食的时候，不要脸皮到穷凶极恶的程度。我当窑门记录，体能消耗少得多，每顿主食吃不完，我都将半个馍给周歧昌或樊永贵，唯当值日最犯难。我事先打好招呼：谁若嫌少，嫌我分得不公，可和我对换。说完我才开始分菜饭，我认认真真尽量将一碗水端平，最后给自己留的不到别人的一半。说实话，我宁肯不吃这一顿，也不愿与人发生不快。两位组长颇正直，他们觉得我对自己太亏，当过两轮值日后，他们都自告奋勇替我分饭菜，使得以摆脱这一苦差。

二分队马孝科组有个怪人，他是被军事法庭判决的，虽来服刑改造，据说仍保留着军籍。最奇怪的是他不能吃白面和鸡蛋，一吃就胃痛全身痉挛。每当周日大家改善生活时，他就独自到伙房索要杂面馍。

三、心在不停地颤栗

兰州新生砖瓦厂隶属省劳改局第一支队，是支队直属大队，共有一千多犯人在此服刑。监院呈长方形，东西长，南北窄，唯一的大门位于西北角。汽车进大门贴北边高墙行驶，可直达东边操场和伙房，这条路也是监牢的唯一通道。

操场南边有个戏台，开大会时用作主席台。靠牢门的西端是一中队，往东依次为二中队和三中队；四中队在最东边，挨着操场。每个中队的犯人住两排平房，东西相向，中间是个院子。各中队互

相隔离，不准来往也不通讯息。狱门外，路边有几间平房，那是医务室，犯人发生工伤或生病就在此就诊。病号室在监院里，占着一中队西排屋山墙的另一片，面对监墙。从医务室门前的公路再向西，下坡约五百公尺许就能看到，公路北侧有许多房子；那是干部办公的地方和家属区，它对面不远的公路南侧是倒垃圾的臭水塘。

大队里挂帅的人是韩教导员，我来此第二天早上见过他。从他的暴戾行为来看，这是个极左人物。

成品中队的指导员姓高，瘦高个，皮肤黑，说话空洞无物且稍有口吃。中队长四十多岁，很凶，记不得姓名了。他中等个头，满面红光，嘴里镶颗金牙。四个分队各有分队长，我所在三分队原分队长是从部队转业的，彪悍凶残，对马依不拉用刑的就是他。

同组犯人马依不拉，甘肃积石县人，回族，长得像老外。他三十出头，罪名是流窜盗窃。因完不成任务，被分队长戴上土铐，用铁丝拼命拧紧。那土铐嵌进肉里、骨里，从晚上八点多上刑具，直到第二天天亮。马依不拉嚎哭不止，那声音撕心裂肺，可见痛苦不可名状。若无十分歹毒心，难以如此下手。痛在他身上，伤在我心里。我想到，如果我不是当着窑门记录，命运会比马依不拉更惨。他受酷刑整整十个小时，到第二天早上才解除，因为还要他去劳动。卸铐时，他的两只手和胳膊肿得如发面一般，连铐子都看不到了。幸得不久他就完成了任务，再没受刑。要换作我是做不到的，完不成任务，我必会连续不断地遭受这般折磨。死不足惧，却叫你生不如死，我能承受这种痛苦吗？一颗孤寂的心不停地颤栗，我不敢想下去。好在不久这位分队长就不见了，换来个姓王的小个头当分队长。他也是部队下来的，听口音像湖南人。此人比较通情达理，我才感觉好一点。

管教人员平时到监院次数很少，除非开大会。犯人院子里没有干部办公室或休息室，他们即使进来，只是到李光伟的统计室坐坐，个把小时就走，与犯人少有接触。休息天以及收工后，犯人之间如果发生冲突，多是李光伟出面调解。

李光伟约四十左右，个头偏矮，举止斯文。他城府深，也相当

有能力。我始终不知他犯的何罪、刑期多少，也不知他是何处人氏。所有政府人员对他都很信任，在犯人中他口碑也不错。要做到这点，很难。

相比之下，除了孔繁成、周歧昌和本组犯人外，我与他打交道要多一些。一则窑门记录收工后要忙不迭地算账，向他提交数据报表；二则中队黑板报要写这写那，他忙不过来，要我帮他写。以后我对罐式土窑结构产生兴趣，向他索取各窑历年的万块煤耗、成品率等统计数据，他都提供了方便，我们之间的接触又多了一些。他工作认真，待人态度平和、礼貌周全，是活得很明白的人。

中队还有两个“文化”犯人，我这分队二组有个范佩玉，和我住着同一个大监室。他中等个儿，并不健壮，年约三十余，原是兰州部队战斗文工团成员，擅长打击乐，听说还是个小头目。他的案情和刑期我一概不知。隔壁二分队有个周西红，年约四十，原是省歌舞剧团的一级编导，因“作风问题”判刑。他俩和其他犯人干同样的活，也要完成定额，没得到任何照顾。处境狼狈，若不开口说话再难看出原来文化人的底蕴。

用当时流行的话来说，马依不拉的经历属于“脱胎换骨”，周西红、范佩玉以及我，如今是面目全非，可谓“洗心革面”。

从6月到8月这三个月里，骄阳似火，半成品队的犯人上身赤膊，下身只穿条短裤，在坏场上不断地打躬作揖，往返奔跑。每个人都晒得黑糊糊的，身上的皮脱了一层又一层。成品队的犯人从出工到收工，一直是汗水涔涔，身上干了湿，湿了又干。人们弓背弯腰，步履沉重蹒跚，鱼贯行进在坏场、陡坡和公路上；我不禁想起了列宾的油画《伏尔加河上的纤夫》。人们衣裤上布满白花花的汗渍，远看就像斑驳的戏装。收工回监，所有力气都已耗尽；谁都不愿动弹，都是吃了饭就上床。没有人擦身洗脚，更不会去洗衣服。躺着四十个犯人的大监室，汗臭如厕。我这小组只有周歧昌和我是例外，他即使再累也要提两桶水，在院子与我互相浇淋、搓背。我们都是洗刷一阵后才上床。

难得的星期天终于捱到了，犯人们直睡到九点半开饭时间才慌

忙爬起来。饭后洗衣，衣服是穿了一周的外壳，已经硬邦邦的了。尔后大家缝衣补被，修理背夹、皮带。

犯人虽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少有交谈，更莫说交心了。劳改有年头的犯人组长孔繁成，终日不说一句话。他们有阅历有经验，闭口不谈政治，也不谈自己的案情和刑期，除劳动上的事不说别的。我有了看守所李绪虎的教训，又得到董剑青的嘱咐，已经懂得再简单的人其实都不简单。有的人为了争取宽大减刑，挖空心思，充当包打听。一旦他打个小报告，跳到黄河也洗不清。政府支持的是“靠拢政府”的人，只会相信他们。我不敢马虎，始终保持警惕，不谈过去。尽管我对周歧昌有好感，也同样如此，绝不打开心扉。仿佛又回到三年前看守所的黑号里，与人没有任何交流与沟通，面对的众多失语的哑巴，犹如面对黑牢四壁，连我也成了哑巴。

我多么想看见我的同学苗庆久、何之明、杨贤勇啊，哪怕瞥一眼也好。他们现在身体都好吗？数月来我从未发现他们的身影。我甚至盼望见到张炳秋，能和他谈上一两句话，然而也只是在饭场才能远远瞥上他一眼。

这就是装窑分队劳改犯人的生活。

四、出窑分队犯人的劳动

1963年国庆节前后，我由三分队调到四分队。四分队与三分队犯人住同一排房，只是在另一边。面对一中队与二中队之间隔墙，门前是条窄窄的廊道，要到院子则需绕过山墙。四分队有三个出窑组，一个杂工组，约五十几号犯人，住一间大平房。进得门来，四周贴墙全是土炕，是个转一圈的通铺。

调来四分队，我心里颇高兴。一是我不愿当窑门记录，干这“工具”角色；二是四分队有张炳秋，他是唯一知我根底的人。我不相信他对我怀有恶意，视他为自己的半个亲人。此后我还知道，出窑组劳动颇适合我，我不但能完成丙等、乙等，甚至能完成甲等定额。这样我不再因为劳动而产生精神负担，毕竟我想活下去，不到迫不

得已不愿意死。

我分到一组，正好与张炳秋同组。组长叫蒙世辉，甘肃河西一带人氏，犯诈骗罪。二组组长叫胡三仙，年龄与我不相上下，湖北人，听说原为某体育学院体操运动员，案情、刑期皆不知。三组组长叫董顺海，也是甘肃人，捕前是农民。他在中队很有名气，以“积极靠拢政府”著称，立过功，减过刑，我在三分队就听说了。杂工组长姓冯，是临洮一位老地主。他六十出头，相貌很慈善，领着八九个是非多多的老头犯。他们的任务是待出窑组出完窑后，把窑底、炉膛里的碎砖清掉，为装下一窑砖坯做准备。这组有个董姓犯人，年约七旬，山羊胡，据说是临洮董卓后裔。此人懂四书五经，说话文绉绉的，喜欢咬文嚼字。我刚到四分队不几天，他出工背垃圾，一头撞到炉膛上，再没醒来。事后有人说他是畏罪自杀，人死灯灭，无人再提。

出窑小组每组十六个犯人，包括组长在内共三个固定的外码工，六对背工（内码背子或背，两小时一轮换），外加一个窑门记录。背工对子自由组合，快手配快手。如彼此不满意，也可更换搭档。从窑内到公路上的砖垛，通常是三十至五十公尺距离，甲等劳动力每趟三十块砖，乙等二十八，丙等二十六。若每块砖以四公斤计，每趟的负担分别为一百二十公斤、一百一十二公斤、一百零四公斤重量；这比装窑背工的负担要轻。根据距离远近，狱方规定了每小时必须完成多少趟的劳动定额。如距离在三十公尺以内，一小时需背八十趟。外码工的定额是包干制，无论背出来多少，都必须码完；不能叫背工站在那儿耽误时间。背工任务完成好坏，实际上不取决于他跑得快慢，而是取决于他的搭档码背子的速度。若是背子码不上，背工进窑只能站等，想快也快不了。这就是快手找快手配对的原因，活路是一环紧扣一环，人们互相催逼，一个个紧张得没喘气工夫。

我能够完成甲等背工任务，因为在出窑组，要点主要不在于体力和耐力，而在于速度和灵敏。我背三十块砖，当胳膊感觉到酸麻时已经到达了砖垛上。无论是背还是在窑内码背子，我的动作很快，

其他犯人都愿与我搭档。我与张炳秋是拆不开的一对，内中原因只有我俩心里明白。我这小组还有一对超一流的快手，我至今记得他俩的姓名是马英才和杨增生，他们在全分队无人可比。此外快手就要算张炳秋和我了。

如果说，装窑的活路最重最累，好歹在坯场外码背子时还能喘口气。而且无论是背工、内码还是外码，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出窑则不然，它是世上最脏、最热的劳动。

先说脏，窑内六个内码工码背子，各人支一个“座”，脱掉上衣，甩开臂膀，两只手犹如机械手，飞速地抡动，在二十秒左右的时间里要码好一个背子，真是手忙脚乱，满脸的汗也顾不上擦。有时将砖窑扇子面上的砖碰下来，不是砸手就是砸脚，即使鲜血直流，钻心疼痛，也顾不上包扎，甚至没空呻吟一声。背工速度如飞，挂皮带快，一路上来去都是小跑。放背子也快，二十秒左右便是一个来回。窑里煤灰、砖灰，尘土飞扬。人们没有任何防尘措施，连口罩也不发一个。内码两小时，出得窑外，头发、眉毛上都盖了一层厚厚的砖灰，整个人变成了白猿。

再说热，我参加出窑劳动不几天，终于轮到拆窑。拆窑任务由五人担任，一个外码工和两对背工。我们事先到伙房挑出两担温开水，同时又要准备棉衣、棉帽和外带皮掌的棉手套。棉衣是专门发的破旧货，棉帽实际上是个长长的棉头套，上面只留两个窟窿。每当一个窑的成品砖快出完只剩窑底砖时，为不窝工，立即派出五人先去拆窑。拆窑者将刚停火的窑砖从高扇子上一块块取下，把窑内的路一层层台阶铺好，直到能支上六个内码工的座，才算拆开窑。

按一般规定，拆窑时间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即四个工时。人们来到窑上，先将上、下偏门唏哩哗啦推倒，又将垃圾清走；这才开始拆窑。拆窑必须从最高处取砖，自上而下次第而行，断乎不准从下抽砖，那样会造成扇子砖墙坍塌，砖砸砖，好砖成了碎砖；那叫人为破坏，谁敢！窑内温度此时当在 800 至 1000 摄氏度，最困难的莫过于从最高扇子上取下第一块砖。此时，五个犯人都戴上棉头套，穿上棉衣，又戴上胶皮棉手套。大家全副武装，轮流上阵。

只见第一个犯人屏住一口气冲上去，不过是一两秒钟，棉头套焦了，棉衣糊了，棉手套外的胶皮都熔化了。热浪把第一个犯人打回来，第二个犯人接着上。棉帽、棉衣冒烟着火了，赶快拿水浇灭。有时，凡数人，进窑数次都没取下一块砖，全都无功而返。时间紧迫，任务比军情还急，怎么办？将棉头套、棉手套、棉衣全用冷水浇湿，再入火海！

书有“火中取栗”的成语，我不知咋回事。唯这火中取砖，我曾身经百次。不到四小时，五个犯人喝掉四桶开水，这四桶水重约1一百多公斤，每个人身上流了多少汗？可想而知。

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恶作剧，拿犯人性命开玩笑，有这个必要吗？为什么不等窑凉下来再拆窑出砖呢？当然有必要，在狱方来说是毋庸置疑的。目的是缩短生产周期，提高土窑利用率，提高青砖产量以满足社会需要，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趁热拆窑，出窑，紧接着装窑；此时窑里仍保持一定炉温，对于未完全晾干的砖坯可起到烘干、预热的作用。如此节约了燃煤，降低了万块煤耗。至于犯人受的罪，那是无须考虑的。

一座十多万砖坯容量的窑，通常只要一天，一个小组的犯人就将成品砖出得干干净净，劳动效率惊世骇俗，举世无双。

我不能不叹服，这儿真是改造人的好地方。财富唯有艰辛劳动创造，所有的寄生虫都须明白这一道理。但我是寄生虫吗？我有不劳而获的企图吗？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员才真该来这儿劳动改造。

五、张炳秋是“畏罪自杀”！

三分队队长叫张登高，甘肃泾川人，高个儿，行伍出身，性格极粗暴。他没啥文化却爱出点子，又好吹毛求疵，把犯人折腾得够呛。

有一次，张炳秋站在“蓝火”上码背子，他慌里慌张，一不小心从“蓝火”上失足跌到七八米高的炉膛里。我进窑一看人不在，吓呆了。全组人也都慌作一团，不知所措。炉膛经过反复煨烧，四

壁坚硬如铁，我猜他是死定了。可没想到他居然安然无恙，只是擦破了一点皮。“蓝火”上被他踩垮的几块砖伴他而落，竟然也没砸着他。这可真是奇迹，任何人都不敢相信。不幸中的万幸，我的心好长时间还在怦怦跳。

然而收工回监，张登高却不放过张炳秋，他说张炳秋“不认罪服法，企图畏罪自杀”，晚上亲自主持小组会批斗他。尔后又在各分队开犯人大会批斗，大小会先后不下十几次。会上，除三几个犯人积极分子帮腔，其他人都缄口不语，批斗会开不起来。

张炳秋只判了三年刑期，他已服刑两年，妻子在外面等着他，常给他寄这寄那。他会自杀？他为什么要自杀？真正岂有此理。

张队长如此对待张炳秋自有原因，人说同行是冤家，张登高当兵的出身，张炳秋也是，而且还是排级干部。他看不起这位队长大人，认为他说话办事没水平。别的犯人见了队长点头哈腰，偏他大不咧咧，不理不尿他。一个犯人竟敢如此不恭，张队长怎能容忍？他早想收拾张炳秋，苦于抓不到把柄。现在机会来了，当然不会放过。张炳秋也并非一个软柿子，虽身为犯人，毕竟还沾着“人民内部”的边儿。他算定张登高不能把他怎么的，会开来开去，张炳秋丝毫不认错，口气硬邦邦。张登高弄得颇难堪，只好不了了之。

我这一组的窑门记录名叫冯辉，比我大好几岁，圆脸高个，长得一表人才，说不清何处人氏。日子一长，才知他家就住在兰州市大砂坪，原来是省劳改局干部。我估摸他犯的是经济罪，刑期也不长。他告诉我，这直属大队的韩教导员、管教科长他在外面都认识。冯辉平时穿着整齐，依然一副干部模样。全分队、全中队犯人中，没有人像他这种穿着。他性格沉稳，话极少，遇事不惊不乍，脸上从不表示他的喜怒哀乐。

另两个出窑组的窑门记录，一个叫朱焕章，一个是钟世雄。朱个矮，圆脸，戴副深度近视眼镜，从眼镜片后射出的目光阴森森的。听说他被判刑前是会计师，年龄也只比我大三四岁。钟世雄是广东籍人，个头比我矮些，年龄比我大一两岁。他偷偷告诉我，他原是某大学的学生，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饿得受不了，跑回广东。

到广东仍然挨饿，只好往港澳跑。他是在“偷越国境”时被捕判刑的。他说的情形我至今记忆犹新：

那时，偷越国境的人多啊，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什么“叛国投敌”，什么“现行反革命”，全是一派胡言！不是“反革命”，是人要活命。活命是人和生物的本能，总不能眼睁睁等着饿死吧。我选择的路线是从水上走，为此事先还专门训练了自己的水性。谁看起来到香港的水面没多宽，一下水却变得远似天涯。水面到处都有探照灯，光柱一道一道，横七竖八纵横交叉，将水面照得如同白昼。军警的快艇来回穿梭，一旦发现偷越境者，立马驶到跟前，像捞小鸡般将洄者提到艇上。有的人眼见得快游到香港水域了，无论大喇巴怎么喊“回头是岸”，或者鸣枪警告，仍然是义无反顾地奋勇前游。这时，边防军警就给他们一梭子，子弹溅起串串水花、串串血花！每个晚上都有葬身鱼腹的不幸者，那场面真惨啊，太恐怖了！我是体力不支，濒临灭顶之时，自己喊救命被抓了。现在想起来还心惊肉跳。

记得入狱前在1960年上半年，我也曾听张春元兄向我谈到大量饥民外逃的事，只不过没有钟世雄讲得如此具体，惊心动魄。但我只听他讲故事，并不搭腔。

四分队还有两个犯人，一个叫王振坤，一个叫金克明，都与我年龄相仿，颇合得来。他俩判刑前都是农村的团支部书记，王是甘肃省何处人、犯何罪，现已不能记忆。金克明的情况我还记得，他是陇西东铺人，家住铁路附近。“三年困难时期”，陇西是重灾区之一。家里有人饿死，其他人眼看不行了，王振坤自己也饿得前胸贴着后脊背，不得已铤而走险，干了“火车钳工”的勾当。

他坦言：“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判刑劳改，值。至少我救活了家里的几条命。如果还有别的办法可想，打死我也不会去干这营生。实在逼急了，咋办？饿死的人全是吹牛皮的人给害的，他们只要乌纱，不要百姓，惨哪。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有一次，金克明的年轻妻子来探监，给他捎来一些熟鸡蛋，他

要将其中一半赠我。我执意拒绝，推推让让盛情难却，只好尝了一个。我说不明白他何以对我抱有好感，或许是从我的目光中读到理解和同情吧。

我很需要食物，当窑门记录时一份朽粮我吃不了，如今两三个月的超强劳动下来，又吃不饱，常觉饥肠辘辘，身体明显垮了。杂工组的余粮户也都喜欢把剩馍给我，在别人是求之不得，但我也一一谢绝了。张炳秋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大可不必。我不便解释，只说是性格使然。

1964年元旦前，王振坤、金克明还有三分队的马明川，都调到烧窑分队去了，他们案情轻，刑期短，在那里当了自由犯。

六、“冬训”

12月初，天气很冷了，半成品队终于停止倒坯作业。成品队把坯场砖坯装完，把烧好的砖出完，犯人次第进入窑内清理垃圾。在体力劳动大为减轻的时候，精神劳动突然紧张起来，这就是思想改造，一年一度的冬训运动开始了。

平时犯人也政治学习，一般在七点钟开始。记录员念篇报，大家斜躺顺卧地听完，东拉西扯几句。组长睁只眼闭只眼，应个卯完事。只在干部进来时，大家才装模作样一番。

冬训可不一样，天寒地冻，砖瓦厂半停产的时间达三个多月。这时，我们除了上午清除窑里的烂砖头，下午和晚上便要清除头脑里的“烂思想”。冬训时间每天长达六七个小时，监室里犯人将被子叠齐整，盘腿坐在被子前，不准挨着被，不准打瞌睡，不准骗传。这一坐就是四个小时，直坐得腰酸腿麻，浑身僵硬；那滋味比劳动还难受。干部也全体出动，在大屋里来回踱步察看，反正不叫你松闲。犯人松闲了就是干部的失职，这弄得犯人精神个个紧张。

这是我经历的第一个冬训，我对此并不陌生。在看看守所南监号和水三监，我不断听说过犯人冬训的情况，无非是如下步骤：

先学习文件，叫每个犯人发言，谈认识。接着是联系实际，深

挖反动思想。然后是互相检举揭发，批判斗争，最后做处理。你的发言往往被认为是“放毒”，是污蔑攻击，鸡蛋里寻骨头，斗你没商量。你若“顽固不化”，还会招来犯人积极分子拳脚殴打，把你打得皮开肉绽，甚至扭断胳膊或大腿。你再不坦白交代顽固下去，政府会给你戴手铐甚至背铐。冬训是对每个犯人一年改造情况的总清算，也是对犯人进行分化瓦解、分而治之的举措。据说每个冬训下来劳改队都有人添罪加刑，也有人立功减刑。

我纳闷的是，三监在 1962 至 1963 年没搞冬训，为什么？后来得知，大饥馑年代犯人死得太多，没法搞了。如今大饥馑已过，法宝不能丢，又拿了起来。

果然，这年冬训的程序正如老犯人对我所言。先学文件，这年学的是“九评”。

我对冬训已成竹在胸，加上五七年鸣放的切身体验，“引蛇出洞”对我已经失效了。

最底层的人日子最难熬，犯人当然属于此类，我在其中又是底层的垫底。当犯人最好是哑巴，其次是文盲犯人。这些人无须开口，即使说错了话，大老粗们也不会追究。贪污犯、偷盗犯、强奸犯等一般刑事犯，他们说错话也无所谓，因为他们的犯罪行为与政治问题无甚牵连。最难当的是反革命犯，这里面又分“历反”和“现反”两类。“现反”尤其要受到严惩。自 1957 年后，“现反”中又有一类所谓“新生的反革命”，其中首推有文化的年轻大学生，他们被视为“最凶恶、最危险”的敌人，我即属此类人。二审判决结论中说我“实属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除了死囚之外，我的处境之险恶可想而知。

冯辉是小组记录，他有读报念文件的职责。在三监由我读报，我对“九评”已有所闻，早想系统地读一读，如今如愿以偿。冯辉一遍一遍地重复读，组长一遍一遍地催人发言，管教干部在地上来回转悠，目不转睛盯视着犯人。犯人个个呆若木鸡，噤若寒蝉，总无人开口。组长无奈，只好叫冯辉再读一遍。犯人里傻瓜少，尤其老犯人见多识广，他们明白“祸从口出”的道理；各自谨守沉默，

勿谈国是。

我对“九评”确实持有异议，我要说谁也拦不住，但我不想说，任何人休想从我嘴里掏出来话。在这种场合，我知道摆自己的观点毫无意义，无异于白送死。

蒙世辉指着一个犯人说：“你给咱们开个头，说说你是咋认识的。”那犯人道：“我说个啥子呢？我啥也辨不来，啥也听不明白。我看哪，还是请组长给咱先叨叨，叫咱听懂一些。”噎得他再开不得口，干部一旁听见也没吭气。

一个下午搭一晚上，大家呆坐着，大眼瞪小眼。其他组也一样，不说话不行，说话又怕出错，人人战战兢兢，如坐针毡。

冬训期间，犯人铺位的墙上都贴着姓名，以便管教人员对号识人。前来巡视检查者有分队、中队的干部，还有大队和外来的人。第二天下午来了个大块头的年轻干部，年龄约莫与我不相上下，听口音像是陕西或靠近陕西的甘肃人。他一进来就在墙上逐一看犯人名帖。当他看到我的名字时，开口问道：“谁是向承鉴？”我装作没听见，他又连问两遍，我只得回答：“我就是。”他验明正身后，自言自语道：“我知道你，看过你的《右派言行录》，你原是兰大化学系学生。”

此人来得蹊跷，我断定是个不速之客。来者不善，我暗自警觉起来。

所谓《右派言行录》，反右期间我就听说过，但始终未见过。那里面的内容全是反右英雄的杜撰，是背着右派当事人搞的诬词。右派自己也读不到，它是高校左派之间互通情况的内部小报。我在学校时听说上面录有我要“把共产党杀光”的言论，震惊各高校。如果是在法治国家，我可以控告他的诬陷罪。但这个国家不制止恶行，鼓励诬陷；没我说话的地方，我只得忍着。

我猜测这个干部是西北师大政教系出来的，且与我年级相近。据我所知，师大政教系毕业生大多分配到中学教政治课，少数有背景的入仕途为官。也有人被分到监狱劳改部门，此人大约是其中之一；且看他对我耍啥花招。

他静默片刻，开口道：“我看你们学‘九评’太吃力，不如叫向承鉴给大家先做个辅导性发言，或许对你们有所帮助。”

我推脱道：“我早成白痴，不堪胜任。”

冯辉悄我耳语：“这人是省劳改局来的，我以前在局里见过。”

这位巡视大员话虽客气，骨子里是给我下命令。我尽管推脱着，心里还是打起腹稿。我必须慎之又慎，不能流露丝毫异议。于是我按“九评”原意来表达一番，夸夸其谈了半小时。我的记忆力可以，观点实际上都是它的，和我没一个字的关系；他想找茬儿，谈何容易！

我同时也在想，反右过去六年了，他怎么能记得我的姓名？显然，他事先查看了的黑档案，这是专门冲我而来的。

冬训是一次大比拼，比的是隐忍和耐性；谁沉不住气谁吃亏。犯人中总有沉不住气的，二组刘效贤就是一个。他年近五十，留两片向上微翘的胡子，有些驼背，地主出身。我不知他的案情和刑期，只觉得他是老秀才一类旧人物，对新知识几乎一窍不通，却自命不凡。结果他只要一开口，立即掉进陷阱里；说得多便也错多，越错又越要说。到头来被那些想减刑的犯人揪住不放，批得焦头烂额，只有痛哭流泪的份儿。

这年冬训，听说四中队出了个大放厥词的犯人，他原是北师大中文系学生，具体说的内容不得而知，唯知四中队开了犯人大会批斗他。他能言善辩，后来狱方也从其他中队派犯人前去与会批斗。我甚钦佩他的胆量，却不赞同他的做法。

其实我的烂思想可能比他还多，我的厥词只是在内心没放出来罢了。

3月底，冬训终于结束。全大队犯人集中在伙房前的操场上开奖惩大会，有的人受到了物质奖励，有的人立了功。全大队只有三四个犯人得到减刑嘉勉。刘效贤在批斗时未受皮肉之苦，四中队乱放厥辞的犯人也未被加刑。留给他们的唯有精神创伤，也算万幸。

七、四中队跑了一个犯人

周而复始，眨眼又到4月，成品队开始正常生产。张登高虽没多少墨水，却精通改造犯人之术。他把原来的三个窑门记录全部更换掉，冯辉被叫去背砖出窑，让我接替冯的角色。我心里不情愿，却只能无条件服从。张对我，对冯辉、钟世雄和朱焕章等几个知识犯人实行轮换制，每人背两三个月砖就叫去当窑门记录；而当了两三个月记录，再又调换去背砖。

出窑组的窑门记录有些不好干，六个背工都是一溜小跑，进进出出只在瞬息间。记录员站在窑门口，忙得不敢眨眼。即使盯得紧紧的，趟数有时不免还是有少划和漏划的。一个背工一小时背百多趟，记录本上的“正”字划得密密麻麻。表格的行距小，弄不好把张三背的趟数划到李四头上。那占了便宜的不吭声，吃了亏的要争要吵；窑门记录与背工之间，常有骂闹的事发生。我当窑门记录与别人不同，我是在砖垛上帮外码，或是在窑内帮内码工码背子；我不用表格和笔，背工每背一趟，我报他是第多少趟，准确无误，从未与人争吵过。到换班时，我在表上一次性记出背工的总趟数和总砖数。

我这样做，当然不为什么立功赎罪，而是受良心的驱使。我深切体会到犯人劳动的艰辛，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愿为减轻他们的苦难做点事。何况，我与他们吃着同一份朽粮，别人的活累我的活轻，于心不忍。

隔几日，分队长又来给我找事。他从外面拿来四块小黑板，对我指示道：每块黑板上画一道工序：制坯、装窑、烧窑、出砖。然后还要再写上四言八句，挂在监舍外墙上。他说要让大家时时看见，知道一砖一瓦来之不易，自觉爱惜。

他的用心无可挑剔，不过在我看来，纯粹是画蛇添足，多此一举。劳动高度紧张，犯人莫不诚惶诚恐，时刻担心飞来横祸，又怕被扣上“蓄意破坏”的帽子，哪还有不爱护砖瓦的胆。他给我出了一道不大不小的难题，我不会画，又不能拒绝，更不能反抗。我心

想，只好应付了事了。没想到这个半文盲办事还特别认真，我画来画去他总不满意。我写的四言八句，他不是嫌深就是嫌浅，又说不押韵。反正是横挑鼻子竖挑眼，总不合他口味。我没法向他解释，更不能反驳，这对我的耐性是个很大的挑战。改来改去，就这点小事，好多个星期日都没得到休息。直至勉强交卷，从他脸色可见，终未令他满意。

我琢磨他的心理是这样：我张登高在改造犯人上是想了办法、下了功夫的，我是有水平的。

1964年7~8月份，正热的时候，一天收工回监，监房空气突然紧张起来。犯人互相议论着说：四中队跑了一个犯人。一中队监外住着烧窑的自由犯，他们消息最灵。劳改队逃跑犯人，这可是惊天动地的大事。监内外一片肃杀之气，大墙上响起阵阵急促的脚步声。晚饭后传来消息说，外围哨兵一直没撤，许多管教人员，还有牵着警犬的武警，在坏场、窑洞四处搜寻。直到天黑，传来逃犯就擒的消息，一场惊恐才得以平息。

第二天出工前，在伙房操场召开了犯人大会。干部、武警进来了上百人，随即押进来一个身材颇矮的犯人。他的头发、眉毛、脸上全是土，浑身上下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土人。总之，谁也无法辨认他的容貌。天色突然阴沉下来，犯人积极分子一齐喊道：

抗拒改造，死路一条！

把他捆起来！捆紧些！再捆紧些！

给他砸上大镣！

他已经被按倒在地，绳子捆得再紧不过了。从几个武警呲牙咧嘴使狠劲的表情，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头上滚动着豆粒大的冷汗，没有一声喊叫，也无一丝呻吟。他没有告饶和屈服的任何表示，只是拼命地挣扎着，忍受着。我心里赞道：“是条汉子，骨头够硬的！”

事后闻知，他叫邹庆礼，是个大学生，四川人。他大我两岁，毕业于四川医学院，在五七年也被划右。1967年后他一直与我在一起劳改，我俩成了患难之交。他平反后参加援非医疗队，有副主任

医师职称。退休后他定居四川安县，至今与我仍有联系。

当时他在坏场，躲在自己挖的土洞里。我心说怎么会干这种蠢事？这是劳改场所啊，在弹丸之地的坏场泥坑边，众目睽睽。难道他不知道收工要清点人数的吗？犯人不够数，外围警戒哨不撤啊。人说当局者迷，真是一点不假。

邹庆礼因此被加刑两年。

我那时还是年轻，精力旺盛，习惯于思考问题。不让忧国忧民，我就把心思转到砖瓦的生产技术上。李光伟给我提供了历年来的生产统计数据，分析表明，同样是罐式土窑，有的窑号不论谁装，谁烧，谁出窑，总是比别的窑号生砖少、碎砖少而成品率高。论周期也比别的窑周期短，万块煤耗低。可见土窑结构很有学问，值得深究。

出窑组窑门记录有个空闲时刻：一窑砖出完，全组犯人转移新工地，他留下来清点砖码。这时要计算一级砖、二级砖、等外品各有多少，又要造表报给统计室。我利用这个时间对砖窑结构实施测量考察，如月台高度（与窑底平面比较）、面积、窑底面积、炉膛体积和燃烧面积；还有窑高及上、下部的截面积。我甚至毫不犹豫地钻进烟囱底（俗称“狗窝子”），去测量它的深度和大小。这样弄得一身黑灰，黑头黑脑。

我拿测量所得数据与统计资料仔细比较，能得到的初步结论是一、一窑砖的周期长短与炉膛的燃烧面积相关。二、碎砖与窑的垂直高度和窑底面积相关。三、生砖与烟囱底部（狗窝子）的深度、截面积相关。根据这里的数据和结论，我写了篇几万字的长文：《罐式土窑生产若干问题之浅见》。文中将测量数据与统计资料列表对比，逐一指出产生生砖、碎砖、水哑砖、焦头砖的原因和解决问题的途径，提出了缩短周期和降低煤耗的设想。

这篇东西给烧窑组马明川等人看了，我也较详细地讲给了孔繁成听。他们认为理论联系实际，很有启发帮助。大家建议我呈交政府，举办讲座，给烧窑、装窑的人上课。我拒绝了，我对干部反感，不想让他们知道。然而，这件事在烧窑和装窑的犯人中很快传开了。

1965年上半年，我把某些设想付诸实验。过去装窑只在最底层将砖坯竖立，其后所有砖坯均侧立套装。竖立与侧立，砖坯抗压强度有极大差别，能不能将窑底的三至五层一律改成竖立套装呢？砖坯竖立之后，抗压强度提高，稳度却减少，两者形成了反比关系。如果要提高稳定性，必须使竖立砖坯相互套装。我拿了几块砖来回比划，琢磨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方案，随即我绘成图纸。孔繁成等人支持我，决定在29号窑进行新装法试验。我没有与政府干部接触过，但我知道，孔事先请示过并得到批准。

实验新装法成功了，碎砖大为减少。但这种装窑法并没推广，原因是装窑底使用新的方法，颇费时费工，影响到进度和效率。即便如此我仍感到快慰，这个结果证明，我的探讨是有益的。

就在这个时候，张炳秋和生明辛（原单位兰州铁路局）先后刑满出狱。对他们的离去，我是既高兴又悲哀。他俩出监前，把服刑中我能用上的衣物各包了一包留给我，其中有背心、衬衣、短裤和鞋袜，仅张炳秋留给我的皮鞋就有三双。待我收工回监，已是物在人去，给我留下一片激动、一片凄凉。

八、劳改队的另类犯人

1966年过春节，大队犯人搞了个文艺演出，都是犯人自编自演。节目不少，我却了无兴趣。当时是有一眼没一眼地望望舞台，别的节目都无甚印象，只记得大合唱的指挥不错。每个中队都出了节目，唯有一中队空白；这使一中队干部感到脸上无光。

春节过罢，依旧在冬训时节。有次正开会，张登高把我叫到跟前说：“你的‘四言八句’写得不错呢，见的人都夸。我想派你一个特殊任务，编个剧本。这事不能着急，你现在起放在心上。缺时间给你时间，开会学习都可以写。”

这太让我意外，我要能写出剧本，岂不成作家了？我哪有这本事。“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是犯人，只能被动地接受“服务”，焉能“服务”于人？自建国以来，批判《武训传》，批

判俞平伯的红学研究，再到批胡风反革命集团，文字狱就没停过。那还是在监狱外边，如今我在笼子里，莫说没这本事，即使有也不敢写。

我毫不犹豫地一口回绝他：“队长高抬我了，我没这本事，不敢接受。”张登高个性要强，固执，一旦他决定了的事很难改变。他给我灌甜米汤说，这是政府对你的信任呐，写剧本也是对自己罪恶的批判、反省呐，既教育自己又教育别人呐……总之他非要我试试。

权衡再三，我想，眼前冬训坐会，身心备受煎熬；待到自我检查阶段，还要人人过关。每个犯人要判刑表态，挖反动思想根源。如不想死，就得认罪服法。我不想死，那就只能说我的刑期判得合适，我是咎由自取。犯罪根源……我总回避着这个罪字，用在自己身上，无论如何开不了口。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好人偏把自己说成恶鬼，世上还有比这更残忍的吗？

为了逃出这一劫，我答应试试。

春节前一中队烧窑分队跑了个自由犯，我心血来潮编了个故事，大致情节如下：

一个农民因偷盗犯罪，在劳改中受到政府信任，调去烧窑当上自由犯。我不能把他写成监内犯，否则写他逃跑出去了，就有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强大、不严密之嫌。这位农民自由犯由于思母恋妻想子心切，在一个雷电交加之夜不辞而别。一路尝尽饥寒苦楚，奄奄待毙；无奈只好在村舍乞讨。在这个过程中，他先后遇到在河滩垦荒的老人、嬉闹地头的村童、岸边放鸭的农妇、挑灯不倦的教师、修理农机的工人师傅……他们个个勤劳善良，给了他帮助。农村由于实施了八字方针，公社改行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核算，农民劳动积极性得到提高。他看到处处小麦翻浪，稻谷飘香，菜园油绿；因此深受感召，痛悔昔日所为和眼下之举。进到家门，母亲和妻儿欣喜若狂，忙不迭地向他诉说家庭和村庄的巨大变化。惊喜之余，得知他系逃跑归来，家人转而怒目相向。正当他决心前往公安机关自首时，公安干警出现在他门前。

我用小说体裁先写出了这个故事，有两万来字，算作交差。

没过几天，管教科批复下来，意见写了满满一页。大意是故事情节生动感人，人物刻画具有时代气息，文笔流畅等等。批文要求迅速组织人力，尽快改写剧本上报；其中还建议修改剧本的题名，由《南轲梦醒》改为《逃跑无处去》。

高指导员通知我，由我和二分队周西红负责改编剧本事宜，初定半月时间。我知周西红其人，只不曾与他说过一句话。现在才晓得，他入狱前是陕西省歌舞团的一级编导，且发表出版过作品。我曾亲见，这是一本八开的关于曲谱的专著。他以后调来甘肃省歌舞团当编导，在大西北文艺界算是名人。

我和周西红见面后商定，由我执笔写词，他谱曲兼导演。我们拟将小说草稿改编成三幕五场歌剧。周乃专业编导，自然有大家风范。但他为人很谦虚，每谱一曲，他都要唱给我听征求意见。我其实是门外汉，只是稍懂乐理，却也冒昧谈了感受。比如根据我写的词意，在何处似应低沉些，另一处似应高亢些。他无不认真听取，用心修改。

我俩如期完成改编，临末一天，他从统计室借来小闹钟，从头到尾，一人扮演着剧中八九个人物，面对我这唯一的观众表演起来。他绘声绘色，有板有眼，一丝不苟。他的演技、唱功证明，他是个很高明的行家里手，真叫我大开眼界。演完后他对我说：“此剧不小，全场要两个半小时，算是‘中剧’了。”周西红能歌善舞，此时还兴犹未尽，即兴给我跳了个“扣坏倒斗”舞，动作夸张然神似韵合。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这在劳改队是多么难得啊。

紧接着，管教科齐科长主持召开讨论会，征询对剧本的意见。这个会开了好几次，除科长外，干部有高指导员和二中队的陈指导员出席，其余人都是犯人中的文人墨客。我因此认识了董小吾、赵大刚和苗一山。

董小吾是歌舞剧《白毛女》编导之一，原是解放军总政歌舞团副团长，被授上校军衔，曾遍访东欧、苏联诸国。此时年近五旬，仍风度翩翩，风流倜傥。苗一山原是《解放军报》编辑，年约四十。

赵大刚原是兰州部队宣传处长，军衔大尉，是歌曲《二郎山》的词作者。他们的大名对我是如雷贯耳，以前却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唯董小吾在春节演出时指挥合唱，我远远“猫”过一眼。那次演出所有内容在我脑中早成空白，只记着他指挥的手势气派。

他们三人和其他犯人不一起住，而是独自住在四中队那排房的后片，每人一个单间。他们也不参加任何体力劳动，只是编辑一份《改造小报》。他们嘴上叼着令管教人员羡慕的高级香烟，屋里摆放着高级酒、饮料，还有各种罐头。三天两头有人来接见，好吃好喝的东西源源不断送进。这三人的穿着打扮，即使在社会上、在大都市也属上乘。与之相比，管教人员的形象相形见绌，会感到自惭形秽。从他们身上看不到一点犯人的影子，劳改队于他们好似疗养院一般。董小吾有几大本精美的相册，那里面都是总政文工团演员的剧照，尤其是出访苏联、东欧的纪念照，还有不少与外国演员的合照。想到我和其他犯人的“脱胎换骨”，不禁感慨：坐牢能过神仙日子，这种现象各时代都有，不过行贿狱吏都是偷偷进行的；如今竟是公开化合法化了。口称追求平等的人，正把不平等变成更不平等，使不平等绝对化、彻底化！

讨论会开得并不热烈，几乎是坐冷板凳。发言者无非是“不错”，“可以”，“拿得出去”；并没有提出像样的意见。我忽然感觉到，由于三个特殊犯人在场，管教干部似乎都受到拘束，不敢贸然开口。我心想：死虎有余威呵。我穿得破衣拉撒，土头土脑，一副典型的劳改犯模样，却心安理得，不卑不亢的，并不感到拘谨。

二中队的陈指导员发言，他倒是对我的一句歌词提出了很中肯的意见。那句歌词是：“东风无力百花残”，他建议将“东”字改为“春”字，理由是“东风”两字政治性太强，容易产生误会。

其实，他只点出这字来已叫我猛醒。伟人说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东”字因此被赋予了特定的涵义，它指的东方是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等等。我说“东风无力百花残”若是被上纲上线，足可要我的小命。记得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推敲后改写成

“春”字，谁想落到纸上依旧是个“东”字。我焉能不知文字狱的厉害，宁可牺牲于有意为之，也不愿死在无心之过上，多险啊！

讨论罢，管教科长决定立即上报省劳改局审批。不料，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很快就开始了。劳改局内讧，自顾不暇，无人审批我们的剧本。数月后，原稿退回来。张登高不准我保存，他自己拿走了。

陈指导员是我的一字之师，我对他心怀感激。他使我知道，即使在劳改队这种险恶的地方，也还有心存善意的好人。

九、处决袁同礼

1966年来了，春夏之交开始文化大革命，运动发展神速。毛主席亲自点燃的火种，顿成燎原之势。

砖瓦厂的8号、9号窑与兰州火车站只有一墙一网之隔，在那儿出窑，车站的一切皆入眼底。列车东去西行，无论客车还是货车，车厢上都贴着巨大的横幅，还有五颜六色的标语：“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无敌！”。人们高呼口号的声音如涛声阵阵，清晰可闻。站台上的戴红卫兵袖箍的人流涌动，年轻人像无头苍蝇一般来回奔跑，四处窜突挤碰。

除了目睹耳闻，每个小组还有一份《甘肃日报》，这是我们的另一信息来源。不管多累，我们都要从头到尾一字不漏地读完。

记不得是6月还是7月的一天早上，我拿着背夹皮带正准备出工，高指导员忽然进来了。他手里拿张名单，第一个叫了我，接着又叫了五六个人。他说：你们几个今天不出工，在监房等着，另有安排。

大队犯人出工不久，一辆解放牌卡车开进来。高教员道：“今天要你们接受一次现场教育。你们要规矩，一切行动听指挥；否则后果自负。”

要去现场的大约有三十个犯人，每个中队都抽出了七八个。我见到一色的新面孔，挤挤挨挨在一起。其中没有苗庆久、何之明和杨贤勇，但有四中队的逃跑犯邹庆礼和冬训中乱放厥辞的周有祥。

原来这是满载“反改造尖子”的专车。

我来砖瓦厂服刑已有三年，我的表现受到犯人广泛称道，管教人员表面上对我也算客气。但我一点没糊涂，深知他们对我特别关注。那档案中“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结论如同我脸上的金印，这好比在阎王那里注了册。坐上这专车，我自然当之无愧。

出得监狱大门，前面有一辆警车鸣锣开道，后面也跟着一辆警车。警车上都是公安战士，他们全副武装，车篷上还架起了两挺机枪。前后两辆警车拉响警笛，押着我们的专车从兰州闹市区呼啸而过。街上有行人，他们的面孔一个也看不清。

此行的目的地是草场街北边，那里是大砂坪监狱即甘肃省第一监狱。进得一监大门，又拐了两个弯，我们来到一个大操场。这里黑压压一大片，已经坐满了犯人。管教人员将我等带到操场中间，我见地面上写着“第×支队直属大队”字样。管教命令大家席地而坐，每个队列是单列竖行，我位列第一。我的面前是用木板临时搭建的主席台，其上方挂着“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宣判大会”横幅。犯人的外围四周，每隔三四公尺都站立着一位端枪的武警，枪管上刺刀闪闪。他们一个个瞪大双眼，神情凌厉。整个会场笼罩着一片恐怖与煞气，我有种预感：今天要杀人。

果然，大会伊始，主持人便喝令将三个囚犯押进会场。他们距离我约有三公尺，与我相向而视。这三名囚犯都被五花大绑，脖颈上的绳索是死结，背上插着亡命牌。但他们脸上不见畏惧之色，体无瘫软之态。这三人中如今我只记得首当其冲的叫袁同礼。台上在宣布他的罪状，他在拼命挣扎，拼命呼喊。他的脸涨得紫红，颈间青筋鼓起，一条条清晰可见。每个死囚都由三个年轻力壮的武警对付，两个在两边挟住胳膊，另一个在后面一只手狠命地按头，另一只手将囚犯反绑的双手向上提拉。三个武警都在全力制服犯人，但袁同礼仍能发出“吱”“吱”的声音。行刑人员拿毛巾塞住他的嘴，

此后一点细微的声音也发不出来了。而他仍左右摇晃，拼命抗争。

我与袁同礼近在咫尺，全神贯注于袁的挣扎与呐喊，情不自禁地帮他用劲，对他的判词一句没听清。

回来的路上，我陷入了沉思，觉得自己仿佛生活在中世纪。一个国家文明的程度，从对囚犯执行死刑的手段就能体现。文明国度都叫死囚死得清楚明白，死前有权利留下遗言，也不会叫这么多人来围观。不准囚犯临死时说话，是行刑者自己虚弱的表现。在我读过的书中和看过的影片中，处决死囚皆无堵嘴之举。国民党“四一二”屠杀共产党人，刑场上尚且响起“共产党万岁”的雷鸣……以前我认为自己经历了太多的恐怖，恐吓对我早无效用了，不过这一次我还是受到了“教育”。在看守所等待判决时，我曾打算在刑场上激昂慷慨一番，现在想来，实在是幼稚。我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如袁同礼一样，仅仅是挣扎一番罢了。

回到监室后，听以前与袁在一块待过的犯人说，袁同礼乃窃国大盗袁世凯嫡孙。因“政治问题”被判十五年徒刑。在狱中他一直不认罪，又屡屡“胡说八道”，招来今日的杀身之祸。我想，在唯成分论猖獗之时，他被处决无疑也是沾了他老祖宗的光。

我又一次体味到，我距生存太遥远，与死亡近在咫尺。袁同礼不过十五年刑期，今日已命丧黄泉；我的刑期是十八年且有特殊标记，倘若如袁一样“不认罪服法”，更胡说八道几句，今天挨枪子的舍我其谁？至少我会走在他前面。

十、韩教员“畏罪自杀”了！

“文化大革命”之初，我以为真是要革“旧文化”的命。批判《海瑞罢官》只是序幕，知识分子又要大祸临头了。直到《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我才悟到其严重性远不止此。

毛泽东亲手写大字报，钦点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使政治局形同虚设。他又亲自接见红卫兵，厉兵秣马，赤膊上阵。这一切表明，“文革”是比五七年更大规模的阳谋，亿万人民又一次被玩弄于

一人股掌之上！

列车车厢上的标语横幅花样翻新，不多久便出现“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硕大字样，“刘”“邓”两字还是颠倒写的，上面打上红叉。再后来又出现了“打倒洗恒汉！活捉李贵子！”的标语，洗恒汉时任兰州军区政委，李贵子是兰州大学“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

犯人都识相，无一谈论“文化大革命”。

9或10月的某一天，忽然传来砖瓦厂第一把手韩教导员畏罪自杀的消息。开始我还不太相信，后来外面烧窑回来的犯人说是自己亲眼所见，韩教导员的尸体漂浮在臭水坑里。我心说，难道专政机关也要夺权，也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刚到砖瓦厂时，我亲眼见到韩教导员辱骂、殴打犯人。他是立场坚定的左派，如今竟畏罪自杀，我感到不可思议。“文革”才开始几个月，他居然经不起考验，走上了“自绝于人民”之路。在跳进臭水坑之前，他一定尝到了不准开口的滋味。不知道他的政治信仰和革命精神，都跑到哪里去了。

死了就死了，死了谁都没什么了不起，犯人照常吃饭拉屎劳动，一切如旧。不过我能想象到，为了名利和权力进行的窝里斗，已经到了何等的激烈与残酷的程度。

新法装窑试验后，我把注意力投放到减少生砖、降低煤耗上。我不为主动赎罪，因为我无罪可赎；我的目的只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根据热力学原理可知，生砖的成因一是窑底炉温低，二是窑底与地面紧连，热量传递散失快。要杜绝窑底生砖，唯一途径只能是提高窑底温度。这有两个方法可行，一是设法架空窑底，阻断热能对流损失，那么可以使窑底下面有火道。此外，还可以将窑底烟囱下部（狗窝子）下挖下移，相当于抬高窑底高度。我仅仅是思考但缺少实践经验，前法终未得到解决方案，而后法对现成的砖窑无法施工，只有建新窑时才能实施。

我对烧窑组的马明川、装窑组曾凡晨、孔繁成等人详细解释了这些思考，获得了他们的认同。

正当我在冥思苦想之时，从外地砖瓦厂传来真经。方法其实很简单：将窑底挖掉一公尺左右，用青砖箍成一个个如鸡笼的榿，垫平，榿间留出一条条火道。这办法与我的分析一致。我破例被召去参加改建空心窑底的劳动。原烧万块煤耗是四点四吨，以后虽有降低，数量也有限。没想到改建空心窑底后，万块煤耗一下降到二点七吨。一座十万容量的砖窑，一窑次可节约十七吨煤。如此计算，一年砖瓦厂可节煤百万吨，生砖也大为减少；这一效益是我始料不及的。

国庆节后，成品队决定在南排窑的 47 号窑西、公路的坡坎下（距离臭水坑很近），新建 88、89 两座窑。我负责设计，曾凡晨总负责。因为需要考察借鉴旧窑结构数据，我获得更大的活动空间。每日里我手提瓦刀，拿着皮尺钢卷尺钻到窑里测量。烧窑犯人都认得我，他们用烤得黄澄澄的馍片洒上白糖招待我。

我对 92 号窑情有独钟，那是口容量四十多万的对口窑。而我拟设计的是容量更大的三口窑（三个炉膛，互成 120° ），它的结构数据有参考借鉴意义。

劳改队像个避风港，犯人像是密封在铁罐里。社会上正忙着人与人斗，犯人则忙于战天斗地。12 月，我的设计成形，图纸也绘好了；建窑工作全面铺开。狱方抽了两个小组共四十名犯人参加施工。天气很冷，地冻得梆硬，大家用十字镐、钢钎、十八磅大榔头掘冻土，干劲还真不小。

然而，变化比计划更快。不但我和所有犯人，即使直属大队的头头脑脑也不曾料到，突然上峰有令：砖瓦厂全部搬迁到甘谷朱圉砖瓦厂，刑期短的犯人随调；刑期长的犯人则调往别处。

图纸变成了我的手纸。不过，我对设计新砖窑这件事仍感欣慰。我尝试了运用理论指导实践，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了。在砖瓦厂近四年，我的光阴没有白熬虚度。

第四章 大漠孤烟饮马场

一、武威火车站一瞥

1966年12月，隆冬时节，闷罐子囚犯专列向西行进。不知目的地在何处，是河西走廊的某个地方，或者是更远的新疆边陲？有一点我是猜到的，那里一定是荒漠，是历代王朝充军之地。

每节车皮里装了百余号犯人，车厢上方有两个铁栅栏四方小窗，黑糊糊的。地板上有牲口的粪渣渣，犯人于其上横七竖八地躺卧着。正中有只便桶，很大。没有人交谈说话，也听不到一声叹息，各人都在想着自己的心思。不时有人在便桶里小解、大解，车厢里臭气熏天。列车走走停停，有时小停，有时大停，一停一两个小时。上车约莫十个小时了吧，我感到饥饿难耐，便掏出随身的干粮，一个烤饼。其他人早吃了，我口干得无法吞咽，心里又生出感叹来：若运的是牛羊猪，主人也要隔一段时间来巡视一下；或者添把草料，或者喂些饮水。不然饿瘦了或得瘟病，何以出货？而我们这些囚犯被押上车已经十多小时，连管教的影子也见不到。

夜很长，天气很冷很冷，寒气从四面八方涌进车厢。一直捱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们这列车才停下来。有人打开大铁锁，把犯人全部驱赶下车，在这里倒便桶，开饭。我抬头一看，这里是武威火车站。

靠铁路一边的月台沿，站着一溜全副武装的军人。靠车站的另一边也站了一排，一眼望不到头。军人戴着一色的棉军帽，穿一色的棉军大衣；枪刺在阳光下闪着寒光。我这才发现，这一车犯人总有两千多。

靠车站一边的军人背后是站台，那里有一群小孩穿梭一般来回奔跑。我数了数，大约有一二十个；有男有女，有大有小。大孩子约莫十二三岁，小的不过五六岁的样子。令人惊奇的是，除两三个稍大的女孩上身穿件破花格单衣，脏兮兮地勉强遮住羞处，其他孩子全是一丝不挂。他们互相追逐，为争抢旅客的弃物而撕扯哭闹。有的孩子站在军人身后，目光中带着疑惑朝我们盯望。他们身上冻得紫红、青乌，真是匪夷所思。

时值12月下旬，气温当在摄氏零下十好几度。当兵的全穿着冬装，我们这些犯人将所有能穿的衣服都穿戴在身上，仍觉寒冷难以抵挡。不知这些孩子怎么能如此抗冻？人的生命力何其顽强，长期挨饿的人大约会产生“抗饿性”吧，我似乎就有这一特点。长期挨冻的人大约也会产生“抗冻性”，如其不然，眼前这群孩子岂不会成冻殍？人乃万物之灵，有改造环境的能力却少有自适应功能。尽管饥饿和寒冷或许可以迫使人为了生存而强化耐力，终不见得是好事。长期如此地强行自适应，人类难免退化到低级动物种群去。

这些光身子的孩子此刻就在军人左右，军人应该看得比我更清楚；但他们似乎视而不见，无动于衷。我很想把身上的衣服脱一件给孩子撂过去，但我知道这样也无济于事。

我感到痛悔，自己过去把农村的现状想得太简单，太理想化了。在《逃跑无处去》的剧本草稿中，我设想，通过贯彻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农村形势一片大好。面对这群裸体的孩子，想到自己在文中的歌功颂德，觉得简直是胡说八道。

一路上浑浑噩噩，任凭列车一路慢行。直到第三天早晨，列车终于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站停下来。我看到“玉门镇”三个字，古诗中好些残篇断句从脑子里联翩出现：“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儿已是嘉峪关外、塞北的不毛之地。

小站冷冷清清，除两三个接车的铁路员工，不见一个旅客。负

责押解的武装军人不知何时换上了皮帽、皮大衣。管教人员原来是一色的棉装，这时也都换上了清一色的皮货。干部、军人的福利保健何等周到。

出了车站是条颇宽的公路，后来才知这是兰新公路。公路上一溜解放牌大卡车，看不到头，总有一百多辆。犯人按事先编组，对照车号依次登车。卡车沿兰新公路继续西行，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我们到达目的地——饮马农场。

我和同时到达一些犯砖瓦厂犯人分到了场部良种站，进入了站里的基建队。

二、黄闸湾修跌水

整个冬天朔风凛冽，气温在零下 20℃ 以下。我把能穿的春夏秋冬衣服全垒到身上，仍然冻得瑟瑟发抖。强劲暴烈的北风好似强盗，把人身上的热量搜刮一尽，犯人无衣可添，只得在腰上加系一条草绳防寒。基建队在这种时候，还要每天去黄闸湾修跌水。

饮马农场在兰新公路北侧，与公路平行有条引水干渠，由西向东，流到黄闸湾，流到玉门镇。黄闸湾是个村庄，距玉门镇不过数华里。这里干旱无雨风沙大，不能靠天吃饭。这条引水渠是农场的命根子，由它分水到支渠、斗渠、毛渠，灌溉着数十万亩农田。

引水主渠宽有七八米，渠底宽约两米，有两公尺深。每到冬季干涸时便要维修加固。这里全是沙碛土，为充分利用水资源，同时也防止渠底经过水的冲刷形成沟壑，因此渠底要成台阶式。这样在每一段渠中水的落差小，水流减缓，防止冲刷。所谓跌水，就是在接口上铺以石头，抹上水泥，而于接口下砌几个石头墩子，水由高处流下冲击到石头上，避免直接冲刷渠底；每段引水渠之间都要修一段承上启下的跌水。

早上吃罢饭，犯人们爬上汽车，接连几辆车沿兰新路东行。最后一辆车上是看押武警和管教干部，他们都穿着皮大衣，又把皮帽的耳朵拉下，浑身捂得严严实实。他们脸上还戴个大口罩，只露没

有冻神经的眼珠在外面。车速不快，风在我们耳畔嗖嗖作响，犯人光着头，衣衫单薄，为躲风全蹲在敞篷车斗里，尽量缩成个小团团。下车时，腿脚已经冻了半天都感觉不到是自己的，整个身体如同冻结成了冰棒。劳动不算太累，只这出工收工往返受尽寒冻之苦，尤其早上出工乘车的个把小时，简直像在阴间走了一趟，实在太难熬了。

到了工地，武警在一段主渠的首尾两侧插上四面小红旗，此即警戒线。犯人只准在这无形又有形的范围内活动，倘若越出警戒线半步，武警随时可以开枪击毙；格杀勿论，这是管教人员已经向我们宣布了的铁律。好在每天工地固定，旗不挪动，只“猫”一眼心中便有数。有人运沙子，有人拌沙浆，砌石头，一时间铁锹飞动，石头噼啪作响，犯人一齐忙乎起来。

干渠两旁间或有树，白杨高高的，柳树粗壮。武警为站高望远，每每爬到树上放哨。管教干部不用遭这份罪，他们分派完劳动任务，立即钻到黄闸湾的农家烤火去了。

黄闸湾村紧贴渠的北面，有的人家门口即是渠堤。这里是一色的土坯屋，低门矮户，参差错乱。从外观可知，村民都是穷困潦倒之人。我们刚到时，曾招来数百双惊疑的目光，无论男女老幼，都是举家伫立在屋前，面无表情地望着我们，很“热闹”了一阵。以后见惯了，他们再不出门，以至于我们也见不到老乡影子了。

我猜测，这些农家多半与犯人有某种干系。他们衣衫褴褛，脸如土色，比犯人的衣着打扮强不到哪儿。此地黄沙瘠土，人烟罕见；若非迫不得已，谁会心甘情愿跑到大漠戈壁来拓荒垦殖呢？早听闻犯人刑满后必须留场就业，这些人的前身大约是就业人员也未可知。我想到自己，即使侥幸能熬到刑满，眼前所见就算是最好的归宿了。

午饭由“家里”送来，饭后有近两小时休息。渠道里横七竖八都是犯人，有的斜躺有的顺卧，有的假寐有的编传，还有的人抽烟，或者解衣捉虱……众生相形形色色，难以尽述。

时光匆匆，如是营生到了3月。工地由下游上溯，自东而西，每两三日换一段工地。这期间，发生了两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犯人正在渠里施工劳作，突然“叭”“叭”两声，枪声近在耳根。紧接着从树上稀里哗啦掉下一串子弹，弹壳从渠沿滚到渠里，有的直滚到犯人脚跟前。犯人吓傻了眼，有人抱头缩成一团，以为大限已到。此时管教干部从老乡家慌忙奔出来，大声吆喝道：“谁？往哪个方向跑的？”

事后查明，树上放哨的是个年轻新兵；他闲得无聊手痒，摆弄枪栓弹匣不慎走火，人们虚惊一场。

又有一次，也是在劳作期间。忽闻公路上“哞”“哞”的怪叫，蹄声急骤同时还伴随着“杀”声呐喊。一阵阵狂飙怒吼由远及近，呼啸而至。人到近前，才发现是军人骑着骆驼在进行追敌演练。这些战士手举柳叶大刀，刀刺约有一公尺长，寒光闪闪，杀气腾腾。那些骆驼矫健，胜似烈马，一时间奔突咆哮加上骑兵杀敌的呐喊，气势威武，惊得犯人们失魂落魄。

日复一日经过场部，我也有些观察。饮马农场场部所在地算是个小镇了，大约有上万人居住在这里。场部有商店、银行、邮局、医院、学校、机关单位、面粉厂和军营，相关的行政机构和生活部门一应俱全。小镇街面不平，房屋不整，不是凸肚便是驼背，挤挤挨挨的；间或有树木点缀其间。

场部管辖十个站，还管着新一站、新二站、良种站等等。每个站据说相当于一个大队，有五六百犯人，算个颇具规模的罪犯改造基地。

良种站位于场部西侧，与场部只隔一条窄路，这条路可供汽车通行。良种站大墙里有两个院子，住着两个犯人中队。前院是农业队，后院是基建队。两个中队的灶房挨着，灶房边有个共用的水井。农业队从事农活，劳动强度小些，粮食定量也低。基建队都是年轻犯人，劳动任务重，定量也稍高一点。饮马农场的大田里种的全是小麦，犯人主食是白面，副食是甜菜根、蔓菁和胡萝卜。副食不定量，保证供应，只是无油无盐。食堂一般是焖一大锅，任取任吃。农业队犯人眼馋得很，馋基建队馍大，更馋副食能填饱肚子。基建队犯人互相监督，禁止副食外流。农业队犯人只有哀叹自己年岁大，

眼巴巴地熬着饥饿的日子。

我这小组共有十七个犯人，都是来自原兰州砖瓦厂的成品中队。我们彼此相熟，其中蒙世辉、朱焕章、胡金生和我都曾在出窑分队。蒙世辉和我原在一组，如今他仍是组长。朱焕章和胡金生虽原先不同组，也是很熟的。在靠伙房的那一头，还有两个小组来自砖瓦厂半成品中队，邹庆礼、周有祥都在其列。其余各组要么是这儿原来的老犯人，要么来自其他劳改单位。

胡金生，吉林四平市郊人，小个儿，约比我年长十岁。他肤色紫红，身体结实，动作敏捷。入狱前他是中共党员，在兰州某建筑公司属下的工程队任队长兼党支部书记。他架子工出身，一步步爬到脱产干部位置；他的案情涉及奸淫幼女。我记得听他说过，解放军强攻四平城时，他是支前抬担架队的队员，亲睹现场情景。他给我讲过东北战场解放四平的见闻，至今我未能忘记。

四平城墙高而厚，坚固非常。国民党军队训练有素，凭借城堡顽抗。解放军攻城屡屡受挫，死伤无数，后边的战士踏着尸体往上冲，又倒下为后来者“垫脚”……如此反复，尸体垒得跟城墙几乎一样高，这才攻破城池。打扫战场时，尸体太多无法辨认。时值热天，只得用推土机推到大坑里。城破数月，城郊行人一路掩鼻，尸臭数里不能闻。

听了他讲的悲壮故事，感慨良多。回想解放之初，我若身在战场，也会扑上前去，在所不辞。新中国的大厦是亿万农民子弟的血肉之躯打造出来的，如今你对得起这些铺路石吗？先烈若在天有灵，也会和我一样发出诘问的吧？

这年冬训，“文化大革命”鏖战正酣，社会上的人六亲不认，斗红了眼。犯人没资格参加革命，如同掉到空隙里，只是念念报而已；算是未触及灵魂没沾皮肉，草草完事。

三、倒土坯

我在饮马农场劳改整三年，印象中，正如诗人所言，这儿没有

春天。即使有，也只是在倏忽间。直到阳历5月中旬，白杨树才绽出点点新芽。而在4月初，天气还很冷的时候，狱方就迫不及待地为犯人换了劳动项目：倒土坯。

这是项与水和泥打交道的超强体力劳动，每人每天的定额是四百块。这种土坯不是砖坯，一块土坯足有两块砖坯大。这里也不像我们在兰州的砖瓦厂，那里的半成品队是五人一小组，三个斗工，各有定额；一个泥工负责打泥供泥，一个修坯工负责修坯、上架。在饮马农场，各人的任务是包干到底。以前在砖瓦厂，三个斗工全是甲等定额，每人每天一千二百块；按小组共五人计算，平均落到每人头上的定额不过七百二十块。而在饮马，定额相当于每人要完成八百至一千块，其劳动强度比砖瓦厂要大得多。

做土坯前要先挖土，做泥窝。四百土坯需挖两方半土。而取土则先要将土中的芦苇割断拣出，将土围成个周沿稍高内里低的窝子。接着是放水，水不能过多，也不能过少，以泡透土为度。这道工序再快，也得用上两小时。第二天早上一到坯场，泥窝上面已经结了一层厚冰。可是再冷也得毫不犹豫地脱鞋卷裤，跳进泥窝里，一锹一锹将两方多泥甩到坯场上。接着再一锹一锹打成泥垛，如此捣腾两次，至少需要两小时。上午十时开始倒斗，四面八方响起“乒乒”“乒乒”的扣斗声。犯人开斗先后只在十分钟内，人们一律是赤着脚来回小跑。完成四百土坯要弯腰弓背如磕几千次头，直磕得腰酸背痛，天昏地暗，无片刻喘息之机。

我们中间只有少数犯人曾在砖瓦厂干过，他们是老手，技术娴熟，动作快又体力超强。这些人在中午十二点午饭送来时就可完成任务，饭后还能在坯场铺上破棉袄，小睡一觉。而绝大多数犯人，或者是体力较差，或者是技术不熟而动作慢，饭后只好接着干。有的从上午扣起，直扣到快手翻身起床的两时左右。下午，人们先将土坯侧立，以利快干；接着是运沙，挖土打泥窝，放水。利用放水时间，还要将土坯上架，刮平坯场，为明天同样的活路做准备。

以上还是就施工正常的情况而言，倘若泥泡得不合适，土干了要喷水，稀了要掺干土，至少要多捣腾一次。逢到这种时候，就更

难完成任务了。犯人个个如打仗，忙得昏天黑地，连放屁都没工夫。

天气很冷，有的犯人手裂开大口子，像小孩嘴。血从里面丝丝渗出，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根本没时间处理，只好任其渗流。我的皮肤好，从不开裂，免却了这方面的痛苦。只是与别人一样跳进泥窝时，小腿被冰划破了许多血口子。区区小痛，谁顾得上这些。

此前我没干过这种活，在砖瓦厂天天见别人扣斗，上手便会，只是不熟练。同组犯人与我一样，也都是新手。人都有表现欲，犯人尤甚，原无可厚非；可恶的是有类犯人总要以己之长去“挤兑”别人，想在别人头上立功赎罪。这种人劳改队里比比皆是。“刑不罚众”，我一般是抱着随大流的思想。但同组里却有四个积极分子：组长蒙世辉、组员朱焕章、胡金生和刘继业。蒙世辉，我不敢和他比，他身强力壮个子高大，又是农民出身。与其余三人相较我想自己应可略胜一筹，我比胡、刘年轻，尤其不相信拼不过朱焕章。没想到，这四人一上手都超额完成任务，每天出手的砖坯不是四百零五就是四百零八。没办法，我只能舍命陪君子。这些积极分子每晚拿完不成任务的人开涮，说这是“不认罪服法”，“有力不出，好逸恶劳本质不改”，“坚持反动立场、不肯脱胎换骨”。若有管教干部过来，他们更是来劲，直把你吼到地上勾头站着，咬牙切齿地臭你。干部也视你是“反改造”，处处看不顺眼。在这些积极分子眼中，似乎所有犯人都与他们一样，在外面干了卑鄙不耻之事。对这帮家伙，我打定主意，不能容忍他们作践我。

然而要完成任务，对我委实是太困难、太吃力了。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六点，除午饭半小时，必须马不停蹄。手里干着这一道工序同时就要琢磨下一道怎么干，心里时刻精打细算，生怕多跑冤枉路浪费了时间。我的体力已经大量透支，无法想象在这种极限状态下还能维持多久。也许明天我的生命就会耗尽，说不定突然倒地，气竭人亡。

有一次运沙时我偶然路过积极分子的坏场，无意中看到了他装斗的操作。我转到另一个积极分子处，操作也是一样。我终于发现了他们完成任务的秘密了，原来不过是偷工减料、藏奸耍滑而已。

土坯并非砖坯，砖坯装斗要泥满，四角泥到位，大面需刮平，倒出来还要压、夹修整。砖坯有棱有角，方算合格。土坯只要大致成形，不需要整修工序，缺棱少角是常事，无人检查质量。这些积极分子的做法是挖一坨泥装进坯斗，四角满不满任由它去，这时泥的中间往往是个凹槽，但缺泥他们也不管，端斗就走，一倒了之。我却是照规矩办，在坯斗的四只角还用手指按一下泥，以防角不饱满留出空隙。若泥不够，再补一坨。这样做的结果是费泥又费时，给自己找了许多麻烦。但这种态度也是我的秉性使然。

自从得到“真经”，我也能和他们一样，午饭后躺上一觉了。俚语道：“一窍不得，少赚几百。”在这个世上，老实人总要吃亏，有什么办法呢？得来的“真经”我不愿独享，有一天我故意走到完不成定额的同犯跟前，不好明说，用眼光示意叫他去看看别人的先进装斗法。如此，他很快也就完成定额了。那些积极犯人每天或多或少总要超额几块，我则每日四百，一块不多，一块不欠。如有多余的我积攒下来，以补偿来日之不足。我毕竟“胆量”小，即使偷工减料也不敢像别人那样做得太黑。完成四百的定额，我已经是山穷水尽了。

四、捉奸捉双

星期日休息，人们上午缝缝洗洗，下午蒙头大睡，养精蓄锐为下周体能消耗做准备。多数犯人如此，不过，也有极少数犯人例外。

基建队犯人都年轻，体力恢复快；加上有蔓菁块、甜菜根的足量供给，总有精力过剩者要设法发散。二组有个犯人，人称大力士。他一米九几的大块头，长得膀粗腰圆如铁塔一般。每逢周日他都在院中练摔跤，他不但膂力过人而且动作至为敏捷，不待人沾身就将对方撂倒了。人们知其厉害，琢磨自己不是对手，只能二对一或三对一地与其较量。于是几个人像草原上蒙古人摔跤那样，满院子兜圈，虎视眈眈地寻找战机。而大力士总能出其不意，一个扫堂腿过去，或猛一把将对方撂倒。有时失利者抱住他一条腿，另两人立即

扑上去，四个人滚成一团，这就打成了平手。每逢此时，院里助威的叫喊声不断，惹得睡觉的犯人也禁不住爬起来围观，这算是犯人唯一的娱乐活动。

精力过剩的犯人还有另一种发泄，不久后的一件事，是我在经历了看守所、三监、砖瓦厂劳改以来闻所未闻的。三组有个犯人叫叶克勤，江浙人氏，长得纤体蛇腰，粉红脸，说话走路扭怩作态，一副女人样。据说他小解也如同女人，蹲在地上。一天深夜，大家都在周公乡里，突然被隔壁嘈杂之声惊醒。只听得噼噼啪啪的拳击声，噗噗嗵嗵的跑步声，各监室犯人纷纷涌到院里察看。原来是有人鸡奸犯事，被同组犯人逮个正着，饱打一顿。犯事人被打得受不了跑出监舍，其他犯人仍不释手。房前屋后，黑天瞎地，一通穷追撵打折腾到天亮。

据说，有此癖好的人很难根治，除非将其阉割。果然，此事后来又发生过几次，还是原人原马。不过看热闹的越来越少，见怪不怪了。犯人朝夕相处总要说话，既然禁谈政治，叶某这事便成谈资笑料。整个良种站搞得沸沸扬扬，无人不晓。那些谈论者何止是津津乐道，有人甚至肆无忌惮地做一番演示，动作不堪入目，淫话不能入笔。

管教人员早知底细，却并不追究。只是冬训期间找不到“政治靶子”，犯事人才被拿来示众，七斗八斗一番。听说三组犯人在斗叶克勤和他的相好时，有一位表现最积极，下手最黑。听说此人欲对叶克勤“图谋不轨”，结果遭到拒绝。积极批斗，实为发泄醋性。

我惊骇这极少数人的超强精力，也感慨犯人的浓浓兴致。十五至十八岁，这是我的青春季节，我也有过性萌动，裆下尤物有桀骜之时。从1957年到1968，整整十一年，正值我生命的旺季，也是性成熟的时期。然而自五七年反右开始，政治压迫，饥寒煎熬，体力早已透支；若不是每日小解，我会忘记自己是个男人。眼下四百块砖坯的定额已使我累成一摊烂泥，裆下物了无生机成了眠蚕。我都怀疑它已萎缩退化，自己成了太监。

一天收工回监时，在伙房旁突遇陈德根君，令我惊喜万分。陈

君原判八年，已熬到刑满之时。按农场规定，这类犯人须在刑满前到场部良种站出监队，在这里集中学习一个月。学习内容无非是当前国内外形势和政府政策法规等。他到良种站已有时日，只是我无从知晓。陈君性格内向，不善言谈交际，很重感情，人品极似挚友冯淑筠，深受我敬重。1959年5~6月的时候，他和百泉几位同学饥饿无奈跑到我处，他是我主要招待对象；我们之间的感情弥足珍贵。

陈君年长我六七岁，他是四川达县城郊人，出身贫寒农家。解放前他靠着别人的资助读到中师毕业，当上了小学教员。解放后他边教书边自学，于1956年和我同时考入兰大。他是如何划右的，我不得而知，心里一直纳闷。他时常一两天不说一句话，不论同学们聊得多热闹，他都不搭腔。有时要听听他的意见，硬逼他开口，他也只会对你笑笑。后来接触多了，才知他脾性耿直又倔犟，心口如一，绝不会转弯。遇到不平事，不说则已，一出口能撞倒南墙。这种人在五七年最容易出纰漏，所以他被划右，也在情理之中。

陈君心灵手巧，见啥学啥，一学即会。他会缝纫，会雕刻，写得一手漂亮毛笔字，手脚又勤快。五八年“劳考”期间，他和我一样再难抑制怒火，毅然走进地狱之门。

时隔五年多相见，彼此尽吐衷肠。他向我详述了在武山云雾山劳改农场的情况，又谈到谢成、田昌文、杜映华、罗守志等人。知道他明天就“学习”届满，要回到六站，我找出了珍藏的东西送给他。那是绣有“花好月圆”字样的两个枕套，还有两双丝袜。那对枕套是我初恋的纪念品，一直带在身边没舍得用；丝袜还是张炳秋离开时留给我的。我对陈君说：“其他东西全成破烂，只这还能用，给你算作个留念。我还有十年，对熬出去不抱希望。不过，即使骨头成灰，我也坚信历史会宣判我无罪。你或许能看到这一天，我大约是看不到了。”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老陈对我重重地点头，他紧攥着我的手不肯松开，泪水模糊了双眼，我赶忙帮他擦拭了：“你是经过炼狱洗礼的人，怎么还这么儿女情长！”时间很迟了，担心被

哨兵发现或被其他犯人撞见，我装作生气的样子，把手强抽回来。转身我回了监舍，再没敢回头看他。

欲哭无泪，此时的心情糟透了。我已认定，这是我俩的永诀。在我这小组中，犯人都是十年以上的长刑，除了我这个政治犯，其他人都是刑事犯。而且还并非一般的刑事犯，他们不是淫棍就是大贪，不是欺诈成性便是杀人越货。一些人嗜恶成癖，我无法和他们沟通，更不用说推心置腹了。我觉得自己被假、恶、丑包围着，在齷齪凶险的环境中苟活，必须时刻戒备，提防小人。我从来没有感到如此的孤独、憋闷。

我的心已是一片荒漠，我的处境甚至还不如在看守所，不如关在黑牢里的一人世界。那时我还有书读，早上跑步时还有其他同学用脚步声作出回应。那时我还能感觉到，离我不远处有许多颗同样的心在跳动，热血在奔流……如今，我什么感觉都没有，我多么期盼陈君与我砥足而谈、掏心掏肺啊！

我的心在抽搐，其痛无以名状。

五、疏勒河畔

从地理课本上早知甘肃有条疏勒河，到饮马农场后听说这河就在场部对面。它位于兰新公路南侧，与场部半里之遥。犯人劳动是“划地为牢”，四面小旗圈定了“雷池”，自然与河无缘。

9月的一天，中队抽两组犯人去盖一间小屋，用于看守菜地，我所在的小组也被抽调去了。菜地在兰新公路与疏勒河之间，老大一片，说不清有多少亩；地里种了蔓菁、甜菜、胡萝卜等。小屋拟建在疏勒河北岸，河的南岸是建设兵团农建某个师（是第几师我记不清了）的垦区，与农场一河之隔。建设兵团最初是王震在解放新疆后将新疆部队转向生产建设而组建的，如今兵团成员年龄都在三十好几四十以上，后来又从内地招来许多支边青年。听闻内中有少数接受监督改造的人，也有五七年反右漏划而后补划的右派大学生，还有五九年划出的右倾分子以及其他“白旗”人物。我原来以为，

除开那些有排长、连长官衔的老兵外，年轻的农垦战士或因家庭成分之累，或受父母亲朋历史问题影响，不得已才来此戍边。如果不是强迫，谁又心甘情愿来到荒漠？然而我目睹的现状与我的猜度相反，这些支边青年似乎乐不思蜀。我想，要么是我心境晦暗，错估了形势；要么是他们只是表面上如此。反正给我的印象是，兵团的青年们情绪饱满，革命觉悟高涨。

建个小屋，对三四十个犯人来说不是难事。大家开始分工干活，有人运送砖坯，有人和泥砌墙。此地空气清新，大家眼界开阔，劲头也足，只一个上午时间便把四面墙砌好了。下午，正当我们开始上房泥、抹屋顶的时候，河的南岸传来嘹亮歌声，“语录歌”一首连一首地唱起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世界上到底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还有一首歌唱的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声音由远而近在空寂的大漠上飘荡。

饮马农场不比兰州新生砖瓦厂，在兰州，“文革”硝烟随时可见，而到饮马以后，若不是今日听见这歌声，我竟把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给忘了。

从疏勒河南岸一大帮青年男女涉水过河，女的全是男的背过来的。他们一边唱歌，一边手舞足蹈，说说笑笑，疯疯癫癫，一路挥洒青春的气息。可是，当老远看见这边是犯人在劳动，年轻人的表情立即严肃起来，也开始摆出姿态显示优越。只见他们朝着犯人这边指指戳戳道：

“你看，那家伙满脸横肉，一定是个杀人犯。”

“那一个肯定是强奸犯，信不？我敢打赌。”

“那个是反革命。要不我们去问问他们的带队管教，我的眼力不会错的。”

“那边那个，你看，贼眉鼠眼，不是盗窃犯才怪。”

他们心高气傲，大不咧咧的，又故意从犯人正施工的小屋贴墙而过，像示威似的。犯人对这群疯男女本来就一肚子气，甭看在管教面前毕恭毕敬，在他们面前却不是省油的灯。当这些青年男女从墙边经过时，房顶上的稀泥巴不偏不倚地落到他们头上、身上。其中有两三个姑娘穿着裙装，沾上泥巴像糊上屎，又蹦又跳地骂。犯人概不搭腔，管教和武警远远看到，也是睁只眼闭只眼。

犯人泄了愤，情绪好，干劲高，下午四点多小屋便竣工了。管教破例允许犯人到疏勒河洗澡。

我自幼喜水，南国夏天酷热，每到暑假终日泡到河里，戏水游泳又摸鱼捞虾，其乐无穷。自五七年至今，十年过去，往事已成梦境，再不能重现了。

疏勒河是条有历史的河，它的宽度与流量与我故乡东门港相当，河两岸的情形也颇似。在南国，它或许够不上“河”的资格，只能被称之为“港”或“溪”，这样的河流到处都有。我却想不到疏勒河居然有如此大名气，这河听说很长，有的地方是明流，有的地方是潜流。它曾流淌在古丝绸之路，那些往返于东西方的探险家、使者、商贾都喝过她的乳汁，不然无法维持生存。如今它灌溉着从安西到玉门镇的广袤大地，也滋润着新华农场、饮马农场等数十万人的心田，它是条当之无愧的母亲河。

我迫不及待地跳进河里，河水出奇地清澈，能看见水里的鱼群，那都是些一两寸长的小鱼。岸边也有柳树，一株一株稀稀拉拉，不像在家乡东门港，柳树一棵连着一棵，有荆棘藤蔓，密密匝匝。置身水中，眼望高天白云，感觉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回到了故乡的河。《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从脑海中浮现出来，只有此时，我才体味到诗人艾青笔下的意境。

这里的犯人都是“旱鸭子”，只洗不游。我用蛙泳、潜泳、自由泳逐一尝试，只是立泳办不到，因为水只有半人深。还好，各种

姿势没忘，不过扑腾两下已感气喘吁吁。临末我仰面飘在水面休息，大家看着我发愣，忘记给自己撩水擦身了。

只宽松了这一个多小时，紧接着又是挖排碱沟，也是特别重的体力活。

大组长事先用石灰在地上划下了两道线，两线之间即是排碱沟上口宽。犯人排成一字长蛇阵，统计员用拐尺一下下拐过来，各人做着自己地段的标记，以防互相扯皮。大家都是比着干，不比由不得你。若是你两边地段的劳力强，进度快，给你留多少，你全得兜着。没有自己多挖少留些的傻瓜，谁都是多少想占点便宜，留下一两指宽算有良心的，叫你争也不是，不争也不是，无可奈何吃哑巴亏。体力强的游刃有余，体力弱的得拼拼命赶上。排碱沟剖面呈梯形，上宽约七米，下宽约一米，深约三公尺半。每人都占一公尺，任务一个样。每天一段，一天需挖土方十二至十四立方。沟越挖越深，越来越窄，撂土越来越费力。到了沟底，要将土块撂到沟顶去，必须越过堆积两边的土堆；可那土堆至少有七八公尺高，每撂一锨都得用尽全力。

天天都干着这超强劳动，直到天寒地冻的12月底。这地方地表一公尺多是沙磧土，很硬很难挖；再往下的土不那么硬，好挖一点。挖到下面时可立身展腰干活，我感觉比倒坏好受一些。只是苦了两只手，第一天就磨出了血泡。这时也顾不上痛，只有更紧地攥住锨把，锨把上也全是血渍。

一句话，“脱胎换骨”是假，“脱皮换肉”是真。我的双手已不知褪过多少次皮，换过多少肉。

六、姐姐的信

1968年6月，又是倒坏扣斗的时候。

去年冬天我给胞姐写了封信，告诉她我仍活在世上。信中我还向她提了一个要求：我需要一床棉被。这信发出快半年了，我急切地等待着回信。自从进了看守所，我只给姐姐写信，而不与任何亲

人友朋一字，为的是叫他们少受我的株连。

劳改队每年给犯人发一套单衣、单鞋，每两年发一双棉胶鞋，每三年发一套棉衣，每五年发一床棉被。无论单衣、棉衣还是被子，一律都是蓝色平布。据说这些都有文件规定，但我劳改八年里，只在砖瓦厂领过两双单鞋，再未发到手任何物品。劳改队发这些东西的时候，犯人都使尽手段，将能穿用的东西藏起来，故意穿些破东西。又因犯人调动频繁，管教人员有时搞不清该发给谁，不该给谁。犯人你争我夺，把东西混到手算数。而我则相反，每到这场合，非但不争先恐后，反而故意回避，躲得远远的。发给我我还不情愿要，不是嫌布料质地差，而是穿在身上犹如金印在脸，恶心。我从内心到外表，一秒钟都不曾认罪，我也不接受犯人的称号。我宁愿穿自己的衣服，即使它再破再烂难以遮羞，我也毫不在乎。因此，在长达十八年的服刑过程中，我就比别人多吃了许多苦，多受了许多寒冻。我的被子棉絮早已破了几个大洞，而这儿的冬天奇冷，西北风呼呼彻夜不停，每每把我从酣睡中冻醒。我不得不拿些破衣服塞进窟窿里，实在不得已，去年才向胞姐开口。

一日，正在坏场劳动，管教队长径直走到我面前，给了我一封信。胞姐来信了，我如获至宝，连忙展读。信给我带来一哀一喜，而哀远大于喜。

我的祖母两个月前去世了，她在断气前一直呼唤着我的乳名。姐在信中叮嘱我：你一定要好好改造，全家人都盼你早日归来。她还告诉我，祖母因为我哭瞎了双眼（祖母生前眼睛就不好）。

呵，我亲爱的祖母呵……童年时代，祖母每天给我洗澡，她在一只大木盆里倒上热水，然后一点点加凉水，用手试了又试，才叫我站到盆里。她拿毛巾一把一把、一遍遍地将我从头擦到脚，直到我上学都是如此。以后她对我弟也是这样。小学四年级，我被强制辍学，被父亲“停伙”；若不是祖母和母亲搭救，书再难读下去。祖母辛劳一生，处处呵护着我，在她有生之年却未得到我滴水回报，直到临终还累她牵挂我，叫她难合眼。我的罪孽是何等深重呵。

同时我也仍然满怀期盼，期待姐姐将棉被寄到。第二天管教队

长又给我拿来一封信，队长语气严厉，还带着嘲讽的口吻，他对我说：“好好看看这信，反省反省。改造中还要这要那，可笑不自量！”

我慌忙抽出信瓤，只见信上写道：

承鉴：我考虑再三，不能给你寄被子。你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反革命，我不能帮助这样的“弟弟”，不承认你是我弟弟。望你好好改造，彻底脱胎换骨。

看罢信，从头凉到脚，眼前顿时漆黑一团，差点晕厥栽倒。仅隔了一天，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变化实在太快，太大。我气，我恨，我痛，我的心在滴血。不寄也罢，何必一连写四个“反”字呢？别人不了解我，难道至亲至爱的姐姐也不了解？扪心自问，我正直善良，爱国爱民，不惜以生命作为奉献。我的精神支柱就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正因如此，近十年圉圉我的精神始终不垮。我需要理解，然而，我最亲最爱的人竟然不能理解，我在她的眼里成了如此恶人，这是怎么回事？谁在颠倒黑白？这才是一种法力无边的魔术，如今却发生在我身上。我不知这股邪恶势力来自哪里，但感觉到它力大无比。真理需要多数人的认同，如今连挚爱的姐姐也不能理解和认同我，我甚至自己也怀疑起自己来了。我觉得生命失去了支撑，内心一下子被抽空了。人最伤心断肠处，莫过于亲人离你远去，我感觉万事皆空、万念俱灰，生命不再有任何意义，它已是一个绝对的空壳。

精神恍惚过后，我渐渐冷静下来。这事太蹊跷，我不相信姐姐会对我如此绝情。换个角度思考，的确，在很多人眼里，我已不再是贫农的儿子，而是“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重大现行反革命罪犯”。眼下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姐可能也不再“清白”，她有个“现行反革命”的弟弟，怎么能脱干系？并且，她还与这个“反革命”弟弟藕断丝连，保持着通信联系，又还给他寄东西，资助他……这会带来什么后果？想到这一切，我不禁浑身冒出冷汗。

我害怕，但并非是自己。我怕的是亲人和友朋因我而受到株连。社会上已经开始清理阶级队伍，专政的铁筛子要把每个人细细

过筛……我似乎看到我姐已被红卫兵揪斗，她个性之刚烈一点不亚于我。她披头散发，挣扎不服，被打得满脸血污。她是因我而蒙冤受难，而我居然怨她，恨她……我头痛得厉害，好像有数不清的钢针在脑中乱搅乱戳，疼痛令我在床上打滚。我用两只手死命顶住额头两边的太阳穴，也不能减少这苦痛。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其实大谬；心死了还知哀么？我要说：哀莫大于心不死。若能成为不知哀愁的木头，那该多好。对我来说，疲劳、饥饿、黑牢、杀头全都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株连。过去历朝历代遭杀戮者，都还有亲人来收尸；现在哪里还有？为什么？怕。由此可见，现在的株连有多厉害。

辗转床上，痛苦不可名状，我彻夜未眠。直到天快亮时起来小解，走到垫厕所的一堆厩土旁，忽然天地旋转，眼前一黑，什么都不知道了。

醒来时，我躺在病号室的病床上；也不知在厕所边上躺了多久，也不知如何给弄到这病床上来的。我的病症是持续高烧，打过吊针高烧暂时降一些，吊针一停又高烧。我不思饮食，任何饭菜皆不能下咽，全身并无任何痛感。场部医院就在跟前，医生来会诊。有人怀疑是伤寒，有人说是类伤寒、副伤寒，终无定论。

我一向体力较弱，体质却不差。步入成年后，也从未患病。这次病前身体并无不适，也无症候，不知是否与“心死”有关，我说不清。

几乎与我同时病倒的还有“大力士”，他的症状据说和我一样，只是我比他病情更重。这病势来得凶猛，每天都要从医院取药打针。冥冥中我听说给我注射的一种针剂颇贵，“大力士”也注射了同样的针剂。一针过后，他声明再不要打，他怕痛。每次给他打针，需叫好几个人按住他的手脚，他如同杀猪一般发出嚎叫。我不怕痛，听凭发落，我根本感觉不到疼痛，大约我全身的痛神经都麻痹了，甚至是丧失了功能也未可知。

我吃的是“特灶病号饭”，伙房先来问我想吃点啥，偏我什么都不想吃，说不出要吃什么。伙房犯人只好用细白面擀薄薄的面片，

用清油炆葱花下面。我往往只喝一口面汤便推碗作罢。我的剩饭质量好，但没人敢吃也不允许别人吃，怕引起传染，全倒到尿桶里了。有一次，队长来到床前，反反复复问我想吃啥。我绞尽脑汁拼命想了半天，终于想出好东西来：吃生的胡萝卜。队长立即派人去取，伙房没有，又派人去新一站取来一堆。然而，我只吃了半点薄片就再不能下咽。

在病床上不知躺了多久，反正已经不能翻身。经常在昏睡中，肚子一点不饿，身上一点不痛，全身都舒服。只是大脑停止了思维，我既没想到死，也没想到生。总之无知无觉，不曾想到任何事、任何人。

眼前有几个人影晃来晃去，好像很忙乱。他们在搬我，抬我，把我放进一个黑糊糊的盒子里……事后得知，1968年9月，我在不省人事时被抬上汽车，调到了新单位：饮马四站基建队。

欠的孽债不还清，罪不赎完，苦不受够，阎王爷是不收你的。要是“眼一黑”走了，一丝痛苦没有，该有多好！

哈哈，我死过一次了，死的滋味真的蛮好。后来，我时时这么回味。

七、在四站住病房的日子

一到四站，人们将我直接抬进了病号室。我处在高度昏迷状态，什么都不知道。卧病数月之后，神志终于慢慢清醒，身体逐渐好转；我也才了解到这里的情况。

四站病号室与良种站不同，良种站的病房那里有个长条炕，病人睡一溜通铺，稀稀拉拉一共有五六个病号。这儿的病号室有三间，每间房里是单人单铺，都住得满满当当。我住的这间里共有六个人，我睡中间的床。

大队的犯人医生叫贾克，年过五旬。他中等个头，皮肤黝黑，四方脸，嘴巴宽宽的。他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中校军医，曾在武山洛门矿泉医院干过。我猜他是“历史反革命”，刑期不详。他现时享

受每月的五元“技术津贴”，是这站唯一拿津贴的犯人。他医术平平，人倒是谦虚友善，对我尤甚。他指派病房犯人组长卢福海侍候我，卢福海负责为我打饭喂饭，接、倒大小便，端水倒痰，还抱我翻身，无所不包。

卢福海是轻病号，天水人，四十余岁，高大个，髭鬚很浓，罪名是“盗墓贼”。他对我的照顾殷勤周到，因为他“有利可图”。我到四站后仍吃小灶病号饭，而其他病号都是普通病号饭。伙房为我单独做饭，虽说无非是葱花炆锅的白面片，上面却飘着一层黄澄澄的油花，足使其他病人馋涎欲滴。每顿给我一小碗，起初我只喝口面汤，后来也只能吃一小勺。卢福海不怕传染，我剩余的面片他眨眼就下了肚，快得别人来不及反应，犯医贾克拦都拦不住。病号定量低，而他原是个大饭量，自然饥饿难耐。

大田犯人出工后，贾克便来查病房，每天如此。他后边总跟着助手，三个病房齐齐转一圈，直到末了才到我床前。他用听诊器听，又询问我。初来时，我昏迷时候多，清醒时少。即使清醒，听到他的询问也没气力回答，连抬眼皮都觉疲惫，说话如蚊声，只有自己听得见。贾克不知从何处得知我是大学生，他拿来厚厚一本医书，贴我耳朵跟前念。他说，如果对症，你就点点头。只见他不急不躁，顶有耐性。以后他又拿着书，叫我自己阅读，每看完一段累了，就闭眼休息一会儿。然后，他又指到下一段文字。凡我点头处，他都做上记号。医务室有的处方药，他的助手会立马取来；没有的，他要助手立即去向大队请示报告。

贾克的助手叫边立林，甘肃临洮人，长得精瘦，年约四十样子，是个颇有城府又很能干的人。此人话不多，极有眼色。贾医生就用这种方法，给我诊断病情，开处方下药。从9月病倒，一直到12月份，我的病情才终于有了点起色。

贾克诙谐，喜说笑，见我的病有好转，甚高兴。他到病房来得更勤了，只要一有空闲就坐到我床沿，同我说笑聊天。以后他知我是学化学的，便说要向我学化学知识。他的谦逊好学令我感动，也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轻病号待大田出工后，有的人搬个马扎到前院晒太阳，有的人在院里散步。唯我这卧床的重病号静躺床上，只能偶尔听听别人讲的故事。所幸贾克和边立林常来陪我，减少了我的寂寞。

卢福海给我讲过他盗墓的事，他说，盗墓贼作案都是天马行空，独来独往，除非大宗买卖一人委实干不了，一般都不要搭档。每次作案，先要探访侦察，不能干无利可图的傻事。而被盗的对象都来自富豪官宦之家，冬天出殡后不过月，夏天入土后以三日为限。久了，尸体腐烂便没法弄了。动手时间要选在下半夜天黑人静之时，若是刮风下雨则更便于行事。盗墓要有技巧，坟掘开后，只需带上一条两三尺长的绳套便可进入棺中。盗者棺尾而入，与死尸相向，叠伏其上，将绳套套在尸体颈部然后坐起，使死者上身直立。盗者与死尸面对面几乎贴在一起，然后用双手解其衣，从一边拉脱，最后再搜寻棺内其他财宝。

卢福海解放前即以此为生，解放后仍以此为业。他讲得轻松自如，沾沾自喜。我这不信鬼的人，听了却头皮发麻。

他又告诉我，在我来四站前不久，发生过另一桩事。四站基建中队有个姓马的犯人，三十出头，有文化，平时胆大不驯服。有次不知因何事与“班长”顶撞起来，说得条条是道，把武警弄得下不了台。这武警忌恨他，总想找茬治他。有一天终于机会来了：监墙后面种着百亩蚕豆，收割时为赶进度，镰刀刮刮，豆荚抛洒一地。过后要将豆荚拾一遍，年年如此。拾豆荚是难得的轻活，犯人溜横排，由远而至监房，为的是拾完后中午好进监院吃午饭；管教、武警、犯人都能有点时间午休。此时，地埂上的四面警戒旗也不停地向前移动。犯人一边拾豆荚，一边闲聊。马姓犯人与另一个犯人走在最前边，他俩只顾叽叽咕咕，却忘记抬头看那小旗标记的“生命线”。此时有双眼睛正盯瞄着他，待听见“注意警戒旗”的喊声时枪声已响……说时迟，那时快，马姓犯人反应敏捷，头一缩，子弹击中他的同伴头部。犯人立时毙命，就倒在离监墙不到三五十公尺的地方。

卢福海自言自语道：“说他有意逃跑。他又不是傻瓜，岂能朝

着牢房方向跑？后来，尸体挺在原地不准动，警戒旗也不准挪，用石灰做上标记。听说管教与武警扯了一通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四站还有些武山籍犯人，我前脚进四站监房，后脚就有人来探望我。不知他们从何处知道我的，有人此前已来过病房多次。我不是昏迷不醒就是在昏睡中，全然不知；而他们还是常来。如今我的身体有了转机，始得认识其中几位。来得最勤的，一个是农业队的薛守志，另一个是基建队的丁志成。

薛守志比我小两三岁，长得漂漂亮亮，衣着颇干净。他是武山县新寺公社人，中师毕业，原来是小学教员，不知他案情与刑期。丁志成年约四十，个头偏矮，原来是武山城关粮管所的股长，也不知其因何劳改判刑的。他俩被捕判刑都在我之后，在外面听说过我和《星火》案情，故而对我特亲切。他俩对我说，你们这一案爆发后，武山无人不知；连甘谷、漳县、陇西、通渭、天水都传遍了。人们知道你们是讲真话，因为替农民鸣不平而获罪，都把你们当成英雄。他们又告诉我，中央就是从你们这个案子中才得知甘肃真实情况的，结果把张仲良调了，又紧急调来粮食，少饿死好多人，你们有恩于百姓。

他们说的这些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无从核实真假；不过已足使我欣慰。倘若真是这样，牢底坐穿又何妨？真话总要有有人说，区区个人性命算得什么。

他俩常来看我，收工回监、晚饭过后也来病房“猫”我一眼，问寒问暖，直到“晚汇报”才不得离开。星期日休息，两人吃罢早饭就来。有时无话可说，就陪我呆呆坐着也不走。他俩对我的感情，叫我好感动。

12月的一天，二病房突然忙乱起来。有个病号胃大出血，贾医生守护在旁寸步不离，边立林跑进跑出拿这拿那，几个轻病号也七手八脚地帮忙。从一早直忙到中午时分，大出血仍未能止住。正当贾克、边立林汗流浹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从基建队工地又抬来一个犯人，他因逃跑被武警开枪击中颈动脉，也是大出血。

抢救一直坚持到下午四五点钟，均告无效，两个犯人都死了。

听说逃跑被枪击的犯人是乔占瑞，叫我吃惊不小。这人我认识，原是兰州砖瓦厂半成品队的，以后与我一起调良种站基建队，虽不与我同组。他是个老实人，从不与任何人来往。这天，大田犯人平整沙包造田，警戒旗固定不挪动。乔忽然脱掉鞋，手提着鞋，撒腿朝警戒线外飞奔。武警鸣枪竟不理睬，直到中弹扑地倒下。我在良种站就耳闻乔占瑞神经不正常，这个结果可以说验证了传言为真。否则能不知道他的两条腿跑不过枪子吗？

是夜，大约半夜时分，经过一天折腾的病号都睡熟了，病室正中一盏十五瓦的小灯泡发出惨淡的光。我没睡着，忽然听见乔占瑞在门口大声喊我名字，我赶忙大声答应他。这一声，把睡乡中的大家全吵醒了。人们问我咋回事，我说：“乔占瑞在门口大声叫我，你们没听见吗？”几个病号从床上爬起来，惊愕地一齐道：“没有哇，我们什么声音都没听见，只听到你‘哎’的一声。”整个病房惶惶然，都说是个不祥之兆，这是乔来唤我与他做伴来了。有人悄声说，要是不回答就好了，回答了必死无疑。但我很坦然，心里一点不怵。我知道这叫幻听，大病久病身体极端虚弱的人，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八、六八年底冬训

1968年底，隆冬时节，一年一度的犯人冬训又开始了。这时，我才能吃完每顿一小碗的小灶病号饭（不到八十克主食），也能挣扎着下床上厕所了。病号室冬训与大田犯人不同，这里的病员来自不同中队、不同小组。有的人少则上三五天、多则七八天便出院了。病员进进出出，来不及互相认识；加之有病在身，也自顾不暇，相互间无甚瓜葛，故而病号室里也不开会。唯一的任务是要背诵红宝书中的“老三篇”，根据犯人的文化程度，大致有个最低要求，比如某人要背诵毛的著作多少篇、语录多少条等等。

另一病房有个犯人，可惜我记不起他的姓名了。他六十多岁，大高个，山东籍人，驼背，瘦骨嶙峋的。这是个久住病房的老病人，

终日手不释卷，居然能将整本的《毛主席语录》从头到尾背下来，而且每条语录的次序都准确无误。他因此名声大噪，理所当然地成了四站学毛著的犯人标兵。我见过他，只无法测验其真假。他超常的记忆力令我折服，但内心也为他感到悲哀。我不相信他从红宝书中获得了“改造的信心和力量”，不相信这过程里有“无穷乐趣”，更不相信什么“枯木逢春”。他的内心世界难道真的没有苦涩？难道他因此不再思念妻子儿女？他的学习态度虽然虔诚，可惜并未感动上帝，上帝没给他减去一天刑期。

在这个学习热潮中，我是起死回生的重病号，受到破格对待。无人过问我，也没有给我规定任何定额指标。不过我也记得几十条语录，足可滥竽充数；我的记忆力在逐渐恢复。

过罢阴历年，大墙里躁动起来。每到天黑，从监号里便传来激昂的口号声、痛楚的呻吟声。冬训进入了检举揭发和批斗阶段，这是少数犯人的节日。他们梦想早日出去，自然会大打出手，争取立功。如此，也总有人被当成活靶子。病房与大田犯人仅一墙之隔，那边的动静逐日增大，狂呼乱叫的喊声之外，又添上了噗噗的沉闷响声。病人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家并不打听议论。

忽一日大清早，轻病号去伙房打饭，带回来一个骇人的消息。农业队伙房门口有个大水桶，高及胸口，直径两公尺。这个桶是用来盛水洗菜的，一年四季都盛满了水，无水的话木桶便会干裂开缝。这日天不亮，伙房犯人照例起床做饭，出门洗菜，只见桶边趴着个人。刚开始还以为是有人口渴在喝水，可是近前一看，一个人勾头沉浸在水里。水面已经结了层冰，人早淹死了，身子在桶外完好无损。

没人敢动他，怕自找麻烦，被说成“破坏现场”。直等到大天亮，管教队长和另两个人才进来察看。两个中队的四五百犯人都都涌到前院，很热闹了一阵。有病号认得这死者，说到他叫什么姓名、多大年纪、何处人氏，唯闭嘴不提死因。

如果不是近在咫尺，有那么多人亲见，死者也有名有姓；我都不敢相信这事是真的。一个人在无外力作用下，凭自己意志力勾头

浸水窒息而亡，轻易能做到吗？死者也是个超人，他的意志力何等惊人！爱惜生命是动物本能，不到万不得已，一个人断然不肯如此结束自己生命。那死因不言自明，是无须说的。

又一个生命结束了，短短四个月里，死了四个犯人，四站是个凶险之地！

这年冬训，饮马农场四站战果辉煌，挖出了以何维清为首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案，震动了整个农场和劳改局，犹如当时的“珍宝岛事件”震动世界一样。此案是如何发生的，内情究竟如何，又是如何结案的？这些问题对于我，时至今日仍然是谜。

我当时听说的是，这个案子的成员遍及饮马农场各站，且成员都是一色的大学生或知识型犯人。四站首当其冲，被指控为头头的何维清是四站农业队犯人。四站顷刻间雷鸣电闪，狂风大作。最先是何维清和基建队一马姓犯人被戴上手铐、脚镣全套刑具，接着又有别的人被抓出来。曾来探视过我的丁志成、薛守志也被戴上手铐，砸上大镣，整个四站的空气像凝固了一般。

监狱高墙与牢房间有四五米宽空地，犯人只在牢房之中的院内活动，牢房背后的这块空地人迹不至。“何案”发生后，监房里大兴土木，每日运坯和泥，在监房背后紧贴着山墙砌了一排小屋。这小屋长、宽、高均为一米左右，糊上泥巴，留个门，形同鸡笼或狗窝。凡“何案”犯人一律被戴上手铐、脚镣，推入其中。一人一屋，高不能直腰，宽不容躺卧，只可倚墙席地而坐。小屋随砌随进人，泥巴湿乎乎的，数九寒天，薄被薄褥，地上只撒了把麦草，其情其状，惨不忍睹。白天黑夜，镣铐之声、批斗的口号声和痛苦的呻吟声不绝于耳。整个四站沉浸在“与人斗，其乐无穷”的疯狂中，换言之，沉浸在血腥恐怖中。

有天早上刚早饭毕，基建队犯人统计张家林来病房通知我，他说中队范指导员叫我。我颇觉蹊跷，只得跟他走一趟。

张家林是武山籍人，年龄与我差不离，或许大我一两岁。他微驼背，瘦高个，有张鸭子嘴，说话嘴角冒白沫。劳改前他是小学教员，此前我不认识他，也无人在我面前提及他。

卧病半年，我已经不知四站是个啥样。绕过山墙、厕所，我进到监舍后院（农业队在前院）。好家伙，政治挂帅真是不同凡响。黑板上、所有监舍的墙上都写满了毛主席语录和林副统帅的话，白墙红字，非常醒目：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

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

毛泽东思想是改造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最强大武器，是革命胜利的保证。

政治是统帅，是灵魂。

毛泽东思想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

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几面墙壁上都是这些内容，几无缝隙。

范指导员年约四十左右，白白净净，中等个头、圆脸，说话语气平和。见到我后他问道：“你是向承鉴？”我点头。“听贾克说，你的病基本好了。今天叫你来是给你一件任务：中队现在要开‘批斗会’，你来做记录。”

随后，各小组的文人墨客、骁勇善战的积极分子，一人手里拿只马扎，络绎而至，把个统计室挤得水泄不通。统计室有张桌，有把椅，桌椅都给我用。范指导员坐在张家林的床沿，他指示张家林把“斗争对象”带进来。

进来的犯人姓马，很遗憾，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他用戴铐的双手提着脚镣，迈着大八字步，“匡啷”“匡啷”走过来。眼前的他，矮个儿，很结实。刚进得屋，我身后的一个犯人突然大喊一声，把我吓了一跳。接着，狂涛汹涌，一屋子犯人全站起身，挽胳膊捋袖子高呼：

坚决打垮马××的反革命嚣张气焰！

彻底粉碎马××的反革命阴谋！

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顽固不化，死路一条！

口号呼了一阵，范才示意停止。马某伫立人堆中，拳头贴到他鼻梁，他却不缩头弯腰。这场面勾起我对反右的回忆，我对此太熟悉了。如今工厂、机关、学校、劳改队，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一个样，成日吼声如雷。

按照事先安排好的顺序，批斗会正式开场。第一个发言的犯人是一组组长，后来得知他叫张宗焕，长相与朱焕章颇似，也戴副近视镜。他的发言属批判性质，无检举揭发内容，我懒得记，只在他名字后写上一行“内容见发言稿”。他发言毕，我把他的稿子要来即可交差。接下来的人发言踊跃，一个紧接一个，个个都怒不可遏，抛出的一律是吓人的政治大帽子。尽管批判的口号震耳欲聋，可我听来听去，既无事实，也无旁证。

斗争性最强首推犯人大组长张家林，他眼睛鼓得老大，唾沫星子都要溅到我的后脖颈上。

这次批斗会还算“文明”，除几次推搡，马某并未受其他皮肉之苦，大约因为他已经是全套刑具在身又关押在狗窝里了。

九、“你就是何案的总后台！”

我荣幸地当了这一次记录，当天晚上便被取消资格。不为别的，只因我也是“何案”成员，而且非一般成员，我是“何案”的总后台、幕后总指挥。按照饮马农场总场王政委的逻辑，这“何案”实际应称“向案”。

当天深夜，我睡得正熟，忽然有人推醒我，我被提审了。

监狱的大铁门，以前到了晚上便安静不响。“何案”发生后，大铁门整夜“哐当”不休。我的身前身后各有一人，身后人照着手电。其实这是多此一举，此时月光如水，明晃晃的路我看得清。出了大铁门，我被带进一个有套间的办公室，这里似乎离大墙很近，

就在大门附近。外间有只铁皮炉，火烧得很旺，屋子里暖烘烘的。灯泡度数不高，室内光线不很亮。靠窗有条长凳，再无别物。外间空荡荡的，里间有桌、椅、床，桌上有台灯。

坐在桌边的人见我进门，好一会儿不吭声。末了，他顺手将一把扫帚撂到我脚前，叫我坐到扫帚上。我站原处一动不动，没理他。

在看守所，在三监，没人能污辱我的人格。到了砖瓦厂、良种站，我知道劳改队是执行单位，他们只认“判决书”，此地无理可讲；因此，我对管教人员都是敬而远之。我尽量回避同他们的接触，以防受到侮辱和伤害，我也告诉自己不要感情冲动，以免导致不测，至今我与他们相安无事。自 1958 年“劳考”以来，我已经见得太多，我心里的恨也越积越深，我恨的是一条倒行逆施的路线。以前我指着丁局长等人痛骂过，但那时是把他作为这条路线的代表。对他们每个具体的人，我无所谓恨，也恨不起来。

然而，对眼前这个人我确实生出恨来，恨得牙痒痒的。明明椅子空着，却要我坐扫帚。我大病初愈，瘦得皮包骨，他竟如此侮辱我。这是为什么？他没把我当人。这个混蛋，我在心中愤愤骂道。

押送我的干部给这人端来一杯茶，提来一暖瓶开水，又用打火机给他把烟点着，轻声道：“王政委，您还需要什么，请吩咐。”

哟，这是饮马农场的大政委，不小的官呢。他见我站着未动，厉声道：“叫你坐到扫帚上，你为何不听？”我答：“我不能弯腰，腰有老病，里面长有石头。”此前，他手指头夹支烟，一直未点燃，虎视眈眈地盯视我。我也与他对视，脑子里记住了他的模样。他长得无甚特色，只是目光犀利，妄想从精神上震慑我。我心里盘算着，你不叫我“舒服”，我也不会叫你好受。

他突然道：“叫你来，是要你交代你和何维清的关系。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就不用多说了。”他的口气斩钉截铁。

我与何，八竿子沾不到边儿，我心里再清楚不过。我只摇摇头，不吭声，算回答。

王问：“你怎么不认识他，你不要装蒜！”

我很气恼：“姓何的是个什么人，我为什么非得认识他不可？”

王道：“他认识你，你何以不认识他？你欺骗政府，抗拒交代！”

我已不是孩提，这种雕虫小技用到我身上颇觉滑稽。

“你该马上送他去医院做神经病理检查，他大白天活见鬼。”

王政委厉声喝道：“你不仅认识何维清，你还是他的总后台、幕后总指挥，是何案的真正策划者、组织者，你的一切活动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他在吓唬我，我的愤怒达于极点，但我努力控制着，心里不断告诫自己，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的回答不如他气壮如牛，却清晰准确，也够他消受几日。

“感谢政府这样看重我。你是党的负责干部，但愿你的话有根有据，而不是危言耸听，信口雌黄。否则，会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损害。”

他自然听出了我的嘲讽、鄙夷之意，只见他从桌旁站起身来，绕着我转了一圈来向我示威。他那气势像要吞了我，我对他也恨不得咬牙切齿。说真的，我恨不得抽他一嘴巴，咬他一口。他对我用的审问方法是一吓三诈，惯用的，只是更露骨也更拙劣。根据我的判决书和其他条件，他搞对号入座似乎在情理之中，他只忘记了根本的一点——事实。我不会令他舒服，更不会叫他随心所欲。这个疯子，他才应该是犯诬陷罪的罪囚，没想到我如今落到这种人手里，有什么可说的呢。

屋里很暖和，我已站立近两小时。出得门来，寒风刺骨。时值午夜，四方八面只听到嗖、嗖，鸣、鸣的风声，如鬼哭狼嚎。我顿时冷颤不已，接连打喷嚏，腿也发软发沉。到牢舍不过两百公尺许，路似乎越走越长，胜于两百公里之遥。这时我体重还不到四十公斤，虚弱之状可以想象。

回到屋内，我躺在病床上，脑子里突然跳出儿时唱过的《古怪歌》来。那是解放前的1947年前后唱过的，原以为我已了无印象。那歌词道：往年古怪少，今年古怪多。板凳爬上墙，灯草打破了锅。清早走进城，老鼠乱咬人……。

而眼前我遇到的，比这更离奇。我在了无知觉时被抬到四站，三个多月里足不出病房且不能下床。除两个犯医和同室病人，只有薛守志、丁志成来探望过我，以前我不认识他们，他俩跟我说话，我也是只听不答。我不曾议论过劳改队的任何人和事，何以成了“何案”首恶？世上还有比这更奇怪的事吗？

呵，有的，有的。自1957年以来，我亲历的怪事太多。彭德怀变成“反党集团”罪魁，他不感觉古怪？刘少奇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总头目，他不感觉奇怪？我们生活在一个荒诞的时代，只好认倒霉。

第二天，我半夜被“提审”的消息不胫而走，不仅传遍病房而且传遍四站：逮住了一个比何维清更大的老虎、真正的首犯。于是，所有病人、犯医都远离我了，卢福海对我更是判若两人。幸亏此时的我已基本能生活自理。

隔了两天，我的小灶病号饭也被取消了。又隔几日，普通病号饭也取消了。我被送回基建中队四组，跟大田犯人出工劳动。

这时已是在1969年3月。

十、双重夹击

到四站半年，不知东南西北。这日跟大田出工，顿觉天高地阔。我惊诧这儿的建筑设施、布局、道路交通与我在看守所梦境所见，居然毫无二致。从高处俯视四站主建筑莫若两个“口”字并排着，面前一条公路，公路两旁有电线杆，时有汽车驰过。

两“口”间也有条可行汽车的马路，约三五十公尺距离。这两个“口”一粗一细，粗口在东，大墙又厚又高，那是犯人牢狱。细口在西，围着矮墙，四周树木掩映，那是大队部，里面是一个个温馨的小家。路东、路西，两个世界两重天。监狱大门附近东侧又有些小屋，那是工具房、猪圈之类。以后我到其他劳改农场服刑，风格布局如出一辙。我猜想，全国劳改农场的建筑设计均是出自一人之手吧。

工地很远，要走几里路，它在牢狱的西北角。已垦耕的农田呈长条形，每块地总有几百亩，农田两边是防风沙的林带，宽约三十公尺。林带的树种多为沙枣树，也有胡杨和荆棘夹杂其间。林带边上还有白杨树。

去工地不光走大路，有时还要跨地埂，越毛渠，穿过林带，翻过排碱沟。我的脚拖着虚弱的身体，走一会儿就走不动了。所幸本组还有个老犯人陪着我，他叫杨思诚，这名字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同名同姓，故我记得很牢。他六十多岁了，高大个头，弓腰驼背，上海籍人。他原来在银行系统工作，因贪污罪被判有期二十年。他的身体很差，已属垂垂老朽。我俩拖着步子，跟在大队犯人的后面，我们后面是带工的管教干部和武警。他们倒也并不催逼，听凭我俩蹒跚而行。到达工地，我已是大汗涔涔。

这里的劳动项目是平沙包，拓垦新地。虽天气很冷，犯人的干劲却热火朝天。人们挖的挖，抬的抬，有的推小车，有的装土，一齐忙碌起来。没人过问我，也无人给我布置任务。我试着装了几锨土，胳膊再也抬不起来，只好坐地休息。干部站在我身后，他们也不吭声，由着我去。

我的身体离康复还很远很远，可是停止了我的病号饭，将我逐出病房，这无非是要惩罚我。我心里清楚，他们更清楚。他们要给我更大的精神压力，还不准我在监舍病休。无疑，这些都是王政委下达的命令，中队只能遵旨办事。我觉得范指导员和其他管教对我并无大的恶感，他们只要把我带到工地即可交差，其他随我自便。

坐在地上休息，我身上一阵阵发冷，头皮绷得紧紧的，头痛得厉害。基建队有个背药箱的随队犯医，他四十左右，长得干巴巴的，原在部队当过护士。我不记得这人的名字了，他的医术有限，药箱的药更有限。我要他给我量体温，一量，39.2℃。这人擅长针灸，他问我怕痛不？我摇摇头。他把我搀进帐篷里，这儿是带队干部抽烟聊天的休息之处。犯医给我扎针，有的扎在手上，有的扎在脑门上，银针扎得很深。管教在一旁，用惊骇的目光看着我。针灸罢，犯医搀扶我蜷躺在一个沙包边。

就这样，即使发着高烧，我也必须离开那遮风的帐篷。天冷风大，冻得我浑身直哆嗦。大田犯人推着小车，在我身旁来回奔跑，很快踏出一条小路。放眼看去，这里南边是种小麦的土地，田垄参差，阡陌交通；北边是茫茫戈壁，地上长着一蓬蓬骆驼刺和一丛丛蒿草。荒漠延伸开去，到目力不及的远方。在病房里我听说，离四站不远的北边有个颓败的土台台，传说是穆桂英的点将台，但此刻的我也无法看到。

回中队小组后，我还被提审过好几次。照例都是王政委单独审，照例都是在半夜开始，还是工具房旁边那个办公室。他牢牢地缠住我，掌控着我的生和死，就像一个权力无限的人此时掌控着亿万人的生死一样。他每次问的都是老问题，只没再叫我坐扫帚。

有一次他对我说：“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是辩证唯物论者，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革命者。对穷凶极恶的阶级敌人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你是个死心塌地、坚决与人民为敌到底的现行反革命，是我们党和国家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我们对你有清醒的认识和估计，你是不会改变你的反革命本性的。我们知道你的过去便知道你的现在，知道你的过去和现在，便知道你的未来。”

真不愧是饮马农场的大政委，只不过他看错了对象，他的辩证法不过是鹦鹉学舌。我是农民的儿子，幼时逃过荒，讨过饭，当过少先队长，这便是我的过去。按照他的逻辑，我似乎从娘胎里出来就是反革命，而他的革命者身份也是娘胎里带出来的。多么荒唐，我想对他说，刘青山、张子善、高岗、饶漱石以及彭德怀，还有时下刘少奇和邓小平，这些人都有辉煌的历史，到头来都成了反党分子、反革命，有的竟被割了脑袋，他能解释？

但当时的我什么话没说，我要摆出观点，正中他引蛇出洞的诡计。只要有所谓“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这一条，就足可要我的小命。他没有自己的思想，不过是以他人思想为思想，只有遭到砖瓦厂韩教导员相同的遭遇，才能使他醒悟。

王政委见我半晌不语，又一声怒喝道：“你不要装聋作傻。抗拒交代，只有死路一条。”

“唔。我刚耳鸣，耳朵呜呜响。你的话有的没听清，有些不明白。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把过去的判决再审判一次？如果是这样，无须多说，你看着办好了。”。

“我们是执行单位，只追究你在服刑期间的重新犯罪行为，你应该如实交代。”

“是要‘如实交代’？”

“我们共产党人最讲究实事求是，绝不冤枉一个好人，也绝不放过一个坏人。”

我今天终于在这儿见着一个讲究实事求是的人呢，我愤怒，我悲哀。我觉得天底下最恬不知耻的人，非他莫属。

“我不认识何维清，这名字是从你这儿知道的。如果有人能证明我与他见过一次面，点过一次头，打过一声招呼，说过一次话；我任由处治，要杀要剐，绝无怨言。我愿签字画押，这就是我的全部交代。”

此后，无论他啰唆什么，我再也不开口，没有说话的必要了。

十一、阴霾重重三月天

这一天，天空灰蒙蒙、阴沉沉的，这是要下雪的样子。大田犯人在监房大门口出猪圈，猪屎猪尿与厩土搅和在一起，结成厚厚一层硬冰。十字镐挖下去只能刨个白印印，要破开这层冻块，下面就松软了。圈里的犯人有的抡镐挖，有的用锨往猪圈外撿。其他犯人在栏外推小车，手推车回来时装上干土，再倒入圈内。

九点光景，监院里传来镣铐之声。“哐当”“哐当”由远而近，这是提“何案”犯人去大队部受审。隔几分钟从监狱大门出来一个，每个犯人都是一样的脸色行状，看上去憔悴、枯槁，苍白无血色。犯人用戴铐子的双手提着大镣环，走着大“八”字拖步。先后出来有五六个人，其中就有丁志成、薛守志。此时，我推不了车，使不了镐锨，只是站在猪圈里朝矮墙外撿些较小的冻粪块。我与他们相距不过二十公尺，他俩都一眼看出是我，向我报以悲怆的微笑，我

回应他们深情的一瞥。我懂得他们的表情所传达的信息：我没事，心里坦然。然而看见这一幕幕，我依然浑身痉挛，心在抽搐，痛楚万分。他俩如此遭罪，我恨不能以身相代。

直觉告诉我，他俩是清白无辜的。连我这不知何维清姓名的人，尚且能变成“何案”的总后台、总指挥，还有什么谎言编造不出来呢？

悲痛之余，我也得到一些慰藉。丁、薛两人还能挪动脚步，还能惨淡一笑，他们的身体比我想象得要好，精神也没崩溃。回想反右，经过漫长的疲劳战煎熬，我也不得不投降认“罪”，尽管后来我拒绝签字。再想想，连彭德怀也曾违心地写检讨，他还是视死如归的大将军呵。在无所不用其极的酷刑面前，能不说违心话的中国人有几个？只要丁、薛任何一人嘴巴一歪，我便在劫难逃。到了那个时候，我又能如何？想到这些，我深知他们的不容易，对丁和薛既感激又钦佩。

天气原本晦暗，此时愈加阴沉。狂风阵阵，终于下起雪来。下午没出工，一场罕见的大雪降临。这是我到戈壁滩两年多来经历的唯一一场大雪，雪花满院子飞旋，像无头苍蝇乱碰乱撞。

犯人巴不得下雨下雪，可以捞到休息。小组犯人多数在蒙头睡觉，杨思诚戴着老花镜在缝补衣袜。靠窗的一人在写信，还有两人低声叽咕着。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是用被子盖住下半身靠墙而坐。信不能写了，但我对胞姐的思念之情却无法断绝。我想念老父亲和兄弟姐妹，我忘不了贾义老两口、张大妈和李大娘，还有我的那几个大学同学。他们如今在何处？在干啥？都好吗？我想到××姑娘，我没有株连、伤害她，我感到安慰。她的选择是正确的，不知她的爱人是谁，她应该早有孩子了，她过得幸福吗……

院子里积了一层厚雪，偶尔有人从门前经过去厕所，雪上留下一串脚印。院里冷清清的，从来没有显得这样静谧。

这小组里我认得的唯一一位犯人是朱焕章，在砖瓦厂时，他与我同一个分队；到了良种站，我们又同组。我们认识有六七年了，在他看来，他是一般刑事犯罪，比我这“现反”优越。他的优越性

时时泛在脸上，而我的想法正好相反。我不可能跟他说一句体己话，唯以哼哈应付。这次我从病房搬来，他装作不认识我，连一句招呼也没打。他很聪明，怕沾着我受传染。这个小组的犯人无一敢同我搭腔说话。

靠监舍门的第一位犯人是组长霍效贤，他是天水人，比我大三岁，写得一手好字，中队满墙壁的语录皆出自他一人之手。不用说，这是个“积极分子”。不过他对我还算可以，来小组一月，他没分配过我具体干何种劳动，也未下达过定额任务。我干多干少或坐下休息，哪怕躺倒在地他也并不过问。小组值日，当值者要背工具，他将我剔除在外；一捆铁锨二十把，从监狱大门口扛到几里外的工地，本来我也无法胜任。伙房打饭，他也不排我；那一铁桶菜汤有三四十斤，一桶开水有五十斤，他知道我拿不动。霍对我采取如此态度，是否有管教干部指示，我无从得知。我以为不给我找茬出难题，不欺侮我，这是明智的。我这过了生死关的人，倘若施以欺侮凌辱，会遭到断然拒绝和反抗。对干部尚且如此，莫说犯人了，我是时刻准备着的。自从王政委将我塞进“何案”后，虽受到巨大压力，我并未躲闪或惴惴不安。到后来，只要见到范指导员，我就要求面见王政委，要求政府宣布对我的审查结论，以正视听。尽管范支吾搪塞，我依然缠住不放。

天气一天天暖起来，我的身体居然慢慢好起来。而在病房一直伺候我的卢福海却不行了。在病房时，他硬拉我的手去摸他的心窝，那儿确有个鹅蛋大的硬块。我判断他得的是胃癌，他说那硬块还在长大。听说他沉疴不起，命在旦夕，我很想去病房探望他。不管怎么说，在我最需帮助的时候，是他帮了我，为我端屎接尿，喂饭翻身，他都是尽心尽力的。我应该当面谢谢他，但是我又做不到。无论我走到哪儿，无论接触谁，都有眼睛盯着，我怕给他人带来麻烦。

没过几天听说卢福海死了，我有些内疚，没能在他活着的时候向他表达谢意。这个一生以盗墓为业的人，死后不会有人来盗他的墓了，他可以放心长眠。

这一天，农业队和基建队大田犯人都已整好队，在前院监门里

等待出工。忽然从农业队的一个监舍中，几个犯人拖出一个人来。他直挺挺地躺在队列前，基建队犯人七嘴八舌议论起来：这个马占林真个是死皮，没法救了。

马占林何许人也？我不知其详，只知他是回民，四十岁左右。每次大田犯人出工，他就是赖着不出。犯人积极分子拖他，一直拖到工地。开初是顺着拖，拖的人各拉他一条胳膊，他用脚在前蹭顶着，累得拖的人浑身冒汗，很难拖动。后来改成“倒拖”，各提他一条腿，马占林的头仰面在后，拖的人才轻松些。路是凹凸不平的搓板路，地上尽是一些碎沙石、小鹅卵石。他的上身背部衣服磨烂了，变成了碎片片，背上的皮肉血渍斑斑，沙石嵌进了肉里。可他就是不吭一声，到得工地，他依旧躺着不动。无论是踢他还是踹他，一律置之不理。

一句话，他就是不干活。他原本是棒劳力，为什么要拒绝劳动呢？管教干部说他是抗拒改造的典型，犯人骂他是死猪赖皮。我却在想，在砾石与棘刺遍布的戈壁滩拖行，任皮肉磨烂，血肉和砂石黏在一起结成硬壳，是个什么滋味？若无非常毅力，怎能熬得这份苦痛？若无非凡胆量，岂敢如此明目张胆，抗拒改造？

我在漫长的服刑过程中，此人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位明确拒绝劳动改造的犯人，他是个硬骨头。我判断他对判刑不服，心有冤屈；而且是普通刑事犯，“罪行轻微”，刑期也不长。劳改队对判刑不服的比比皆是，无人敢用马占林这一绝招。我就做不到，也没这胆量。自然，我若像他所为，立即会受到格杀勿论的对待。而即使我如他一般的案情和刑期，也不会有他这种气魄和胆量。这就是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吧。

在我心中，马占林是个英雄，我只能望其项背，自愧不如。

十二、与邹庆礼、周有祥重逢

4月中旬，大地开始解冻，紧接着春播大忙季节来到了。

有天早上，基建队和农业队都在前院“报数”等出工，我突然

发现薛守志也在大田犯人队列中。他的手铐、脚镣全卸了，正望着我笑。我为他高兴，又用眼光问他：丁呢？他朝我一摆头，我明白丁志成是调到别处去了。他若不调走就会与我一个中队，而他被调离也有我的原因。后来我才听说，何案的案首也调走了，基建队姓马的“二号人物”也调离了四站。他俩最后被如何发落，直到今天我也不得而知。

四站基建队与场部基建队不同，场部基建队不种麦，只有些菜地。这儿基建队种着几千亩小麦，只比农业队少些。农忙时节一律干农活，农闲时挖排碱沟、开垦新地。春播用播种机，跟机犯人一色都是自由犯。他们的案情轻，刑期短，原本大多都住在监外。有的人看场，有的人喂猪种菜，还有的人赶牛车、马车送粪等等。另有一些犯人从各组抽调过来，他们必须住在监内。这些人来回扛运种子，还有两三人赶着骡马，补种播种机耕不到的边边角角。大田犯人此时的劳动是给已播下种的小麦地打地埂，修毛渠。机播时毛渠被碾毁，要重新修复才好放水灌溉田垄。

春播劳动是犯人的又一次比拼，机子播过去，补种的紧跟上。大田犯人在已播地各组占一趟地。地的长度和地块多少是一样的，大家都得抡胳膊甩袖，你追我赶，怕落在别组后边。每个小组里，两人占一块地，直到把土埂打好、田塍修好，依次往前翻。组长霍效贤是个棒劳力，我与他配对。我虽高度自觉竭尽全力，仍沾他不少光。杨思诚是我这组唯一不拿铁锨的人，他挑着两只铁桶，里面放着犯人的吃饭家什，从地的这头送到那一头；而后折回，又将小组犯人脱的衣衫，转到前边去。这些活也够他忙乎的。

春播大致两周时间，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平时也吃白面，但定量很低。每餐一个馍或饼，重约一百克，副食是清汤寡水，从不见油腥。春播时的馍大些，菜里始见油花，有时偶得一、两小坨肉，算是洪福齐天，但仍在半饥半饱中。犯人也并非都挨饿，少数人总有办法。自由犯可以偷麦子，秋收时节将成麻袋的麦子埋藏于沙包中，一年到头得以享用。个别大田犯人有较知己的自由犯朋友，也能得到额外帮助，分享一点。我睡铺旁的一个同犯，他有个老乡在

放水组，每星期他都从老乡那里得到一小袋炒熟的麦子。在后半夜，他就藏在被窝里嚼食。他知道我发现了他的秘密，起初怕得要死，以后见无动静，知道我是好人，对我从此友善起来，一改以前的生分。

随着“何案”淡出，笼罩在我头上的阴霾也逐渐消散，我这最末等的犯人也能享受其他犯人的待遇了。星期日休息，我也可以满院子走动，看别人下象棋，或者听吴耀章讲故事。

基建队的后院我不愿去，那里四面墙上都涂满了语录，令人窒息。我宁可跑到吴耀章那儿，听他编传。

吴耀章是个特别犯人，四川籍，三十几岁，人长得单瘦，脸色寡白无血色，和我关了一年多黑牢时的脸色一样。他是队里的裁缝，管教干部很信任他，犯人对他也都有好感。的确，他平时不沾政治，不打小报告也不惹是非。在我们中队，犯人的被褥、单衣、棉衣都由他缝制。他住在我这排监舍靠一组档头的小单间，天气暖和时，大田犯人一出工，他便把缝纫机搬到门口，机子也随之“哒哒哒”响起来，星期日也如是。

这天他讲的是在马鬃山煤矿劳改的见闻，围听的一大帮，有的站着，有的蹲着。

马鬃山在饮马农场北边，天气晴朗时可以看到一条墨黑的山脉。它位于内蒙、内蒙、新疆、甘肃交界。马鬃山有煤矿，挖煤犯人住在两山间的山沟里。那儿不怕你跑，跑也跑不出去。山外是沙漠戈壁，跑出去无水无粮，不是冻饿而死就是被狼吃掉。因而那里的警戒哨也稀稀拉拉，几里地才一个；只在临近马鬃山的出口处才戒备严一些。我在那劳改几年，从未发生过逃跑事件。你们以为饮马农场很冷，风很大又荒凉是吧？其实你们没经过真正寒冷风大的地方。马鬃山煤矿才真个冷呐，风真个大呀。黑风一来，山沟正在风道上，昏天黑地，飞沙走石，好像地裂天崩一般。你得平展展地趴在地面，一旦被风刮倒，再也停不下来。一个人滚啊，滚啊，滚出一二十里地，直到碌到石头上。那有头破的，断胳膊断腿断腰的。受伤还算命大，每次黑风袭来都要死个把人。有时你躺的不是地方，被滚落

的石头砸中，该你倒霉。平时你不管干什么，首先都得观察周围地形，心中想着黑风一来该往哪儿躲避，以免猝不及防。

基建中队还有我认得的两个人，一个叫周有祥，一个是邹庆礼。他俩原在兰州新生砖瓦厂四中队，与苗庆久同中队。以后与我同调饮马农场良种站基建队，又同调来四站基建队，现时在不同小组。我认识他俩是在三年前，我们一道陪死刑犯上杀场，接受“反面教员”袁同礼的“教育”。在良种站虽然同中队，各小组却相隔颇远，没有一句话的交往。

有一天周有祥在院子里，他问我，苗庆久和另一矮个儿戴眼镜的也到饮马农场来了，你知道不？我说不知。他又问，在武威车站下车吃饭你没见？我说没有，那时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在一群光屁股的儿童身上。他说，听说苗庆久和那人被分到五站、六站去了。看来你的病已大好了，实在万幸。他又告诉我，邹庆礼也调来这里了。我问，人呢？我怎么没见？于是他把邹的近况告诉我：

“唉，甭提了。他这人太憨直，眼不亮，不识人，老吃亏，吃的都是大亏。砖瓦厂四队时，他和一个叫刘军的人颇要好。这人原是生产队党支书，有些文化又能说会道。邹逃跑未遂，受到加刑处理，其实主要问题不在逃跑上，而是在逃跑案发后，刘军为了保护自己，立功赎罪，便开始揭发邹平时对他说了些什么反动言论。邹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戴了几个月背铐，又关了半年禁闭。到这四站来后，他又结识了王安普，他俩都在二组。冬训时，王安普又揭发他说了什么。你住病房时他被关进了禁闭室，一直戴背铐，至今没放出来，多半年了。”

王安普我也认得，他是山东人，长得瘦精精的，个头和年龄都与我相仿。我在良种站就知他大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见面熟；我对这种人概无好感。我从病房调大田后，有时在院子里碰到他。每逢他要与我攀谈，我脖子一歪转身就走。

直到6月份，老邹才从禁闭室被放出来。我见他时，他的两只手腕上都包扎着厚厚的药棉、纱布，手背肿得像发面馍。他的手指也变成了胡萝卜，互相挤挨着要重叠的样子。他告诉我：“手腕化

脓溃烂生了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了。我原来是医生，连自己都不忍看。出来后贾克给我清洗创面，又敷了药。昨天刚换药，似乎肿有些消退。”

我问他：“这究竟怎么回事，成这样？”

邹长叹一口气：“唉，蛇咬一口，入骨三分！怪自己瞎眼，谁知这坏蛋比蛇蝎心还毒。我什么事没干，什么错话没说，他硬咬我说了。我坚决否认，干部信他的，给我戴前铐，以后又改背铐。铐子是土铐，用铁丝拧紧，直扎进肉里、骨里。”

邹君是我所见过的知识犯人中骨头最硬的，我对他很敬重。此时我却没给他一丝安慰，反而狠狠地说他道：“论知识和年龄，你都堪为我兄长，也经历过 1957 年的事。我竟不明白，你怎么会跟这些无赖搅在一起。这些‘下三滥’心毒手黑，什么事干不出来？为了减刑宽大，不只你，连他的亲生父母也会卖。你要接受教训啊。”

此后，虽经七调八调，我与邹兄始终在一起服刑，有时在同一小组；直到刑满也没分开过。再以后，我俩都彻底平反，各自走上工作岗位，依然电话书信不断。1986 年他参加援非医疗队，后来由马达加斯加回国，还来看过我。我又一次撩看他手腕上的凹痕，那一处皮肉依旧是深深地凹下，再也长不起来了。

十三、小蝇末虫可恶的纠缠

戈壁 7 月，太阳炙烤，大田劳动无由躲避，只能干熬着。不知名的小蝇末虫只针尖大，趁火打劫，一群群飞旋肆虐，寻找吮血对象，一叮咬便起个大红包。这些小东西从早到晚围着人打转，赶之复来，纠缠不休，可恶之极。杨思诚佝偻着腰，瘪着嘴，他的牙全掉了，动作迟缓。这小虫对他情有独钟，偏欺侮他。他的脸上、头上、手上、身上全是红包，一个挨一个。奇痒难耐，他拼命抓搔，弄得全身血迹斑斑。有人说他的血是甜的，拿他打诨：“老杨，你如今发福了！”

为摆脱小蝇末虫侵袭，多数犯人用纱布缝个头套来套在头上，

手上也戴着手套；再热也不敢打赤膊穿短裤。佝偻身子的杨思诚戴上纱布头罩，远看活脱脱一只大狗熊似的。也有少数犯人不太怕这小东西，我是其中之一。小蝇末虫叮到我身上只留下红点，不起包也不痒。犯人都说，我这类人血苦，小蝇末虫不爱招惹。

世上有许多事情就像这小蝇末虫一样，整日缠绕着你，摆不脱也躲不过，拿它毫无办法。

炎炎烈日下，我在小麦地锄草，从土埂上走来两个干部模样的人。他们走到带队管教干部跟前，叽咕一阵后，径直朝我而来。

管教指指我，“他就是向承鉴。你们问吧，需要配合请招呼一声。”

我坐在地埂上，两位生人一左一右，一个问，一个记。

“你叫向承鉴？”

我点头。

“什么案情？”

“右派反革命。”

“原判？”

“十八年。”

他看看我，突然说：“你还有没交代的余罪！”

我摇头。

“你不要有顾虑，不要背包袱，怕交代余罪会加刑。只要彻底坦白，非但不加刑，你还会得到立功减刑机会。故意包庇隐瞒，抗拒不交代，后果你不会不知道。”

问话的人三十好几，一脸狡黠相；记录的人只二十出头。两人都穿着白衬衣，头戴一顶质量不错的草帽。那年轻的只管低头记录，偶尔抬头看我一眼。他很识相，知道自己的副手身份，不插一句话。

他俩是哪个庙门的？公、检、法系统的？科研教育主管人事方面的？或者是红卫兵、造反派？我心里嘀咕，猜不透。

我说：“我劳改九年了，党的政策我懂，凡我知道的情况愿实事求是向你们提供。”

“很好嘛，我们很需要你这种合作态度。现在你交代在大学时

期你与其他同学的关系。”

“大一、大二同一大班的同学有一百九十多，同小班的也有三十几，一晃十多年了，绝大部分同学我连姓名也忘了，你要我交代的是哪一个？”

“当然是与你关系最好、最密切的同学，你心中没数？”

他与我玩着虚无缥缈的游戏。

“再具体些，要交代你与其他右派同学的关系。”

“无一有关系。”我立马回答他。

他停顿一下，说道：“右派分子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原本是敌我矛盾，本质上即是反革命，只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罢了。你们同为右派，有共同思想基础，这是前提条件。在学校，在你劳动考察期间，在你进行罪恶反革命活动的时候，你们又频繁接触，来往不断，能说你与他们没有关系？”

这两个是文化人，我大致能判断他们的来处，也明白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然而我对他的逻辑学嗤之以鼻。

“既然事实可用逻辑推理得到，何必千里迢迢跑来问我？”

他噎住了，想发怒，态度立刻凶横起来。

“你很嚣张！我们知道你是个死心塌地的家伙，你对革命派的态度我们会请管教干部去修理，我们没时间同你啰唆。现在必须交代你是在何时、何地发展吕绥生参加你们反革命组织的？”

他终于摊牌，呵呀呀，腔调与王政委如出一辙，当权的怎么都是这种人呢？呵呵，五七年后世道早成谎言世界，不会这一套能生存么？能当官在台上混？

“你要听我编故事呢，还是要真实情况？”

“当然要你交代真实情况。我们共产党人一贯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

我心里暗笑，“实事求是”早叫狗吃了。

“那好。一句话：我与他无半点政治关系。”

“根本不可能！你知情不报，抗拒交代，还想继续反革命下去！”

“你们可以继续调查。五七、五八年在校时，大家都是右派，有些生活上来往。右派与右派不一样，互相戒备提防，不谈反右。1959年4月我回校治眼疾，那时也仅仅是右派，没什么谈的。此后再没见过他，没有一个字的通信，如何介绍他参加什么组织？何况，根本不存在什么组织。”

那个年轻的给我看过笔录，叫我按上手印；他俩气咻咻地走了。

时隔不久，又有两个搞外调的找我。这次是关于邓德银的事，情况与上述大同小异。不同在于这两人有些土气，大热天还穿着制服外衣，头上汗腾腾的也舍不得脱。我猜那里面的衬衣要么脏兮兮，要么破旧，不好见人。这两个人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两手空空走了。

刘少奇早已被揪出来，他被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他隐藏党内近半世纪，就在最英明的人身边，最英明成了最昏聩的别称和讽刺。

珍宝岛事件把“老大哥”赶跑，它在外蒙屯兵百万，不像虚张声势。无论国际国内，阶级斗争都已白热化。全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清理阶级队伍”，环境险恶，我为亲人、同学的生命揪心。他们遭受逼供信的煎熬，会不会给自己扣屎盆、编故事呢？我不敢想。我的同学都接受了正规的五年大学教育，国家和人民正需要他们。他们若遭不测，该多可惜，可是我又能为他们做什么呢？

一连几个晚上，满脑子胡思乱想，辗转不成眠。

为配合清理阶级队伍，劳改队也搞起“交余罪”运动。人人要在会上交代，看是否还有余罪没坦白；搞了两周时间才结束。

十四、第一次秋收劳动

阳历8月，风，又热又干。麦浪由绿转黄，每天在变幻颜色，眼看秋收时节到来了。

基建队种着约五千亩小麦，农业队更多。这里播种用播种机，秋收后翻地用拖拉机，但秋收割麦全是用人力。秋收是“龙口夺

食”，能动弹的犯人悉数上阵。有经验的老犯人早早地缝块垫子，割麦子时绑在左腿下，以防镰刀伤腿。没等秋收动员，监院中已现出繁忙的气氛。如果说饮马农场还有可取之处，那便是农业生产的组织管理颇正规有序，少有胡日鬼现象。

秋收前，两中队的犯人集合监房前院，大队干部作动员，接着又是小组讨论表决心。刀架、镰刀片、油石、磨石都发下来了，中队干部根据犯人情况下达了定额指标。没病的人，最高定额是两亩。我此时病算基本痊愈，只是体质虚弱，给我的定额是一亩。除杨思诚外，我的定额属于最低一等。杨思诚的定额是三分，不过我估计他一分也无法完成。正式割麦时，范指导员干脆没叫他动镰刀，只叫他在割完的麦地里拾麦穗。范指导员在对待和使用犯人方面，还是蛮有分寸的。

服刑以来，我还没拿过镰刀；现在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小学熟读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虽未拿过锄镰，自以为也懂得农民辛苦；这时方知那不过是空泛的认识。我当过背工，拆过热窑，倒过土坯，挖过排碱沟，那些劳动都特别重、特别苦。原以为割麦不过如此，亲身体验方知大谬。

月挂天边，繁星还在闪烁，周边黑洞洞的时候，伙房一声高喊“开饭咯！”犯人如士兵听见紧急集合号，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院里电灯照着，置放着大菜桶、大簸箕。主食有油饼、白馍，副食是杂烩肉菜。主食不定量，任由取拿，菜则每人一大瓢，在灯光下一层油花显得黄澄澄的。有的犯人顾不上洗脸洗手，抓来油饼便塞进嘴里。一年到头只在割麦期间能放开肚皮，人们饿疯了，恨不得一口一个油饼，还有的人两只手各抓三五个油饼或馍，狼吞虎咽。

大组长张家林在院子里高声喊道：“你们一边吃，一边听我说几句话。油饼、馍尽管吃，命可是自己的。我劝大家都把握些，一则吃得撑着，到工地弯不得腰，割不了麦，弄不好还出人命。二则中午还有更好的，大家该留些肚子。不是嫌大家吃多了，绝没这意思，老同犯都晓得我这话是为大家好。秋收期间，顿顿管饱，日

子长着哩。”

我对张家林印象不好，对他这话却信而不疑。长饿的人猛然吃得过饱，胃不胀坏才怪。我对饮食比较能把握，再饿也不暴食，胃从未出过问题。我看见有的人听了他的忠告，把手里的食物摞进筐里。

犯人走到工地，天才麻麻亮，勉强能看见地里的麦行。割麦是简单劳动，对新手又很不简单。左手揪不住麦棵，只能一把一把地割，既慢又费劲。那些老手将麦棵卷裹在一起，割几刀就是一捆。在他们手上，麦子不倒麦穗不撒，到我手上却一秆秆闹独立，不往一处挨靠。我再着急也是枉然，越紧张抛撒越多，到头来还要拾麦穗。有人割“走镰”，腰不必弯得太低，边往前走边割，一镰扫倒一片，割倒的麦子全在左脚脚面上，用镰刀顺势一勾，只几下便是一个捆子，居然无甚抛撒。他们不紧不慢，不慌不忙，工效极高。

多数犯人都单干，一人占一块地。也有两人合割的，这两人多半平时关系好，体力和技术也相当。每割完一块地依次向前翻，如抛撒过多要返工收拾。张家林用拐尺丈量麦地的面积，登记在册；又负责检查验收质量。出苗不齐整或被盐碱渍死而无麦的地方要扣除面积。完成的数是实打实的，任何人休想投机取巧。

我身子弯得低低的，贴着地皮割，忙得没功夫直腰喘气。张家林见我大汗如注，站在地埂上对我说：“你这块地正好一亩，一天割完就完成任务。你莫慌，慌了容易割手伤脚，回头我来帮你教你。你这块麦子太厚，要多花许多气力呢。”

麦子都长得不错，平均亩产大约两三百公斤吧。我这块地的麦子有半人多高，有些麦秆、麦叶还有绿色。麦秆有筷子粗，亩产怕在四百公斤以上。

我没想到张家林会对我这样说。

午饭送到工地上，主食是油饼和夹有葱花的花卷，菜里的肉果然比早上多。可惜我无福消受，咕咚、咕咚我先灌了两大碗凉开水，主食一口也吃不进。我把腰部垫在麦捆上，四脚朝天躺着。腰像断了一样，疼痛得厉害，浑身瘫了一般。我无法描述我的难受和疲惫。

再看看我前头的那块地，人家的地块大小与我的差不多，麦子已所剩无几。我只割了四方的一小块，估计仅有两分吧。光这块地怕两天都割不完。虽然我也是分秒必争拼命干，怎么这样慢呢？我对自己的能力从来没有这样沮丧过。

吃饱喝足，大多数犯人用麦捆搭个人字，将头掩在荫里，横七竖八地躺下歇着，抓紧时间睡个囫囵觉。这里开饭、午休总共不过一小时。有几个犯人坐在捆子上，一边抽烟，一边用油石擦磨镰刀。只有我这不中用的货，既没本事割麦，又没本事吃饭。灌了满肚子水，身子像刚肝掏肺般痛苦难忍。

下午开工，张家林满工地转一圈后来到我面前，他手把手地教我，一边讲解，一边做示范动作。他说，左手反向抓一把麦，绕到另一些麦的后面，无非缠绕托扶一下，一刀就能割得多。割倒的让它躺倒左脚面上，用镰尖一勾就一堆。下镰要平，麦茬既不要太高也不能太贴地面，不然会伤镰，刀钝得快。你割的茬太低了。打蛇要打七寸，这是蛇的软肋；麦子也有软肋，刀口离根两寸处即是。你从这儿下刀，最易割断还省劲。唉，你这镰刀也没磨好，晚上我教你磨镰。

张家林微弓腰，左手将麦秆压斜，“哗啦”，“哗啦”，他一刀刀向前横扫，动作麻利得蝎虎。只半个多小时，就割倒了一大片，与我一上午的成绩差不多。我照着他说的做，效率果然有提高。

麦垄又热又闷，人在麦地里犹如蹲在笼屉里。我腰酸背痛，拿镰刀的胳膊抡不动了，不听大脑指挥。麦秆变幻成一棵棵大树，在我眼前，长出一片原始森林。我越砍它越多，排山倒海向我涌来。我只觉得对它们无可奈何了，我的前后左右全是割净的麦地，其他人早挪到前边去了。而管教和武警就在我这地里，他们谈话聊天，并不催逼，我不由得自己逼催起自己来。

天将黑，快到收工时候，张家林跑来帮我收尾巴。他说，这些我来割，你不要割了，快捆吧。

回到监房，嘴里又苦又涩，什么都吃不下，又是“咕咚”一通开水。张家林教我磨完镰刀，我立即躺下了。开初全身痛楚，只一

会儿便睡成了死猪。

秋收只两周时间，第一天最是很难熬，像在地狱里过奈何桥。以后慢慢好些，再也没碰到第一天那么厚的麦子。这段时间虽然狱方改善生活，吃饭不限量，可没一个犯人长胖。我在此期间反而为政府节约了不少粮，全中队掉肉最多的莫过于我，看上去只剩皮包骨，像住病房时的样子。

张家林为什么对我如此和善？费思量。他的案情、刑期我点滴不知。回想马姓批斗会情景，他一副穷凶极恶嘴脸，但仅是就事论事而已，并没捏造事实。我想，尽管“大帽子”满天飞，到头来都要凭事实算数。反右中，哪个同学不是狂呼乱叫的，不表现行吗？真正蛇蝎心肠的又有几个。生存是动物本能，自保是人的天性。为适应环境，不得不变换颜色、面孔；张家林大约也在这大多数人之中，本质并不坏。

人呵人，我在内心感叹，政治运动把每个人变得高深莫测，很难看出他的庐山真面目。

十五、大搬迁前后

秋收刚过，监院有许多小道消息流传。有人说，苏修在新疆策动少数民族闹事，从边境跑出去好几千人。有人说，兰新公路不断有大部队经过，军车一辆挨一辆，一眼望不到头。车上有大炮、坦克，都用油布蒙着。还有人说，苏修准备从马鬃山斜插到祁连山，一刀切下去，想把新疆和河西走廊一口吞了。

这些传言，来自零杂工和看场犯人，也有人从报上披露的情况来猜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人际关系的道理其实也一样，一旦反目仇恨更深，巴不得对方从地球上消失了。

中苏之间的斗争一触即发，再愚蠢的人也感觉到了。

9月份，农场开始排碱沟清淤。秋收罢，我的脸上留下四个大坑，两只眼窝深陷，两腮帮深陷，颧骨高耸，体重与外形都回到住病号室的状态。不过我的身体变结实了，毕竟我还只有三十一岁，

个把月就开始恢复过来。

老排碱沟因盐碱水浸泡，沟帮大块大块地坍塌，必须清淤疏浚。沟里的水浅处齐膝，深处有一人多深。水呈淡淡的黄绿色，水里长满芦苇，密密的有两人高。清淤不但要挖淤泥，还要割掉芦苇。看着沟里的水，犯人个个犹疑不前。组长霍效贤捋起裤脚，一步一步往下试探。我一头扑进水里，游了几下，水不凉，温嘟嘟的。嘿，还有鱼哩！其他人纷纷涌到水里，一边干活，一边捉鱼。

内地河里的鱼我认得不少，多能叫出名字。这儿除鲫鱼外，最常见的一种棍棒状的鱼，它的背鳍和尾鳍都很短，我不知其名，称之为土鱼。我捉得好几尾，其中有尾稍大的鲫鱼，足有三指宽，二两重。其他人将所得一并送与我，收获共有二十来尾。

我们泅进水里，齐根割断芦苇；而淤泥就只能一点一点从水里捞挖，出水后把水滤去，再将淤泥撂到沟顶上。这个进度很慢，带队管教站在沟顶看，也不催。大约秋收刚过，有意让犯人喘口气吧。

排碱沟紧挨着林带，其中的沙枣树已经是硕果累累，果实黄里泛红，快成熟了。沙枣树浑身棘刺，长得不高，跳起就可摘到。饥饿的人不肯舍弃任何可食之物，休息时大家折腾一阵，摘了不少。可惜这东西又苦又涩，很难下咽，吃进肚的却不多。

回到监舍，我把鱼放到脸盆里，倒上清水，搁在门外的窗台上。我心想星期天去伙房讨撮盐，用大茶缸清炖，也可解解馋。我已有十年没闻过鱼腥了。

隔壁是杂工组，有几个老弱病残，他们不出工，只在大田犯人出工后打扫院子，再就是干点捻毛线之类的活路。有个姓马的瘸子，回民，四十稍过，平时最爱下象棋，棋艺不错。每个星期天他都在院里下棋，围观的人不少，有时还争争吵吵。我经常观战，并不对弈，马对我颇熟。那天，我正准备对盆里的鱼下手，他来了，站在我身边说：“给我一条吧。”我有些舍不得，既然他开口讨，不给又未免太小气。我问，要一条，干啥？他说：吃啊。我说：一条鱼，这么小，怎么吃？他说：活吃。我还没听过吃活鱼的。你要哪条？我要那条最大的鲫鱼。好吧，我同意了。没想到他竟捉起那条鱼就

摺进了嘴里，一扬脖吞下去了。

我把这盆鱼全送与他，他只一阵功夫全活吞了。那美滋滋的样子，叫我好开心，好羡慕。世界好多奥秘，人们认知还太少。比如这排碱沟的鱼是从哪里来的？它自身没有水源，从地下渗出来的也是盐碱水。人的食道分明没有三指多宽，他怎能活吞下三指多宽的鱼呢？倘非目睹，我断然不敢相信。

国庆节后不几天，监院里忽然来了一大帮人。大队、中队的管教陪着他们，东转转，西看看，一声不吭走了。从年龄和步履姿态看，虽着便装，也能判断出他们是军人。他们一走，监院里立刻有风言风语，说饮马农场即将成为战场，犯人都要调走，部队要来接收。

12月，天气很冷的时候，我这中队发生了一件大事：陈洪太逃跑了。

陈洪太在七小组，四川人，年龄比我小四五岁。他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颧骨又高又大，长相酷似我在看守所南号认识的薛克明，那个偷炒面、刮猴头木勺的人。陈洪太平时很喜欢下棋，不过棋艺臭，棋德也差，下棋爱悔棋，观战又多嘴多舌，最爱与人争吵。要是别人不听他的，他便喧宾夺主动起手来。总之是一个自以为聪明的角儿，不过没惹出过什么大麻烦。

他竟然跑了，能跑到哪里去呢？这里只有一条兰新公路，路一卡，在戈壁只有等死。果然，第三天他就被逮回来了。据说是在玉门镇火车站被捕的，警察在那儿守株待兔。陈洪太被捆得铁紧，模样像只小鸡，全身都是灰土，被摺在七组的监舍门口。接着干部又在犯人中找同谋，挖后台，开小组和中队大会，把他批斗得死去活来。只是无论如何斗他，他什么都不说。批判他的会本来还得开下去，中途又有一起突发事件。

12月末的一天，大田犯人正准备出工。突然有人喊：“今天不出工，现在排队到前院开大会。”

前院较宽敞，凡开大会都到那里。院里站着一堆大队、中队干部，农业队犯人已齐整地席地而坐。

大队教导员是位皮肤松弛、下眼皮发泡的人，秋收动员会上见过一次。他说了这么一番话：

你们也都知道，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这儿即将成为战场，成为埋葬苏修的坟墓。你们虽犯了国法，是犯人，政府还要替你们负责。为了你们的安全，决定把你们调到更安全的地方。给你们三天时间准备，整理行装，伙房预备路上的干粮。在待调的日子里，不准搞串联，不准造谣生事，不准传递小道消息。凡违规违法行为，严惩不贷！

“你们听见了吗？”

“听——见——了。”满院回应。声音软塌塌的，拖得长长的，透着故意和无奈。

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战备大转移，从安西至武威，在漫长的河西走廊有许多劳改农场都要搬迁。听说除了较大的农场如饮马农场外，像新华农场等等全要一锅端。这么多犯人加起来，至少有十多万吧。命令下达得很突然，很紧急。

准备行装于我只需三分钟，铺盖一卷胳膊窝一夹即可动身。就是最啰唆的犯人，两小时也足够了。与以往不同，这次犯人可多带干粮，想拿多少拿多少，只要你拿得动。这一点暗示了行程的遥远。犯人饿怕了，自然尽量多拿，二两一个的白面饼，有人带上了一百多个。饼子一律裹在被褥里，打成背包。

我只要了二十个面饼，数量在犯人中最少。我心想：今天还不知明天死活，拿那么多沉甸甸的，没有必要。邹庆礼不同，他拿了七八十个。我批评他太贪，他朝我笑笑，不与我理论。

我、邹庆礼、周有祥等一大拨人，我们到前院一间大屋里集中。这时我才知道，犯人并非一次同时走，而是要分期分批。我们去的也不是同一个地方，我这拨最先走的，都是刑期长的重案犯，我们属于最危险的敌人。

大屋里东半边是农业队待调犯人，西边是基建队待调犯人。薛守志来了，他不在首批调离之列，他来与他们队上即将调离的难友

告别。我与他相距数公尺，但不是同队就不能走到一起说话，到处有贼眼盯着。我见他一直注视着我，眼里深怀感情，有爱怜，有期盼，有祝福。看望其他人是由头，他是专来向我道别的。我恨不能跑过去拥抱他，可我俩谁都没动，只能远远地互相凝望。环境太恶劣，麻烦已太多，谁也不愿给对方添新麻烦。

薛守志，我的好兄弟，你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何案”一年多，该有个说法、有个交代吧？交代个屁，向谁交代？谁又敢承受这交代？没整死你，算你命大，把你整死也是活该。该感谢英明、正确、伟大呢，还想干啥！

我去了大队医务室，向贾克医生和边立林道谢，也是告别。谁知贾大夫与数月前判若两人，瘦得不成人形。他卧在床上拉着我的手，慢声细语对我嘱咐道：“你还能服务社会，不要故意作践自己，千万要保重啊。”

他是个慈善又坦诚的人，看着他病恹恹的样子，我有种不祥的预感，心里很难过。

出得门来，又到后院转悠；眼前满墙依然是语录和准语录。我忽而感觉到，这儿不像劳改犯的营地，更像毛泽东思想的殿堂。

到玉门镇火车站的时候，月台上黑压压地已经站满了犯人。公路上的犯人大军仍连绵不断朝车站涌来，人流车队仿佛无穷无尽的样子。天将黑我们才登上列车，仍然享受闷罐子优待，和三年前来饮马时一样。车开了，罐厢里黑糊糊一片。没有光线，无法辨别东南西北，也弄不清是东去还是西行。

火车开得很慢，走走停停。有时刚启动没走多远又停下来，一停就是好长时间。我浑浑噩噩、混混沌沌，一觉醒来复又睡去。我什么都不想，脑子里一片空白，任凭命运之神把我拖向前方。一个闷罐车厢里装了一百好几犯人，不知走了两日两夜还是三日三夜。我只想睡觉，瞌睡出奇的多。最后车终于停靠下来，这里是终点站——青海省湟源车站。这一路，从玉门镇到湟源，车门从没开过，犯人命比牲口贱，不怕掉膘、渴死、发瘟。

到湟源是个大清早，我看到车站的屋瓦、帐篷上，目力所及的

荒草枯树上都结了霜。车站及四周列队站着全副武装的军警，他们威风凛凛，一色的皮帽、皮大衣。四面八方看去，只见车站屋顶和车站两边的山坡上，都有军人架着机枪。荷枪实弹的军警个个岿然不动，只有戴袖标的管教人员来回咋呼，赶犯人去上厕所。

出站以后，我看到公路上已经停靠了一色的解放牌军用卡车。每个管教领着所管辖的犯人，爬上事先已编好号的卡车。管教进了司机台，坐在司机旁边。最前面一辆武警车开路，在载满犯人的这台车的驾驶室上架着两挺机枪，车上的军警全端着冲锋枪。然后是五辆囚犯车，后面又是一辆相同装备的警务车。

我坐的是八号车，卡车离开湟源站不甚远便开始爬山。山路蜿蜒曲折，崎岖不平，车有时摇晃得厉害。八号车已爬到半山腰，我回头一看，呵呀呀，多数卡车还在山根，好一个长蛇阵，足有几十里路。我数不清汽车到底有多少，从未见过这许多的汽车、这么壮观宏大的场景。汽车爬了一上午的山，中午时分才到山顶。山顶是个颇开阔的平台，中央处立有一块碑牌，上书“日月山”三个遒劲大字。

到了这里，车队停下来，犯人开饭、解手，管教和武警也忙于此道。司机除此之外还要检查、保养车辆，他们的神情认真严肃，好像在准备接受新的挑战。

日月山，大名鼎鼎，我早从地理书上得知。倘不劳改，难有到此一游的机遇。汽车上山足足用了三四个小时，可见它的陡峭险峻了。在山顶停歇了两小时，我们重又上路。这时开始走下坡路，方知此山真是易上难下，下山之路陡的了得。道路又窄又滑，弯道也多。窄处只能单车下行，无法错车。从车上俯视山底，崖壁齐刷刷的如被刀削剑劈，看上去都有如临深渊、如探地狱之感。胆大的人会头晕目眩，胆小的吓得赶紧闭上眼。满车的人和司机一样紧张，大家都是全神贯注，屏声敛气。可以想见此时的司机瞪大了眼睛，头上沁出虚汗，不停地手脚联动操作。

我们车后有车紧跟着，两车相距不过五至十公尺。急转弯太多，吱吱的刹车声，声声不断。车开得很慢很慢，一律空档，如蜗牛爬

行。我们在车内也听不到发动机的轰鸣。感觉这车是一步一捱地滑到了山脚，全车的人才长长吁了一口气。

只见沟底躺着两辆教练车，已是粉身碎骨，看不出汽车的原状。

就这样，我们到达了新的圣地——青海省贵南巴仓农场；时间大约是在 1970 年元月 10 日前后。

第五章 日月山下

一、最初印象

听说这儿叫巴仓农场，心中生出几分欣喜。巴仓出了个大英雄门合，誉满全国。报纸上宣传颂扬，无人不知其人其事。门合是民兵教导员，他带领民兵制造土火箭驱云防冰雹，不慎突发事故。在土火箭即将爆炸的千钧一发时刻，他扑在火箭上，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战士和群众，壮烈殉职。如今到英雄的故乡服刑改造，我想这儿的环境和干部群众觉悟都应该不错。

然而，生活又一次欺骗了我，就像 1958 年我在全国闻名的红旗县甘肃武山县“劳动考察”一样。在怪圈里的人必须循着怪圈走，最“红”之地往往是假得出奇，是作假最肆无忌惮、最猖獗之处。我在这儿的遭遇，证明此论并非虚妄。

在巴仓农场，我经历了人生最难熬的岁月，那苦甚于在看守所关小黑号的日子，我几度濒临绝境，险遭灭顶之灾。

这地方远有祁连山脉，近有日月山两道屏障，交通极为闭塞。它不怕外敌侵袭，不怕犯人逃跑，安全保险，是改造犯人的好地方。这里又是少数民族（藏族）地区，茫茫草原无边无际，天高地阔，人烟稀少，属高寒地带。气候奇冷，环境潮湿又缺氧，初来乍到的人会觉得呼吸困难，憋得慌，过一小会儿要来一次深呼吸。

巴仓农场管辖三个劳改大队，我和邹庆礼、周有祥同分到二大队的五中队。周在二小组，我与邹分在四组。与饮马不同，那里一个站辖两个中队，两个中队的犯人划分到前院和后院。这里二大队辖四、五、六三个中队，每个中队有犯人两百多人，各有一个小院。

院子朝监狱大门敞开，监狱大门顶上的哨兵能一眼看清各院的动静。靠狱门两边是三个中队的伙房，紧挨大门有个碉堡式建筑，后来我才知道，这里有惩治犯人的禁闭室。

我们这些新来犯人住在临时搭建的窝棚里，这排窝棚靠院西一侧；它贴着六中队高高的后山墙，棚子低矮，人进门要低头。不仅如此，而且棚内极其潮湿，新墙几乎都能渗出水来。它盖得过于匆忙，简陋得无法形容，还不如关牲口的厩栏。每间棚屋不足二十平米，还分了里间、外间，中间有截矮墙。就这样的棚子间，要住二十个犯人。屋里除了土炕还是土炕，进门只有一平米左右的地面。

土炕用土坯围着，里面摆些烂土坯，上面铺的青稞秸秆，硌得人浑身生痛。这一平米地面四周的“炕围”上砌有一个个方洞，那就是放鞋的地方。因为只有十几个方洞，有的人脱了鞋没处放，只好拿鞋当枕头。在这一平米地面上还有个小火炉，也是土坯砌成。日用的脸盆、漱口家什和饭具则一律放到门外贴墙的院中。在这儿睡觉十分拥挤，就和1962年我在看守所南号一样，睡觉时一个紧贴一个，还必须侧着身子。挤倒是有挤的好处，挤着暖和。

正值隆冬时节，窝棚的门、顶盖、土坯墙，八面透风，冻得蝎虎。可供取暖的仅有一只小土炉，里面烧的是杂工组从草原上拣来的牛粪马屎，一块块像大饼的模样。粪火淡红，热力虽有限但还管用，有时一屋人全睡死了，炉子一灭，都冻得醒来。这时就要有人重新去生火点燃炉子，不然这一夜很难熬过去。

院的另一面是原有的房子，砖木结构，很高，比窝棚高出一倍多。门窗也很正规，共有两大间。一间住的是杂工组，约有三四十人。另一间住着伤残组，有十余人。那屋内也是一圈炕，只有炕圈是砖砌的；屋里空地很大，足可抵一个小组的窝棚。屋里左边和右边各支了一个大炉子，和窝棚相比，这儿的人就算住的是高楼大厦了。这两个组的人都是巴仓原来的老犯人，他们来自江苏、浙江和上海，也有个别山东人。这些人都在解放初的土改、肃反和镇反运动中被判刑送来的，他们在这里都已服刑十五年以上了。

伤残组犯人有明显的肢体残缺，严重者自臀部以下全被截掉，

看上去只有上身，他们在截肢处捆个牛皮蒲团，双手着地，一掌一掌地移行。有的人从膝盖处截肢，有的人从踝骨截肢，还有的人失去了五指。这些来自南国的人，开始不知这儿严寒得厉害，那时又缺少御寒衣物，肢体都是冻坏的。他们也必须劳动，干些捻毛线、织毛衣的室内活路。

原有的高屋白墙上，没刷写一条语录，这一点与饮马四站基建队形成极大反差。只有大监门外有座照壁墙，上书毛主席最亲密战友林副统帅的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

犯人伙食很糟，质差量少。这里只种青稞，一年到头吃青稞面。粮食定量很低，每人每月不足二十五市斤。平时出工日吃三顿，星期天休息吃两顿。早饭有糊糊，二十个犯人喝一小铁桶青稞糊糊，外加一个如小孩拳头大小的青稞馍，那馍也是软塌塌的。分完糊糊后，刮铁桶是值日的专利。他低头弯曲食指，从桶底刮到内帮，把铁桶刮得比舌头舔还干净。午饭和晚饭，犯人得到的青稞馍较早餐的那个馍稍大一点，副食是水煮白菜。这种菜往往是有盐无油，偶尔菜汤里有几片土豆片。莫说干重体力劳动的犯人，即使不干活蹲号子，吃这么点食物也受不住。犯人二十四小时都处在饥饿状态，一个个饿得黄皮寡瘦皮包骨。只有杂工组是例外，他们有“外快”补充，身体还不错。

我的境况也特别糟，喝青稞糊蛮顺溜，吃青稞馍就反胃，呕吐起来停不住，简直是翻江倒海，直到把黄胆汁吐出来。邹庆礼与我打通铺，我们铺两床褥子，盖两床被，颠倒睡，减少许多寒冻之苦。他见我胃口如此恶劣，便要把从饮马农场带来的白面饼给我。君子不掠人之美，这是我为人处世的信条；何况饼子是他千里迢迢带来，那会儿我还嘲讽他“太贪”，此时焉能接受他的馈赠？尽管我们的心已交汇在一处，我还是谢绝了他的好意。而他硬把白面饼往我手中塞，他对我说，你要是过意不去，就把青稞馍给我，这总可以吧。人的适应能力各有不同，有的快，有的则要个过程。我估计你用不了十天半月就能适应，务必保护好身体。他的真诚既叫我感动，又叫我愧疚。凡事要留余地，考虑周全些。我过了今日不管明天，就

不是明智之举。

某日轮到我值日，天麻麻亮时，我就提着铁桶去伙房排队打饭。伙房距监舍不过三十公尺许，小铁桶的提手是根圆铁，待我提回监舍，圆铁竟与手掌粘连在一处了。我用力一拔，手掌掉了一层皮，露出红森森的嫩肉，手背已经变成紫黑色。我冻得麻木了，还没觉出疼痛。新来犯人面面相觑，一个个大惊失色。这儿的寒冻果然厉害，万不可掉以轻心！

组长陈康年是这里的老犯人，他见我如此则安慰道：“不必紧张，只要按我说的做，保你没事，一二十天就好。每天出工前去伙房讨块冰，在手上来回搓，直到冰块化完为止。天天如此，莫停歇。”说完他又给我一副毛线手套，叮嘱道：“以后但凡挨金属铁器，一定要戴手套，尤其是一早一晚。”我琢磨他的方法有道理，也没去医务室，就按他教的做。每天早上一大块冰捧在手上，不停地搓，手上冒着热气如蒸笼一般，全身热量都调度到手上了。这种方法无非是“以毒攻毒”，果然两三周时间我的冻伤就好了，手上居然没留任何痕迹。

二、陈康年和他的犯人小组

我分到陈康年小组，是我服刑期间的一件幸事。

陈康年是浙江人，五十左右，小个子。他的出身、案情和刑期我一概不知。他不善言谈，劳动特别卖力，管理小组的方法就是以身作则。手脚麻利的他捻毛线，织手套、毛袜、毛衣、毛裤，样样在行。副组长叫陈阿三，与陈康年岁数差不多，上海人，是个病秧子。他有严重的哮喘病、肺气肿，有时痰咳不出来，憋得满脸猪肝色，整个冬天都不能出工。每个组都有几个老犯人，除两个组长外，我还记得肖恒，其他人皆无印象了。

肖恒是个老头，六十有余，瘦得没法形容，脸上除了骨头就一层皮，刮不出一钱肉来。我只知他是赣南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以后在浙江成家定居，解放前还当过县里的参议员。这是个倔

老头，脾性率直，为人坦诚，凡看到不平事，他天不怕，地不怕，总要说出来。

老犯人都住外间，里外间只在一平米的“豁口”相通。

在这个组，和我一起来巴仓的“新鲜血液”共有十几个成员，有的来自饮马农场各个站，有的来自安西新华农场，除邹庆礼外，其他人我都不认识。如今我脑海里依然有印象的人有陈凯仁、吕用生、吴海清和马成功。

陈凯仁是甘肃临夏人，一个漂亮青年；他肤色很好，文质彬彬，举止谦和。吕用生是天水北道附近农民，一脸麻子，他是小组最棒的劳动力之一，为人也不错。陈和吕二位与我年纪差不离，都是三十出头。吴海清，大我们十岁，农民出身又不像普通农民。他个性老成持重，从不表露自己思想和任何情况。马成功是回民，三十七八岁，临夏州某县人，平时少与人交往。吴和马也是小组里的棒劳力。

经验告诉我，生活越困难，人的动物性本能暴露得越充分，人与人之间越要争抢，打斗，如为分食不匀等等。但在我们小组，这种情况竟没有发生过，大家和睦相处，彼此间常有互助。社会上“文革”正酣，尔虞我诈，而我们劳改队小组里居然保持了一团和气，这不是很难想象吗？然而事实却是如此。

巴仓农场靠天吃饭，没有水利灌溉一说。地块上因地制宜无地埂，大的地块有一千五百亩，小的也有六至八百亩。四周的藏民还处在刀耕火种时代，与之毗邻的劳改队，其生产方式自然也先进不到哪里。

一开始，我们的劳动是耙土坷垃，烧灰堆，为种土豆准备肥料。工地都较远，最远的地方有七八公里，最近也有一公里。劳动工具是铁耙子，每组一大捆，存放在监狱大门外的工具房。出工时，值日犯人扛着工具，到工地才能打开，人手一件发到犯人手中。每个组都有年老体弱者，空手走路跟上大队已很艰难，二十把钉耙少说有四十市斤，路上还不准停下来歇息，恹恹病体的老弱轮值者不堪重负。据说轮值制是公平的，大家吃的口粮一样多；至于年龄嘛，

只怪你出生太早，有什么好说的。年轻犯人路远扛一捆工具，也够喝一壶的；老弱每轮值一次，颤颤抖抖犹如抽筋剥皮去地狱走一遭。

独我这小组与众不同，肖恒等几个老弱犯人，一律豁免轮值扛工具，全由陈康年一人替扛了。不仅如此，但凡路远些，有年轻犯人轮值时，他也总是出其不意，突然从你肩上抢过工具捆，帮你扛一阵。

到得工地，陈康年叫我用一只大筐运草放堆。马车将青稞秸秆运到地边，那儿离小组劳作处还有一两百公尺远。我将草堆放下，约五公尺一堆，一个小组占两行，草堆放两行。所放草堆即是灰堆圆心，大家绕它从四方八面将土坷垃耙拢，围成直径不到一公尺的圆，然后将草点燃，将土坷垃立即覆盖其上。干这个活的技术在于，既不能让草快速燃完，又不能叫土坷垃将火压灭成了死堆。新来犯人一时难掌握，陈康年都逐一指教。后来他干脆叫新犯人只管往前耙土坷垃，由他领几个老犯人在后面点火覆埋，工效提高不少。

我的任务也不轻松，它要速度快，一人端着草筐来往奔跑。每跑一趟我都要停下来，大口大口喘气。其他小组放堆的人都是一窝蜂朝前冲，你不紧跟看齐不行。落在后头意味着消极抗拒，反改造，而且还要影响全组。

犯人蛮喜欢烧灰堆劳动，虽然紧张但活路不算太重太累。更主要的是，犯人还另有所图。土里有时能找到一种干瘪的植物根茎，它有香烟般粗细，五六公分长，呈淡淡的黄色。老犯人称它作“人参果”，新犯人称它“小人参”。我不知其学名，猜它与南国的野萝卜同科属，秋收翻地后经太阳晒过，叶冠脱落只留根茎，最后成这个模样。犯人手里的耙着土坷垃，眼睛却盯着找它。一旦发现立刻弯腰拾来，往身上一蹭，就撻进口中。我在前面运草放堆，无此口福。休息时候，大家正乐陶陶地议论着它；陈康年来到跟前，掏给我一大把人参果。我尝了，味道确实不错，脆脆的，还有丝丝甜味。陈康年是个很心细的人，他还带回了一些给陈阿三品尝。

也许，有人嗔怪我写的这些小事很平淡，不足挂齿；那是你无法身临其境去体验。在当时那种境况下，有人干活时帮你扛工具，

休息时拿出一把人参果给你，这是何等可贵！我现在回忆起陈康年的行为来，仍是怦然心动。那时物质极端匮乏，常年食不果腹，人们终日能想到的只有两点：一是尽量减少体能消耗，二是寻觅一切可食之物。寸力如金，粒粟关命啊。

一分到这个小组，陈康年便叫我当记录员。说来甚觉奇怪，在漫长的服刑岁月中，我从没当过一天犯人组长，可始终伴随着记录员的头衔。我不知是组长相中了我，还是当局有指示。在我的档案中，狱方究竟写了些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即如眼下，邹庆礼君的文化程度就在我之上，却偏叫我当上了记录员。

我和邹君也受到陈康年精神的感召，小组不再设轮流值日生，大家争先恐后地自觉扛工具。只要你工具在肩，总有人想着；不多会儿便有同伴从你肩上“夺”走。那种感觉真是好极了，你生活在这个小集体里，是它的一员，莫名的温暖从心底油然而生。我忽然有所感悟：在非人的环境里，一个人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并非独善其身；而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仍然能以行动去体现自己的道德信念，证明它存在的价值。

我对眼前的烧灰堆劳动则有所质疑，我认为它带有破坏性，弊大于利。在草堆燃烧和土坷垃压堆过程中，大量的氮素、磷素和微量元素被糟蹋了，只得到有限的钾肥。这还不算，它还破坏了土壤的团粒结构和原有的根瘤菌，得不偿失。我痛彻地感到，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人的思想以及人身权利方面，我的古老民族仍处在蛮荒时代。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国才有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的举措。

整个冬天里，气温都在零下20~30摄氏度，寒冷透骨。大田犯人收工回来，囫囵几口晚餐，再无心无力去洗漱，只想快快焐到被子里。陈康年嘱咐我，晚上读报只念一篇文章或一段文字，让大家早些休息。

不到九点，除杂工组有点响动，大田小组都沉入了黑暗与死寂中，院里兀立着三只尿桶，像三个矮怪物。

三、听来的“故事”

对门杂工组犯人都是幸存者，不但生命力强且富有生存本领。他们在一定意义上是此前那批犯人中的佼佼者。杂工犯人都是单个劳动作业，天不亮就一个个喊着“报告班长”出工了。这些人打扮得多姿多彩，半像汉人，半像藏民，有几分流寇气息。他们头戴皮帽，脖围狐皮，多数有翻毛皮背心或皮筒短大衣，脚蹬毡鞋，鞋子也是圆通通的。这些穿戴都是他们的手工作品，来自从大草原拣拾的东西，再经过加工制成。这身装束粗陋难看，却很实用，不然就无法抵御藏区的奇寒。

杂工组犯人每人背条麻袋，这是唯一的劳动工具。他们在大草原上从早走到晚，每天的路程甚至长达五六十华里。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拾牛粪马屎，但凡犯人用得着的东西自然也不会放过。从荆棘丛中、草蓬里，可以捡拾到一绺绺骆驼毛、羊毛；从沟沟岔岔处往往能拾到死羊羔，还有藏民丢弃的牛羊下水。偶尔甚至能捡到整只死狐狸、死狼……直到天黑尽，他们才背着一麻袋东西，拖着疲惫的双腿回到监房。有口福的人，将捡到的死狗烂猫开膛洗净，丢到两只大铁桶里。接着，炉火旺旺地直燉到天将破晓，几个人端着大碗，分而食之。这过程弄得满院子飘起肉香味，大田犯人闻着无不馋涎欲滴。

大田犯人羡慕他们却不嫉妒，对他们没有恶感而且深怀尊敬。没有他们，大家的冬天如何熬得过？伤残病犯的蒲团从哪儿来？老犯人几乎人人有毛衣毛裤、毛袜手套，这些材料来自哪里？他们是大田犯人的福音，感激还来不及呢。

春节前几天的一个夜晚，吕用生在院中小解时，捡回一只狐狸头。这是杂工组丢弃之物。吕用生视为宝贝，他不吭不响，在炉子上燎掉毛，刮了又洗，洗了又刮，一直忙了个把时辰。到天亮，他把狐狸头撂进小铁桶，对陈阿三嘱咐道：“别忘了给炉子添火，要燉得烂烂的，晚上收工回来，人人有份，都喝口肉汤，解解馋。”

收工回来，满窝棚全是腥、臊、臭味，臭得受不了，有人呕吐

起来。吕用生道，不怕，我有法子祛除这异味。他不知从何处弄来两块新砖头，囫囵洗了洗，丢到桶里，又煮一个多小时。接着他提起狐狸头来嗅了嗅，啧啧道：“唔，不错，一点怪气味没有，请各位品尝！”然而，无论他送到谁面前，大家都谢绝了他的好意。他只好美滋滋地独享，把那半桶汤全倒了。

1970年2月过阴历年，巴仓农场放了五天长假。生活和平时一模一样，没有任何改善，我待过的劳改队都不曾有过这种做法。犯人都有怨气和怒火，只是相处日子短，人心隔肚皮，无人敢骂出声来。

院子里很冷，空无一人。大家焐在被子里听肖恒等老犯人讲故事。陈康年把炉子烧得旺些，一个人站在地上捻毛线。还有些人正蒙头大睡。讲故事的人东一句，西一句，开始不连贯，讲的都是巴仓过去发生的事：

你们以为现在很艰苦、很冷，是吧？我们刚来时，那才叫苦呢。这儿什么都没有，住在荒野帐篷里，到处都有狼嚎。发的馒头冻得比石头还硬，啃一口只一道牙印，没法吃，开水也喝不上。现在好多了，十成好了九成。

你们见过冻死的人吗？有一次跑了两个犯人，只跑得二十多里都冻死了。在一个避风的崖壳下找到他俩的尸体，姿势已经凝固，双手护在裆处，脸上露着笑。两人表情和死状一模一样，怪怪的。临死怎么还会笑的呢？

你们过去劳改的地方，“文革”搞得咋样？嘿，我们这儿才热闹哩，“早请示”，出工时犯人在大门外对着照壁墙林副主席的语录鞠躬请罪，反改造尖子戴高帽，他们要跪地磕头。“晚汇报”就是每晚开批斗会，用毛主席语录斗争反改造尖子。

有天早上出工，刚到工地，×组有个犯名叫×××（*言者有名有姓，可惜我不记得），面对东方，迫不及待掏“家伙”撒尿。当时红日冉冉升起，有丈把高，于是有人检举他是故意污辱伟大领袖毛主席。从此天天晚上开他的批斗会，打得他死去活来；又逼他交代反动思想，差一点要了他的命。这里安静下来才不到半年。

我刚来巴仓，以为这儿政治氛围不错，不像饮马四站，语录满天飞。没想到这儿比饮马还左还凶，且更荒唐。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些故事陡然增加了我的警觉与清醒。

其实，这些算不得什么，听了下面的故事我更是目瞪口呆，半晌出不得声。这是位“补鞋匠”的故事——

这是几年前发生的事。有个犯人称×××（好像姓黄），在二大队六中队改造，浙江人。他在浙江判刑不久，就给劳改部门主管写信，称他会炼金术，愿戴罪立功，为国家作贡献。干部信了，让他试。他不知从何处弄来一块铜，充抵黄金，被识破了。调来巴仓，他专以小报告为业，每天向政府打五六个小报告，多时一天有十几个。他成日做着这样的梦，那就是把自己的刑期加到别人头上，争取早点出狱。管教干部对他这种积极靠拢政府的态度很欣赏，因此照顾他。他不用跟大田出工，而是留在监院里，替犯人补鞋。他心领神会，大田犯人出工后，他拿个小凳在院中坐着补鞋；此时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大田留休的病号、杂工组轮休的犯人、病残组室内劳动犯人，尤其四队、五队、六队这三个中队里犯人之间的来往，尽在他监视之中。而他又不满足表扬和物质奖励，要的是提前出狱。他知道不立大功则难如愿，于是冥思苦想，炮制出一个“现行反革命武装暴动集团”，揭发出这样一个看似穷凶极恶的阴谋大案。此案牵连了三个中队好几十个犯人，这些人有姓名，有代号，有职务，有纲领，有计划，作案还有时间地点。被他揭露出来的最高职务是司令，下有军长、师长、旅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班长，职级一应俱全。并且，职务最高的又是文化程度最高的，旧社会的老大学生就有好几个。他把案情编得滴水不漏，由不得你不信。

上头追查下来，二大队顷刻间鬼哭狼嚎，变成人间地狱。白天黑夜开斗争会，有小组会、联组会，更有全中队犯人的斗争大会。犯人捆绑犯人，犯人吊打犯人，积极分子拳脚相加，棍棒溅血。涉案犯人有头破血流的，有被拧断手指、胳膊的，有被打得大腿骨折

的，有打断数根肋骨的……绝大多数涉案人员受不了酷刑，在“提示”下招供；职务、代号等等自然与揭发材料吻合。时值隆冬，高墙内侧挖出一条浅沟，那些签字画押的死囚，被戴上脚镣手铐一起推到浅沟里，身上无任何遮拦，任凭风吹雪埋。

首犯金（靳？）××（*我不记得名字），上海人，不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属教授一类高知。唯他顽固不化，至死不招供，结果被打斗致死，“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了上帝。倒卧在浅沟里的死囚共有六七人，上报死刑全不上诉，唯求速死。

此案上报死刑的人太多，以至于惊动了中央。恰逢公安部一位副部长有事出差青海，顺道查到此案。调来卷宗一看，漏洞百出。询问有关当事人，更是牛头不对马嘴，终于真相大白。这位副部长从枪口下抢回几条人命，阴功不小！

事后，姓金的家属从上海赶来巴仓，要求开棺验尸。她也受过高等教育，有胆有识，还请来了律师。她既不相信自己丈夫会干“武装暴动”的傻事，也不信“畏罪自杀”的谎言。她在巴仓农场场部待了几个月，听说把农场大小干部“折腾”得够呛。验尸结果证明肋骨断了几根，手臂也断了。只不知最后如何了结的。

补鞋匠的弥天大谎败露后，引起犯人公愤。管教不忘他的耿耿忠心，为安全计，将他调走了。

饮马农场的“何案”已是够凶险吓人了，没想到与这个案子相比竟是小巫见大巫。几个睡觉的人不知何时都坐了起来，竖起耳朵听得出神。

讲故事的人补充道：“这事过去好多年了，涉案者如今各中队还有人在，只是没几个了。”

我大体相信他讲的故事，但对某些情节存疑。比如姓金的妻子请来律师一说，在当时则不太可能。我对那位不知姓名的副部长非常敬佩，他何止阴功不小！在这种“现反”大案面前，干部常常明知冤枉，也会望而却步；弄得不好，轻则被认定为“右倾”，重则砸掉饭碗。别说丢掉乌纱帽，受株连进劳改队也不为怪。一般干部

不会冒这风险。

我对巴仓农场的改造环境总算有了初步的认识。

我和邹兄彼此讲着自己的故事，不是高喉大嗓，而是窃窃私语，互相增进了了解。邹兄大我两岁，学业上高两届。他毕业于四川医学院颌面外科专业，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从小就受到与人为善的熏陶。大学期间他有两个要好的同学被打成右派。组织上动员他检举揭发，划清界限。他觉得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揭发，因此拒绝了，最终受到株连被内定为右派，黑材料塞进他档案。他的情况与冯淑筠君相似。冯淑筠被划成右派，邹兄则是提前半年毕业分配，到了甘肃卫生厅，然后再分到临夏州医院。他在医院工作兢兢业业，但政治和经济待遇都与别人不同，而是按照右派来对待，处处遭白眼，甚至比右派还不如。为了立身活命，他给某外国使馆写了封信，想出国谋职，遂构成大罪，被说成是“偷听敌台，图谋投敌叛国”。他就这样成了现行反革命，被判十五年长刑。他被捕后，先是羁押在兰州八里窑看守所；在此他认识了我的同案同学张春元。他与张虽然不同监号，但也听闻过我们案子的许多情况。邹兄说，张春元在八里窑看守所深得犯人同情和尊敬，后来在别人帮助下脱逃出去。那个地方高墙电网，戒备森严，张春元竟然能够逃出，我简直难以置信。

邹君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我至今没忘。他说：

八里窑看守所有个犯人，与我同号，睡我旁边，是个小青年，回族，只有十七八岁，被捕前在兰州某中学读高中。1959年饿死人的情况大量发生，他义愤填膺，只身骑车一路撒“反革命传单”。被捕后关押不到半年，被判死刑，立即执行。在等待最高院批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奇怪事，我至今无法理解。每晚半夜，他的头跟前站个人，这个人偶尔也移到我的头后。我是学医的，不信邪，偏偏这一切真真切切。我还做了个梦，我梦见一个地方，两边都是墙，只有一条窄窄的甬道；甬道里塞满了乱七八糟的破桌烂椅，一直堆到天花板。天黑，依稀还能看见人影，我和他不停地攀啊，爬啊，

试图从这些桌椅板凳中穿出去。我在前，他在后，我们互相鼓劲加油，累得大汗淋漓。可前面的破桌烂椅还有很多很多，总也攀不完，好像是无穷无尽。我攀爬得比较顺利，他在后头不时踩塌桌椅跌倒。我在前面不断喊他，开初他还答应我，待我攀过最高峰回头再呼他，竟无回应。我一惊就醒了，没过几天，他被执行了死刑。

我也把看守所期间做的梦一一向他说了，又说了在饮马四站住病房时的梦中情景，我听见乔占瑞大声叫我。

邹也认识乔，他告诉我，幻视幻听，做梦以及各种潜意识的产生，都是大脑神经的产物。或许，除了视、听、味、触，还有其他感觉存在，人们只是现在尚未认识罢了。

四、种土豆撞上“恶煞”

4月了，我们开始为种土豆做准备：翻土豆窖，切土豆籽。翻土豆窖是犯人最爱的劳动，胜过耙土坷垃，烧灰堆。老犯人对此简直望眼欲穿，新来犯人还体会不到这心情。地窖在一条约一公尺宽的地沟里，地沟有两公尺深，地沟里两边都是土豆窖。窖口用一捆青稞秸秆堵得紧紧的。取掉草捆，就能看到小小的窖口。人须得趴得平展展的才能钻进去，一般是两个犯人一起翻一窖土豆。

进到窖里，不禁笑逐颜开。这里见不到干部武警的面孔，就像到了“自由王国”。犯人都饿得发疯了，来不及说话就拾土豆；各人拿起土豆往衣上一蹭就“咕渣”起来。吃过一阵，老犯人才来指导新犯人识别糖化土豆的方法：土豆皮泛红的即是。同窖的老犯人对我说：“我挑一个你试试，味道好极了，像苹果和梨，又甜又脆。”

小时候，我也吃过生红薯、生豆角、生豇豆；可是吃生土豆还是头一次。我拿起一尝，虽没他说的那么美妙，口感却也不错，能吃。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填肚子再说。我俩谁也不说谁，等肚皮舒服了才来翻窖。

翻窖，就是把冻的、烂的土豆挑拣出来，免得传染好土豆。在挑拣过程中，一发现红皮土豆，我俩便塞进嘴里。尽管肚皮已经胀

鼓鼓，仍不忍放过，土豆把肚皮撑得滚瓜溜圆。我们进度奇慢，一上午只翻了一个窖，不到三五百斤土豆。干部问：“拣出烂土豆并不多，怎么这样慢？”犯人都说，窖里光线太暗，又需一个个仔细察看，害怕有烂土豆蒙混过关。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犯人巴不得天天有翻土豆窖的好事。

可是翻土豆窖只需要三四日功夫，这几天里，老犯人都精打细算地过日子，大家尽量吃生土豆，把青稞馍攒了下来，以便翻完窖后肚皮还能好受几天。新犯人学他们样子，也把生土豆吃到肚皮饱 and 状态。

接着是切土豆籽，这个活路是在地面上干，就在干部眼皮底下进行。犯人此时是有贼心无贼胆，大多不敢贸然偷吃土豆。只有少数人大胆，他们乘干部眨眼的瞬间，赶紧将土豆块摞进嘴而不动声色。一个土豆切三四个坯种，切好的土豆籽随即拌上杀虫药，以防播种后被虫咬鼠啃。待农药拌好后，带队干部才放心离开。哪知偏有人不怕杀虫药，抓一把在身上擦擦，照吃不误。

我悄声问那位：“这还敢吃？”

他笑笑答道：“杀虫药杀的是‘小虫虫’，我这样的‘大虫’它杀得了？”

确实，无人吃出毛病来。他的话我无以应对，但我心里明白，杀虫药确含有毒成分，它对人体肯定是有毒的，只是短时间没反应出来而已。但我又如何向饥饿的人们解释得清，唯我和老邹不碰那些拌了药的土豆。

饿疯的犯人，谁还顾得这些。

翻窖和切籽这几日，犯人生活稍有改善。那些挑拣出来的冻、烂土豆，还有切籽剩下的土豆芯随即由伙房运走，犯人的菜里每顿也有几块土豆疙瘩，至少在视觉上可以得到一些安慰。

4月中旬开始种土豆了，这儿的土豆是犯人的命根子，人人都很重视。到了地里，各组一字形排开，每组占四趟，两趟共用中间的一行灰堆。撒籽的犯人端着脸盆，挖坑和施肥的各拿铁锹。前边挖坑的，一行只用一人，挖出一锹土放在坑边，棵距约四十公分，

撒籽的一人撒两行。多数犯人负责施肥和覆盖土豆籽，他们从灰堆挖一锹草灰（百分之九十九是烧过的土，泛着黄色），一锹施四五个坑，顺便将土覆盖。大家态度认真，依次往前翻，速度极快，一千多公尺长的地块，一上午要打个来回。

一个灰堆只有六、七锹草灰，要分施到三十多个窝里，每窝不能多。多了，有的窝就无灰可施。我正来回奔忙，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

犯人把所有武警都叫“班长”，把干部叫“队长”。这天带工的队长，我忘了他是姓郭还是姓葛，实际职务我也不知道。这个队长走到我面前，用手试了试我铁锨里草灰的温度，对我厉声骂道：

“这么烫的草灰泼到土豆籽上，不怕把土豆籽烫死吗？你这混蛋！我看你是有意搞破坏！”

郭（葛）队长年近五十岁，高大个头，是个河南人。听说他以前是国民党军队的下级军官，解放前夕大军压境之时起义。不知何种因缘，他混成了劳改队的管教干部。我来巴仓四个月，不曾与任何管教干部打过照面；这还是头一回。只见他眼里喷出凶焰，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心想：“大白天撞上鬼了，且看他把我咋样！”

他吹响哨子，大喊道：“集合！”

喝，他要拿我开刀示众！

我对劳改队干部中的大多数颇有看法，甚至有憎恶之情。他们中间只有少数人通情达理，例如我在砖瓦厂二中队遇到的刘指导员、一中队三分队的王队长等。大多数干部都是粗暴蛮横之人，我尽量躲着他们。我觉得与这些人冲撞起来，招致杀身之祸，不是我希望的死法，划不来。可偏偏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我撞上的竟然是个兵痞、一个不会说人话的东西，他开口就骂人。

一个中队的大田犯人列队站在我面前。

“你们摸摸他锨里的草灰！”他命令道。

有两个犯人组长出列摸了摸，没吭声，又回到队列里。郭队长吼道：“刚才比这还烫，现在是冷下来了。这么烫的火灰泼到土豆籽上，不烫死？这不是故意破坏是什么？”

他逼视着我，我很坦然。

“陈康年，你们组今晚开他的批判会！要深挖他的反动思想。你们不能再这么干了，听见了吗？”

“听——见——了。”

“解散！”

我想笑，无论如何又难笑得出来。一锹灰分散撒到五六个坑里，即使再热再烫，充其量不到一百摄氏度（烧灰堆到种土豆中间经过两三个月长的时间），热量很快就散发，就被周围的土吸收了。它最多灼伤土豆皮，断不会破坏胚种的发芽生殖，这是任何人都能想到的。这个队长愚不可及，横生枝节。何况所有犯人都与我一样操作，无一等摊凉了再施撒的。为什么他独独揪住我不放？

我对郭不止厌恶，也生出更多的警觉来。

为了证明我没有搞破坏，我拣来几颗小石头，在刚施肥的几窝土豆边上作为标记，以待收土豆时检验。必要时能对簿公堂，让事实说话。陈康年懂得我这样做的意思，不能不防。

接着重又开工，大家原样干起来，无人置理他那一套。郭队长站在地边，眼见犯人把他的话没当话，只装没看见。

晚上收工回来，郭没来小组检查落实他的“指示”。组里一切平静如常，陈康年只字没提。

在高举阶级斗争旗帜的文革时期，凡历史有污点的人莫不心惊肉跳，日子不好过是肯定的。他们中不少人成日花心思乔装打扮，拼命表现自己革命觉悟高，对毛主席的感情深，对阶级敌人有深仇大恨。他不这样就混不下去，郭就是这号人。让我颇感意外的是，新政权、新社会二十多年，丝毫没能改造他的流氓恶习，出口就骂人，素质如此低下！

这么多犯人，为什么偏偏盯上我？

邹君对我分析道，你走路抬头挺胸，目不斜视，大学生模样一点没变；全大队难找第二个，惹人注意毫不奇怪。仅从你的外表也能猜到你的出身、案情。郭有新旧社会的丰富阅历，深谙生存之道，估计他翻看过你的档案。他找大老粗的麻烦，能捞到什么油水？能

表现出他的革命热情和政治觉悟吗？不能。只有找到你头上，才能达到目的。看来，他盯上你是有备而来，以后你要格外留神。

的确，我在大学连滚带爬不过混了两年，没想到书生烙印这么深。我已服刑十一年，早已是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居然还能叫人看出模样；这说明我连外壳都没有褪掉，离“脱胎换骨”更是远得很，能不叫有些人对我额外操心？人的外在气质是内心世界的自然流露，我无意粉饰。总之，要把我变成低三下四的谄媚之徒，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五、又一次遭遇“恶煞”

青稞地全用的牲口厩肥，牲口少肥少，早在冬天就运到地里了。那肥堆稀且小，像一个个小坟包，而且根本没有腐熟发酵，一坨坨冰疙瘩撒到大田里如同眼屎，不可能满足需要。青稞全由机子播种，跟机子的是刑满就业人员和杂工组的“自由犯”。直到5月中旬，青稞才长得半尺高，大田犯人也才进地里锄了头遍草。青稞缺肥，长得瘦弱，如同形骸枯槁的锄草犯人。

这儿锄草也与饮马农场迥异，我是头一次经历。按组序，犯人一字形横排，统计用拐尺丈量，每人占两公尺宽，顺田垄往前锄。小组两端犯人负责把边，不占外组便宜，也不能叫自己小组吃亏。组内关系好的，快手带慢手，互相帮扶着。若彼此生分，只是各顾各的。我们这组在陈康年的带领下，齐头并进，没人落下。有的小组个别犯人落下老远，也无人管。

这里锄草的新鲜又在于它并非锄草，实际是划沟，而能划沟还算好的，有的只是划线。各人拿着两米长的锄头，大家都争选锄柄长的，柄越长越轻松。锄草时弓腰，前腿伸后腿蹬，顺垅划线。锄头放出去每次有两公尺多，快速拖回至脚跟，左右手不停交换，前后脚快速轮替，连续十几次（两公尺宽有十几垄）。完了以后再向前挪，这时人的两条胳膊像端午节划龙舟比赛，要疾速抡动，争分夺秒。从地的一端锄到另一端，一千几百公尺长度，真是紧张的了得。

表面看，锄草质量蛮不错，可恰恰是与青稞争夺营养的根部野草，那些野燕麦、辣浆草为主的杂草秋毫无损，它们都被划沟拥来的虚土遮掩了，好像穿了件土衣。地里尘土飞扬，犯人甩开膀子大干，看上去一派紧张忙碌气氛，效果几近为零。

管教干部事先布置了，锄草要锄到地头才开午饭，不飞快划沟行吗？

午饭后，人们东倒西歪，就地卧躺一阵，任凭日晒风吹。下午更紧张，另趟任务正等着。

这就是巴仓农场的锄草。不过，还有比这更精彩的锄草法，先按下不表。

天气一天天暖和，休息日里，监房院子也逐渐热闹起来。连伤残组犯人也拄在蒲团上，用双臂支撑着，靠手掌在地上一蹭一蹭地到院中溜达。院子里有人正在下象棋，一大蓬人围着观战。我在此认识了岑宝林，他是另一小组的，我们很快成为棋友。他劳改前是天水汽车运输公司的调度，不知因何犯法劳改。他拿过天水地区象棋冠军，又钻研过棋谱，造诣颇深。此前，他打遍中队大队，皆无对手。凡与人对弈，他必让其一子。我早知其名，又常听见他在院中大嗓门喊：棋高一着，不怕人多。

我与他相形见绌，不过无须让子，四局能赢一局。直到与他分开，仍逊一筹，三局仅胜一局。下棋于犯人是项好活动，可以暂时忘却饥饿和悲哀；尤其星期天休息时，肚皮总是不停地诉泣，叫你坐不住，睡不成，总想着下顿饭。认识了岑宝林，我与他每星期天都在院中摆战场，围观的有好几十人：挤得水泄不通。输一局者头上顶只脸盆，再输，加上破鞋烂袜，有时则贴胡子。我俩都不悔棋，下得文明；也不吭声，更不脏言秽语。围观者七嘴八舌，我们也不干预。下棋和观战的无不聚精会神，不觉间就等来开饭时间。以后我的棋瘾越来越大，出工走在路上，我俩还要弈一局盲棋；这给难熬的日子添了不少乐趣。

6月底或7月初，大田犯人有次远距离突击任务：去喇嘛沟背木头。喇嘛沟离二大队约三十华里，天还漆黑就起床开早饭。伙房

给每人发了两个小馍，出发时天刚麻麻亮。大田犯人共有一百五十号，不少是老弱者，一个个黄皮寡瘦，蹒跚地走在大草原上。道路弯弯曲曲，甚至也没有现成的路；这群行者不像俘虏，不像残兵，更像是一长串游魂。幸好路上遇不到一个人，不然会把生人吓坏。直走到午后一点左右，我们才到达目的地。这时人人饥肠辘辘，口干舌燥，忙不迭地歪倒在喇嘛沟一侧的湿土地上，大口大口喘气。

喇嘛沟两旁都是树林，郁郁葱葱。这儿有高大粗壮的松树，还有各种不知名的树。沟里溪流流淌，发出汨汨的响声。沟两旁是陡峭的大山，山上一派深绿，那儿藤蔓勾连，荆棘丛生，林子密密匝匝，遮日蔽天。老犯人指着沟南的山腰处对我说，那儿原有座很大的喇嘛寺，喇嘛沟的名字由它而来。1959年底西藏叛乱，喇嘛寺是叛军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扼守要津，解放军的大炮打不着，很头痛了一阵。据说后来是用飞机炸，才摧毁了喇嘛寺。双方在此处付出惨重代价，沟里到处是尸体，溪水也变成了红色。

我远眺山腰处，残垣断壁依稀可见。

休息一阵过后，犯人纷纷下到沟底，喝着溪水，吃着干粮。沟两旁横七竖八躺着早伐好的木头，每人任选一根拖到沟上面的小路上，等待返回命令。较为粗重的木头，由两人来抬一根，而我选的是一根重约五十~六十市斤的木头。一直处于饥饿状态的我，常常眼前发黑，心慌头晕。我没力气选更重的木头，还要走几十里路哩。

在扛木头回去的路上，我又遇到那个郭队长。邹庆礼的估计是对的，郭像阴魂一样黏着我。他从犯人队伍的后面打我身旁经过时，突然转过身来朝我鹰眼一瞪，厉声指责道：

“你这么年轻，扛这么个小木头，还不如一些年老的。你是个偷奸耍滑、消极怠工的家伙！”

这次他骂我“家伙”，上次骂的是“混蛋”。看来，指望他说人话是不可能的。我看出那眼中迸射的凶焰，像要熔化我这块顽石似的。我很愤怒，也毫无畏惧地回瞪了他一眼。太阳早已偏西，热力有增无减。我满头大汗，腹中空空，两条腿左晃右晃，软得像面条，已经开始不听使唤了。我已疲惫到极点，若不是强烈的求生欲

支撑着我，随时都有倒毙的可能。而他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身体健壮如牛，却甩着两只手，训这个骂那个，真正不是个东西。我盘算着如何对付这只咬人的虫，他却往前走了。大概他发现我头上大汗如注，而且从我的回瞪中也看出我毫不示弱了。

我承认，我的政治观点与现时代格格不入，我的思想反动。但在劳改队里我从没有偷奸耍滑，也没有消极怠工。人既要生存，就要消耗五谷杂粮，我没有理由当寄生虫。我有强烈的自尊心，或许，这是一种虚荣心抑或一种怯懦——我后来反省自问，我无法把自己变成“死皮”。我不接受其他犯人歧视我，也不能容忍管教对我的无端敲打。在砖瓦厂、饮马农场良种站和四站，我对任何劳动莫不全力以赴，从未因劳动受过指斥。

没料到在巴仓，我却一再受到郭的垂顾，他该没有瞎眼吧。

我知道，我回敬他的一瞥不善良，可能比他赠予我的更恶毒。任何人的忍耐力都有限度，这限度便是半死半活，不死不活之间；若真逼到绝处，肯定也会孤注一掷，铤而走险。

我当时就处在这凶险的境地。

我一直铭记着郭队长对我“深情”的两瞥，铭记着他赠予我“混蛋”“家伙”的雅名。此时倘若他还活着并能看到拙文，不知他会做何感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一定没忘记我对他的深情回敬，就像他对我的侮辱同样令我刻骨铭心吧。

那天扛木头，直到天墨墨黑，十点过了我们才回到监舍。我和大家都像被剔了骨头只剩皮肉的软体动物，全都瘫倒在床上。夜深沉，屋里、院里，一片哎哟的痛楚呻吟，此起彼伏，经久不息。

六、锄草和秋收前后

锄二遍草时，青稞已拔节，长得有两尺高了。

此前在饮马农场，那里有林带、排碱沟、沙包，到处沟沟坎坎，地形复杂。大田劳动警戒放得范围小，拿旗的四个体弱犯人不不停地举旗前移。劳动时得时时关注这生命线，万万马虎不得。

而在巴仓则不同，周边是茫茫大草原，一眼望不到边。这里的警戒线放得很宽，比如眼下给这一千五百亩青稞锄二遍草，警戒旗插在四个地角上，整天都不移动。只要不越出这地块，就能平安无事。这样既减少拿旗的劳动力，武警和干部也少跑路。他们就坐在地上抽烟，编传。其实警戒不过是形式，他们才不怕你跑，叫你跑也跑不了。这块地的北边是条大沟，地与大沟之间还有几百米宽的草原，大沟的另一边是个高高的平台，那儿住着藏民。他们有时也到沟这边来放牧，时下便有几个放牧的藏民跟干部、武警打着招呼，正在聊天。锄二遍草与头遍一样，不同的是，由于之前锄草时偷工减料，现在地里的燕麦肆虐，辣浆草已长得手指般粗，满地都是。野燕麦比青稞还高，杂草成了气候，喧宾夺主。犯人任务在身，哪能顾上许多。这草不能用手一棵棵拔，除非它长在田垄当中，正好撞到锄头上送命。

正锄草时，有人忽然发现一只野兔，兔子的毛呈棕褐色。这下可热闹了，大家四面围拦堵截，无奈都体力不支又手脚僵硬跑不快。瞎忙乎一阵，眼睁睁叫它逃走了，到嘴的美餐成空欢喜。继续锄草，没锄多远又有新发现：地中间有两条菜花蛇。有人还在犹豫之时，犯人马成功眼疾手快，上去左右开弓，两手分按住两蛇的蛇头，双双被他擒获。两条蛇各有两尺多长，有擀面杖粗。马成功急不可耐，将其中一条的蛇头扭断，然后从脖项处一捋到底，蛇肉好白嫩啊。接着，他像山东人吃大葱一样，就着生蛇大嚼起来。不一会儿，一条蛇下了肚。他将另一条包在擦汗的破毛巾里，挂在裤带上。我就在马成功旁边，看他捉蛇、剥蛇、生吃蛇肉，惊得发呆。一条蛇少说也有斤把肉，他算是饱了口福。我生平第一次见人生吃蛇肉，也是饱了眼福。

回到监房，马成功如法炮制，尔后他将蛇肉切成一小段一小段，撒点盐拌了，端到每人面前，叫大家各品尝一坨。大家都谢绝了，只有吴海清与他分享。他俩边吃边道：“味道蛮好蛮好。”

锄三遍草是8月份，青稞快成熟了。五中队有块地在巴仓一大队监狱后面，那是最远的地，离二大队总有十好几华里。照理，这

地块应由一大队种。以后才知，一大队全是无期和死缓犯人，他们只能在室内劳动。因此，我们队不得不去锄草。

早上出工时，杨队长布置说，今天中午不送饭，锄完回监吃饭。杨队长是五中队的中队长，他胖胖的，肤色很好，中等偏矮，四十来岁，听口音像江浙一带的人。他不骂犯人，待人态度平和。大田犯人出工多是郭队长带队，这次才由很少带工的杨队长领头。我们走了个把小时，下了一个缓坡再上坡，到了工地，已是上午十点的样子了。

这块地有八百亩，周围全是一人多高的燕麦草，构成一道天然屏障。穿过这屏障进到地里我们才看到，青稞地面貌不再，青稞没了，全被燕麦草吞噬。燕麦都已成熟炸籽，白花花的像一面面小白旗，犹如死人坟上插的纸幡。青稞得不到阳光养分，绝大多数都夭折了，剩下星星点点的几棵，长得枯黄、矮瘦，也无穗。犯人解开工具捆，每人一把锄头扛在肩上，优哉游哉从那些趾高气扬的燕麦丛中俯首穿行，从这头到那头，锄头没下肩。在地里转了一圈，任务完成了；捆锄头，往回走。不少犯人脸上漾出喜悦，难得捞到半天轻闲。我心里只有苦涩，有对胜利者的睥睨，更有对失败者的凭吊。收不上青稞，犯人往后的日子怎么过？

中队长和武警远远地跟在后面，他们聊得正开心，看都不看这边一眼。显然，杨队长心里亮得像面镜子。这块地他早勘察过，已无动锄头的价值。不然他不会布置中午回监吃饭。打个来回光走路就得半天，哪来锄草时间？犯人自然也心领神会。

这就是锄第三遍草，八百亩地彻底报废，连种子也没捞一粒回来。秋收时，干脆就没去。

“胡日鬼”时代尽出“胡日鬼”的怪事，不过，在众目睽睽下这般毫无遮掩，明目张胆，并不多见。我写的是亲身经历，无半点虚妄。经历此事至今仍健在的还有邹庆礼、周有祥、宋占荣，他们都可以证明。

8~9月份开始割青稞，比起饮马农场割麦，有同有异。相同处是一样的紧张、苦累，不同处是在于，它又是另一种“胡日鬼”。

割青稞定额非常高，每天高的在七八亩，最低也在五亩。平均下来，每人每天要割六亩以上。割的方法与饮马截然不同，这里是两人搭档，一个割，一个拉耙子，捆捆子，无人单干。

我和吕用生搭档，他在左小腿上绑块帆布，以防镰刀碰到拇指粗的辣浆草弹起来伤到腿。他不抓不扶，右手拿镰横扫，扫倒即可。青稞少，野草多，横七竖八倒一地。我在后面用铁耙将之耙成一堆堆，然后捆成捆子。杂草和青稞混一团，青稞首尾搅一起，捆子无头无尾。这时用的耙子不是耙土坷垃的那种，那是铁钉耙，较窄较沉，能挖进土里。现在的是粗铁丝制成，有一公尺宽，铁丝前端弯成一致的弧形，很轻，只在地皮上耙。吕用生割的速度极快，拉耙子须得来回奔跑，紧紧跟上，多数必须耙两遍。杂草中有各种带刺的草，夹在堆堆里，捆草时手上扎满了刺，可哪有工夫挑刺，再痛也得忍。比起小麦来，青稞少韧性易断头，经过一番人为糟践，青稞穗遍地都是，藏民的羊群饱了口福。

秋收期间，巴仓也管饱，青稞馍十个八个由你吃，只是菜还是平时老样子，不见油星肉影。犯人都累得如一摊烂泥。

正当大家准备喘口气的时候，新任务又来了。管教干部教育道：“明天还要帮助藏民同胞割一天青稞，这关系到落实党的民族政策”。

第二天，照样天不亮就起床开饭，然后往那条大沟走。此时空气清新潮湿，有点蒙蒙细雨的感觉。翻过大深沟，我们爬上另一侧的高台台，此时天才亮。高台台上面仍是茫茫草原，只是有一些坡坡坎坎，住着半游牧半定居的藏民。眼见稀稀拉拉几处房舍，四周有多座帐篷，帐篷外都有看家猎犬。这些猎犬高大威猛，藏民用铁链将之拴在铁桩上。有人经过时，大犬跃跃欲试，作出猛扑之状，还狂吠不止。若不是被铁链拴住，我们这些体弱又疲惫的犯人，十个也不是它的对手。

工地到了，几个藏民老远迎候着。他们忙不迭地与管教和武警打招呼，把他们让进屋，外面只留两个武警放哨警戒。

藏民种的青稞比劳改队要好，犯人割起来也不像劳改队的田里

那般紧张；割下来的青稞质量也就好得多。四周都有藏民围观，大人小孩指指划划，对有些犯人割青稞的速度感到惊讶。到午饭时节，三百多亩青稞地已所剩无几。

午饭由藏民招待，每个犯人分到一碗羊肉。羊肉煮得不熟，还有膻味。可犯人个个吃得啧啧香，称赞藏民厚道。我这碗羊肉里有一坨羊尾巴，大家都说我有福；没想到这羊尾竟是一疙瘩肥油。我自幼不吃肥肉，此时仍不改旧习，只好送给别人消受。

约摸四点光景，任务完成，犯人早早收工回营。管教和武警都成了红脸关公，犯人劳动了一天，他们吃了一顿，喝了一天。

天气晴朗，空中飘着白云。走在大草原上仿佛行走在绿色的地毯上，脚下生出些弹性。草原上到处缀着小花，红的、粉红的、白的、黄的、兰的、紫的、色色俱全。唯没有那种招人注目的大红大绿，这些斑斓花朵很耐看，给人充满生命力的感觉。

七、饥饿，除了饥饿还是饥饿！

秋收过后第二天，食物又恢复到从前的质量。还是青稞糊一勺、小孩拳头大的馍一个，软塌塌的。我体质依然虚弱，而且越累越吃不下东西。这在全组乃至全中队都是独一无二。秋收十几天青稞馍随便吃，我累得几乎没人的形状。待缓过气来有胃口了，早过了不定量的日子了，唯懊恼痛恨自己无用而已。

五中队有一块地最近，它就在监狱大门外的马号后面。地里种的是胡麻，它是当地唯一的油料作物。这块地有两三百亩，只消半天就可收割完毕。9月底或10月上旬的一天，大田犯人正在割胡麻，天空中悄悄飘来一大块黑云。说时迟，那时快，眨眼间天昏地暗，冰雹砸下来了。它们小的如鸡蛋，大的如拳头，一阵噼里啪啦，真是迅雷不及掩耳。武警、带队干部和犯人一样争相逃命，场面大乱，溃不成军。幸好隔堵矮墙便是马号，大家动作反应不慢，各色人等均无伤损。

冰雹下了一个多小时才停。回到监舍，院里一片狼藉。杂工组

和病残组住的高屋，屋瓦砸得七零八落，摔到院里都成了碎渣。我这边窝棚的墙根原放着脸盆、饭碗、漱口家什，此时滚得满院都是。搪瓷砸掉了，露出里面斑驳的铁皮。土豆蛋般的一堆堆冰雹疙瘩，正在融化变小，院里淌着一汪汪水。

隔一阵零杂工回监来，一个不挨一个。每个人回来后都站在门口，大声报告着见闻，哪个沟里砸死了一头牦牛；哪个塬上砸死了多少羊。人们说冰雹有碗口大，吓死人。

天有不测风云，巴仓天气变化无常，来势迅猛又暴虐凶狠。若犯人在偏远地里劳作，后果不敢想，只能是“生死由命”了。

又有一次，大田犯人出工走到半路上，突然狂风大作，飞沙走石，霎时间黑天黑地，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听有人大喊：“快趴下！”犯人全都平展展地趴倒在地上。事情过后，老犯人说，这种怪风每年都会遇到，不赶快趴下会被大风卷走，那就没命了。喝呀，没想到这儿也有吴耀章说的“卷人风”！

巴仓冷得早，刚过10月就下霜，一早一晚寒气逼人。下过几次霜后，土豆的叶和茎秆全蔫了，耷拉在地上，到了挖土豆的时节。犯人一听说挖土豆，立刻有了精神。在挖土豆那几日里，午饭有熟土豆吃，晚餐菜里也有比平时多得多的土豆块。我盼望挖土豆还有另一种心思，我一直记挂所谓“有意破坏”那桩事，记挂着我做了特殊标记的几窝土豆，有些迫不及待地想见证它们了。

巴仓的土豆长得不错，只有个别株棵上就几个拇指大的土豆崽，绝大多数的土豆都有一窝半斤甚至一斤多的收获。每挖到一只“土豆王”，就像发掘到一件宝贝，大家都跑来看。“土豆王”被拣出来放在一处，休息时大家欣赏品评，个个爱不释手。

挖到地中间，我终于发现了那几窝我放了石子做记号的土豆。我把组长叫来一起挖，每窝里都有拳头大的土豆，还带着鸡蛋大小的一串小土豆，一切正常。我喊道：“请大家过来看看，烫坏了吗？烧死了吗？无稽之谈！”陈康年劝我说：“算了。他后来也没追究，事情早过去了，不要节外生枝，又弄出麻烦来。”他这话自然对的，犯人与干部是专政与被专政关系，再有理还是没理。要争个究竟只

能是鸡蛋碰石头，到头来自己吃苦。

午饭时，每人一个小馍，每个组另有一小铁桶的熟土豆；由小组值日来操持分土豆。因为没有秤，要分得公平是件难事。大家都在饥饿中，难免斤斤计较。只我这一组情况好得多，值日先按人头分堆，再对每堆土豆的大小、数量来做搭配。只见他搭来搭去，换来换去，忙乎老大一阵才做定夺。有的人早已急不可耐，一人一堆忙着自己拿了。陈康年、邹庆礼和我故意落在后边，等别人拣剩了才拿。按规定最后剩下的一堆是值日的。大家都是连皮带肉把土豆整个地吞下肚，无人剥皮而食。

此刻，新鲜土豆的味道真是好极了；堪比美食家品尝的珍馐佳肴、达官贵人赴国宴享受的山珍海味。

整个 11 月，大田犯人都在青稞场上劳动。场上青稞垛有四五个，每一个都跟小山似的。比起饮马农场四站基建中队的麦场来，这里的青稞场同样壮观。只不过，领导看到的仅仅是表面现象，犯人早知，这都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麦垛里八九成是野草，而青稞中无头无穗的光秆多多。其后，又是拆垛，又是碾场，又是扬场，犯人忙乎一月；待把青稞归拢来，不过一小堆，总共十来万斤。到 1971 年底，竟只得六七万斤。这些收成不够犯人一年的口粮，更莫说留种子、饲料了。

人哄地一时，地哄人一年。饮马四站一个中队收获小麦一百多万斤，同样是两百来号犯人，同样的五六千亩土地，巴仓收成不及饮马的十分之一。犯人累得死去活来，“胡日鬼”的干法得到“胡日鬼”的报应。

犯人在场上劳动时，虽饿得心里发毛，休想偷青稞一粟。进监房前检查得又细又透，全身搜查无微不至。也有犯人动过脑子，结果都是被查获，落个挨批斗的下场。零杂工是另一码事，他们饿不着，有的是办法。

又是严冬到来，饥饿与寒冻一齐向犯人袭来。

一个深夜，陈凯仁起床去院中小解，好大一阵不见回铺。他就睡在邹庆礼和我的旁边。老邹醒了，不放心，爬起身到门外察看。

“哎呀，陈凯仁晕倒了，大家快来帮忙抬一下！”我和几个人忙起身出门，只见陈凯仁倒在尿桶一旁，原来披的棉袄在一边，身上只剩单衣单裤，人已经冻僵了。除几个老弱犯人，全组的人都慌忙爬起来，七手八脚把他抬回铺上，再用几床被焐到他身上。陈康年在炉子上烧了一缸子开水，慢慢地喂他。过了个把时辰，陈凯仁才苏醒过来。醒来后，他慢悠悠对大家说：

“我正解手，迎面过来一个大汉，黑乎乎地看不清面孔。他举起大棒朝我头上砸来，我便什么都不知道了。”

老邹细细地给他检查头部，无任何伤痕。他说：人在过度虚弱时易产生幻觉，不奇怪，大家不要当回事。陈康年嘱咐小组今后互相多关心，他说：今天若不是发现早，陈凯仁会冻死在外头，肯定没命了。

陈凯仁为人不错，他与一组唐尢玉、二组宋占荣是老乡，与本组犯人关系都很融洽。表面看来他的身体比谁都棒，气色比谁都好，没想到偏偏是他最先栽倒了。陈康年去医务室找到大队犯医、上海人朱兴坤，给陈凯仁开了几天病假条。

饥饿，除了饥饿还是饥饿。大家都饿得受不了，必须想办法。

阴历年前的一个休息天，邹君邀我一起去干一件勾当。他把捅炉子的铁钩拿上，叫我找截木棍。我找了一圈，木棍找不到，只好掰断房檐下的一截竹子。我俩来到伙房背后，这儿有个污水池，池沿是砖砌的，有三四十公分高；池子颇大，有十多平米。池面已经结了一层厚冰，池中间的冰鼓出老高，而四周的薄一些。冰冻得瓷实，硬邦邦的。透过冰层能隐约发现冰下有“宝”，是些猪、牛、羊的下水，都被伙房倒掉的弃物。显然，老邹事先侦查过。他对我说：“这里天气严寒，东西不易腐烂变质，说不定还可以吃。”

我们到巴仓整一年了，伙房从没给过一丁点肉影影，何以有这些下水呢？我心里甚纳闷。费了好大劲才敲开冰层，我们用火钩伸过去，钩出了几截下水来。仔细一看，下水都已发绿了。老邹嗅了嗅，细细地审视一阵，终于无奈地摇头：“伙房这一伙不是人，把这么好的东西全扔了，糟蹋了！饱汉不知饿汉饥呀，应该把他们都

赶去大田劳动，让他们也尝尝饿的味道。”

腿蹲麻了，两臂酸空，忙乎一个多时辰，白辛苦一场。我俩扫兴而归，各自睡下，谁都没再说话。

八、燃烧的大年初一夜！

按照政府的配给，犯人应该有的食物远不是眼前的这些，要多得多。老犯人都深知内情，只是缄口不语。日子一长，大家混熟了，我们这些新犯人才陆续得知些情况。

五中队伙房组的组长姓张，他既是中队统计，也是犯人大组长。说不清他是何地方人，四十岁样子，是一个八面玲珑特会来事儿的角儿。他减了一次刑又减第二次，如今听说狱方又在酝酿给他第三次减刑。他获减刑的诀窍就在犯人的伙食上。老犯人半夜在院里解手，亲眼见他深更半夜朝监外提大桶大桶的油，背整麻袋的白面和肉，那里牛羊肉和大肉都有。这些原本都是政府配发给犯人的，用于逢年过节改善犯人生活。老犯人又说，夜里若无干部来带领，犯人出不了监狱铁门，他也不例外。每次他往外送东西，都有干部在哨楼上或大门外接他。还有胆大的干部，夜里直接跑到伙房来亲自背上拿走。我们这中队有人亲见王管教夜里从伙房背东西出去。三个中队都这样，谁也不说谁。

1971年的阴历年到了，大年三十是传统节日里吃团圆饭的时候。时下“文革”正炽，家家四分五裂，能团圆的不多。饿了一年的犯人顾不上思念家人，最大的期盼莫过于吃顿饱饭。却没想到，大年三十一切照旧，伙食原模原样。不到七点，犯人都早早上床睡觉了，比平时早了两个多小时。监舍里出奇地安静，各人都在想自己的心思。眼前这凄凉的除夕，没有人睡得着，肚子饿得咕咕叫。也许，明天会有改善吧？大家寄希望于大年初一，然而等来的仍然是幻灭。

初一夜晚，饥饿和愤怒主宰着里间这些新来的犯人。组长、副组长还有大多数巴仓的老犯人睡在外间，里间是清一色的新来犯人，

也都较年轻。原有的巴仓犯人都在五十以上，不再容易冲动了。

有人突然骂道：“他妈的×，这犯人没法当了，不如早些死了好！”

一石激起千层浪。里间犯人全坐起来，有人轻声道：“眼看活不下去了，不如一起去偷土豆窖，弄顿饱饭吃！”

土豆窖在伙房门前不远，大烟囱旁边，离大门有二十公尺。吕用生、陈凯仁、马成功、吴海清、邹庆礼和我，穿好衣服悄悄溜下床；我们怕惊动了组长和老犯人。

夜漆黑如磐，风寒刺骨。土豆窖上盖着沉沉的厚铁板，焊死了，铁板上挂了把大铁锁。我们几个人一齐上，用尽力气想要掀开。但没工具，铁板和铁锁纹丝不动。饱吃一顿的梦，破了。

躺回床上，沉默，又是死寂般沉默。这是个难眠之夜，半夜已过，大家毫无睡意。过一阵，又有人开口，悄声道：“我有个点子，不知大家敢不敢与我一道实施。”没有人回答，静静地听他的点子：“我拿个缸子，去敲伙房门，只道小组里有危重紧急病人，要喝水服药。你们躲在门两旁，待姓张的来开门，先打瞎他双眼，免得他咬人，再打他半死。伙房有啥吃啥，饱餐一顿。如何？”大家认为可行，并立即付诸实施。

这是几个有血性的人，为了一顿饱饭，义无反顾，甘愿冒风险。不是十分无奈，断不会出此下策。

然而，这次又泡汤了。

原来伙房夜里只有姓张的一人留守，开罢晚饭后，他将伙房前后门用大锁锁了，铁棍顶了，大木头在里面顶着。任凭谁敲门也决不开门，当然，干部自是例外，他能分辨声音。这夜他早有准备了，我们的同伴敲了前门又敲后门，用拳头撞，用脚踹，屋里无一丝回应，好像里边根本没有活物存在。折腾了个把小时，又冻又气，无功而返。真是令人沮丧又悲愤，大家的心绪都糟透了。

这就是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 1971 年的春节，一个饥饿难熬之夜，一个惊心动魄之夜，一个怒火中烧之夜。

我们试图抢劫食物，在当时只是凭热血冲动，我和大家一样来

不及详细考虑其严重后果。事后，我还是认真反省了的。十一年前，为了父老乡亲的生存权，我挺身而出，值得。如今是为个人的生存铤而走险，我自问：值得吗？心里答道：也值得。你崇尚文明、礼貌，他天天欺榨你，吃你的肉，喝你的血，咋办？你曾有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时候，正因为不幸、不争，才有恶人当道。我们的处境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还要个空皮囊做甚！

春节休息几天，犯人都挺在被子里睡觉。除了开饭吃饭，我和邹庆礼也不曾下床。只不过我俩并未睡觉，而是将被子盖住下半身，靠着墙悄悄耳语，声音低得像蚊声，防止第三者听见哪怕一个字。我对邹君敞开心扉，披肝沥胆。我谈对中国共产党和毛的认识，谈我的认识变化的过程，谈我对“文革”的理解和判断，谈对林彪、江青的看法。此后的历史进程证明，无论是彻底否定“文革”还是对林彪、江青的预言，我都切中肯綮。

邹君对我甚佩服，说我料事如神。十年之后我俩彻底平反重新工作，后来他由马达加斯加援非归来，再后来到1998年……每次我们重逢，他总要问我一个问题：那时举国上下对其顶礼膜拜，而你的那些判断是怎么来的？当时的根据是什么？我不愿多说什么，只是“我也说不清，可能是‘潜意识’的作用吧”，以此来打发他。

我的判断当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更非“潜意识”，而是深思熟虑的结论。只是，往事早成历史，已经没必要说了。

九、触目惊心的“一打三反”

春节刚过，我被调到一组。一组的组长叫蔡方土，浙江人，接近五十，一米七五左右，稍有些口吃。他的为人处世和作派与陈康年极似，只是性子急一些。他仍叫我当小组记录员，负责晚上读报。出工没几天，老蔡见我裤子单薄，送我一条毛裤，我无论如何不接受。他说：“放我这儿也是闲放，给你穿，物尽其用。你需要它，保护好身体是第一位的。我还有一条备用的，你拿着吧。”他此前在对面杂工组待过，人缘甚好，人家帮助他，他又拿来帮我。这条毛

裤，毛很粗硬，里面需穿衬裤才行，要不然被扎得受不了。若是在今天，撂到垃圾桶里也无人去捡拾，当时对我来说，却是派了大用场。我穿着它又熬过十个寒冬，直到平反以后重新开始工作。它的意义和价值超过市场上头等毛裤的百倍千倍，我至今没忘蔡方土对我的情谊。

现在，我记得的一组犯人还有史成德、唐尕玉和李欣杰，其他人已了无印象。史成德是甘肃甘谷火车站附近史家庄人，已五十好几，大块头，身体极健壮，膀粗腰圆，年轻犯人工活都赶不上他，手脚麻利的了得。他是赶牲口脚夫出身，解放前与人结伴跑马帮，到过云南贵州、西南边陲，贩运日杂百货和食盐；同时夹带些烟土，我猜他即是因此而劳改。据他说，年轻时能扛四百多斤的口袋涉水过河，力大无人可比。唐尕玉，临夏人，二十刚出头，与史老汉一样的身架，黑黝黝的脸庞和肤色，也是大力士。这一老一少，不但长相酷似，性格也都开朗豪爽，喜欢说笑。李欣杰，天水市郊人，原是民间中医，四十多岁，人很瘦，背微驼，脸色枯黄，一副病恹恹样子。他的嗜好是抽水烟，一有空便会点燃火绳，“咕嘟嘟”个不停。

1971年犯人的劳动科目与1970年相同，而这一时期，“一打三反运动”的政治运动正在全国铺开。巴仓地处偏僻的青海，烈火传过来时间虽晚，却一样惊心动魄。

5~6月间，监狱里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五中队杂工组高屋的山墙外侧有块大黑板，对着前院，也正对监院的大铁门。我来一年多，不见上面写过一个字，也没贴过东西。这天，黑板上忽然贴了张大布告，招来三个中队犯人围观。

这不是普通布告，是杀人告示。布告的前文写着死囚的姓名、年龄、民族、籍贯、文化程度、家庭出身等，尔后是罪状正文。法院判词此后我见多了，都是千篇一律，几乎能背诵下来：该犯一贯思想反动，仇恨无产阶级专政，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污蔑诽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以及江青同志，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每隔几天又有新的贴在旁边，其共同点就是有罪状而无具体事实。布告最下方，还有死囚被行刑前后的照片，行刑后的现场照尤其惨人：有的整个脑袋被打化了，有的只剩半边脑袋，旁边是一摊脑浆。所有死者，无不是弹炸头部。犯人看了，都有冷气灌顶的感觉。每次看完布告，虽在极度饥饿之时，我一拿到馍端上碗，顿觉血腥扑面而来，令人作呕。我无法描述这些告示在犯人中引起的惊骇。

没过多少时日，这场飓风便卷到巴仓二大队。监院里原本很少言谈聊笑，此时更一扫而光。

这天早上吃罢饭，犯人站在院里等待出工。忽然监狱大铁门打开，进来两个干部。他们打开禁闭室小门，从里面提出来个五十多岁的精瘦老头。这里的老犯人有人认得他，说是姓张，叫张××（我不记得名字了）。他原是巴仓农场三大队犯人，无人知道他是何时因何事关到这二大队禁闭室的，此前都还以为禁闭室里没人。他与我们这些观者距离不过二十来公尺，戴着手铐，砸着铁镣，说话声音都能听见。

他对干部说：“我的被褥还在里头”，好像想问：拿不拿。

干部犹豫一下，答道：“不拿。”

他被带出了监狱。

原以为可以出工了，没想到才过几分钟，又进来两个干部，直奔四中队，带走了个年轻的光头犯人。

这个年轻人只有二十六七岁，我见过认得，只没说过一句话，不知他的姓名，不知是何处人氏。认得他是由于下象棋，我和岑宝林下棋有时在五中队的院口，有些四中队和六中队犯人也跑来观战，他便是众多观战者之一。他从不开口，神情颇呆滞。

晚上收工回来，杂工组传来消息，这两人同时被毙了。早上提他们的时候，行刑车就停在监门外不远处。巴仓农场场部当时正开宣判大会，他俩被直接拉到会场示众，随即被处决。

五中队有许多浙江籍犯人，有人知道这年轻犯人的一些情况。

他是浙江人，叫×××（姓和名我全不能记），在浙江那边判刑后曾在狱中呼“反动口号”，被加刑五年。到巴仓后一直表现规矩，并没犯过错误。事情已过多年，这次算是旧账。有人嘀咕道，昨日下午还见他在伙房门口看下棋，统计跑来把他叫走，说是给他剃头。犯人剃了光头，行刑者将子弹事先在鞋底上擦擦，射出去成霰弹，打在光头上才会“开花”。

从“一打三反”贴出的布告看出，受镇压的几乎百分之百是政治思想罪，惨遭杀戮者百分之七八十年龄都不大，有的人才二十出头，是在新社会出生的。

以后知悉，“一打三反”像其他运动一样，有硬指标：巴仓劳改农场每大队都要搞出一个“活教材”。

十、最危险的时候！

“人在屋里坐，祸从天上来”，1971年9月1日在我身上发生一桩意想不到的事。

当时每小组发有一份《青海日报》，这是犯人政治学习的唯一材料，由记录员收存。我睡外间，头顶着隔墙，头上方钉个钉子，平时念完报用夹子夹住，挂在钉子上。在四组将这张报纸从头浏览完的只有我和邹君，到一组来就只我一个，其他人很少问津。报纸每天由姓张的伙房组长发送，到了下个月的初一，一个月的报纸由他悉数收回。

那时，每逢五一、七一、八一、十一、元旦，党报都用套红的边框刊登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巨幅标准像，一左一右占据着第一版的整个版面；《青海日报》也不例外。每晚约七点半学习，我负责读报，读一篇或者一段，这是我的职责。要等组长发话：“好了，今晚就学到这里”，才算完成任务。读报时，李欣杰总在抽水烟，他烟瘾大得很。为节约火柴，他搓根火绳，火绳点着后放在炕沿的土坯凹缝处，一袋连一袋抽。屋里只有一盏二十瓦小灯泡，看报读报很费劲。我总是随手将一摞报纸平摊在炕沿上，读完了顺手挂到墙上。

9月1日那天，姓张的来收8月份整月的报纸，他翻过来一看，第一张就是八一建军节有领袖标准像的那张。令人完全没有想到的是，报纸有个洞，不偏不倚正在毛主席像的额头中心处！姓张的朝我指了指那个洞，二话没说，拿了就走，快得我来不及反应。我知道这个人渣决不会放过立功机会，果然他立即报告了政府。

我心里直骂自己，为什么事先不检查一下？如果能提前发现，其实不难处理。收旧报一向也不点数，有人拿旧报用来卷烟。即使被追究，无非是少了一张，又能咋的？偏偏“一打三反”这个恐怖运动的血腥时刻，叫我撞到了枪口上！

第二天便遭提审。

第一个审问我的是中队王管教员。他长得瘦小，表情猥琐，面容奇丑，眼睛歪斜着眯条细缝，好像害怕阳光似的。王管教此时四十来岁，我说不清他何处人氏，因为他说话南腔北调的，大致判断大约是江苏人。伙房物质“外流”的传言与他关系最大，犯人都对他均无好感。他又爱咬文嚼字，装出一副文绉绉、满腹经纶的样子，却又常常念别音，读错字，叫人忍俊不禁。

我无可隐瞒，将事情来龙去脉说了一遍。王管教厉声正色道：“这事非同小可！你知道它的严重性吗？那张报我仔细检查过了，分明是你用香烟头烧的，事前选准了部位，否则能那么巧合。你必须深挖反动思想，彻底坦白交代罪行！你回去先在小组里检查。”

我也确实抽烟，抽的两角钱一包的最末等杂拌烟。但我只是在工地的上午和下午休息时各卷一支，回监舍从来不抽。我铺上没有火柴，没有香烟。看样子他是要“干墙上钉钉”，硬要给我砸上！

小组会上我把情况又说了一遍，无人发言；原本大家都知道事实如此。批判会规模继续扩大，一个小组变成两个小组，仍然没人吭声。王管教员又主持召开了全中队犯人批斗会，要求所有犯人检举揭发我。两个犯人组长事先得到指示，不得不就事论事说了些后果严重的话，没人在下面喊口号，也没人叫嚣“不老实”。冷场，批斗会开不下去了。

我到巴仓快两年，自己本质善良，又受到陈康年、蔡方土精神

的感染，更懂得做人处世的道理。杂工组、病残组乃至全中队的犯人没有不认得我的。无论老的、小的，我一概以礼相待。上工时我帮年老体弱者扛工具，对缺胳膊少腿的病残组犯人更是尽力相助。冬天牛屎马粪堆到杂工组门口，病残组取烧不便，我背一大堆给他们放到炉旁。下棋我从不吭声，不跟任何人红脸，是公认的棋德高尚。我能做的都是些小事，但也得到不少人称赞。我不敢说每个犯人都喜欢我，但我敢说没有一个“对立面”，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我人缘好，相信这就是批斗会开不起来的原因吧。

还有，在巴仓，无论原有的老犯人，还是由饮马、新华农场来的新犯，都已辗转多处。这些人见多识广，改造经年，也不再相信“犯人斗犯人”能获得宽大减刑。我来巴仓两年，这里没有发生一起犯人陷害犯人的事。

批判会虽然不开了，事情远未了结。隔了几日，中队的金（靳？）指导员又来提审我。金是兰州皋兰人，大块头，嘴里镶着金牙，说话粗声粗气；他是战备大搬迁时由饮马农场随犯人调来巴仓的。我向他详细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分析说，只有一种可能：由于灯光太暗，自己疏于观察；可能是土坯缝的火绳未灭，我将报纸摊于其上，造成了这一后果。小组里平时几乎无人动报纸，这过失只能由我承担。但无论如何，我并非有意而为。我只在工地抽自卷的杂拌烟，回监舍从不抽烟。王管教一口咬定说是我用香烟头点的。哪来的香烟？不只是我，全组也无人有香烟，请政府调查明察。末了，我强调说：“我没有精神病，理智健全，断不会有意干这种事。”

金平时说话大嗓门，让人觉得他态度粗暴。此时他却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叙述。这个西北大汉还真是粗中有细，他到小组询问了我的情况，陈康年、蔡方土如实报告了我各方面的表现。

然而，有关这次“事故”的材料还是由中队至场部，最后上报到了贵南县的公安机关。

过了十多天，在9月中下旬的一天，县法院（或者是检察院）来了两个干部。他们在大队部提审我，不过不是在屋里而是在外面的院子里。我又一次“交代”事情原委。我说，至今我也不知道事

情是如何发生的，我负有保管报纸的责任，极有可能由于光线太暗未发现床沿的火绳还燃着，误将报纸摊在上面，造成了这一过失。两位干部只管记录我的话，没有插话，也没给我扣政治帽子。他们神情严肃，我由此也体会到“案情”重大，简直有生死攸关的分量。

返回监狱时在大铁门外，我看见几个人正在忙乎，他们铲掉了照壁墙上原来有的林副统帅题词：“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看到刮铲得五麻六道的字样，我心里怦然一动：中央出了大事。

虽然自己已经是命悬一线，我仍立即向邹庆礼君报告了我的发现。我说：“这事非同小可，极有可能‘最亲密的战友’不再亲密，露出了狐狸尾巴。他自己钦定的‘接班人’居然背叛了他，这世上还有可堪信赖之人吗？这打击对他来说实在太大大重，很可能会产生精神变态，从此更疯狂起来。我活的希望渺茫，有可能死定了。我死不足惜，但愿你能熬出去。在这种凶险的环境里千万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邹君是我身边唯一能沟通思想情感的人。

长夜漫漫，思绪万千。我感到很冤很冤，冤得无边无涯，冤透了。报纸上烧的这个洞，或许根本与我无关，即使是我所为，那也是百分之百的无意。现在我却要为一个洞去偿命……倘若这个洞烧在另一侧，正好在林彪头上，那会怎么样？很可能不仅无罪，还会被称为“料事如神、目光如炬”；甚至成为“反林英雄”亦未可知。天下事多么奇怪，多么不可思议！

但我又觉得不冤，比起有些人来，甚至一点不冤。我确实对毛在建国后的所作所为持否定的看法，尤其是1957年以后。自从五九年毅然走上叛逆之路，我内心里对此始终是供认不讳的，只是在劳改队里没再表现出来罢了。扪心自问，我不能苟同五七年以来所有的“政治运动”，我认为那全是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三年人为灾害饿死数千万善良农民，时下的“文革”又一次让整个民族沉入深渊；如果以“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罪名而遭杀戮，我冤吗？比起胡风、彭德怀、刘少奇……真是一点都不冤，甚至还可以说是“罪有应得”。而如果追究旧账，我在《星火》上发表的文章中，在看

看守所庭审时所说的话，在“反动诗词”中表达的内容，哪一条不够“斩立决”？比起不久前被处决的光头年轻人来，我冤吗？

人固有一死，那些脑袋被击碎的刑场照片，实在也算不得什么。人死即在枪响的刹那间，或许当时有一两秒的痛楚，随后是什么也不知道了。谁还管尸身悬挂示众、碎尸万段或者喂狼喂狗！就死者而言，死在刑场与睡在水晶棺里又有什么两样？

我庆幸自己苟延残喘多活了十二个春秋，又多看了一些世道；更庆幸自己熬过了1968至1969年的那场大病，没有死在病床上，如今也算如愿以偿了。

我时时刻刻等待着死神的降临，我决定竭尽所有，把自己打扮得整齐些。我不愿穿那身“劳改皮”，甚至连劳改队发的棉鞋也不愿穿。天气寒冷，我上身原来穿了件破旧的短大衣，这时我将一件蓝色的褂子罩在上面；脚上穿了双破皮鞋。这件蓝色罩衣是在看守所期间一位亲人寄来的，我还不能确定她是谁。原来是双面卡棉制服，以后穿成夹衣；又由夹衣穿成单衣。虽然已经破烂不堪，我仍视为宝贝，舍不得丢。我把它包在枕头里，留作永远的纪念。现在又派上了用场，穿上它赴刑场我将更坦然。脚上的皮鞋是张炳秋留给我的，也是难友情谊的见证。我已无任何东西可以留下来作为纪念，也无甚可以赠人。除了邹庆礼君，我也无须向其他人表露心迹了。我做好了准备，随时可以上路。即使夜里睡觉，我也仍然衣着整齐。在大田劳动时，我留心带队干部的一言一行，时刻观察着是否有陌生人出现。收工回监院，我留神监狱大铁门的响动，倘有干部进来，我一直盯着他的行踪，看他究竟是要到哪个中队去。

如果读者指责我是胆小鬼，那自然也是有理由的，我口服心服。而如果认为我是“庸人自扰”，又当别论。因为你没有身临其境，不了解当时形势的紧张和政治氛围的恐怖。从理性上讲，我对死已无所畏惧，对社会也不再留恋之情，我甚至盼着上帝尽早将我召去。然而，我又是多么不情愿死啊！我想看看这世道究竟会如何，毛百年后又会有何种变化；难道人们会继续抱残守缺、执迷不悟？我苦难的民族何时才能拨开阶级斗争的迷雾，走上和睦、关爱、重

视科技和发展经济的正途？我绝不相信睡狮永远不醒……何况我已熬过了漫长刑期的三分之二了，要杀要剐，只在当初；何必拖到现在呢。

我不情愿死，但却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我心里充满凄凉、悲愤和万般无奈的感情，终日默默地承受着巨大的精神煎熬。尽管有过无数次心的惊悸，但我也依旧坦然，我觉得我可以问心无愧地告慰亲朋：我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讨饶，没有出卖灵魂和人的尊严。

十一、1972年春节

从1971年9月至1972年过春节，要记述这四个多月我的经历和感受，太困难了。那是我随时准备赴刑场的日子，尤其在“国庆”、元旦、春节这三个节假日中，一连几夜我都是和衣而卧，整装待死；那是一段多么难熬的日子呵！

1972年春节，大年初一，不曾料到伙房给犯人改善生活，每人一份羊肉馅和一份白面，破天荒头一次。八点左右，犯人在伙房门前排起长蛇阵，等待领取自己的一份。厨房里摆放着几大盆羊肉馅，每人一碗，拍得实实的，然后用块木板在碗口上刮平；每人一碗白面，也是如是分法，极公平。羊肉馅鲜红鲜红，事先已拌好佐料，一平碗足有一斤多，面粉听说是一斤二两。

回到监舍，犯人喜上眉梢，话也多起来，整个监舍洋溢着欢乐的气氛。院里很冷，大家都坐在睡铺上和面，有人用饭盆，有人用脸盆。然后是各自包饺子，包的形状千奇百怪，互相又比，看着逗笑。有人说，吃了这顿饭，去见阎王爷也值得了，做个饱死鬼。

表面上我和大家一样愉快，没有人知道我内心的复杂情感。我把这顿饭视为最后的晚餐，似乎到了上路时刻。无疑，这顿饭是服刑十八年中最实惠的一顿，只是当时我没能感觉出它的味道。

初五忽然宣布调动命令，调离的犯人名单中我也在其列。有关调动的事，之前未曾闻到半点风声，只有在这时，我才感到逃过了一劫，精神上的重负顿时释放了。早在年前就有零工组的犯人说，

场上打碾完毕，全年青稞只收获了六万余斤。这个数字不及饮马农场一个中队收获量的二十分之一，农场撑不下去，这是明摆着的。只是没想到变化来得这么快，对于我来说，更是求之不得。

这次大部分犯人都要调离，这些犯人几乎全是甘肃河西走廊战备大搬迁过来的。在我认得的原来巴仓的老犯人中，只有肖恒被调走；陈康年、蔡方土、陈阿三等均原地不动。我无法想象他们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我向陈和蔡道别，感谢他俩对我的帮助；他俩对我也是依依不舍，我们彼此心中都明白，这便是永诀，今生今世再难相见了。

天不甚亮就集合站队，依次登上汽车。汽车绵延十数里，看不到头，见不到尾。这情形跟两年前的战备大搬迁相似。每五辆囚车的前后各有全副武装的军车押解，车篷上架着轻、重机枪，威严肃杀，鬼怕神避。重上日月山，上山路即是两年前的下山路，又是惊悚的一幕。下山与前不同，仿佛朝西。无论上山下山，车速都极慢，如蜗牛爬行。下山后过夜，过夜的住所在一个叫曲沟的地方，走去不算太远。曲沟是个不大的县镇，位于一座山的峡口处；镇上几乎所有机关、学校的房子全被犯人占满了。我在这车的犯人住在一所小学的一间教室里。

汽车又整整跑了一天，囚车用篷布遮住，前后敞着口，在车里能见到车外的一些情况。出得曲沟峡口，汽车向南行，地势逐渐开阔平坦，中午在名叫倒淌河的地方午饭。倒淌河是个镇子，在东西大道旁，顾名思义，这儿应该有条自东向西倒流的河；吃饭时我左顾右盼，不见河的踪迹。饭后汽车继续西行，路面很宽，不过这汽车路不是人修出来的，而是众多汽车跑出来的。原来这里无路，是茫茫一片荒原。

路况极差，车速很快，感觉颠簸得厉害。犯人有好几个呕吐不止，弄得车上一塌糊涂，秽物溅到行李上、身上，到处都是。望向车外，真是名副其实的莽原荒漠，车行一两个小时不见村镇和人影。偶尔发现离汽车很远的地方有三五只骆驼、一两个羊群。直到下午五点光景，在汽车的右前方，可以看到远处有一脉群山，皑皑白雪

如围裹在山巅，远眺如一条白色巨龙，巍峨壮观。原来，那就是祁连山脉。

不多久，来到一座颇具规模的城市，车速明显放慢，从街道上穿过。这城市看上去不小，道路两旁有不少店铺。刚过完春节，路人稀少。人们的穿着都差不多，显得灰头灰脑的。街面的房屋多是土坯屋，极其简陋。偶尔见到一两栋砖瓦结构的楼房，算是鹤立鸡群了。有人说道，这里是巴音河。

听到这名字产生奇怪联想。初中时读《西游记》，依稀记得书中也有这么一条河，不知是否同一条河。我如今竟走在去西天取经路上，能跨过这条河吗？

有的囚车继续西行，我乘的这辆以及其他多辆囚车，没待行到街市的西头，忽然急转弯折回向东，顺着一条矮山梁而行。不到一个小时，车停在一处高墙外，有人喊道：“到了，都下车。”

下得车来，天已擦黑。我这才发现到这儿来的只有我们这一辆囚车，其他的囚车早已分道扬镳。幸得邹庆礼也在我这辆车上，我们还是在一起。乘车两日，坐在自己行李卷上，彼此挤挤挨挨，东摇西晃，人人颠得浑身要散架。我虽疲惫不堪，躺在炕上仍是心事重重。

回首巴仓两年，饥饿，除了饥饿依旧是饥饿；恐怖，除了恐怖仍旧是恐怖。在我命悬一线完全绝望的时刻，却安然无恙落地他乡，这是怎样的奇迹啊。

第六章 转机

一、树挪死，人挪活

这新到之地是青海德令哈农场，全国最大的劳改农场之一，地处柴达木盆地东沿，下辖几个劳改分场，有好几万犯人和刑满就业人员。我被分到尕海分场，尕海分场下辖四个大队，一、二、三大队是劳改犯，四大队是清一色的刑满就业人员。

这儿的地形地貌、监舍、大队部的建筑布局与饮马农场相似，正如我在看守所时曾经梦到过的情境。不同的是，这里每个大队下属的中队全是农业队，无基建队与农业队之分。高墙里各中队隔开，每个中队前后有两个院子，大约有两百左右犯人。

我在二大队的五中队五组，初到时住在前院，不久后搬到后院。

我们这个组的组长是周孔章，他四十好几岁数，四川达县农村人。无论大田劳动或休息天，他一天也不说一句话，像个哑巴。劳动中他虽是组长，也从不指使别人干这干那，只管自己埋头干活，哪儿活重在哪儿干，像头老牛。出工、收工扛工具，老弱的负担全由他包扛，这与我在巴仓的组长陈康年竟是一模一样。监舍休息时，他也是手脚不闲，不是捻毛线、织毛衣，而是帮小组犯人补鞋袜，补衣服，或者拆洗被褥。他任劳任怨，这表率作用做到顶了。

我睡老周旁边，又当记录。不多久便知道了周的一些情况。周原是生产队长（或农业社长），1958年因带领社员抗交统购粮而“犯罪”，判了二十年长刑。想不到，一个农村基层好干部竟叫我在劳改队碰上了。

在周孔章事事处处身先士卒的感召下，这个小组的犯人都很奇

特，可以说小组像个大家庭，彼此融洽友爱的风气比之陈康年小组又胜一筹。时隔三十年，我还记得小组成员一半以上人的姓名，他们的音容笑貌鲜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而我与他们共同生活满打满算只有一年，印象之深实非寻常。

邓安瑶，广东人，快四十年纪，一脸麻子，却不甚难看。他的特点是相逢开口笑，为人极和善，与世无争。姜有祖和李竹叶两位都是浙江人，四十好几，处事通情达理，待人至诚。以上三人皆不知其案情、刑期。

杨信全的情况与众不同，他年龄比我小三岁左右，江苏人，有眼疾，一只眼因白内障完全失明。他是个特别老实巴交的青年，却一直公开不认罪。他不断写上诉，年年写，没一字回复依然写。在我到过的所有劳改单位，狱方最忌讳“不认罪”，犯人无一敢喊冤，倘若内心不服说出来或叫别人知道了，那简直就是捅了马蜂窝，大会小会批斗，年年冬训拿你“开刀”。这还是轻的，重的就要加刑严惩。唯独在德令哈，干部对杨信全的不认罪和上诉竟然没有训斥和追究。他写的上诉经管教检查后都替他发了，这表明，干部似乎对他的案情也存疑。的的确确，凡见到杨信全这个人，一眼便能看出他根本不是“现行反革命”的料。他的案情是这样，解放初他还在上小学五年级，少年人爱读《三国演义》，他和几个小朋友也来了个“桃园结义”，彼此称兄道弟。肃反时各乡有硬指标，就因为这个把他们几个小学生判了“反革命集团”罪，判他二十年长刑。我推算了一下，无论如何，判刑时他不会超过十五岁。

张沛生，这名字我是用心才记住的。平时大家都不称呼他的大名，只叫他“张聋膨”。他是江苏或者浙江人，已六十多岁；长得如武二郎一般矮粗，双耳都背，对着他耳朵大声喊，才能听到一些。他是文盲，旧社会一直给地主当长工，按阶级算，他应属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但他竟敢公开地为地主歌功颂德。旧社会他年轻，到地主家扛长工；自己勤快，能吃苦，对主家忠心不二，被地主两口子相中了。他们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还陪了许多嫁妆。张沛生因此感激不尽，也视地主夫妇为亲生父母。我不知他因何犯罪、刑期

多久，我判断这与他和地主的情缘有关。平时，只要有人提起旧社会，他便打开话匣子，说地主如何如何对他好，滔滔不绝。大家都不敢接他的话茬，也不去反驳他。他是年岁大，出身又好，加上耳聋听不见别人的话，管教干部也只好听之任之。

张聋膨始终保持勤劳本色，他的肺部或上呼吸道有病，脖子原本粗短，经常一鼓一鼓的，气上不来。小组年轻犯人都照顾他和另一位老年犯人金城，不叫他俩干重活。他过意不去，想方设法做出补偿。星期日休息，年轻犯人爱睡懒觉，不到开饭一刻不起床。他老早爬起来，给他们打洗脸水，摆碗，打饭。他又帮人洗衣洗袜，在监舍里擦窗子，扫地整理内务。做这一切时他都是悄悄地，尽量不弄出声响。这小组就我一个新犯人，时隔不久，他也像父辈一样照顾我。他主动帮我拆洗被褥，缝补衣衫，无微不至。

如果说这小组像个“家”，周孔章是家长，张聋膨便是名副其实的“管家婆”、“内务部长”。

我毫不怀疑张聋膨所讲故事的真实性，他的话对我震动很大。由于家庭出身，童年和少年时的经历，我对地主阶级怀着深深的憎恨。《白毛女》中的黄世仁、《高玉宝》中的周扒皮就是我对地主的概念。我从未听说有心地慈善、体贴关怀长工的“好”地主，还有肯把女儿许配给长工的“傻”地主，何况张沛生又长得丑。联想到在故乡老家张万元对我的帮助，始信哪个阶级都有好人。“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已使我中毒很深了。

再说老犯人金城，他是江苏人氏，也是本小组里的所谓旧社会的“残渣余孽”。我判断他过去曾在军界或政界干过什么事，具体情况不知。他年六十岁，脸形瘦削，眼睛奇大，颧骨奇高，两颊两个深坑，嘴里只剩得上下各一颗牙。一张嘴，口腔内黑洞洞的，乍见令我毛骨悚然，仿佛白天见鬼。他已形骸枯槁，弱不禁风，时常咳嗽不止；只是偶尔随大田出工。到了工地什么也干不成，只是坐在地埂上大口大口喘气。

德令哈农场种小麦，犯人吃的全是白面，伙食情况大抵如饮马农场。副食方面好一些，一星期有三次改善生活，多少能见点猪肉

羊肉。虽然吃不饱，总算勉强过得去，不像在巴仓那般饿得发慌难耐。

金城是小组里唯一的“余粮户”，他对我有些偏爱；我到小组不几日他就有意照顾我，每顿饭都要掰块馍给我。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说实话我很“怕”他，甚至避之不及。我怀疑他患有开放性肺结核，甚至是性病，我怕被传染。我很重视个人卫生，尤其是自己的餐具，一般不愿让人触摸。但凡金城用过、触摸过的东西，比如锄把、锨把，我不得已要使用时，必牢记仔细洗手。我不忍心伤害金城，毕竟他已在风烛残年，我不能让他有被嫌弃的感觉。他已有够多的悲哀了。

不久，金城就搬到了病号室。他对我仍依依不舍，每次在院子里看到我，他在病房门口老远就向我招手，要把积存的馍给我。我心存感激，但依然谢绝说：“我确实饭量不大，自己的一份够了。”

不到一年，金城死了。我感到难过，他对我怀有真实友好的感情，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人感动呢？

社会上阶级斗争正如火如荼，而在这被社会遗弃的劳改队里，被视为“人渣”的犯人们竟能心无芥蒂，互相帮助；倘非亲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我庆幸自己摆脱了巴仓那个死亡之地，简直有二次投胎的感觉。

二、朱彬其人其事

在德令哈，农业劳动与饮马农场相似，但更重视质量，不像巴仓那种“胡日鬼”的搞法，把犯人累坏了，种粮成了种草。干活重视质量，这很顺我的心意。

中队种了六七千亩地，播种用播种机。春播完，大田犯人紧接着扶地埂，打毛渠，准备浇水。接着是几遍锄草，准备秋收，脱粒打碾。收割后用拖拉机翻地，地翻完，晒一晒，接着又是扶地埂，打毛渠，平地，开始冬灌……周而复始。这些活我在饮马大体都干过。

我的新技能是学会了看地平。秋收和平地是两项最重的劳动，看地平则是平地中一项关键活，带着技术内容。拖拉机翻过的地，原来的地埂和毛渠不复存在，但痕迹依稀可辨。大的地块一般有一亩二三，小的地块也有七八分。这儿没有排碱沟，要排出地里的盐碱成分，就全靠冬灌的质量。如果地平整得不好，冬灌浇不上水，来年就会出现白花花的一片盐碱；结果是庄稼渍死，颗粒无收。

我来德令哈之前，我这组只有老周一人会看地平。他上蹿下跳来回奔跑，忙得一塌糊涂。就这样，有的地块来不及察看，低处的土挖出来被抬到高处，地就不平了；返工的事经常发生。如今不同了，老周和我各领一人，一副筐，专啃需要大动干戈的骨头。在我的提议下，老周把小组其他人分作两摊，一摊平那些劳动量较小、只需动锨无须动筐的地块；这些人只要把高处的土取挖若干摞到低处即可。另一些体力较弱者紧随其后，他们把这些处理过的小坑小洼用锨拨拉平。这样做，平地的质量好，进度快，令外组瞠目。

由于精神上的解脱，相对宽松的环境和生活好转，到了1972年冬天，我的身体恢复到最佳状态。在场上劳动时，各组选派最棒的劳动力装车，我也当仁不让，两百斤的麻包也扛得动了。

邹庆礼君在另一小组，几个月下来，我和他认识了难友朱彬。

朱彬是一组的犯人组长，兼管办中队黑板报的工作。他是辽宁或者吉林人，大我七八岁，四十刚出头。他中等个子，身材匀称，性格开朗，非常健谈。东北解放时他参加工作，到军政大学学习后，在部队当文化教员、宣传干事。全国解放后，部队送他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深造，他也成为中共党员。大学出来分配在《健康报》当记者，印象中还是外派到某省市的采访组长。

他向我和邹君较详细地谈了他的“犯罪”经历。

1957年整风运动开始时，他从外地接连发回高等医学院校和医务工作者的鸣放报道，没想到眨眼间他成了“反党吹鼓手、喉舌、急先锋”。他被划为右派，妻子离婚，也带走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他原本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发配到大西北，在劳教队当管理员，享受干部待遇。没想到朱彬不领情，反而干出了戏剧性的“反

党叛国”勾当。

当时，他管理着劳教队的财政大权。男女劳教人员不得带现款在身，一律寄存在他这位管理员处。需要开销时向他请示报告，而劳教队的伙食费也由他掌管着；因此他手头经常有几千上万现款。朱彬有划右切肤之痛，又受妻离子散之苦。他利用自己的干部身份，频繁找劳教分子谈话，对他（她）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又翻阅他们的档案资料，终于物色到一个理想的合作者。这人驾驶过飞机，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体格壮健。两人很快交心，策划一道偷越国境。某日，朱彬以到县城采购为名，挟带着公款和私款离开了。他由玉门乘飞机，经西安短暂停留，仅用了一天便到达西部边陲的云南昆明。

他和那位飞行员购买了必要的工具和一应所需物件：雨衣、油布、长筒雨靴、火柴、打火机、手电筒、望远镜、刀剪、绳索和食品等，准备缜密而周详。两人从昆明去到西双版纳的景洪，接着一头扎进原始森林。在密林里，他俩昼伏夜行，经历了各种艰难，蚊蝇叮咬，蛇蝎袭击，虎豹惊吓，大雨浇淋……有时睡在乔木树干上，有时匍匐在草丛里，一连数小时地窥听动静。一句话，吃尽了苦头。在距国境线一步之遥的关键时刻，他俩被边防军人发现，无情的枪管直指他俩的脑门。他就这样丢了干部饭碗，而且作为首犯被判十五年；那位飞行员是从犯，判了十年。

朱彬言之滔滔，我听着他的故事，回味良久。我与他相差七八岁，经历有许多相似之处。不同的是，他是为了个人的生存和出路不得已地越境“叛国”，我是在高度理性支配下心甘情愿地走上了反抗之路。

朱彬与邹庆礼和我相处甚好，他对我俩还讲过劳改中的经历，其中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

1959 或 1960 年，当时他在西宁附近的劳改营服刑，好像是在某个厂矿。犯人都饿得不行了，有人拿一件袍子只换得一块馍，一件上等的大衣换一个馍。有的犯人乘机发财，拼命节约换得不少好衣物，最后还是饿死了，东西全成了人家的。有些自由犯，出工到

场上经常偷麦子回来煮着吃。麦粒难消化，从大便里排出来仍是麦粒。监号里不能外出的犯人饿得无奈，就把这些自由犯厕的屎弄来，放到缸子里，洗了又洗，搓了又搓，挑出麦粒拿来煮吃，弄得满监号臭气熏天。

他说，人吃人屎还确实起作用，真救了些人命哩。

我听说吃人屎的事这是头一遭，我是相信的。读史书只知“易子而食”，特记于此，以补史书之缺漏矣。

1973年元旦到了，心情颇好。朱彬向我约稿，我答应了，写了篇散文诗《春之曲》，登满一黑板。还记得文中写道：

巴音河两岸，矗立着无数棵白杨。此时，枝杈上泛出斑驳点点的青意。它们虽依旧赤身裸体，受尽北风的鞭笞，却从未卑躬屈膝过，如今明显露出傲首向上的气概来。

离离原上，放眼望去见不到一个活物。但在冻土下面，在巨石重压的底下，有无数草芥籽种在萌动，在甦醒。你可感觉到，它们正用双手拼命往上推，用头颈狠命往上顶；你能听到，它们发出惊天动地的呼喊：

“我们有生的权利，我们要破土发芽！”……

呵，春姑娘来了！飘飘荡荡，从天而降。有的着彩霞霓裳，有的穿百鸟羽毛织的罗裙；有的披百花编的浣纱，流光四溢，五彩缤纷。那夹着冰块卷起层层涟漪的流水浪花，是她曼舞的碎步；那抚摸人们脸颊的温煦风儿是她的纤纤玉手……

歌唱吧，纵情欢呼吧！因为，春天来了。

朱彬颇欣赏这篇文章，他又征询我的意见，欲将“我们有生的权利”这一句删除。他说以防小人钻空子，我赞成他的意见。

写《春之曲》，我是直抒胸臆。我仿佛感觉到了什么，林彪坠机亡命，“一打三反”运动已是强弩之末；严冬将尽，我似乎已经嗅到了春的气息。

大概是在1974年或是1975年，朱彬刑满释放，留场就业。1978年右派改正，他也得到了平反并调回西宁，仍在新闻单位工作。以

后邹庆礼来信告诉我，朱彬已成家，新找的爱人也搞新闻工作。我真为他高兴啊。

好景不长，1984年底，我从邹庆礼的来信中得知：朱彬突遭意外去世。一个晚上，他与新婚妻子在西宁火车站前的街上散步，一个醉鬼用酒瓶猛击他后脑，立时毙命。

1985年夏我出差西宁，亲眼看见了法院对此案作出判决的布告，验证了这消息的真实性。凶手与他素不相识，全因酗酒失控，被判了无期。

朱彬是性情中人，有胆有识，一个敢讲真话的人。原本他还可以为社会工作二十年，竟这样走了，令我惋惜。

哀乎，朱彬，愿你一路走好，莫像阳世再栽筋斗。

三、我认识的初立朋

这中队犯人中，还有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快进入了我的视野。他叫初立朋，上海人；才五十左右年纪已全秃顶。此人模样出众，身材高大，膀阔腰圆，力气奇大。乍一见他，会以为这是个粗人，他经常打着赤膊，皮肤是发亮的古铜色。他嘴瘪瘪的，似乎牙齿脱落了很多，但面容依然很慈善，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气质。

初立朋解放前毕业于清华大学，可能是化工系，记不清了。大学时期他参加过国民党，听说还当过国民政府最末一层的参议员。他和他妻子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并无劣迹恶行。然而在1957年反右后期开展的“社会大扫除”中，他被看作社会垃圾扫进了劳改队，而且判了长刑。

原来的犯人告诉我，初立朋以前一直在大田劳动，除了严冬两个月，他通常只穿一条短裤，赤裸着上身打赤脚，劳动非常卖力。他用光脚丫蹬铁锨，一人能抵两三人干活，中队无人能比。他的饭量也大得吓人，管教干部为照顾他，把他调到伙房当了伙房组长。

伙房组长也即是中队的犯人大组长，职位非同一般。我在看守所时认识的张士俊、巴仓五队的张姓组长何其了得，莫说顶撞，即

使你脸上稍微带些不悦，马上施以颜色看。你当小组值日去打饭，他故意少打些，回到小组后就有你好看。饥荒年间伙房组长握着勺把子，如同攥着犯人的生杀之权。有人乘机敲诈勒索，把犯人的手表、高档衣服等洗劫一空。在我印象中，伙房组长拉拢干部，欺凌犯人，是狱霸中的恶霸，“人渣”中的渣滓。

初立朋当伙房组长却是另一码事，他不说话不回嘴，成了犯人的“出气筒”。监院内离大门不远有眼井，井离伙房约五六十公尺。平时伙房专设一人从井里吊水，担水，供伙房洗菜烧开水烧饭之用，这是伙房里最重最累的活，如今竟是初立朋兼着这项劳动。他膂力过人，连扁担也不用，只见他两只手提着四桶水来回奔跑，就像少林寺练武功的和尚。那四桶水，足有一百公斤重呢。数九寒冬，我亲见他站在井旁冷水浴，一桶水由头顶直灌全身，像幼年我见日本俘虏在崔家祠堂洗冷水澡一般。初立朋光着身子，浑身古铜色，犹如一个铁人。我很羡慕他的好身体，尤其佩服他的意志力。

有个休息天，不知何故，四组组长戴怀悟和二组组长干起仗来。戴是浙江人，长得漂亮出众，尤其双目炯炯有神，异常精明。他年龄与我差不多，或许还小我一两岁，正年轻气盛。二组组长是个高个儿，山东人，也是三四十岁，血气方刚的年纪。双方由争吵到对骂，彼此跃跃欲试要动粗。眼见一场恶仗即将爆发，但休息天管教干部不进监院来。此时的伙房组长负有调解责任，初立朋奔到我面前向我求助。我觉得有点奇怪：我狗屁不是，算老几？这两个组长都以脾性暴躁闻名，我担心他俩不买我的帐。初兄站在我面前一副窘态，莫可奈何又极诚恳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只得硬着头皮陪他走一遭。我俩一番劝说，终使吵骂平息了。

初立朋拉我到伙房门口，细声对我说：“主在我们心中，主会保佑你的。”

1974年，初立朋和我都调到了朶海一大队二中队。不久他便刑满就业，在猪号喂猪。1978年底，我被调到德农总厂中学教书，听说领导也点名要他，被他拒绝。他安心于他的猪倌角色，比我更看破红尘。

1980年3月我回德农办离场手续，听说初立朋已经回上海了，是他妻子来接走的。他妻子对他坚贞不渝，感情如初。以后从上海传来讯息，他妻子身体不好，初立朋代妻上班搞化验工作。我想这项工作对他来说，已是游刃有余了。

我从初立朋身上感到了宗教之伟力，只是始终没机会与他深入交谈。听说他是非常认命的，“一切都是主的旨意”，他心甘情愿地承受了自己的命运。

四、我认识的姚士彦

1973年春节过后，我这小组人员有了变化：姜有祖、李竹叶刑期届满，调到外面去喂猪、种菜；邓安瑶调到中队伙房做饭。

这时报上推广施用5406菌肥，文中言之凿凿说效果不错。在德令哈农场，尕海四大队率先试制并使用了它。春播刚过，大队调我去搞菌肥试制。我此时服刑已进入第十三个年头，超过刑期的三分之二，我也具备了当“自由犯”的资格。得以自由行动这一点，极大地改善了我的生存环境。

一个四十出头的中年干部来监院领我出监，这也意味着他要为我“负责”。此人身材魁梧，穿着白衬衣，肚子突起，说话慢声细语，是一口带河南腔的普通话。我觉得他风度不俗，有文人气质。

我们绕过监墙东面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平房，有妇女和儿童在我身边出现。这儿不在大田犯人出工的“过道”上，是我从未到过的地方。它是副业队的领地，在这里工作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不少人拖家带口。副业队里有人做酱、醋，有人酿酒，还有的人理发；更多的人是喂猪，种菜。我们一路又向北，直到一所较高的房子里。

带我过来的这位干部叫刘发江，河南辉县人，时任大队生产干事。此前他已为我配了两个助手，姚士彦和方洲观，他们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刘发江对我们三人的工作作了简要布置，他说，制作菌肥技术上由我负责，生活管理由姚士彦负责。他让我们每周给他报个计划和小结，只要简单几句话就行；为的是让他了解情况，掌握

进度。凡工作所需，可以找向医生借或取，他会全力支持的。

刘干事一走，姚士彦就告诉我，刘发江是正规农学院毕业的，向医生也是正规的兽医，是从畜牧学院毕业的。他们两人是大队干部中的秀才。

难怪二大队的生产搞得井井有条，干部中竟有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明白人，这是我不曾想到的。

刘干事走后，姚士彦和方洲观领我把房子看了一遍。这个屋子是全大队最高的建筑，虽然它只是一层平屋，但比其他平房要高一倍。房顶侧向开着天窗，屋里靠门处约有三四十平米空间，里面另一端，有两个门对门的小间，中间隔个窄窄的走道。我想：这正好，一个小间可以用作接种室，另一小间可作菌种培养室，隔开来便于消毒控管。在紧贴小间的外间墙，我拟砌个炉灶，既用于高压消毒又可煮饭取暖。我与方洲观住靠门的一侧，姚士彦住另一侧。姚夜里要看书，他怕影响我俩，用纸棚和布帘围出个小房。

姚士彦和方洲观二人，我一眼能看出都是知识分子。尤其姚士彦，我推测他可能是大知识分子。他年过六旬，驼微背，脸呈熟橘皮色，嘴巴很宽，上下唇颇厚，用着带牙托的假牙。他是浙江诸稽人。方洲观似乎比我大不了几岁，说一口四川话，是陕西汉中人。

我开列了一份清单，上书所需试剂、仪器设备，我和姚士彦便去找向医生。向医生全名向怀烈，他是我在劳改期间见到的唯一一位同姓者。他是四川人，乡音未改，年龄三十稍过，身体颇健，人很爽快。他答应凡他有的，随便我来借取。末了，姚士彦给他写了张领用单；我们抱回一大堆东西，连高压消毒器也掂来了。我又设计了一个菌种培养箱，画了尺寸草图，交大队木工定制。然后是四处搜寻玻璃罐头瓶子，拟做二级菌种扩大培养用。接着又开始准备牛皮纸、橡皮筋、药棉塞子，动手制接种针；一切按部就班进行。

一切顺利，只有一点我感觉不好。此时我还是犯人身份，一日三餐都要跑到监院里打饭。进监、出监都要喊报告，非我所愿。很快，老姚就帮我解决了困难。

老姚是个大度人，他对我毫不吝啬。每月他拿农工正一级的工

资四十八元，除了订书报便是吃，花得不剩一个子儿。他主动要和我合伙吃饭，我每月把口粮一次性地从监内打出来，每周改善生活时进监打两次菜。平时由他到职工灶买菜，吃他的。犯人伙房对我颇照顾，又适逢邓安瑶掌勺，每次打菜都能打满一小钢精锅，邓还多挑拣些肉给我，弄得我心里不舒服。邓则说，你一周只打两次菜，油少吃了多少？菜节约了多少？这两次多打些原本应该的，你也没占大家便宜。

每次打的肉菜够我和老姚吃两天，老姚爱吃肥肉，恰巧我肥肉不沾，只吃瘦的；我们各得所好。打的面粉只能擀面条，我性子急，揉面总不到家，面条一下锅全成浆糊；弄得老姚和我一道吃了一年的浆糊。他却从不埋怨，还总是说：很好，不错。

我很快与姚老成了忘年交，他叫我“小向”，一直叫到1998年我最后一次到杭州看望他，叫到我已是白发满头。我则尊称他“姚老”，一直到他去世也是如此。

我和姚老无话不谈，但对方洲观有所戒备。有时我俩正聊得投机，方洲观一来，我们便换个话题或戛然而止。姚老说到他见我的第一印象：小向呐，你无论走路说话，举手投足，无论外表和气质，一个标准大学生样子，一点没变，难得呀。

这印象也是对我的评价，以后几成他的口头禅；其含义有褒有贬。那贬的意思是：还这么单纯，这么幼稚。自然，话里充满对我的爱怜与信赖。

姚士彦出身于杭州附近的地主家庭，家境优裕，幼年受到极好教育。他母亲是那个时代的浙江才女，也是研究元曲的学者，五四前后曾在杭州一所著名小学任校长。他父亲年轻时东渡留日，回国后曾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上发表过有见地的文章。姚父与江西督军、湖口通电讨袁的国民党元老李烈钧交往甚密，在病重弥留之际，姚父将幼小的士彦嘱托给李烈钧，请他代为庇护照顾。

姚士彦1930年代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大学时期的他拉京胡，演话剧，多才多艺又富正义感，是进步学生中的活跃分子。他在上海时积极参加了抗日民主运动，是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干

事。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他曾与著名电影演员胡×假扮夫妻，经常更换住所，在遍布军、警、宪、特的大上海与国民党周旋。1936年11月，“七君子”在上海被捕入狱后，特务在章乃器的记事簿上查获到姚士彦的住址，将他抓捕。

姚士彦抱定救国无罪的决心，没有出卖同志。这时他母亲托了他的连襟将他保释出狱，而他的这位连襟张太风，曾经是中共地下党员，这时早已叛变，成为中统特务组织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要员。实际上张太风是把姚士彦作为靠拢 CC 特务的外围组织成员保释出来的。姚士彦后来在回忆中写道，那时地下党对被捕出狱的人立刻割断联系，他成为一个有疑问、待审查的人。这使他感到精神上十分痛苦，但他没有放弃努力，决心以行动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抗战爆发后，姚士彦在天目山老家进行抗日宣传；继而在1937年参加了江西省青年服务团，在江西工作前后八年时间。他先在永修县政府担任政府秘书兼战工队长，从事联络通讯、动员乡民等支援军需等工作。1939年10月他从赣北敌后回到江西吉安，又应王造时、刘九峰之约，进入《前方日报》工作。此后，他担任该报主笔并主持了一系列编辑工作。

1940年，时任《正气日报》社长和中央通讯社战地特派员的曹聚仁到吉安，姚士彦和他一起跑过战地新闻。1942年，由于曹聚仁的联系，姚士彦应宦乡邀请，到上饶参加了《前线日报》的工作，直至抗战胜利，并随《前线日报》迁往上海。

在大半个中国惨遭日寇蹂躏的时候，姚士彦曾辗转于鄂、赣、皖的崇山峻岭，将设备驮在马背上，报道国民党第三战区在沦陷区游击抗日的情况。认识姚士彦之前，我都不知道国民党军队也曾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49年前，姚士彦的名字曾被载入《上海六十名人录》。

上海一解放，他马上去军管会汇报了自己的历史经历。军管会的人说，你的一切情况我们都很清楚，你没干过坏事，安心好好工作吧。其时，他进入上海财经学院，教政治经济学，任副教授，还

兼任了校教工会主席一职。

1952年，高校开始“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一来，家庭出身和历史问题交织，他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到1955年7月，肃反运动开始，姚士彦被看作“隐藏的反革命分子”，标记为“胡风分子”逮捕。1956年12月，他被判刑十年，送到江苏灌南县五图河农场服刑。至1958年，他随江南大城市的大批犯人一起被调至青海德令哈农场劳改。

姚老幼年丧父，中年丧妻，经受了人生的两大悲哀。送来劳改后，他在上海财经学院教过的一个学生调来青海工作，打听到他的下落，专程来看望他。以后就调他去财务处办公，还讲授《会计学》；我现在还保存有他编写的《会计学原理》。所幸劳改期间他一直在分场场部当会计，每月发七元技术津贴，身体没吃大亏。

姚老有两女一子，他1965年刑满后留场就业。十几年来，他很少回家探亲。我猜他一定有难言之隐，但也不敢问他。

五、制造5406菌肥

5406的试制工作进展顺利，无论是扩大菌种还是培养二级菌种，都是一次成功。接下来的工作一环套一环，马不停蹄。在菌种接种时，刘干事来看我操作。

拿了十年铁锹和锄头的手，猛然拿起小小的接种针，掂不出轻重，我的手有些颤。隔着玻璃窗，刘干事在外面喊：没关系的，即使失败了，重来一次。你胆子放大！他大声鼓励我。

我们用保温箱的恒温培养菌种，热源是一支一百瓦的大灯泡。灯泡放在箱底，上面隔层五合板。夜里我每隔一个小时检查一次，温度达到32℃立马停电，降到27~28℃又供温，温度过高过低都不利菌丝体的发育。二级瓶装菌种的培养快结束的时候，我便琢磨起大床生产了，这是最后一道工序。

贴着我们住的高屋后面是两间土平房，一间住着老两口，另一间空着。我打起那间空房的主意。

老两口是我们唯一的邻居，就业人员姓黄，人们都叫他“老黄牛”。他是广东人，五十多岁，在副业队就业，专喂一圈猪。他老伴头发白了，比他更显老。这位老嫂子千里迢迢来陪伴丈夫，我对她深怀敬意。

看见他们的家，不由得想到解放前我自己的家。他们比我过去的家还差一截。一间土屋，就十来个平方，一张床占去多半，床上仅一床破被褥。床面前一只土炉子、一口小铁锅，另有一只钢精锅，三四只碗、两双筷。还有两只纸壳箱，是用来装面和装衣裳的。此外，家门口有只矮凳。环顾一圈，可以说是家徒四壁。老黄一个月四十来块钱，一份口粮两张嘴，职工灶伙食他也吃不起。我亲眼见到，他从喂猪的白菜帮里拣些好的，拿来炒菜或下面条。夫妻俩都很慈善，虽然互相体贴，毕竟也上了岁数，我很为他们的寒碜日子难过。每到他家，心里便涌出悲戚之感。

我收拾好了他家旁边那间空屋，封闭起来消毒。接着为大床试验准备燃料，这里极缺煤，只有一个解决办法，那就是到尕海湖沙滩去挖沙柳。

姚老干不动这活，我和方洲观也不叫他去。姚老说：你们吃苦，我在家享福，心里不安。三个人的任务，重的干不了干轻的，总要尽我心意。他非去不成，怎么说都不退步。

结果，这趟打柴把姚老累得不轻，过了半个月才恢复。

燃料依然不足，我和方瞒着姚老起了个大早。我们吃饱喝足，计划速战速决。我们开水也不想带，多个暖瓶多份累赘。由二大队向东南，我俩跨过麦地和菜园地，进入了大草原。草原上全是大大小小的沙包，遍长各种柴草。这里只有一条打柴人踏出的小路，直通沙滩深处。我俩带着架子车一溜小跑过去，就这样快步赶路，一气赶路十多里才停脚。十时许，便到了作业地。

沙柳是种生命力极强的怪树，它在地面露出不多几根枝杈，枝条上长着细叶，大部分根茎深埋在沙包里。地面上的枝条只有拇指粗，沙包里的茎与根却有大腿粗。

我们用铁锹掏沙包，而不是挖。沙包掏空后，沙柳的茎和根才

完全露出来。这些根都是互套在一起，盘根错节。地面上看似两棵沙柳，互不搭界且相距甚远，但在沙包下可以看出，它们其实是同根的一棵树。茎与根粗而脆，很容易折断。我们用了个把小时便打满一车柴火，我的这一车足有五百斤，方的车在离我三五百米远处。我们互相打了个招呼，同时起步踏上归途。

开初一阵我还浑身是劲，也并不觉吃力；后来就不行了，车轮不时陷进沙窝里，把车拉出沙窝简直得掏出吃奶的力气。时间稍长，柴车更加沉重起来。大沙滩的中午没有一丝风，四周除了沙子便是砾石。太阳晒下来，气温骤然升高。即使在秋末初冬，中午也有三十好几摄氏度。我觉得浑身燥热，口唇焦渴难忍。眼看方洲观离我越来越远，转瞬已不见人影，心里越发着急。我咬紧牙关坚持，每挪一步，思想都要一番苦斗。汗淌尽了，全身都仿佛干涸，整个躯体里不再有水分。我开始头晕，感觉舌焦唇裂，眼前满是迸发的火星，浑身在燃烧，天旋地转……我似乎休克了，思维停顿了一阵。一待恢复神智，我便试图从地上爬起来。此时终于发现，我的体力已全部耗尽，连站也站不起来了。

我索性平展展地躺在小路上，任背脊在滚烫的砂砾上炙烤，心里考虑着咋办。这事原本不难处理，或将柴撿掉，拉空车回队；或者空车也拉不动，就撿到沙滩上，明天再来取。这不会有人说什么，打柴原本就是我们自己决定的，无人指派。再说，大沙滩上鬼都找不到一个，也没人会来将车拉跑。然而，当时我脑子想的完全是另一码事儿：把车撿到这儿，万一被人拉跑了，说我盗卖公物咋办？

此时此刻，我浑身酥软得像没有骨头，像被人抽了筋，只剩大脑还是清楚的。大沙滩上有黄羊、兔子，也有狼群。我必须在天黑前离开，就是爬也要爬出这个地方。我想爬到菜地边沿去，那儿有间看菜园的小土屋，目测只有一公里的样子，房子的形状清晰可见。只有到那儿我才会安全无虞，还能看着架子车不被人偷走。也许，太阳西沉，热力减退，我的体力会恢复一点吧……我陷入昏迷，什么都不知道了。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终于又苏醒过来，我勉力爬，爬了一米又

一米，不知爬了多久，总算到了土屋。屋里没人，空无一物，唯有个土炕，炕上垫有一些草。我又爬到菜地里，刨啊刨，刨出一只大萝卜。这是救命的萝卜，我大口大口嚼起来。萝卜真甜呐，它胜过孙悟空偷吃的人参果、蟠桃园里的仙桃。一只大萝卜下肚，简直是万病皆除。

晚上八九点，我回到住地，对姚老和方绒口不提这段。

渴之极限，1961年我在看守所经历过。那时饿得无奈，将一碗甜酱全填入饥腹，夜里渴醒无水，渴得喝自己的小便……但那时我的神智却清楚。这次凶险得多，几次没了意识。在沙包里整整折腾了五个多小时，与死神长久拥抱共眠，差一点成了饿狼的美食。

六、几件小事

姚老兴趣广泛，晚饭毕，总要拉一阵京胡，有时还自拉自唱一段。他的演奏和唱腔都很地道，很有功底。后来他告诉我，初来劳改时，他曾在劳改队京剧团干过。自娱一番之后他就看报读书，我和方早已入睡，他的灯还亮着。他订了份《人民日报》，在经济拮据的当时，就业职工中肯花钱订《人民日报》的就只有他了。偶尔他也下围棋，一星期一两次。有个叫陶寿春的职工，上门来找他对弈。下围棋我也会，但我不露声色，只是在一旁观战。

姚老为人善良，性情随和，平时很难看出他的所思所想，其实他内心是很悲凉的。我后来知道，他还遭遇了人生的第三大不幸。被捕入狱后，他留下三个儿女，小女当时只有四五岁。两年后，他的老母亲去世，三个儿女到处漂泊。小女儿流落到农村，长大后嫁给一个老实巴交的文盲。儿子没读成书，当了个理发匠。因为父亲是劳改犯，儿子找不到老婆；受刺激以至于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三个孩子中，只有大女儿读至中专，现已为人妻，育有一女。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是养儿防老，姚老晚年却无法依靠儿子生活，真是满腹辛酸泪，唯咽肚子里。在1957年之前，据说宋庆龄和章乃器都曾关注过他，还曾多次向姚老的母亲打听他的下落。他的案情本

可通过调查取证得到澄清，偏偏姚老既固执又懦弱，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他拒绝给任何亲人、友朋只字音讯。

姚老从青年时代就一腔热血追随革命，没想到革命成功后难逃一劫。姚老沉痛地告诉我：“我对共产党相信到底了。叫我好好工作，我就拼命工作；叫我好好交代，我就剖腹剜心地交代。没想到越交代问题越大，步步升级，直到停职去徐州集训。去那里的人又都是高知，集训干部变着法子整人。大会小会吼声如雷，日日夜夜合不得眼！国民党监狱的种种酷刑，那都没有几天几夜不叫人睡觉的刑罚厉害。罢，罢，你要我交代什么我交代什么，就这样判刑十年。我不是三岁小孩，不能出尔反尔再翻供。我的问题再也洗刷不掉了，我的后代更别想洗清。”

他哪里知道，我在十九岁经历反右时就受到“疲劳战”的折磨，其程度一定不比他差。我不能告诉他，他已经悲痛欲绝，我还能火上浇油？就算两人抱头痛哭一场，又有何用。

我问姚老：“您都刑满这么多年了，为何不回去看看？”

他悲戚道：“不是不想，是怕。我没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心里有愧啊。儿子、女儿、女婿有权利不认我，不理我。但我在上海、杭州还有不少新闻界文艺界的朋友，如何满子等，还有北京的聂绀弩……他们不理我，鄙视我，我这老脸往哪儿搁？想起这些，真恨不能早死！”

姚老是我的父辈和老师，我处处尊重他，唯他的想法我不能苟同。解放以来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有多少？每次运动都有百分之五的人遭殃，而实际挨整的人超过百分之五。如此，所谓政治清白的家庭还有多少？哪个家庭没有亲人朋友被抓、被判、被杀、被冤？姚老的那些朋友都出身旧社会，又是大知识分子，姚老被判刑，朋友们也难保不受运动冲击；无非是时间先后而已。但我相信，他的子女已过而立之年，应该能理解他，原谅他。我对姚老道：“您没做亏心事，何怕之有？一直抱着这个想法，那才是真正作践、糟蹋自己。我盼您振作精神，昂首挺胸地见人。”

姚老终于被我的话说动了心，他答应明年春播把 5406 试验田种

下去，就请假回家探亲。

天气冷了，人们开始穿上冬装。一天，刘干事来请姚老帮他家糊顶棚。姚老糊顶棚堪称大队一绝，无人可比。他带我去当助手，刷浆糊。去时，适逢刘干事家正在吃饭，他见我俩来了立即起身，全家老小都站了起来。刘干事邀我俩一起进餐，我俩婉谢后，他又张罗着为我们沏茶。

以后我们又去向医生家糊顶棚，也受到相同礼遇。后来我有事单独去，两家人依然如故。尤其是两家的小孩都很懂事，彬彬有礼。那时的我，内心是人，外形已很不像人。刘干事与向医生都是专攻我的人，能待我以礼，令我感动。

11月，菌肥进入大床生产阶段，三个中队各派来一职工来参与。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菌肥生产将由大队向中队铺开。从我原先中队调来的职工叫顾用之，上海人，近六十岁，长得瘦而精神。他原来是上海的一个小学校长，写得一手好字，又特别爱整洁。他的穿着、用具无不清清爽爽。此人脾性既直又倔，倔起来叫人不敢相信。只要他看不顺眼的事，无论是谁他都敢申斥，一点不留情面。顾用之给一般人的感觉是清高难处，但他与我却很投缘。我俩合作默契，夜里值班，检查室温，通风散热或添柴加温，他都一丝不苟。

白花花的菌丝体终于长了出来，满屋涌出淡淡清香。直到此时，我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还有方洲观，我发现他并不坏，不是姚老和我担心的那种人。他只是有点小气，有时斤斤计较。而生活与劳动正是姚老和我最能包涵的，只要不打“小报告”，不搞政治陷害就行。我和姚老吃政治亏吃怕了，再吃不起。不过方也有点小毛病，干活毛糙。他对我或多或少还有一点优越感、一点骄矜。他自称老高中，许多本该懂的知识却不明白。一次我叫他用无水乙醇配百分之七十五的消毒剂，他不会计算。我写了个计算公式给他，没想到他居然连一元一次方程也算错了，配的试剂不能用，白浪费了。让他煮高压釜消毒培养基，他又心不在焉，结果超时，把高压釜烧变了形；幸好没发生人身伤害事故。高压釜很贵，全大队只有一只。姚老主动替他承担，

打算用工资赔。还是向医生好说话，他说：“没有伤害就是万幸，釜还能凑合用，算了。”

从此，方洲观对我颇友好，对姚老尤其尊重。

分场要放电影，往返有十公里夜路。姚老年纪大了，力不胜任。方邀我同往，我们接连两个晚上同去看电影。头一晚看的是日本影片《望乡》，第二晚看的是朝鲜影片《卖花姑娘》。每次正片开映前还放些新闻短片，内容有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还有他接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及国务卿基辛格等。

我已有十四年没看过电影了，这次观影我惊奇地发现，毛主席已老态龙钟。他接见尼克松时坐在沙发上，起不得身，还要人搀扶。以前他接见红卫兵时，红光满面，精神焕发；不到几年已判若两人。这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人，晚年斗人达到疯狂，多少老将、党内精英都死于他手。没料到最后林彪叛逃，斗人斗到自己的头上，他也有惊魂隐痛吧？

通过新闻短片，我清楚地意识到，“万岁”已来日无多。

七、没有不散的筵席

这段时间，我还收了个学生。他读小学三年级，他父母硬把他推给了我。他的父亲叫郭士渠，江苏人，副业队就业职工，在大队开了个理发铺，人称“小剃头”。这孩子智力发育不甚好，功课跟不上，急得两口子跳脚。我教小孩颇有耐心，不教懂不放手。孩子学习有些进步，夫妻俩对我千谢万谢。孩子每天晚上过来找我，有时给我捎点好吃的，说是犒劳我。他父母与我年纪差不多，都是三十出头，年轻能干，人又活泛，日子过得可以。同是就业之家，他们家比起“老黄牛”的家就像是两重天。

向医生也常到我这儿来，他比我小两岁，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他对数学尤其平面几何饶有兴趣，常与我一起讨论一些难题。说起几何，我得感谢初三教我平面几何的樊老师，那还是1953年的事。樊老师是江西修水人，我在九江一中有幸成为他的学生。二十年过

去，平面几何的定理我还没忘记。

按照刘干事的要求，1974年春节前后必须完成920的试制。920是一种促进植物生长的激素，据说喷洒在豌豆以及一些蔬菜上有显著的增产效果。刘干事从副业队要来一块地，大约半亩多面积。他对我们三人嘱咐道：“我们不搞假的，搞的是科学，不要人云亦云，必须经实验验证过真正有效，才能使用和推广。你们必须做好对比实验。”

对比方案出自姚老之手，他把半亩多实验田划分成八等份的小畦。播种毕，姚老请假东归。我和方洲观则每日忙于一级、二级菌种的扩大培养，还要完成培养基配制和高压灭菌工作。此外，我们每天必到实验田里察看动静，犹如关心自己的孩子，我们是眼巴巴地盼着种子快些发芽。

五中队的生产基地离我这高屋不过三四华里，那儿有麦场、猪号、菜地。小麦地也集中在那一带，与四大队的地块挨着。一个星期天，我抽空先去那儿看望了姜有祖、李竹叶和苏炳初；顺着干渠又去了四大队和分场副业队，看望我的两个老乡。

四大队的同乡叫黄宗华，年近六旬。他牙齿不整，肤色却白皙透红，模样清秀，说话慢声细语，斯斯文文的。黄宗华是赣南人，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按年龄推算，他比姚老稍低两三届。我不知他的案情，也不知判了多少年、何时刑满的，只是听说他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当属“历史反革命”一类。他是柏拉图主义者，终身未娶，孑然一身。此前他也听说过我的些许情况，如今见我身体尚好，人还年轻，俨如亲人，欢喜的了得。他忙着去灶上打馍，又切菜炒菜，恨不得把心掏出来给我。他说：“这世上我无一个亲人，今后你是我唯一的亲人，盼你常来看我。”我问他今后的打算，他神情惨淡地说道：“还能有什么打算？在此老死而已。”

我走时，他送我送了很远很远，一直送我到分场背后。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果真是如此。

这就是一辈子的一生，我还能说什么呢。

罗时甫是我的又一个老乡，他是南昌市人，毕业于江西财经学

院，比我大五岁光景，却已秃顶。他身上少些黄宗华的儒雅，案情属于“经济犯罪”，判了十年。刑满后他在分场副业队，负责操作一台轧面机，专门轧面条。初认识时他劈头就告诉我说，他是被冤枉的，死都不服。在劳改期间和刑满就业后，他一直坚持上诉，他先后写了数十封上诉状，却从未得到只字回复。

试验田的小麦发芽齐整，长势喜人。用菌肥作基肥的一畦，长得墨绿墨绿，肥嘟嘟的。刘干事、向医生、战队长还有施正丰（一大队统计，上海人）都不时去观光。

转眼间，姚老探亲回来了。见到我他喜形于色，忙不迭地说：“小向啊，真有你的。一切大致如你所料，我好高兴呵。若不是你打气，我这辈子恐怕见不到亲人了。我得好好谢你。”

他打开带来的大包小包，里面都是浙江土特产，有肉松、金华火腿等，摊了一床。他说，在上海、杭州，见到了许多友人，还有他教过的学生。大家都是恍如隔世，无一人对他报以白眼。言谈间人们感慨世态炎凉，唏嘘世事荒谬。他说：“那些在外面的，比我在里面的见得更多，体会更深。”

他又说，大女儿、女婿对他亦好。外孙女才两岁，活泼可爱，给布娃娃当医生，时而量体温，时而喂药打针，嘴里还不停地喊着：“外公，外公，快来看呐！”姚老听在耳里，心里像盛了一罐蜜。他在偏远的乡村找到了小女儿，她非但不记恨他，对他还更亲、更孝顺。小女婿虽是不识字的农民，人则极忠厚，又勤劳懂事。对他像对菩萨一般，尊敬有加。他没提儿子的事，我也不好问。

姚老好像变了个人，背也不驼了。我见他走起路来，步履轻盈。长期笼罩在他心头的屈辱、悲凉全都不见了，他还沉浸在团圆的喜悦和兴奋情绪中。

8月，我们对实验田的麦子分小畦收割，脱粒，过秤。姚老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总结，获得了较理想的结果。我也学到了数理统计知识，但还不能明确判断920的效能。刘干事则指示说：“再试，直到有肯定结论再议。”

正当我准备搞食用菌和灵芝的时候，场里传来消息，犯人要调

走，二大队要改为职工大队。姚老悄悄对我说，刘干事已向分场写了报告，要求把你留下来，你不要心乱。我则预料到，我的案情重大，还有四年多刑期，怕是难以留下来。

果然，不几日，刘干事通知了我调动之事，他又嘱咐道：“把该交代的事向姚士彦移交，尤其是一些技术细节，你向他介绍清楚，做好准备，以免措手不及。”

我把保存菌种、退化后的提纯和复壮等事宜向姚老作了重点介绍，他都记在了一个本本上。

到外面制菌肥仅一年光景，我和副业队的职工、家属和孩子们都混得很熟了。大家对我很友善，听说我要调出，连日里都有人来看我，说些客气话。离开二大队的头天晚上，姚老做东要为我饯行。我执意不从，他却毫不理睬，与另几位早早筹划安排好了。下午四点，“小剃头”的妻子就跑来操起炒勺，鸡、鸭、鱼、肉，样样俱全。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弄来的这些东西，真是神通广大！晚饭时，又有白酒甜酒，摆满了一桌。参加聚餐的人除了姚老、方洲观和顾用之，还有“老黄牛”两口和小剃头一家三口。

十多年来，我第一次面对如此丰盛的筵席，平生是第一次喝白酒。姚老和顾用之对我情深义重，说话时竟喉头哽咽。散席后，他俩又悄悄地各自送我二十元钱，还亲手缝进了我被子的棉絮里。

那时的四十块钱啊，何等贵重，足以买到四百斤粮，可供一个人一年之需。他俩都经济窘迫，对我竟如此大度。我至今难忘那段岁月和那些难友，你们现在都好吗？

八、爬过一山又一山

1974年8月，我又经历了一次调动。这次调动并非大规模和远距离搬迁，而是在分场范围内的调整。出发时不见一辆汽车，没有我从前经历过的大阵仗和肃杀气氛。犯人们背着行李卷，提着网兜，走得稀稀拉拉没个队形。干部和武警只在后头远远跟着，也并不吆喝催逼。

尕海分场管辖着四个大队，四个队的分布呈现出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大队部位于四边形的顶点，分场场部位于中心。二大队与一大队按“S”形公路，需经分场门口，约十五华里。两个大队的地头连着地头，若从地里斜插走，那就只有八九华里路。

两个大队毗邻，自然条件相差无几。然而，犯人的改造环境却大相径庭。

我和邹庆礼分在同一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新旧犯人掺和着。

中队长姓赵，不知名字；犯人背后称他赵老黑。这个绰号恰如其人，他黑得像块炭，是部队当兵的出身；平时作风粗暴，开口便骂人。大田犯人每次出工，他都要骂一通，唾沫星子乱溅，犯人都勾着头，任他发泄个够。

中队有个叫杨洪燧的犯人，比我小一两岁，原来是西北师大学生。他体格甚强健，我不知其案情。有次大田劳动，赵老黑盯上他，令他站在地里。杨洪燧平时大大咧咧，多有桀骜不驯之状，这次便与赵顶撞起来。我真替杨捏了把汗，以为他要吃不了兜着走；谁知竟没事。

这期间，全大队都在闹地震。有传言道，地震中心即在尕海。大队家属院里搭起不少帐篷，犯人多用塑料布在监院中撑个阳伞，白天、黑夜都睡在下面。不太在乎地震的人也有，他们仍住在屋子里，我和邹庆礼就属于这少数人。不过我们也不敢麻痹大意，我俩把头跟前的窗子大开着，事先观察窗外，如有障碍物如石头之类，立即将其清除。我们又练习了“后滚翻”动作，以便地震发生时，两秒就能从窗子里跳出去。我睡的铺位旁边是个老犯人，他在这儿改造有十多年光景了。他告诉我俩说，他可不愿睡到院里去，那院子曾经让他吓破胆。我们听了感到奇怪，他接着说，前些年说是搞反暴动演习，武警站在大墙上对院里空地开枪，子弹打在地上溅起一串串尘土。武警还用机枪扫射，吓得犯人躲在屋里不敢上厕所。我说，现在不会这么搞的，你放心。他说，这我知道，但一想起那阵势就怕。

这又是件新鲜事，我听了也不寒而栗。

记得有一天，那是个休息天，人们正在午休。忽听有人大叫：地震了！快跑！大家睡得糊糊涂涂，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惊醒，屋内屋外顿时一片混乱。有人提着裤子，有人被裤子绊住脚。人们跌跌撞撞从屋里向外奔逃，乱成一锅粥。有人因此头破血流，鼻青脸肿，伤情最重的一个竟跌断了腿。

原来是场虚惊，屁事都没发生。

以前在饮马农场四站住病号室时，我听人讲过，四站曾发生犯人梦魇惊乍之事。那是在夜里，先是一人大喊，引起全监室惊恐；由一个监室里的大喊大叫、狂奔乱跳引发了全监院的大骚动，像是地球末日来临。

大白天发生这种事，以前不曾听闻。我和老邹只在一旁呆呆地观看着，没有卷入这场歇斯底里的人不多，可谁也没有能力制止它。

又是一个严冬，北风呼啸，风像刀子一般刮得脸上生痛。大田犯人在南面平地，那儿有条陡坎，需要把它削掉。冬灌过后，地冻得铁硬。人们抡起十字镐，可扎到地上只留下一道白印。这么硬的土，得用钢钎，打大锤，用撬杆来撬。赵老黑有经验，他把全队最年轻的劳力集中起来，组成突击组啃硬骨头。杨洪翥、周孔章、我和老邹都在其列。气温在零下三十摄氏度左右，犯人光着膀子只穿条短裤，全都在刺骨寒风中奔跑。装冻土的大筐三筐摞起来，足有三百多斤重。抡大锤、刨十字镐的人也一样光着身子。这时，也只有这时，赵老黑才不吭声骂人，感到心满意足了。

这个中队有两个犯人小鬼，一个与我同组，叫马××，另一个叫周××，都才二十出头。他们被捕前是毛主席的红卫兵，中学生。马××家住兰州某矿务局，周××家在某铁路局，两人因打、砸、抢而犯罪，判的刑期不长。干部对这两位有点另眼相看，也许因为他们年纪小，又是红卫兵，令干部有自己人的感觉吧。他们劳动时或在干部面前说话时，都是满不在乎的样子。连赵老黑对他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由着他们。

我很快发现了这位马某的秘密，他经常躲在被子里吃东西。一大队犯人伙食比二大队差远了，年轻人饭量大，就连我自己也饿得

够呛。马某吃的馍是从一中队犯人灶上搞来的，一队灶上有个回民犯人，每星期都捎一小口袋馍给他。或许他们在社会上就有私交，或许马某给了他一定代价；对此我无心研讨。马某知道我晓得他的秘密，也猜我会守口如瓶；他心安理得，照吃不误。

与二大队比较，一大队各方面相差甚远，唯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在前院大门侧有间大平房，那是个乒乓球室。大队管教殷干事是个乒乓迷，犯人里喜欢打乒乓球的有杨洪燾和周××，后来又加上邹庆礼和我。几乎每个休息天，早饭一过殷干事就进来打球，风雨无阻。我们这五个人是大队打乒乓球的高手，其中又以邹庆礼和杨洪燾的技术最好。殷是知识分子干部，个子高大，性格随和，我们经常一玩一整天，吃饭挤空儿。室外围观的人也是密密匝匝，大家都很开心尽兴。

1975年过春节，监号举行象棋比赛，我也参加了。报名的共有二十好几人，赛事接连几天几夜。二队除我外，还有陈建忠和李应唐，一队有一个姓傅的，我们四人棋力相当，最后进入决赛。那几天里，我无论睁眼闭眼，满脑子都是棋。结果我拿了冠军，人却像害了一场大病似的。事后想想，这么多年过去，自己争强好胜的脾性一点未改，甚觉可恨。不过还是有收获，认识了陈建忠和李应唐，他们都已年过六旬，对我一直很友善。1980年3月我回青海办离场手续，还专程去看望了他们。

陈建忠，浙江人，仁慈宽厚，与世无争。具体案情不详，我只知他孤身一人，以劳改队为家。认识他不久，他便调到四中队看菜园去了。

李应唐是山西临汾人，经历颇富传奇色彩，犹如《新儿女英雄传》中的人物。他对我讲述往事时，我说，您要有机会一定把它写出来，太惊险感人了。如今我有了机会，他讲的故事却有许多记不清了，他本人大约也已不在人世。

李应唐说，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的事，远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他们便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物色汉奸种子，以后撒到全中国。临汾城有个中药铺老板的公子便是其中之一。“我那时在城里读中

学，这位少爷回国后躲在家中不做事，中学请他教书，他不干。七七事变一爆发，他就露出原形。日本飞机炸太原，炸临汾，有人见他在阁楼上，用反光镜为日机指引轰炸目标。日本鬼子占领太原、临汾，他摇身一变，成了日军大翻译官。”

李应唐说到他自己的经历：“全面抗战一爆发，我便投笔从戎，参加了山西的牺牲救国同盟会。‘牺盟’是阎锡山与共产党合办的抗日武装组织，实际被共产党掌控。我受训后，成为抗日武装的一员。太原、临汾相继沦陷，我在临汾城内外与日本人周旋。这时的我二十四五岁，是抗日区长兼区武工队长。我办的第一件事是成功地设计了一个圈套，将汉奸分队长处死了。我认识伪军分队长的妻子，她和她丈夫都是我中学同学。女的很正直，有爱国心，通过她给她丈夫做工作，夫妻俩很快成为我们的人。日本人每次清剿和出城抢粮，这个分队长都事先向我们报信，以致日本人屡屡吃亏，伤亡惨重。几次之后，日本人起了疑心，怀疑有内奸。分队副早想搞掉分队长取而代之，便向日本人告密。日本人抓了分队长，施尽酷刑；他招架不住，终于招供。结果他被杀害了，队副因此升了正职。原队长之妻对她丈夫感情深挚，发誓替夫报仇。临汾城内有我们多处交通站，如饭铺、铁匠铺都是。在群众掩护下，我经常进城，在鬼子的鼻子底下活动；加之我对城内特别熟悉，他们奈何不得。我和队长的妻子化妆进城，通过内线，早掌握这家伙的生活规律；最后在他姘妇家把他杀了。待鬼子发觉，炮楼枪响，我俩已翻过城外壕堑，远走高飞了。”

他的许多故事和小说《烈火金刚》中人物肖飞的经历相似，我真以为他就是肖飞的原型。

他说，有次我和一个助手走在田间小路上，忽听到后面有皮靴声。回头一看，三个鬼子正端枪向我俩瞄准。我俩一头钻进高粱地，和鬼子捉迷藏，最后我选择有利地形，躲在河沿的土坎下，将三个鬼子全消灭在河滩上。

李应唐投身抗日早，却未成为老革命。他所在的部队后来改扩为支队，不知什么原因，被国民党策反哗变。这时他选择了脱离军

队，从此结束了他的革命生涯。

我问他：“你当时怎么想的？”

他淡淡答道：“怎么想的？大多数人如此，我也只好如此。再说，从军从政，总没有当老百姓自由轻松，我当时已经三十出头，该有个家了。”

离开革命队伍后，他流落到陕西，也成了家，平时靠烧砖瓦谋生。十几年过去，烧窑，炆窑，看火，他成了老把式。1955年被捕，法院判他十五年刑。他不服道：“我没有出卖过同志，没害过人，我有什么罪？我不愿打仗，想当老百姓，革命可以参加进去，也应该允许退出来，这算罪吗？”

法院的人说：“这么说来，你对判十五年刑不服。对吧？”

“是不服！”

“不服？再加判你五年，判你有期徒刑二十年！”果真是二十年，他再没敢吭声。

“文革”中一个福建省委的书记或副书记被揪斗，此人曾和李应唐共事，被怀疑是叛徒。福建的专案组数次来劳改队向他调查，纠缠不休，他多次为此出具证明材料。

“一失足成千古恨”，李应唐若不是一念之差，也应是省级高官了。谁知他竟当了二十年阶下囚，刑满后也只能留场就业，不能回家与妻小团聚。

李应唐对往事似乎并无多少感慨，他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有时还来青海探监，他心里感到慰藉。他对我说，我一直那么干下去，即使当了省级干部，“文革”中又被七斗八斗，或许还要短命也未可知。过去的已经过去，我并不后悔，因为我没干过亏良心的事。人的一生曲曲弯弯，一条直路走到底的，能有几个？

他的话很有哲理，令我久久回味。

九、听红卫兵讲故事

经过数月相处，我对中队里的两个红卫兵小将也很熟了。周是

通过“乒乓”外交结识的，马与我同组，自不必说。

我很想知道“文革”究竟发生了些什么，但我不能轻率询问他们。我对他俩也是另眼相看，“打、砸、抢”三个字令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在我心目中，他们心灵扭曲，又是反复无常之人。我岂能自找麻烦？

1975年过春节，他俩主动给我讲“文革”经历，为我补了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他俩的故事惊人地相似：

在毛主席《我的一张大字报》鼓舞下，我们高举造反有理大旗，先造了老师的反。那些平时最有责任心的老师首当其冲。有个教物理的老教师，平时对我们特别严厉，上课时发现不用心听讲的，叫起来罚站，回答不上问题的也罚站。可他教的学生物理成绩出奇的好。他被打成贩卖修正主义黑货的反动学术权威，班上斗，年级斗，全校斗，斗得死去活来。他顽固得很，死不认罪。后来没人上他的课，他哭了。

我们砸了教室的桌椅、黑板，砸了物理、化学实验室的瓶瓶罐罐。他拼命护着，老泪纵横地说：“同学们，你们可以打死我，但不能砸这些设备、仪器。国家需要科学，你们更需要知识！”我们才不听那一套，斗！老教师勾着头，佝偻着身子，双臂被学生扭在身后，依然不服，被乱拳乱脚打得口吐鲜血，当晚便溘然长逝。

我们只相信毛主席的话。老师虽是名牌大学毕业，在我们心中不过是螳臂挡车的小丑。他死了活该，从此地球上少了个阶级敌人。

我们不上课了，去学工，学农，学军，狗屁都没学会。以后我们又和其他中学联合起来，造反夺权。我们欺侮过“黑五类”同学，他们不敢反抗；我们轮奸“黑五类”女生，她们不敢不服从。我们认为这是出于阶级仇恨，是阶级觉悟的表现。我们参加武斗，打派仗，开过枪，扔过手榴弹，为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献身，值得。

搞革命大串连那阵，我们在天安门广场接受过毛主席他老人家两三次检阅。那种幸福感甭提了，我们走到哪儿，吃住到哪儿，白

吃白拿。一次深夜到西安，我们都饿了，跑进一家餐馆，没想到老板和服务员不识相。我们一下喊来百多红卫兵，把他们打得鼻青脸肿。我们吃饱了，拿光了案板上的熟肉。为了出口恶气，临走时把锅也砸了，还在灶台上屙了一泡屎。

我们学红军长征，到过井冈山、韶山冲、延安宝塔山……去各地都是免费，包吃包住。我们二三十个男女，夜里绞成一堆，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听说美国流行“性解放”，我们体味过。我们的“性解放”比美国的肯定更彻底，是毛主席给了我们这个机会。

他们各自说了许多，说得流畅，面无愧色。

这就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听后没作任何反应，在心里我想得很多，也想了很久。

二队犯人中，我熟悉的人还有许之品。他的故事与朱彬相似，不过更多了一些荒谬。

许之品，河南信阳人，与我也算是老乡。他比我大七八岁，1949年在山西读高中时参加革命。许之品随军南下，直到江西南昌才停歇。他在军政大学受到培训，后到部队当文化教员。1954年他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1957年开始鸣放时，他是三年级的班长，糊里糊涂成了右派。1958年许之品大学毕业，戴着右派帽子分到甘肃通渭中学教书。

通渭与武山毗邻，我没去过。那儿比武山交通更闭塞，也更穷困落后。三年人为灾害时期，通渭是饿死人最多的县份之一。武山、漳县、陇西、定西、甘谷诸县，饥荒已是严重万分，据说通渭更甚。

许之品绰号书呆子，他孤身来到通渭，举目无亲，又戴着右派帽子，头上有这个紧箍咒，在中学里的处境还不如校工和学生。好不容易撑到1959年，那些平时看不起他的人都饿得眼冒金花，年轻的许之品更是陷入绝境。面对死亡威胁，他决定孤注一掷。他想起在大学教他俄语的女教师，她是前苏联驻华使馆大使或者某位外交使节的夫人；许之品有了主意，他打算跑到苏联，请她帮助求职谋生。

1959年底，许之品由东北兴安岭偷越边境。冰天雪地，许之品除了御寒衣帽，只带了十斤炒面。他抱着殊死的决心与命运抗争，为此吃尽苦头。不料入境后就被苏方边防军抓获，关押在西伯利亚的伊尔库茨克，一个月后转押到莫斯科。

当时中苏两党矛盾已公开化，许之品浑然不觉。苏方人员询问他对中苏分歧持何态度，他一无所知；再问他对中国党和政府的看法，他亦无一字批评。简直是朽木不可雕也，想见的老师没见到，许之品被遣返，回到了他逃亡的出发地通渭。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尚有囚粮供应，暂时不致饿死。

与此同时，通渭有一桩现行反革命大案告破，该案的一批要犯也关押在这个看守所。涉案者有农民，也有基层干部。许之品本来是一人一案，且案情简单；当局指派他为这桩现反大案的人犯代写交代材料，前后达三四个月之久。

他做梦也想不到，材料写来写去，最后竟是他自己成了此案的“首犯”，被判二十年徒刑。无论他怎么辩白，人家是“干墙上钉钉子”，硬把他钉成了反革命。

十、又当“自由”犯

1975年，春播刚结束，我被调到大队机务队修理组，又当上了自由犯。我对这次调动甚感意外，我没有学过机务修理，也没想去机务队。内心茫然，但也无理可讲，只有服从。

机务队修理组在监院大墙外东侧，那里有四面夯实的矮土墙，墙上插些蒺藜，墙里围个小院。前面临公路的是修理车间，后面有修理组宿舍、机务队伙房和库房。

这次当自由犯与原来在二大队搞菌肥不同，我的伙食全转到机务队的职工灶上，主食与副食给我定量发餐票。机务队和修理组里都是就业人员，我是唯一的犯人，住修理组六人宿舍。朱队长又指定我当修理组的学习记录，每晚给大家读报。

主管机务队的干部朱队长是个老广，典型的广东人长相。他四

十出头，个子瘦小，也是知识分子出身，看上去很干练。第一次开会训话，我就感觉到这人很自负，说话又刻薄。

修理组组长是王阳春（又名王德太），浙江人，年近五十。他矮小身材，长得匀称结实，性格内向。此人极聪明，是高级锻工，对钳工也内行。不论什么难活儿，他只要摸摸看看，便能想出解决的办法。据说他是解放初期由台湾派来的空降特务，被俘后判了无期，后改判有期二十年。王阳春原在浙江监狱服刑，19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他与陈后勤一起被调到青海关押。

陈后勤也是浙江人，年五十许，中等个头，平时话多，有时爱说过头话。他是钳工，手艺确有一套，只是速度慢，干活不像王阳春那样干脆利索，还多少有点拿架子。他原是国民党军一艘炮艇的中校艇长，在一江山岛战役中被解放军生擒。原判无期，后改判二十年。他和王阳春都在两年前刑满，留场就业。

童志友，陕西人，年龄与我相近，长得颇帅，天生一副白里透红的脸；平时衣着也颇讲究。他原是兰州供电局电工，如今主要干电工和机井修理。他对电焊、钳工、白铁工的活也很熟；人很聪明，却不太规矩，干活经常开溜。有时一天半天不知他在何处，机务队多有他拈花惹草的传闻，老广队长询问他，他顺口编个谎总能搪塞过去，队长拿他无可奈何。

严济章，青海湟源人，与我年纪相当；原是汽车司机，在车祸中丢了一条腿的下半截，现装着假肢。他是回民，身体壮实，尤其膂力过人，性格颇豪爽。

另一位是姜××，河南洛阳近郊人，五十有几，身体壮健，翻砂工。没有翻砂活时，就给王阳春抡大锤。他亲口对大家说，1940年他才七八岁便参加了国军。但那时他见日本鬼子很害怕，对老百姓却很凶狠。在河南离黄河不远的地方，他钻进一农家，持枪胁逼，强奸了这一家三代人：五十多岁的祖母、三十多岁的儿媳和十余岁的孙女。解放后，他在洛阳附近上山为匪，带了一帮兄弟，自己当土匪头子。直到解放军大规模剿匪，他才被擒获。他得知立大功可以免死的政策，毫不犹豫供出所有同党。那些与他山盟海誓

的把兄弟吃了枪子，他只被判了二十年。

姜××可称是色胆包天，他还说在某农场服刑当自由犯，夜里给麦地浇水；事先他打听好某干部出差，半夜窜到干部家中奸淫其家属。有人问，你不怕她喊叫、事后告发吗？他笑笑说：“你们不懂得女人。只要你把她弄舒服了，她巴不得你夜夜来，怎么会告呢？”

我劳改快十五年，辗转到过好几个劳改单位，见过的犯人成千上万。无恶不作、毫无廉耻的人渣，他是唯一的一个。想想姚士彦老先生的谨言慎行，再看看这个姜某的大言不惭，我真正体会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荒谬了。

过了许多时日，我才知道机务队还有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他能使干部言听计从。他是年届六旬的上海人金祥粹。金祥粹满头华发，身架高大，腰板挺拔，颇有气派。他也是就业人员，在机务队干统计，兼管职工食堂和就业人员领发工资。他不住修理组，而是住在南面机务队基地的小院里，独自一人。小院有两排平房，他独用一排大约三间，另一排闲置着。我见他每次同朱队长说话都如耳语，让我感觉有点神秘。

有一次到金祥粹的小院，那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他；我发现他的住室与别的职工迥异。看机井的职工也是独自起伙，他们需要燃料只能抽空去沙滩打沙柳。这些职工的屋里只有简单的衣被，再无别物。而金祥粹的房间内布置得井井有条，物品琳琅满目。他的炊具全是电器，有电饭煲、电炒锅、电炉，取暖则有电褥子、电热器。他在外屋摆着各种镶牙器械和石膏模具，我猜他可能正在琢磨镶牙技术。他在一张桌上放着相机、胶卷，两只白瓷盘中盛着显影液和定影液，另一张桌上放着药品，抽屉中露出纱布药棉。里屋是他的卧室，床上铺的盖的，泛泛有光；即使是干部家庭，与此也难有一比。他还有个书橱，我大致浏览了一下，其中有医务方面的专业书，还有一些是中外文学名著。

一眼就能看出，金祥粹会生活也会享受，他兴趣广泛又多才多艺。我判断他原属民族资本家一类，或许是在“三反”“五反”运

动后进的劳改队。

我正要离开，他一把拉住我，要留我吃饭，热情的了得。首次晤面就受他款待，实不敢当。但我拗不过他的诚挚，只见他动作奇快，眨眼间鸡蛋挂面外加肉松、芝麻油便端上了桌。

金祥粹待人谦和，一视同仁，从不与哪个犯人对立。连我这新来乍到的末等犯人都得到他的尊重，对其他人自不必说。这个特点使他办事顺利，左右逢源，得到不少实惠。

农场里规定，职工每隔三年可以探亲一次。而金祥粹每年往返上海总有两三次，而且次次都是公差，路费得以报销。实际上他所办的事务都是公私参半，公少私多，甚至公事是名，私事是实。我听说，他能从牧民手里收购到名贵的中药材，如牛黄、驼毛以及羔皮之类；将这些捎到上海后，他又买些小巧物件回来，从中获利。他每次往返都会给上面的有关人士奉上从上海捎买的东西，又从不吝啬给他们一点恰当的好处。

从现在的政策来看，做点小生意没问题；可在当时就属于“走资本主义道路”，“投机倒把”；那是犯罪，风险太大了。若没十分心计和胆识，这种事是不可想象的。

经济实惠还在其次，金祥粹获得的最大照顾是可以不参加政治学习。在劳改队，犯人或就业人员最难忍受的就是政治学习。偏偏除周六晚和节假日之外，政治学习又是雷打不动的。虽说全属形式，你不得不认真应付。平时，组长见管教干部没来，三言两句，各自睡觉。但时间还不到十点，谁也睡不安稳。只要门外略有动静，“唰”的一下大家都坐起来，动作快得蝎虎。每年冬训更难熬，时间长达三个来月，个个把自己臭一遍。金祥粹却可以不参加学习开会，精神上至少得到了百分之九十五的解脱。

十一、修理组和修理车间

机务队有几十职工，还有几个正儿八经的工人师傅。这个队要负责维修全大队的农业机械，如拖拉机、热拖、播种机、脱粒机，

粉碎机等等；又还管着十余口机井。这个队的分工有看机井的、开机子的、种菜的、做木匠活的、熟皮子的，总之五花八门。一大队的地块挨着沿海边，盐碱很重，要靠机井抽水来降低地下水位，使盐碱返不上来。这个作用类似我们在饮马农场挖排碱沟，而在这里，十几口机井整齐有序地分布在数千亩土地上，两机井的纵横间距大约有五百米。

修理组的院子百米见方，院子的另一端是修理组的露天库房。那里有栅栏围着，里面堆放着机井用的工具：两米来长的粗钢管、长轴、短轴、橡胶轴套、轴头螺帽、水泵、机座。此外，还有铁元器件、电器元器件，又有少量配购的无缝钢管，总之品种繁多。修理组宿舍是间大平房，它的旁边是机务队职工灶房，灶房朝院里开一扇大窗子，便于修理组的人打饭。伙房大门与车间大门反向，前面一片开阔地，对面约六七十公尺处就是机务队各色人等的宿舍。

修理组宿舍里间有个小套间，占着四分之一的面积，门前挂着帘子。我猜，那里放着这几个人的私物，他们已经刑满多年，能不置点“家业”？只有我随身一个铺盖卷、一只饭碗、一个脸盆，无物可存。我在这间屋住了两年多，为避嫌，我从未掀过帘子。王阳春与陈后勤两人睡对面，中间靠墙有桌。我和严济章两人对面，和他俩成九十度角，也有共用桌。另还有两位职工，他们睡在门的两侧。

如果说金祥粹堪称特殊职工，我此时也要算个特殊犯人了，精神重负基本得以解脱。我在二大队搞菌肥时从不参加政治学习，犹如过上了神仙日子。到了这里要学习，不过不正规。组长已是改造油子了，不过敷衍而已。我是入另册者，与他们差着档次。大家要挖反动思想，我一言不发。组长叫读文件我读报，叫读哪篇我读哪篇，叫读多少读多少。他叫停我就停，叫记我就记。组长要大家发言，这与我沾边，谁高兴说说去。我心安理得当哑巴，比监院里的犯人轻松多了。

我劳动的地方在修理车间，那里一排三个房间，中间是大间，两头是较小的套间。这里只有中间大间有一个门，门前二十公尺即

是公路。西边套间是钳工房，其中有一张足有五平方米大的铁桌；桌面桌腿浑身铁，两头各一台虎钳。套间门跟前有台电钻，四面墙上挂着锯弓以及各种形式规格的锉刀、榔头、扳手。陈后勤是这“小寺”的“住持”，机井若无动静，我和严济章就在钳工桌边跟着他干。开初我对修理一窍不通，大多数工具都没见过，连锯条装锯弓的方向都不懂，丝锥、板牙也不会用。使榔头、钢锯、锉刀……样样事我都是笨手笨脚的。榔头有时打在上手，红肿过后一片青紫。经过陈的指点和练习，我慢慢熟悉起来。毕竟也不是太深奥的技术，唯用锉子锉平工件，需得长期磨炼。

修理组围绕大头车床转。偶尔大队部或者哪个中队有电器或机械故障，王阳春就叫童志友去处理。童志友是出色的电工，对钳工也很有一套。陈后勤、严济章和我则给大头车床锉平道轨，配制三星齿轮和齿轮传动装置。要锯齿轮先要划线，掌握划线颇不易，幸得高中学过机械制图。我接触到制造齿轮时才真正感觉到，机械制造真是门深奥的学问，英国数百年前发明出纺织机、蒸汽机，谈何容易！模数有英制、公制，需懂得换算；而齿数、牙深、牙宽、齿间距等等，它们之间有一二十个数学关系式来表达、换算。为了弄懂这些，我花了不少精力。

画线于我却不难，与机械制图一样，只是工具换成铁家伙，然后按图锯齿。锯齿轮很费劲，就像蚂蚁啃骨头一样，要耗费好几天时间。齿轮锯好后，陈后勤再用什锦锉修整，直到它与铣出来的正规齿轮配套吻合。

如若机井出了小故障，又是因为电路问题引起，一般由童志友一人前往排除。遇到大的故障，就由童和我两人一并前往。属于机械故障如断轴等，除我俩外还要加上严济章。院里有一辆架子车，上面放有铁三爪、神仙葫芦、钢管支架、加力杆、管钳、链子钳、大小活动扳手，还有各种备用件。这些工具都已准备停当，我和童志友推车便走。严济章有残疾，他骑辆破自行车跟着我们。

机井都挨着道路，我们将工具车推到井房门口，然后支三脚架，挂神仙葫芦。电动机吊走，机座吊走；最后吊水管，水泵。每吊一

节，须将下面用夹板夹紧，固定于井盖上，再用链子钳将连接的丝扣旋开，直到吊出最末端的水泵来。有时问题出在水泵上，还须拆水泵换叶轮。若是遇上断轴，只需拆到断处。

我们三人同心协力，轮流拉神仙葫芦的细链。“唰啦”“唰啦”接连不断，用力不多，只拉得久了，胳膊酸困才换换。如果不换，一人将一节管子拉上来也能坚持。我们拆卸完，若缺备件，童志友骑车回车间去配去取。

第一次使用神仙葫芦，果如其名，我感叹道，发明者真是太聪明了。没神仙葫芦，我们仨一筹莫展；有了它，即使一个人也能干出来，只是速度慢些。人类社会就是在生产工具的不断创造、发明与更新中，一步步走向进步与文明。

十二、第一次承接任务

经过几个月的锻炼学习，我的操作技能有较大长进。跟着童志友、严济章修理机井，拆装几次，我也能单独作业了。电工方面我有基础，问题只在操作规范和上杆两个环节上。开初连正规的“电工结”也不会，我细心观察童志友的操作，很快掌握了技巧。第一次上杆，我爬到八九米杆顶，心里便发毛，不敢朝地面看。我腰上系着保险皮带，还是只敢单手操作，另一只手臂抱杆。此时只觉得少慢差费，别扭透了。好在我年轻，身体柔韧性不差，经过空中锻炼很快就适应了。这时我的胆量也变得奇大，上到杆顶，我把保险皮带掼到地面，自信地骑在横担上，双手自由操作。

1975年10月，老广队长给我任务，命我一月内独自完成：从机修车间对过公路边的变压器那里，架设一条低压动力与照明线，直达一中队猪号。起点与终点距离约两千公尺。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新的挑战。

我先要勘察与丈量距离，拟制方案，编制计划……一中队职工张统计给我派了两个助手来放线，又派来更多的职工挖坑，继而是树电线杆和埋杆。我第一次当指挥，心里紧张得扑通跳，时刻担心

杆倒伤人。接着是上杆装横担，套抱箍，再上绝缘子。再接下来是架线，紧线，扎线。整个施工过程中，最苦最累的活莫过于这道工序了。带钢芯的铝线，直径有十毫米；两杆距离长，线死沉死沉。我骑在横担上，用绳将电线吊起，需花很大力气才能架到横担上，尤其是线路中段，真是其重非常。

紧线扎线时节，已是在严冬的11月。天寒地冻，手脚都麻木了，但穿多了衣服则不便操作。我用紧线钳（机）紧线，身体几与地面平行，平展展伸向两米远处。接着我用大扳手旋拧，最后还需在大扳手上穿根绳在地面帮拉，其作用相当于加力杆，非常吃力。扎线难度也大，紧线后的电线张力极大，它在横担上，必须用肩将横担上的电线抬高二十公分，直到达至绝缘子凹槽。肩扛电线上这二十公分高度，必须竭尽全力，然后才是扎线。

尽管苦累到家，我却以苦为乐。因为这里没人监督，没有定额，进度全凭自己安排。有这份自由和自主权，能不痛快！这是技术性劳动，我又掌握了专门技能，内心莫名其妙地生出建设者的自豪感。

一队职工张统计是职工大组长，他是河北人，五十多岁。每逢中饭、晚饭，他都要我去职工灶吃饭。一到饭点，他就在杆下等着催我。这里的每顿饭都有肉和蛋，还有四五个菜。我过意不去，恳请他简单些。他说，以前大队部从电厂请师傅架线，每小时一人八元，一来两三个人，只一个人上杆干活。他们一天干上两三小时，工钱却得按全天结算。这些人在地上轮流烤火，又要抽好烟，喝好酒，点好菜，真难伺候。你给我们队架线，上午、下午不下杆，成天在杆上，实在太辛苦你了。中队的干部职工都看在眼里，再好的东西也舍得拿给你吃。不过我们只有这些，别的拿不出，你就坦然受用吧。

1976年元旦节前几日，我顺利完成任务。这次实践吃了大苦，却受益匪浅。从变压器接线到动力接线，由外线到内线，我都亲手过了一遍。由此接触了许多电器件，增加了知识与能力，身体也强健了。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

干电工也发生过事故，险些要了我的命。

一次在五号井，看机井的职工姓马，陕西人，对我很热情。我一到井上，他便张罗着为我做饭。我叫他切断电源，他正在炒菜没听清，胡乱答应了一声。结果 220V 电压将我击倒在地，电线也缠住了我。电压若是在 380V，我就死定了，所幸未失去意识，我在地上打了几个滚挣脱了。老马见我土头土脸面色蜡黄，大惊失色，问我咋了，我说触电了。他后悔不迭，但我也没埋怨他；我知道他不是有意的。

从此我总结了一条教训，断电作业一定要亲自拉闸，亲自推闸送电，要给周围人交代清楚。

这次算小危险，还有一次是大危险，要怪自己麻痹大意。那天，天阴沉沉的，要下雨的样子。一处变压器高压跌落脱钩，好几个机井停止运行。我拿高压绝缘棒及熔断丝去处理，换了黄蜡管里的熔断丝，用绝缘棒挂高压跌落总也挂不上。这时我便爬上变压器，试图观察下线桩的挂钩究竟怎么了。人距离高压电源应在一公尺外，这一点我是清楚的，我也大致估计了高压线的距离；但却没考虑到天气因素的影响。那日天阴，空气湿度增大。我刚一抬头，“噌”的一下，来不及做任何反应，我从变压器上一头栽到地面，什么都知道了。过了好长时间我才醒过来，幸亏周围全是软地，居然毫发无损。

我已经“死”过几次了，照我的体验，渴死需要两个来时辰，痛苦无可名状。饿死最难熬，要承受十余日甚至数月的痛苦。1968年在饮马良种站时，我头一晕，眼一黑倒下，这得要算是“好”死。这次“噌”的一下，更是痛快，连晕的感觉都没有了。其实说“噌”的一下是假的，那一刻来得太快，来不及感觉，既无痛苦，也无恐惧。若真能如此死去，当属幸运。

回车间后，我未对人提及这起事故，只是在内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牢记教训。

到了 3 月，修理组又从二中队调来一个犯人。他叫陈达元，年约三十出头；浙江黄岩人。他身材矮而壮，戴一副近视镜，眼球凸出，两唇较厚，上唇微向上翻。这人是老高中生，我原来认得他，

只是未说过话。在监院，他给人修打火机，配钥匙，修拉链，混点口粮。我知道他与周、马两个人关系不错，是个心灵手巧之人。他这次来，是承担车工角色的。

刘指导员来了，朱队长走了，走得无影无踪，机务队无人再提到他，就像在机务队他从没存在过一样。

十三、毛主席逝世的日子

机务队只由指导员一人管，他很少来车间，似乎从不过问车间的事。一切按原样做，大家很自觉。我们围着大头车床转，除车头和丝缸外，齿轮、道轨、刀架、手柄、操纵控制的“哈佛”……全由我们一锯一锉地啃。陈后勤率领大家，一步步向前推进；工期虽慢，已能看到曙光了。

这时，指导员拿来一台家用的小型轧面机，他问王阳春、陈后勤，这个能不能制作。他俩同声道：“这有何难。”指导员立即布置任务：“照这个样，给我搞一台，越快越好。”

就业人员好巴结干部，尤其是直接主管。这不足为奇，不看上司眼色，敢吗？环境使然。此前车间也有干私活的，但少，不过是偷偷摸摸干一点。

王阳春和陈后勤都不会放弃这个博取好感的机会，在他们眼里，干部叫干的活就是公活，名正言顺。王阳春叫大家停下手中的活，立马将样机大卸八块。人们拿着游标卡尺，量的量，画图的画图，全组大动起来。

我这人天性怪，为公家干活可肝脑涂地；为私人干活，心里一百个不乐意。也许如诸葛亮说魏延，我头上也长有反骨吧。我是国家的犯人，不是某个人的犯人；我这劳动力并非无偿的，凭什么给私人打差？家用小轧面机，市场上三十元左右一个。单个制作而非批量生产，人工成本不下百元。因为我们无车、铣、刨床，全凭一锯一锉手工进行，费工费时，极不合算。况且原材料全是国有财产，岂能白拿白用？

小轧面机制出来了，指导员喜形于色。再过几日，上门要轧面机的干部络绎不绝；有中队的、大队的，也有分场的。王阳春应接不暇，一概答“是”，不停地应承“好”。他谁都不惹，谁也惹不起。以后又有人上门要求制作沙发、钢管床头架。修理车间成了家具制作所，库房里的钢材、无缝钢管、元铁等等，原本要用于机井维修的材料和农机备件，源源不断流到了私人家里。这还不说，费用又在维修农机具的招牌下实报实销。

大家公私不分，一视同仁，为干部干私活甚至积极性更高。我感觉车间空气太齷齪，令人窒息。俗话说眼不见，心不烦。我宁愿出公差，不愿在车间待。但凡机井有故障，各中队电路有故障，我蹬辆破自行车便走，一去半天或一天，乐不思归。有时处理完事故还有时间，我也懒得回车间，就近到三中队猪号编传聊天，打发时光。三中队猪号有汪汉江（即看守所戴大镣的那位）、史成德、肖恒和梁训章，此时都刑满就业了，而且也住在一起。他们喂马喂牛，喂猪种菜，都与我在一起待过，关系不错。偶尔，我还在他们那儿吃饭。

星期天出远门，最远不过五公里。我去分场看罗时甫，看分场机修队的张子贵、唐尕玉和卜宗平。我还去四大队看黄宗华，我答应他尽量常去的，焉能言而无信。有时星期天，我去二大队看“老黄牛”夫妇、“小剃头”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又去五中队猪号拜访顾用之，看邓安瑶、姜有祖、李竹叶和苏炳初。姚士彦已经“宽转”了，他被调到德农总场直属一大队，在那里当管理员。三大队有岑宝林和陈凯仁，他们都已刑满，岑在大队开拖拉机，陈当裁缝已成家。我隔个把月也去看一次。外面空气好，令人心情愉悦。

9月上旬的一天，童志友、严济章和我在十号井拆修机井。每个机井都孤零零一间机房，四面皆是农田。山高皇帝远，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天南海北聊些闲话，间或聊到一些国家大事。比如：去年（1975）河南发大水，要保城市，不得已炸水库淹死了多少万人；唐山大地震又死了几十万人等等。这都是些道听途说的小道消息，谁也不知真假。这次，大家聊到毛主席的健康问题。

“接见外宾时，口里不断流涎水，话也说不清了；送外宾从沙发上站不起，看来麻烦大了。”

“有什么麻烦？毛主席能活一万岁；到了一万岁还能活到一亿岁！”

“你莫‘创新’乱说哟！”

“我怎么乱说，万万岁不就是一亿岁吗？”

这天收工了，我刚回到车间门口，有人悄声报告消息：毛主席逝世了。

没想到这么快！

第二天上午，我被召回监房，听干部传达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这日是个大阴天，天地间灰濛濛。监院进去好多干部，他们衣袖上一律戴了黑纱，个个脸色阴沉。院里摆了张桌，犯人席地而坐。董指导员站在桌前，照着事前拟好的文件向犯人宣读。他宣布：十天哀悼期，禁止一切文娱活动，不准唱歌，不准打扑克，不准下棋，不准打麻将，不准跳舞，不准放电影，不准看电影，不准喝酒……不准笑声喧哗……

一大堆“不准”。末了，他强调说，谁若违犯，后果自负。

回到机务队，就业职工也开了类似的会。大喇叭里持续放哀乐，仿佛天地间只剩下呜咽。听说大队部院里开追悼大会时，干部和家属哭声一片。×××的家属因悲痛过度，晕倒不省人事。又有某某人家属哭得心脏病突发，至今还在医院抢救。

人不同，情自异。哀悼禁娱期间，就业职工偏有违禁者。有的是职工互相检举揭发出来的，有的是干部亲自抓到的，几乎每个中队都有。有人酗酒，喝得酩酊大醉；有人下棋，打扑克。这些胆大妄为者趁一时之快，揪斗时又大放悲声。人们无法判别，这究竟是失去伟人，还是因个人心灵与肉体的疼痛。

此后有两种说法暗中流传，一种说法是：大人物都是天上的星宿转世，他们的陨灭需要许多人为之殉葬。河南发大水死人，那是提前去为周总理做伴的。朱老总死了，又发生唐山大地震；是为朱老总做伴的。毛主席更伟大，他需要更多的人为他殉葬，今后还会

有大事发生……

另一种说法是：毛主席曾到山庙拜访一位老道。老道说毛有王者之相，待之甚敬。毛向老道询问未来之事，得语“8341”。毛不知其故，再问，老道笑而不答。毛百思不解，遂用“8341”作为中央警卫部队的番号。毛死，真相大白：原来83是指毛的寿数，41指他坐天下的年限——遵义会议后到他逝世，正好四十一年。

传闻有鼻子有眼，不由人不信。

不到一个月，果然真有大事发生：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被粉碎，举国欢腾。

只不过，在杂海劳改之地，此事并未产生多大震动。职工和犯人很少谈论它，但我却感觉到了巨变，“粉碎四人帮”有着无与伦比的意义。

“四人帮”算什么东西？不过是跳梁小丑。没有毛的授意、支持，他们能跳得如此高？能翻如此大浪？想都不要想。“四人帮”下地狱，诚然罪有应得，可将一切罪过归咎他们，于情于理于事实却大不公。这是我内心的想法。

一个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已经开始。

十四、当辅导员

1976年冬训，难得的风平浪静。管教一次没来，职工间人际关系有了明显改善。阶级斗争的伟大旗手故去，人们也斗累了，开始从长长的噩梦中醒来。

不觉又到1977年底，冬训无大事。每晚念篇报，然后人们斜躺顺卧、七嘴八舌地谰传聊天。约莫九点，大家偃旗息鼓，关灯睡觉。

忽一个晚上，大家聊得正欢。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奔到宿舍来，愣头愣脑地问：“你们这里谁叫向承鉴？我有问题要请教他。”没人理他，过了一阵，王阳春朝他翘翘嘴。他手拿一摞纸，一副大不咧咧的样子。学习原不过是“聋子耳朵”，他只是破坏了大家聊天的兴致。王阳春也没阻止他，还向他提供了“目标”。不少职工

认得他，我猜也是有些来头的。原来，他是指导员的儿子，一个在校高中生。我不假思索，没等开口就回绝了他。我说：“我劳改十七年多了，一本书没看过，全忘光了，还给了老师，实在抱歉。”

谁料这小伙竟是个难打发的主儿，他说，我不是盲目来的，事先做了调查。我爸到分场查了你的档案，你会的。你一定要帮我。他把手中一摞试卷硬往我怀里塞，我感觉到了他的诚意，也就诚恳对他说：也许过去会，现在是全忘了。“三年荒个秀才”，十七年多，我都荒成文盲了。

我不愿看他拿来的试卷，以免陷自己于狼狈境地。可这小青年真犟，硬赖着不走，跟我泡蘑菇。他还振振有词：你看都没看，如何便知不会？你看了试题，真不会，我就走。

他说得在理，我多少被他的执着所感动。

“文革”狠批十七年资产阶级教育路线，高考自1966年就取消了，后来倒是树了个交白卷的英雄。知识断代，留下深远苦果。没想到毛闭眼才一年，高考已在酝酿恢复。我想，中央有人未雨绸缪，不然变化不会来得这么快。

小青年拿给我的是1977年南京高考试点摸底试题，当年的教育决策者为了解当时高中毕业生的实际水平出了这套题，难度很低。我原以为自己早已把学过的东西忘光，谁知一接触试题，数理化公式一个个从脑子里蹦出来。只花了两个小时，我已经将数、理、化三科的试题全都解答出来，毫无障碍。其中不少题根本无须动笔，一眼便能看出答案。

会场搅散了，王阳春、陈后勤早已进入梦乡，我却了无睡意。恢复高考，是件了不得的大事。我懂得这意味着什么，也大致能窥见中央决策者的思想脉搏。

我为之兴奋，激动，终于发现新时代的曙光了。

我也有对自己的恨，这一生中，我最吃亏的是学不会撒谎。只装不会，谁又能把你怎样？劳改了这么多年，还这样心软心热，唉，我这是何必呢？

解题的事很快传遍大队，仅隔两三天就有人找到我。当时，我

正在三队猪号史成德、肖恒处吃午饭，大队通信员骑车而至。他满头大汗，气喘吁吁地说：嘿！找遍所有机井、中队，想不到你躲在这里。快随我回大队部，时教导员正在办公室等你呢。我问啥事，他说不知道，反正顶重要的事。

时教导员胖墩墩的，气色很好，说不清是河北人还是山东人。见我进门，他开门见山地说：经大队研究，决定把你从机务队调出来，专门给大队学生上课，辅导。学生一律称呼你为“辅导员”，你在干部灶吃饭。还有啥要求，你可以提出来。

我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快如闪电，叫人发懵。过去“打倒”，现在“恢复”，变化只在眨眼间。我在心里叮嘱自己：这次一定不能心软头热，要坚决拒绝。

我淡淡地回道：一则我尚未刑满还是犯人，二则我将所学全忘了，不能误人子弟。请教导员另物色人，我确实不能胜任。

时教导员颇有耐心，娓娓道来。他说：这是根据学生家长的要求，又经过认真研究后作的决定，我都无权更改。你现在是犯人，很快就成为职工。莫说犯人、职工，即使是国家干部，也都在党的领导下，谁能不服从组织？

他的话有肉有骨头，确实。今天是共产党高官，明天要他当一介草民，谁能不服从？何况我，小命还攥在人家手里。

“我看你是有顾虑，怕学生捣蛋不听话，怕家长刁难干涉，这些不必多虑。大队会上已约法三章，既然叫你教，就把管学生的权力给你。家长们允许你训骂甚至体罚学生，决不怪你。凡故意找你麻烦的，你找我。”

看来已无回旋余地，我想了一下说：我只好硬着头皮试试，我仍住修理组，在职工灶开伙，这样方便。

“还有什么要求你尽可以提。”

“没别的要求。”

教导员盯着我一身烂工作服，上面油渍斑斑，衣袖破得像演京戏的甩袖。他说道：“这样吧，明天叫人给你缝一套三面新的棉制服。”

这个大队读中学的干部子女有二三十人，初中生在分场初级中学，高中生在总场育红完全中学。此时正值寒假，学生们都闲待在家里。他们年级不同，即使同一班级，学习程度又参差不齐，成绩相差甚远。要说补课，数、理、化都要补，可是只有一间教室，让我为难得很。

没办法，我只能办复式班；让各年级选一个组长，数、理、化各辅导两个晚上。我每晚给各年级学生分别讲一两点内容，然后布置思考题、练习题，使不同年级的学生都有点收获，也有事干。

头几个晚上上课，教室外面也站满了人。可怜天下父母心，天寒地冻，有的家长一直陪到夜里十点下课。

后来学生反映晚上时间太短，讲的内容少，吃不饱；要求全天上课。于是辅导课从上午八点半开始，到十一点半结束；下午从三点到六点，晚上七点半到十点。如此，我一天上课八小时。

辅导课的消息传开来，三厂初中生和分场初中生也有骑车来听课的。教室里挤挤挨挨，有的学生拿着小板凳坐在讲桌跟前，还有的挤在教室门口。我很累很辛苦，口干唇焦，心里却感到欣慰，甚至有些激动。学生的求知欲是对我最好的奖赏，也是对“知识越多反动”的批判。

无论我到哪儿，无论是我教的学生还是职工、家属和干部，他们见了我都亲切地叫一声：“辅导员！”连时教导员也这样称呼我。在大队部院里，我成了最受关注和欢迎的人。有子女听我讲课的干部、家属，对我尤其热情。李管理员住在大队部院子最前一排，他的孩子用功好学，我成了他家的常客。每在他家吃饭，他都特别殷勤地招待我。后来我听说，他的孩子考上了中专。

我并不为受人尊重而沾沾自喜，但我的确感到庆幸，我又能与书为伴了，知识的价值终于得到承认了。我体会最深的是，干部和家属对子女教育和前途的关心胜过一切。过去搞上山下乡、学工学农，可见多么不得人心！

世道真的变了。

十五、看望肖恒和姚土彦

1977年冬天，三中队猪号的肖恒病得不行了。我只要有空就去看他，在他床边长时间守望他。我与肖恒要好，并非因我得益于他。肖恒没有能力帮助我，但他需要我的帮助。我喜欢他的个性，他非常坦诚和直率。他的病是老毛病，冬天咳嗽不止，气上不来，畏寒。每过冬天像过鬼门关一样，如今更是骨瘦如柴，卧床不起了。

肖恒有个愿望，他想缝件棉大衣。他自信，只要有件大衣，他还能康复下地，还能喂猪劳动。他说他要看到我刑满，看到我结婚成家抱孩子，然后心无遗憾地走。这话说的……我心头阵阵发酸。我不敢当时就答应他，心里下了决心，一定要帮他办到。1978年2月，我终于弄到了布票、棉花票，又托人买来了平布和棉花，我可以了却他的心愿了。

那天下着小雪，我用自行车驮他去三大队陈凯仁处量尺寸。这儿离三大队不远，只千余公尺，有条马车土路径直可达，只是要翻过两个大队之间的斗渠。在过斗渠的时候，车把没抓紧，一时间车翻人倒，我亦摔倒在地。这下把我吓得半死，一个病重老人，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咋交代？还好，他竟然没事，躺在地上对我笑。

陈凯仁见我俩来，亲的了得，中午硬要留我们吃饭。他说，都是老难友了，很难得。大衣我连夜赶出来，一分钱不要，缝好就给你们送过去，不要你们再跑来跑去了。

陈凯仁有情有义，直把我俩送过斗渠，他才折身回转。事后我知道，他为肖老汉做的这件大衣，非但分文不取，还贴了许多材料，如绒领、口袋布、纽扣等等。我与肖恒好感激他。

3月，周孔章也刑满了。他被调来机务队种菜，住在修理组背后的平房里。他很关心我的终身大事，每去看他，他都提及此事。但我谢绝了他的美意，不脱犬皮不找对象，这是我既定的主意。

老周给童志友介绍了一位四川姑娘，品貌都不错，他们很快结婚了。后来我看电影《牧马人》，那姑娘几乎可与影片中的女主人公媲美。其实，关心我的人多多，汪汉江、梁训章、史成德、李应唐、

陈建忠都是我父辈年龄；有的要写信帮我找，有的要请假回家乡帮我物色，我一概婉拒。这时黄一清、杨洪燾也都刑满成家了，他们的对象也都是人们关系套关系介绍的。

不久，分场来人要调我去教中学。时教导员提前跟我打招呼说：“上级单位要你，我们不好吭气。大队希望你留下来，你要不愿去，估计他们也不好把你咋样。”

虽是回绝了，我仍到分场初中看了看。毕竟一大队非我久留之地，没想到在分场初中遇见了周有祥。他先我刑满且已结婚成家，调到分场教书已经快半年了。他的妻子是宋占荣的女儿，婚事由他岳父一手作伐促成。宋比周约大十岁，他女儿至少比周小十多岁。宋若对周无深透了解，断不会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我和周、宋都熟，只不曾同组待过。周和宋曾在巴仓二大队五中队同在二组，互相很了解。

周与我一样，纯粹是“政治思想”犯。他很有见地，人也善良。宋占荣看准了人，我为周高兴，也为他俩祝福。

分场初中还有个叫陈炳荣的瘦老头，年约六旬，传说是蒋介石的亲外甥。我对他早有耳闻，他读大学时是学问型人，毕业后因系蒋氏嫡亲，挂了个上校军衔。其实军政两方面他都没沾过边，谁料一个空头名衔换来终生牢狱。

分场初中老师多为就业人员，自己烧饭。到处烟熏火燎，住室窝窝囊囊，看他们的日子都过得凄惶。

邹庆礼也已刑满，他在大队部当医生，我每天都能与他晤面。他告诉我，砖瓦厂加刑两年没算数，直到殷干事给他发刑满释放证他还不相信，以为搞错了。老邹虽先我获释，却也并不比我自在自由。

与他一道还有刘瑞，原在监房当犯医组长，医术远不如他，其他方面却强他十倍。老邹只能当班守点，被绑得死死的，离开医务室一步都难。他告诉我，他已请准探亲假，争取尽快回去祭奠双亲。他母亲因他被捕哭瞎了双眼，父母在他服刑期间相继亡故。

春播结束，大队有台热拖需送德农总场大修。我要求随车前往，

我想去探望姚士彦，破例被允准。我与姚老分别已四年，倍加思念。1975年我听说他获特赦，身份改变了，很为他高兴了一阵。如今见了他，似乎又高兴不起来。他是直属一大队管理员，住在大队部一排平房中的一间；除工资翻番每月百元外，其他依旧。从工资可知，他这干部身份距离真正的干部还矮一大截，人家的工资有二三百元。干部也并没有真正把他当作自己人，有些会说“不便”让他参加，有些文件说“不便”给他看。就业职工因他是管理员，属于另一营垒，也不把他当自己人。姚老生活在夹缝中，如困在沙漠一样苦涩难言，心情反而糟透了。

吃饭的时候，姚老对我说，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宽转”。在尕海二大队毕竟熟人多，有人陪着聊天，下围棋。现在太孤独了，想找个说话的都难。

我劝他到城里走走，到新华书店转转。末了我宽慰他道，也许，事情慢慢会有转机，日子不会一成不变的。

他送我时，一脸悲戚。我望他的背影，驼背弓腰，步履疲惫，愈显苍老了。

爬上热拖，已是下午六点半了，归程很不顺利。李大队长酒喝得太多，面红耳赤。他借着酒劲，一把将开车的小个子师傅（我已记不起他的姓名，他是严济章的老乡，脸上微有些麻子）推开，自己踞在驾驶座上。热拖在公路上忽东忽西，蛇一般左扭右窜，眼看就要撞到路旁的白杨树上。车上乘员除我之外还有两三个人，大家顿时发出惊呼，赶紧从车厢后跳车而逃。所幸车速慢，无人摔坏。

李大队长行伍出身，山东大个，性格豪爽。平时他对工人师傅、就业人员都还可以。他会开热拖、拖拉机，只是现在明显失去自控能力。他又没驾照，岂能让他拿人命开玩笑？可是，他是上司，直接管着开车的工人。他硬要开，你拿他咋办？

工人师傅说：“你不要命，大家还想活，谁的命也是命呐！”不料，大队长火了，大声嚷道：“上车，都上车。我还要开，如果还是老样子，我就让位。”三四个乘客没人听他的，他只管又开起来，“嘟嘟嘟”，大家跟在车后跑，与前回一样，车又撞到路边土埂上，

差一点翻车。他确实醉了，几个人将他抬到车斗里，不一会他就打起呼噜来。

回到机务队，已是黑灯瞎火的深夜。

十六、刑满前对劳改农场的思考

平时，我这“辅导员”只是在星期六下午、晚上和星期日有课，且是初中生的辅导课。到了暑假和寒假，住在总场的高中生回家来，这是我的大忙季节，忙得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现在紧张一天半，轻松五天半；假期紧张一个半月，轻松四个半月。总的说来，还算张弛有度。

在大队部院里进进出出，眨眼半年多。所有干部、家属和小孩都混得熟了，免不了聊些家常。以前只知机务队修理组给干部做小轧面机、沙发、床架等，实际上此乃区区小事；到了大队才知道，德令哈劳改农场年年亏损。这里是劳动力成本最低廉的单位，竟然养不活自己，何故？我这“犬”类痴心不改，总爱问为什么，有什么办法？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以尕海分厂一大队为例，大致有二：

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我用两种方法估计这大队的干部编制和人数，结论基本一致。从大队部住家户计算：除两排平房是办公室，十排平房住人家，每排五户，每户以一个干部计，全大队约五十名脱产干部。从编制计算，大队有教导员一人，正副大队长各一，大队管教干事一人，会计、出纳、保管、采购、食堂管理员（另有炊事员）约十人。有四个中队，每中队有指导员、中队长，三四个分队长、管教员，也还有会计、出纳、保管。全大队拿工资的不少于五十人，再把分场、总场干部部分摊到大队，加上其他开支，大队年总支出至少三十万之多。

大队犯人职工约八百人，四中队规模小些，拟将机务队补充之。

就业职工约两百，月平均工资以四十元计，年总额十二万，还需支付各种生产费用如电费、油费、水管局的水费、工具耗损费以及犯人的衣、鞋、被的开支费等等。武警支出假设不计入农场成本。

全大队种着约一万六千亩小麦，每年收获四百多万斤。除犯人、职工口粮外，按三百万斤卖出；据 1978 年价格，小麦每斤以一角计；收入不足三十万元。

收入与支出两相比较，一个大队每年亏损几十万。分场四个大队，估计亏损不下百万。德令哈总场亏损总额不下千万，甚至过亿！

各中队也种菜，养猪，多为自给，用来出售赚钱，所得甚微。

二、跑冒滴漏（我不用更刺激的字眼）

家属也种地，好几十亩。由拖拉机翻地，播种机播种，犯人筑毛渠，打地埂，放水，收割，打碾，一直到装好麻包，将劳动果实扛到他们家里。家属锄草已是很不错了，有的大队要好得多，如二大队；有的则更糟。

每中队都有菜窖，看窖的是就业职工，他们没有售菜权利，权在中队手里。干部家属兼着会计、出纳之职，一天开不出一张票据，甚至十天半月开不出一张票；但每月两三百的工资一分不少。不干事白拿钱倒也罢了，还要干些相反的事：自己想要菜，或亲戚朋友需要菜，写个条子捎过去，好菜送上门来。

猪场养猪，鸡场养鸡；猪肉、禽蛋都送进了那些有福之口。

监院各中队犯人灶上都要派一个人，专门打水送水。用水首先供应本中队干部家属，拉水一拉都是一整天。送够了水，还要打扫庭院，甚至替家属整理内务，洗衣服。水源极近，就在监院与大队部之间，但干部乐意用无偿劳力。

“文革”时有句近乎口头禅的话：由懒变馋，由馋变贪，由贪变烂。如今是谁们正在进行这种嬗变呢？

或许有人要批我反动本性不改，这叫光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将几十万、几百万犯人改造成了“新人”，这就是劳改农场的价值

和意义所在。对此，我心存质疑：

在这种环境下，耳濡目染这些脏事，是把“鬼变成人”还是把“人变成鬼”？

一个正“上班”的家属打着毛衣与我闲聊，我道：“四个中队各有一个保管、一个会计、一个出纳，我不想吃粉笔灰，宁包这十二人的活，你看我干得了不？”

她哈哈大笑：“那把你美死咯，可这十二人干嘛去，喝西北风不成？”

我想到解放前的地主，倘若这是私人农庄，经营者会让它年年亏损赔本而不心痛？革命的终极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如今生产力解放了没有？白拿钱不干活吃闲饭的人比解放前、比历朝历代的比例不是低了，而是高多了。再加上瞎指挥，胡折腾，国家能强？人民能富？

8月中旬，我正在大忙时节。来了两个人找我，说话口气硬硬的、态度横横的：

“我们是总场的。现在通知你立即捆行李，跟我们到场部去。”

“干啥？”

“调你去总场中学当老师。”

“对不起，我是犯人，当老师不够格。”

“够格不够格，我们说了算。你去准备行李吧。”

“我要是不愿意呢？”

“我们是奉上级指示带了调令来的，由不得你。”

这“由不得你”几个字深深刺激了我，心里陡然涌起对抗情绪。

“这么说来，你们打算给我戴刑具，绑我？押我？上级给了你这权力？”

我横下一条心，真要这样，即使去一句话不说，一分钟课不讲。

“那倒没有。不过，我们的任务必须完成，你必须服从调动。”

“我教不了，不去。你们想咋办听便。”

时教导员在办公桌边翻报，一句没插嘴。我知道他专注地听着双方对话。这两个自恃带有“尚方宝剑”的人，三四十岁的样子，

还嫌嫩点。在他们心目中，犯人都是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哪晓得今天碰到刺儿头，有点不知所措。他俩的眼睛望着教导员，教导员不得不开口：“俗话说，强扭的瓜不甜。你们不如先回去向主管汇报，我这边再做做工作。”

两个盛气凌人的家伙碰一鼻子灰，气咻咻地走了。

时教导员笑了，问我：你一年忙两个假期，平时只是星期六晚上、星期天辅导一下，不很累吧？

这年9月底，我刑期届满。

多么漫长的十八年，几生几死，几死几生，我竟奇迹般地熬出了头。十八年啊，六千五百七十个日日夜夜！在历史长河中只是个涟漪，但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真是太漫长了。人一生能有几个十八年？人到中年，我的青春韶华、学业、爱情和事业都消逝了。如同内脏被吞噬，生命只剩一个空壳，还有一缕不变的魂。王宝钏寒窑十八载是历史佳话，但她还是自由之身。我体味不到王宝钏思夫之苦，可我受到的肉体摧残、病痛折磨、精神禁锢、死神威逼，又岂是王宝钏的十八年所能相比？

而这十八年里，最大的苦痛莫过于，一个彻底无罪之人，要时时伪装成有罪认罪的模样，任由那些真正的罪犯欺凌。

刑满那天，我做了三件事：第一，我到巴音河照了张相，留下曾为“犯人”的永久纪念。第二，我借了五十元钱给老父亲寄去，告诉他我还活在世上。自1968年姐姐那封信后，我已整整十年没给任何亲人写过一封信。第三，上诉，我早已打好了腹稿。

莫说我活着，即使死了，骨头成灰，去了阴曹地府，我也要上诉！我要问苍天，问大地，问高山，问大河：我有罪吗？我究竟有什么罪？真正的罪人又是谁？

下 篇

归 魂 路



第一章 “劳改释放犯”的岁月

一、初上讲台第一课

我要回家，归心似箭。

打从 1957 年暑假一别，我已有二十三年没见老父亲和兄弟姐妹。他们如今是个什么样子？父亲七旬有几，我没有在跟前尽过一天孝，反而叫他为我提心吊胆，吃尽苦头。我攥着《刑满释放证》怔怔地看，我释放了吗？自由了吗？可以回家吗？我好比无翅的鸟、无毛的秃鸡，莫说飞，连扑腾也不能。我手无分文，买不起车票。即使借钱，还得申请待批。虽然我没有姚老那种怕见人的顾虑，却不能不考虑对父亲和亲人的影响。倘若乞丐一般拿张释放证回去，半人半鬼，在亲人心头无疑是旧伤又添新伤。罢，罢，当务之急是把上诉状多复写一些，不断地寄出去。

父亲知道我活着，兄弟姐妹立即与我取得联系，众口一词嘱我速归。他们以为我有了释放证，就可以自由行动了。可我不过是从小笼换到大笼，离真正的自由还有万里之遥。

邹庆礼君这时从四川探亲归来，他光速一般地处理好了终身大事。我简直惊得目瞪口呆。他对我说：妻子只有十八九岁，一字不识，很健康。相亲那天，我自惭形秽。没想到未来的岳母和妻子一眼看中我，断定我靠得住，是可托终生之人。他们不嫌我年龄大，也不嫌弃我“劳改释放犯”身份，一分钱彩礼不要，只张罗了一周便成亲了。他又说：“我此前一辈子从未碰过女人，虽是学医的，新婚之夜竟找不到‘庙门’，你说可笑不！”

我笑道：“新婚燕尔，你怎么忍心抛开她跑回来了？”他不假

思索地答道：“有什么办法呢？我回来是要上诉打官司，我必须洗刷不白之冤。我已经写过好多上诉书，只是到现在还没收到一个字的回复。”

邹君把自己妻子称作“女皇”，每次见到我，他都要向我说到“女皇”对他如何体贴，简直赞不绝口。

邹君是痛苦的，又是幸福的。他对生活充满着期待。

众多难友对我都很关心，他们不断进言：“都四十了，不能再拖了。打官司尽管重要，但刀把子是攥在人家手里，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才能解决。成家又不妨碍打官司，两手同时抓，拖不起了。”看到童志友抱着刚出世的白胖儿子，我也确实怦然心动，只好表示愿意试试。大家问我有什么要求和条件，我说：身体健康，忠厚老实无谎言。年龄最好在二十七以上，不可太小。

1979年2月，刚过罢春节，总场又来人调我。这次不同，来人坐着吉普车，带着总场政委手令。时教导员对我打招呼说：“这次顶不住了，我们再想留你也不敢。你去吧，不然对你不好，我们也惹麻烦。”来不及向难友们道别，我被“押”上吉普，到了总场。

一年多前我去看望姚老来过总场，当时坐在热拖的拖斗里想心思，什么也没看见，没搞清东西南北。原来，这儿是个颇具规模的城镇，纵横有两三条街道，街面上多为平房。道路两旁有高耸的白杨，街道比较整洁。四处分布着修配厂、面粉厂、副食品加工单位和机关单位。这里也有招待所、银行、信用社、邮局、商店。十字街中心处即总场场部所在，它的对面是新华书店。书店门口有篮球架，不少人在打篮球，街上行人很少。

从总场场部同侧约百米的一条巷道插进去，便到了总场的育红完全中学。老大一片平房，教室、老师宿舍、实验室都在其中。校园占地面积不小，布局杂乱无章，俨然一个大杂院。

开初我住离校门不远的一间平房，里面已经有一位教外语的陈老师。他六十多岁了，人长得清瘦，气质文雅。他在抗日时期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现在与我一样是刑满就业人员。闲聊中我才知道，他先我来这里才不几天，之前在另一个分场。此时尚未开学，

把我们提前调来是要先熟悉一下环境。

陈老师在北平参加过学生运动和进步组织，七七事变后才去西南联大。肃反中说他“托派”，判了他二十年。刑满后他一直待在农场，前后有二十多年了。他说指控全是莫须有，他写过无数次上诉，提供过许多旁证，案情本来是不难澄清的。然而每次上诉都如石沉大海，没人理睬。他至今仍在上诉，只是感觉到希望越来越渺茫，因为活着的知情人越来越少了。他显得悲戚，也很无奈。

开学上课前，我搬到另一排平房，房间离陈老师不远，中间隔个篮球场。这排平房共六间，两间房空着，四间房有人。西头第一间是轧面机房，白天有三四个教工家属忙进忙出。我住另一头第二间，我隔壁左右住着两位带家眷的老师，他们都姓任。一位任老师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犯罪判刑原因不详；他调来已半年，此时喜得千金。他老婆很年轻，还在坐月子。另一边的任振亚老师比我大几岁，个头比我矮。他和他妻子是原配，湖南长沙人。他们有个十三岁的儿子，正在读初一。

任振亚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分配到青海冷湖，是一级技术员（挨工程师的边儿），还兼苏联专家翻译。1960年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撤回专家。他因与专家关系“过密”而罹祸，判了五年刑。他老婆皮肤白嫩，体态匀称，五官端正，又颇会修饰，衣着打扮给人清新不俗之感。任振亚教初三两个班的数学，我教高一两个班数学。我们专业上有些联系，接触多些。任振亚后来也平反了，调到了格尔木中学当校长。

那些干部身份带家眷的老师住篮球场西头，虽同属平房，却是独门独户。每幢平房内有三四个房间，外面用篱笆围了个小院。不像任振亚，三口之家还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房间是卧室又是厨房，还兼用于办公备课。

育红中学是德令哈农场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学生有一千好几，老师有一百多人。学生多数是干部和工人子女，也有少数就业人员子女。高中学生都是从各分场念完初中过来的，他们平时在校住读，周六下午回家，周日下午返校。

学校老师的来历形形色色，有正规大学毕业分来的，如教导主任马孝喜（河南人）就是师大化学系毕业。这类人全校只有三五个，大多数老师是从小学老师里提升上来的，学历属于“文革”前的老高中生。此外，老师中还有从开拖拉机的师傅中提拔起来的人。学校里的绝大多数老师没进过大学门槛，像我这样的另类教师有八九位，还有的人正在调动中。

校长兼党总支书记叫孔军，原是某大队的教导员。他妻子原来是某个小学的校长，现在这里教着初一数学。她与我同组，桌挨桌。她四十有几，脸色红润且微胖，是个爱说笑性格活泼的人。

数学组长房增春原是哈尔滨工大的老右，毕业后发配到这里，他问题较轻，未被判刑，来校前任着机修厂工程师。老师中名望最高的有两位，一位是赵毓文，人皆称赵老。赵老年过花甲，毕业于上海某名牌大学，是解放前的老工程师。他学识渊博，并不上课，专为一些年轻老师上课答疑。另一位是教毕业班物理的戴云龙老师，戴老师是解放初的大学毕业生。这两位老师都是上海人，我一来学校，便听说了他们。无论老师学生，有口皆碑，对他们非常佩服。我这被打着鸭子上架的门外汉，心想要向他们好好学点东西。而戴老师不到5月份就平反，调回了南京工学院，回去就定为副教授。待正式上课，我又掉进学生窝里，顾不上听他们的课，想来甚觉遗憾。

我们这些“残渣余孽”，在“文革”中属于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人，现在竟然站上讲台了，形势发展确实神速。

中国知识分子最贱，有什么办法呢？要活命不贱不行，又受良心驱使，一旦接受任务，唯恐误人子弟。此时我拿着农工正一级的工资，每月才四十八元，不到公办教师的二分之一，却担着比公办教师更重的担子。开学以后，我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中。

同事告诫我说，现在很多人是以貌取人，你应把自己收拾得整洁一些。我本性邋遢，不修边幅，又炼狱二十载，习惯成自然。穿上一大队发的棉制服，已倾我所有，脸虽洗了两三遍，终洗不掉犯

人的底色。

没料到上第一堂课我就撞到了鬼。

“现在上课！”

“起立！”学生班长一声口令，学生齐刷刷站在我面前。

我没有立即请同学们坐下，我离开讲桌，逐个地审视我的学生，我必须尽快熟悉他们。当检查到最后一排座位时，我发现有个人没起立。从他幼稚的面孔来看，我判断他是学生，可还是想确认一下。

“你是来听课的老师？”

他摇头。

“你是场里派来检查的干部？”

他仍然摇头，学生发出轻微的笑声。

他的椅子前腿悬空，他仰着头，两腿交叉架起，脚放桌面上，身子呈平躺状，还在悠闲地忽闪着身体。

我又问：“你是学生？”

他点头。

“你是否身体有些毛病不能站立？”

他摇头，脸通红，圆鼓鼓的眼睛瞪着我。他像个不会说话的哑巴，一直不吱声。

我狠狠地盯着他，怒火上涌。我的心在颤栗，来不及考虑后果，突然爆发了。我一把将他提起，直拖到讲台前，怒吼道：“我没有你这个学生！从此后我的课你不要上，你走吧！”我一把将他推出了教室。

心头有怒涛咆哮，久久难以平静。第一堂课，我未能完成讲稿内容的一半。教学计划被打乱，我已经气坏了。

我不是当老师的料，一辈子也不曾想过当老师。命运偏偏作弄我，也罢，干不成我卷铺盖滚蛋，又不是我打报告要来的，杂海还盼我回去呢。

事后得知，被我赶出教室的学生是全校闻名的尖子生，一个有来头的小衙内。他个头长得高，很多同学都受他欺侮。此前，不论哪个老师上课，他从未起立过。他早已习惯于目空一切，对老师很

鄙视。而可怜巴巴的老师们只能忍着，任由他去。

正当我准备滚蛋之际，他父亲领他上门来了。没想到他们是来赔礼道歉的，他父亲是位有资历的干部，身板硬朗。一见到我，他的双手就攥着我的手不放；他的手粗大而有力。

他说道：“你就是向老师啊，你来得太好了，可惜迟了些！我的孩子就是要你这种老师教，你一定能把他教育好！千错万错只怪我们当父母的平时太溺爱他，使他不懂规矩，不懂礼貌。请你原谅他一次吧，他以后一定会改的。孩子，过来！赶快给老师行礼，表个态呀！”

他儿子向我鞠了一躬，身体弯曲近九十度；嘴里没说话。

这就够了，我的气全消了。

一场风波过去，我没说一句话。这是个不错的老干部，有身份不居功自傲，没摆架子。我还能说什么呢？

过了两日，朶海分场孔场长到学校来看望他女儿，那孩子也正好是我教的学生。孔场长有点架子，他派人把我召到图书室，话里有话地对我道：“向老师，你是我们朶海出的一个人才哩。我调你去分场你不肯，嫌我那儿庙小，放不下你这菩萨，竟跑到总场教高中了。也好，大材大用，各尽其能嘛。我的孩子就烦你多替我操心咯。”

我早听人说这孔场长以前跟贺龙元帅当过警卫员，凭这点很牛气。“文革”中，贺老总被打成“军阀”“土匪”，不知株连到孔场长没？看来问题不大，要不哪能这么牛？他把我叫到图书室谈话，我是很反感的。

孔场长走了，图书管理员提来只小竹篮，上面用报纸蒙着。揭开来，原来全是鸡蛋，有好几十个。我无论如何不接受，管理员发起脾气来：“不要白不要！我说你这人怎么到现在还这么傻，脾气这么倔呢？”

我也有些动火：“你没听说‘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吗？若是我教不好，怪自己没本事。被人一脚踢出去，回去也不欠人的。拿了吃了就不同，人家心里会不舒服，我也觉着对不起人。何必呢？”

即使他女儿满意我的教学，那我是替国家负责，是我本分，用不着他谢。”

我硬把他推出了门，只听见他在门外说：

“没见过这样的怪人，不可思议！”

二、和鲁××的邂逅

德令哈的阳历2~3月冷得很，早上我跟着学生跑操，操场上的人都戴着皮帽、皮手套，像我这样光头光手的没有一个。我不停地搓手搓耳朵，此前我已经认真做完一套“劳卫操”，做了几下引体向上，仿佛又回到大学时代。

毫不夸张地说，这时我的精神好极了。我是全校师生中第一个起床的人，不管头天晚上睡得多迟，第二天早上五点，外面还是墨墨黑的，我就准时开始了早读。我希望把外语捡回来，把能捡回来的都捡回来。我精神抖擞，充满活力，走路像阵风，再也浪费不起光阴！

关在笼里与世隔绝的人，无限渴望自由；渴望工作和新的生活。一旦这一切展现在面前，内心的激情远非言辞所能表达。尽管我心中仍有伤痛与郁闷，有种种矛盾与冲突，这生命激情的迸发却是无法阻挡的。

我住的这个房间无甚家具，只是靠后窗并排放着两副高低床架。我与学生贺鹏都在下铺睡，上铺则用于放置脸盆、漱口缸和几本书。屋里有一张桌、一把椅、一个铁壳火炉，一盏四十瓦的灯泡直垂到桌面，再无别物。

贺鹏是初三学生，这孩子好学懂事。他的父母早年从四川来青海支援边疆建设，如今父亲是机修厂汽车修理工，母亲料理家务，也种一点菜。贺鹏的姐姐贺小燕是本校高二毕业班的拔尖生，他下面还有两个读小学的弟弟。一家六口四个学生，靠他父亲一人的工资生活，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们家就在中学附近，我说不清与这家人是如何结缘的。一到学校，贺师傅便找到我，他说听说过我的

情况，他把贺鹏托付给我，请我管教。我无法拒绝他的信赖，便一口答应了。平时贺鹏见我太忙，他主动给我生火炉，扫地，整理内务。我为他补习功课，我们之间大有叔侄亲、师徒情。

我很快为学生所接受，小屋里常常是门庭若市，热气腾腾。

开学不几日，房组长要我证明一道恒等三角题。不知他是要考我呢，还是他解此题真的是力不从心。中午十一点我在教研组接到任务，一口气搞到开饭时节才解证出来。我以为是午饭结果却是晚饭时间了，居然午饭没吃一点不觉饿。古人有废寝忘食之说，我第一次有此经历。这道题很繁难，加之对三角诱导公式生疏，先要推导公式再来演证，我足足花了四个小时才抄写交差。

学生喜欢我的热心与耐心，房老师赞许我锲而不舍的钻劲。

3月底或4月初，又有三位老师调来，其中两位是我的相识相好：姚老和向医生。另一位是教语文的老师，年龄与姚老相仿。我们住在同一排屋，确实开心，“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974年调离尕海二大队后，我与向医生还时常相见。有时在休息天，我骑车去二大队或四大队探亲访友，路上遇到向老师；这时他竟也要与我讨论初等数学问题。我俩蹲在路边，一蹲个把小时。他严肃认真又勤勉好学，这次他是改行当老师，家眷仍在尕海。每个星期六他回家一趟，第二天带上一些好吃的回来，把姚老和我一起叫去打牙祭。向医生又喜欢体育，有时硬把我从房里拖出去打一场篮球，或者一起到马孝喜家下象棋。因为他们的到来，我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

4月，尕海来人捎话说，给我物色的对象来了，要我去相亲。姑娘到了农场，暂时寄住在童志友家。

对待婚姻，我的态度既严肃又古板，内中不乏封建的东西。我也意识到这一点，但又改不了。爱情与婚姻必须双方自愿和情投意合，否则便无从说起。我抱定一项宗旨，自己已在不惑之年，没有挑拣别人的资本；只要人本分老实，身体健康，对“劳改”过的人不存偏见就行。

姑娘叫鲁××，四川达县人，出身农民家庭。她才二十六岁，

身体健康，长相平平。我对长相原无苛求，对品性要求更高。我想，这也算门当户对了，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交谈中很快发现，她不是我希求的女性。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她的眼神告诉我，她不是那种淳朴的女性，而有些轻佻。她注视我时毫无少女的羞涩，我判断她多半是已婚的女子。当我细问她父母和家中情况时，她终于承认她刚离婚；原夫不务正业，是个吃喝嫖赌的二流子。我要看法院离婚判决书，她说撂在家里没带来；我便嘱咐她发信寄来。

劳改农场发生许多怪事，那些年岁已大的刑满人员，刚释放便迫不及待四处找老婆，不是欺骗对方就是被对方所骗，弄得满城风雨，贻笑大方。骗的法子各种各样，如谎报年龄，五十说四十，四十说三十。又如隐瞒身份，不说自己是“刑满释放”，说是“农业工人”。还有的人吹工资收入，四十几说成二百、三百……也有女方骗男方的，二婚再嫁者扮处女，头婚已有子女，谎称无牵挂。甚至还有有夫之妇来农场搞假结婚，过不几天，卷走男方所有积蓄，逃之夭夭。

就业人员重建家庭，十有七八不安生。夫妻关系紧张，吵嘴骂仗是家常便饭。骂辞如出一辙，都指斥对方是骗子。我沦为囚徒二十几年，再也不愿把自己变成婚姻和家庭的囚徒。相亲应该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我不断告诫自己要小心！

我把鲁姑娘安顿在介绍人家里，答应承担她的生活费。在离婚书未到之前，先“冻结”关系。交代完后我便赶回学校，我记挂着学生，怕耽误他们。

不几天，鲁姑娘由尕海跑到学校找我来了。我甚觉尴尬，颇多羞恼。贺鹏的父母替我排忧解难，把她接到家中住下，犹如她已经是我的妻子一般，亲切备至。每天早上，他们用白糖给她冲荷包蛋，午餐晚餐也都是罄其所有，尽量给她做好吃的。家父知道我要谈对象，寄来了老家的腊肉、腊鱼。我悉数送去贺家犒劳她，自己未尝一口。我对她嘱咐，一切都要等离婚证明来了再说。你不要来学校，我很忙，周日上午我过来看你。谁知鲁竟也不自重，全然不避嫌。

一日下午，我正在给几个学生讲题；忽然她一头撞进来，把学生全吓跑了。她眼泪巴巴地说，我千里迢迢奔你而来，你为何不愿见我？你是嫌我长得难看丢你的人吗？就这样，连轧面条的老师家属都知道我“爱人”来了，她们一齐拥进小屋，在她面前赞我，在我面前夸她，七嘴八舌，甚至说出“浪话”。我感到自己像只被人戏耍的猴，面红耳赤，只得大声宣布：“眼下‘爱人’二字根本谈不到，八字不见一撇，只了解一下，请各位大嫂莫笑。”

私下我征询贺鹏母亲对鲁姑娘的印象，她坦言道：“按道理，这种好事应千方百计撮合促成。你要我把你看成亲弟弟，我才说一句，此事恐怕不成。”她说鲁每天都睡懒觉，早点做好了还要端到她手上。白糖荷包蛋，糖放得多，她喝到碗底不喝净便泼了。“我的孩子都不曾受过这个优待哩，这是过日子的人吗？”

贺大嫂与我的判断完全一致。

弟弟听说我有成亲的打算，卖掉大立柜，凑了一百元来资助我。姐姐更是竭尽全力，一次寄了四百元来；当时这可是笔大数目。接着，鲁的法院离婚判决证明来了，她还有个三岁孩子。判决明白白写着归她抚养，她此前对我一字未提。

我要果断表明态度，我跑到校长兼书记孔军家，向他详述了我与鲁的邂逅和打算，请他代表组织出面为我调解作证。孔军随即到我的小屋，我对鲁摊牌道：婚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经过这段时间了解，我与你没有这种基础。现决定终止我俩之间一切关系。考虑到你千里奔我而来，我不能无情无义，愿承担你回程的路费……

此时鲁哭诉道：“我愿嫁给你，你不能变卦坏良心！”

我说：“婚姻是双方的事，不是我变心，是你一再哄骗我，我无法接受一桩欺骗婚姻。”她知道我说的是事实，有介绍人佐证，也就没争辩。

我说：“我不亏你，虽然没碰过你一个指头，但可能伤害了你的感情，请你原谅。”我掏出事先拟好的文书，读给她听：

“当事人×××与×××，经介绍人介绍，双方议论婚事。后

经交谈了解，彼此情趣各异，无法弥合。经协商，男方同意支付一百元路费、十斤粮票送女方回四川原籍。另外无偿送女方外衣一套、手表一块、皮鞋一双。今后双方无论发生何种事变，与另一方概无干系。特立此字据为凭。”她大约感动于我的诚意，二话没说捺了手印，我说好给她的东西，当孔书记的面悉数给了她。

事情结束后，孔军找我谈了一次话。他称赞我做人正派、坦荡厚道。这件轶事在全校不脛而走，几乎尽人皆知。

也有人说我迂腐，几百块钱打了水漂，原本一分钱都不该给的。我不这么想。我怕，很害怕。我不怕当反革命、政治犯，害怕当刑事犯、坏分子。倘若她咬我一口，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即使洗清，必然是满城风雨，身败名裂。就凭这点，再多感谢她些也应该。

破财消灾，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掉进樊笼，内心如释重负。

这事前后折腾了半个月，终于平静下来。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我接连好几夜因此失眠。

学校的政治干事通知我回杂海分场一趟，说有个什么文件要我过目签字。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去了。

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纸文件：《关于向承鉴同志右派纠正通知书》，上面赫然盖着“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会”大印。文中文字不多，大意是：经查向承鉴在五七年鸣放中确有错误言论，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现予纠正。正文下方又写着说明字样：如本人对此结论没有意见，请写“同意”，一式两份，一份存入本人档案，一份寄回本校。

没有片刻思考和犹疑，我用抖瑟的手写了五个大字：坚决不同意。签上名，一扭头我就回了总场学校。

一路上心潮起伏，二十三年前的往事又出现眼前。这什么文件？到如今还貌似公正，各打五十大板。说我有错，我错在何处？为什么不列出来？往事历历，那些狰狞面孔在我脑中全都鲜活起来……

回校后我就告诉了姚老，然而姚老对我的做法很不赞成。他说：“小向啊，只要他们承认不该划，划错了，就可以了。何必斤斤计较、字字斟酌呢？你敢保证你在鸣放中没有任何错误？莫弄巧成拙，

你不该那样认真较劲的。”

姚老心有余悸，怕我又捅娄子。在他眼里，我还太嫩，是个愣头青。但是，我不怕。我已经被冤枉到底了，难道还不该理直气壮说句真话？

我说，我了解自己，我敢打保票。那时我对毛主席、共产党不仅是相信而且崇拜到了骨髓里。爱都嫌不够，哪能反党呢？

接下来的半年多里，我一直沉浸在教学中。乌七八糟的私事又缠人烦人，我没看过报，对社会上的事一概不知。而姚老看报是雷打不动，他又看的是《人民日报》。他告诉我，去年（*1978年）错划右派甄别改正，现已到了大张旗鼓的阶段。你的事因错划右派而发生，错划是因，后来的问题是派生出来的果。右派纠正，后面的问题依逻辑分析也有望解决。知识分子想问题缜密严谨，物理化学等还须实验证实。某些政治家不同，他们不要法则，不受道德约束，他自己即是道德化身，是最大的法。无因可造因，无果可生果，既无因又无果，照样格杀勿论，人头落地。如今，那个时代虽已过去，但一切都会按科学规律办吗？且拭目以待吧。

姚老的分析令我感慨，却又不以为然。我心底也有希冀，并没有绝望。

我的上诉状寄出去半年多了，难道还会石沉大海？

三、和×女士的交往

转眼到了五一节，晚上总场放电影，这次放映的是南斯拉夫影片《瓦尔特保卫塞纳热窝》。

晚饭毕，班主任和一大帮同学拥到我宿舍来邀我，并说座位早占好了。我到学校来还不曾看过一场电影，有人相邀同去，乐得放松一下。

这是露天放映，不用买票。场地在总场大门与新华书店之间的十字街上。银幕挂在高高的白杨树上，正反都能看。我和班主任坐了一条稍高的条凳，我们面前是全班学生，天色渐渐暗下来。这时，

忽然挤进来一位女老师，学生慌忙给她让座，她正好坐在我脚前的小凳上。刚坐下一阵，可能是嫌凳矮或不愿与学生为伍，她挤到我身边，顺手把一块水果糖塞到我手里。露天电影须天黑透才开映，此时她与学生说着闲话。我的学生都是她教过的，与她很熟。这位老师我也常见到，只是未搭过腔，她是初三的化学老师。

她坐在我身边，与我挤得很紧，我浑身不自在，她却毫不在意。就像老相识似的，她贴着耳朵与我说起悄悄话。这时，电影开映了。

她说：“我早知道你，你没来学校还在孕海的时候。我哥在孕海一大队开拖拉机。你是孕海的才子、孕海人的骄傲呢。”

“你可不能胡说，我受不了。”

她说：“你不但会数理化，文学也不错，还会写诗写小说。”

“全是造谣，胡说八道！我什么都不会，不要听这些无稽之谈。”

“你不要说了，我对你的情况知道很多呢，真的，一点不骗你。”

“全是虚妄，你什么也不知道。”

“好了。我们不谈这些。你与鲁××的事处理完了吗？”

“全干净了。你怎么知道这事？”

她笑出声来，贴近我耳朵悄声道：“我是学校团总支成员，有名的消息灵通人士，你不知道吧？你一来学校我就注意观察你，你也不知道吧？”

“这就怪了，我有什么值得注意观察的？”

“这你就甭管了。你现在打算咋办？”

“啥打算咋办？”

“你的婚事呀。”

“一切暂不考虑。暑假先回家看老父亲，以后再说。”

我们的交谈声音极低，又贴着耳朵，前面学生和旁边的班主任都不可能听见。我很快被电影中的情景所吸引，故事精彩，“老钟匠”的事迹感人至深。

×老师完全另码事，她似乎在想自己的心事。

我问她：“你在想什么？想家？想孩子了？”她扑哧一笑：“我

连对象还没，哪有孩子想。”

“呵，你还小哟！我大约伤害你了，请原谅。”

“这有什么，我一点不介意。我五二年的，都二十七了。现在还在碰，东碰西碰。”

“那以后我称你‘碰君’吧。千万莫心急乱碰啊，碰不好，像我一样上当受骗呢。”

电影散场了，人们陆续退走。她紧紧握着我的手，低声说：“我中专毕业，没学到东西。现在教学甚觉吃力，尤其化学计算，数学底子很弱。我想请你辅导，你答应吗？”

她身上散发着成熟少女的气息，她的手滚烫。

“只要我能力所及，愿意效劳。”

“那以后我可以常到你那儿去吗？”

“不妥。一则我宿舍又乱又脏，像猪窝；二则我那儿学生太多，不方便。”

“那请你到我住的地方，行吗？”

“可以。不过我要抽得出时间，恐怕难以随叫随到，尽量吧。”

回到校园，大多宿舍已熄灯。

这位老师大名鼎鼎，我焉能不知？她的名气来自她擅于交际和打扮。她圆圆的脸，皮肤白皙，收拾得干净利索，浑身流溢着青春活力。她也是四川人，个头偏矮，故常穿高跟鞋。虽“墨水”不多，语言表达能力强，性格泼辣敢管学生，教学效果不错，颇受学生尊敬。理化教研组就在数学组隔壁，我因事常去，总见她伏案备课，头也不抬。我以为她是性格高傲，我还知道她父亲也是劳改队干部，因此对她原无好感。

第一次见面，她为何如此热情？电影场上的邂逅是无意还是有意？躺在床上我反复琢磨，也睡不着，干脆爬起来用记叙诗的形式写下这次相遇。贺鹏问：“向老师，夜深了，怎么又爬起来？”

“你睡吧，我想起一个问题。要把它记录下来，怕忘了。”

她住伙房门前的一排平房里，隔壁邻居是赵老。我每次买饭必得经过她门口，绕弯都绕不过去。我怕见到她。而她有时却把门打

开一半，在门里向我招手。我只装着没看见，急匆匆地走过。没想到，她的胆量比我大得多，竟会站在门口守着我。见我过来，她当着其他老师的面大声喊：“向老师，有个问题要请教你！”我没办法，不得不踏进她房间的门槛。

她的宿舍与我的不能比。我的房间窄而深，墙壁乌黑。她的宿舍阔而浅，墙壁刷得雪白。屋内弥漫着淡淡清香，各种小摆设雅致整洁。我每次去，辅导时间不多，闲扯时间不少。有时，她要我吃她烧的菜肴，却不陪我吃，只在一旁呆看。我品尝一口，连声道好，便放下筷子。她却上前来，非要我全部吃完，说是专为我做的。有时，她要我伸出手来给她看手相，她说我手上的生命线长，生命力强，定能长寿。又说我感情线少而齐，将来娶妻能白头偕老。有时她拿出一副扑克牌，铺了一桌，让我抽一张用来算命。看过牌，她板起面孔认真道：“你要找的爱人在南方，今年8月有贵人相助。”

我点滴不信，表面上只能应付着。

我怕她，怕这般大龄姑娘有变态心理，怕“男女授受不亲”，怕外人生出流言蜚语；还怕应付不好，伤她自尊心，会使她恼羞成怒，惹出事端。每次去她那儿，我都疑虑重重，小心翼翼。我先要她摆出问题，解答完就尽快离开。我的时间确实很紧，况且，我压根儿没打算和她发展关系。我们年龄相差甚多，且又门不对户。

她对我的不耐烦很敏感，只是不露声色。她向我讲述了家庭情况，着力介绍了她父亲的为人。她说，你看，我哥在杂海与就业人员不是相处得很好吗？他欺侮、压迫过你们吗？看得出他是干部子弟高人一头吗？

不错，她哥人缘很好，我原以为他是农工家庭子弟呢。

“我爸常对我们说，犯人犯的是国家的法，不是犯哪个人的法，要尊重他们的人格。他们有自尊，甚至比一般人更强烈。那里面有些人是因为不同的思想观点而犯罪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若是思想转变过来，是很有作为的。”

她父亲无疑是个开明的劳改干部，有这些看法很难得。

她又说：“我对你的看法就没有偏见，一点都没有。从你对待

学生的态度上，从处理与鲁××的关系上，甚至从挺胸抬头、目不斜视的走路姿势上，我大致得出结论，你是一个正直的人。你过去的问题估计也能得到平反的。”

她的话对我震动很大，对于平反，我何尝不是梦寐以求，何尝不是期盼着这一天早日到来。我告诉她，刑满那天我就递了上诉。

“现在全国都在搞右派平反纠正，落实政策；总场也在搞。你是先错划右而后打成反革命的吧？”

我点点头。她说：“那大概好办。只要右派纠正，后面的问题也就不攻自破。不错划你右派，你在大学里好好读书，不可能接触后来那些事。你说对吧？”

嘿，这个中专生大姑娘倒挺有政治头脑呢，我对她的看法陡然上升一个台阶。我淡淡答道：“其实，平反不平反对我已意义不大，我还能做什么呢？反正这辈子都糟蹋了，完了。”

她很惊讶地说：“你平时看起来精神振作，朝气蓬勃，没想到你竟是这么悲观，不可思议。”

“我有时振作，有时悲观；表面振作，内心悲观。朝气与活力只是强打精神，我不愿别人看出我内心的痛苦，不愿自暴自弃。可冷静思考，已经大半截入土了，再无缘从事自己喜爱的科学研究了。”

“你还年轻，有知识基础，还会有作为的。你的后半生肯定不错的，我很羡慕崇拜你，你难道看不出我对你有好感吗？”她脸上泛起一片红晕。我则故意冲淡气氛说：“好感顶什么用，它挽回不了我青春岁月的流逝。”

这是个很不错的姑娘，开朗、热情、好学而能干。但我对她却没有产生爱的感觉，理智告诉我，不该有此奢望。

工作担子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要备课，写教案，改作业；还要自学与复习本科课程，又要拾回外语。下课后，学生像潮水般涌到我屋里，要一个个打发。只有夜深人静，我才能静下心来钻研学问。

我有意回避她，而她只要两三天不见我去，便径直跑到我宿舍，

当着学生的面将我拽走。

某个星期日，向医生邀姚老和我到马孝喜家去下棋聊天。此时我们四个人都在教数学。马孝喜住在校内篮球场北端，独门独院。这是个幸福家庭，两个男孩读书成绩优秀，夫妇俩待人宽厚，热情好客。即使这时，她也跑来凑热闹。马孝喜拿她开玩笑，向我们介绍道，“这是我侄女，伶牙俐齿。”她撅撅嘴，装出不高兴的样子。姚老解围道：“马老师大你十七八岁，给你当叔叔，你不吃亏的。”她眉飞色舞起来：“真不吃亏？”大家一齐要她喊“叔叔”，她还真喊，一众人笑得前仰后合。

姚老到学校后结识了赵老，图书管理员与他在一起改造过，我又与他经常在一起，姚老的心情较前判若两人。只有一点不满足，他到处物色棋友，未得如愿。我告诉他愿与一试，他有些疑惑，纹枰上竟也不相上下。姚老说：“小向，在二大队我和老陶下围棋，你在旁观看。问你，你说不会。没想到你还真沉得住气，对我也打埋伏”。我说：“那时我刚从巴仓过来，巴仓的阴影压在心头不散，哪有下棋的心境？”此时她在旁边观战，替我俩沏茶添水，一句话不说，像是乐在其中。棋局未完，她也不走。

那些日子，邹庆礼来看过我两次。一次是他送危重病号到总医院就诊，顺便来看我。他告诉我，“女皇”已身怀六甲，可望6~7月临盆分娩。邹是个很稳重的人，喜乐极少溢于言表；这次也难掩兴奋。他又说，你的事也要抓紧啊，怎么样，有眉目了吧？要不要我替你张罗？将来要是一龙一凤，我们好成儿女亲家。

朶海二大队刘发江的两个孩子也来看我，他们正念小学，一点不认生，“叔叔”长“叔叔”短叫个不停口。看两个孩子在我床上、屋里蹦蹦跳跳，手舞足蹈，我心底涌起一股股暖流。

暑假前，贺鹏给我捎话说，他父亲叫我晚上去一趟。贺师傅领我七拐八拐，在夜里我也摸不清东南西北。我问他去哪里，他说到地方你就知道了。进得一个小院，堂屋里灯火通明，屋内走出一位高大汉子，拉着我的手问我：“向承鉴，还认得我不？”

“呵，是金指导员！您好，您好！”

金指导员是我在巴仓农场二大队五中队的指导员，为毛主席像烧洞的事，是他救了我一命。我焉能不记得，我终生都不会忘记！

桌上早摆满丰盛的菜肴。他说：“来，都就座，我们边吃边聊。”我说，我已用过饭了。金一听不高兴了：“贺师傅，你咋帮我请的？用过饭不是叫我白忙乎？”

金指导员还是那样高嗓门，快人快语。我不能叫贺师傅为难，叫恩人扫兴，我主动就座道：“我今晚舍命陪君子，陪你们喝酒吃菜，总可以了吧。”指导员爽朗地笑了起来。

原来，金指导员与我们一道由巴仓调来德令哈农场，在总场任着副食品加工厂指导员之职，再没动过。

他说，你一来学校我就知道了，我的孩子回来说，来了个向老师如何如何，我一猜就是你。

他说，请向老师来，有一事相托：我的老小现读初二，调皮捣蛋光贪玩，功课不好。以后烦你多操心，管管他。

他叫出孩子，只见这孩子年龄不大，个子不小，与贺师傅个头相差无几。这孩子朝我规规矩矩鞠了一躬，进里屋去了。

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救命之恩”又当如何？可惜我此前不知，早知早管了，何须相托相请。

四、探亲记

6月20日放暑假，第二天我便踏上探亲归程。为节省车费，贺师傅在机修厂为我找到便车。他说：“搭便车的人可能很多，你要尽量早些。”天不亮我便赶到停车地点，我是第一个上车的。

这是辆刚大修过的带篷旧货车，搭车的人果然很多。人们蜂拥而上，互相争抢，又挤又吵，有人直往我身上压过来。我一让再让，最后只得坐到一只柴油桶上，才算安稳下来。

天下着雨，上车前就在下，越下越大，这是场青海少见的大雨。十点光景，这辆车突然车轮打滑，陷进了烂泥。司机无论怎样加大油门，始终冲不出来。大雨滂沱，车在荒滩上抛锚。此处人烟稀少，

有时十几里、数十里才见人家。前不挨村，后不着店，司机站在大雨中，吆喝乘客们全下车，一则减轻负荷，二则帮忙推车。我第一个响应跳下车来，其他人全装聋作哑。司机跳脚骂娘，又下来三四个。司机轰大油门，我们帮着推，试了几次都未成功。司机又是大骂，车上除四五个老人和小孩，还有二十几个中青年。有几个人模人样的小伙子和大姑娘，全铁了心一样；纵使司机骂到了祖宗八代，他们也不下车。

我迷惘了，在毛泽东思想阳光雨露沐浴下成长的人们，如今竟这般自私、麻木了。十八年被打入地狱的我，对这般情景十分陌生，恍如隔世。这还是人的社会吗？怎么没人味儿呢？

车轮陷在黄胶泥里太深，而且越来越深。司机和我早已通身湿透，还滚了一身黄泥巴。司机站在大雨中向远方眺望，他对我说，那里像是个羊圈，有人。请你去看看，借两把铁锹来。

果如他所料，我借来铁锹，我们将烂泥挖出，再填入砾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车终于开了出来。待我送还铁锹折返，腰腿都不是自己的了。司机对我说了许多好听的话，又叫我坐到驾驶室里。此时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受到优待也是当之无愧的。

火车上我无心顾盼沿途风光，一直憧憬着与亲人的重逢。北京新车站我是第二次来了，第一次在二十年前。那还是1959年冬天，巍峨壮观的新车站刚投入使用。我知道它的设计者是梁启超之子、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的梁思成。这次重来，车站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我像掉进了人海里。出得车站四处搜寻，却不见来接我的胞姐的身影。无奈，只得问路前往。姐夫见我虽然高兴，却不很热烈。过了一会儿，胞姐气喘吁吁回来，她一把抱住我，一句话也说不出就抽泣起来。胞姐是世上最少私心的人，她脾性耿直，对人像炭火般炽热；对我更是无微不至。她说在车站找不到我急坏了，请车站广播找人，生怕我迷路走丢了。在姐姐眼里，我似乎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我说我有眼睛有嘴，认得汉字又认得外国字，只要在地球上就丢不掉，说得她破涕为笑。

6月下旬的北京，天气炎热，所有人都穿着衬衫、背心，我穿的

却是件套棉衣的罩衣，黑不溜秋，犹如外星来客。姐姐伤心不过：“可怜连件衬衣都没！”理发、洗澡，姐姐亲为我搓背搓身，然后让我从上到下换上夏装。她把我打扮好才舒心道：“瞧，弟弟一下年轻了十岁，还年轻得很哩。”她把我身上的“劳改皮”全做了处理，没留一针一线。姐姐说，你大约劳改二十年都没洗过澡，身上的污垢够肥一亩地。

姐姐给我买了一块手表，又带我游天安门广场、故宫、中山公园，照了不少相。就这样，她形影不离地陪我玩了一个星期。我把我的经历简要向她诉说，惹得她时时落泪，有时竟失声痛哭。姐姐说，我一直认为弟弟是清白无辜的。你穷孩子出身，吃着国家助学金读大学，对共产党感激还来不及，哪里会反党？你是对混进党内干坏事的个别人不满，才被划右的。你吃亏在认死理上，又争强好胜不服人。以后你遭逮捕判刑，大约是对反右不服，对党产生怨恨。这也是人之常情。

姐姐并不完全了解我，她大致说对了前半。后来的判刑，并非因为我的心胸狭隘，也不是拘泥于个人私怨，而仅仅是因为我有起码的做人的良心。我没有告诉她，或者去反驳她；我觉得没必要。

星期日外甥回家来，他亲切地叫我“二舅”。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才六岁，如今已是相貌堂堂的英俊青年。姐姐告诉我，他参军后在部队各方面表现优秀，只是因你的原因，没能提干入党。这都在我意料之中，姐姐和姐夫何尝没因为我而受株连呢，他们只是没说罢了。

姐姐又问我与鲁××的事，我和盘托出。姐姐说，我看世上就你傻。现在社会不是以前了，到处都有瞎哄骗。我真担心你适应不了，你的婚事以后我替你物色，保证找一个你中意的。

离开北京到江西，先在九江码头下船。弟弟来接我，猛一见他我竟把他当成了哥哥。二十多年前他还是个十一岁的孩子，如今长得人高马大，和记忆中的哥哥一样。胞弟很能干，在九江供电局总调度室当调度，早娶妻室，已有个四岁多的男孩。弟媳也是电工，全家住市郊不远。

自母亲辞世，弟弟是我最爱；也因我的缘故失去很多机会。见到他我心有戚戚，弟弟也因我受到伤害；身在囹圄时，我对他的愧疚和思念也是最多的。

弟弟对我说，自1957年暑假我毒打他后，他开始重视学习。读初中时成绩稳步上升，毕业时飙升前三名，考上九江农专。毕业后他考上军校，体检与成绩很不错，最后政审又因我而落选。读大学无望，他当了通讯员，本应转为国家干部，结果却被下放农村。后来柘林修水库，建电站，他当了普通工人。电站建成他已是技术拔尖的电工，调到武宁变电所，不久又选拔到九江供电局当调度。

在家期间，弟弟有一天拿来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读着这份《纪要》，我不禁感慨万千。记得其中有段文字：毛泽东今天利用这个打倒那个，明天又利用那个打倒这个，对谁都不相信，唯相信自己……应该说，林彪还是把毛某人看透了。阴谋家行程匆匆，都到马克思那儿报到去了，还有一场官司打。不知马克思把谁当成自己的真传弟子？或许被马氏一顿臭骂，亦未可知。

九江是我待过四年的地方，抽得闲暇到母校一游。我欲探望恩师章甘雨，谁曾想到他已作古多年，而且也是五七年反右的冤魂。打听他的坟莹，无人知晓。我只能在心里向他鞠躬默哀，惆怅与悲哀笼罩了我，归途中只觉四肢无力，像是病了一场。

我从九江再到家乡武宁，终于见到了睽别二十三年的老父亲。父亲已年过古稀，见到我时老泪纵横。我宽慰道：“我现在好好地回到您面前，又没留下残疾恶症，您老应高兴才是！”父亲哽咽：“我知道你不会干伤天害理的事，苍天有眼保佑了你。”父亲终生不信教，不入任何党派，竟相信苍天有眼。

第二天一大早，我去到奶奶、母亲坟上，行三跪九叩大礼，向她们报告我的归来。

县城里传开了我回来的消息，连日来好友接连登门探望。他们都是我小学、中学的同窗，大家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每每谈至深夜。

当年少先队时期的辅导员是一位老党员，见到我他开口便道：“听说你在大学划右，划错了，划错了，真亏死你了！”

谈话中得知，我的小学老师陈竟楼已逝世，是老死的；而最受我尊敬的罗时浣老师与我一样，划右后被活活整死了。罗老师一身正气，敢在讲台上痛斥国民党腐败；国民党没有划他右派入另册，可毛泽东容不了他。

听说肖庚生老师健在，我连夜去拜访。早年离开他时我还是个十四岁的少年，如今再见，他居然一口叫出我的名字。言谈中，得知老校长张罗已遁入空门，成天吃斋拜佛，如今是县佛教协会会长。世道变化何其大！

父亲和哥哥把他们的遭遇也大致对我讲了。

“文革”中，哥哥有三大罪状：首一条是有个“现反”弟弟，第二条是加入过三青团，第三条是出身“逃亡地主”。关于第二条，那还是解放前夕上中学时，他们学生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第三条是造反派对我父亲的捏造，他们的根据是：为啥你家能供养起两个大学生？言下之意，必定属于地主阶级。幸有街道居委会主任左老太出面作证：“莫乱说。他一条扁担挑两只箩筐，逃荒要饭进的东城门，我亲眼见的。”左老太为人正直，又有硬后台——她女婿时任县委副书记。造反派不甘心，还跑到河南光山我家祖籍去外调，结果证明我家世代贫农，父亲为人忠厚老实，这才不了了之。

“文革”中小小的武宁县城，揪出牛鬼蛇神好几十。这些人天天被戴高帽，游街示众。长长一串人，跪一阵，斗一阵，喊一阵，哥哥在其列。晚上被关牛棚，不得回家，嫂子一日三餐送饭。批斗中，人被吊在房檐上拳打脚踢。有次批斗，一个黑打手照哥哥后心一拳，把他打得昏死过去。我哥生性柔弱，受不了酷刑欲自杀，父亲发现后及时制止了他。父亲说：“这是场大劫难，只要没做亏心事，总熬得过去的。你要想开，要挺住，你有儿女要抚养啊。”

1960年哥哥由太原主动请调回县，任县里水轮机厂的工程师。按资历、文凭与能力，厂长位置都不够他坐的。他不懂权术之道，当个技术股长还遭人嫉妒。哥哥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时，有人质问他——你弟弟当反革命，是不是你指使教唆的？

受我株连的何止亲人？我的朋友、同学及其家人，不下几十

百。父亲说，现在好了，乌云散，太阳出，那些拿钢鞭铁棍打人的恶人，这几年每年死几个，死光了，全得的暴疾。这是老天报应。父亲掰着手指，有名有姓，谁得的什么病症，何时死的，一连数了十几个，令我惊骇。

如今的武宁县城是1968年新建的，我记忆中的小山城已不复存在。我怀念老县城，那儿是我童年戏耍的乐土，有我的欢乐与笑声。中山公园争奇斗艳的梅花、任摘任吃的梅子……还有张家祠堂、王氏夫人庙、我的母校师范附小和武宁一中。紧靠城门的北门头，有我栽下的第一棵刺槐。大操场上有我赛跑的串串足印，还有在大年初一雪地上留下的深深步履……

我站在新县城的南渡街口，望着没入水中的老县城，我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一去不返，曾经的足迹和笑声也无处寻觅了。

连日来，父亲和哥哥与我讨论了两件大事。他们执意要我尽快回来，西北漂泊半生，再不能浪迹天涯了。家乡有我的亲人、我的老师同学，可以相互照应。我则告诉他们，虽已刑满，我仍身不由己。回来得上头批准，办各种手续。若不能平反光明正大地回来，对亲人有害无益。我说，我正在打官司，平反或许有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我还要打官司，浑身哆嗦起来：“你还打什么官司呀？打不得的！衙门历来是官官相护，你告原来判你的衙门，不但打不赢，弄不好还要算老账，罪加一等。吃个哑巴亏算了，千万莫打。”

父亲吓破了胆，我只能宽慰他说：“我不是小孩子了，凡事我会酌情处理，量力而行。您老就不要再为我操心了。”

再一件事就是我的婚姻，父亲对此看得重于一切，他要我抓紧办，好像一天也不能耽搁了。他噙着泪说：我只要看到你成家，死也瞑目了。此前哥嫂已为我物色了几位，我都觉得不合适。吸取第一次的教训，我决定一切由自己做主。父亲心情急切，我不能不满足他的愿望。我向他表示：短则一年，长则两年，我一定解决终身之事。父亲听后还是半信半疑。

故土一月，匆匆又踏上回程。望着悲怆的老父亲，还有兄嫂和送我的侄儿女，告别众多的亲朋好友，我心中积满断肠人的血泪。

五、“桃花运”

在车上我一直在考虑，要不要到兰州下车，去兰大落实我的右派悬案。我估计还有人作梗揪住不放，这就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事。想来想去，感觉我陪不起。一则我身上没钱，下车就需吃住；二则要耽误德令哈的学生。心一横，算了，先回青海，以后再说。

进得育红中学，惊闻暑假里发生了两件事：刘干事刚调尕海分场不久，竟然暴病去世；金指导员的小儿子在水塘溺水而亡。

刘干事、金指导员都是不错的干部，我很感激他们的知遇之恩。正想尽力帮助他们的孩子，没想到悲剧发生了，心中十分惋惜。

这学期我教高二数学，高二也是毕业班，教学任务紧迫。刚要进教室上课时，×××到我跟前来说，你下课立即到我宿舍来，我有特重要的事告诉你。

课后我到她房间去，见她的脸红彤彤的。她说：“暑假我回诺木洪农场父母那儿，把你的情况向他们说了。”

“我的情况有什么好说的？”

她的脸更红了，娇嗔道：“你真是个书呆子。有时聪明绝顶，有时笨得出奇。”

“我是个笨人，乃世上最愚者，请指点迷津。”

她轻轻推我一下，撒娇道：“难道你看不出，感觉不到我喜欢你？”

“请莫拿我开玩笑，这玩笑开不得，我开不起。”

她一下扑到我跟前，用胖乎乎的小拳头击打我的胸部和胳膊。

“谁和你开玩笑，我是真心爱你呢。”

“×老师，请你冷静。我们不合适，无论年龄、身份都不合适，莫把鲜花插到我这牛粪上！”

“谁说你是牛粪了？你是作践自己。你劳改十八年没看书，一上手便能教高中。老师们对你评价很高，都说是块好料。”

她一再向我表白，她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则一再表明，我们根本不合适，跟了我不会有幸福，只能陪我受

一辈子罪。

她不慌不忙，掏出我写给她的“联句”来。

“你写的东西我爸看了，说你很有个性，文字有味儿，夸了又夸。”

看电影归来的即兴戏言，没想到竟转到她父亲那里。

她告诉我：我父母说，论年龄相差十三四岁，稍大了一些，但也没什么。主要是你必须彻底平反，他们才会同意。

我听后心有不悦：“你父母的话是个托词，平反与否，我能决定得了吗？如果是这样，倒像是我自己要去坐牢似的。刀把子攥在别人手里，哪能由我？”

“不过，父亲说，目前对你平反有利，全国都在清理如同你这一类的案子，他估计你平反的希望很大。”

“希望有，不等于事实。要平反，很难说是不是要等到猴年马月呢。年龄不允许我无边无影地等下去。再说，我压根儿不接受附有先决条件的爱情和婚姻。我认为凡有先决条件就不是真正的爱情和婚姻，是买卖，是交换。”

“那你觉得什么才是真正的爱情呢？”她偏着头，问我。

“很简单，以心换心，两心相倾；相互绝对信任，无怨无悔，这便是圣洁的爱情。附有条件即是给爱情戴上枷锁，是对纯真爱情的玷污，两者没有共同之处。”

“你对爱情的理解过于理想化了。婚后可能遇到的压力和困难处境有时不得不考虑呀！”

“这我承认。但我追求的是真正的爱情，否则我宁可终身不娶。我不接受任何先决条件，有条件即是不信任。说到底，你相信的只是法院的那张纸片，不信我。彼此不信任，有什么爱情可言。”

她面红耳赤，尽管她钦佩我的想法，但不能不顾虑父母意见。末了，她表示还须做通父母的工作。

平心而论，这时我确信她是喜欢我的，我对她也颇多好感。

哪晓得，事情又有变故。

快到国庆，同教研组的师淑芝老师邀我到她家去，说有事和我

商量。师老师是我到学校后十分敬重的一位老师，这并非是因为她学识最高。她是“老高中”，教初一、初二数学。平时穿着朴素，在组里话很少，很庄重。她原来就在这所学校任教，却不摆老资格，遇到疑难问题也总是虚心请教。这是一个真诚和朴实的人。

她对我很客气，开门见山地问我：“听说你同鲁××的事处理妥当了？”我点头称是。她说：“你是马主任和老苗接到学校的，你在杂海的情况我们也知道。”

原来师老师与苗干事是两口子，俗话说：“不是一样人，不进一家门。”苗干事也是个本分人，我印象不错。

“本来，你刚来校不久，我就打算找你。听说你和鲁已经在谈，不便再开口。如今那边的事已了结，我打算给你介绍一门亲事，你意下如何？”

我很感谢她的关心，便问：“不知是谁？”

“我侄女。”

我吓了一跳，“那不行。我与你年龄差不多，你侄女太小。”

“是叔伯侄女，今年二十六周岁。”

“恐怕不行，年龄相差太大。”

“我这侄女委托我替她做主，我看上的人，她便同意。我认为你虽然年龄稍大些，其他方面都很不错，你们还是般配的。她那边的工作我负责做，现在只看你的态度。”

“请给我三天考虑时间，三天后答复你。”

我不能“脚踩两只船”，我决定将这事婉转告诉×××，看看她的态度。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到她屋里去，我对她说，我的老父亲七旬有三，我已经答应老人，一年内解决婚事。这是我力所能及的，没有理由不满足老人；我已经使家父失望太多。不知你把我的意思向你父母转告了没有？

她答应：“转告了，两老还是那个意见，要你平反了才好定。”我问道：“你的态度呢？”她说：“父母的意见自有它的深层道理，我想，应该尊重他们，就像你尊重你父亲的意见一样。”

谈崩了，只有摊牌。我说：“我们应尊重父母，都没有错。可这事不能拖，再拖我只好打一辈子光棍了。那样的话，我只有接受别人的介绍了。”

她抿嘴笑，以为我跟她开玩笑，或者在变着法子要挟她。

“如果有人替你介绍亲事，你应该接受这好意。”

此时我便告诉她：“这是真的，不是玩笑话。我尚未对介绍人表态，特来告诉你，征询你的意见。”

她停顿了好一会，笑容没了，说道：“你可以接受，你有这个权利。”

我说：“那好。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谁也不怪谁，骂谁，恨谁。谁也不欠谁，我们还是朋友。”

她答应了：“这有什么可怪、可骂、可恨的。”

她可能心里不是味道，我也没有什么话可以安慰她。我打算立即离开，避免难堪。刚要举步，她又叫住我。

“有件事还要听听你的意见，我想写入党申请书。”

“别的事或许我可以参谋参谋，唯独这事你只能自己拿主意。”

“如果我一定要听听你的意见呢？”

她很有个性，我不能把事情弄僵。我考虑了一下说：“各人的经历不同，对党的认识也不一样。我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谈，你觉得无参考价值就当我说。”

她默默地听着，脸上失去昔日的活泼，表情很严肃。

我说：“如果在建国之初，我一百个赞成。如今我认为，可入可不入。在百姓心中，共产党威信已今非昔比。这是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执行了一条极“左”的错误路线，光那三年‘困难’饿死的人就难以计数。二是治党不严，大量坏人混进党内，入党做官，欺压百姓，败坏党的声誉。当然好党员也不少，党的宗旨、纲领是好的，在很大程度上被坏人玷污了。你想入党，证明你有信念。人不能像牲口那样活一辈子，没信念追求就没有精神支柱，没有灵魂。但必须清楚为什么要入党，真正的动机是什么。要入，就要做个真党员，不为入党做官，更不仗势整人。”

我一口气说了一大堆，以前从没对她说过这许多话。

她说，你的要求好高，比党组织对我的要求还高，你看我能做到吗？

“只要心正，肯定可以。”

她又要我替她草拟申请书，我答应了。

从她屋里出来，我径直去了师老师家，我对她说：“试试看吧。”她要我写份简要履历，还有家庭成员情况等。我在一张小方块纸上如实写出，纸上既无抬头也无落款。

写完字条又过了几天，1979年11月5日，我突然接到兰大电报，要我回校落实政策。这是我期盼已久的事，我立即向校方请假。临行时我只通知了姚老和师老师，便踏上旅程。

那日我的床架上还放着一个用报纸包着的大猪头，是学生家长送来的。当时我不在场，否则我会拒绝的。猪头足有六七斤，匆忙中我甚至忘记告诉贺鹏，叫他拿回家去。以后猪头腐烂发臭，贺鹏发现后扔了。可惜！

由此可见，当时我的心情是何等的急切啊！

第二章 回兰大落实政策

一、2010 号房

兰州、兰大，阔别二十二年的古城和母校，我回来了。我在心底禁不住发出苦涩的嘶喊。

这一天是 1979 年 11 月 7 日。

兰州和兰大变了，变化很小。令我吃惊的是，在兰大我见到久别重逢的老同学、老难友，他们都先我回校，比我早到半年甚至一年。他们是胡晓愚先生，我们同案中唯一的老师；谭蝉雪——唯一的女性；还有田昌文、杨贤勇、陈德根、何之明、孙和、苗庆久。缺席的只有张春元、胡学忠、顾雁和谢成。

二十多年了，多大的变化啊。胡先生当年才二十八九，如今已全秃顶。谭大姐当年才二十几，如今人到中年，风尘仆仆。当年的一帮年轻大学生，转眼间脸上沟壑纵横。多少风刀雨剑，多少日煎夜熬！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心上都刻着毛时代悲剧的深痕。

陈德根、杨贤勇、孙和、苗庆久和谭蝉雪均已成家，我、田昌文、何之明三人还是光棍。

老谭领来五岁的女儿辛琦，把我们一一介绍给孩子。胡先生是辛琦最大的舅舅，陈、杨、苗、孙全是“大舅舅”，田与何是“小舅舅”，我位末，成了她“最小的舅舅”。辛琦逐一喊着，声音甜甜的。最后喊着我这“最小的舅舅”时，引来满屋欢呼。那亲昵的称呼滋润了我干涸的心田，我感动得落了泪。辛琦长得很美，肤色晶莹剔透，又聪明乖巧。在长达数月争取平反的日子里，她给我们带来欢乐和信心。

这幢招待所是新盖的楼，在拐角楼档头。窗下一条水泥大道，自校门绕过文科楼，直通各教学楼。道路两旁，当年我们这些老右挖坑浇水栽的白杨已长成大树，树顶高过文科楼四层房顶，梧桐树郁郁葱葱，足有一抱多粗。

我被安置在招待所 2010 号房间，与胡先生、陈德根、苗庆久、何之明住一起。老谭带着辛琦住在我们对面房间。杨贤勇的家在兰州草场街，他每天早来晚归。能与这么多难友同学重聚，自是意料之外的惊喜。而最令我惊喜的是见到苗庆久，他与我相处最长，关系最密切，我一直视他如兄长。他原判二十年，按时间要到明年（*1980）9 月才刑满，竟然先我回校了。

在我们这一案里，除了死者，我是最后一个出狱返校的。我原以为是学校拍电报通知我返校，不，我把兰大想得太好了。他们才不关心我平反不平反，全是难友们四处打听后获悉我的下落，也是他们给我发来了电报。

先我回校的老师同学，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最初没有生活费也没有住的地方，回来落实政策的人太多，住房相当紧张。我们原先的同班老同学留校的有一大堆，还都当了讲师、副教授之类，个别人已经是教授；但他们中间有的人是道地的左派，不会向我们伸出救助之手。还有的人虽然也同情我们的遭遇，却又心有余悸，怕受株连。偏偏我们这些人又都怕看人脸色，只好自作自受。先回校的人，几乎到沦落街头、断顿挨饿的地步。直到周芹香调任兰大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还有陈德根来校以后，情况才有改观。

陈德根能带来变化，原因在他与同班同学杨宗德曾是好朋友，而周芹香正是杨宗德的妻子。杨宗德是甘肃临洮人，在我入校前，他已在兰大行政上当干事。工作后他发奋用功，考上兰大生物系当学生。他与老陈互相帮助，交谊甚厚。如今杨宗德是生物系副教授，妻子周芹香正是与我们直接打交道的责任人。周主任政策水平高，泼辣敢为，这与杨宗德的不忘旧情多少也有些关系。总之，因为兰大落实政策办公室提供了方便，我们才摆脱困境，把“落实政策”坚持下去。

孙和对我说：“向必到，老陈可是立了大功，要不然大家熬不住，早散了。你姗姗来迟，等到桃子快熟了，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吃，以后你该多出点力才是。”

“向必到”是孙和赐予我的绰号，1958年到1960年我们在一起办厂，那时候他给我起这个绰号，意思是我言而有信，时间观念强，答应几点必定几点到。只是这个绰号没能叫开来，只有他一人坚持。二十多年过去，他一开口还这么叫我。

我们在教工食堂吃饭，主食中百分之三十是杂粮，常常吃那种黄糝糝的四方形苞谷面发糕。副食种类虽不少，都比较贵；大家只能买点便宜菜。开初我没有在灶上吃，买饭票要有粮票，但我没有。一日三餐我都下馆子，吃一碗牛肉面。买牛肉面交二两粮票则每碗两角，无粮票则每碗三角。每天三碗面不足半斤粮，我总是处在半饥饿状态。此时我不仅没粮票，且身无分文。所幸已经可以向“落办”借款，每月能借三十元，最多不得超过五十。我每月借三十，除吃饭外还剩个发信的钱。

回到兰大的第二天，我便给育红中学发信索要粮票，半月余才得回信。看了回信我吓了一跳，其中说我“寅年吃了卯粮”，居然到明年5月也不会有粮票寄我。我的口粮吃过了站，想来确是事实。×××吃二两面条，我吃半斤；她吃三两包子，我吃八两，哪有不超之理。可我从不知育红中学有定量的事，没人告诉我定量是多少。我以为可以随便吃，只是多吃多交钱而已。我这人有多糊涂！不过，我又想，倘若我一直在那儿待下去，会不会在某个时候伙房不给我打饭呢？想到这里，我倒有些责怪伙房不曾给我提个醒。

如此，我只得去信向胞姐求援；她寄来全国通用粮票，这才为我解了围。胡先生建议大家一起吃，不必都去排队打饭菜；既省人力，还可多买几种菜肴调剂。大家欣然接受了。我是迟来的摘桃人，寸功未立又年龄最小，每日三餐打饭自当多跑腿了。

我们中间除我以外，其他人的右派问题均已解决，都得到“纯属错划”结论；现在需要查清的是由错划右派而衍生出来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我的右派问题尚未了断，既需改正也待平反，双重任

务得逐个落实。

这时，兰大为右派落实政策的工作已近尾声。几百右派师生都已改正，连原副校长、甘肃省第一大右派陈时伟先生也改正了，唯一一个没改的是数学系的姜永宁。姜永宁是死是活，杳无音信，无法听取他的个人申辩，只好搁那儿。化学系的麻烦则是我，讨论时有人不同意改正。主持具体工作是位女同志刘红，四川人，心地善良。她把我这届在兰大、科学分院工作的老同学都召集到一起座谈，经说服后勉强通过结论：“鸣放中确有错误但不应划为右派”。这已是对我“网开一面”，殊属不易了。哪晓得我这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反倒不领情，不接受，真是岂有此理！

然而在我看来，哪有这种改正法？为什么不叫我到会行使申辩权利？掩耳盗铃，还是老一套，我对此十分愤怒。

我跑到系党总支办公室，要求澄清所谓“鸣放中确有错误”。接待我的是位姓阎的中年人，时任党总支组织委员，负责全系右派改正工作。我向他做了扼要申诉，他见我情绪激动，气势汹汹，对我很反感，打着官腔说道：

“党的工作方法是走群众路线，对你的右派问题，我们专门召集了在兰州的十多位曾与你同届同班的同学，进行了调查和座谈。组织上给你的结论还是客观公正的嘛。在鸣放中说你有错误，谁又敢说自己言行百分之百正确？何况你的错误比别人更明显、更严重。考虑到你当时很年轻，难免意气用事；现在形势又要求从宽，能平的尽量都平，你也可以接受的。事情过去都二十多年了，还纠缠什么？”

他的话几乎把我气晕过去，貌似公允，天衣无缝，实际不沾边。按他言下之意，如果不是政策宽大，我原本是实打实的右派，不该改正。时间过去二十多年了，黑锅应该背到底的，你却还来纠缠。

我一点没给他留面子：

“你能不能把话说得明白具体些？我在鸣放中有哪些既‘明显’又‘严重’的‘错误’，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呢？”

“比如，你赞赏《胆剑篇》，尤其是《白杨颂》，难道不是你对

党不满的表现？虽然文章不是你写的，但你宣扬、吹捧了它。又比如，你把党员分为三大块，一块为党工作，一块靠党混饭吃，一块靠党整人害人。这话很不对头，即使现在看也是错的。”

我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他：

“《胆剑篇》的作者笔名流沙河，如今早已平反，当了四川作协主席。他这诗发表在《诗刊》上，《诗刊》是党领导下的刊物，为什么不能转载转抄？我至今都不明白：那‘指向蓝天的剑’何以抒发了‘反党的思想’？”

我有意停顿一下。这条“罪状”，已不攻自破。我接着说：

“毛主席说：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历来如此。他又说，共产党并非铁板一块。我认为，党员中有林迪生那样的党员，也有林彪那样的党员；有焦裕禄那样的党员，也有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党员；有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党员，也有光耍嘴皮混饭吃的党员。即使现在也还有这三大类，我的话有什么错？”

我知道，在办公室的档案或者在他的抽屉里，依然放着我在鸣放和反右时期言行的原始材料，尤其是我的右派结论。我等他拿出来同我一一辩论，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然而他并没有同我较量，或许是他不屑，或许是他自知大权在握。他用这段话来了个急刹车：

“好呢，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可以坦诚告诉你，对你的结论是组织认真研究后做出的。要想再更改，我没有这权力。”他显得不耐烦，我读懂那“好呢”乃是逐客令的意思。

“我不会在这儿死赖，只有三句话要说：第一，二十二年前给我作的右派结论我没有签字，请查原档。第二，我要求再召集一次座谈会，允许我与会并为自己辩护。第三，我保留申诉权，任何人休想将诬陷不实之词继续强加于我。我相信党的实事求是政策终会落实到我身上，历史必将还我清白。”

我迈出了办公室。

化学大楼像人一样，也老了。二十二年前，它还是一幢新楼，墙壁亮堂，水磨石地板、玻璃窗光洁无瑕，楼梯扶手一尘不染，黑板、实验桌整齐有序……里里外外都明亮耀眼。我曾为之激动，为

它骄傲。如今的它却面貌陈旧而混乱，走廊里明显光线不足，到处码放着大箱小盒、各色包装木板；水磨石地板早已失去光泽。有的实验室亮着日光灯，那灯光也与二十二年前不同，它没有柔和与亲切，而是一片煞白。楼的外墙似乎还有大字报的斑驳痕迹，虽已经过精心处理，然而人们心底的创伤又怎能洗净呢？

回到房间，大家问我今天是否出师顺利，我无言以对，心里还在回味阎组委的话。他有一个古怪的逻辑，当年鸣放中，有错误是必然的，没有一点“错误”则令人难以置信。他负责全系的右派改正，但对全国右派改正的情况还没有我知道得多。叫这种人主持政策落实，我心里一片茫然。

这仅仅是第一个回合，我必须抖擞精神，把官司进行到底。

二、“右派改正”

刚一回校，我就感觉气氛不和谐。人们被偏见、不信任的阴霾笼罩。右派改正轰轰烈烈，可这不过是表面现象。骨子里人们并没有把我们当成自己人，昔日同学如今混得一官半职的，依然视我们如病毒，唯恐传染，躲得远远的。主持落实政策的干部，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应付支差，借故推诿；有的设卡阻挠；还有的人怕给右派洗刷得“太干净”，再来一场运动株连自己。有的人原本就是假案冤案的制造者，现在要谈“纠正”，无异于否定自己那段光荣历史，自是不甘不愿。

即使 2010 号房间的气氛，比我想象的也大相径庭。原本志同道合的人们，如今寡言少语，难见昔日的推心置腹。大家闭口不提劳改，似乎都有意回避。是当过犯人感到自卑自贱，还是有内疚有后悔？我每欲开口讲我在劳改队的见闻，总是发现听者了无兴趣，我也只能按下不表。

大家都变了，不只是容颜。连我这公认“一点没变”的人，也得承认我不再是从前的我。我学会了察言观色，适可而止；我也懂得谨小慎微和“虚伪”的好处了。

但我的想法似乎也不全对，世间尚有真情在；第一个来看望我的是我的老乡张友杰，就在我到校的晚上。当年他顺利完成学业且成绩不错，由于家庭出身不好，没能留校也没能分到要害部门，发配到新疆农学院当老师。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他以上限年龄考上了兰大著名学者朱子清的研究生，此时就住在这招待所离我不远的房间。他有两个孩子在读中学，妻子是在老家找的，如今也在农学院工作，十年前他就是讲师了。

张友杰告诉说，系里已知你返校，有人想见你，托我先讨个口风，怕吃闭门羹。他报出三个名字，其中两个是“反右委员”，直接整我的。另一个与我不在同一小班，交往甚淡，我一口回绝了。张友杰说，二十多年了，你脾气没变；我估计到你是这个答复。也好，不见就不见吧。不过，别人可以不见，陈祖武你该见见。他每次见我都打听你的下落，每次都直言不讳对你的愧疚。我认为他与别人不同，是真心悔悟的。

陈祖武其时在兰州科院（*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工作，他的妻子也是我的同学，上海人，长相姣好，性格温柔，也在同院工作。提起陈祖武，我心里不免反胃。反右时他张牙舞爪的凶相历历如在眼前。他是踩在我、老冯、吕佩璜的肩膀上去的。在我离校不久，他火线入党。毕业后他又得到一位好妻子、一份好工作。

我说：“算了。人的好坏平时很难看出来，只在生死攸关时刻方显本色。反右是人性本质的一次大暴露。我不相信他的本质能变过来，就像我也秉性难改一样。我可以原谅过去的事，又何必一定要相见呢。”

第二个来看我的是吕绥生，囿囿中我一直担心他，想念他；他是我大学时期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老吕已是一女三子的父亲，大女儿读中专即将毕业。当年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他背着“留校察看”处分读完大学。他虽然成绩优异毕业，却被发配到中学。如果当个正儿八经的中学教师，倒也不错；可右派没这福分，他既不是教师又不是工人，而是在化学实验室和物理实验室打杂，连实验员都不算。此外，他还要修设备，兼

电工，学校凡有杂活就派他去。任何人都可以支使、欺侮他。他的工资只有正规大学毕业生的一半，拖家带口，苦不堪言。妻子原在商店当营业员，因为他的原因被辞退，去了理发店给人理发。“文革”时清理城市人口，那时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一双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理发员也不叫他妻子干了，逼迫她带着儿女回山西临汾农村务农。留下老吕子身一人，在学校挣扎度日。

老吕先后吃过两次大亏，1960年我与何之明在武山被捕；“除恶务尽”，他被批斗长达数月。“文革”期间他被长期关牛棚，惨遭殴打，眼睛被打成玻璃体混浊，几成瞎子。他虽未逮捕入狱，却与我在笼里的日子相差无几，甚至还要凶险。

老吕带着他的两个小儿子由西固六中过来看我，我挽留他们当晚和我住一起。我俩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相互倾诉直到天明。唯一令他感到安慰的是，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妻子，始终与他相濡以沫。

王秋莹是第三位来看我的故人，见了她她又惊又喜又恨。回忆五七年往事时，她说：“明明是陷阱，大家都看清了，你偏偏往里跳！”对她的嗔怪，我心里不服，又不好驳她。她比我大四岁，同学时期就有大姐风范，为人极善良，一直受我敬重。反右后期，她与M都受批判，被划为中右。毕业后，她嫁给了我们同系高一届的翟应离。翟是中共党员，人很本分，两人均留校任教，如今都是化学系骨干讲师。她有两女一子，家庭温馨。这三位学友后来都升任正教授了。

王秋莹告诉我许多老同学的情况和下落：

朱彭龄和单忠莲、路宝田和彭高聪、沈凤嘉和高忆慈结为夫妻。这三家人都在本校化学系任教，其中朱彭龄是副教授，马上要升正教授。此外还有周效贤、巩玉珍，也在本系，巩玉珍的丈夫是省委一位领导干部。她又提到潘琨、杨淳庆、李超云、孟繁瑜、薛洪福、王子民诸人。

她说，王牟死了。王牟当时是我这小班乃至全年级最健壮的男生，壮如犍牛，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打手。他竟死了，身材瘦小又

遭虐待的我居然活着，难道老天真长眼了不成？

有些当年红极一时的左派，如今混得并不怎样，潘琨就在西固化校（中专）当普通教书匠，黯然失色。

又一日，史凌霄来了。他是兰州师专讲师，专门从十里店老远跑来的。他不是专门看我，是来看望我们这一群人的。

史凌霄比我高一届，划右后与我受同样的处分，一起到了武山。他被分在洛门公社龙泉，与宫忠诚、刘良寰、秦孝斌一起；而我留在城关，我们之间不曾有任何往来。史凌霄是兰州市人，二十多年过去，一见面仍是老样子。

他说：“你们逮捕后，我和其他同学在六〇年底被召回兰大。全校贴满我的大字报，称我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有的大字报说有鼻子有眼，说介绍我参加现行反革命组织的就是你。”

他指着我，又接着说：“他们把我打得死去活来，险些丢了性命。诬陷、造谣的人是郑连生，他不但陷害我，还陷害了物理系的江宪国、中文系的马启凯。去年他来兰大落实问题，被江宪国揪住痛揍一顿，打得哭爹叫娘，还是保卫科来人才解劝制止。这条疯狗在兰大没敢逗留，灰溜溜地逃了。”

江宪国、马启凯后来都是正教授。

郑连生与我同分在联丰社，前后不过两月，“大炼钢铁”开始后再没见过。当年在一起的时候，我颇讨厌他，呲牙咧嘴、点头哈腰的，一副“叭儿狗”模样。可我也没和他吵过嘴或者闹过什么矛盾，不想他竟如此歹毒，其心比他的外貌还要可憎！

史凌霄盯着我又说：“要是你也在，那才好呢，还不把他砸扁啊。”

我心想：我若碰到他，不会有江宪国那种举动，划不着。我最多会在公众场合痛斥他一顿，绝不会动手。他是时代的产物，“伟大”时代必然造就“伟大”的孽物，靠拳头打得过来吗？后来还有人告诉我，他不但陷害这些人，你们这一案也是他和柴志德揭发的。我对此半信半疑，无法否定。

与阎的谈话过去了一周多，平反没有进展。连日来心绪不宁，

躁动郁闷。难道被冤枉了二十多年还不够，还要把我冤枉到死？正打算再去理论，张友杰出现在门口；他后面跟着张政治——我的又一位老乡、故人。

张政治，兰大中文系毕业，比我高一届，因工作需要提前半年分配到兰大校刊当了编辑。“文革”期间，我在兰州砖瓦厂服刑；那时常见《甘肃日报》有笔名“正之”的文章，内容与高校有关，我猜就是他撰写的。此后他调回江西，在九江师专任教。这次他受邀回兰大参加校刊发刊三十周年纪念活动。张友杰、张政治与我，我们三人从小一起厮混，在老家武宁同住一条街，又是门对门，不但彼此相熟，对各自家庭情况也都了如指掌。

张政治对我说，阎是他的同班同学，他已知晓我与阎交谈的情况。

“事情已过去二十多年了，你吃尽苦头，即使有错误，还不够抵偿么？你不但是化学系也是全校唯一一个有待落实改正的右派，如今还有什么可纠缠的？”

“不是我要纠缠，是他们缠住我不放。到现在还说我有错误，我不服。”

“其实，结论只要写‘不该划而错划’就行，有无‘错误’无关紧要，何必斤斤计较。”

“恰恰相反，给错划右派改正本身证明左派错误属实。右派无错等于左派有错，他们的错误再也赖不脱。时间愈长久，历史愈清楚。”

“你还是老脾气，又认真，又固执。”

“别的事可以马虎，唯独这事关系大是大非，决难退让！”

“那不是又要拖下去吗，对你有多少好处？”

“我不管它好处、坏处，只要还历史真相，还我清白。我愿一桩桩对质，看我究竟错在何处。这过分吗？”

张政治要我与他一道去阎家，做礼节性拜访。我回绝道：“这是公事不是私事，我没必要登门求他。再说，我对他印象不好，讨厌他。”

“你在笼子里待的时间太长了，对社会一无所知。任何手段都是为目的服务的，你得给人家一个下台阶的机会。我不要你低三下四，不要你说一句话，只要你陪我走一趟。”

晚上，我们一起去了阎的家。他家就在兰大后门不远的家属院，他俩曾是同班同学，相见亲热得很，阎又斟茶又递烟的。寒暄中，张政治把我的家庭出身、学生时代的情况以及个性，叙说了一大堆。我知道他的用意，自己像根木头似的坐在那儿。

听了张的一番话，阎开口道：“当时以为批判批判就过去了，谁知道后果如此严重，有的人竟丢了性命。有的同学很有才华，也耽误了。无论他们个人还是国家，都受到巨大伤害。可惜！”他居然说出一堆同情惋惜的话来。

关于我的事只扯了这些，大家都不是糊涂虫。闲聊一阵，我们便告辞了。在路上，张政治又对我“开导”了一番：

“你的礼节性拜访是完全必要的，虽你一句话未说，去与不去大不一样。你不去，他对你的看法转不过弯，心里存着疙瘩。即使他想替你彻底纠正，也会担心你真有错误。万一给你抹得太干净了，再有运动来，自己就脱不了壳。现在的人，多少有点职务、权力的，都滑得胜过泥鳅。哪有你这种直肠子，不给自己留余地的。”

所言极是。给别人纠正事小，把自己装进去事大，这才是聪明人首先要考虑的，也是为官之道。

果然，没过几日，我的右派问题得以彻底纠正：

关于向承鉴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

向承鉴，男，汉族，现年四十岁，江西省武宁县人，家庭出身小手工业者，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六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习，一九五八年划为右派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处分，同年八月送甘肃省武山县劳动。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向承鉴同志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向承鉴同志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中没有右派言论。因此，原划向承鉴同志为右派分子是属错划，决定予以纠

正，恢复政治名誉，撤销原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决定。工资从一九五八年八月起计算。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①

三、历历往事、斑斑血泪！

也许，有的人拿到这张纸片会兴奋不已，感恩戴德；但我的心情不同。被错划右派的人死了一大片，张春元在1970年被枪毙，邓德银“文革”期间在通渭被活活打死。史美唐1962年被骗去新疆，死在高压电网上。冯淑筠下井挖煤，砸死在矿井里。胡学忠因缺医少药，死在劳改队。这些都是与我关系亲近、至纯至真的人。全国划了五十多万右派，死了多少人？只有天晓得。这些错划右派致死的人怎么办？难道不该追究罪责？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制造这场五十多万人蒙冤的大案，其罪魁祸首是谁？为什么不点出大名？

既然现在的党还是过去的那个党，现在的政权与三十年来的政权衣钵相授、一脉相承，就该为过去的行为承担责任；岂能糊里糊涂混过去拉倒？

一定有人说我“不知足”，“得寸进尺”，想要搞“反攻倒算”。有人会骂道，这个死右派，原本就不该给他纠正的；纠正了反而更来劲了。我承认我不懂政治，不懂和稀泥、装聋卖傻，只会认真算账，一笔是一笔，决不含糊。

我呆呆地望着眼前这“改正”的纸片，想起死去的众多难友，他们每人也都有这么一张。如果不是“错划”，他们会死吗？我多么希望人死后能有灵魂啊，如今他们的忠魂何在？这“改正”的结论又如何能送达他们？

呜呼，挚友的音容笑貌一齐来到眼前，我已经知道他们的一切了。

张春元，这位志愿军战士没有在朝鲜战场上牺牲，却死在“自己人”的屠刀下。与他一同被处决的还有共产党员、县委干部杜映

华。刑车载着被五花大绑的他们两人游街示众，许多市民至今记忆犹新。其时我在巴仓农场，见过行刑后的许多照片，我知道春元兄没有留得一具完尸！

冯淑筠兄 1961 年春节前后由武山看守所无罪释放，依常理，对他所受的伤害应当予以赔偿，并让他回到兰大而分配工作。但兰大不接收他，他四处漂泊，生活无着。冯兄向好友胡依理求助，此时胡在新疆乌鲁木齐天山化工厂任总工程师；老学长冒着极大风险收留了冯，将他安排在化验室工作。冯兄非人非鬼苦熬几年，“文革”中又被清理出来，押到一处矿井挖煤。因瓦斯爆炸，被活埋在矿井。

史美唐的是我这年级唯一的“极右”，被开除学籍，劳动教养。解除教养后他回到上海，结果在 1962 年上海清理城市人口时被遣送到边疆。有人告诉我，当时是两位干部模样的人寻上门来，对史美唐说：“我俩是兰大派来的。你的右派问题经党组织复查甄别属于错划，兰大决定取消对你的一切处分，恢复你的学籍，我俩特来接你回校。”史美唐立即收拾行装，随两个干部乘车西行。车到兰州，干部不准他下车。列车一路向西，史被骗到新疆边陲某个关押场所，他死在囚禁地的高压电网上。关于死因有两种不同说法：一种说他企图越狱逃跑致死，一种是他故意触电自杀。

邓德银划右后，与老吕、老冯一样受“留校察看”处分，毕业后发配到甘肃通渭县教书。他受到我与何之明的株连，“文革”中被造反派摧残致死。

胡学忠在甘肃五大坪农场劳改，刑满后与一位女劳教结婚，育有一女，患胃癌去世。

我独自坐在操场边的台沿上，月亮洒下一片清辉，照着我的泪痕。我想着逝去的难友，想着他们的亲人何其悲伤……不远处树影婆娑，一对对情侣窃窃私语，拥抱接吻。年轻人啊，你们知道甘肃省这座最高学府的历史吗？

1958 年我离校不久，江隆基从北大调任兰大校长。他与林迪生校长一样，为人正直，克己奉公。三年“困难时期”，他因高干级别，还能享受每日一瓶牛奶的特殊照顾。他不喝，把牛奶让给兰大

幼儿园的孩子。据说，陈时伟先生就是他三番五次向省委打报告，从夹边沟拉回学校的。江校长“文革”中被造反派整死，施害者还伪造他“自缢身亡”现场，把他的尸体拖到厕所里，在脖子上挂根绳。此案至今未破，不了了之。

副校长陈时伟五八年受“双开”处分后遣送夹边沟，由于其妻左宗杞先生的全力救济，才逃过一死。他们的女儿1958年高考时为甘肃理科状元，没有大学接收，此后屡考不中。“文革”中被逼下跪挨斗，此后失踪。

右派改正时，陈时伟的改正也是一波三折。因为陈先生也是甘肃全省所谓最大的右派，为他改正，无异于否定了兰大乃至全省的反右。据说最后是胡耀邦亲自做出批示：“中央认为，凡是解放初期回国的专家、学者，起码都是爱国的。”这才为陈先生做出改正结论。

大一时我的授课老师陈佩芳先生讲无机化学，深受学生欢迎。1957年划右派，1958年我离校时听说，她在兰州铁道设计院当总工程师的丈夫与她划清界限离婚。“文革”中又查出，她父亲在台湾当将军。如此，陈先生成了双料敌人。盛夏在校园的水泥路上，她的衬衣被撕扯得稀巴烂，奶房裸露。“革命闯将”挟持她的两条胳膊，在水泥道上来回拖跑，把她折磨到不省人事。

胡晓愚先生告诉我，反右中被抓捕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张我权，如今是高级工程师、甘肃省某劳改支队的厂长，就住在大砂坪。我心有狐疑，胡先生不愿往下讲。此后老友来访，一语道破：

“右派那时气焰太盛，需要震慑一下，制造声势嘛！”

我问：“不是反革命硬被打成反革命，不是毁人政治名誉吗？”

他答：“政治需要，什么名誉不名誉。给你平反，不就得了，你还能咋地？”

我再问：“右派也能进专政队伍，不怕‘毁我长城’么？”

他再答：“右派不右派，是人的一句话，也是政治需要。调入前，将你右派捋掉不就名正言顺了？”

在一个以权为本的社会，人算得了什么？不过是工具和牺牲品。

我想哭，却哭不出来。

四、给邓小平写信

现在，我与这房间的难友终于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把强加于我们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推倒。

孙和说我是“下山摘桃子”的，有一定理由。此前，先我刑满的难友们，尤其胡晓愚先生为平反四处奔波，付出巨大努力。胡先生的上诉状七拐八拐，最后到达方毅之手。方毅其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管着科技、文教口，胡先生得到他四字批复：“认真复查”。

有了如此高级别的领导批示，官员们再也不敢踢皮球了。甘肃省高院责令中院成立复查专案组，调集人力正式启动了复查工作。

高院离兰大很近，我们这些等待平反的人，每天轮流去高院催问，又向中院写催办信。兰大“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周芹香思想颇解放，为此案平反费了不少心血。

我原先写过上诉状，这时拿出底稿来请大家提意见。大家看了七嘴八舌说：“不行不行，又臭又长，递上去没人看。”胡先生最后表态，他也连连摇头说：“你这种写法早已过时，不等看完就会打瞌睡，丢到废纸篓里。你过去寄过多次，没有回音，多半因此。”

胡先生建议说：“正文不超过一页，字数不超过一千。标题要醒目，第一句话就要揪住人的神经。”

遵照大家意见，我提笔写出标题“弥天的谎言，天大的冤枉”。

“这还差不多，就这么个写法。”

尽管如此，接下来在正文中我还是力图写清缘由。最后以两页纸完稿，立即递呈省高院和中院各一份。

11月下旬，兰大周末接连放映了两部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引起极大反响。影片的主角都是右派，我们如身临其境，回到房间后就议论起来。胡先生和陈德根很少吭声，王新民的话最多。他是学中文的，并非同案人。他认为片中对左派的卑鄙嘴脸揭

露得很不充分，对右派的非人遭遇暴露得不够火候。两片主角的结局又都是“回到母亲怀抱”，有歌德之嫌、御用之疑。有这般对待“儿子”的“母亲”吗？②

没有人回答他。我却认为，这两片的编导颇具匠心。如果将一切和盘托出，或者不回到“母亲”怀抱，两片都会夭折在摇篮里。

或许在笼子里关得太久，我锐气已消，心有余悸。我甚至为剧作者和导演的胆大妄为捏了一把汗，这种为右派翻案的大毒草在毛时代能出笼吗？不打成“反革命”才怪哩。大家谈兴未了，转而议论到我们的案子。有人说，我们的事比电影里的复杂坎坷多了。又有人开始给片中的角色起化名：田昌文叫田芜，苗庆久叫苗菱，何之明叫何之有，我叫向天问，胡先生则称胡不为……

夜已深，人们开怀大笑；这样的笑于我，二十三年来还是第一次。

12月初，一天我从外面回到房间，见桌上放着一本书。随手拈来一读，原来是邓小平的一些讲话文章。我翻到其中关于右派问题的内容，读后浑身战栗，血充脑门。

我断然拒绝这种观点和提法：“五七年反右派斗争还是必须的，只不过我们犯了扩大化的错误。”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大是大非的政治问题既不宜拿来大庭广众中讨论，也不宜把看法和打算告诉别人。同学同案中，经过二十多年风雨，如今变成啥样，难说。即使我说出来，别人会说我惹是生非，自找麻烦，还给大家添乱。

我决定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向任何人透露。

我就是这样恶习难改，不顾忌后果。如今才变得聪明了一点，还会想到后果。然而我坚信，生命价值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活着的时候明辨是非。身体不过这百来斤血肉躯壳，迟早要回归自然；怕什么？刀山火海再走一遭。

待同室的人呼呼入睡，我爬起来奋笔直书，一气呵成。这是写给邓小平的信，大意如下：

尊敬的邓小平总书记：

我不赞成您对反右和右派问题的说法。您是位开明的政治家，请耐心等待这封信，然后再给我治罪，治我冒昧之罪、大逆不道之罪，不迟。

鸣放与反右，是一场赤裸裸的骗局，是人为设置的陷阱。

1957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整风，并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党提意见，帮党整风。大学里召开茶话会、谈心会，邀请与会者提意见。谁若不提意见，则冠以“与党缺乏感情”的帽子，我便在这种背景下卷进“鸣放”漩涡中。

既然是提意见，意见的正确与否、采纳与摒弃，完全由党来判定和选择。党领导着几百万军队和强大的国家政权，不存在提意见者将自己意见强加中共接受的可能性，谁也强加不了，谁也不敢强加。毛泽东有言在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即使意见百分之百不正确，提意见者又何错之有、何罪之有？

反右运动将数十万知识分子打入另册，斗得死去活来，死残难以数计，这样做，不失信于民？

人无诚信，何以为人？党无诚信，何以立党治国？

从效果看，五七年数十万知识分子错划右派，受到残酷迫害、无情打击，使科技、教育、医疗卫生、文化艺术……国家元气大伤，停滞倒退；使言路堵塞，再不闻逆耳忠言，社会正气下降，邪气猖獗泛滥；使正直之士缄口，奸佞小人青云直上，吹牛之风盛行。随后才有人民公社、“大跃进”、大炼钢铁等一系列反科学的荒谬之举，才发生饿殍遍地的三年人为之祸！反右效果之坏、之严重，历史空前。

我有足够理由认为，“反右倾”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五七年反右运动合乎逻辑的延续和发展，没有前者就没有后者。

用“质”与“量”的关系衡量，五七年兰大划“右”两百余，时至今日已甄别纠正，无一真右派。全国划右数十万，不知真右派有没有，有多少（诚然，您是极清楚的）。以一当百，扩大百倍，如

果还可以牵强附会说“犯了扩大化的错误”；那么扩大千倍、万倍、十万倍还能说“犯了扩大化错误”吗？把跳蚤说成大象，这种“扩大”不贻笑天下？

这种“扩大化”，对扩大者意味着：要么是白痴，要么是疯子。

无论于情、于理、于事实、于宪法；无论从何种角度去分析评断，1957年的反右运动应该彻底否定，不应继续遮遮掩掩、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含含糊糊，“犹抱琵琶半遮面”。

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心胸坦荡，襟怀坦白；为了人民的利益、民族的振兴，敢于承认错误，勇于改正错误。在大理面前，个人威信算得了什么。

向世人公布真相，彻底认错，不但不会降低个人威信、党的威信，得到的必然相反，有利于更好地开拓未来。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任何人都受“历史局限性”制约。五七年反右运动，毛泽东起主导作用，尊敬的您参与了重大决策。您是位伟大的革命家，必然有非凡的勇气，能更全面、公正客观地评价这一运动，会少一些“局限性”，而多一些高瞻远瞩。

您的坎坷经历，世人皆知，三落三起，中流砥砺！如今权极彪炳，国人拭目。您的一言一行，关系着国家前途、民族命运。

您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人，我是刚刑满出狱最屑小之人。今斗胆写信，仗义执言，多有冒犯，乞请赐罪；一孔之见祈能兼听三思。

顺致

崇高敬意

落款处，我犹疑了一会。我想起孙自筠1959年给《红旗》杂志写匿名信的往事，他因此被捉判刑。我知道上书人的真实身份在中国土地上是藏不住的，于是我写上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加上了地址。我又思量：信封上写邓小平亲收太显眼，便写了“中共中央办公室收”。

第二天一大早，人不知鬼不觉，我已经跑到火车站邮局。寄出

信后，我感到心情愉悦，步履轻盈。

这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溅起一丝水花，却也没有再现孙自筠的后果。在中国，这已经是跨时代的进步了。

呵，新时代，你确与旧时代不同，只是进步有限。

五、天水中院行

11月末，我突然接到师老师侄女师风枝的来信：她是从她姑姑处获悉我的住址的。

我离开德农育红中学回兰大时，本打算与×××打声招呼；考虑可能节外生枝耽误行程，所以未去。我内心对她仍有几分歉意。

师老师的侄女师风枝，生于1953年，比我小十五岁。她在文革时期高中毕业，是回乡知青；如今是农村小学的民办教师。从她的第一封信中我感到，她可能与她姑姑一样，是一位纯朴善良的姑娘。我同意建立联系，增进了解。从此我们之间开始了一周一次的通信。

我的秘密很快被大家发现了，胡先生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应该等到把官司打下来后再谈此事，那样会主动一些。据我所知，现在城市里有一批大龄女青年，她们有职业有工作，正等着你们这些平反的大学生。兰州大砂坪医院二十七八的女护士多得很，不用担心找不到对象。”

平反后再找，可以提高身价，可这并非做生意买卖呀。胡先生对我是好意，我平时很尊重他的意见。但我认为只有自己尚未平反、身处逆境时，或许更能考察对方感情的真伪，不是说“患难见真情”吗？

我将这事也告诉了胞姐，她很快给我回信，和胡先生意见如出一辙。她嫌师风枝没有正式工作，又是农村户口，将来“农转非”很麻烦。这次我也没有听取她的意见。二十多年前我就知道有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的区别，“农转非”犹如铁门槛，想迈过它，谈何容易。

我对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的划界，切齿痛恨。三年浩劫，城镇

户口有基本供应保障，几无饿死者。饿死的几千万人全是农村户口、无颗粒粮食供应的农民！不种粮者得食得活，种粮者不得食而死，这是天大的不公。户籍政策禁锢农民人身自由，是套在农民头上的枷锁。我相信它必将与毛泽东和他的时代一起进坟墓！

愚蠢的政策、世俗的偏见，使有情人难成眷属。然而为了爱情，我宁愿随凤枝到农村落户。我已饱尝人世苦难，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

眨眼一月过去，又得跑兰大“落办”去申请困难补助。吃着嗟来之食，常觉内心苦涩。官司进展无确切讯息，我还惦记着青海的学生。我心中着急，几乎“泡”不下去了。但看看难友们，似乎个个都蛮有耐心，一定要坚持到底。他们中有的人已在此待了一年多，最短的也比我待的时间长。我不便说什么，只能硬着头皮继续等。

12月中旬，省高院终于传来讯息：我们这一案大都可望彻底平反，只个别人可能留“尾巴”。有人暗示被“留尾巴”的可能是苗庆久，这对老苗无异于晴天霹雳。他的脸色立时阴下来，大家的喜悦之情也只好抑留胸中。

苗庆久曾与我同榻而卧，同锅而饭，饥饱相济；我对他唯有敬重二字。他办事老到，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在同学中威信亦高。正因如此，被捕后，我宁愿替他赴死。这次回兰大，我写上诉状也是这么做的。我一人可以承担的决不牵连于他，我对他心无半点芥蒂。

如今，我已是不惑之年，想问题较以往成熟些。我认为，这“留尾巴”之人应当是我而非他，当时只是讹传而已。只要大家都“一风吹”，个别人留点“尾巴”也没什么了不起。有“尾巴”的官司更好打，划不着心情沉重。我直言不讳对他坦言，可他仍然心事重重，茶饭不思。唉，难道“尾巴”比二十年徒刑更可怕？以前在宣判二十年徒刑时，何曾见他如此？

绥生兄领着段志兴来了，他们专程从西固来看我。段志兴一见我便放声痛哭，我惶惶然。他搂着我哽咽道：“你是耿直善良的人，五七年还是个孩子，何罪之有？竟受了二十多年的罪，真正天大的冤枉啊。”

情绪平静下来他才告诉我：反右最激烈之时，看见你被斗得不成人样，曾为你说了几句公道话。不料左派对我大加挞伐，批判了好长时间，差点也打入另册。

段志兴当时和我不在一个小班，平时并无交往。若不是老吕引来并介绍，我已记不得他的姓名和容貌。想不到与我素昧平生的人，竟也受到株连。

元旦前几天，根据各个方面传来的讯息分析，我们案子的复查已到天水中院。现在是最后定夺的时刻了，为了力争最好结果，大家认为应赴天水，必要时可与办案人当面澄清或辩论。

去天水的共有六人：杨贤勇、孙和、苗庆久、陈德根、何之明和我。我们到天水后住进了索价最低的旅社，六个人住一大间。

早上九点光景，我们一行进了天水中院大门。时过境迁，今非昔比。十九年前，我们一个个戴着刑具进公安局、法院，如同待宰的羔羊。现在我们是原告上访，是一群有公民权的人。六位当年的右派大学生同行，颇有气势。尤其杨贤勇、孙和、苗庆久三人都是大块头，他们穿着大衣，显得气宇轩昂。中院见到这批人来也不小觑，领导好像姓吴，亲自出面接待我们。

我们申明了来意。

吴是个颇精明又有水平的人，说话开门见山。他说：

“你们这个案子中央有明确指示，我们一定遵中央政策复查。中院已经成立了以我为组长的专案复查组，眼下需要复查的案子太多，我们人手不够，只好向外单位借人来帮忙搞。隔壁大房间是你们这一专案的办公地点，有关案卷全部调齐，正日夜兼程复核。”

他停顿了一下，用一种平和、坦然的口吻说道：“你们都是有才。从目前复查的情况看，你们案中的每个人都会获得重新工作的机会。”

他的话给了我们一颗定心丸，我们问他何时可以结案，他的回答也很干脆：“力争在旧历年前。当然，工作量很大，困难不少。”

我们又向他诉说了我们的困难，请他务必加快进度，并表示我们愿意在天水住下，等待结论。

他说：“无此必要。这会增加你们的经济负担，也可能给专案组的工作产生干扰。你们还是先回学校，如果需要询问你们，我们会派人前往。你们放心，我们一定会按中央指示精神办，实事求是，会让你们感到满意的。”

为了证实他的话并非虚妄，他领我们到了专案组办案的大房间。果然，有八九个人正在伏案工作，每个人面前都摆着一摞卷宗，中间的长办公桌上还放着大摞大摞卷宗。

我们只在门口伫立一阵便告辞了。

出得法院大门，顿觉阳光灿烂。我们边走边议论，刚转过一条斜街，忽听有人高声喊着我的名字。只见他从我身后跑过来，我止住脚步迎候他。

站在我面前的是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个子与我差不多，脸上红扑扑的。他跑得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停下来他悄声说：“今晚七点半，请你与何之明一道，务必到地委招待所 1003 号房间来一趟。”说罢，他扭头便匆匆离去。走不多远，又回头叮嘱道：“七点半，一楼 1003 号房。”

同学们一齐围过来，惊讶地问我咋回事，遇见中院的熟人了？我说，不认识。街上人正多，熙熙攘攘；大家问他说了些啥，我说回旅社说。

回到旅社，我告诉了他们。大家七嘴八舌猜测起来，孙和说：“向必到，这回轮到你出力了。可以通过他做些工作，至少可以打听一下复查的内情。这是大好事，机会难得。”

大家凑得十来块钱，嘱我与何买几斤水果、两盒点心带上。

正是隆冬时节，天黑得早。我与老何准时到达，年轻人早在门口迎候。进到屋里，里面还有一位中年人，身体很壮实。他站起来招呼道：“你俩是稀客，快请坐。”

外面很黑，屋里很亮。乍一进来，什么都没看清。待到光线适应，才发现屋子正中的方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桌酒菜。他们要请我俩吃饭，这是为什么？

年轻人首先开言：“这位是老王同志，现在和我一道借调到中

院，在专案组工作。我叫何林，二十二年前我就知道你们了。”

他的话使我和老何感到迷惘，他简要介绍说：“我是武山洛门公社百泉人。1958年你们下放武山时，我刚读小学。以后我考入天水师专，中文大专毕业。”

难怪。杨贤勇、田昌文、何之明、陈德根和地理系的褚松村，下放劳动考察正是在百泉社，整天背着粪斗。

何林说，你们这个案子发生时，影响很大，全武山人人皆知。天水以及全省都震惊，农民要为你们喊冤，搞得当时很紧张，你们当然不知道。

我们已用过饭，请他们赶快吃。他俩执意不肯，说：“实不相瞒，这是专为二位准备的。”

经再三推让，只好从命。桌上四个冷盘全是肉类，四道热菜乃鸡鱼肉虾。何林竟谦辞道：“我和老王临时商量的，六点下班，来不及多准备。算是缘分叫我们在一起相聚。按理我该称二位老师，若不受挫折，我当你们的学生恐怕还不够格哩。我现在称二位老向、老何吧，你俩一个大我八岁，一个大我九岁，不知失礼不？”

“这样最好，随和又亲切。”

何林斟满酒杯，高高举过头顶，要连敬我和老何三杯。我和老何不胜酒力，推脱不过，各自满饮了一杯白酒，以后改喝甜酒。老王也要敬，他比我俩都大几岁，更不敢当，只好与他互敬甜酒。

席间，何林说，他和老王看了我与何的全部案卷材料，十分惊讶。推算时间，那时不过是二十一二岁的青年，不单字写得漂亮，文章更是观点鲜明，感人肺腑。

何林问我被捕前是否看过彭德怀的万言书，我并未读到过。何林说，你的材料中，所有观点与彭老总一模一样，有的竟一字不差。你抨击“反右倾”“人民公社”“大跃进”“深翻土地”“大炼钢铁”。你二十二年前的观点超前，有预见性，现在都得到承认了，无一不符合现在对它们的评价。

何林提到这些，大有相见恨晚的样子。

我道：“当时抱定死的决心，我必须让后来人知道我是因何而

死。我只说了一切正直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而已。”

老王不善辞令，只是重复着他的感叹：“凡读过你们材料的人，无不受到感动。你们确实是人才，这些年不知糟蹋了多少像你们这样的人才，损失实在太大了。”

何林告诉我俩：“你们的案子，中央领导有批复。中院一点不敢懈怠马虎，省高院每星期都来电话催问，无人敢刁难设卡。”

晚宴一直持续到午夜一点过，我与老何在“放心、保重”的暖心话语中告辞出来，何林和老王一直把我俩送到大街上。

回到旅社，大家没睡，都在等待我们的归来。我把经过情况叙述一遍，孙和说：“向必到呀向必到，我们这些人打了多半年官司，你才来。原想你是专等摘桃子的，没想到你还真派上了用场。有了这层‘关系’，以后办事就方便多了。”

大家都很振奋，又聊了老大工夫才睡。

*1990年，康明前的堂兄弟来看我，我向他打听何林，谁料，他说何林已病故。

六、又见孙自筠

桌上放着师风枝的两封来信，是我去天水期间收到的；此前我们已经互寄了照片。第一封信里她说，要利用寒假的机会来看我。第二信里说，她考虑到我的困难，一切路费、生活费由她自己准备；唯一要求是不要拒绝她的探访。信中还提到，她来时上身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下身穿什么颜色的裤子，手中拿什么标志，以便我好接她。她是个细心的姑娘。

可是，这怎么行？我如今飘在半空，犹如断绳的风筝。每天还在借钱吃饭，形同乞丐。她来，住哪儿？吃啥？我连忙回信拒绝。

没想到她还是来了，在腊月廿四那天。

眼看阴历年来临，年前结案已成泡影。有家小的同学要回家团聚，我年轻些，买火车票、送人、抢座位这些跑腿的事，理所当然由我承担了。老苗已回西宁爱人家，这天我又送老谭和辛琦母女俩

回酒泉。匆匆返回学校，上得二楼，见一女青年站在楼梯口处。她一身土八路打扮，背了个小帆布挎包，外面一条洗脸毛巾，毛巾上还系个白色的漱口瓷缸。我没好意思看她脸面，一头钻进 2010 号房。

刚过一阵，杨贤勇进来对我说，有个从河南来的姑娘，姓师，说是找你的，正在对面房里哭呢。我惊愕不已，连忙跑过去。见面后我安慰她，她泣道：“明明看见我，却不理，你这人好没良心！”

“不是叫你不要来吗，你怎么突然来了？这事太突然，我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谁知是你呢？即使我们的事不成，我也会接待你，怎么会无情无义呢。”

我将凤枝安顿在老谭住过的房间，和我们一块儿吃“集体灶”。

一连几日，我伴她逛五泉公园、雁滩公园。我们边逛边谈，谈彼此的家庭情况、思想情感和一切感兴趣的见闻。凤枝的父亲是文盲，与她母亲结婚不久，因朋友的介绍到了国民党“重庆号”军舰上当了炊事兵。他曾随舰长到英国受训，学会了做西餐。1949年2月“重庆号”在邓兆祥舰长领导下起义，投奔了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凤枝的父亲到武汉军区工作，职务仍然是炊事员。“三年困难时期”，为度荒年，她父亲要求带妻小回家乡河南种田。从此不仅丢掉了铁饭碗，全家也失去了城镇户口和商品粮，还招来不白之冤。她父亲有两套西装和一架相机，这是在英国受训时人人皆有的物件。农村人少见多怪，将这些当作“特务”罪证，“文革”中将他斗得七死八活，几乎丧命。邓兆祥成为共产党的座上宾，是爱国的起义将领，他怎能顾及他麾下一名小兵所遭受的痛苦？

师风枝从她父亲的经历中已感受到冤屈，她还向我讲到她那些有权势的同学得以飞黄腾达的事情，对社会的不公深有体味，已是思想颇成熟的女性。

我告诉她，我平反与否尚在两可间。即使有恢复工作的机会，极可能还是要拖一条“大尾巴”，甚至会二进宫。我没提给邓小平写信的事，只是暗示可能的后果。

她毅然答道：“你这人正直、实在，我信得过。即使平反不了，

我也愿意。即使再进劳改队，我讨饭也守着你，等你！”

太难能可贵了，世上还有比这更珍贵的东西吗？我什么都不需要，恰恰需要理解与信任。我是个被社会长期抛弃的人，在许多人眼里不是人。如今她对我诚信不二，叫我感动万分。

正当其时，胞姐给我来了信，她要给我介绍一位在北京某单位当统计的大姑娘，随信附有她的照片和给我的信。我不能再犹豫，必须当机立断。

我对凤枝说：“我们在一起，今后的生活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你都想好了吗？”

她态度十分坚决：“我什么都想到了，无非一辈子受歧视，受穷受苦，我全认了。”

“恐怕还不仅这些，还可能活守寡。你必须把困难和灾难想得更充分些，不要到时候后悔不及。”

她急得哭起来：“我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罪都愿受。只要我们心心相印，你心里永远有我，我就心满意足。”

我的坎坷经历比起《牧马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感叹牧马人获得纯真的爱情，心底也萌生信念：师风枝抵得上牧马人的贤妻，一点不会逊色。

为了对得起凤枝的赤诚，也为了做人的道德，我没拆那位姑娘的信，原样给胞姐寄回了。我俩山盟海誓，拍了合影，算是订婚。

阴历年我带凤枝和同学们一道，去草场街杨贤勇家拜年。大家苦中作乐，热闹了一番。凤枝等不到过正月十五，她急着返校上课。我与她约定，一俟平反结论下来，我立即通知她。不管我到哪里，随时告诉她我的行踪。临别，我花十二块钱给她买了双皮鞋，送她上车，依依惜别。

再说阴历年前的另一件事，那天，2010号房来了位新伙伴，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自筠，他也是回校来“落实政策”的。

乍一见他，委实吓一跳。二十多年大家都变了，然而他的变化最大。学生时代，他与史美唐一样，人长得很帅，衣着整齐，风度翩翩。如今竟是未老先衰，都秃顶了，看上去就像个五十多岁的老

农民。我脑中禁不住闪出杜甫诗句里的“老大归”“鬓毛衰”来。二十年前他与我一同分在天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见闻相同。我彷徨焦急，一次次向党中央上书又一次次撕毁信稿。我通宵达旦地阅读马列，寻求答案，突然得知孙自筠上书遭到逮捕的消息。以后我又获悉他被判重刑，不禁瞠目结舌，惊诧莫名。

还记得是1959年底或1960年初春时节，我因公到兰州出差，在兰大盘旋路拐角处，意外地撞见了孙自筠。他大约处在将判未判之时，手上戴着镣铐，脸上蒙着口罩，身披一件破棉袄，后面跟两个武警，与我擦肩而过。我见他脸色蜡黄且浮肿，内心一阵痉挛。后来听说他被发配到新疆劳改，去了林则徐曾经去的地方。

直到二十多年后回校，我才又听到他的故事：

在新疆服刑，孙的处境十分凶险；一方面受犯人欺侮，另一方面是饥饿难捱。劳改干部素质低，更嫉恨有文化的犯人，总想在精神和肉体上找茬，折磨他们。

孙要活命只有一条路：逃跑。虽然只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总比等死强。

由新疆边陲到内地迢迢数千里，他不敢乘车，靠两条腿走。沙漠浩瀚无际，荒原人迹罕见，气候千变万化，飞沙走石。更还有狼群在荆棘洞丘出没，到处潜伏着危险。孙是个有心计的人，他选在盛夏时节出逃，昼伏夜行，始终保持着和兰新铁路或兰新公路两三百公尺的大体平行的方位；这样既不至于迷失方向，又减少了狼群袭击的危险。白天高温，他尽可能离公路、铁路远一些，靠蒿草荆棘丛遮阳。夜里温度降下来，他爬上公路或铁路，捡拾旅人撂下的瓜皮维持生命。经过无数艰难险阻，就靠一双脚板，花了数月时间长途跋涉；他以常人不可想象的意志力逃出。

中学时我读过大文豪普希金《上尉的女儿》和《高加索俘虏》，最令我热血翻滚的是著名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俄罗斯女人》。事过数十年，我大致还记得其中的内容：一群贵族出身的大学生发动了武装起义，反对沙皇，被尼古拉一世扑灭。为首的几个人上了断头台，大部分人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挖煤，服各种苦役。叙事诗的主要内容

是这群流放者的妻子结伴从圣彼得堡出发，到数千公里之外的西伯利亚边陲探夫寻夫。作者讴歌了俄罗斯女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和勇往直前的无畏精神。当时青春年少的我，读后怎能不激动。

如今听说了孙自筠的事，才知俄罗斯女人遇到的困难逊色许多。她们乘坐四轮马车，不曾用脚板走路，大队人马结伴而行；而孙自筠却是不敢见人的逃犯。她们带着马弁、侍从和丰盛的食物，自己还有钱，可以沿途补充给养，而孙自筠只能靠捡瓜皮吃……她们是为了崇高的爱情，孙是为活命最后一搏。

孙自筠最后进入到陇、陕、川交界的山区，这儿是深山老林，人烟稀少。他被一对农民老夫妇收留，成了他们的干儿子。从此三人相依为命，孙扮道地农民，也如文盲一样生活。

几年过去了，周围农民也有人打听他的来处，老两口以“亲侄过继”搪塞。孙待人礼貌周全，与乡民关系融洽。但“文化大革命”来了，农村搞清理阶级队伍，还是查到了他头上。周围乡亲联名具保，孙总算安然无恙。此时他刑期届满，又无重新犯罪证据，有关方面对他查了一番也就不了了之。

我回校后，知道他是兰大首批改正的右派之一，所谓“诽谤信”的案子也彻底平反。只是他地处偏远地带，讯息不灵，直到年关临近才来领取改正通知书。他待了三四天就走了。

他老了，脊背佝偻。他也变了，从不与我们说话。其实，包括我在内，这2010号房间的人他都认识，就像大家全都认识他一样。可是他始终不开口说话，即使有人问他，他只是怔怔的表情。他受的刺激太多，可能比我还多。

以后我听说他调到四川内江师专当讲师，不久升任副教授，并组建了家庭。此前我还有些担心，怕他失聪，得知他的消息不胜欣慰。再以后，这是近十年的事，偶见电视剧《大明宫词》，作者名字与他相同。倘若是他，证明他有成名之作。原有心给他一信落实此事，想来想去，“历史的教训值得注意”，算了。

我多么希望他在有生之年能见到我这混乱不堪的文稿啊，我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在我们几十个劳动考察的右派中，他第一个站

出来揭露农村实情，替农民父老乡亲说话。其时我还陷于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的矛盾中，而他的私心杂念远少于我，他的同情心和正义感也更强于我。

我对孙自筠有期待，他是学中文的，倘能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不敢说一定是不朽之作，但肯定会充实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识，而且，一定会是震撼心灵的作品。

七、与王晾交谈

王晾由北大回兰大了，他返校已有些时日，就住在招待所我对面西头的单间。我没找他，在春节后不久的一天，我俩在过道上相遇。他约我晚上在操场上晤谈，而后匆匆离去。

从外貌看，他的变化不很大。他依然那么健壮，皮肤黝黑透红，学生时代体操运动员的气质依稀可见。他不再像大学时那样的爱说爱笑，似乎颇有城府。他匆匆离去证明，心里或许有“井绳”之忧。他不可能不知道我返校了，却从未登过2010的房门。我听说他返校有要紧事，也不便打扰他。我多少也有点不确定，昔日友情他是否已经忘怀。

文科楼前操场，我俩倚坐在双杠上。寒假留校过年的学生不多，初春之夜，校园里万籁俱寂。

王晾向我解释，返学第一天就听友杰说你落实政策来了。本当早些时探访你，无奈事情缠身，请你原谅。

我们互相介绍了分别二十二年的简要经历，感叹不尽。

王晾，温州人，家中唯老母。五七年划右时，我们俩是全系也是全校年龄最小的右派。只是他的“罪”比我要轻，这才捞到“保留学籍、留校察看”的处理，总算完成了五年大学学业。按成绩他是佼佼者，但到分配时，那些不怎么样的人，留校的留校，进科学院的进科学院，都捞到实惠。他和吕绥生、邓德银等人一样，被分配到中学。老吕去的是西固六中，他去的是永登一中。工作不伦不类，工资只拿大学毕业生的一半，在白眼中度日。他一直不成家，

只是埋头读书，除原来学过的俄语、英语外，他又自学了法语和德语。

1962年后，他有一次摘帽机会。有人问他对“三面红旗”持何看法，他不假思索，立马答道：都是错的。结果帽没摘，反招来几年监禁。

学生时代，我们都心胸坦荡，直言不讳。经过反右，很多人学会了人云亦云。他依然拒绝说假话。

“文革”中他受到冲击，仍然坚持自学。那时农民都举小红旗、捧红本本去了，后来到又要搞“抓革命，促生产”的时候，永登县革委会有一位副主任起用了王晾，交给他试制阔叶除草剂（燕麦灵）的任务。当时从捷克进口的燕麦灵，效果甚佳，然而价格昂贵。进口货每公斤索价数万，永登县是穷乡僻壤，哪里用得起。

王晾遍寻外文资料，制定实验方案。在无设备、缺试剂、没助手的困难条件下，靠他的外语和专业功底，竟研制成功。那时他是夜以继日地工作，甚至曾因氯气中毒晕倒在实验台上。经田间喷施，效果比舶来品好，造价只是进口产品的十分之一。

他的事迹传遍了永登县，也轰动了甘肃省。

按理，王晾的右派帽子可以摘了。永登革委会也打算给他摘帽。事出意外，这年冬天他母亲来永登看儿子，不意给他带来新的麻烦。知子莫若母，王晾的母亲生性耿直。每见来人，总是为儿子辩护：“我儿子没错，他不赞成‘三面红旗’，他是对的。是上面搞错了。”

造反派不能把王晾的母亲怎么样，她古稀之年，又没有公职；账只能算在王晾头上。王晾送走母亲后，就被押去劳改队。直到1978年初，他的命运才有转机。

省里开科学大会，王晾提交了论文《阔叶除草剂——燕麦灵的研制实验报告》，这难坏了县、市、省的各级头头。由右派宣讲论文吗？谁都不敢拍板，只好请示上级。材料一直转到中科院院长、中共政治局委员方毅手中。方毅批道：“人才难得。这种人才我们是要用的。”于是匆忙给他摘帽，让他站到了大会讲台上。

王晾后来考上北大黄子卿教授的研究生，不到一年，又入选赴

美留学，有机会享受全额奖学金资格。但美国校方要求候选人提供大学和中学主科成绩。王晾这次由北大返校即是来索取他大学时期的成绩资料。

王晾的中学档案，他就读的母校保存完好，很快办妥。而到兰大办他的成绩单却很不顺利，卡进死壳。

1957年反右后，大学学生成绩按政治立场给分，无真实性可言。要进行甄别，还当年右派学生的真实成绩，没有先例。再加上化学系的头头百般刁难，坚持要复查当年的试卷，更要原来的阅卷教授亲自评审。王晾找到了原来的毕业论文，幸亏教授健在，将成绩改评为优秀。但他的其他科目的试卷或者在“文革”中散佚，或者找到了试卷又找不到原阅卷教授；有的人调走，有的人去世；这就无法重审评分。据此，系里头头也不允许更改。

王晾还是原先的火暴性子，经过多次争辩与请求后，他终于按捺不住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怒火，把头头臭骂了一顿。结果可想而知，他想办的事全部泡汤。

“拿不上奖学金咋办？”

“回北京再想办法。即使任何办法也没有，我可以边打工边上学。我就是卖血，也要完成学业，绝不放过这次机会。”

末了，他又向我坦言：一俟出去，不打算回来，至少短时期是这样。他哽咽道：“我不是不爱我的国家、人民……但是，倘若制度不发生彻底变化，民族振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初春的深夜，四周弥漫着残冬的气息。用手抚摩双杠，湿漉漉的，下霜了。我俩穿得单薄，却没有感觉到寒意。四处没有鸟叫虫鸣，汽车声早已绝迹；空气清新得沁人心脾。我们敞开心扉，热血交融。

王晾关心我的工作，他问我愿不愿意去永登县。若有意，他说可以负责介绍，我会得到礼遇。但我谢绝了他的好意。

“根据家父的旨意，我当尽力争取回武宁。万一不允，恐怕只好到兰州连城铝厂去，这基本谈好了。”

东方泛出鱼肚白，启明星快落下去了。周围响起二三晨跑的脚步

步声，四围的树丛里，有人开始做操、舞剑。早练者影影绰绰，天要亮了。

“你后天走，我不便去送行。”我带着遗憾提前打招呼。

他攥住我双手说：“我理解你，这样最好。只要我们的心的相通，已经足够。相信我们还有相见的时候。”

八、永别了，劳改农场

1980年3月的一天早上，我和大家刚用罢早饭，“落办”办事员来通知：“主任请大家开会。凡你们这一案的，都去。”

终于等到瓜熟蒂落，我们走进会议室，明显感觉到与以往气氛不同。无论是“落办”的主任还是工作人员，都露出了难得一见的笑靥，态度也殷勤热情起来。周芹香主任招呼我们就座，让工作人员沏茶。

她说：“先向大家报告好消息。你们盼望已久的事终于有了结果。除个别同志留了点‘尾巴’，全案平反，宣告无罪。向承鉴同志虽留了‘尾巴’，不影响重新分配工作。我祝贺大家回到人民的怀抱！现在，我受省高院委托，把判决书发给你们。”

如我所料，被留“尾巴”的是我，而不是苗庆久。我面前的一纸判决上赫然写着：“在《星火》中撰文三篇，文中确有错误观点；但罪行轻微，决定改判免于刑事处分。”

何止“错误观点”？留条“尾巴”一点不过分，简直是太宽大了。然而，这并非我的思维逻辑。

百感交集，我想到牺牲的烈士张春元、杜映华、林昭；想到遇难的冯淑筠、邓德银、胡学忠，史美唐……他们家里还有亲人吗？他们的亲人此时此刻在哪里？亡魂的尸骨何处寻觅？

我想起1962年7月1日，武山县洛门镇那场万人公判大会。那是何等的威严、杀气腾腾！如今平反却是如此怯懦，中院、高院连一个人也不来。

何之明、田昌文和陈德根几位发现我陷入沉思，便过来安慰我。

他们误会了我，我笑着说：“大家都好，我十分高兴。刚才想别的事。至于‘尾巴’，虽然长而粗，我不信它能长得牢。我要把它割掉的，等着瞧吧！”

回到房间，我开始考虑我的《上诉状》该如何写。

“免于刑事处罚”，这意味着问题的性质没变。倘若我默认了，无异于认可头上还要戴这“紧箍咒”。今后我还会受到种种额外的关怀，必然继续被歧视，我将终生低人一等。

我决定趁热打铁。在《上诉状》的开头部分，我扼要罗列了1958年至1960年的亲身经历，我问道：这种种残酷事实是不是倒行逆施？算不算蜕化变质？如果是事实，为什么不准喊“打倒”？依此类推，共产党所领导的推翻蒋家王朝的全部行为，便也没有正义性可言。我愤怒质问：那些置千千万万人民于死境的人，他们难道没有错误？这笔历史的欠账又该如何清算？

在结尾，我要求面对面为自己辩护，以令我心服口服。

2010号房间里，从来没有这样人声鼎沸，一片欢歌笑语。除了我，大家的罪状都被一风吹了，吹得干干净净。他们心旌摇动，精神振奋。有人说，要在1978年时平反就好了，每个人还可得到几千、几万赔偿金。到了1979年下半年就没了，因为冤假错案太多，国家没钱，不给受害人赔偿了；最多只给几百元生活困难补助。还有人说，宋庆龄在中央对此种做法持异议，她打算自己拿钱或者筹钱来代为赔偿，只是至今没下文。

我有自知之明，即使有赔偿我也不在列，自然不参与议论。

古往今来，冤假错案难以避免，并不足怪。奇怪的是，毛时代的冤假错案之多，真是多如牛毛。倘若认真统计，恐怕超过了历代封建王朝的总和；超过世界各国总和。中国对待冤假错案的草率态度和事后处理，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一个蒙冤数年、十数年、二十多年的人，却只能得到几百元困难补助；被错杀的人命最多是千元赔偿，不过是一头猪的价钱。在欧美国家，一个被错判十年的人，可以得到百万乃至千万美元的损失赔偿，与之相比，相差几十万倍。至于那些无辜饿死的农民，连一分钱赔偿也得不到。正因为

人命不值钱，所以他们才敢草菅人命。

看着同学们的喜悦之色和诸般议论，我心里陡然生出许多惆怅和悲凉。

为落实我们的工作，由省人事局牵头在兰大召开了“四方”会（*省里、兰大相关机构、我们当事人和接收单位，共为四方）。兰州 306 厂的两位干部张有玺和刘成福代表接收方，他们当着省局和兰大领导的面，答应解决我的家属师风枝“农业户口转非农业户口”的问题，并承诺将师风枝作为正式职工来安排工作。此前，张和刘已经约我到红光旅社见面谈过，也表示答应这些条件。可惜事后均成空头支票，1957 年后，中国已没有诚信二字。

我们同案人中，胡晓愚先生和顾雁被召回兰大任教，谭蝉雪从敦煌调回酒泉与丈夫团聚。田昌文回武昌工作，与老母亲团聚。杨贤勇家在兰州市内，就在市里工作。“四方会”后，苗庆久、陈德根、孙和因家中妻小翘首以待，不一两日便先后离去。何之明直奔长沙探望兄嫂，也走了。

都走了，散了，各奔前程。二十四年的青春代价，换得手头两片小纸。这里没有值得我留恋的，兰大留给我的只有伤痛。

我在“落办”领了五百元“错划右派生活困难补助”，扣除平时借款后所剩无几。又索得一纸介绍信，便决定尽快离开。我去理了发，洗了澡，换了一身颇洁净的衣服；然后买了黄纸和两炷香，独自来到黄河岸。面对浊流滚滚的黄河水，我独自烧纸焚香，祭奠亡灵。我轻声呼唤着张春元、林昭、杜映华、胡学忠、冯淑筠、史美唐、邓德银的名字，顿时泪如泉涌。

你们听见了我的呼唤吗？你们此时又在哪里？历史已经还你们清白了，可是，你们的尸骨早已化作缕缕青烟。我坚信，你们的英灵依然在华夏大地、在碧云蓝天飘荡，我依然能听见你们振聋发聩的长啸。

死了的，都是最优秀的！

祭奠回来已是满城灯火，张友杰在房里等我。

他说：“陈祖武已知你平反的情况，给我来电话，要我转告他

对你的问候和祝贺。你曾答应平反后接受他的邀请，这下该践约了吧。”

我说：“在这儿多一秒钟也不愿待，明天我就回青海办手续，恐怕来不及了。”“这好办，我给他电话，他派车来接我们。”

张友杰在我面前多次提到他，不去显得我心胸狭隘，会被误会为不原谅他。

陈祖武的小家显得很温馨，屋里的摆设布置都恰到好处，这证明他妻子是位操持家务的能手。客厅的大饭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菜肴，我感到惊异。即使到餐厅点菜送上门来，也没有如此速度。这是咋回事？

陈祖武拉着我的手，显出极热情的样子。席上，他和他妻子、友杰殷勤招呼我吃菜、喝酒，我却没有丝毫食欲。出自礼貌，我只是点缀了一下做做样子。友杰见气氛并不融洽，为免尴尬，他努力营造氛围，左右周旋。陈祖武开口道：“我万万没想到后果竟是这么严重，让你吃尽了苦头。每想到你，我就十分内疚。我每见友杰，都向他表达了这种愧疚的心情。”我相信他的话发自内心，他已良心发现。我真心原谅他了。

皮球踢到我的脚下，我道：“过去了的已经过去，只要有你这句话，一切我都谅解了。”

我不隐讳我个性上的缺陷，我最不记仇又最记仇。即使天大的损害，当面承认事实，赔礼道歉，我会原谅。即使损害再小，还遮掩真相，我会永远记在心中，从此不与来往。

一笑泯恩仇，还能说什么，还有什么可说的？

第二天早上，我登上了去青海的列车。前来送行的有顾雁和张友杰，还有张有玺和刘成福。

列车启动了，又是一路向西。我在列车行进的声音中陷入了沉思，此行四月有余，我空手而来，如今只不过是多了两张纸，仍然是空手而归。两张纸对我意味什么呢？我不敢奢望它是自由的象征。1979年4月，我已被农场通知“恢复公民权”，也获得了《选民证》。可是，我没有择业自由，不能离开农场自由地回家。中国有数亿农

民，每个人都有公民身份，可他们的自由和民主权利又体现在何处？刘少奇、彭德怀至死也没有被剥夺公民权，他们是级别最高的公民，可他们在被打倒后有发言权吗？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吗？

列车驶向柴达木盆地，驶向荒漠，我的心亦如荒漠。

回到总场中学，我已平反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学校全知道了；连尕斯库勒分场也传遍了。贺鹏早把我的铺盖整理好，搬至他家里存放。

姚士彦老先生为我的平反特别高兴，简直不亚于他自己的冤案平反。师淑芝老师自不待言，她已视我为亲人。她给我端来了一大碗挂面，碗底全是荷包蛋。我已经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一直吃不下去。如今才感到饿，饿如饥虎。这一海碗挂面，我松了两次裤带才送下肚。吃饭时，我发现我与凤枝的合影已挂在她家的镜框中，显得异常醒目。

麻烦事发生了，既是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老师把我拉到她房里，又哭又闹。她埋怨我回兰大落实政策，事先没向她打招呼；又怨我一走四个月，无只字书信给她，连通信地址也没告诉过。当她在师淑芝老师家看见我与凤枝的合影后，甚至把怨恨发泄到师老师身上。我心说，这一切都毫无道理，可埋怨的是她自己。她那讨厌的先决条件刺痛了我的自尊心，她只信一张纸，不信我这个人。而那张纸，在中国十之八九是错的，是颠倒的。

人说爱情自私，她的固执与偏狭难以理喻。但我不能再伤害她的感情，我只是不断解释道：

“我是个浑身毛病的人、一个愚不可及的人。你应该找一个比我好十倍、条件比我优越百倍的丈夫。”然而她一直嚶嚶啜泣，花了几个晚上才扯断了这感情上的纠葛。姚老每晚十二点准时来叫我，他担心我把握不住自己会惹出麻烦。

处理完这桩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我脱出身来，去场部办理离场手续。场部人员这类事办得多了，业务极熟。不待我开口，他叫我先写个收条领五百元生活困难补助。我又开了介绍信到派出所，办理户口和粮油关系迁出的手续。前后两个小时竟然全办妥了，这种效率以前不曾有过，而且干部的态度都出奇客气。

肖恒死了！这是我去总场医院打听到的。四个月前，我动身去兰大时他住进医院，当时他满怀信心要熬过冬天，等待我的好消息。然而他还是走了，这位耿直得连亲生父母有错也敢批评的老人。

我去坟场祭奠他，总场坟场就在育红中学后门不远的荒滩上。以前我从未去过，也不曾听人提及。坟场的另一面是低矮的山坡，山下有条蜿蜒小路。坟冢约莫有十几排，有多长说不清楚，总之一眼望不到头。到了坟场，虽然太阳明晃晃照着，毕竟是独自前往，再胆大也会心里发怵，头皮发紧。我边想着心思边寻觅着，冷不防，几只正在吞噬尸骨的野狗从坟冢里窜出来，把我吓了一跳。可怜那些坟冢不少已成空穴，还有尸骨半露在外面。到处是乱七八糟的尸衣，眼前一片狼藉。每座坟丘原本都竖着一个小木牌，上书死者姓名、籍贯；如今七歪八倒，有些竟与尸骨一起荡然无存了。

人们呵，千万不要目睹这个坟场！如果没有恒定的信念、坚韧的神经，只要睹一眼，你会发疯，会自杀！

费了很长时间，我才找到肖恒的坟莹。我焚香烧纸，燃放一串爆竹，悲戚戚，惶惶然。在他的坟莹前站立，我默哀了数分钟。从服刑到释放，他是唯一一位我到坟上祭奠了的人。

我又回到尕海分场待了三天，在我回去兰大落实政策时，向怀烈医生调离中学，到尕海当了分场场长。他用自行车驮着我，把我从“三厂”接到他家。路虽然不过五华里，中间还要经过大坏场，坑坑洼洼，把他累得不轻。

一连三天，早出晚归，归来都是瞎天黑地。我看望了三大队的顾用之、“老黄牛”夫妇、“小剃头”夫妇和他们的孩子，还有杨信全、苏炳初夫妇、李竹叶、邓安瑶、姜有祖。我去了四大队看望了我的老乡黄宗华和三大队的陈凯仁，去一大队看望了周孔章、梁训章、汪汉江、史成德、陈建忠、李应唐；我又去分场看望了张子贵、唐尕玉、卜宗平和罗时甫……

我的这些难友经历不一，年龄参差不齐。其中既有从旧社会的大学毕业的，也有道地的文盲。一半人是我父辈的年龄，一半是我的同时代人。我不敢担保他们无罪，然而凭相处观察，他们都是

本质不坏的人。除了命账血仇，即使有罪，也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卷进政治漩涡，扮演了某个角色。罪责本不该由他们完全承担，即使有罪，也不至于要在这里了此一生吧。

难友们知道我此去不再复还，与我分手时个个如生离死别，多有咽泣者，令我肝肠寸断。患难情谊之深，今生不忘。

呜呼，别了，德令哈农场尕海分场；痛哉，惜乎，与我朝夕相处过的难友们，你们多多保重啊！

①有关这份右派改正结论，作者原曾有过这样的批评：“这份改正结论寥寥百字，还有两处错误：我不是1958年错划右派，而应该是在1957年6月底或7月上旬。落款也不应是8月8日，而应该是11月下旬的某日。我是1979年11月7日返校的，这一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为什么把复查结论的日期要写成8月8日？费解。由此不难看出兰大党委的态度，如此处理有关人的政治生命的大事，是何其草率和不负责任。”但是编辑在核查事实时，看到作者保留的这份同日签发的原件与上文不同，可能作者当时仅凭记忆写出，未与原件经核对；或者是资料遗失。这里将原件附上，以备今后校史研究者查找核实。

关于向承鉴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

向承鉴，男，汉族，现年四十一岁，河南光山县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分学生，一九五六年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学习，一九五七年划为右派分子，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处分。一九五八年送往天水地区武山县农村劳动。在劳动期间因现行反革命集团案于一九六〇年九月三十日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刑满，现在青海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子弟学校就业。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对向承鉴的右派问题进行了复查。经复查认为，向承鉴在一九五七年整风鸣放中有错误言论。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衡量，对向承鉴不应划

为右派分子。决定予以改正。撤销一九五七年给予保留学籍、劳动考察的处分决定。

中共兰州大学委员会
一九七九年八月八日

*在这一盖有红色公章的打印文件上，还附有手写的两行说明：“此结论同时给你校党支部已寄去二份，如你无意见去校党支部签字后便予存档。”

②作者这里记叙的 1979 年冬在兰州大学看到影片《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可能有误。安徽作家鲁彦周的小说《天云山传奇》发表于 1979 年 10 月的《清明》杂志（创刊号），后改编为电影，1980 年才完成拍摄。《牧马人》改编自张贤亮的《灵与肉》，小说在 1980 年 9 月在《朔方》第 9 期上发表，影片在 1982 年上映。

第三章 老脚旧鞋走新路

一、二次探亲

翌日深夜，我在河南漯河站下车。漯河是个不小的城市，灯火一片辉煌，大多店铺已打烊，街上行人寥寥。为省旅店费，我在候车室的长凳上对付了五六个小时。四周长凳上横七竖八睡满了如我一样住不起旅店的人，在昏黄的灯光下，这些人形容枯槁，看上去三分像幽灵，七分像乞丐，满面的愁苦、潦倒和无奈。

等到九点多，望眼欲穿，才看到凤枝。她见到我，笑靥如花，扑到我面前。在熙攘的市面，我们徜徉了个把小时。凤枝一手策划，购买了各种礼品。烟、酒、糖、茶、水果、点心之类，我们手里大包小包，恨不能长出四只手来提。中午时节，我们才到了凤枝的家。

这里是个颇大的村庄，属郾城县大刘公社管辖，坐落在漯河市到平顶山公路的西南侧；离漯河市有一小时的汽车路程，交通还算方便。我未来的岳父母是典型的贫苦农民，都已六十有几。他们原来住的土墙屋，1975年被大水冲毁，如今住的是三间草房。凤枝没有兄弟，唯一的姐姐早已出嫁。家里没劳力，父母的日子过得凄苦。三间草房既矮且暗，我必须弯腰勾头才得进门；感觉这房子极似1949年前我家逃荒到江西武宁时搭的茅棚。屋里黑昏昏的，屋内的檩条上挂着一些竹篮和别的物件，我的头磕碰了好几下，惹得凤枝嗤嗤地笑。

这就是凤枝的家，一个我熟悉的、整个童年如此度过的家。对一个讨饭出身的穷孩子，真是再门当户对不过了。

随凤枝转了一圈，对亲戚们做了礼节性拜访。傍晚迎来了一大帮客人，他们都是凤枝学校的同事。大家挤坐在屋门口，嗑瓜子，

吃糖，抽烟，喝茶。人们说了些道喜祝福的话，时间不长就散了。我问凤枝，小学除你，都是男老师？她说女老师有好几位，都怕见你没敢来。这就怪了，怕我什么呢？凤枝说，怕你考她们，一问三不知，丢人。我不禁捧腹：我凭什么考人家，我又懂得多少？

在凤枝家只待了两日便匆匆南行，临别时我告诉凤枝，一月内，无论她落脚武宁，或去兰州连城铝厂，我都来接。我叫她事先办好有关证明，她问我道：“我受过培训，又是计划内民办教师。近来有文件通知有批‘民办转公办’的指标，一要教龄五年以上，二要年龄三十岁以内，已婚的则只生一胎。这些条件我全符合，丢掉机会有些可惜。”我说，厂里已答应解决“农转非”和正式工问题，这边一切都不要了，指标让给别人吧。可惜后来证明，我又一次上了大当。

回到武宁，全家知道我右派改正和冤案平反，高兴非常。犹如拨开云雾重见天日，压在亲人头上二十多年的巨石终于被搬掉。

隔一日，弟弟忽然跑来叫我，说一位老友来访。我问是谁，弟弟说你一见就知道了。

堂屋里，一张破旧的圆桌旁坐着一位女士，皮肤黑黑的。见我进来她并不招呼，不卑不亢的样子，脸上微微笑着。我哑然。弟弟问我：你的这位朋友还认识不？我愣着，摇了摇头。弟弟这才说：她是×××。

哎呀呀！原来……对面相见不相识，这就是二十四年的变化！一个今生今世倾心爱过的姑娘就坐在我面前，我端详良久居然认不出，谁相信？但此刻却是千真万确。

1959年她出嫁了，当时还不到十八岁。成天砍柴喂猪种菜，围着灶台转，她过早地失去了昔日的容颜，再加上多生多育，显得未老先衰。如今她的实际年龄不过三十八岁，大女儿已经十九岁，也到了成家的年龄。我不禁想到我的难友，即使是变化最大的孙自筠，我也还能一眼认出并呼出其姓名。可我最熟悉的姑娘坐在我面前，我竟不能认出二十四年前的倩影。

她对我仍然一往情深，也关心着我的婚姻和平反后的工作。我

把情况和打算告诉她，她斩钉截铁地劝我道：

“江西极左，武宁更甚，千万莫回来。不论到何处都比武宁好，不然你会后悔不及。”

她的话对我是有分量的，我必须仔细斟酌自己的去留。

弟弟告诉我，在他下放最困难的时候，还曾经在她家住过。她对他视同亲兄弟一般。他又说，去年暑假你回来时，她在这屋前屋后转悠过好几趟。寻你未遇，她心里一直记挂你。生命苦短，听了她的经历，我对她更增了几分敬重。原以为闺阁小姐吃不得苦，谁知她吃的苦比谁都多，而且她都挺住了。

来访的人络绎不绝，我中学、小学时期的同学，孩提时一起玩耍的朋友。有人说我吃了太耿直的亏，有人怪我桀骜不驯，脾气倔犟。还有人说，人怕出名猪怕壮，应了“出头的椽子先烂”的话。

“矫矫珍木巖，得无金丸惧？”太冒尖容易遭人暗算。

大家一番好意，我悉数心领；但有些观点无法苟同。如果遇到有悖人性良心的事情，人人都明哲保身，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想到，即使受戮百次，我还会坚持我做人的理念。

拿着兰大“落办”的介绍信，哥哥陪我跑武宁县委组织部。我们也去了县人大等有关部委，还有县政府的有关科室。一连三天，遇到的面孔都是冷若冰霜。

哥哥在武宁也算是资历颇深的人，我离开武宁尽管久远，知道我的人依然不少。在武宁，谁不晓得谁呢？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任县级与科部级的领导中，大多是我哥或我的中小学同学，彼此都知道根底，有何架子可摆？

在县里各机构循环往复，折腾了几个来回。有关我的归宿，终无一人拍板。

我算晓得什么是官僚作风了，当你进到办公室，那些上班的人看文件，伏案写字，个个都是全神贯注的样子，连头也不抬。好像进来的不是我们两个大活人，而是两截木头。只有叫出某某的官衔来，此人才慢慢抬头，说着相同的鬼话：“这事么，我们需要研究研究。”最好的结果也不过是在我的申请报告后写上几个字：已阅。

请×××书记过目。

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我感觉自己像件劣质甚至毫无价值的商品，在乞求买主的施舍；那些官僚的嘴脸令我恶心。

直等到第七天，才算有了下文。我被约到县委组织部，他们已拟好文稿，放在我面前。接待我的一位干部道：“兰大‘落办’不是组织人事部门，其介绍信的效力有限。县上为你的工作安排专门开过会，知道你在武宁土生土长，又是你们同时期的佼佼者；讨论决定破格照顾，同意接收你回武宁工作。不过需要甘肃省人事局同意放行，并把你的档案材料寄来。”

我告诉他说：“我五七年被错划为右派，现有改正的证明。五八年下放，六〇年又因冤案系狱。至今才平反，现有法院的判决作为证明。这二十多年的档案想来全无，即便有也该全部销毁。我的档案理应重建，还有什么档案可寄？”

他答说：“我只能按规定程序办，这对你已经是最宽最好的结果。”

他们给我一纸公文，内容如下：

甘肃省人事局：

向承鉴同志个人意愿回武宁工作。经研究：我县同意接收。如你们愿意放，请将向承鉴同志的档案材料寄中共武宁县委组织部。

中共江西省武宁县委组织部（印）

1980年4月18日

我不再说话，拿上这张公函出了县委大门。

几位老同学听我叙述了经过后都说：“武宁不重视人才，你不要回来。否则，有更多的气要受。”

江西极左，然而全国何处不左？不敢不左，不得不左，制度使然。武宁不重视人才，全国又有何处重视人才？何况，我也不算是人才。天下乌鸦一般黑，到哪里去找白乌鸦？

我知道已失去回武宁的可能，兰州那边不会放我；而且已经为我分配了工作单位——兰州连城铝厂。厂里干部刘成福、张有玺在

我面前表现出了“求贤若渴”的态度，这可能是逢场作戏，但我也只能饮鸩止渴。毕竟那还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这里的脸色我看够了。

父亲已在古稀之年，他三令五申要我留在他身边。他哪里知道，儿子需要人格尊严远胜过生命。我打定了主意，却不忍向父亲透露。

4月下旬，我告别亲人友朋，依旧背着劳改队那套行囊上路了。一床破被褥和一块破毡，搁现在，撂到垃圾桶里也没人捡。我携风枝赶往兰州连城铝厂，5月1日报到。

张有玺对我说：“考虑到你情况特殊，根据事先约定，有三样工作供你选择：职工大学、中心化验室和子弟中学高中教数学，我们想听听你的个人意愿。”

我说：“我个人无要求，不选择，请组织上把我放到最需要的地方。”

张说：“目前高中数学急需老师，情急似火。”

“那好。我去。”

组干科的科长沈老头是一位抗日时期的老干部，耳朵背，平时科里的事由张有玺负责操持。张把我的意思告诉了沈，沈老过来拉着我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同志，想不到你有这么高的觉悟，组织先要谢谢你呐。”

二、草草完婚，急急上课

我并非是“政治觉悟高”，五个多月的官司，长途旅行奔波，把我折腾得成了神行太保。看尽了冷眼后，我已经心力交瘁。经过漫长的劳改生涯，按说有必要先做个全面体检，甚至短暂疗养一段。但我渴望工作，不愿时光虚度。

厂里住房紧张，刘成福把中学党支部的办公室腾出来给了我。这间房约有十二平米，它既是卧室、灶房又是我办公的地方。理科教研组长戴良卿为我借来双人床，操办了案板、菜刀、锅、碗、勺、盆，又亲自动手做了两只水桶盖。女老师李土玉（白族，西南民院

毕业)、马淑兰、戚英、刘秀兰、曹华民等人又替我翻洗被褥，将那破了几个大洞的烂棉絮塞满棉花……我好感动！

1980年5月4日，我们办好了结婚登记手续，我把凤枝从招待所接过来完婚。没有婚纱，没有“喜”字，没有纸花，没有一件新衣服、新被褥、新枕头枕巾……现在年轻人结婚的物品我们一丝一毫也没有。是晚，书记刘成福、校长董葆凡、副校长魏丕祥以及先期到达的同学陈德根、何之明、苗庆久、孙和等……众多老师挤满斗室。我们端出瓜子、糖、烟，沏上清茶一杯，热闹一番。我的四位难友陈德根、何之明、苗庆久、孙和，合伙送我们一条毛毯和一个电子挂钟，作为新婚贺礼。

我和凤枝的婚礼是世上最寒酸的婚礼，连购买日常用品在内，一共花了不到一百元。但我们依然感到充实、满足。凤枝纯朴善良，她理解我，没有任何埋怨。至今回忆起来，亦无遗憾。

5月7日正式上课。董校长领我进教室，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我的情况。介绍一点不实事求是，多有谬赞，令我心虚汗颜。

高一共有三个班百余学生，原由曹华民老师授课。她是“老三届”，力不从心。我来之前数学课已经停上，由同学们自学；曹老师到班上只是维持秩序而已。如今她跟班听我的课，同时兼助教，帮我批改学生作业。

按规定，高中数学每周应有六节课，三个班共十八节。二月底已经开学，但我五月初才到校，学生已经缺课太多。为补进度，只能每班每周加一课时，我的工作量变成每周二十一节。除此之外，又增加了周日补数学课：上午在图书室，三个班合并上大课，系统补平面解析几何。我由直线方程一直讲到阿基米德螺线，再到参数方程、极坐标。连周日上课的四课时，每周实际我要上二十五节课。

我全身心扑到教学上，融入学生中。这届学生有不少是上届或上上届“沉淀”下来的“重金属”，他们不甘心待业就业，勤奋好学。每晚自习罢，总有五六个学生又聚集到我宿舍里。我床前那一席之地，成了解题答疑的黑板。不到校领导前来催赶，同学们不肯离去。他们走后，我还得准备第二天的课。学生的求知欲感动着我，

也鼓舞了我，我只能“舍命陪君子”。幸好在育红中学时我已经教过这些课，内容都过了一遍，成竹在胸，不然真是疲于奔命了。这一时期，我精神高涨，精力充沛。何之明正在教高一英语，我想把英语捡起来，又跟班听他的课，一节不缺。

邓子珏老师是上海人，他教语文，也是落实政策而调来的，他比我先到半年。有一天，他拿了一大摞作文本叫我看。他说：“向老师，你刚来不久，学生写作文，无一例外全写的你，真没想到啊。他们写了你的言行、你说话的腔调、声音，你的手势和比喻，把你写得栩栩如生。我看了很受感动，很受启发。”

学生对我多有赞誉，这是我不敢领受的。有的学生还写到我不要超工作量课时费，拒绝接收补课费，连月奖也不肯多拿一分钱。我认为这些都是应该的，学生的认可对我就足够了。

在精神上我是个富有的人，物质上却一贫如洗。现在每月有七十二元俸薪，我给岳父母五元、父亲五元，还要资助其他人。也是在这时我才搞清楚，厂里并没有“农转非”的户口指标。莫说安排工作，凤枝连口粮配给也没有；我们得花高价买粮票或采购高价粮。为了添置衣被家具，凤枝只好到建筑队筛沙子、石灰。下班回来她又要买菜煮饭，料理家务。我忙得连轴转，顾不上帮她，叫她吃了许多苦。

我的来信也出奇多，每月都有好几十封，最多一天有七八封。负责后勤的罗本云老师开玩笑说：“向老师，我都快成你的私人通讯员了。”

尽管劳累、紧张，生活却是多姿多彩，充满激情。

与此同时，我继续为逝去的难友呼吁。我与何之明兄联名上书甘肃通渭县法院、检察院和中共通渭县委，就邓德云君受株连致死一事提出诉状，终于使他的冤案得以昭雪。邓君的老母亲给我来信说，现在她每月可以得到二十元的抚恤金，直到天年。老人家随信给我寄来一小袋茶叶，说是聊表心意。

我欲哭无泪，恨不能把老人接到跟前侍奉。

三、武山之行

1980年的暑假，我偕凤枝到武山去。那儿有我牵肠挂肚的李大娘和康大伯，他们都已七十好几了。来日无多，我必须先去看望这两位曾待我如亲子一样的老人。

武山，我曾在此生活了四年，它是我人生的转折之地，给我一生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印记。1958~1962，那四年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四年。我在城关公社的山丹镇、联丰社、杜家垆、上街子与农民父兄促膝谈心；为水土保持工作，我曾踏遍城南的大小山头。大炼钢铁期间，在西关的试验炉旁我熬过不眠不休的三天三夜。我曾新华书店、文化馆的常客。在那间小房里，我与杜映华就现实与历史有过推心置腹的讨论。当年的铁路两旁，我数次见到了倒毙的饿殍。在武山看守所，我住了一年多小黑号……

二十多年过去，我又踏上了这片土地。

武山陈家门车站变了，原先这儿是个末等小站，只有破旧的两间平房。如今站两旁修起长长的栅栏，而候车室、售票厅都已在崭新的楼房。陈家门镇原来只有一片店铺、两家最廉价的末等饭馆，现在的小镇热闹繁华，汽车与拖斗车在镇上来往穿梭。极目远眺，我想找到杜映华住过的平房，可惜已夷为平地；他的遗孀和两个儿子也无处寻觅。隐约听说杜映华平反后，县里将他的一个儿子安置在陇西水泥厂当工人，另一个儿子安置在商店当售货员。但愿消息无讹，杜映华的在天之灵也算得到些许慰藉。

“心事浩茫连广宇”，悼念故友，我满怀沉重而悲凉的心情。

天气异常闷热，我一边走一边向凤枝介绍我在此处二十年前的种种经历。陈家门向东五华里处是上街子村和下街子村，渭河岸边，硫酸车间的大棚和陶瓷管高塔已荡然无存。

从上街子村去百泉，需过渭河，如今河面上有座木桥。我指着离桥不远的河岸说：“二十年前，我就是在那儿发现了一具女童的饿尸，这令我震怒不能自己；因此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争。我永远不会忘记她”。

过了渭河即是百泉，百泉依山傍河，家家院里都有三两棵果树，或李或桃或是苹果，绿树成荫。河川里有良田，山上可放牧，这是一片富饶肥沃的乡土。

李大娘正在院里簸粮食，见我进来，上来一把搂抱我，激动得老泪纵横，一句话都说不出。她的女儿连忙过来，把我俩拉到上房歇息。我问起李大伯，大娘哽咽道：“你们被抓不久，他又饿又气，又惊又怕，不久就去世了。他一半是饿鬼，一半是冤魂。由于我家和你们同学关系好，接触多，案子爆发后，他也被管制了。他死后，连我这老婆子也不放过，又把我管制起来，还在村前村后游斗。”

李大娘边说边啜泣，说到伤心处，又恸哭起来；凤枝一旁陪着垂泪。大娘一生不曾生养，女儿是抱养的，以后招婿入赘得了孙子，延续了李家的香火。女婿在城里当铁匠，一星期回家一趟，是个老实巴交的人。孙子当年不过六岁稚童，如今已大学毕业，在中学教书。这个由四姓组成的三代之家和和睦睦，足见她的宽厚和持家的能耐。

四合小院连着门廊，靠山一侧是厨房，对面是厕所与牲畜栏。栏里饲养了几只羊，一群鸡在院里四处啄食。

凤枝递给大娘的女儿两包点心、两包水果糖。我对大娘解释道：“才分配工作又成家，拿不出什么东西孝敬老人家，惭愧得很。”大娘乐呵呵地说：“看见你身体没落残疾，还这么年轻，又娶了这么好的媳妇，我打心眼里高兴啊！哪怕空手来，也说明心里还记着我这老婆子，我比喝蜜还甜，快别说这些生分话。”

不知何时，大娘的女儿宰了鸡，晚餐用鸡肉挂面招待我们，又安顿我俩在上房歇息。上房宽敞明亮，是唯一一间像样的房。大娘和女儿挤到窄小的下房住，我心里甚觉过意不去。

一大早康大伯的儿子明前过来看我们，早饭后我俩随明前一道去看望康大伯，也带去两包点心和水果糖。

大伯家在渭河川上，离大娘家不足一华里。这儿也是个四合院，只是更宽大些。二十年前康大伯卷进我们的案子里，我点滴不知情。他与我在看守所待过近两年时光，虽没在同一号子，也没说过一句

话，他对我的情况却了如指掌。谈起看守所的情况，老人滔滔不绝。

“看守所你的代号是十一号，排老大，苗庆久十三号排老二。你关小黑号时间最长，大家见不到你，都很关注你的情况。你痛斥所长、局长、庭长，转弯抹角都传到我们耳朵里。你到南号后，提审你时各监门上锁，大家都在窗缝里盯着你。那时见你昂首挺胸，步履铿锵，目光炯炯，在心里为你叫好。在那种时候能做到精神不垮，不容易啊。”

早年在看守所期间，康大伯的身体就不太好。他能熬到现在，亲眼看到全案平反，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他的身体远不如李大娘，手中已离不开拐棍。

大伯无限感慨道：“在有生之年，能见到你，看到你身体好，结婚成家，有工作，不久还会有孩子，我死也瞑目了。”

我十分感激康大伯对我的情义和祝福。

明前约小我一两岁，1958年我下放武山时，他正读高中。他后来考入师大，因受大伯株连，被迫辍学。如今大伯平反，明前恢复工作，在百泉农中教书。他收入低微，业余还与妻子一道兼着地里的营生。他已是两男一女的父亲。

晚饭后，天气凉下来。明前陪我和凤枝到村头、田间、河畔转悠。

时值1980年7月下旬，包产到户的做法已风靡百泉。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夏收进度出奇快，麦子早已收割过了，许多人家已打碾入仓。眼前不少麦田已翻晒了，待种新茬。

明前告诉我：“若是人民公社时期，一个工只有几分钱；收获的粮食大半被公家统购上交，剩下的又被大小干部私分贪污；干也白干。现在不同，收获全入自家的粮囤，谁也不要人催，都起早贪黑拼命干。”

我问：“公社塌台，原先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的书记、主任、队长、会计、出纳、保管一帮人现在都干啥？”

明前答：“公社、管理区两级干部，我不清楚。大队和大队下面的这帮人，如今也都在自己的承包地里干活。农民不再怕他们了，

我想，公社也会自动消亡的吧。”

这是政权的基层组织基础，断乎消亡不得的，只会变换一下功能和形式。我心里如是想。

走出村头不远，我惊奇地发现有一小块地，面积约几平米，地里麦子居然没有收割，麦秆已成褐色，无穗无叶光秃秃的。

“这是咋回事？”

“这是块‘公地’，没分到个人头上，所以无人过问。”

呵，这便是公有制的下场，是人民公社优越性的见证。

我伫立在渭河岸边，凝望一脉渭水，此处滔滔，彼处汨汨，千回百转。即使大山挡道，河水陡然跌宕折向，总还是要复归东流汇入大海。

由明前连日陪同，我和凤枝又去看望了雷振华和雷岩家。他俩都是道地的农民，平反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变化。依然是家徒四壁，穷困潦倒，还是过着日出而耕、日落而息的日子。我们又专程去龙泉看望了罗守志，他平反后未官复原职，当了四门中学校长。几年后我得悉他调到武山县人大，任职副主任或是秘书长。

罗守志身高与我差不多，年长我十岁，他是个沉稳内向、文质彬彬的人。他蒙冤后妻子离婚走了，眼下他与儿子相依为命，儿子正在读高中。考虑到他生活多有不便，我劝他尽快续弦。他作苦笑状：“谈何容易。要找一个通情达理、能理解我的可心之人，至今无有。我又不愿苟且从事，弄不好反添许多烦恼。”

我心里感慨，为农民免受荼毒之苦，我们付出了满腔热血。除了牺牲者外，即使最后能从劳改队幸存下来，有多少家庭已经支离破碎了啊。

武山之行只有短短四五天，我完成了一桩心愿，还了情感债。临别那天，康大伯和李大娘都嘱咐我，有了孩子一定再携妻小来看他们。我答应了，不能不答应。

返回路上，我一直沉浸在往事的回忆里。农民是如此的纯朴善良，难道不值得我挚爱？

四、“我不信邪！”

新学年开始了。

9月1日开学典礼，我受到厂部嘉奖，全校师生鼓掌祝贺。我教的学生欢呼雀跃，掌声经久不息。

这一年，高一年级的三个班合并成了两个毕业班，我的课虽少些，担子反而更重。曹华民老师调去教初中数学，我的学生还是那么多，但没有曹老师兼做助教，我每天都有百余本作业要批改。我既不会偷工减料少布置作业，又不能只批部分作业；结果每天仅批作业就要耗费三四个小时。

最要命的是教材全换了，我们第一次使用全国统编教材，难度很大。高一数学就要教微积分、概率；此外还有逻辑代数。《逻辑代数》我未沾过边，只得边学边教，不敢有半点马虎。新课本已经投入使用，而给教师用的教学参考书还来不及印制。我们无一字资料可供参考，只好将课本习题先做一遍。讲完二进制后，有一道逻辑线路设计的习题，整整把我憋了个通宵，真正是“赶鸭子上架”。

学生照例下课后还来到我家，要到深夜十二点过后我才能批改作业和备课，真是忙得四脚朝天。凤枝已怀孕，恶心呕吐，反应日烈；加之休息不好，身体到了无法支持的地步。正好何之明的亲属回国探亲，他请假南下。我委托他先把凤枝送回江西老家。为确保胎儿正常发育，只得孤军作战。

送走凤枝没几天，发生一件事。

一日，我正伏案工作，突闻门外“噼啪”斗殴声。我丢下手头事务，急忙出门了解情况。原来，在我门侧的一楼到二楼楼梯拐角的平台上，×家兄弟俩已将李冬根同学放翻在地，一个骑在他身上揪头发，另一个对他拳打脚踢；李已无力反抗。

李冬根与他姐同年级，都是我教的高二学生。×家兄弟原也是该校学生，此时已离校，属待业青年。

令我不解的是，楼梯上下全是围观者，大多是学生，有个别教职员也在场，竟无一人上前劝阻。

我没作任何考虑，一把上前将压在上面的人拉开。李爬起来站到我身后，打红了眼的兄弟俩与我直接对峙。我正在规劝他俩时，吃了亏的李冬根突然从我身后冲出来，一拳击中其中一人的面门，打了对手一个猝不及防。被打的人鼻子破了，流血不止。兄弟俩立即斥我拉偏架，脏言秽语，骂不绝口。伤者鼻血抹得满脸，恶狠狠地瞪着我说：“你等着！”

一大帮学生围在房里，七嘴八舌告诉我：“这兄弟俩打架全厂出名，向老师，你划不着与他们计较，还是先回避一下为好。”

我坦然道：“我没干亏理事，谅他们不敢杀人放火。我要回避、躲藏，他们气焰会更嚣张，今后我如何安身？如何教书？”

不到半小时工夫，兄弟俩从校门外闯进来，腰上别着斧头、菜刀。我房里气氛一下紧张起来，一群同学将我团团围住，有的同学甚至强行要拉我离开。这都是十八到二十之间的男生，我知道他们是仗义；但此时我也勃然大怒了，我吼道：

“都走！这屋里不准留一个。若不听我的话，从此师生情绝！”

赶走了学生，我打开房门，点燃一支烟，站在门口迎候贵客。他俩一步步踏上楼梯直冲到我面前，我问：“你们是先动手呢？还是等我把话说完再动手？”他俩一愣，互相看一眼，没搭腔。

“依我看，最好让我把话说完再动手不迟。不然，会留下遗憾，于大家都不好。”他俩仍不开口。

“上门都是客，请进屋。”

小房里只一把椅子，他俩只好坐在床沿上。我把椅子放到他俩面前，也坐下来，平静地对他们说：

“人都是懂理、讲理的，因为理大于天。我说两点：我拉没拉偏架，该不该拉架。如果我说的不是事实，不算正理，说完后请给我指出来。我不强词夺理，一定虚心接受。”

我出门时，李冬根已被打倒在地。拉架该怎么拉？不把上面的人拖开，难道把他从你们身下抠出来？这算不算拉偏架？在我对你俩劝导时，李冷不防冲过来打你一拳，我既未事先暗示他这么做，身后又没长眼来不及制止；我有责任和过错？”

我点燃了又一支烟继续道：“骂人没好口，动手无轻重。你俩真要把李冬根打伤致残，他的父母、姐姐能善罢甘休？事情发生在学校里，身为老师不去劝解、制止，就没有当老师的资格。退一步讲，即使发生在校外，只要我看见，仍然会挺身而出。这样做，符合我做人的准则。”

他俩听着，也没有插话和反驳。

“我要说的就这些。现在请你俩发表不同意见。如果在处理这件事上我有偏心，或者对你们不礼貌，伤害了你们人格，我愿向你们赔礼道歉甚至认罚。大家是平等的。”

兄弟俩互相对视，犹豫了一会儿。末了老大说：“老师没什么错，是我俩不好。”

“知错认错，证明你们本质不坏。化干戈为玉帛，不但我和你们兄弟俩，我还希望你们和李冬根从今以后友好相处。”

老二突然冒出一句：“请问老师贵姓？”

“我姓向。”

“你就是向老师？”

我点头。

他俩站起身，朝我恭敬地鞠了一躬，走了。我很惶恐，站在原地发愣。忽然感到，他们能知错认错，本质也不坏；便赶出房门朝着他俩的背影也回了一礼。

学生从各处跑出来，他们没想到事情解决得这么顺当。有人说：“原以为向老师没脾气，谁想到发起火来也怪吓人的！”有人说：“惊心动魄呀！向老师还真是临危不惧。”

这事本也不足挂齿，我毕竟不是傻瓜，难免在心底问道：“学校当局知道这事，不少老师在场目睹，为何都不干预？如今，为什么人都如此麻木、自私和奸猾呢？”

五、侄女冯英茜来访

11月份，我见到了冯淑筠的长女冯英茜；她由新疆乌鲁木齐专

程来兰州看我。此前，我与胡依理学长取得了联系，前面我提过，他是天山化工厂总工程师，也是全国人大代表，再后来我听说他当了厂长。我们全案平反后，冯淑筠君理所当然应该得到相关待遇。但冯已蒙难，胡兄经过努力争取，使冯的两个女儿离开了河北农村，在新疆安排了工作。到这时，已将近一年了。

英茜千里迢迢来看我，为的是我与她父亲比兄弟还亲的友情。我惊奇和欣慰的是，冯君的女儿已经这么大了，她只比凤枝小一岁多，她还有一个妹妹、一个弟弟。

英茜告诉我，当年煤矿瓦斯爆炸，她父亲的两条腿都被砸断了。他拖着断腿拼命往外爬，已经离坑道口不远了。在他面前，有崩塌的巨石堵着路，那儿有个豁口，许多人从他身边跑过，由这个豁口逃生。可是无论她父亲如何哀求，就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拉他一把。冯淑筠最后被活埋在矿坑里。她的母亲原本身体不错，遭到这一打击后天天哭泣，两年下来眼睛瞎了，四十的人看上去如同六十多的老太婆。她说，父亲上大学时，我已三岁，有记性了。每次回家他都下地帮母亲干活，手脚不闲。母亲虽大字不识，他从未对母亲大声说过话。父亲待我和弟妹好，他重身教，从不打骂我们。他至诚至善，我找不出他的缺点。

英茜说的极是。如果硬要找冯兄的缺点，这便是太善良了。1957年下半年，反右最激烈的时候，我哀求他编天书揭发我，可他说宁愿自己死也决不害人。

我无法逼他，我太了解他了。

英茜听了我这一席话，眼泪夺眶而出：“我为我父亲骄傲，为有您这样的叔叔自豪。父亲、胡伯伯、您，你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你们的心比金子还金贵。”

英茜在我这儿待了二十天，我送她到兰州大学。胡晓愚先生和老吕（绥生）都来帮助她，这样她从兰大的“落办”拿到了她父亲的右派改正通知书，还有五百元困难补助。此后我们长期保持着联系，直到她结婚成家有孩子了，现在她定居在乌鲁木齐。

11月，学校又出了件大事：初中英语老师党廷显无端被殴打，

打掉了两颗门牙。老师的人身安全都无保障，这书咋教？先生挨打这种事，解放前没有过，五七年前没听说过。以后知识分子成了臭老九，这种事成了家常便饭。学校里老师们都义愤填膺，邓子珏和我尤感不平。校领导既不保护学生又不保护老师，这样不行。我找到书记刘成福，对他说道：如果厂里不严肃处理肇事者，我就不上课了！

迫于老师压力，厂里给肇事者一个记过处分。党老师请调，走了。

年底，全校老师加班加点开会，为的是调工资指标。指标不多，我们这些因落实政策调入学校者不在调工资范围内。原来就在编的老师各显神通，拼将起来。老师的工资二十多年没动过，好不容易盼到一次上升机会。虽调高一级只不过多个七八块钱，一个个都争红了眼，恨不能把对手吃了。结果，调资会变成检举揭发会、攻讦会。

“文革”的派性源远流长，各个单位无处不在。陈谷子烂糜子，无一大是大非值得一提；但这时的竞相揭发令人际关系更恶化了。成和德、彭瑞蓉夫妇不久便调走了；张有玺在厂里待不住，也走了。邓子珏老师调去了上海职大，何之明办完了出国手续。如今又走了两个正规科班出身的老师。

学校师资依然缺胳膊少腿。

我好像在梦中，坐在运牲口的闷罐车里，不知白天黑夜、东南西北，也不知是在前进还是倒车。我感觉昏昏沉沉，这个行驶了二十多年的专列，把我抛在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大雨滂沱，车陷在烂泥里，昔日与我一样挨棍子的人，不知何时也学会了打棍子。一切全变了，变得面目全非。这个社会如此陌生，我不认得了。

六、魂兮归来

1981年，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这年3月9日我当了父亲，儿子满月后，凤枝携他来与我团聚。

见她俩母子平安，儿子发育良好；我回到家里，心比蜜甜。

毕业高考临近了，学生紧张，老师更紧张。可周围环境糟透了，学校无法保证学生晚自习的安全，因为有小流氓夜里在校门口、在学生的回家路上斗殴打劫。我和其他几位老师只得每晚到学生家中去，逐个辅导答疑。待我们回到学校，已是深更半夜。校门上了锁，我们翻过铁门进入校园，回到各自的寝室。由于玩命工作，我的体重骤减到八十市斤，血压也低，高压只到五十。有时突发牙痛，满床打滚，只好半夜去医院急诊打止痛针。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肯耽误一节课。

儿子将满百日，我终于盼来了渴望已久的申诉回音。省法院刑庭庭长接待了我，他递给我一份终审判决，原文如下：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

(81) 天法刑监字第 14 号

申诉人（原审被告）向承鉴，男，汉族，现年四十一岁，原籍河南，家庭小手工业者，本人学生，现在兰州连城铝厂工作。

上列申诉人因反革命一案于一九六二年三月被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一九八〇年二月经我院复查改判为免于刑事处罚。

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现查明：

一九六〇年元月向承鉴与苗庆久在武山县刻印“星火”刊物，并亲自写稿三篇，在其文章中确有错误的观点，但不构成犯罪，一九八〇年复查时以反革命论罪，改处以免予刑事处罚不当。据此，特判决如下：

一、撤销武山县人民法院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法刑字第三十四号判决书及我院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五日（62）法刑字第十三号、（80）天法刑申字第 6 号刑事判决书；

二、对向承鉴宣告无罪；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

审判长 杜贞祥

审判员 谈世清

审判员 高志强

一九八一年四月廿八日

书记员 高玺

×庭长颇有水平，发完判决书后与我交谈了很长时间。

我对“错误”一说，心犹不服。

然而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得以苟活至今，若非全国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者之一，难道不是万幸？张志新、遇罗克上了断头台，“一打三反”中脑袋开花的有多少？那些人都只不过是所谓“诽谤”“恶毒攻击”罪。你居然秋毫无损地活了出来，还不知足么？
诚是事实，我知道的。

“错误”总有的，这件事上没有，另件事上会有。行为上没有，思想上会有。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没有错误的人在世上不存在。

说我有错误，逻辑成立，一点不亏。不过，有人比我的错误大得无边无际，一错就错掉几千万人的性命；一错就把中华民族倒拖了半个世纪！谁又指出过他的错误？

这是一场天大的官司，估计要再过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见分晓，扯清楚。终归要扯清的，能扯清的，我坚信。就如邓小平所言：留给后代去评说吧。中国的事情得慢慢来，急不得。心急的人容易脑溢血、心肌梗塞猝死。心急的人多了，血流成河。

姑且打住，这已是最好的结果了。

割掉了尾巴，我不再是半人半鬼。自1957年6月底兰大党委将我划右，我由人变鬼，到1981年4月平反，我由鬼变人。二十五年完成了一个轮回，一次否定之否定，我该歇笔了。

尾 声

许之品夫妇在 1982 年和 1984 年先后两次来找我，我也曾为许的冤案平反写申诉，终未能如愿。原因很简单，他牵扯的是现行反革命大案，涉案者都是农民和最基层的干部。他们死的死，没死的也找不到下落。许之品一人势孤力单，原来的办案人又在台上，百般推诿。山高皇帝远，有什么法子呢？在那个时代，一些农民对人民公社不满，抵触或对抗干部的贪污横行，为活命而闹粮、抢粮，被打成“反革命”的，还有被判被杀的，有的是。他们不会说不会写，无法争取到平反。在农村基层，这类被尘封土埋的冤案多得很。

1985 年，许之品因胃癌在北京病故，留下贤惠的妻子王懿和两岁的孩子。他从刑满至去世的几年中，没有工作，没有生活来源，终年奔波申诉；多亏北师大校友会对他的帮助。他病故后，北师大校友会给我发来讣告和请捐函；我当时手头紧张，只寄去了一百元，聊表心意。

许兄就这样悄悄地、了无声息地走了。1949 年他在山西投笔从戎，可还有人记得他吗？一个热血青年、一个曾在北师大俄语系当班长的调干生，一个坦诚、正直、温和、绰号叫“书呆子”的人。

1982 年 4 月，胡晓愚先生给我寄来一份《民主与法制》，内有陈伟斯所写的文章《林昭之死》；文中记叙了林昭如何被捕、她在狱中的遭遇和被处决的经过。行刑后有关方面竟向林昭的母亲索要五分钱子弹费，真是骇人听闻。林昭平反后，北大为她召开了追悼会，系主任参加并主持。胡晓愚先生附有一短信说，《星火》给那个时代刻下浓重的一笔，对我亦有谬赞。而我想到的，北大毕竟是北大，比兰大强多了。张春元、史美唐、冯淑筠、邓德银、胡学忠……死的多了，全平反了，兰大未给任何人开追悼会。北师大也比兰大好

得多，校友会给落难的许之品提供了帮助，又介绍他给人刻钢板，每张蜡纸四角钱，多少帮补一点生活开支。兰大却没有校友自助团体，兰大，你何以如此的薄情寡义？

1983年1月，为兑现诺言，我又一次携妻儿去武山探望李大娘，并在农村过了个阴历年。此前，已得悉康大伯去世；考虑到李大娘年事已高，专门给她带去了寿衣等物。宇儿其时是一岁十个月，长得活泼可爱，已能背诵多首唐诗。小儿在乡下，甚得李大娘和乡亲们疼爱。

1984年元月，根据中央文件精神，我和苗庆久返校，领到了兰州大学本科生的毕业证书。我们住在家属院内的招待所，这次逗留的时间短暂，竟碰到了两位大熟人。

一位是大一时教过我普通化学的陈佩芳先生，说来不可思议，时隔二十七年，她居然认得我，一口叫出了我的名字。我们各自叙述了经历，抱头痛哭一场。她已退休，“文革”后期由兰大调兵工部任教授级总工，这次是专程从内蒙来兰大探亲，她儿子在这里读研究生。

陈先生感慨万千，她说：“你们当时多年轻啊，太单纯了。突然一阵狂风，把你们吹得无影无踪。你们五六届入学的学生是历届中素质最好的，一个个勤奋用功，照那样子下去，说不定有人拿诺贝尔奖了。真正造孽呀！”

我说：“真正可惜的还不是我们，是从国外归来的陈时伟先生、左主任，还有像您这样的老师！”

陈先生已联系好了江苏工学院陶瓷研究所，退休后她将去那里搞超导方面研究，也算发挥余热吧。

我遇到的另一位熟人是吕佩璜，他专程由天津返校办毕业证书。那天，我去看望老同学王秋莹，在她家与吕不期而遇。他见到我，显得异常惊愕，我心说他一定以为我早不在人世了。记得我第一次回武宁时，老同学都传说我从狱中逃跑，至中苏边境被击毙了。吕既未上来拥抱我，也没说话，只是怔怔地看着我。我想，王秋莹大约没来得及告诉他我的情况。临出门他才悄声对我说：“中午请你

吃饭，我去叫你。”

我叫苗庆久陪我，苗庆久与吕佩璜没有交往但也认得。客随主便，穿过兰大对面名为一只船的窄街，吕佩璜把我和苗庆久领到汽车站旁的甘兰饭店。时值正午，买单就餐的人不少。吃着吃着，吕佩璜的眼圈红了；他不动筷子，趴在桌上啜泣。我和苗庆久劝他，他反而恸哭起来说道“老向啊，这辈子我对不起三个人，欠着三个人的，其他人我谁也不欠，还有人是欠我的。”他的话，我心里大致有数。他泣不成声，哽咽道：“我欠我父母的，再一个就是欠你老向的。我对不起你，叫你吃了好多苦、受了好多罪，不说出来，我心里痛呀！”

他翻开了二十七年前的那本旧账，尽管记忆犹新，可我早就原谅他了。因为1958年6月宣布我的罪状时，只字未提什么“反党小集团”“桃园反党会”的事。在那之前，我为此遭了许多罪。“疲劳战”煎熬了几个月，简直把骨髓都熬出来了。

“过去的早过去了，还记它做什么。”

吕佩璜自顾自地滔滔不绝：“如果不是我作孽，你不会成顽固派、死硬分子；你的处分不会那么重，不会被劳动考察。那样你不会接触到那么多社会现象，也不会半辈子在劳改队受难。这根子都在我身上。向兄啊，我欠你的太多，这辈子还不清！”

吕佩璜聪明善良，唯骨头软些。我们当时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未经见过政治运动。莫说我们这些毛头孩子，即便那些连蒋介石也奈何不得的民主党派头头脑脑们，在毛泽东亲自指挥和组织的火力下，哪个不是丢盔卸甲？

我劝他：“好了好了，甭提过去的事了。你什么也不欠我，欠账的人或许有的，肯定不是你，你不够资格！”

吕佩璜安静下来，他告诉我自己的经历：大炼钢铁逃回天津后，他当小工拉大板车，过着老鼠般的日子。“文革”在劫难逃，七斗八斗，被打得浑身是血。直到1978年右派改正，他的日子才好起来。如今他已获得助理工程师职称，是天津公交公司的一位民选场长，管理着上千辆车辆、几千工作人员。

我为他高兴。

晚上，回味吕佩璜的话，我为他的真诚所感动。而对他的“欠人的和人欠我的”一笔账，我还是不以为然。在我的经历中，几乎全是我欠人的。我欠贾义老两口的，欠张大妈、李大娘、康大伯的。他们是我的长辈，在我最艰苦的时候，待我胜于亲生儿子。我也欠着冯淑筠、胡学忠、邓德银以及一切受我株连的人，欠着劳改队的难友董剑青、张炳秋、生明辛、金克明、陈康年、蔡方士、周孔章、姚士彦、顾用之的。我欠着父母亲的，欠我姐姐的，欠我弟弟的。我还欠向医生、刘发江、金指导员，欠“那双明亮的眼睛”的。我欠给我寄棉衣、棉鞋、棉手套那位亲人的，欠张万元、罗时浣、陈竟楼、章甘雨老师的。我欠一切帮助过我，教我做人的人……我欠的数不清。

大约在1984年里，陈祖武病逝。兰大几位老同学邀我去参加他的追悼会，我婉拒了。难得同学一场，临到归西，原本应该去送。但我想到史美唐、冯淑筠、邓德银……他们都死了，谁提议过送送他们，开个追悼会？我向友人直言，何时开了史、冯、邓的追悼会，我再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吧。我确实没有不原谅死者的意思，只是觉得太不公平。

1987年，我的同学王公慰应母校邀请回校讲学。他是大连物化所研究员，刚从日本讲学回国。王秋莹邀我偕妻回校相会。王公慰已秃顶，满脸沟壑，佝背佝腰，俨然一个老头的模样，没想到他衰老得如此严重。

实验室里，公慰兄、秋莹和我正“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忽然进来个人，学者模样，形态莫若三十年前的刘有成。他是路宝田，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人，其时他和王秋莹都是兰大化学系副教授。六时过，王秋莹提议由她做东共进晚餐。我和妻婉谢了，没想到路也婉拒。我们一同来到学校后门处，食堂正开饭，小操场里端着碗的人流涌动。路宝田突然转过身向我伸出手，涨红着脸说：“向承鉴，我对不起你！万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这是三十年后一次偶遇，整个反右期间对我伤害最大的莫过于

他。呜呼，他也有良心发现的时候。我能原谅他，原谅一切人和事；毕竟我还苟活于世。可是，冯淑筠——一个至诚至善的人永远离开了人世！

我原谅他，因为他不仅是加害者，也是受害者，他的心灵受伤也许超过了我。我压根儿没想过报复他，我们各自的工作单位也没有交集，他完全可以不道歉，如今他放下副教授架子，在众目睽睽下道歉了。

他是诚心的，我相信。

这是我与她交往的一段历史，但我以为，这不属于某个人的历史，而是折射出整个民族的痛史。凡经历过的人都该反思总结，这是责任，更是义务。

2003年8月7日

初稿于江西武宁黄墩乡下小屋

后 记

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时八年，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我在炼狱是八年的三倍，不敢说取到真经，唯经历了生命的各种极限：困、累、饿、渴、病、冻、孤独与黑暗、恐怖与杀戮。我亲眼见到人世的最善最爱最哀最痛最残酷与最悲惨，百味尝尽。我对人世、社会终于有所感悟，这是倾尽我的全部生命所得到的。

为寻振兴富强之路，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比任何民族都多！但至今仍在世界落后民族之列。为什么？走错了路。

指望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强行废除私有制来达到消灭压迫与剥削、阶级和差别的目的，必造成逆选择逆淘汰，适得其反。民主与科学才是正途。

要走上正途，公权必须来自人民的委托，必须实行真正的普选制度。

有人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一个人三十岁以前不左倾，是没有良心；三十岁以后继续左倾是缺乏头脑。我是过来人，体会尤深。对前者社会应爱护，但要警惕；对后者要避免。

这里所写的一切，都是我当时的感受，反映的是我那时的认识和观念。读者不难发现，我曾是个中毒很深的人。我要强调的是：它不是我此后的认识与观念，更不是我现在的思想观念。不断地学习、反思，才能进步，我一直坚持这样做。

这部回忆录是蘸着我的血和泪写的，我依然觉得，我的笔墨所述仅仅只是我真实感受的百分之一。但愿它能勾起同代人一些回忆和反思，给年轻人和未来者一点借鉴。想起众多死去的友朋，我只能做这一点事，寄托我无尽的哀思。

向承鉴

2003年8月8日4时

附录一：向承鉴为《星火》所撰的六篇文章稿

编者注：以下六篇文章稿中，前三篇刊印于《星火》第一期；后三篇是为《星火》第二期准备的文稿，未能刊印。六篇文章均由《星火》案蒙难者谭蝉雪老师辗转寻觅，多方求索，终于得以从狱方保留的案卷中获得。谭蝉雪老师从复印件中甄别文字，录入电脑，并收入谭蝉雪编著：《星火——兰州大学“右派反革命集团案”纪实》（国史出版社，网址：www.mirrorbooks.com），特此鸣谢！

文稿一：目前形势及我们的任务

一、目前的国际情况

第一：在现代，帝国主义的活动地盘虽然大大减少，殖民主义在许多地区已经瓦解，但是它们却仍然千方百计，坚持着对国内国外的压迫和掠夺，并企图恢复和扩大它们的霸权，并且在帝国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也在加剧。

许多殖民地已经取得独立，其它殖民地人民也正在为自己的民族独立和自由作出日益激烈、日益有成效的斗争。

各个中立而中立程度和倾向又各不相同的国家，为了自身利益对大国和不同政治体系的集团表现出不稳定的态度。

社会主义国家在外国国内重重矛盾和困难中艰难的前进。其中有些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自[*漏字“身”]推行错误政策的结果，使得经济消退和政治反动。

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直接矛[*漏字“盾”]和冲突，对于殖民地运动的支持和镇压，对于不同中立国家的争取以及由此所表现出来的手段和现象，所有一切国家间的相互作用、矛盾、影响，使得国际情况异常的复杂和尖锐（它不可能稳定的朝着缓和的方向发展），局部或由局部而导致大规模战争的危险性仍然存在。

但是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教训，爱好和平的力量正在迅速的加强和壮大，使得越来越可能克服新战争的威胁。（两个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发生作用）。

第二：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正在发生着越来越明显的分裂，这分裂是由于反修正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斗争而导致的。随着反修正主义和反教条主义的加剧，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空前的混乱局面，使得国际工人运动和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非常困难和缓慢，甚至出现了危机。

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思想垄断和国家集权（其实就是党的绝对领导）的恶性发展，由于一个或数个带着“真正马列主义”衔的政治寡头的思想方法日益主观唯心、反动变质，已经造成了可悲的结果，还有些国家也面临着这个暗黑的深渊。

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之间，以及一些国家内部的这些情况产生的根源在于：在阐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还是一个空白，为填补这个空白所出现的理论还没有得到统一和公认。

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个别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和学者为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了填补这个理论上的空白，为了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对那些具有雄厚背景而企图进行思想垄断的所谓的“真正马列主义者”——而其实是对马列主义作了实用主义修正的人们——作了最坚决有力的斗争。这个斗争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和支持，它振奋了人们[对]真理的信心，给国际工人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开辟了新途径。

国际关系的第三个特点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统治者（他们假借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对国内人民实行反科学、反人性的法西斯化

官僚独裁统治，和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金色牛皮的识破，中国的国际地位日落千丈，并且处于空前孤立的处境。

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对几个主要经济指数悬殊的更改，是它牛皮吹碎和迫不得已的表现（其实还是吹牛！）

在国际上没有看清中国大跃进其实是大跃退、人民日报所吹嘘的“钢铁翻一番”“稻谷亩产万斤”等等伟绩真象的人只有那些头脑特别简单和不愿用眼睛的人。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看清了中国当代统治者的反动、变质的也大有人在。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统一工人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见四月五日人民日报*），深刻地分析和暗示了中国当代统治者的“美好”未来。（请参考本期《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赫鲁晓夫》一文）

中国统治集团在国际上的景况取决于它在本国的施政和人民的情绪，应该肯定，它将越来越孤立，它的真面目很快就要在世界舆论和人民面前全面的剖露了。

二、国内情况

甲、恶性发展

从总的方面来看，共产党在取代了国民党的统治之后，把中国社会向前推进了一步的事实，但是 1957 年整风运动以后的事实表明，它们正在努力把中国倒退两步的工作。

当代统治者在历次运动中都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和做法：以主观臆测代替客观实在和它的没有法制，它使得许多无辜者在心灵、肉体上受到重大的创伤，使数以万计的生灵变成冤魂。

应该指出：当代统治者的这种穷凶恶极、灭绝人性的做法是与时俱增的，在解放初的运动中只是部分、甚至个别现象。

虽然共产党在 1957 年以前，犯了许多重大的错误和罪行，已经使人民群众不能忘记，但由于它以前给人民做了一些好事，大多数人期望它改邪归正，但这种期望被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彻底粉碎了。

反右运动虽然使许多人失去生命、变成囚犯、神经失常、失去家庭、爱人，但得到的却是亿万人对当代统治者本质的认识。

反右运动使当代统治者在道义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整风运动和反右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共产党质变的起点，从此它就失却了改好的可能性，开始公开走上与人民为敌、与道义、人性为敌的道路，步入反动的深渊。

反右运动之后的双反、交心、拔白旗等运动是反右的继续，这几次运动将全国人民的精神面貌作了彻底的变革。

人民公社化运动实际上是整风、反右运动的必然产物，统治者为了使人民驯服，对人民群众物质的、精神的一切所有实行彻底的剥夺，使人民依附它，并强迫以军事组织形式将农民编制起来，实行奴隶式的集体劳动。

人民公社的最反动性在于它拆散家庭、使父母妻儿东西南北，这是对人性最基本特征的否定。

共产党标榜人民公社的最大优越性之一是它的大协作精神，而这恰是它的主要症结之一，以公社或管区（生产大队）为单位实行劳力统一调配，其实质是将定居变为“游牧”。在无常的运动中物质、时间、体力的消耗使生产效率大大减低。

大闹钢铁运动是自然科学的复古（反科学、反客观发展规律），它的结果在于数不清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数以万计的人命牺牲和数年来国库储存消耗殆尽。（至今，许多生产队还欠下农民一个劳动力 200 元）。

大闹钢铁运动是一个或几个政治寡头头脑发胀、愚蠢无知的最明显表现。（由此观之他们早应该滚出庄严的宝座去与三岁小儿玩球的。）

大跃进完完全全是一次数字上的自欺欺人的把戏，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到处兴办了没有一个工人的工厂，没有一个学生的学校，只[有]一只猪的猪场，没有一只鸡的鸡场，那些报纸上醒目的红色数字增产比赛，使人不感到惊奇，并习以为常！

目前在党内展开的反右倾运动证明：在统治集团内部已有很大

一部分不同意继续执行这种反动的政策，它的实质和表现是：共产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空前大分裂。

乙、各阶级、阶层的情况

由于狂妄自大、愚蠢无知和主观唯心；由于反科学、反马列主义、反人性，当代统治者已经彻底地背叛了工农群众利益，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使自己失去了群众基础，得下了不能诊治的极症。

由于一切的被剥夺（连同基本人权），农民已经成为无产阶级，并且无产阶级品性日益明显地在他们身上呈现和成长起来。（虽然在思想意识上他们还保有农民的大部分特性）。

农民同当代统治者的矛盾及其尖锐性突出地表现在粮食问题上。现在全国农民都处于饥饿的死亡线上，他们奄奄待毙（而且有许多地区已经饿死了不少的人）。而当代统治者还强制农民（开辩论会——打人会等）拿出24分的干劲，作24小时连续的苦战（平常最少也达12小时），农民恨之入骨，他们的情绪是跃跃欲试，一触即发，（事实上小规模农民暴动已满地星火了）。

根据过去的经验，当代统治者很了解工人阶级的团结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因此待工人阶级较之于农民要“宽厚”些，但是除了一些大城市附近的可数的大工厂外，大部分工人状况也并不比农民好多少。

由于无休止的加班、加点的红旗竞赛，不断加强劳动强度，严厉的惩罚制度（减薪和开除等），恶劣的劳动条件，使工人精神和体力终年终月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过高的劳动定额，使他们失去了应得的劳动报酬，工人阶级的不满情绪和反抗也在迅速的加强。

知识分子在历次运动中很熟悉当代统治者的习性。而它们也在57年里记尽了知识分子的作用和可惧影响，很快地加强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控制（他们谓之曰“改造”，当然知识分子必须改造）。引诱、拉拢和利用一些市侩式文人、学者参加共产党，为他们做招牌，替它们歌功颂德，打击和迫害一批追求真理的人（这之中特别是大学生），企图驯服、稳定知识分子阶层的局面。

由于知识分子的摇动和两面性，当代统治者的分化手段也确实起了一些作用。目前知识分子情况的主流是幻想改良、悲观失望、消极反抗。它的综合表象是：所有的会议和学术上等等场合，冷冷清清，一言不发。

知识分子的转化和发展还表现在：那些由于受蒙蔽而在反右中的“积极”者，日益越来越感到受到良心上的自责，而对被迫害者越来越敢于表现出同情和友好。

在军队中不久前发生众所周知的“彭总事件”，这表明军队中上层领导的分化。军人一般出身于农民家庭，对于目前农民情况绝不会一无所知，对于军人生活上的照顾和思想、行动上的特殊管制，将不能阻挡他们思想认识的转变。

现在的军队自然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但由于军队组织、纪律的特点，它很可能随时随刻被用来反人民。军队组织、纪律的特点，和军人由于对现实认识的转变，将使军队出现混乱的局面。

反右倾运动的积极意义在于：第一，使国内形势急转直下，这样虽然使人民遭到更严酷的统治和迫害，但古语说：“长痛不如短痛”，当代统治者的死期也愈加逼近了。

第二，又有一批人受到了政治运动的洗礼，从而提示[升]了他们的认识，这些人（并非全部）将可能为劳动人民的真正解放和幸福做出有益的贡献（当然，还必须提高认识、改造自己）。

一个新兴的官僚统治阶层，在 57 年之前就己萌芽，但在 57 年后，它的特征才清楚和完美起来。官僚统治阶层的特征在于：在政治上、精神上和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对其它阶层人民进行欺压、掠夺和奴役。

目前国内总的形势是：

由于当代统治者推行各种各样反动政策的结果，工农业生产生产力已遭到全面的毁灭性的破坏；由于以所谓的“党性”代替个性和人性，而实际是强赐人民的“奴性”，人与人的关系到了空前虚伪的程度；由于变化无常和没有法制，人民基本人权被剥夺，每时每刻

都遭受着生命的危机，由此而反映出来的现象（全国范围内）是：政治运动鱼贯而来，各种刑事案件激增（凶杀、偷盗），市场供应紧张，农民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烽火满地。在政治上、人民精神面貌上、经济上出现了全面紧张和混乱。

当代统治者在国内、外已经陷于空前孤立、四面楚歌的境地，它的地位已经摇摇欲坠。

三、我们的任务

面临着国内外这种形势，我们目前的任务是：唤起人民，放弃幻想，统一行动，准备战斗！

为了适应即将来到的全民行动的需要，在理论上应该努力从事于客观规律的研究，从而填补马列主义学说在阐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理论空白，发展科学的马列主义学说，和指导我们的行动。

我们应该大胆，由于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为了工农劳苦大众的幸福、科学的社会主义，工人农民是推翻现政权的力量保证。我们应该大胆而果断的在工人、农民中展开工作，启发他们对当代统治者本质的认识，引导他们将暴乱自发的行动变成统一自觉的行动。还必须启发知识分子的热情和理智，因为他们能为革命作出重要的贡献。

我们绝不容许混水摸鱼的现象，我们永志反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以及其代表的反动阶级），我们将以革命手段对待那些来自自己死亡阶级的任何妄想。

全国的百姓们，赶快醒来吧！民主、自由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曙光已经升起了，让我们团结一致，为迅速彻底地摧毁当代的法西斯化的官僚统治而奋斗！

*编者注：《赫鲁晓夫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全文见1959年12月3日《人民日报》第5版。

文稿二：自白

我们信奉的是遵从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的马列主义真理（我们认为马列主义决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对于任何东西——人物、主义等的绝对崇拜，决非真正的马列主义者。）它必须是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和能体现人民群众（特别是劳苦工农）的意志。我们反对的是已腐朽透顶而自己标榜为英明伟大所谓共产党的现政权，并且（*将）矢志不移的为彻底摧毁它而奋斗。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使工农劳苦大众幸福、人人平等、自由的社会。目前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社会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最终的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文稿三：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当代统治者在叫喊英明、伟大、绝对正确之余，最近也突然谦虚起来（其实是不得不如此），承认它们的各方面工作缺点和成绩有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但是如像其它所有的一样，当代统治者惯用颠倒黑白的技术，这两个数字的颠倒也是自然应当的。

当代统治者经常教训人们要看事物发展，要看主流，我们现在也不妨来看看主流。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 80%以上，农民的情况是现在社会情况的主流，这是无可置疑的。

由于当代统治者的愚蠢无知，在农业上强行采取一些反科学的措施，使得许多土地减产，并且随之以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实行其他一系列的错误政策，目前农村生产遭到了可怕的破坏。

农民的情况是：吃不得饱，穿不能暖，处在饥寒交迫的死亡线上。目前全国许多农村成年农民口粮不到 20 斤，还有些省份的农村农民口粮每天只有三两，他们把苞谷棒视为高级食粮，以野菜、树叶等充饥。在今年阴历三、四月间，有一个县就饿死了一万多人，有一个生产队就饿死了 180 人之多。槐树叶就吃光了三次，柳树叶吃光了一次。全国农民除了在阴历年时沾了点油外，全年都没沾着油，（有情况特别好和位于大城市附近的，在伟大的国庆十年大典那天吃了八钱油！）许多老年人厌世自杀了。而就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还在无休止的向农民搜括、掠夺，并且强制农民拿出 24 份的干劲，24 小时的日夜苦战。如果农民一旦有点不满情绪，那些无法无天的干部就可以随时随刻召开所谓“辩论会”（其实就是打人会。）不是捆绑法办就是打得死去活来。

这就是“社会主义”给农民在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恩赐，这就是农民从当代统治者那里得到的幸福生活！

是那些繁华的都市、那些只供官僚们“办公”享受用的大楼，那些只供外宾们参观的设备，是那几个国家供了大量补贴的公社典型、是城市里穿皮夹克带手表人数的增多是主流是九个指头呢？还是80%以上人口的农民是九个指头呢？

文稿四：不打自招

——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

孺子牛

根据中共中央 8 月 10 日发出的文件，人民日报在本月初发表了《南泥湾的方向》的社论。

这篇社论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我国内外形势良好”；“大跃进，持续跃进”；“XX 翻一番增几倍”的口头禅【禅】不见了，我们倒从满篇的“艰苦、困难”里听出悲惨的哭音。难怪，夏天已经过去，秋风正横扫老朽的树叶，并且，按照自然的法则，严冬也就要到来了，蝉儿们还有什么可叫的哩！

这篇社论本身说明了这样的事实：（这是当局最最害怕啊！）金色的牛皮吹破了！同时也证明了：无论动员怎样多的力量来缝补这个大牛皮，哪怕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利用组织力量甚至军事暴力，在事实面前他们终是白费力气！（因为事实是客观真理——即绝对真理，而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奇怪！自从 1957 年反右派之后，我们一直从中共领导人嘴里听到：“气象一新”“钢、粮翻一番”“大跃进”“稻谷亩产 XX 斤”、钢棉粮煤提前两年完成五年计划、形势空前良好、继续跃进等一连串振奋人心的捷报。怎么？有人问：我们怎么“跃”到南泥湾那儿去了呢？奇怪！

的确，在中共的“英明”“正确”领导下，我们终于被飞速的“跃进”带到南泥湾的那里和那时了。睁眼一看（当局者说：我们中共是绝对正确的，你们要绝对服从，闭上眼睛跟着我走。所以我们一直不敢睁开眼过，因为知道许多试图睁眼的人都倒了霉，我们再不敢了。）钢丝床是没有的，每日半斤肉、四两糖也是没有的，

所谓的康庄大道不见了，却是悬崖峭壁、穷途末路，原来！我们受骗了！

从《南泥湾的方向》这个社论的题名里，当局者给了我们这样的暗示：现在全国的情况和南泥湾的那地那时一样；并且：那时那里的困难能够克服，而且被克服了，现在也能一样。（对当局者来说，能作这种公开承认和暗示，该是一个多大的让步！）不！完全不一样，我们不愿受骗了，我们不但要睁开眼看看，而且要作现在的情况之所以与南泥湾的那时完全不一样的比较：

首先，程度上大有不同。那时解放区正是小日本、蒋介石展开了殊死的搏斗，一切为了战争、前线，极大一部分的物力、人力、财力均消耗在战斗上，而当时解放区还小，这种担子相对来说应该是极重的了。但是南泥湾的那时，不管饿死人民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说明解放区的人民力量（人力、物力、财力）尚有盈余，景况并不太坏。如今，全国范围内除少量的军事行动外，不曾有大规模的战争，大部分待戈的军队边训练边生产还能自给自足（据报称），因此，有充分的理由证明，现在在我们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全国范围内对于一小部分有军事行动（就算全部军队吧）的军队，给人民造成的负担是微不足道的，与南泥湾那时战争给人民的负担相比只千一而已，彼此相较，现在理应好得多了，可是我们所见刚反：“饥饿笼罩着全国，到处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扶老携幼，沿门求乞（而不可得！），铁路公路饿殍野尸屡见不鲜，荒山野岭白骨铺地，豺狼抢食，食人！食人！”

文稿五：

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

——目前农村剖视之一

同志，你问我目前农村的情况吗？那什么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咯，生产积极性生产力咯，生产关系咯，我可说不上，连什么叫生产力我都不懂得。不过，同志，如果你愿听，不嫌麻烦的话，我倒可以把我一天里的事情讲给你听，如对你有用你就记下，没用就算扯淡好了。

不知是谁接二连三的摇我的胳膊，使我醒来了。妈妈说：“快起来吧，上工的哨子已经吹了半天了。”我用了很大的力量想动一动我的身子，但它像被十二捆疲倦的麻绳捆在床上，我用力想睁开我的眼，但我的眼皮比几十斤的钻头还要重，我哼了一声，又睡了。但妈妈又把我摇醒了，说：“再不起可了不得了！昨晚的辩论会就要临到你头上了！”妈妈一提到辩论会，我的瞌睡立刻吓的走了大半，自从大闹钢铁到如今，村里一半多人都吃过那味道，昨晚上的辩论会上，王家老二被人用拳头脚踢打倒到地上好几回，又拉起来，最后拉不起来，就为的是前几日上工太迟的缘故。妈妈又接着说：“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我就不能看见你受那么的刑，儿啦，好汉不吃眼前亏，我们惹不起那些当权的東西，那些畜牲啊！”

我起来了，穿上我那土改那年做的破短袄，妈妈怕我冷，又把父亲留下的破长袄披在我身上。父亲是上个月饿死的，那是因为食堂的门关了，自留地收的150斤谷也被他们从地底下寻到，（还说我家是人家的哩！）屋后面的几棵榆树皮已剥吃光了，远处已早被人家剥去了，只剩下管理区周围没人捋，我弟弟偷偷地去剥，被夺去了斧头和刀子，说这是破坏树木，还绑关了几天，“鞭抡”了一阵。而门前沟边的柳树却还刚发芽，未长叶，吃不成才饿死的。像这样

饿死的人才多呢！光我家和我亲戚中就有我父亲和我的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我外祖父、外祖母、我三叔和我岳母，我随便算了一下，全村 340 多人。要不是这几天毛主席突然长了眼，供应了，那我妈妈和我老婆也早到另一个世界了，就有我存根，我还算落了好些哩。最近政府也在统计饿死的人数，据他们说只有 63 个，我感到好奇怪，他们一向数字大功劳大的，这次第一次把自己的功劳说小了，我估约至少说少了一半罢！

我揉了揉眼，用腰带扎紧了，担了一担土箕出门来。我一出门便打了一个哆嗦，好冷啊！望了天上三星将沉，启明星有五尺来高了，我细算了一下，昨晚上大概睡了两个时辰，比起大跃进和以往的日子，不算睡得最多的也算很多的了，咳，不过现在大跃进一天等于 20 年，只怕一天一夜睡两个时辰多得太不像话了吧！这时从村东头又传来了一阵的哨子的“嘶嘶”声，和粗呷的喊骂声：“王家老二，你想死了吗？昨晚罚定你第一个上工，你还死得不起来！”天虽然黑得很，但我听得出来这是赵队长的声音：“你哭！你装病！装死！今晚才叫你好看呢！”这赵队长工作可负责任哩，每天天不亮他自己扛个铁锨，总是抖擞精神、气势汹汹的，他是社里的党支部委员，又是队的财经委员（会计吧！），别看他管不了社员的吃，可是把自己的伙食倒安排计划得好，不但他自己，连他家的人都没饿着，都是肥头大耳的！他不管自己的工作，可把社员的工作活计倒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按照他的安排 24 小时每一秒钟都不会浪费，他总是天没亮就叫（骂）社员上地，一年到头天天如此。

我怕错过一道去上工的时候，就带上工具到每天集中的地方等着。这是一个畜牲棚，棚面前是个不大的场子。牲口房很大，长长的两大排，原先刚土改时，我们每家都有 1.5 ~ 2 个牲口，有的人还有全家子分到 4 ~ 5 口的呢！刚入社时牲口房满满的，小的牲口还得另存，有的被挤坏或踏死呢！可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搞的，全队原先有 60 多对牲畜，现在只剩下 11 对了，而你听连声音都听不见了，要是过去你老远就能听见这里“咕嚙”“咕嚙”的响声呢！……我想着想着，可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突然哨子和队长的

骂声把我惊醒，真可怕呀！我连忙打开眼一看，还好，还没来一个人哩！我还以为人都到齐已去上工了，队长专门来找我骂我的呢！东方一片红光，有个别早醒的鸟在飞在叫了，天还没大亮，我在连接不断的哨声和队长的骂声中，就又糊里糊涂睡着了……

我第二次惊醒了，并且出了一身的冷汗，那是由于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来的、坐在我旁边一块大石头上打盹的细毛（我的邻居），因瞌睡而栽倒在旁边放着的土箕上，弄得“咔嚓”一声响。他是一个11岁的小孩，脸面瘦得像小猴一般，这时正将头从土箕里慢慢地很困难地爬起来。天已经大亮了，我看见他的额头上被土箕扎得直流血，不知什么缘故，他没有哭，甚至连哼一声也没有。说真的，现在我们都流眼泪了，哪怕遇见最伤心最痛的事，例如我父亲临死的时候直瞪瞪地望着墙上的毛主席的像，又望望妈妈和我，可是我和妈妈连一滴眼泪都没掉，不过妈妈叫我把那像撕下了（她自己那时已饿得不能下床）。我赶忙帮细毛擦掉头上的血，并扯了一条我的大毛巾（指擦汗巾——记者注）帮他捆包了。这时我望望四周，看见了一二十个妇女、男人（多半都是年轻的像我一样），也都乱七八糟东倒西歪地睡在场地上、草上，或坐在石头上，而赵队长也坐在磨床石的一个碾石上打盹（他也困了），其中有几个人被细毛的摔跤声惊醒，揉着极困的睡眼朝我这里望。

赵队长也突然醒来了，他立刻站起来吹了一声哨子，我看见许多睡梦中的人被吓得跳起来，大家都索索的发抖！“这些好吃懒做的死猪！怎么还没来齐！”他望望众人之后骂道：“好，夜晚让驻社干部和你们这些流氓算账！”他立刻给我们分了工：五个人将牛粪送到西村的地里；十四个人犁土岗下面的老地，我被分配为挑粪。（原先我这队有75个全劳力）。

赵队长分配完工作带着嘀嘀咕咕的骂语和恶狠狠的神态走了，他有他更重要的工作要做（睡觉）。

我试着挑担子，但是第一次却没有挑起来，我不禁再望望担子，看它到底能有多少重，我很冷静地估计了一下（但这也不免夸大），两小半土箕牛粪最多50斤，但为何这等重！我今年26岁，身体从

不生病，以前能挑起 300 斤担子，常日挑 150 满不在乎，这会儿 50 斤竟变成了 5000 斤那么重，真真的古怪！我望了望别的同伴们，还都不如我呢！我再鼓了鼓劲，终于挑起来了。

将牛粪由东送到西头要经过全村子，我正担到村里时，一家门前围着三个人在看什么东西，我也累了，便也放下担子看看；原来是一个饿死了的人，旁边一个人说：“这是吴婶的亲弟弟，也是因为肚子的事来请姐姐帮忙的，但是如今谁不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可怜吴婶有 15 天不能下床了，家里都夭亡了，她弟弟昨晚来，她都不能下床来开门，她弟弟看见帮助没希望想走，可怜连这门口的小沟都过不来，我眼看着他在过这沟时候倒了就再也没起来过，可怜吴婶听见她弟弟这样也就完了。可怜……”说话的是个女人，她哭了。为什么要哭呢？我就不哭，我父亲死了我就没哭，我孩子死了我也没哭，人反正是要死的嘛！咳！

我的同伴们把粪倒在地里，就寻起野菜和草根起来。说实在话，肚子实在饿得惨啊，我恨不得将泥土、牛粪往嘴里放！我挖到了好几棵野猪草，就快得不能再快地将它吞到肚里，连泥巴和叶子上的粪尿，我还寻到了一个小烂薯，那是去年的存货，咳！要是这些存货再多一个（！）又有多好啊！

我寻累了，望望我的同伴，已经有三个因为收获不大而厌倦得睡了，我也就倒在地上睡了。我睡得正糊里糊涂，张家老五把我叫醒了。他说：“差不多了，咱们该往回走了，红眼睛的人来了又麻烦。”于是我们就往回走。果然不错，我们走到鲍姓庄子门口碰上了眼睛睡得红红的赵队长，他问：“你们挑几趟？看你们一个个任务完成了没有？”张家老五回道：“我们挑了十好几趟，每人都超额过了一万斤呢！”现在我们都学会了“以虚带实”，把五十或一百斤说成一万斤，不是吗？按照党提的一天等于 20 年的口号，把任何东西都该放大 7000 倍才成，要不就是落后保守分子，要挨“鞭抡”（辩论）了，谁还敢不响应党的号召呢！？

我这就到食堂去吃饭，早上吃的是黑麸饭，每人 6 两，另外还有两勺子菜汤。说实话，这些以前连牲口都不吃，可我家土改时是

贫农啊！但这时望见眼就红了，恨不得盛饭的人盛多一点才好。没吃之前想一口全吞了，可到了嘴边又舍不得，害怕一下吃光了，我就慢慢地嚼。哎呀！你可不知道那黑麸皮饭该有多香，以后好了万万不要喂给牲口吃，多可惜哟！我吃完后又帮我妈妈和老婆打饭，她们两个打作两处，就这样各吃各的，她们还吵嘴哩。妈妈骂我偏心我老婆，说我把多的浓的给她吃了，或说我偷了；可我老婆呢也是这样骂我，叫我真为难。说实在话，我可从来没有偏心过哪一面，食堂怎么打的，我原样带回家。有什么办法呢，国家只给我“照顾”这么多嘛，另外做饭的、管伙的还要多吃一点，你看，要不然他们一个个的脸上为什么都红红的？还有哩，你看，那厨房东边小屋里，有七、八个干部正围着桌子一边谈笑一边吃着，那碗里不但是白面条，还带肉哩。咯！社里这些日子牲口也天天有饿死的，那些可怜的牲口全进了他们的肚子了，我们可没闻到一点味呢！不过，话说回来，他们吃得好，我可没有半点不满意的，他们都认得几个字，会骂人，还会对大干部笑，本领可大哟，那能和我们农民相比！我想他们的祖先都是积了阴德的吧。你看，我们不是只能吃这些、吃这么多吗？他们骂我，真亏人啊！不过，也不要紧，俗话说：人正不怕影子歪。

刚走到家里，上工的哨子就响了，跟早晨的一样，哨子吹了两个钟头左右大家才去了。说来也怪，“辩论会”几乎晚晚都要开，大部分的人都尝过“鞭抡”的厉害，可大家反倒不害怕哨子了。说实在话，连我心里也松了许多。可1957年以前，哨子只要吹两三声人都到齐了。你看，十点上工的，这会太阳都歪西了人还没有到齐呢！我想大家不太害怕了也不是没有原因的，辩论会开的还跟以前一样多，可打人的人比以前少了些，或是打得没有以前那么有劲了。1958年的时候，粮食有一个时候不定量，人都很有劲，打一拳、踢一脚都了不得。可现在就不是那么难受了，再说也都不愿打人了，大家想：今天打别人，明天说不定自己挨打，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吗？何苦呢！虽然这话不对可也有点理，另外，我们农民里如今有力打人的真不多了，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今天下土呢还是明天，为什么

在下土前还要结下怨仇呢？

中午上工本没什么事发生，可赵队长总不喜欢大家太平静的。他一见张家老五就骂：“小杂种！你明明只挑了一担30斤，说什么挑了十几担几千斤，你敢胡吹牛皮，你胆敢骗你老祖宗，好，今晚上瞧！”赵队长说我们胡吹牛皮，我想这就怪了，去年你把十五亩快熟的苞谷连根挖起来栽到一亩地里，报苞谷亩产两万零五斤，有谁说你吹牛皮了！报上登稻谷亩产两万斤，谁说吹牛皮啦，为什么我们就是吹牛皮了！按照党的精神，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就是吹牛，这么说就是党的话是吹牛或党号召我们吹牛了咯！那还了得，我看你也是睡糊涂、吃糊涂了吧！

话虽如此说，经他这么一骂，整个下午我的心头都忐忑不安，大家也是这样子。按以往中午也是挑一回的，这次可挑了两回，每人两千斤了。我看见张家老五每次都挑得特别多，压得东倒西歪；有好几次都差点摔倒在路上，因为“红眼”队长每次都红着眼瞧他呢！这张家老五也真可怜，父母亲和小弟弟在2月间都死了，如今只剩下他和他妹子们，原先该是多么可爱聪明的小家伙啊！

你要我谈谈生产力吗？天哪，我连什么是生产力还不懂，你要我算账？啊，大概是这样的，如果是同样远的路，以前我每天能担30趟，可现在只3趟。以前每趟最少能担150斤，可现在每趟最多能担50斤。合起来算就是，过去干一天，现在干一月。你问我为什会这样？那我可不会说了，不过那时我每天吃三斤多，还有油、肉、菜咯！

你问我有什么感想吗？为什么不起来反对共产党？唉，同志，你这样问我可是冤枉我了，我对共产党可热爱得很哟！我一点感想都没有。再说，反共产党谁来领导，又怎么个反法呢？共产党可聪明厉害得很哩……

好了，又叫开会了，我不能再陪你谈了，我心里总想着张家老五，说不定我还要挨“抡”哩，不过又听说今晚开会布置夜战的，这是应该的，苞谷再不种就不能熟了。

1960.4.19.3时

文稿六：告全国人民书

全国的父老兄弟们、姐妹们、全体同胞们！

我们再也不能忍受了，59年、60年血的教训我们决不能忘记！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我们用木板、桌子、门、床做的棺材埋葬了我们的亲人，【用】柜子或草席埋葬了我们的亲人，最后我们不得不把自己的亲人葬在门前的院子里，葬在家里，葬在床面前所挖的坑里，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是濒于饿死的人。我们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不知道自己死在今天或明天，我们已经没有力量来拿动亲人的尸体。我们看见了其他的人死后的尸体在炕上或床上躺了十几天、二十几天，臭了，没人管！同胞们！你们一定看见了：在高山、在平地、在大路旁、小路上、在车站、在家门口，那衣衫褴褛、平展四肢、眼球突出、嘴巴张大的年老人、年轻人、妇女和小孩的惨象吧！或许你自己的亲人中就有成这种冤魂的！全国的父老兄弟们、姐妹们、全体同胞们！我们已经看见了，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什么都该清楚明白了！这是在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对人性、对生命的浩劫啊！

当代统治者不管它说得多么漂亮，所谓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等等运动任何用马列主义的美丽招牌来解释、来标榜，但我们不再受骗了，我们早就明白了。当数百万、数千万的农民饿死在床上、在火车上、在铁路旁、在沟底，当数亿（四亿）人民濒于饿死的时候，当其他二亿人也半饥半饱的时候，那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勤务员”的畜牲们，却在商店的后面可以买到任何的点心、饼干、糖果、中华烟、前门烟；他们可以在任何农村食堂里吃得饱饱的扬长而去（谁敢问他们要粮票）。而且他们一到饭就端上来了，真做到了随到随吃。57、58、59运动后，干部在群众头上建立了崇高的威信，他们可以恣意的开盛大的宴会，以便能得到“贵宾”们在酒足饭饱之后的几句恭维话。像这样的宴会一次

就要花 5000 农民劳动一整年，在北京等大都市天天皆是。一句话，他们变了，他们脱胎换骨了！彻底变了！他们从 57 年之后已经正式形成了一个官僚统治集团，他们是人民大众的老爷，他们是把国不当国、民不当民、贪得无厌、花得不倦的浪子，是一个夸夸其谈、自吹自擂、不懂装懂的资产阶级的轻浮的花花公子，是一个以无偿的受淫换取捧场的下流女戏子，更是一个在半有知半无知中罪大恶极的土匪、强盗。

彻底变了！刘少奇、陈毅的老婆为什么只有 20 妙龄、漂亮无比，可是他们自己却是 50 开外的老妖魔了！许许多多的大中干部们为什么离弃与自己同甘苦共患难过的女人，另有新配？从反右倾中揭露出来的无数事实可表明，无数的干部老爷们强霸民家妻女，在他们工作过的地点设下 10-20 个暗窑，恣意作乐！他们变了，在他们身上连每根毫发都不是人的东西了，这些畜牲！

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全体同胞们！中国人民被这群牲口杀得较【够】多了，农民死得已经较【够】多了，死去的冤魂在向我们作证。同胞们，我们千万不能说：他们死他们的，等死到我们头上再说！同胞们！如果那些死去的人是我们的父亲、母亲或者妻子、儿女，我们会有怎样的感觉呢？难道你的良心会无动于衷吗？如果说我们现在不积极行动，那么等死面临我们自己的时候，又有谁来帮助和拯救我们呢？恐怕到那时或许人都死光了吧！同胞们，我们千万不能这样打算，这是奴才的哲学！这是统治者要把我们分批杀尽的技术和战略！因此，我们只有团结起来互相救助，只有这样才能自救。

全国父老兄弟姐妹们，全体同胞们！为土地、为自由、为粮食、为我们不至于饿死、为生存、为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团结起来，积极行动起来，准备战斗！唯有战斗，无情的斗争，把那些杀人的统治者、在我们面前横行霸道的畜牲统统消灭绝，才是我们生命的唯一出路！

*以上三篇为《星火》第二期稿件（未能刻印刊出）

附录二：向承鉴：大饥荒让我们彻底清醒

——寻访“星火”连载四

江雪

3月初的南方，天还冷，夜里有雨，清早积水成片。向承鉴穿一件黑大衣，背着手，走过湖边。“这里都是桂花树，香着哪！”仿佛只有此刻，那苍凉的声音才有了一丝欢悦，银发也愉快地颤动了。

桂花的香，能让他隐约找到一些童年的气味，仿佛故乡还在。而其实，故乡早已沉入水底，那是1965年大修水库时的事了。那年，他27岁，因为“星火”案，正在千里之外的青海高原，熬炼于十八年囚徒岁月。

2010年，向承鉴七十二岁了，才从兰州回到这座江西小城。县城早已迁址重建。他倾囊买下湖边的一套房子，自己看着装修了，安顿下来。妻子总是抱怨，说这里菜太贵，冬天又没暖气，不如兰州。他却喜欢这里的静，还有房前屋后的桂花。

九死一生，晚年能得一片安宁，他很满足，又不满足。他拒绝老伙伴们的建议，“少回忆，多养生锻炼”。绞尽脑汁，他还在追问那些纠缠了他一生的噩梦，以及噩梦的根源。关于自己，关于这个国家。

一本《炼狱归魂》的自传，三十七万字，1998年从中学退休后就开始动笔，十年前已完成。一笔一笔，蝇头小楷，用中学的大开作文纸，写了将近九百页。妻子一字字帮他打印出来。当然是无法出版。

2014年，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二本书《马克思主义之异见与反思》，并在香港出版。书出来之前，不知怎么，惊动了相关部门。兰州方面来了三个人，包括当地一位官员。他们来武宁登门拜访。未

见面前，先去找了他的哥哥、弟弟，一生为他饱受惊吓的亲人，如今垂垂老矣，再次为他胆战心惊。

来人接连三天登门。坐沙发上，为他倒茶、点烟，但语气很硬，就是希望他不要出这本书。无奈，他联系出版社，但人家答复书已付印了，要履行合同，不能毁约。对方无奈，最终悻悻离去。

那之后，他和外界联系更少了。“我这一生，连累了很多。再也不想给亲友带来麻烦了。”他说。

好在还有互联网。他七十八岁了，睡眠少，每天清早六七点就起来上网。阳台改装的小书房里，先浏览新闻。偶尔看看电视上的体育节目。围棋，以及各种球类，都是他喜欢的。也会看看股票，很多年，他用两万元炒股，“为了验证自己对政治经济学的一些看法。”还有点收获。

夜里，一般都是读书，偶尔陪老伴儿看看电视剧。至于《新闻联播》，是极少看的。

他向北方来的晚辈回忆起过去。深深地叹气，抱着银发的头，靠向沙发。“老天爷！”在苦痛的记忆中忍不住喊出声来。又说起1960年的那个2月，饥饿的早春，太阳仿佛被寒霜冻住了的清晨。甘肃天水武山县，一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黑乎乎的小脸，就那样蜷缩在他的脚下……目光沉入往事，那揪心的痛，再次攫住了他。

1

1959年，大饥荒已席卷中国。那年向承鉴21岁，已戴上“右派”帽子三年。

“我这一生，受够了罪，要说享过点福，就是刚上大学的第一年。”他忆起1956年初入兰州大学的日子，那时，他意气风发，恰如刚“改天换地”后的这个国家。

他是苦孩子出身，也是“新中国”的红色少年，对共产党，“那是磕头作揖都表达不了的热爱。”

1938年，他出生在河南。才到人世不久，就遭逢河南大饥荒。

兵荒马乱，父亲携一家老幼逃难到江西九江，流落在武宁城里。父亲当脚夫，母亲和祖母纺纱织布，日夜操劳，生活仍然艰难。

1949年了，穷人突然成了新政权最信任的人。他家“根正苗红”，姐姐参了军，他学习好，门门功课拔尖，成了县里的第一批少先队大队长。上了中学，老师动员他入青年团，他自我检省：“我还不够格，需要继续努力。”

1956年，他考入兰州大学。兰大是当时全国五所理科重点大学之一，与北大、清华等比肩，又位处大西北，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下，有国家战略的意味。

他报了化学系，“重点大学的重点系”，系主任是左宗祀女士，和丈夫陈时伟（当时的兰大副校长）一起 1949年后从美国双双归来，是备受尊敬的科学家。“系里有七八位正教授，师资很强，我那时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自然科学家。”他说。

红色中国正在开启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从1949年开始，各种政治运动也让人目不暇接。“肃反”“镇反”“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不断在中国人内心深处“掀起革命”。而向承鉴，因尚没离开过校园，对政治运动还没有感受。“身心都如一张白纸。”

大学一年级，他最深的印象是校园里的伙食“好得不得了”。大学食堂里竟然还吃到过老母鸡。他家穷，此时一个月二十多元的生活补贴，心满意足，一心读书。兰大学习气氛浓，学校也要求严格，“两科不及格就要退学”，学生们学习劲头十足，实验室夜夜灯火通明。校领导甚至不得不劝同学们多休息，“身板好才能报效祖国。”

那场风暴，是在1957年5月渐渐浮现的。“五一”节前后，学校党委突然宣布“整风”，号召鸣放，每个人都要给党提意见。

“我再三想，绞尽脑汁，结论是，我对党没意见。”向承鉴说。但这可不行。学生会、系支部等，多次举办点心会、茶话会，请大家座谈，给党提意见。他没去参加，因为实在提不出意见。结果被批评，“提不出意见，说明对党没感情。”

最终，还是学校党委的再三动员起到了作用。5月下旬，有高年

级的同学，贴出了兰大“鸣放”的第一张大字报。

今年七十八岁的屈剑英，是兰大第一张大字报的执笔者，他是兰大历史系二年级学生。“大家响应党委号召，写大字报表达意见。我们几个同学商量的内容，主要是表达对学校管理的一些不满。由我执笔，写了两页。”2015年12月，屈剑英对雪访（编注：雪访为作者江雪的公众号）回忆起那个贴大字报的夜晚。他的同班同学、后来的“星火”创办者张春元也在其中。

一夜之间，校园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在党委的鼓励下，高年级的同学纷纷加入“鸣放”，“他们年龄大一些，经历的事情多一些，也能提出意见。”但在向承鉴的记忆中，学生的大字报没有什么“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内容，最多就是批评学校管理中的官僚主义。很多同学对兰大招生中的“吹牛”不满，认为学校的设施等和重点大学还有距离，于是出现“并校”呼声，要求把兰大并到北大等其它几所大学去。

在向承鉴的记忆里，当“鸣放”越来越热烈，学校和上级却不出面回应，学生的情绪逐渐高涨。5月底，兰大组成了“赴京代表团”，由副校长陈时伟带队，屈剑英是历史系的学生代表。2015年12月，他告诉雪访，“赴京代表团”当时在西安停留，见到了国家高教部的副部长刘凯丰。其时，刘正在西安处理西安交大学生的“鸣放”诉求，在西安人民大厦，屈剑英是与刘辩论的学生代表。

此时，在全国，知识界的“鸣放”也进行得轰轰烈烈，而政治风向比天气变得还快。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这是为什么》的著名社论，“整风鸣放”一下子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的“反右派斗争”。

几天后，甘肃日报以通栏大标题，整版刊发《兰大陈时伟的右派反党罪行》，陈时伟成了甘肃省第一个“大右派”。兰大校园里的各级“鸣放委员会”一夜变成了“反右委员会”。

向承鉴成了化学系一年级小班的“右派”。他并不是鸣放中的“积极分子”，鸣放开始后，他周末仍旧去图书馆看书。之后，他“莫名其妙”被班里同学选为“鸣放委员会委员”，就组织同学，

整理出自己一份唯一的“大字报”，标题是“某某教授访问记”，讲述了兰大一位教授在肃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中的遭遇。

除了赞成储安平“教授治校”之外，他的另一个罪名是“仇恨共产党”，因为他看了一张别人写的大字报，骂了句“该死”，被人举报说“要杀死共产党员”。

1957年7月，在副校长陈时伟的批斗会之后，兰大公布了首批“划右”学生名单，共二十多人，向承鉴也在其中。生活补贴停了，吃饭都成了困难，在冷眼和歧视中，他和其他的右派同学，只能去校外建筑工地上干活，来换一点饭吃。“我那么爱党，怎么突然就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敌人？”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号召检举揭发、“痛打阶级敌人，捍卫党和毛主席”的气氛中，同学之间的友爱也不见了。从暑假前到新学期，批斗会开了一茬又一茬，十九岁的向承鉴，成了兰大最年轻的“右派”，而且“气焰最嚣张”“最顽固”。因为生性倔强的他，始终不低头认罪，不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被“群众处理意见”定为“极右”。

屈剑英也被定为“极右”，开除学籍，立即送往兰州沙坪劳教。向承鉴不服，在最后时刻他找到了校长林迪生申辩。最终，他被降格处理，和另外四十名左右师生，包括此后的“星火”同仁——中文系的谭蝉雪、历史系的张春元等人一起下放天水，“保留学籍，劳动考察”。

这成了他命运的另一个分水岭。

五十多年后，他回望那一年，说，那也是他思想转变的分水岭。“反右”前那个“相信党的一切宣传”、从没有试着去独立思考的年轻人，内心深处，“一个迷信被摧毁了。今后，遇到任何事，都会去问个为什么？”

2

1958年7月，向承鉴等一行四十多人，离开兰大，坐火车到天水。到天水后，他们被分成了两部分，向承鉴、苗庆久等人到武山

县，张春元、谭蝉雪等同学被派到北道区(当时为天水县)的马跑泉公社等地。

向承鉴被派往武山县城关的联丰公社，住在村支书家里，和社员们一起劳动。被要求，“老老实实劳动，老老实实做人，接受改造，才是唯一出路”。

“反右之后，一切反对的声音没有了。毛泽东真正成了一言九鼎。”他说。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在农村，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也席卷了联丰社。

联丰人民公社是一夜之间突然成立的。向承鉴被派去布置公共食堂，刷写大型标语。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中，人们喜气洋洋，遵循毛的指示，“人民公社就是好”，开始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家家户户撤掉锅灶，到食堂吃饭。到处是标语“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

人民公社开始不到一年，大饥荒席卷中国。在这场人为的大灾难中，数千万人丧生。在张仲良主政的甘肃，死亡惨重。在通渭一县，死亡人数就占全县三分之一（据杨继绳《墓碑》）。2009年，《通渭县志》副主编张大发依据相关档案资料，出版了一本关于通渭大饥荒的书，书名就叫《金桥路漫》。

人民公社一成立，接下来就是“大跃进”狂潮。口号是“一天等于二十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向承鉴所在的武山县是全国闻名的红旗县，也不断放出“大卫星”，著名的是“玉米亩产万斤”和“白杨树上结苹果”。

向承鉴耳闻目睹了谎言包裹下的荒诞。“玉米亩产万斤”的卫星，在验收的时候，当地找来一批可靠劳力，挑灯夜战，把其它十多亩地里的玉米连根拔出，密密麻麻栽到“卫星田”里，密不透风，再放水把地浸湿，就看不出痕迹了。技术员跳到地里，数玉米棒和玉米棵数，算出来，远超过万斤。于是敲锣打鼓庆贺，干部们再去食堂大吃一顿，卫星算是放上天了。

随之而来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的狂潮。因为都去吃食

堂，农家的铁锅、铁铲暂时派不上用场，为完成大炼钢铁的指标，干部挨家挨户，把农民的铁锅摔碎，连农民箱柜上的锁头、锁扣都拆走了……

灾难的来临是有征兆的。在1958年这个疯狂的8月，受命去研制“高炉”的向承鉴，看到乡间山路上全是背矿石的人流，男女老幼，情绪高亢，唱着山歌。他在一瞥间，发现路边地里的庄稼已焦黄，麦粒全掉在地上，大炼钢铁的高潮淹没了往年夏天的“龙口夺食”，他心里掠过不祥的念头：来年日子怎么过？农民吃什么？

3

1960年的早春，记忆中最寒冷的2月。向承鉴永远记得那一天。

天冷得仿佛连太阳都冻住了，发出青色的光。路边的麦苗，还低低的，刚没过人的脚腕。他离开工厂，去附近的一个公社办事。正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地里干活的农民都停下来，呆呆地看着他。他莫名其妙，低头平整衣服时，一眼看到了那个饿死在路边的小女孩。

孩子大约有十一二岁的样子，“穿一件破烂的夹衣，蜷缩着。手伸在嘴边，嘴角挂着一块黑乎乎的东西，不知道是土坷垃，还是土豆……”

那一刻，他只是默默地站着，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妹妹，也就这么大……远处有人看着他，他无法大声哭喊，只得忍住心痛，走过一个大坡，转弯到无人的地方，才捶胸顿足，放声大哭。

“那一刻，我太痛恨自己了。为什么这样无能，甚至连记录下来的能力都没有。”他曾经在校报做记者。这时候，怨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相机，“为历史留下一个证据”。

在他的记忆中，从1958年冬天开始，在天水一带，农民就开始挨饿了。1959年春天，他因眼疾回了趟兰大，在兰州街上，满是沿街乞讨的农民，饭馆里供应的是“人造肉”“小球藻”等代食品，乞讨的人到处伸出干瘪的手臂。

在武山，他看到的，是携老扶幼的逃荒人群。人们没有目标，只知道向西逃去，去新疆，至少，那里能够活命。

1959年夏天，饥荒疯狂蔓延。在武山县，渭河河川一带的杜家垌、百泉一带，原来很富庶的地方，也没有粮食了。正在灌浆的苞谷地里，生产队派了人手持棍棒日夜值守，在当地的邓家堡，有社员因为偷挖土豆，用铁锨打死了看守的人。

在火车站一带，常常能看到饥民的尸体。向承鉴每进一次城，身上不多的粮票和钱都给了出去。

这年，他二十一岁。他一次次拿起笔，“要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

“我想，党中央和毛主席可能不知道农村发生的事情。要是知道，能让这么多人饿死吗？”可信写好了，又一次次撕掉。“你本身是右派，被管制的对象，人家领导明明说形势大好，你却说这里饿死人，这不是污蔑攻击社会主义吗？”他煎熬着，痛苦不堪。

饥民遍野，“大跃进”的鼓点却越擂越响，上级要求“社办工业，遍地开花”，向承鉴和他的同学，先被调去筹备化工厂，后来又调到盐井公社办厂。1959年9月，他有机会去北京出差买菌种，这次，他特意在铁路沿线的天水甘谷、山西太原、石家庄、天津等地下车，为的是验证内心的疑问，也做一点社会调查。

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到处是逃难的农民。在太原，他和已参加工作的哥哥发生了争执。哥哥指着城市里新建的高楼，说：“你为什么就看不到新中国的这些伟大成就呢？”

返校此时也变得遥遥无期。和向承鉴一起下放的兰大同学，如谭蝉雪等人，都曾返回学校质问，但校方只是推脱。“那时，每天去食堂打回一盆清汤，就是我们四个人的伙食，能照出人影。”2016年，时已八十二岁的谭蝉雪告诉雪访。那时，她和孙自筠等另外三位同学，在北道区甘泉公社劳动，与武山县相距大约六七十公里。

向承鉴一开始也吃不饱。但之后，当地的“头头”要利用大学生为自己干出政绩，把他们调去办厂，武山县委给了他们“高级知识分子”待遇：每月供应一斤清油，口粮三十斤，全是细粮。当时的

普通干部的标准是：清油四两，口粮二十六斤，百分之六十是杂粮。

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相比，这简直是天上了。

饥荒越来越严重，撒谎成风与毫无人性的掠夺仍在继续。1959年，在武山新寺公社召开的一次全县粮食现场会上，公社不但“超额完成国家公购粮任务，留足社员的口粮、种子和饲料外，还有堆积如山的余粮”。可向承鉴从杜映华（曾任漳县县委副书记，时任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因支持“星火”同学而被捕，1970年被枪杀）处了解到，那个现场会议上，成山的粮食，除了表面，麻袋里装的全是麦草……

人们在饿死。而盐井公社，却调集了脱产干部，到农村大规模收缴粮食。因为“高产”的公购粮任务没有完成，而农民却喊挨饿，“上头怀疑农民私藏粮食，全面收缴。家家户户，火炕刨开了，连枕头都撕开了，房前屋后，猪圈地窖都要挖地三尺……”

“到处是饿死的人。有的村子饿死的人没人埋，也没人挖得动墓穴，就动员中学生埋死人，埋一个可以得到四两粮的补贴。在一些家里，人死光了，都没得埋……”

五十多年后的这个夜晚，向承鉴对雪访回忆起这一切，还忍不住痛苦地叹息：太惨了啊，农民太惨了！七十八岁的老人，眼角隐隐有泪光渗出。

4

1959年11月，也一同下放天水的中文系同学孙自筠在天水北道被抓，消息随即传到了武山。

孙自筠是在给《红旗》杂志寄出信的一个多月后被抓的，当时他还正在田间干活。“我那时丝毫不知道其他同学的想法。只觉得自己有责任把看到的真相反映出去。”2015年11月，孙自筠对雪访说。

他那时并不知道，正是他的被抓，导致了星火同仁们对当局幻想的破灭。

“这时庐山会议已开过了，彭德怀上万言书，已被打倒。孙自筠被抓，让我们知道，必须放弃幻想了，要救苦难的农民，必须寻找另外的出路。”向承鉴说。

此时，在几十公里之外的马跑泉公社，张春元等已经开始行动了。据谭蝉雪回忆，1959年5月，张春元和她，还有顾雁、孙和等人就在马跑泉公社的拖拉机站碰头，一起商量在当下的情况下该怎么做，这是他们第一次讨论到要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到11月，他们又在北道的一个旅社，商量确定了办一份杂志，来传递思想，把党内外有相同思想的人凝聚在一起，为苦难的中国寻找出路。

这之后，谭蝉雪到武山来看望苗庆久，和向承鉴他们深谈，交流了办《星火》的想法。

年轻的心灵心心相印，他们决定立即就干。谭蝉雪他们之前已经开始组稿，并和北大的林昭取得联系。这次她拿来了几份稿子，包括林昭的长诗《普罗米修士的受难一日》。另外，就是顾雁撰写的发刊词《抛掉幻想准备战斗》，张春元写的《论人民公社》等。

因为缺一篇核心文字，向承鉴又写了两篇。“都是一口气写完。”他回忆。其中一篇是政论《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另一篇是《自白》。

那是在秘密的黑夜里。砖瓦厂原来遗留下来一个旧的油印机，小小的，也就一尺宽左右。房间里因为培养菌肥，平时不让人进来，所以是一个天然的秘密场所。11月，深夜已经很冷，他们拉上窗帘，在如豆的灯光下，开始刻印《星火》。

刊头上两个火炬，是苗庆久刻的。在“星火”两个字在中间，一边一个。发刊词是顾雁写的，题目是《放弃幻想准备战斗》。另外几篇文章，包括张春元的《论人民公社》，还有一篇《论粮食问题》。另有一篇，是胡晓愚写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赫鲁晓夫》。

那是极端黑暗的夜。向承鉴和苗庆久，在密室里，一点点刻出心目中光明的轮廓。向承鉴对雪访回忆，其中《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一文，边写边刻。第一期《星火》，仅仅薄薄的两页。刻印了共三十份，之后，“文章交给苗庆久保存，放在一个罐子里。”

印出来的《星火》，被他们以极秘密的方式，送了大部分出去。

那是石破天惊的文字。在这些文章里，耳闻目睹了苦难的他们，用自己的心灵，为农村呐喊，为苦难中的国家呐喊。他们对现实的反思，深刻到让今天的人，也会吃惊。吃惊于在那样的信息与思想隔绝中，他们的思考，能深邃到一个体制的腠理。

5

虽然早已做好了“献身”的准备，但向承鉴还是没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快。

1960年9月。“进地狱的时刻到了。”先是谭蝉雪在广东被抓，张春元前去营救，也身陷囹圄。9月30日，向承鉴在天水武山被捕。

“可以说，那时，耳闻目睹的现实让我太痛苦了，我早已下了必死的决心。”向承鉴说。“看到那么多死人，我就想，农民能死，我为什么不能死？”2016年3月，他对雪访回忆。

“1958年，大炼钢铁的后期，我的脚因为走山路磨出了一个鸡眼，去做手术时，没有麻药，我说，没麻药也要做，我要去体会那种凌迟的感觉。”他说。也正是因为早已放弃了一切幻想，在随即而来的严酷审讯中，他也没有低头。

在天水监狱，“星火”一案已是惊动上上下下的“右派反革命集团”大案。张春元、谭禅雪和他都是要犯。“11号”是向承鉴的代号。此时，和他们一起被抓的，除了“星火”同学，还有支持、同情他们的武山县委常委杜映华，以及牵涉到案件中的本地农民。在武山，一夜之间被抓的有三十三人。而在上海，林昭和已返回老家的顾雁也被抓。

在监狱里，向承鉴一次次和审讯者对质，把审讯者变成了被审者。“你们的眼睛瞎了吗，看不到那么多饿死的人？即使眼睛瞎了，也能闻到遍野的尸臭吧！”他在自传《炼狱归魂》一书中，记录了当时的情景。他也因“态度最为顽固”，最终被判重刑。

1965年，已在兰州砖瓦厂服刑的向承鉴见到了一个叫张炳秋的

犯人。张在当年审讯时，是在现场的武警干部，此时因重婚罪判刑。“张炳秋后来对我说，当时你痛骂审讯的人，那些话让人脊背都发凉！”2016年的这个3月，向承鉴对雪访回忆。

1963年7月1日，武山县召开了公判大会，向承鉴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在之后，其余同道，也都各自领刑。1965年元月，在天水体育场的公判大会上，张春元被判处二十年，谭禅雪十四年……

向承鉴先后在兰州砖瓦厂服刑。之后又被转往青海海南州的农场劳改。

那是最为艰难的岁月。牢狱外，“文化大革命”开始，牢狱中，更要处处小心，在艰难的劳动中，唯靠内心的信念支撑着，活下去。

1970年，向承鉴再次面临极为凶险的命运。正是“一打三反”最严酷的时刻，在劳改队，每天都有人被拉出去枪毙掉。一批政治犯，如遇罗克都是这个时候被处决的。向承鉴此时尚不知道，在兰州，他的挚友、“星火”同道张春元、杜映华，也正是在1970年3月被杀害。在之前殉难的，还有北大的林昭。

作为劳改队小组的读报员，有一天，他保管的《甘肃日报》，头版毛泽东的大幅照片上，前额被人用烟头烫出了一个洞。

他立即成了破坏伟大领袖的嫌疑人。检察院专门来人调查，材料写了一遍又一遍。那段时间，监狱里每天都更换新的杀人布告。

也许是命不该绝，他终于逃过了这一劫。1971年，他和其他犯人被调到了青海德令哈农场。之后，过上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服刑岁月。

1978年，十八年刑期已满。向承鉴穿着一件黑灰色的棉袄，走出了劳改队大门。他昂头挺胸。“这十八年，我没有一天，认为自己是一个罪犯。”在照相馆里，他为自己拍下了十八年来第一张照片。

他回到家乡武宁，父亲已垂垂老矣，亲人们相见，痛哭无声。

之后，他便开始申诉之路。经过漫长的等待，到1980年，“星火”全案得到平反。

他记得，1980年的那个早春三月，拿到一纸平反书后，他去了黄河边，祭奠死去了的同学、旧友。他是孤独的。没有人跟随他。是的，经历过这几十年的浩劫，人们怕了，也不敢了。

他一个人，跪在黄河岸边，祭奠那些冤死的灵魂。

他怀念张春元，那极富行动力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还有杜映华，一个因为良知而不愿放弃思考的中共基层官员；他们，都已为“星火”殉道，在1970年的黑暗岁月里，因一直坚持着自己的理想而惨遭杀害。

他怀念冯淑筠。那是他最好的朋友，一个宁可自己戴上右派帽子，也不愿“揭发”他的人，因为他，受到莫须有的株连，后来流落到新疆，死于坍塌的煤矿……

还有邓得银，1959年探亲返校，曾在水天与他相见，为四川饿死的乡亲们痛哭失声。“文革”时，在通渭一中，被活活打死……

还有史美堂，那样英俊洒脱，很早就参加革命、又到兰大来求学的上海青年，被打为“右派”劳教，听说是死在了新疆的电网……

他是在自己重获自由后，才知道“反右”后他们各自的境遇。那些年轻的容颜、焕发的神采、高尚明晰的头脑，一个民族最杰出的年轻人，就那样在人为的浩劫中被一个个摧毁。很多人，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今天可知的是，仅仅在甘肃，就有两万“右派”。而他们的故事、文字记录，寥寥无几。写下自传的，也不过数人而已。

“我会永远怀念着他们，除非有一天，我也在这世间消失……”这个早春，在夜的清寒中，向承鉴深深叹气，目光沉沉，坠入永恒的痛念与追问里。

2023年11月27日刊于《中国数字时代》

附录三：向承鉴及其《星火》冤案年表

艾晓明 整理

向承鉴，生于1938年农历冬月廿九即1939年1月19日，河南省光山县人；身份证的出生记录为1939年6月15日，系他人误报。

祖籍河南，祖辈农民，幼时父母带一家人逃荒到江西武宁。家中有祖母、父母、兄弟姐妹共五个儿女。母亲早逝，父亲再婚；少年时代与父亲、继母共同生活。

1952年，13岁

9月，由武宁一中转学到九江一中，至1956年高中毕业。

1956年，17岁

考入兰州大学化学系。

1957年，18岁

5月，兰州大学开始鸣放，参加鸣放两周时间，这期间被选为56级一班的鸣放委员。

6月底或7月初，被划为右派。暑假返校后经历连续批斗、“疲劳战”。

7月，被兰州大学“点将台”点名划右，在系里进行批判。

1958年，19岁

3月，化学系被划为右派的教师张我权被捕，罪名是“现行反革命”。

5月，与右派学生史美唐二人在化学系二年级学生中被划为极右，史美唐被送劳动教养，向承鉴所受处分为“保留学籍，劳动考察，以观后效”。

7月中旬，离开兰州大学，与兰大右派师生四十一人，被送到天水、武山接受劳动考察。在武山县联丰高级社参加劳动。

8月，与苗庆久一起被调去县委办《工地快报》；后又受命研究炼铁炉，搞矿产资源普查等工作。

1959年，20岁

3月，患眼疾；4月，返校治疗。

5月，回到武山，看见县城内到处是逃荒人群。多次挥笔，拟向党中央报告民生疾苦。后得知孙自筠因给《红旗杂志》写信反映情况被捕，放弃上书意图。

《星火》发起人张春元、顾雁等决定要在绝境中探索变革之途。

调到东顺化工厂，与已在这里工作的苗庆久、孙和等兰大右派师生五人会合。在这里认识了武山县委常委、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城关公社第一书记杜映华。

8月，调到盐井公社办综合菌肥厂。

9月，出差到北京购买菌种；归程中观察了沿途各省市饥民逃荒的严重状况。

11月，盐井公社开展反瞒产、收缴粮食的大规模行动。

11月底，张春元、胡晓愚、顾雁和苗庆久四人在天水北道埠的一个旅社里，讨论了创办《星火》事宜。

12月，参与创办刊物《星火》，撰写了其中的政论文章《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后来又写了《自白》《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

1960年，21岁

1月，与苗庆久一起刻印《星火》第一期；在刊头下刻出“一九六〇年元月出版”，“星火编委会编印”。

将《星火》第一期曾送给何之明、杨贤勇阅读。何之明为《星

火》第二期供稿两篇，分别为《论“政治挂帅”》《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杨贤勇供稿一篇，题为《从一首歌谈起》。

此后为《星火》第二期写了三篇文章，分别为：《不打自招——评〈人民日报〉社论〈南泥湾的方向〉》《三月的农村一日：一个农民的口述记录——目前农村剖视之一》《告全国人民书》。《星火》案发后，所有稿件均被搜走，成为罪证。

1月，与武山县委干部杜映华深入交流，对现实问题达成共识。

2月，路见女童饿殍，深受震动。从同学邓德银处得知四川大饥荒的严重程度。

4月，苗庆久、张春元和顾雁在顾雁上海郊区的家中聚会，计划针对时弊写文章向高干散发；拟于8月份在全国五大城市（北京、上海、武汉、广州和西安）通过邮寄方式传递到高层干部手中，并商定由向承鉴作为在西安发信的联系入。文章为张春元执笔的《论人民公社》，当时已印了三百份左右。

同月，甘肃省公安厅指示武山县公安局，“兰大（后并入西北师大历史系）右派分子陈幼达向省公安厅反映：兰大下放在武山及天水等地劳动锻炼的右派分子张春元、谭蝉雪、孙和等人经常去兰州与学校右派互相来往，秘密交谈，散布反动言论，行动十分可疑。”

（据谭蝉雪《求索》，第110页）

有关此案的举报线索，另见1980年2月4日《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结案报告》开头第一段：“一九六〇年四月武山县公安局根据省公安厅电话通知和郑连生、柴志德（在武山劳动考察的右派学生）和雷鸿吉（通渭县法院干部）反映的情况，经过五个月的侦察，于六〇年九月三十一日破获了以张春元、苗庆久为首的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据顾雁保存复印件）

5月，向承鉴与张春元商量印行《星火》第二期事宜。写出短篇小说《食母记》。

5月2日，“武山县公安局收到在武山劳动考察的兰大学生郑连生、柴志德交的书面反映材料一份，内称：下放劳动考察的右派张春元、谭蝉雪、孙和、向承鉴、苗庆久等十五名右派在搞反革命

组织。”（谭蝉雪：《求索》，第111页。）

6月，向承鉴得知谭蝉雪在广东偷渡被捕，忍痛将为《星火》第二期准备的三篇文稿付之一炬。这三篇文稿包括：林昭的长诗《海鸥》、何之明的《再论人民公社》和向承鉴新作《食母记》。

7月，张春元为营救谭蝉雪到广东开平看守所，很快被识破身份而被捕。

9月，谭蝉雪、张春元分别被押解回兰州。警方开始对《星火》相关人员（以兰大右派学生为主）进行大搜捕。

9月29日下午，受命去贺家店镇。

9月30日凌晨被捕，在武山县看守所被单独关押，代号十一号。

至9月底，武山县一夜之间共逮捕了三十三人，其中兰州大学师生八人，农民二十五人，天水方面逮捕了包括谭蝉雪、张春元等兰大师生共四人。

10月，《星火》发刊词作者顾雁在上海老家被捕。《星火》所刊用长诗的作者林昭、谭蝉雪联系过的北大助教梁炎武相继被捕。

1961年，22岁

1月，首次被提审，要求政治犯权利，后得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文集》等，在六平米的小监号中开始研读。

阴历年前，第二次审问。

4月，其他同案难友转到大监号后，依然被关在小监号。长达十个月里，除了放风的瞬间，未见过阳光，未呼吸过新鲜空气。经抗议，得到一点晒太阳的时间。

在多次审讯中，痛斥独裁，抨击暴政。

7月，张春元从监狱劳改医院逃出，到定西后扒车到达上海、杭州。甘肃省公安厅向全国发出通缉令。1961年9月6日张春元在杭州被捕归案；1962年被送至位于天水的甘肃省第三监狱关押。

1962年，23岁

1月，元旦后，向承鉴脱离单独关押小监，被转到大监号。不

久，被指在犯人中进行反革命宣传而戴手铐惩罚。

7月1日，武山县法院在武山县洛门镇召开宣判大会。会上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判决书上的时间为1962年3月23日）。

在武山看守所关押二十二个月后，转到位于天水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

1963年～1964年，24岁～25岁

春节期间，狱方组织观摩墙报，偶然在一个监房里看见被关押的《星火》首犯张春元。此时张春元尚未得到判决，两人不知彼此情况已有两年半。

春节后，上诉被驳回，天水中院在监狱里召见并宣读判决书，此终审判决的签发日期是1962年8月25日。

从这个判决中确认，向承鉴在看守所期间秘密写下并托获释犯人带出的诗文，已落入当局手里。

3月，与同案难友苗庆久、杨贤勇、何之明离开天水，被转押到兰州新生砖瓦厂服刑。先被分在一中队装窑分队，后调到出窑分队。

1965年，26岁

1月，天水体育场召开万人宣判大会，“星火”案中，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胡晓愚被判15年，谭蝉雪被判14年，胡学忠被判5年。

1965年，研究砖瓦生产技术，进行改造砖窑的试验。

被狱方调去搞创作，写了剧本《逃跑无处去》。

1966年，27岁

6月，“文革”开始。

被狱方当作“反改造尖子”，在死刑犯判决时陪斗。

继续专注于生产技术，研究如何减少生砖、降低煤耗。

从1963年3月至1966年12月，在砖瓦厂劳改共计三年零九个月。

12月，离开兰州，调到河西饮马农场劳改。

1967年，28岁

到饮马农场后分在场部基建队，先在黄闸湾修引水渠跌水，开春后，从事倒土坯、挖排碱沟等重体力劳动。

1968年，29岁

6月，给胞姐写信请求寄棉被。不久收到信后得知祖母去世，次日又收到第二封信，姐姐被迫表示不能帮助他，不承认姐弟关系。感情上深受打击，又担心姐姐受到株连，大病一场。

9月，在不省人事时被抬上汽车，调到饮马四站基建队。

年底，病情略有好转。冬训开始，被诬陷为反革命集团案件“何案”的幕后总指挥、首恶，最后不了了之。

1969年，30岁

3月，被取消病号饭，逐出病号室，回基建中队四组，跟大田犯人一起出工劳动。

夏天，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连续接受干部外调，要求交代大学期间和右派同学的关系。

1970年，31岁

1月，随大批重刑犯人从甘肃调往青海。从玉门上车，坐闷罐子车约两三天后到青海湟源。下车后乘卡车，由军警武装押运，大约在元月10日左右，到达青海省贵南县巴仓农场。

3月22日，张春元、杜映华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1971年，32岁

春节之夜，饥饿难熬，试图抢劫食物，未果。

“一打三反”运动开始，从枪决布告上看到，被杀戮的犯人均有思想言论罪。

9月，因他人抽烟，舍房里《青海日报》上的毛像被烟灰燃了一个洞。向承鉴被怀疑为作案者，成为重点打击对象；名字上报到贵南县公安局，如定罪可能被处以极刑。1971年9月至1972年春节，在死亡的高压下备受煎熬。

1972年，33岁

巴仓农场粮食收成有限，无法满足犯人基本的生存需求。春节后，随大批犯人调出，到青海德令哈农场。

在德令哈，被分到杂海分场二大队五中队五组劳改。

1973年，34岁

服刑进入第十三个年头，当上“自由”犯，得以在农场内自由行动。

与长者姚士彦一起搞菌肥生产，结为忘年交。姚士彦是民国时期知名报人，1955年肃反时入狱，被判十年。1965年刑满释放，强制留场就业。

1974年，35岁

8月，调到杂海一大队二中队。

1975年，36岁

春播结束后，调到大队机务队修理组。

1976年，37岁

毛泽东逝世，中国政治形势开始发生变化。

1977年，38岁

冬训后被调去当辅导员，负责辅导大队里读中学的干部子弟的学习。

1978年，39岁

9月30日刑满，与父亲联系。

1979年，40岁

调到德令哈总场的育红中学。

收到中共兰州大学党委会关于向承鉴同志右派纠正通知书，针对通知中所谓在鸣放中“有错误言论”，签字“坚决不同意”。

6月，先去北京探望胞姐，后返江西探望了家乡亲人，与父亲、哥哥、弟弟团聚。

同月，天水中院与武山县法院根据“星火”案苗庆久、孙和、向承鉴等多位当事人申诉，对此案进行复查，复查后认为：“该案反革命目的明确，并具有反革命行为，性质仍属敌我矛盾，经中院党组研究，原定性‘右派反革命集团’予以纠正，定性‘反革命集团’，维持原判。”（据1980年2月4日《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结案报告》）

《星火》案受害人先后回兰州大学，陈述冤情，要求平反。甘肃省高院成立专案组，指导天水中院复查此案。

11月，接到兰大难友电报，动身回校落实政策。7日到达兰州大学，与同案难友会合，共同要求平反。

12月，实名给邓小平写信，强调反右的恶劣性质和悲剧性后果，要求彻底否定1957年的反右运动。

12月底，与五位难友一起去天水中级人民法院，要求加快案件复查。

12月26日，天水中院党组研究，对张春元维持原判。（见1979年12月30日《关于张春元一九六五年年、一九七〇年两次被定现行反革命判刑的复查报告》）

1980年，41岁

1月，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决定，并分别向天水市法院和武山县法院发出平反通知。

2月4日，在天水地区中级法院《关于张春元、苗庆久右派反革命集团案件结案报告》中，对张春元，“以反革命罪，维持原判”，向承鉴“定性为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免于刑事处分。”其余二十二名“案犯”当事人，撤销原判，宣告无罪。

3月，天水中院将处理决定函告上海市静安区法院。同时，在兰州大学，由“落实政策办公室”负责人对此案在校当事人宣布平反决定。

向承鉴不接受对自己的定罪改判，提出申诉，要求当面进行无罪辩护。

领了五百元“错划右派生活困难补助”。

5月1日，在兰州连城铝厂报到，分配到子弟中学任教。

5月4日，与师风枝完婚。

5月17日，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对顾雁、梁炎武宣告无罪，予以平反。

7月，重返天水武山，看望乡亲。

继续为逝去的难友呼吁，与难友何之明联名上书甘肃通渭县法院、检察院和中共通渭县委，就邓德银受株连致死一事提出诉状，使邓德银的冤案昭雪，母亲得到每月二十元的抚恤金。

11月，见到难友冯淑筠的长女，冯淑筠“文革”期间在新疆一个煤矿事故中遇难。和兰大难友一起帮助她拿到冯淑筠的《右派改正通知书》和五百元困难补助。

1981年，42岁

3月9日，儿子出世。

4月28日，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对张春元撤销原判决，宣告无罪。

7月，向承鉴得到天水中院判决（与张春元无罪判决同签发），宣告无罪。

12月5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对林昭宣告无罪（撤销1962年的有罪判决和1967年的死刑判决，撤销1980年以“患有精神病”

而不应以反革命罪论处的无罪判决)。

1982年，43岁

为许之品案的平反写申诉，未能达到目标。

4月，在《民主与法制》读到陈伟斯署名文章《林昭之死》。

1984年，45岁

得到兰州大学本科生的毕业证书，距1958年离校接受劳动考察处分已有二十六年。

1985年~1996年，46~57岁

一直在兰州连城铝厂子弟中学任教；职称为中学高级教师，历任教导主任、副校长、校长。

1996年6月19日退休。

退休后开始写作，1999年末，论著《马克思主义的异见与反思》脱稿，2002年终稿。2014年4月，九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2003年8月8日，在江西武宁黄墩乡下小屋完成自传回忆录《炼狱归魂》，全文曾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民间历史”网站上连载。

2010年9月至今，定居故乡武宁。

编后记

向承鉴老师的这本回忆录，我最初是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民间历史”网站上读到的。“民间历史”更换网址后，这部回忆录已经很难检索到。由此，我产生了将全文整理出来推荐给读者的想法。

正好向老师定居的家乡武宁离武汉不算远，因此在文稿整理过程中，我有幸得到向老师的支持和指点；遂有了这部新的修订版。我的工作主要是核查事实和文字校对，并与向老师交流后定稿。为了方便研究，在我附录中收入了谭蝉雪老师整理的向老师为《星火》撰写的六篇文章，还有江雪对向承鉴的长篇访谈；此外我也整理了作者与“星火”案的年表。

“星火”一案，无论是当年发生，还是现在来回顾，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当事人付出的生命代价是非常沉重的。而至今“星火”案的幸存者已寥寥无几，若说“抢救历史”，这一抢救可说是已非常紧迫。随着谭蝉雪老师以及“星火”的各位幸存者相继去世，曾经被“抢救”出来的案卷资料也有可能再度湮没。

例如，向承鉴当年写的六篇文章，我虽想再次校对一遍；但因为复印的《星火》第一期（是在谭蝉雪老师的复印件基础上再次复印后拍的图像）页数不全，字迹模糊，手头又缺乏《星火》第二期文章的原稿复印件，因而只能直接采用谭老师收录于《求索》书中的篇目了。谭老师的整理和录入，就辨识文本的准确性而言，是非常值得信任的。只不过，个别读不通的字句，如果有原件存在，则更方便判断，这是属于作者的特殊用语还是当年刻录时的笔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星火》在未来还会被不断回顾和讨论，因此，保全原始手稿的完整性，也就非常重要。

求实和保真，是整理幸存者文献这一工作应该追求的目标。求

实，是指忠于事实；保真是指对史实的叙述进行考证，保存其真实性。然而，个人叙述的完全真实，其客观标准又是什么呢？任何个体的记忆，由于意识形态的压抑、历史悲剧的创伤后遗症或者仅仅是衰老、时光流逝，必然有错漏，有重叠，有选择，有破损和空白；谁能保证写下来的一切都精准无误？所以，假如读者发现这部回忆录里有个别细节失实，有传闻或者转述的不准确，可以再去寻找真相，挖掘细节，补充我们对那个时代的认识。作为审校，并不能直接去修改作者的记忆，个别事实的出入，仅以加注的方式说明。

但这种情况在本书中是很少的，在几个重要的主题上：高校反右、甘肃大饥荒、知识分子的求索与抗争、西部劳改和争取平反——作者的描述基于其亲身经历，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和认识，这将是它的生命力所在。

相比之下，以犹太人经历的大屠杀而言，二战刚刚结束，有关历史真相的调查就展开了，从那时开始积累至今的史料，为避免历史悲剧奠定了坚不可摧的基石。我曾推荐过美国历史学家杨·托马斯·格罗斯（Jan Tomasz Gross）的开创性研究《邻人》（*Neighbors: The Destruction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in Jedwabne, Poland*），其中，为呈现耶德瓦布内——一个波兰小镇屠杀事件的真相，他采用的史料相当丰富，包括幸存者在1945年的证词、1949年5月至1953年11月对谋杀嫌疑人的庭审记录、1980年遇难者的亲友和后代保存的证言、遇难者照片、1998年波兰导演的访谈录、同时代人的研究和作者自己的实地采访。这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调查，还可以说，相关史料和认识的更新，至今也没有终结。

不言而喻，当代中国人所拥有的历史真相是严重不足的。粗略地说来，这首先是因为意识形态机制的刻意压制，再则，从那个时代幸存下来的人们中，同时具有为历史作证意识和写作能力的人，毕竟也是少数。留存下来的证言之所以少，还因为造成大悲剧的历史条件没有彻底改变。幸存者的写作，往往是自印本的形式，印数很少，也传之不远。有些很好的作品，在境内无法得到出版支持，在境外也难以获得市场。

也因为如此，向承鉴老师的这部回忆录完稿后二十一年，一直未正式出版。如果它依然是以网文的形式流传，一来很容易被封禁，二来其特点难以显现，容易淹没在浩如烟海的网文里。

我自己对“抢救历史”的看法是，不仅要有“抢救”的动作，而且要“救活”。抢救历史，包括而限于三个方面：一是鼓励亲历者提供证言；二是保全这些证言；三是让它进入传播，与当代人对话。这样，含有史实和史识的个人叙述才算存活下来；而不至于失传。例如，像《炼狱归魂》这样的书稿，值得以更好的方式存在：它应该达到专业图书的编辑水准，有和内容相匹配的出版装帧（包括电子版）。如此，它能够进入专家学者的视野，被大学的图书馆以及专题数据库保存；不仅对普通读者成为可及的，而且，对于形塑公共意识和知识经典成为必不可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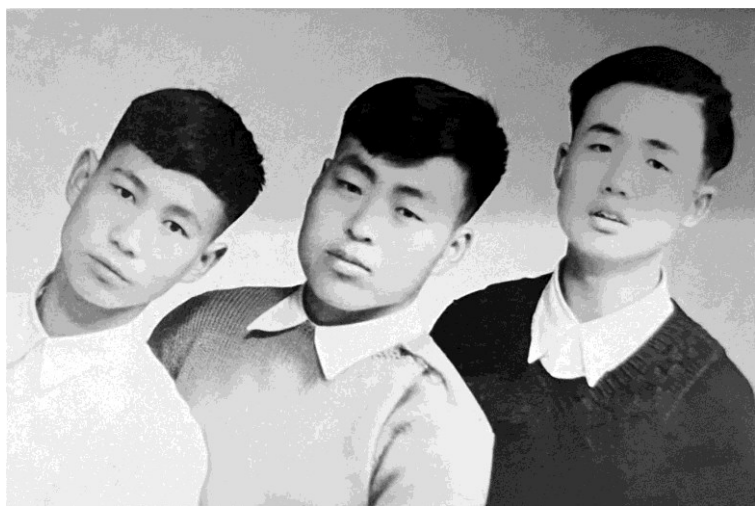
现在向承鉴老师的这部回忆录可以成书，我觉得这是很重要“抢救”且“救活”历史的努力。愿有更多的人加入近来，收藏和整理散落在民间的历史文件、个人记录与幸存者回忆。我相信，这不仅会唤醒很多中国人沉睡的历史意识；而且，未来的道路也会因此而清晰。

艾晓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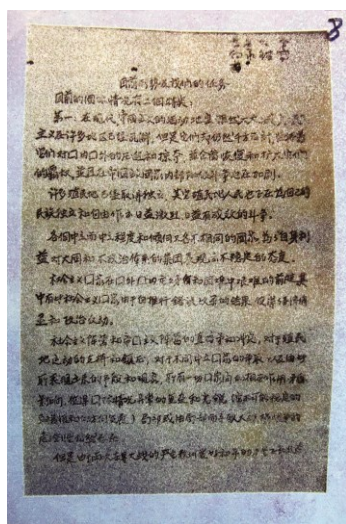
2024年2月6日于武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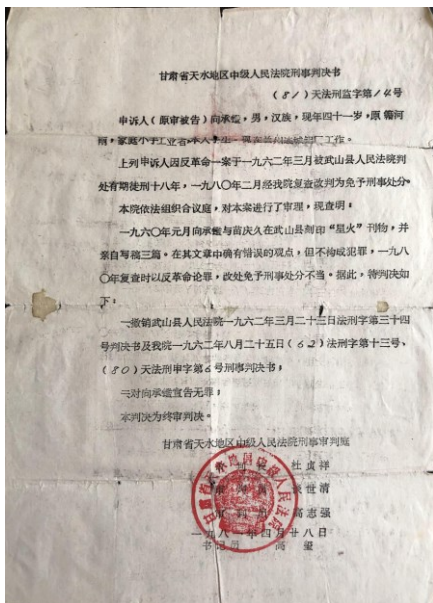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向承鉴，2022年6月，艾晓明摄。



上：向承鉴（左一）与中学同学合影，摄于九江，1956年。
下：向承鉴（后排左二）与中学同学合影，1956年摄于武宁。



上：向承鉴（左一）与大哥和大哥的女友合影，1959年于太原。
下：（左）难友冯淑筠遗照。（右）《星火》手稿，1960年元月。



上左: 18年刑满后的第一张照片,摄于德令哈。
 上右: 1981年4月28日,对向承鉴宣告无罪。
 下: 1979年暑假,第一次从青海回故乡武宁探亲。



上：向承鉴、师风枝结婚照，1980年五一摄于兰州。
下：向承鉴、师风枝合影，2004年10月于兰州。



上：2007年9月重返德令哈，与当年的难友合影，师风枝摄
下：在场部附近的坟场，一位上海死难者蒋志强之墓，由其大哥志国、大姐银萍立碑纪念，2007年9月，师风枝摄。



上：在借居的乡下小屋写作《炼狱归魂》，2003年11月，师风枝摄
下：与北京难友任众合影，2023年12月，艾晓明摄

